罗辑思维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罗斯福传

坐在轮椅上转动世界的巨人

（美）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著
张帆 蒋旭峰 王珊珊/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罗斯福传：坐在轮椅上转动世界的巨人

作者:康拉德·布莱克

ISBN:978750860436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第一部分 天生是个绅士
1882~1932



01
美好岁月展现在你们眼前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给远亲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贺词——后者当时与总统的侄女埃莉诺·罗斯福订婚

I

1882年1月30日，一位母亲在经历了24小时的分娩之痛并使用了麻醉剂后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当时浑身青紫，一动不动，但重达4.5千克，是家庭医生成功地用人工呼吸救活了这个婴儿。他的父亲记录了他的降生，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体型巨大的男婴”。

这个生命力异常顽强的男孩，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罗斯福夫人卧床达一个月之久，医生劝告说，最好不要再生育。在此后近60年的时间里，萨拉·德拉诺·罗斯福把自己充沛精力的大部分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并寄予厚望。

年幼的罗斯福在经历一番磨难后才来到世上，但其父母富裕而有爱心，他们生活在一个讲究教养的环境中。他出生在斯普林伍德，从他家的宅邸放眼看去，流经纽约海德公园的哈德孙河尽收眼底。在壮观的哈德孙河的东岸聚集着50户左右拥有宽敞宅邸的人家，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罗斯福家是其中之一。哈德孙河在这一地区缓缓流经威斯特切斯特县和达奇斯县，包括莱茵贝克到塔里镇的这一段——塔里镇

附近的“睡谷”早已因为华盛顿·欧文笔下的有关瑞普·凡·温克尔和伊卡博德·克劳恩的传奇故事而闻名遐迩。

罗斯福家族并非此地的资深居民，这一荣誉应该属于那些早期的荷兰家族，如斯凯勒家族和范·伦瑟尔拉尔家族；他们也远不是最富裕的，大大不及艾斯特尔家族、贝尔蒙特家族、范德尔比尔特家族，以及最富有的、宅邸更为富丽堂皇的洛克菲勒及其他一些家族。但他们生活惬意，地位显赫，且性情温和。

罗斯福终身都倾心于他家周围的那个区域，不断汇编和研究模糊不清的当地历史，并一直痴迷于当地生活中的琐碎细节。

新世界的第一位罗斯福是那位于1650年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的克莱伊斯·范·罗斯福，而第一位德拉诺则是那位于1621年抵达普利茅斯的胡格诺派教徒菲利普·德拉诺伊。

20世纪30年代，有一种理论广泛流传于那些反犹色彩浓厚的团体，即罗斯福家族源于犹太血统。在1935年的一封著名书信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一位犹太学者对此事的书面提问做出回答，指出：自己的荷兰裔祖先可能信奉某种宗教，对此他并不感兴趣，他只希望他们都是“品德高尚、信奉上帝的人”。

罗斯福家族通过经营曼哈顿的房地产、干货，以及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糖的业务而兴盛起来。他们与一些名声良好、财产殷实的家族通婚。

在18世纪的罗斯福家族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爱国者伊萨克”。1776年，这位富裕的食糖进口商由于不满无理的征税而在地方议会中投票支持独立，并在英国人占领纽约后逃离该城，前往其家人所在的达奇斯县。他参与纽约州宪法的撰写，倡导联邦主义，是亚历山大·汉

密尔顿的盟友，并与汉密尔顿和其他人创立了纽约银行，且一度担任该银行行长。

菲利普·德拉诺来到新世界，他的一个儿子乔纳森·德拉诺在菲利普国王战争中战功显赫，被赠予3平方千米的土地，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特附近的费尔黑文村。他的孙子沃伦·德拉诺于19世纪初开始从事航海业，把农产品运送到不列颠、加那利群岛以及墨西哥湾，并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船主。沃伦的儿子沃伦·德拉诺二世，也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外公，于1809年生于费尔黑文。

1812年战争结束时，沃伦·德拉诺在公海上被英国人拘禁了两周，家族对大英帝国持久的怨恨也许就是这样开始的。新英格兰人的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甚至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南非战争中，他完全同情布尔人）。作为纽约乡绅的后裔，他是一位亲英分子，但作为新英格兰航海者的后代，他又具有某种文明竞争的意识。

沃伦·德拉诺行事张扬，在其影响下，沃伦·德拉诺二世于1833年远航中国，开始从事东方贸易。由于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他在生意上遭遇到了麻烦。后来的罗斯福家族成员，包括富兰克林，他们所继承的巨额财富大多源自德拉诺家族成员在鸦片贸易中的所得。

1846年，沃伦·德拉诺二世结束其在中国的短暂经历返回美国。他将自己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获得的收益投资于纽约房地产、铁路以及各种矿产开采活动。沃伦的兄弟富兰克林与美国首富约翰·雅格布·艾斯特尔的孙女结婚，开始了两个家族间的长久联合。1852年，沃伦·德拉诺二世在哈德孙河西岸、海德公园以南32千米的地方建起一座豪宅——阿尔戈纳克。1854年9月21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德拉诺就出生在这里。

罗斯福家族在19世纪上半叶的成就相当一般。1820年，爱国者伊萨克的儿子詹姆斯在芒特霍普——位于离海德公园不远处的哈德孙河岸建造了一座舒适的住宅。他的长子伊萨克尽管取得了医师执照，但怕见到鲜血而放弃从医。芒特霍普的住宅完工后，他前往那里，过着一种隐士般的生活：虔诚中带着郁闷，癔病般郁郁寡欢、与世隔绝。令周围人感到惊奇的是，1827年，他与年龄相差甚大的玛丽·吕贝卡·阿斯平沃尔结婚，后者当时19岁，来自一个经营船舶运输的富裕的家族。下一位詹姆斯·罗斯福，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父亲，就是这对看似不大般配的夫妻所生，他于1828年7月16日出生在芒特霍普。

他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其谨小慎微、学究气重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天生是一位绅士，谨慎、有教养、举止得体，他见多识广，活跃幽默而又节制，深深扎根于生长的社区。除内战时期外，在其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年都去欧洲旅行。

为人父之后，伊萨克医生变得活跃起来，他在芒特霍普对面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宅第——罗斯戴尔。詹姆斯先生（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父亲的一生中，人们几乎总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度过了愉快但也孤独的童年。父母很溺爱他。9岁前，他一直由家庭教师授课，直到13岁就读于实行进步教育法、教学环境宽松的鲍基普斯特别学校。他的父亲对纽约城的腐败生活持保留态度，要求詹姆斯与其住在布利克尔街的祖父、祖母生活在一起，后来则把他送往位于施切勒克塔迪的联合学院。

詹姆斯·罗斯福曾在20岁时加入加里波第的统一军，但仅待了一个月。按其子富兰克林在1941年的说法，经加里波第同意，詹姆斯先生从红衫军退役。

他于1849年秋进入哈佛法学院。他是一名聪明且受人欢迎的学生，学业一帆风顺，1851年毕业。两年后，他被选举为人们梦寐以求的校园社团——波司利安俱乐部的名誉会员。

1851年至1853年期间，詹姆斯·罗斯福就职于纽约著名的本杰明·希利曼律师事务所，是其中一位年资较低的成员。他将那里的工作作为通往商业世界的跳板。1852年，他成为联合煤炭公司的一名主管，他的舅舅威廉·阿斯平沃尔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在当时的美国，铁路是最容易引发金融震荡但也是增长最快的行业，詹姆斯先生在20多岁时成为坎伯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

1853年4月27日，詹姆斯先生与其表妹吕贝卡·布瑞恩·豪兰德结婚。在尼亚加拉瀑布度完蜜月后，他们住进了芒特霍普，接着在秋天首次双双踏上前往欧洲的旅程。

詹姆斯和吕贝卡在伦敦造访了美国公使詹姆斯·布坎南，后者邀请詹姆斯去美国使馆担任其秘书，直到新的工作人员抵达伦敦。詹姆斯应邀就职，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传统：海德公园罗斯福家族与民主党总统（布坎南在三年后成为总统）共事。

不清楚的是，詹姆斯是在何时成为民主党人的。秉承罗斯福家族传统，他是一位资深辉格党人，而且对安德鲁·杰克逊的人民主义主张所引起的巨大骚动记忆犹新，这种主张曾激怒了老一辈的罗斯福家族成员，其程度不亚于另外两位罗斯福——他那位还是婴儿的远房亲戚特迪以及他自己尚未出世的儿子富兰克林，将会分别于40年和70年后在他们同时代人中引起的震怒。

在背离衰败不堪的辉格党的同时，詹姆斯还与其父亲所信仰的冷酷无情、僵硬死板的荷兰归正会分道扬镳。对伊萨克医生而言，死亡随时可能来临，这最终在1863年成为现实，当时他73岁。

詹姆斯因伊萨克医生的去世而变得非常富足，并成为他所在的家族分支的家长。在芒特霍普的那场火灾后，詹姆斯买下海德公园那所简朴但位置优越的住宅，并将之重新命名为斯普林伍德。这里将会诞

生美国历史上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伟大的领袖，这里是他长大成人并经常重返的地方。

相对于罗斯福家族，或至少相对于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家庭成员，德拉诺一家人更是一些历经磨炼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在19世纪下半叶的前25年里一直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沃伦·德拉诺会对雨天待在室内的孩子们训斥道：“任何天气都是好天气!”

由于在19世纪50年代遭遇投资挫折而陷入经济困境，德拉诺甚至考虑过卖掉阿尔戈纳克。他最终认定，重新积聚财富的唯一途径就是重返中国，并在1860年至1866年期间将此想法付诸实施。他重操旧业，在香港从事茶叶和鸦片贸易，并且作为那里的一名资深美国商人而成为美国领事，如同他19世纪40年代在广州时那样。

沃伦·德拉诺在中国重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甚至比他上次离开时（1846年）更加富足，他和家人迁往巴黎，后来又于1867年迁往德累斯顿。1870年6月，萨拉搭乘普法战争爆发前最后一艘驶离德国的轮船，返回美国。

詹姆斯先生和萨拉是在1880年4月相识的，两人一见钟情，相差26岁，但萨拉并不在意。1880年10月7日，詹姆斯·罗斯福和萨拉·德拉诺在阿尔戈纳克举行婚礼。这对新人于一个月后前往欧洲，恰逢詹姆斯的老校友切特·阿瑟作为詹姆斯·A·加菲尔德的竞选伙伴当选副总统之后。次年夏天，阿瑟将会在加菲尔德遇刺后继任总统。在国外游历了10个月后，罗斯福夫妇于9月返回美国，萨拉此时已有近5个月的身孕。

某种默契在斯普林伍德形成：他们将完全遵从詹姆斯先生和吕贝卡过去的生活方式，包括每晚玩伯齐克牌，但每逢假日和家庭聚会，则要与德拉诺家的人在一起。

1881年秋，萨拉的弟弟菲利普去世，6周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降生了。孩子的教父中，有一位就是埃利奥特·罗斯福——未来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兄弟，如果埃利奥特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结婚时仍然在世的话，他还是富兰克林的岳父。

Ⅱ

萨拉与处于她那个社会地位的其他年轻母亲有所不同，对于养育自己的儿子，她事必躬亲，因而罗斯福从不过分依赖保姆。与父母偶尔的短暂分离令他痛苦，但他都能不失体面地默默忍受。1886年，詹姆斯先生带上萨拉，乘自己的私人专列去墨西哥，由于不放心墨西哥的公共卫生，他把4岁的富兰克林留在家中。正如他后来一生都会体现出的那样，富兰克林默默地接受这一安排，只是一连数小时骑在阿尔戈纳克他称之为“墨西哥”的木马上，摇晃个不停。他父母返回后，在乘马车从纽堡渡口到阿尔戈纳克的途中，他紧紧地依偎着自己的母亲，一声不吭，“活像个小战士”。

在大多数时间里，詹姆斯先生和萨拉都乐于到远离斯普林伍德的地方旅行。1884年，2岁的富兰克林和父母在纽约城待了2个月，在英格兰待了6个多月。1885年，他们又去了欧洲，但回程中有一番痛苦的经历，他们搭乘的轮船日耳曼号差点沉没。萨拉在舱房里紧紧地抱着富兰克林，溅进舱内的海水在地板上汩汩流淌，船上的人惊恐万状，在这场危机中，罗斯福全家人一如既往，始终保持镇定。船长指挥这艘船艰难地驶回利物浦。富兰克林一直记得此番经历，认为它显示出在压力下保持镇定以及沉着冷静的航海技能和家庭团结所具有的长处。

1885年，詹姆斯先生在坎波比勒岛建造了一幢宽敞而舒适的村舍。他被帕萨马科迪湾变化莫测的潮汐、风向及急流所吸引，因为这

一切使驾艇出游充满乐趣。在长达36年的时间里，富兰克林都是在那里度过夏季。

他在父亲的指导和陪伴下从事体育锻炼，他的母亲则几乎操持其他一切事务，仁慈宽厚但又坚定不移。富兰克林深刻领教到了母亲严格规定的惯例所具有的专制性。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8点就寝，早、中、晚餐的时间分别是在8点、下午1点和6点，做功课的时间则是从早上9点到中午以及从下午1点30分到4点，娱乐时间是从中午到1点30分以及下午4点到6点。他的母亲每晚都为他朗读，并要求他专心倾听。与大多数儿童一样，他对钢琴课没有热情，并感到去教堂是令人头痛的负担。

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有自己可支配的零用钱——除非是在随全家旅行时，而与家人交谈，钱财从来都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詹姆斯先生认为："不存在什么某些人相信的所谓运气。事实上，大多数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该取得成功。"但他的确又对贫困阶层持同情但并非傲慢恩赐的态度，这当然对富兰克林产生影响。他对欧美大城市里穷人的生活状况感到震惊。他认为，人人都有责任帮助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不仅是在财政上，而且还要赋予个人关心。他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必须以提供就业来消除贫困。"

沃伦·德拉诺则萌生了某种更加进步的社会观，这种观点将直接并通过萨拉对富兰克林产生影响。他及其先辈有关公共政策和个人责任的观念大大超越了单纯的家长主义。新政并非源于美国的工厂、矿场、工会大厅、大学或农民协会，而是扎根于斯普林伍德和阿尔戈纳克。

一个如此聪颖的孩子，面对一位慈爱而严厉的母亲，他不得不在反抗、顺从以及玩弄伎俩之间做出选择。富兰克林意识到反抗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其父母不断强化他的这种认

识），不可能无止境地服从。他逐渐形成某种技能：为保持平和气氛而接受母亲的权威，接着再按自己设法所能取得的回旋余地加以调和。许多他后来加以完善的世间流行的政治技巧——包括语焉不详、敷衍搪塞、巧妙回避以及形式各样的迎合之举，母亲萨拉无意中成为此种行为的起因和实验对象。

民主党人于1885年重新入主白宫。纽约州州长克利夫兰成为新当选的总统，与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一样，他也是詹姆斯先生的朋友。1887年，5岁的富兰克林与父亲一道去见这位新总统，后者已经对自己担当的职位感到厌倦，他拍了拍富兰克林的头，然后说："小伙子，我对你寄予的希望听上去很奇怪。那就是：你最好永远不要当美国总统。"

罗斯福一家人于1889年重返英格兰。富兰克林感染上了伤寒，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康复力。富兰克林一生在遭遇病痛和危险时的毅力令人称奇。小时候，富兰克林有一次在铁路机车里被一根掉落的窗帘杆划破前额，他没有惊扰父亲，而是戴上一顶帽子来遮盖伤口。在他14岁那年，一位朋友挥动棒球棒时意外失手，砸在富兰克林脸部，伤了他的嘴唇并砸碎了一颗牙齿。富兰克林试图对母亲掩盖自己的伤情，无论当时或是最后到牙医那里就诊时，他都没有动辄就对疼痛做某种过分的反应。

1890年，62岁的詹姆斯先生遭受了一次痛苦的心脏病发作，这永久地改变了罗斯福一家人的生活。此后，这个家庭最大的愿望就是使他免受任何惊扰或病痛。他再也不能陪伴富兰克林参加体育锻炼，并日渐成为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因此，对他们这家人而言，旅行更多的是为了延长詹姆斯·罗斯福的生命而寻求新鲜空气、温泉和治疗，而不是扩展视野、放松身心的休闲。为使詹姆斯先生能泡上据称是具有疗效的温泉，这家人从1891年开始先后6次前往巴特瑙海姆。

1892年，罗斯福夫妇在巴特瑙海姆会晤了马克·吐温。10岁的富兰克林则在这一年学习游泳，并到当地一所德国人的学校上了6周的课。这是他首次经历学校生活，感觉不错，尽管他对自己的德国同学评价一般。当他40年后成为美国总统时，该校校长对他大肆褒扬了一番。

随着年龄的增长，富兰克林成为一个兴致勃勃的收藏者。作为总统，他最为人所熟知的消遣就是集邮，这同样也有其母亲的一份功劳。她在5岁时就开始集邮，后来将收藏的邮票转交给她的弟弟弗雷德，后者又在1892年10月，即富兰克林10岁生日时，将邮票送交给他。富兰克林终身都孜孜不倦地从事这种收集，将收藏的邮票营造成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共有150个集邮册，100多万枚邮票。

有时，在母亲念书给他听时，他却在一旁往自己的集邮册里插邮票，随后他却能将母亲朗读的短文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这让他母亲大为惊讶。他对自己这种可以一心二用的能力颇为自豪。那个时期的邮票图案唤起人们对异国情调的想象，是探险精神和科学创造力的象征——正是这种精神和创造力把这个世界不断地紧密联系起来。青年时代的罗斯福热爱航海，集邮这种爱好大大激发了他对异域风情和地理的好奇。到他当上总统时，他已有15 000册藏书，并收集了大量的英国政治漫画。

他从早年起就有的另一项爱好则是鸟类。他从收集鸟蛋开始，接着又专注于鸟巢，他还希望拥有一支猎枪。詹姆斯先生不再有精力像从前那样陪同富兰克林进行户外活动，他同意了儿子这个请求，富兰克林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射手。他拥有众多的鸟类标本，萨拉自豪地将它们装饰在斯普林伍德门厅的四壁，至今仍保留在那里。

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大的爱好可能要算是海洋了。到他去世时，他的图书馆藏有2 000册有关美国海军历史的书籍、1 200册关于海军的出版物、200个装备齐全的舰船模型以及37册由他自己整理并加以注释的海军舰船图片。

他对海洋的兴趣源于他外祖父德拉诺讲述的远洋传奇故事。父亲拥有一艘15米长的游艇——半月号，富兰克林十几岁时就驾驶着它，他一边掌舵，一边倾听母亲给他朗读。当富兰克林16岁时，父亲给他买了一艘属于他自己的单桅帆船新月号，他每天都兴致勃勃地驾驶着它，航行于坎波比勒岛附近的海域。在他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海军上校艾尔弗雷德·T·马汉的著述，这些著述创造性地论述了海上力量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他一直与后来成为海军上将的马汉通信，直到后者去世，那时罗斯福已经是海军部长助理。

他从未以普通水手或低级别的身份在海上航行过，但从早年时代起就不断穿越大西洋，乘各种帆船和游艇巡游，在担任公职时，他乘过从巡逻艇到战列舰的各种舰船去视察海军设施。他是一位技术精湛的航海者，他这方面的兴趣并未因那场使其备受折磨的疾病而减弱。他从未学习过仪表导航，却是一位出色的航海者，能够凭直觉判断急流、潮汐及风向；他熟悉地图，对地形学甚为了解，而且在任何一条船上以及在任何条件下，他都知道如何装配和调整桅帆。

一直有人认为，他精湛的航海推算技能有助于他的从政经历，尤其是在经济和外交领域，他倾向于稳字当头，巧妙应对。他后来称自己是“变戏法者”，其实他同样可以称自己是航海家——一个只有他本人知道目的地，并拥有到达此地所需智慧的航海家。温斯顿·丘吉尔称赞他具有“判定变化莫测的（美国）公众舆论的趋势和动向的能力”。

富兰克林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而不是哈佛。富兰克林后来称，由于父母的恳求，他没能及时到安纳波利斯注册，仅仅晚了一周。他曾在1917年考虑过从威尔逊政府中辞职，以成为一名现役海军军官，经威尔逊总统劝说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III

1896年秋，14岁的富兰克林前往格罗顿上学。

格罗顿的生活并不比斯普林伍德更加严格，但却更加清苦和缺乏人情味，不容有私人空间，富兰克林对此一定相当不适应。由于他迟来两年，他的同学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富兰克林在学习上从未遇到什么困难，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重点课程，还有就是罗斯福已经熟悉的法语和德语。学校创始人皮博迪博士对他的评价是："具有非同一般的智慧，但并非才华横溢。"这正是皮博迪心目中理想的学生，他对智商过高的孩子并不放心，认为他们不够全面，容易养成爱慕虚荣、纪律懈怠的习性。

富兰克林在巧妙地处理人际关系上遇到麻烦。让他一直感到困惑的是，凭自己那点不足以称道的成就——三次获得年度全勤奖，如何既能获得同学的赞誉，又能取悦长辈——学校的教员。他太过敏锐，不会得罪任何一方，但在那些与他同龄的孩子中，许多人对他并不热情。在他们看来，他说话的腔调和行为举止似乎带有过重的欧洲或英国味。他越是努力试图取悦于人——在以往的生活中一贯如此，越是招致不信任。他总是谨慎应付，既要在老师面前着力表现，又要设法迎合周围的同学。他写信告诉父母，由于在课堂上讲演而首次得到不良评语，对此他感到宽慰："大家认为我没有学生特有的灵气，因此我很高兴获此评语。"在第一年里，他的平均成绩在总共17人的班上名列第4。

他身体过于单薄，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他在辩论方面更为成功一些。他还是唱诗班成员，先是作为童声高音，最后是男高音。

皮博迪博士建立了一套冷酷、严厉但却值得实施的制度，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才智和趣味令皮博迪博士极为满意。他轻松地完成了在格罗顿的学习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罗斯福总是对皮博迪崇敬有加。

他在1934年宣称：“除我父母外，任何人现在和将来对我的影响都不及皮博迪博士那样意义重大。”

皮博迪影响了好几代上流社会男生的成长历程，就此而言，他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但他自命不凡、道貌岸然，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一个低级庸俗的人物。

但罗斯福欣喜于任何与之接近的机会，他似乎汲取了皮博迪的某些极其纯粹的教会观点：人生在世，既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责任，目的在于行善。

富兰克林加入了格罗顿传教会，作为会员，他与另一位男孩为一位84岁的黑人妇女（内战时期北方军队中一名鼓手的遗孀）提供帮助：清除车道上的积雪，喂鸡，并在冬天给她送去煤炭。

在4年时间里，他每周都给父母写两封信。收到他信的时间哪怕只是晚了一天，他们也会发电报到学校，弄清楚富兰克林是否有什么不对劲。与他成年时的大多数通信和谈话一样，这些信也是闲谈性的——语言流畅，只是一般性地汇报情况，总的说来没有任何反映个人情感和内心世界的东西。信里没有流露出一丝失望和懊恼，总是一切顺利。萨拉·罗斯福经常到格罗顿看望自己的儿子，并时刻挂念着他。

在富兰克林广泛讲述的、许多令人生疑的有关他年轻时代的故事中，其中之一就是：当美西战争爆发时（1898年），他和两位朋友决定到波士顿加入海军，他们收买了一名司机将他们带出校园。按罗斯福的讲述，由于爆发了猩红热，他们的计划夭折了。由于詹姆斯先生第二次心脏病突发（1897年），他和萨拉再次来到巴特瑙海姆。他们刚一到达，就收到一封令他们担忧的电报，并即刻返回纽约。在码头边迎候他们的亲戚告诉萨拉，富兰克林已脱离危险，直到这时，哭泣不停的萨拉才算松了一口气。他们直接前往格罗顿，而富兰克林此时

仍然躺在学校医务室里。在从德国一路赶回后，为防止传染，他们也只能隔窗向他挥挥手。

1899~1900年期间，作为格罗顿的一名高年级学生，富兰克林比前些年更为成功。他当上学生宿舍的级长，对低年级学生宽厚、热情，而后者终生都敬仰他。他由于学业优异而受到奖励：享有学校最好的一个单人间，这是得到那位严厉校长赏识的一个明证。他还参加学校剧团的演出，因扮演吉尔伯特作品中的角色而大获成功。詹姆斯先生和萨拉看过他的两次表演，校报的评论也充满溢美之词。他组建了第二支校橄榄球队，但由于身体单薄，他在赛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坐冷板凳。

他比大多数同学更加世故，但这并不有助于他与大家融洽相处。“他也许比大多数孩子更了解格罗顿以外的广阔世界，但后者比他更具有孩子的天性。”他能说会道，讨人喜欢，但这只在其母亲和大多数成人那里起作用，而在学校的孩子们眼里，这似乎显得矫揉造作、阿谀奉承。同样，担任总统时，他是掌握美国公众舆论的大师，但许多了解他的人——来自格罗顿和其他地方，会认为这是媚俗和蛊惑人心，不够光明磊落。

富兰克林于1890年春被高等学校录取。皮博迪善意地写道：他一直是本校一位“兢兢业业和最令人满意的学生……我带着极不情愿的心情与富兰克林分别”。谈及皮博迪博士时，罗斯福总是带着崇敬之情；在其前三次总统就职仪式前及家庭聚会场合，罗斯福还邀请他为自己主持私人宗教仪式。

在格罗顿校友为庆祝皮博迪博士80岁生日而举行的聚会上，这位校长的结束语是：“我相信富兰克林·罗斯福会是一位英勇无畏的绅士。我很高兴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罗斯福当然对这样的赞誉感到满意，但在场的400位校友无人鼓掌，这可能使他不快。不过他笑到了最后。他的同学们继续对他有所保留，但这不再使他感到不安：他在他

们那个圈子里不受欢迎，但与无数忠实于他的选民相比，他们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后来在四个儿子12岁时将他们送往格罗顿，而不是等到14岁——他认为自己被延迟到这个年龄才去那里是个错误。1932年11月的某一天，担任格罗顿高年级级长的小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早上6点就被穿着睡衣的校长唤醒，后者告诉他，他父亲被选举为美国总统了——“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格罗顿学生，完全承袭了格罗顿的传统”，他对这位睡眼惺忪的年轻人说。不清楚的是，这位曾投票支持胡佛的校长所谓的传统究竟是指什么。罗斯福和皮博迪相互利用，实现他们大相径庭的目标。皮博迪的公开赞誉权威性地帮助这位总统击败了往日那些同学对他的漠视，而罗斯福的权力和声望则使格罗顿及其创始人更具魅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00年9月前往哈佛，开始过上轻松愉快的大学一年级生活。富兰克林当上新生橄榄球队队长，并成为校报《深红》的一名通信员。在哈佛的几年里，他成绩平平，只是顺利过关；他的发展更多地体现在个性而非知识上。他参加了一个公开演讲班，每两周就得提交几篇演说。在流传下来的唯一那篇演说中，他敦促南方人通过教育来解决“黑人问题”，并宣称，南方和北方的共同理想就是“把（黑人）从半野蛮状态拯救出来，变成真正的人”。

1900年秋，詹姆斯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1900年11月末，詹姆斯先生心脏病再次发作，由于医治无效，他于12月8日早上去世，萨拉、富兰克林和罗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着他。

詹姆斯先生既没有其幼子的那种超乎寻常的狡诈，也没有他那种永不满足的野心。但富兰克林从其父亲那里学到这样一种能力：把自己掩饰为毫无野心的公职人员，努力服务于那个对自己和自己的先辈们宽厚仁慈的国家。他当然是一个爱国者，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他的确真心实意地希望回到海德公园，但这没有继续担任总统的愿望那么

强烈。他在各种场合声称，自己所考虑的只是奉献以及不可妥协的国家利益，而在相当数量的国民看来，这似乎是其真实写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宽厚、时髦、位高任重且信奉基督教的绅士，这有足够的可信度，因为与其父亲一样，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位绅士。他着力掩饰，使自己看上去显得更加大公无私，而且在其事业巅峰时期，他看上去几乎就与詹姆斯先生一样，没有私欲。这是一项可贵的遗产，帮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屡屡智胜对手。

如果说詹姆斯先生教会富兰克林·罗斯福如何以高贵绅士的面目出现，那么，皮博迪博士则教会他如何公开表示出自己的极端正直。即使在童年和学生时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也通常表里不一。作为政治领导人，他几乎强迫症般口是心非。作为一个绅士，他觉得政治生活中某些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令人不快，但他不自觉地诉诸这些手段，并得意于自己作为一名伪装者而具有的娴熟操纵技能。他很好地从自己早年的这两位导师那里学会了如何以正直面目出现，因此，即便是具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也往往相信，罗斯福大抵是一个坦率诚实之人，当其出自对雕虫小技并非恶意的偏好而在策略上走向极端时，会觉得不安。

“因此，他并非一个真正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皮博迪教育有方。罗斯福个性中的核心内容几乎就是那种极其真诚的理想主义，它不可能无限制地容许那些自作聪明和玩弄诡计的尝试。”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欺骗才能进一步发展，结果就是：他貌似一位心地善良的感伤主义者，不能坚定地唤起大家的激情；天性率直，但偶尔也以玩弄诡计为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对于现实中的罗斯福，学界崇拜者们对他的这种描述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好人而不是政治家。

后来，在罗斯福与斯大林打交道时，上述这番描述使他更容易被对手攻击为幼稚和易受骗上当。他那些最狂热的崇拜者将他说成是一

个仁慈而能干的人，不断被一些他本人难以驾驭的、接踵而至的事件推向权力的顶峰，四次问鼎白宫。本书讲述的故事则有所不同：崇拜者心目中的那个罗斯福，也许并非那么值得崇敬。但是，他把自己那种无情且通常非道德的政治天赋用于实现那些几乎是绝对必要的目标，就此而言，正如最毫无保留的支持者所赞赏的那样，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Ⅳ

萨拉的家人来到她身边，他们接力似的在斯普林伍德陪伴她。富兰克林悲痛万分，他努力加以克制，萨拉从他那里得到莫大安慰。她开始按詹姆斯从前的做法管理家中事务，并骑着他的马在住宅附近溜达。她的丈夫和父亲共为她留下几百万美元的遗产。富兰克林和罗斯各自得到12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1901年夏，萨拉与富兰克林在欧洲旅行了10周，同行的还有富兰克林的远亲西奥多·鲁宾孙（西奥多·罗斯福的外甥）以及富兰克林家在坎波贝洛岛的邻居佩尔夫人（其丈夫也去世了）及其女儿弗朗西丝。他们驾驶游艇，巡游于挪威海岸，并驶入许多峡湾。他们曾与德国皇室游艇霍亨佐伦号不期而遇。德皇威廉二世来到罗斯福的艇上喝茶，并邀请艇上的年轻人回访霍亨佐伦号。威廉二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坚强而严厉。富兰克林从这位皇帝的书桌上偷走了一枝带有威廉牙印的铅笔，将其作为纪念品。他们接着前往德累斯顿、苏黎世、日内瓦和巴黎，旧地重游，拜访亲友。他们回到纽约时得知麦金利总统遇刺身亡，新的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的远亲西奥多。

作为哈佛大学校报《深红》的记者，罗斯福抢先发布罗斯福总统将前来学校的消息。总统一贯对富兰克林很亲切，当着数百名其他学生热情地向他问候。圣诞节期间，西奥多与富兰克林及其母亲进行了

两次私下交谈，富兰克林就第二次谈话写道："这是永难忘怀的。"有关西奥多·罗斯福的报道帮助富兰克林来年被选为《深红》的5名编辑之一。

相对于他在《深红》取得的进展，他竞选声名显赫的波司利安俱乐部（他父亲曾被选为该俱乐部名誉会员，而西奥多·罗斯福则是该俱乐部当时最有名望的会员）则不那么成功，这也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不如意的事情之一。

俱乐部成员由16位高级和低级会员挑选，只要有一票反对，任何一名有志加入者就会被否决。挑选程序绝对保密，即使是选举者也不知道他们之中谁投了反对票或否决票。富兰克林认为自己是被这16人团体中的5位格罗顿校友否决掉的。埃莉诺最终认定，富兰克林的那些同学认为他太书生气——这个解释不大合情理。她声称，这次被拒绝使他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但却使他对下层人民更加敏感。罗斯福本人在20年后承认，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尽管10年后，他在与儿子詹姆斯的交谈中称，围绕此事的种种解释"纯属谣传"。

他决定1904年整整一年都待在哈佛，表面上是为获得一个硕士学位而努力，实际上是为了行使其作为《深红》编辑而具有的权力。他撰写的社论相当平淡乏味：支持修建更完善的道路和消防通道，一般性地推动某些事项，但对校橄榄球队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在社论中对橄榄球队的规劝和指责变得异常尖锐，以至于亨利·詹姆斯二世——一位学习法律的学生，批评他那种"以嘲讽的社论……对待一帮业余选手"的做法。他无疑是一名成功的管理者，其继任者赞扬道，他"喜欢大家，并使大家不自觉地喜欢上他……在他的和蔼态度中，有某种不易招致对立情绪的号召力"。

他在哈佛的经历对其后来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在格罗顿具有的问题依然存在，他不能完全被其同学所接受，但由于潜在支持者的数量增多，他更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并逐渐学会以民主手段寻求广泛

支持。他已经在培养这类政治技巧：吸引陌生人的支持，并通过占据战略要地（如校报编辑的职位）使自己处于一个影响日增的地位。他几乎就是一个永不停息的竞选者，并把选举过程本身看作一项其乐无穷的活动，而不是如同其父亲所认为和告诫的——一种有时为完成为民服务的职责而必须从事的令人厌烦的活动。

30年后，有人指出，罗斯福正在报复某些上层富豪，他们曾在格罗顿和哈佛反对过他，他对此一直予以否认。但是，他一定从中获得某种特别的满足感：以平民利益捍卫者的身份进行竞选，反对那些成为讽刺对象的傲慢而贪婪的财产继承人。正如一贯的那样，他的动机中掺杂着权宜之计和原则的成分，兼有崇高和恶意报复的内容，十分微妙。他的品位相当朴实，而且鄙视“镀金时代”那些花哨而庸俗的暴发户——他后来也对涌现于“兴旺的20世纪20年代”的同类人士持同样的态度。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自命不凡者，从这一点上看，可以说有其母必有其子。但他是精英领导层的一分子，从内心深处蔑视那些轻浮无聊、矫揉造作的财产继承人。

他希望保全自己所享有的生活方式，但又不想过分遵从那些矫揉造作的上层人士、投机取巧的乡绅或经济掠夺者，或者任何其他特殊利益集团。他对美国政治权力的那种非正式的、在很大程度上出自直觉的理解始于斯普林伍德，发展于格罗顿，并在哈佛达到一个更为精细的程度。

在富兰克林于波士顿度过的最后两个冬季里，萨拉也住到了那里。冬季的斯普林伍德有一点荒凉，在没有詹姆斯和富兰克林的情况下，她极其孤单。富兰克林嘴上称自己喜欢她待在波士顿，但也觉得母亲在近旁的关注有时令自己感到压抑。

1903年夏，富兰克林与一位名叫查尔斯·布雷德利的朋友前往欧洲。这是他首次没有长者陪伴的欧洲之行，但他每天都给家里写信。于8月返回美国后，他经历了一次扁桃体切除手术——按萨拉的说法，

他当时体现出“惯有的坚韧和乐观”；他还在一次市政中期选举中首次参加投票，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人。

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似乎开始追逐异性。他在哈佛的社交界还算活跃，许多迷人的女性都是富兰克林最初感兴趣的对象。艾丽丝·罗斯福无疑是他热烈关注的主要目标，但她似乎没有对他的热情给予回报。他们讨论过结婚，尽管他只有20岁，艾丽丝·罗斯福也只有17岁。他有建立一个大家庭的宏伟计划，由于切身体会到与年迈父亲待在斯普林伍德所产生的孤独感，他希望自己在身强力壮之时就能享有天伦之乐。但这不是艾丽丝想要的生活，她对此表示反对，并在多年后称，自己“不想成为一头奶牛”。

就像对待在其他领域的努力所遭遇的挫折一样，富兰克林这次也绝不可能承认失败，尽管艾丽丝的回绝是一次令他心痛的经历。他不断渲染这样一个小故事：自己曾被波士顿上流社会人士那种安宁而与世隔绝的生活所蒙蔽，想结婚后带上妻子去那里，但在一次旅行中，冥思苦想的他“遇上了一些真正的美国人。我被拯救了（改变了主意），但这是一次可怕的悬崖勒马的经历”。事实上，艾丽丝也参加了这次旅行，而且正是她否决了富兰克林的那种想法。

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未掌握自贬这门艺术，更不用说坦白和忏悔这类美德了。部分原因在于，他从早年起就是一个愉快但又具有很强自制力的年轻人。另一个原因是，他极度自负，绝不容许自己被击败或被智取。他从未有任何推心置腹的密友。

奇怪的是，在他患上小儿麻痹症后，上述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他再也不可能被人认作自负之徒了。他身患重病，却能轻松愉快地面对，勇气十足，正如人们后来将会看到的，患上小儿麻痹症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他因此而迸发出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他更加可敬。不仅如此，这一现实还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性格中的利己特征，否则，这些也许会成为其政治上的致命弱点。

艾丽丝·罗斯福在1910年与一位从事保险业的经理结婚，生有两个孩子，并在1925年离婚，此后一直没有再婚。在罗斯福的整个总统任期内，她都对他持激烈批评的态度。1972年，86岁的她在奄奄一息之时还声称，自己对没有嫁给罗斯福感到高兴。她没有嫁给罗斯福，这也许对他们两人都是一件好事。相比之下，埃莉诺似乎要柔和一些，尽管她平时性格倔强。

V

年轻的富兰克林现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埃莉诺身上——这一对象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1903年11月，在一年一度的费尔黑文周末感恩节欢庆活动中，富兰克林把母亲拉到一旁说自己打算娶埃莉诺·罗斯福为妻。萨拉大吃一惊，劝告他说，相对于他父亲、祖父及外祖父结婚时的年纪，他还年轻，并要求富兰克林承诺，一年之内不公开他和埃莉诺的恋爱关系，以便两位恋人考虑成熟。

埃莉诺的父母分别是埃利奥特·罗斯福（西奥多的弟弟）和安娜·霍尔。1881年，埃利奥特遇上了前往欧洲度蜜月的詹姆斯先生和萨拉——萨拉就是在这次蜜月之行中怀上了富兰克林，埃利奥特当时则是出发去进行一次环游世界的观光旅行。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夫妇觉得他是船上一位有趣的陪伴者，请求他成为富兰克林的教父。埃利奥特于1882年返回纽约，在房地产行业找了一份工作，并与霍尔恋爱。6月，在德拉诺家举行的家庭聚会上，他与霍尔订婚。他们的婚礼于1883年12月在纽约举行，西奥多·罗斯福是男傧相。

1884年2月，西奥多·罗斯福和埃利奥特·罗斯福的母亲与西奥多的妻子在同一天去世。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生于1884年10月11日。她从小就让母亲失望：相貌平平，缺乏灵气和自信，没有霍尔家女人所拥有和要求的那种美丽和光彩照人。

不久就表明，埃利奥特是一个情绪不稳、性格脆弱的人。生活在其兄长的巨大阴影之下，他成为一个酒鬼，无法正常工作，行为反复无常。他常常徘徊于无端狂喜和极度沮丧之间，难以预料。他和安娜·霍尔的婚姻几乎刚一开始就出现裂痕，但埃利奥特溺爱自己的女儿，后者对他热烈崇敬，尽管她遭遇母亲的漠视。

1887年，埃利奥特抛下自己在房地产业的那份工作，与安娜、埃莉诺以及安娜的妹妹一同前往欧洲。他们搭乘的轮船刚一驶出纽约港，就被另一艘客轮猛然撞了一下。在一片混乱中，妇女和儿童搭上救生艇逃生。铁路大王科利斯·P·廷顿毫不留情地对《纽约世界》指出，在所有乘客中，埃利奥特是唯一跟随他们上救生艇的成年男性。埃利奥特的行为并非出于胆怯——是该船的一位负责人在一艘尚未满员的救生艇上请求他上艇的。对于亨廷顿的诋毁，他没有公开为自己辩护，这件事的影响一直没有消失。

对埃莉诺未来的航海旅行来说，这是某种最为不祥的开端，一想到要再次上船，她就变得极度恐慌。他们返回美国后，埃利奥特重操旧业，从事房地产销售，但也进行一些冒失而危险的消遣活动，如夜间猎狐。他接连摔伤，最为严重的一次是踝关节受伤，并被自己的坐骑踢伤头部。他又开始酗酒，以此来减轻伤痛，缓解压抑的心情。他有时具有自杀倾向。

埃利奥特和安娜在1889年秋有了一个儿子——小埃利奥特。1890年夏，在安娜的推动下，他们全家人前往欧洲，希望德国和瑞士的矿泉对埃利奥特有所帮助。埃莉诺这次遭遇了更加刻骨铭心的不快之事：当她骑在一头驴上不愿越过一处陡坡时，父亲冲她叫胆小鬼。安娜严密监视自己的丈夫，希望使其摆脱酒精的诱惑。有时，在他们的

住地，穿着睡衣的安娜在漆黑的夜里形影不离地追随着埃利奥特。种种情况表明，他无法戒酒，此后去了奥地利的一家疗养院。

安娜又怀孕了。三个月后，他们一家前往巴黎西郊，埃莉诺被送往当地的一所修道院。她因身为新教徒而受到歧视，为引人关注，她编造了一个吞食一枚钱币的故事，故事本身无伤大雅，但她最终因此被驱逐。母亲狠狠地训斥了她，对于一个年仅7岁、容易受伤害的小女孩来说，这是一种极其严厉的惩罚（她终身厌恶罗马天主教会，可能根源于此）。

对于埃利奥特来说，巴黎是一个无法逃脱的陷阱，不喝酒的时候，他极度抑郁。他无节制地纵酒饮乐，并与原籍美国、来自底特律的谢尔曼搞在了一起。谢尔曼夫人把埃利奥特的问题归咎于安娜盛气凌人的个性，这使罗斯福的家人感到愤怒。就在这场家庭纠纷混乱不堪之际，在纽约那边，罗斯福家的女仆凯蒂·曼指控身在海外的埃利奥特是她私生子的父亲。他无法向安娜保证此项声明纯属谎言。

其兄长西奥多现在是某一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委员，他的政治抱负促使其变得更加公正。他谴责自己的兄弟，并敦促安娜离开他。罗斯福家在向凯蒂·曼付清工资后解雇了她，西奥多发出威胁，要将埃利奥特送入精神病院。埃利奥特则反过来以离婚和剥夺自己三个孩子的继承权相威胁。发狂的埃利奥特浑身颤抖，不是神志恍惚，就是抑郁寡欢。埃莉诺被修道院驱逐后，回到这样一个家中，即使是对修女们那种索然无味的艰辛生活，她有时也充满了渴望之情。

这场婚姻最终于1891年8月彻底崩溃。埃利奥特一度被禁闭在巴黎的一家精神病院，西奥多在向法庭提起诉讼后，前往那里探望埃利奥特——报纸纷纷报道埃利奥特精神错乱的消息。为对纽约的拘禁诉讼做出反应，埃利奥特在巴黎那家精神病院写信称，他并非如妻子和兄长所说的那样精神失常或酗酒成性，正在从骑马摔伤事故所造成的病痛中恢复过来。但当面对其威严的兄长时，他就垮掉了。兄弟俩做出

了某种令人伤感的安排：埃利奥特将继续在巴黎那家精神病院待上半年，返回美国后去伊利诺伊州的一家收容所接受为期5周的酗酒治疗，然后用两年时间看看效果，在此期间完全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离。在这一康复时期内，安娜不得与他离婚。

结束在伊利诺伊州的治疗后，埃利奥特试图重新商定上述安排中有关两年过渡期的事宜。此举不成后，他指责安娜不忠，并称霍尔不是自己的儿子。他的不断哀诉和威胁没有作用，继续处于被逐出家门的状态，1891年，他在弗吉尼亚州安顿下来，养了一些狗和马，并成为村里一位受欢迎的人物。

埃莉诺并不了解父母激烈争吵的是非曲直，只知道烦恼不堪的母亲赶走了亲爱的父亲。她对母亲的怨恨与日俱增，后者不堪忍受婚姻破碎造成的精神压力，身体开始垮掉。她患上了白喉，并于1892年12月7日去世，年仅29岁。

埃利奥特返回纽约时，看到棺木里亡故的妻子，悲痛不已。但他很快又高兴起来，收拾好行装，返回弗吉尼亚。埃莉诺和她的两个弟弟与外祖母一起生活，弟弟们在1893年春也患上白喉，小埃利奥特在三岁时就离开人世。

埃利奥特又过上放荡不羁的生活，只是偶尔去看望自己的女儿。他在1893年搬到纽约，与一位新近结识的情人住在一起，很少与女儿接触。埃莉诺一直尊敬他，终身都保留着他的来信，尽管来信日益减少，偶尔才能收到。

埃利奥特每况愈下，往往由于喝得酩酊大醉而出事，不断陷入狂怒中。1894年8月13日，他在家中的楼梯上不断奔跑，直到全身僵硬地倒在楼梯上，第二天就去世了。他年仅32岁，可能是罗斯福家族所有成员中命运最悲惨的一位。埃莉诺一直爱着他，并不断为其名声辩护。

埃莉诺与年迈的外祖母住在一起，外祖母无怨无悔地照料她。她就这样艰难而缓慢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她相貌平平、性格内向，穿着也很过时——还是她那些讲求时髦、喜好交际的堂姐妹们送给她的。她的命运在1899年开始转折。她被送往艾伦斯伍德法语学校，校长是著名的索维斯特尔女士。埃莉诺的法语水平早已相当不错，索维斯特尔女士鼓励埃莉诺，激发她的求知欲，帮助她学会穿着打扮，并设法使她摆脱以往生活经历所造成的痛苦。埃莉诺不断改变自己，成为一个优秀和热情的人——正如美国人在30年后所认识的那个埃莉诺。她也在艾伦斯伍德变得坚定而沉着，更加不畏惧罗斯福家族那帮刁钻刻薄的女人。

相对于富兰克林在格罗顿的情形，埃莉诺在艾伦斯伍德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她是女校长喜爱的学生，也得到同学们的普遍喜欢和赞赏。她友好对待低年级同学，对每一个人都坦诚而体贴。无论那时或以后，她都没有其未来丈夫的那种自大、无礼或具有政治策略意味的愤世嫉俗。

富兰克林，这位成长中的政治大师，还无法游刃有余地两面讨好：既博得校方青睐，又赢得同学好感。皮博迪博士对近旁有一位政治操纵者感到不自在，许多学生也是如此。埃莉诺来到艾伦斯伍德时，只是想悄然摆脱可怕的过去，单纯且满怀美好愿望，对能在那里读书充满感激之情。她的善良、真诚和智慧让每一个人感到愉快。当埃莉诺最终于1902年离开艾伦斯伍德时，索维斯特尔女士写道："我今生每天都会想念你。"

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从孩提时代起就相互认识。1902年秋，他们首次在一般家庭聚会以外的场合——纽约马展相遇，并随后一同赴宴。他们后来又在一些其他场合相遇，并在西奥多于白宫举行的1903年新年招待会上碰到一起。富兰克林回到哈佛后，他们继续见面。萨拉邀

请埃莉诺去了几次斯普林伍德，夏季来临后，富兰克林带上她航海，还参加了家庭范围内的其他休闲娱乐活动。

那年秋天，埃莉诺与几位亲戚去波士顿看望富兰克林。在观看哈佛与耶鲁的橄榄球比赛时，她着实长了见识：富兰克林居然当起了拉拉队长。尽管他干得很卖力，主队还是输掉了比赛。富兰克林参加这类活动，主要是为了体现自己以身作则，因为他在《深红》上建议，哈佛的球迷要表现得更热情一些。

在其伟大的一生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行动似乎表明——而且他本人很有可能认为，他就是要在某种神圣理想与现实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许多人都曾揣想，他的镇静、信心和超然判断源自何方？他中年时几乎从未有睡眠问题，从他身上几乎也看不到任何紧张症状。尤其是开始患上疾病后，他知道上天将考验他，伟大的成就不会轻易取得。他坚信，在追求可取事业的过程中坚忍不拔必然会得到回报。而埃莉诺对真理和某种不可动摇的责任感怀有坚定无畏的信念，不受权宜之计或任何纵容人类缺陷行为的引诱，并以此使自己变得坚强，在生活中默默地承受。

他们的恋爱经历相当沉稳而纯朴。人们常常对此困惑不解：埃莉诺外表虽有极大改观但依然相当朴实，她身上有什么东西令讲求时髦的富兰克林着迷呢？高挑的埃莉诺具有一副好身材和一头漂亮的头发，但这些很容易被遗忘——如果我们只记得她中年主妇的形象。她的那位叔父和教父是人气极旺的总统，富兰克林十分看重后者对自己的善意。她和蔼可亲、充满智慧，完全不同于社交界那些精神空虚的饶舌妇。

埃莉诺显然是一个优秀而令人钦佩的人，虽然严肃，但可靠而不死板，作为妻子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事实上，在许多人看来，作为

婚姻对象，她似乎比罗斯福更为抢手。尽管他外表英俊，但在许多人眼里是缺乏男子气的“羽毛扫帚”、拉拉队长——并非仅是在有橄榄球比赛的日子里。他身高1.85米，体重不到73千克，打网球时姿势矫揉造作，因此那些牡蛎湾的同辈亲戚都称他“南希小姐”，富兰克林和埃莉诺都曾因亲戚们的诋毁而感到难过。富兰克林不久前被高傲的艾丽丝·罗斯福拒绝，他不喜欢重复那样的失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毫不掩饰对失败的厌恶。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埃莉诺是罗斯福家族的一员。罗斯福家族内部的通婚有先例可循，在海德公园分支和牡蛎湾分支之间一直有不太明显的恋爱尝试。富兰克林决心成功地将两个分支连接起来。正如西奥多·罗斯福在婚礼那天告诉他的：“没有比家族内部联姻更好的了。”

一贯喜欢玩弄策略的富兰克林这次也不例外，但他和埃莉诺的确相互爱慕。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们都非平庸之辈，各自对对方的赞赏都恰到好处，尽管他们之间的感情的确发生过动摇。通过婚姻，富兰克林脱离萨拉善意的专制，而埃莉诺则摆脱从小生长的那个家庭给她带来的那些可怕的心理压力。

他们两人能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之处在于勇气、智慧、充满激情的理想，以及对下层人士非同寻常的关切。富兰克林，这位在中学和大学表现出政治上早熟的学生，已经显露出他后来将要成为的那个政治巨人的某些轮廓。埃莉诺，当她于1902年从学校毕业时，最终意识到自己能够出色行善的潜力。她将取得巨大成就，为那个伟大的家族增添更多光环，她生来就是这个家族的一分子，其独特的婚姻使她仍在这个家族之内。他们各自几乎很自然地从对方身上看到某些将使他们获得卓越成就的优良品质，至于最终的成就，即使是雄心勃勃的富兰克林当时也想象不到。他们的婚姻会遇到许多难题，但总的说来很成功。

富兰克林向母亲透露了自己的婚姻计划，在这之后，萨拉、埃莉诺和富兰克林这三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微妙——直到正式公开他与埃莉诺的婚约。埃莉诺把时间花在美国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上，在她看来，该组织的活动并不仅仅是某种午餐俱乐部或廉价旧货商店的慈善义举，而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社会工作。她在休斯敦街南面的下东区教犹太人和意大利移民的子女健美操。起初，她在富兰克林面前就自己从事的这类活动进行辩护，她想让他意识到城市贫民的状况，经常安排他从那里送自己回家。一次，富兰克林把一位生病的小女孩从埃莉诺上课的教室抱回楼上的廉价公寓房间，此后他说："我还不知道竟然有人在那样的条件下生活。"1961年，77岁的埃莉诺向一位朋友谈及她试图影响富兰克林的事情："这种努力起了作用。他看见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一直铭记在心。"罗斯福也许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直接了解到城市贫困状况的总统，这多亏了埃莉诺。

富兰克林于1904年10月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对学习内容没有多大兴趣，成绩平平。在第一年里有两门课程不及格，他将这归咎于学籍管理方面的过分挑剔。他计划在德拉诺家于费尔黑文举行的感恩节晚宴上宣布自己的订婚消息，恰好是在前一年的同样场合他告知母亲自己与埃莉诺的恋爱关系。但他患了黄疸病，没法参加晚宴，便送去一封信在家庭晚宴上宣读，当场一片热烈祝贺。

宣布订婚的消息登载在12月1日的媒体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埃莉诺，对她的描述是：总统的侄女，美丽而优雅。富兰克林被描述为《深红》的前任编辑和纽约游艇俱乐部成员。在即将举行的婚礼上，重要角色几乎全是罗斯福家的人：罗西担任男傧相，艾丽丝·罗斯福担任首席女傧相——相当欠考虑的选择。喜好热闹的总统刚以巨大优势赢得竞选连任，他将在婚礼仪式上把新娘交给新郎。

总统写的信使富兰克林十分快慰："我非常喜欢埃莉诺，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儿一般，我也喜欢你、相信你、信任你……你和埃莉诺真诚

而勇敢，我相信，你们无私地相互爱慕，美好岁月展现在你们眼前。愿所有的好运永远伴随着你们二人……”

西奥多·罗斯福那时是美国最受人尊敬的人物。在去世之前，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关爱着富兰克林和埃莉诺。总统邀请这对已经订婚的恋人在1905年3月4日参加他的连任就职仪式，并把他们的座席安排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就在他本人的家属后面。富兰克林认真聆听西奥多·罗斯福的承诺：“公平对待”所有美国人。

皮博迪接受富兰克林的请求，主持他的婚礼。婚礼于1905年3月17日（圣帕特里克节），在第76街埃莉诺外祖母的家中举行。就在婚礼前化妆时，埃莉诺收到索维斯特尔发自英格兰的一封贺电。埃莉诺现在享有的许多欢乐都得益于这位女士，但这却是她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索维斯特尔女士两天后死于癌症。

当总统到达并健步上楼时，现场掌声雷动。窗外传来涌动在街上的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欢闹，皮博迪不得不在主持婚礼时提高嗓门。罗西身体不适，拉索普·布朗代替他担任男傧相。新人的引领者全都是他们的亲戚和同学。

这对新人乘火车前往海德公园，他们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对夫妇。就在他俩度过新婚第一夜之时，萨拉选择留在纽约。富兰克林和埃莉诺无人打扰地在海德公园待了一周。萨拉认为，埃莉诺的婚姻起始阶段应该与她的一样，于是，这对新婚夫妇住进了萨拉为他们在西区45街挑选的一处简朴公寓。埃莉诺担心自己缺乏持家能力，例如不懂烹饪，但富兰克林一如既往，愉快且不苛求。埃莉诺费尽心思地迎合萨拉，写给萨拉的信万变不离其宗：“对孩子们来说，你这位妈妈简直温柔亲切到了极点!”这里的“孩子们”当然也包括埃莉诺本人。埃莉诺渴望真正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而萨拉也当然对此表示欢迎，但在未来35年里，罗斯福家族中这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都在不断地加以调整。

富兰克林总是和蔼可亲、性情平和，甚至还充满柔情，但除了身体上的接触外，他几乎从未主动与埃莉诺进行发自内心的亲密交流。渴望情感的埃莉诺试图尝试这种亲昵，但又总是担心得不到回应，并且从未对此抱乐观态度——她会长期留住富兰克林的爱或其他任何人的友谊。富兰克林在父母爱的沐浴下长大，他体会不到埃莉诺对某种亲密关系的渴望。他总是谦恭有礼，有时也喋喋不休，但他从不吐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习惯于我行我素。

02 他是我所遇见过的最难对付的人

1917年，约瑟夫·P·肯尼迪对时任海军部长助理的罗斯福做出了这番评价

I

这一对新婚夫妇于1905年6月7日出发，乘坐英国大洋号邮轮开始欧洲蜜月之旅。富兰克林在途中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乘客，莫过于6个日本海军军官了，他们此行去英国是要取回两艘刚在英国船厂造好的军舰。富兰克林向他们仔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当时，日本在尖端军舰的制造方面还依赖于英国，然后在日本国内再对船舶进行仿制和改进）。

富兰克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内心却充满了忧虑。他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嗓子发炎，而且晚上也会噩梦缠身，有时甚至还会梦游。埃莉诺曾几次将他从噩梦中唤醒，以免他梦游走出饭店的房间。此外，埃莉诺那严重的猜疑心也令他备受煎熬。有一次，富兰克林和饭店里的一个女游客出去爬山，埃莉诺为此恨之入骨，尽管在出发前，富兰克林曾经邀请太太一同前往，但她不愿意，而且在他们外出的三小时里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还有一次，富兰克林在埃莉诺不愿同往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参加了饭店举办的舞会，这又令埃莉诺醋意大发。

在瑞士逗留期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晚上，在宫廷饭店侍者竟然将他俩挡在了餐厅门外，理由是他们的穿着过于随便。埃莉诺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差不多半个世纪后，当她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旧地重游时，她断然拒绝入住宫廷饭店。

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他们花了很多时间逛旧书店，埃莉诺勉强能用意大利语交流，如果富兰克林想要买书的话，埃莉诺便和意大利书商讨价还价，直到富兰克林打断她，因为他发现埃莉诺与其说是在“砍价”，倒不如说是站在书商一边（埃莉诺认为狠命地砍价是很没品位的）。

在巴黎，埃莉诺也碰到了令她感到很别扭的事——富兰克林和同行的哈佛伙伴带上她和萨拉的妹妹去看了一场情景喜剧，剧中有不少淫秽情节。在巴黎，一位有名的预言家和手相师道破了他们夫妻二人今后的命运。他预言埃莉诺将获得一大笔遗产，而富兰克林将成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和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同姓，所以这一“准确”的预测或许也没什么了不起）。8月11日他们到达巴黎，富兰克林当天得知自己第一学年有两门考试没通过，一门是“合同法”，还有一门是“诉讼与法律实践”。他写信给母亲让她把书寄到巴黎来，但没有交代寄书的缘由。当母亲把书从纽约寄到巴黎后，富兰克林就利用上午拼命看书，下午则和埃莉诺四处旅行，尽情享受蜜月时光。富兰克林很轻松地就通过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补考，于1905年10月开始了在法学院第二学年的学习。

和萨拉一样，埃莉诺从欧洲蜜月回来以后便怀孕了。1906年5月3日，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的第一个孩子安娜·埃莉诺出生了，她长得既健康又结实。富兰克林很高兴，而天生谨慎内向的埃莉诺却高兴不起来。在她看来，这又是一个无趣的负担。更加不幸的是，她听信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儿科医生的意见，这个医生认为应该根据严格的时间表来照看新生儿。孩子要是想吮吸手指，埃莉诺就会把孩子的胳膊拽回

身边放好；埃莉诺不许人亲吻孩子，因为怕孩子得上白喉、肺结核，甚至性病；医生还要孩子每天呼吸新鲜空气5个小时以上。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埃莉诺把女儿放在木制的睡篮里，悬挂在她卧室的窗外。直到一个邻居向她抗议，说如果埃莉诺继续这样做的话，就要向“防止虐待儿童协会”提出申诉，埃莉诺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做法。后来，埃莉诺为自己当年一些过于偏执的做法感到后悔。

萨拉还把持着家里的财务大权，因为富兰克林所得的遗产根本不够度日。萨拉希望自己能够管好钱袋子，而不是继续让富兰克林无节制地花钱。

富兰克林的母亲和妻子为了他整天忙碌着，而他自己却过着如同单身汉一般的生活。这对于萨拉来说不算什么，她可以把自己的严厉管教都用在埃莉诺身上，当然这一点是年轻的埃莉诺没有想到的，因此这使她的幻想都破灭了。

虽然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的宗教信仰相近，但埃莉诺由于严谨的性格使然，严守着去教堂礼拜的做法，富兰克林却总能在星期天的早上，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打高尔夫、冲浪或者是睡懒觉。

富兰克林对一些富有男子气概的运动很在行，也喜欢跳舞和各种社交活动。有时候，他凌晨4点才回家，这使埃莉诺很恼火，她担心亲戚们会有微词，也害怕一些同学会说富兰克林轻浮。埃莉诺试着学习打高尔夫，但是失败了，她丈夫劝她干脆放弃算了。她直到中年才克服了对水的恐惧，并学会了游泳。她有时会去钓鱼和冲浪，但对这些活动，她从来没有真正提起过兴趣。当她试着去骑詹姆斯先生家的马时，却没有人提醒她那匹马有时会突然加速疾驰，她当时的窘境自然可想而知，因为那次心惊肉跳的经历，她好多年都再也不敢骑马了。

第二年夏天，全家都搬到位于新泽西州大西洋岸边的西布莱特。埃莉诺作为一个好妻子，还开始学习驾驶汽车，但是她将富兰克林的

福特车撞到了房东家的门廊上。和骑马一样，她又好久都没敢再碰方向盘。

富兰克林对于自己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学习漫不经心，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将来是否会从事律师这一行业。他的很多同学都是犹太人，埃莉诺曾提起过此事，但语气很委婉。很多开明的人士都认为犹太人是异族，他们认为犹太人与众不同，但这不见得一定是坏事；比较保守的人则认为犹太人很坏，但是罗斯福家族中没有一个人持这样的想法。

富兰克林于1906年7月通过了纽约州的律师考试，他正式的学习生涯告一段落了。他在8个小时的考试中“收获颇丰”，因为当时他得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获得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意味着他还要再读一年书。富兰克林很高兴能回到哈佛再待上一年，他不觉得有必要再读一个双学位，他认为马上就可以从事法律这一行了。

据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学教授杰克逊·瑞纳德回忆，萨拉通过一个名叫路易斯·莱迪亚德的人，为富兰克林在华尔街谋得一份差事，供职于著名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律师事务所。

富兰克林对法律实践没有多少兴趣，他为哈佛的几个朋友打了一场酒后扰乱社会治安的官司后，似乎只为一场刑事案件担任过律师，那是1910年的一宗二等谋杀案，最终富兰克林赢得了官司。

莱迪亚德后来告诉萨拉，富兰克林不得不离开那里，因为他对法律丝毫没有兴趣。富兰克林似乎说服了母亲，他始终坚持认为法律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但他那时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做一个职业道德的牺牲品，他在等待时机发展他的仕途。在1907年的某一天，他对一群在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大三学生说，他马上就会当选为纽约州议员了，然后将成为海军部长助理，接着是纽约州州长。这正是西奥多·罗斯福所走过的仕途之路。富

兰克林在演讲时总是语调轻松、涉猎广泛，对此他在法律界的年轻朋友们都习以为常了，并且都觉得他为人坦诚。

虽然他对妻子非常忠诚，并且两人又有了孩子，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富兰克林还是过着近似单身汉的生活。罗斯福的第二个孩子詹姆斯于1907年的12月23日出生了。

当时，很少有哪一位总统在入主白宫以前没有从事过别的职业。似乎有这样的传统，这些人都想在一些受人尊敬的地方任职，例如军队或是法院，然后成为公共生活中的焦点，之后机遇降临，个人仕途也从此飞黄腾达，受到提拔成为高级公务员，最后当上总统。这是由乔治·华盛顿开创的美国传统，即由行伍起家，最终入主白宫。总统精神中包括奉献主义、英雄主义和在危难时刻为国家服务的精神，这些都是受人称道的优秀品质。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延续了这些传统，而且在美国所涌现出的职业政治家中，罗斯福当属佼佼者。

罗斯福的第三个孩子，小富兰克林出生于1909年3月18日，是一个有10磅重的巨婴，但在10月份不幸患病，11月份就夭折了。埃莉诺在孩子刚开始染病的时候没能陪伴在他身边，而是把他托付给了萨拉和其他人。后来她在孩子的墓边不忍离去，她觉得："如果就这样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寒冷和凄凉中，那真是太残忍了。"富兰克林也为此感到痛心，因为这对所有为人父母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很快摆脱了悲伤，这简直让埃莉诺感到不可思议。埃莉诺对自己丈夫总是很晚回来，有时还满口酒气感到十分生气。

她认为自己和罗斯福既然身为夫妻，就应该得到他更多的陪伴。她在1909年8月写给丈夫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连续两天没有你的来信之后，昨天收到了你写的一封短信，我感到十分失望。"那时她正在坎波贝洛，而丈夫不在她的身旁。

富兰克林成为了民主党人，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民主党人，而且他也不喜欢那些身在纽约、个性高傲的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激起了富兰克林所有的政治热情，也触动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富兰克林认为西奥多是他所见过的最伟大的人。

西奥多·罗斯福用他旺盛的精力、改革的锐意以及惊人的气魄向富兰克林展示了一个有决心的政治家的抱负。美国总统可能来自显赫的家族，受过哈佛和哥伦比亚的精英教育，但是仍然能够赢得很多选票。富兰克林非常有计谋，他主张进步派的共和党人和改革派的民主党结成联盟。威廉·霍华德·塔夫托身材魁梧，是西奥多的继任者，但是他让西奥多非常失望，因为他已经使得共和党分裂成了保守派和改革派（进步派），而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西奥多·罗斯福是进步派共和党人的领袖，而且能力出众，没有什么能够难倒他，但是如果共和党分裂了，塔夫脱可能会把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送进白宫。

杜切斯县一个叫约翰·E·马克的法官于1910年初拜访了富兰克林，向他提供了民主党人竞选州议员的提名，这是由前任州长空出来的一个位置。

富兰克林向自己那些功成名就的亲戚们征求了意见，西奥多鼓励他竞选。尽管当时有很多变数，甚至包括前任又宣布要收回职位的可能，但是富兰克林的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激发，他说自己有可能会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他有着显赫的姓氏，也因为他采取了表面上平静如水的自信姿态和相当多的手段，使得他的威胁姿态最终起了作用。作为回应，马克法官建议他去尝试竞选国会参议员，在那里他可以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得到提名。但是要在这个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地区做到这一点，有相当大的难度。

富兰克林由民主党委员会的主席摩根·霍伊特提名（此人后来为富兰克林提名了7次，其中4次是总统提名）。富兰克林和其他地方的一

些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由此，富兰克林学会了行走政界的一个技巧，那就是称呼有着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为“我的朋友”。

在富兰克林的竞选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是他的竞选车轧死了一条狗。虽然当时没有人看见，但他还是坚持要停下车来慰问狗的主人，并赔偿了5美元。事实证明这件小事为富兰克林赢得了选票。富兰克林在竞选的过程中很卖力，他虽然没有太多名气，但他活泼的生气和合群的个性将这一缺陷掩盖掉了。有一天他甚至在竞选的过程中迷了路，这也是他后来津津乐道的一件事。虽然很多人羞于承认错误，但是他经常会无伤大雅地自我嘲讽一番。

富兰克林对一个名叫汤姆·林奇的年轻选民印象深刻，他是一个爱尔兰裔美国园艺师的儿子，富兰克林后来称他为“疯狂的爱尔兰玫瑰”。林奇表示只要富兰克林能够得到美国总统提名，就为他开两瓶香槟庆祝，而这两瓶酒一直保存了22年才有机会打开。

富兰克林在那时几乎没有胜出的希望，共和党人直到选举的那一天还依旧趾高气扬。当竞选到了11月份的冲刺阶段时，富兰克林在妻子、母亲和亲朋好友的陪同下，在两个场所发表了演讲，但他表现平平。埃莉诺后来写道：“他当时看起来有些单薄，还很紧张。”但是他的紧张可能是因为太多家人在场，在这种情况下的表现并不能说明真实水平。

选举结果很快就公布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获胜，当选纽约州参议员，而且他在民主党候选人中的得票数是最多的。在28岁时，富兰克林终于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他再也不像在格罗顿公学、哈佛或是华尔街那样为了营生而学习工作了，他抛弃了所有的犹豫和迟疑。这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其实是美国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Ⅱ

罗斯福立刻在奥尔巴尼成了名人。他过去曾陪父亲去过几次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看望他父亲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退伍军人并在克利夫兰政府内任职。

罗斯福一家也搬进了更高档的住宅区，由佣人精心照料一家的饮食起居。在搬进新居后的第一个冬天里，小詹姆斯·罗斯福感到心脏不适，需要别人抱着他上下楼。这对于本已不得闲的埃莉诺来说，真是忙中添乱了。

这时的议会领袖是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后来成为了众议院议长，他来自一个受人尊敬的爱尔兰家庭，已经当了四任议员了。他和罗斯福后来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罗斯福的女儿安娜曾说过，在他父亲的政治生涯中，起码在竞选总统一事上，很大的动因就是不愿意落后于艾尔弗雷德·史密斯。两人之间的关系总是介于敌友之间，有时很好，有时又很糟糕。

另一位在纽约政坛上活跃的民主党人，就是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他的政治生涯多年来也与罗斯福和史密斯紧密相连。他虽是坦慕尼厅的成员，但是热衷于改革，对于纽约的移民社区也充满了热情。坦慕尼厅的历史比传说中的更加复杂。坦慕尼厅成立于1789年，是由一群反对联邦政府的中产阶级建立的，于1805年改组成为慈善组织，后由纽约民主党接管。它后来成为了无财产移民的支持力量，其中最初的一批移民是爱尔兰人。经过了专制时期，坦慕尼厅渐渐地依靠操纵投票来获取资助，所以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坦慕尼厅这个团体已经慢慢蜕变了。但它主要还是一个慈善组织，而且是纽约为了移民建立的第一个组织。

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有跟这些人打过交道。他在常青藤团队里受过锻炼，但似乎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派不上用场。但是罗斯福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他能够弥合自己所在政党内的分歧，可以使纽约混乱的政治局面得以改善。

富兰克林身材匀称、注重仪表、能言善辩，而且说话时还经常挥弄手中的烟斗，不像西奥多·罗斯福那样会在充满烟味的房间里破口大骂。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变得温和，什么时候应该迂回行事，他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从不过分谨慎。在离开格罗顿、哈佛和华尔街之后，他彻底摆脱了自己身上那种老气横秋的气质。他不再是一个成长于私立学校，只会讨好大人的独生子了。他从来就不赞同西奥多·罗斯福那种好斗和张扬的个性，他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平和、从容不迫又十分自信的绅士。他既有贵族气质又不势利，既有抱负又不至于让自己筋疲力尽。

在开始的日子里，党魁们知道富兰克林和他们不是一类人，因为这些党魁们除了从政别无他途。富兰克林也不像共和党人那样，作为罗斯福家族的一员，他要发布任何消息必定能够吸引媒体的眼球。他不畏恐吓也不为奉承所动，他富有活力同时又深不可测。1910年，在奥尔巴尼这块地盘上，富兰克林还只是个外来者而已，大家都用好奇的眼光看他。但无论民主党的党魁们做何感想，富兰克林永远都是罗斯福家族的一分子，所以罗斯福、萨拉以及埃莉诺是行政大厦的常客。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次真正考验就要到来了。当时，美国各州参议员是由各州议会共同选举出来的。纽约州现任共和党议员戴普本指望得到共和党在国会中86位议员的支持，而民主党的114位议员又分为两派：一派的领袖是爱华德·施帕德，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律师；另一派的领导则是威廉·希恩，是一个狡诈奸猾、贪得无厌的政客。民主党的议员为了联合对抗戴普，决定把票投给党内大多数人赞同的对象。

查尔斯·墨菲当时是坦慕尼厅的头目，他虽然令人生畏，但是和坦慕尼厅从前的领袖相比，已算是有了不小的改善，他决定把票投给希恩。

改革派人获得了早期的胜利。他们偏向于史密斯和罗斯福的朋友罗伯特·瓦格纳。一群年纪稍轻的人，主要是改革派的民主党人，即富兰克林支持的一派，在1911年举行的政党高层会议上告诉了墨菲一个坏消息。他们情愿选共和党人戴普，也不支持希恩。年轻的罗斯福在上任两周后，就把票投到了党内的反叛者一边。共有21名党内反叛者，他们已经连续10周在罗斯福家中定期聚会了。富兰克林成了著名的“牧羊人”。一位资深的奥尔巴尼政治记者路易斯·豪在《纽约先驱报》上撰文写道：“在奥尔巴尼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21名党内‘叛徒’使得政治变得如此饶有趣味，如此人性化。”他很快就发现了富兰克林身上的政治潜质和新闻价值。之后，他和富兰克林的紧密关系发展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这也是埃莉诺第一次对政治如此感兴趣。希恩警告罗斯福，说他将运用包括政党工具和个人关系网在内的一切办法，把他的敌人赶走。他果真动用了政党机器进行报复，譬如将摩根·霍伊特（富兰克林的提名人）从议会内的“农业委员会”中踢了出去，而富兰克林正是该委员会的主席。

罗斯福勇敢地宣布，他的家人将为那些经济困难的党内叛逆者提供经济支持。这确实是一种无私的利他主义行为，但人们似乎并没有看到富兰克林或是萨拉真的拿出钱来。

希恩惯用的一个伎俩便是指责他的敌人反对天主教，这一伎俩在攻击罗斯福时更是毫不留情。罗斯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事实上，罗斯福及其家人对罗马天主教确实存在一些怀疑，认为它隐秘而且专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原始的，很多信徒都存在信仰危机。

一旦富兰克林·罗斯福把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宗派观念放在一起，他就势必会得罪很多天主教的头面人物。他亲密的合作对象、主要的法律伙伴、私人助手甚至民主党的主席等人都是天主教徒。罗斯福改变了说法，不再提反对天主教，特别是从他开始和教皇打交道以后。但是对于埃莉诺来说，提到天主教还是会让她感到心烦意乱。

1911年1月30日，也就是罗斯福29岁生日那天，墨菲和罗斯福谈了一次话，他告知罗斯福，希恩不可能取得胜利。他还让罗斯福出面，劝希恩退出，于是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三天后请希恩吃饭。在这场饭局上，大家都彬彬有礼，但是气氛却很紧张，最后并没有达成实质性结果。罗斯福开始考虑使改革派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合作。他放弃了原来的候选人，为了化解同天主教的积怨，转而推选了一名信奉天主教的候选人。墨菲推举候选人时摇摆不定，党内反叛者联合反对墨菲提出的候选人。最后坦慕尼厅内的一个独立派詹姆斯·奥戈尔曼被推选出来。反叛者团体解散了，史密斯和瓦格纳保证不会对他们进行惩罚，罗斯福也表示支持新推举出的候选人。

就像罗斯福一贯的行事风格一样，他从一开始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帮助奥戈尔曼取得胜利。他此时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对付记者的技巧，例如微笑着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或者省去一部分正确的答案，或者干脆答非所问。

所有这些技巧这一次都引起了争议，使结果弄得更糟。对于怀疑者来说，希恩的出局是一个大灾难。事实上每一个清醒的人都知道，这场党内叛乱持续了如此之久，可怕的墨菲不可能轻易饶了他们。但是两派的激进者对于结果却是感到一头雾水，他们只记得希恩没有获得提名。罗斯福声称自己一开始就看好奥戈尔曼，墨菲也没有对此表示反对，这样给公众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党内反叛者在这场较量中获胜了。最后的笑容从坦慕尼厅头目转到了罗斯福的脸上。

其实，奥戈尔曼胜出希恩并获得当选一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罗斯福在危机的最初几周内树立了威信。罗斯福原先投票时，坦慕尼厅里会有人大声唱歌来表示对他的蔑视。但是通过这件事，在整个纽约州甚至在全美，罗斯福都建立起了无愧于自己高贵姓氏的威信。罗斯福和他的公关顾问们让那些怀疑者大跌眼镜，他们公开了“墨菲失败”的秘闻，公开了坦慕尼厅通过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和瓦格纳向罗斯福表示休战的内幕，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在一场辩论中，瓦格纳在参议院说道：“罗斯福议员达成了他的愿望，他就是想要上报纸的头条。我们应该继续做好自己的事。”

在美国参议员得以直选的问题上，罗斯福确实是功不可没。这是美国宪法第17条修正案确定下来的(注)，两年后得以实施。这一改革避免了类似“希恩事件”的混乱再度发生。

富兰克林·罗斯福刚进入参议院时，经常提出一些荒谬的提案。有一次，别人甚至将他从会场中赶了出去。根据弗朗西斯·珀金斯的说法，富兰克林在那时极不严肃，噘着嘴，显得趾高气扬，富兰克林还爱用冰冷的声音说“我才不听呢”。

别人往往低估了罗斯福的能量，但是他自己总能登上更高的职位。罗斯福在国会不受重视，然而正是这些促使他摆脱世俗，最后实现他的崇高理想。当时，罗斯福对于自己判断局势和把握人心的能力并不是很有信心。虽然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反对，但他还是坚持要为1912年的选举战进行斗争。

1911年，在纽约推出一项新法案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意见不同的派别，富兰克林和各派之间都保持了距离。坦慕尼厅和具有改革思想的市长都同意新法案，他们向富兰克林保证，如果得到他的支持，就会给他在国会安排一个好位置。富兰克林整个夏天都在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投了反对票。这激怒了他的敌人，他们认为富兰克林经不起

诱惑，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罗斯福知道自己的同盟者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政策问题上有不同的盟友。

1912年4月纽约州议会休会期间，罗斯福和他妻弟一起应西奥多·罗斯福的邀请，去巴拿马运河旅游。此时正逢泰坦尼克号处女航沉没之时，超过1 500人丧生，其中很多人还是罗斯福家的朋友。

回到美国的新奥尔良后，富兰克林和埃莉诺见面了，他俩坐车去新墨西哥看望埃莉诺最好的朋友伊莎贝拉，当时正赶上伊莎贝拉的丈夫，同时也是西奥多·罗斯福原来的战友罗伯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此时伊莎贝拉一边伺候着几乎没有治愈希望的丈夫，一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伊莎贝拉此时表现出来的勇敢鼓舞了埃莉诺，在将近10年之后，当罗斯福遭遇不幸时，埃莉诺表现出的乐观也与此不无关系。

在这个总统大选年里，富兰克林支持的是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现任新泽西州州长伍德罗·威尔逊。伍德罗·威尔逊把这个出了名的政治腐败、官僚横行的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且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是全美公认的著名教育家和作家。富兰克林看到民主党受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阴谋操纵，在1886年、1900年和1908年三次都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但最后都落败了，富兰克林感到非常失望。富兰克林认为布赖恩是一个脾气乖戾、寡言少语的西部人。

民主党在最近4次总统大选中连续落败，在最近13次的总统大选中有11次落败。这对于渴望实现理想的富兰克林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共和党的分裂为民主党创造了绝佳的时机。西奥多·罗斯福对于新选出的继任者为塔夫脱非常不满。塔夫脱威胁说，如果在党内的提名选举中不能胜出，他将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他最终赢得了党内选举，这一次只有共和党的党魁可以阻止他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拜访了威尔逊并深受感动。1911年秋，他承诺要支持威尔逊，从此以后，罗斯福十分努力地为威尔逊开展竞选工作。这又是一场同党魁们进行的艰苦斗争。纽约州有一条统一规定，即代表团的投票由大部分人说了算。罗斯福早就看出，绝大部分的投票权掌握在坦慕尼厅头目查尔斯·墨菲手中。1912年6月，墨菲将罗斯福挡在了巴尔的摩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之外。但是，罗斯福对此毫不畏惧，他组建了一个叫作纽约州威尔逊大会的组织，自己牵头带了150名宣传员为威尔逊呐喊助威。

1912年6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人代表大会上，共和党党魁不顾西奥多·罗斯福在党内选举胜出的事实，重新提名了塔夫脱。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错误。他们应该知道罗斯福会分裂他们，并且带走大多数人。这种局面真的发生了。

民主党的提名自从内战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出现胜利已成定局的场面。除非愚蠢的共和党人找到什么办法能使西奥多·罗斯福平静下来，才有获胜的可能性，但是要办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埃莉诺陪同富兰克林来到了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同时出席这种场合。富兰克林拿出当年在哈佛橄榄球队才有的劲头，不断起身游说代表团。虽然埃莉诺觉得这个过程和在奥尔巴尼的选举战一样有意思，但她还是坚持认为富兰克林不应忽略她的存在。她离开了巴尔的摩，带着孩子去了坎波贝洛过夏天。

大会变成了威尔逊和众议院议长钱普·克拉克之间的较量。提名要求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在投完第10张票时，查尔斯·墨菲将纽约州的票投给了克拉克。但即便如此，克拉克领先威尔逊的优势也非常小。布赖恩看到自己无望得到第4次提名后，在第14个投票时将票投给了威尔逊，他的票是决定胜负的一票。

还有32张选票结果未知，但是威尔逊已经一步步地接近了绝对多数的目标。威廉·布赖恩是威尔逊胜出的决定力量。虽然布赖恩不能参选，但是他能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在帮助威尔逊的同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治事业也在蒸蒸日上。

罗斯福的家人在选举问题上意见不一。萨拉偏向西奥多，不希望威尔逊成为总统。虽然西奥多对于富兰克林帮助民主党竞选一事头脑冷静，但这毕竟造成了家庭内部的不和。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多次选举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富兰克林在回坎波贝洛的途中得了伤寒，整个9月都卧床不起，事业遭受挫折。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没有希望能够保住州参议员的位置了，但是美国政治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位人物出现了，并且拯救了他。

上文中已经提到过一位资深记者路易斯·豪。1912年豪42岁，矮小驼背，大眼睛大耳朵，总是带有一副吃惊的表情和一脸穷酸相。豪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在麦金利总统死后，他报道了在纽约郊区举行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职时的场景，并且在1906年成为《纽约先驱报》驻奥尔巴尼站的记者。他的长相很奇怪，只有和他多接触以后，才能看出他可笑的外表背后极高的智商。因为豪知道自己其貌不扬、前路崎岖，他认为通过传统的方式自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个自己可以对其施加影响的政治人物，而这个人的成功也可以帮助他。

豪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还不清楚自己是否需要豪的才智，但是豪并没有放弃。豪是第一个在奥尔巴尼正面报道罗斯福的记者，在“希恩事件”中他在非正式场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12年他帮罗斯福和其助手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们到巴尔的摩之前，他就猜测到富兰克林可能成为美国日后的总统。在豪衣衫褴褛的外表之下，在他烟雾缭绕的形象背后，掩藏着巨大的政治天分。

豪花了很多钱在报纸上登广告，还亲自在罗斯福所在的选区为他拉票。当共和党的反对者指出富兰克林反天主教时，豪为当地的天主教徒筹集资金，罗斯福还写了一封表扬自己的信，在豪的鼓励下寄往当地的一个报社（罗斯福从豪那里学会了政治世界里的很多技巧）。

在大选当天，虽然只有42%的投票率，伍德罗·威尔逊还是轻松地赢了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富兰克林为他的成功当选立了汗马功劳。豪立刻投奔了富兰克林，直到他1936年去世为止。由于罗斯福病情不稳定，所以回到了他在奥尔巴尼的家中休养，还当选为州议员并分管农业协会。这一职位有一定的分量，但是他迫不及待地力争在联邦政府中谋得更高的职位。

伍德罗·威尔逊在新泽西首府招待了富兰克林等人。不知道当时富兰克林有没有向威尔逊表示要担任海军部门职务的意向，但是最后丹尼尔斯提名罗斯福担任了海军部部长助理。

丹尼尔斯于就职典礼当天，正式宣布了这一任命，罗斯福满心欢喜地接受了。曾任西奥多·罗斯福政府国务卿的鲁特参议员警告丹尼尔斯说："无论在哪里，罗斯福都希望走在最前面。"无论是奥尔巴尼的当权者还是坦慕尼厅的支持者，都很高兴看到罗斯福离去，就像瓦格纳在同罗斯福告别时所说的那样。

罗斯福就任海军部长助理，这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唯一副职。

III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13年他的第八个结婚纪念日任职后，立即用崭新的办公用品给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写信。他在海军部内负责政府采

购和供给、民兵和人事安排等事宜。美国海军当时在世界排名第三，但是比英国的皇家舰队和德国的帝国海军都要小得多。

在刚刚就任的时候，富兰克林往往按捺不住自己的虚荣心。丹尼尔斯不在的时候，罗斯福就会提醒别人，现在是罗斯福家的人在负责海军部，而埃莉诺曾就此事责备过富兰克林。

1913年8月，墨西哥内战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当威尔逊呼吁要有一个“正直的、有秩序的”政府来控制墨西哥时，墨西哥国内还是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伍德罗·威尔逊这次并没有干涉墨西哥内战，而是取观望姿态。这让罗斯福很不高兴，但是对于那些联邦和地方上的人而言，这避免了大量地面部队卷入前途未卜的墨西哥内战，所以人们非常满意。

罗斯福似乎认为，他的远房叔父老罗斯福创造了在政坛平步青云的奇迹，他只要按着老罗斯福走过的道路，高喊着他的姓氏就可以了。

富兰克林来到华盛顿任职，埃莉诺也和他一起进入了华盛顿的社交圈。埃莉诺忠实地履行了她向每一位重要官员家中寄送卡片的任务，每周三她还要接待很多不知名的来客。罗斯福结交了很多在他日后仕途发展中有用的人。在他所遇到的年轻海军舰长中，就有日后的海军上将威廉·哈尔雷和哈罗克·斯塔克等人，他们在航海方面的丰富知识给罗斯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罗斯福以外，威尔逊政府的其他官员头脑十分顽固。总统和夫人很保守，他们在白宫甚至没有举办过就职舞会或是社交宴会。威尔逊夫人成天忙于帮助华盛顿的穷人，特别是黑人穷人。

罗斯福家人接触更多的还是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的旧交，以及在同时代进取心十足的一些人。富兰克林在宴会上向来很活跃，他在华盛顿经常参加大学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但是，除了他的助手路易斯·豪之外，似乎没有别人认为富兰克林会有光明的前途。

丹尼尔斯虽然认为海军部里的各种仪式十分无趣，但在一开始他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反常。罗斯福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此人反应迟钝，表情也非常滑稽。丹尼尔斯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还是一个白人种族优势论者和种族隔离主义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忠诚和反对托拉斯的人。

丹尼尔斯将美国海军变得十分呆板，他颁布的法令改变了水手们原先拥有的民主化、随意性的生活习惯。尽管从严格的行政意义上来说，他是富有效率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最终总结认为海军在海上执行命令时，最好做到纪律严明。罗斯福用他一贯的不屑姿态，接受了丹尼尔斯的法令。富兰克林无论是在海军中供职或是在更高的职位上工作时，对这种“索然无味”的法令大都不予重视。

当丹尼尔斯暗示罗斯福对他的政策有轻视的倾向时，罗斯福往往都用在格罗顿公学里学会的那一套——如何做一个成功的下属，如何赞扬丹尼尔斯的优点。1913年的圣诞节，罗斯福送给丹尼尔斯一份贵重的礼物——一个精致的相框，里面装着19世纪美军海军军舰的彩色照片。丹尼尔斯十分喜欢，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我收到过的所有圣诞礼物中，这是最棒的。”

在丹尼尔斯工作的一些重要环节上，他也确实让罗斯福心悦诚服。他勤勉地游说国会，反对海军上将们夺走他的权力，防止他们削弱自己的决策能力，确保那些贪心的商人做出重要让步。要完成这些事情，不仅需要聪明才智更需要丰富的经验，而丹尼尔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极为出色。罗斯福从丹尼尔斯那里学会了很多联邦政府运作的知识，了解到总统、各部部长以及国会领袖之间的互动关系。

罗斯福自己也变成了联邦政府的代言人，不讲任何情面。年轻的金融家约瑟夫·肯尼迪在1917年第一次和他打交道时，对此深有体会。肯尼迪代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主席，向政府提出申诉，表示在阿根廷人取回订制的船只以前，应该先付款。罗斯福彬彬有礼地说，若果真如此，海军部只好先将船只代管，把剩下的事情交给伯利恒钢铁公司同阿根廷人自行解决。肯尼迪告诉老板说，海军部只是在虚张声势罢了。几天后，海军部真的把他们公司的人赶下船只，然后把船只交给了正在等待的阿根廷人。罗斯福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有理、有利、有节，肯尼迪这才改变了对罗斯福的看法，他原先认为罗斯福不过是一个念过哈佛的有钱公子哥，而后来却认为“罗斯福是我遇见的最难对付的人”。肯尼迪本人也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但是那时他不得不承认：“我几乎都要崩溃了。”阿根廷的战列舰起航前，威尔逊总统在舰上吃了晚餐。

在路易斯·豪的指导下，罗斯福在海军部工作时就十分注意和劳工组织的关系，在他经常联系的劳工组织代表中很受欢迎。他经常去视察，而且视察时兴致高昂，这大大鼓舞了士气。罗斯福的所有朋友都知道他十分热爱海军事业。

豪主要负责罗斯福的家乡，即纽约州的政治工作。罗斯福和豪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组织，罗斯福希望回到纽约政界，在1914年的选举中竞选州长或是美国参议员。

罗斯福和豪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削弱纽约坦慕尼厅的力量，即使是他们身处华盛顿时也依然如此。罗斯福支持反坦慕尼厅的势力，并且希望总统任命自己去纽约州管理当地民主党的内部事务，但是威尔逊却用“等等看”这样的字眼敷衍了事。

罗斯福作为政治新星得以崭露头角，不仅是因为自己的才能，更多的是由于豪的帮助。但是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政治前辈们眼里，32岁的罗斯福不过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小毛头而已。原来支持过罗斯福的一

个党魁评价说，罗斯福是华盛顿的一个“自己找事的小忙人”。威尔逊偏向于相信坦慕尼厅，在威尔逊看来，罗斯福更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然，冲动并不是无法原谅的，而且在关键时刻往往会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此时，罗斯福犯了一个在个人政治生涯中最不可思议的错误，那就是决定竞选代表纽约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他听信了当时财政部长的话，这位财政部长名叫威廉·麦卡杜，刚刚在1914年成为威尔逊的乘龙快婿。罗斯福判断失误还有另一层原因：罗斯福猜想，恐怕威尔逊也认为坦慕尼厅无法推出什么有竞争力的候选人。虽然麦卡杜从未明确说过，但是罗斯福还是情愿相信威尔逊总统支持他。而此时，豪也认为坦慕尼厅提名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一个盛气凌人的报业发行人，是个很容易打败的家伙。罗斯福同时还寄希望于得到受西奥多压迫的进步派人士的支持。

1914年7月，罗斯福打算从坎波贝洛出发，去参加科德角运河的开幕仪式，此时他听说奥匈帝国宣战了，还将得到俄国的支持，并且法德有可能进入敌对状态。他当天晚上就从科德角赶回了华盛顿。华盛顿对此没有任何反应，这令他感到非常吃惊。他只是接到了由丹尼尔斯和国务卿布赖恩签发的一些文件时，他就更加吃惊了。罗斯福认为这些人是害怕看到自己宣称的“和平主义”遭遇失败。当他发现布赖恩分不清海军的有关名词时，更是觉得可笑。后来布赖恩写道：“以后只要我提到军舰，罗斯福就认为我什么也不懂，其实那时候美国能做的事很少。”

当总统夫人患癌症去世后，事态的发展就更不顺利了。她8月6日辞世，罗斯福担心威尔逊会受不了（他们已经结婚29年了），但是威尔逊以他惯有的坚强承受住了打击。

赫斯特没有参加竞选，坦慕尼厅最终提名的是美国驻德国大使詹姆斯·W·杰拉尔德。罗斯福简直不敢相信，为了打败自己，坦慕尼厅能

够把这么重要的人从岗位上拉回来参加竞选。杰拉尔德从布赖恩以及威尔逊那儿寻求指点。布赖恩、麦卡杜以及豪斯都偏向罗斯福，但是坦慕尼厅和首席法官詹姆斯·麦克雷诺兹偏向杰拉尔德。威尔逊不想干涉，杰拉尔德离开战时的柏林就是为了赢得这次竞选。在罗斯福的这次竞选中，豪表现得不像平日般那么有效率，也没有得到进步派人士的支持。杰拉尔德以大比分胜出，罗斯福只得到了纽约州66个县中1/3的选票。尽管罗斯福表现欠佳，却没有进行自我反思，也没有反省自己做事欠考虑的毛病。

1915年3月，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军事演习中，罗斯福担任联邦特派专员。丹尼尔斯开始邀请很多国家的海军参加，但是因为战争爆发了，当时建议的国际联合舰队演习不得不停止。威尔逊派往旧金山的代表是不起眼的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马歇尔在美国历史上因为说了一句“这个国家需要的是5美分的好雪茄”而闻名。

老罗斯福身上还聚集着不少公众的目光。1913年10月，西奥多·罗斯福去亚马孙做了一次具有挑战意义的旅行。他说：“这是我最后一个变成小伙子的机会。”他的腿在途中感染了，他瘦了差不多16千克，而且还患上了热带病。这一次旅行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再次竞选总统的希望落空了。考虑到不想给富兰克林找麻烦，他拒绝了萨拉提出的与他们同住的邀请。

1915年春天，富兰克林·罗斯福终于有了一个回报西奥多·罗斯福的机会，在此之前，西奥多曾多次帮助过他和埃莉诺。西奥多被控犯有诽谤罪，提出控告的是共和党奥尔巴尼的党魁威廉·巴纳斯和坦慕尼厅头目墨菲。因为找不出这两派人共谋的证据，使得律师也很难推翻他们的指证。在这关键时刻，富兰克林挺身而出，指出了墨菲和巴纳斯曾在“希恩事件”中共谋的证据。这一证据十分有力，最后帮助西奥多赢得了这场官司。一个是过去的美国总统，一个是将来的美国总统，

两人互致了贺电。“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在陪审团面前作证的样子。”老罗斯福动情地写道。

这个案子在受审时，因为德国潜艇于1915年5月击沉客轮事件而变得更为复杂，在这次沉船事件中共有1 200人丧生，其中有128名美国人。尽管有两名德国裔陪审员在场，西奥多·罗斯福还是坚决提出了美国对德宣战的要求。

富兰克林·罗斯福由于墨西哥战争无法分身，他认为世界大战中美国必须站在同盟国一边，要不然时刻都有被猖狂的德国人卷入战争的危险。虽然美国在海军和商业史上与英国处于一种竞争关系之中，但是他们此刻开始同情英国和法国。罗斯福的奶妈有三个儿子在英国部队服役，整个罗斯福家都非常清楚在前线作战是非常危险的。

1915年至1917年的三年中，罗斯福虽然还在政府中供职，但是他强烈反对威尔逊、布赖恩和丹尼尔斯等人的和平主义路线。他秘密地和他叔父以及政府里最受人尊重的内政顾问们一起工作，他利用训练军官的机会来鼓励参战。西奥多对布赖恩和威尔逊的做法也很不满。威尔逊虽然外表冷酷、不易接近，其实是一个喜欢争辩的人。他谴责他的反对者们“紧张又兴奋”，急于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军事阵营”。

德国海军遭到英国皇家海军围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却没有把握住机会进行攻击，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此感到十分愤怒。由于战事主要集中在海军方面，这使得罗斯福成为美国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外貌也无可指摘：30多岁的罗斯福相貌堂堂，使人印象深刻。

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掌握了自己独有的政治技巧，这在他日后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得到了充分发挥。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在战事紧张的日子里，威尔逊和丹尼尔斯从来都不曾批评过他。这一做法使得政府经常成为媒体攻击的对象，罗斯福成了泄密的最大嫌疑人。他们非常清楚罗斯福和一些人私交甚笃，当然更清楚他和老罗斯福的关系。

随着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个人关系越来越糟，富兰克林发现自己承受的来自两方的压力都在增大。他的忠诚和同情都在他叔父一边，但是他也不能毁了自己和现任总统之间的关系。

威廉·布赖恩在1915年7月，即沉船事件一周后，忽然宣布辞去国务卿一职。因为他觉得威尔逊对英国的谴责没有对德国的那么强烈，不是真正的中立。布赖恩的这一看法非常愚蠢，因为美国本来就偏向同盟国，而且英国人既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沉船事件，也没有造成太多平民的死伤，和德国的恶行不可相提并论。

富兰克林很高兴看到布赖恩辞职了，因为富兰克林觉得他在外交上是一个滑稽而危险的人物。丹尼尔斯表示，美国再也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谴责了。

1916年2月，布赖恩辞职半年多以后，陆军部长林德利·加里森和他的部长助理亨利·布雷肯里奇因为与布赖恩恰恰相反的原因辞职了。他们认为总统在战前准备上做得不够，主张征兵的富兰克林对此记忆深刻（他自己也反对总统的做法，但是他从未考虑过辞职）。

罗斯福想接替加里森的职位，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威尔逊正在考虑此事时感到很高兴。但是这个职位最终给了牛顿·D·贝克，而且总统从未认真考虑过富兰克林的想法。

当威尔逊提议建立国防委员会，并且国会也于1916年8月通过这项提案后，罗斯福十分高兴自己一年前的提议得到了肯定。这是一个富有成效的机构，招募了来自美国各行各业的专家，为政府的国防和相关领域献计献策。

罗斯福与家人分开的时间比以往更长了，这一次将近4个月，因为小儿麻痹症流行，其中美国东北部有2.7万人死亡，所以孩子们都要躲避危险。这是一个大选年，罗斯福需要有人帮助。虽然他对总统不是

一直全心全意，但是他被民主党内的决策制定者看好，他自己也时刻准备着为竞选做出贡献。他为威尔逊在全美广泛进行宣传，直到9月底才回到坎波贝洛与家人团聚。

威尔逊时刻准备竞选，但他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的竞选口号是“他让我们免受战争之苦”，虽然威尔逊私下里也曾表示“德国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将我们拖入战争”。威尔逊竞选策略十分聪明，他表示要以实力争取和平。

共和党的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法官，也是前纽约州州长。结果证明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没有任何污点。开始时，休斯甚至比威尔逊更支持中立，但是在西奥多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偏向同盟国，不过他又始终保证将远离战争。他似乎想同时干两件相反的事。对于他这一点，威尔逊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虽然休斯作为候选人有自己的缺陷，但威尔逊的地位更不利。因为自内战以来，共和党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竞选过程中经常犯错，有一次为了忠于自己的政党，他竟然攻击了老罗斯福任内海军备战不足，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也是一个不光彩的错误。在西奥多从加勒比海度假回来之后，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信，信中委婉地提到了此事。富兰克林尴尬地在信中道歉，但是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歉意。

在大选前夜，休斯、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觉得共和党会获胜。罗斯福离开了纽约民主党总部，登上开往华盛顿的末班火车。休斯赢得了东部的大部分州，但是威尔逊在西部的势头看好。休斯在加州竞选时忽略了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休斯对约翰逊很冷淡，因为他在1912年曾作为西奥多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最终，威尔逊因其在加利福尼亚的微弱优势当选。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加州的选举结果来决定总统大选的最后结果。

休斯在大选当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当时是他儿子接的电话，他儿子说父亲还在睡觉。打电话的人说要是休斯醒了，就告诉他失败了。威尔逊最终以913万票对854万票取得了胜利。休斯直到两个星期后才出面承认失败。威尔逊说："休斯祝贺我时虽然有些口吃，但是说得很清楚。"

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民主党的胜利做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威尔逊对此非常感激。罗斯福给威尔逊提交了一份1814年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写的备忘录。其内容是提醒总统，如果对欧洲强权的挑衅一味退让，只会让最后的解决更为困难。在圣诞节前，德国提出要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问题，威尔逊也已经提出了和平谈判的渴望，并且表示希望"建立国联来保障世界的和平和公正"。他主动提出要做战争国之间的斡旋人，但是遭到了德国的拒绝，因为他们希望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美国公众都对总统的处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西奥多·罗斯福原本支持总统的提议，但也许是因为个人对总统心存不满，改变了初衷，告诫民众不能放弃任何主权。

威尔逊准备在1月22日的演讲中呼吁"不战而和"，因为只有"均势才能保证和平"。他其实是呼吁建立一个国际社区，而不是建立均势，这实质上是把门罗主义扩展到了世界范围。他受到了1812年战争胜利的启发——没有流血，却保证了英美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他的理想主义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嘲讽。那些还没从竞选失败中恢复过来的国内反对派说这是懦弱的表现，是一种政治自杀。

而此时，美国的海军部长助理正在组织去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访问。美国的海军正驻扎在那里，因为海地总统被残忍地谋杀了，他的167个政治反对者的行径使得威尔逊决定先于欧洲各国把军队派驻到那里。1915年，多米尼加的政权也不稳定。丹尼尔斯对此类帝国主义

的干涉举动很反感，但是他的助手却恰恰相反，只要有一点点理由，他都希望美国能出兵，就像英国一样。

罗斯福冬季度假的要求得到了丹尼尔斯的批准，他和几个人一起乘驱逐舰去了哈瓦那。古巴的总统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为此，富兰克林还写信向他的上司报告，而此时的富兰克林已经在觊觎他上司的宝座了。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乘坐驱逐舰去了海地，在那里停泊着美军大西洋舰队的27艘舰艇。它们装备精良，排成两排，等待着罗斯福的视察。当他的巡洋舰从两排舰艇中间驶过时，每一艘舰艇都用17响礼炮向他致敬，这对于34岁的罗斯福来说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罗斯福和同伴去了海地总统的宫殿，念了一遍自己在法国欢迎会上读过的致辞。

当时的美国海军总司令是斯梅德利·D·巴特勒，他曾获得过国会颁发的荣誉奖章，是一个在拉美经历过很多风云的强悍老兵。拉丁美洲的妇女后来都用他的名字吓唬孩子。巴特勒把所有的当地人包括总统都叫作“黑鬼”。

这一番巡游持续了四天，后来罗斯福穿着他的海军制服，坐着高头大马，由巴特勒和50名海军及150名海地军人跟随着，在内陆地区巡视。根据罗斯福的说法，当时从树林中经常传来枪声，但是别人都不记得有这回事，这又是罗斯福在夸夸其谈了。在接下来的聚会上，有来自当地的很多漂亮女人和各种表演，罗斯福的35岁生日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当他们一行人回到多米尼加时，富兰克林被召回华盛顿了。他猜测大概是因为对德作战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但是对德宣战还是经历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阶段。德国宣布将击沉一切同盟国的舰船，两天后他们就击沉了一艘美国船只。那一天威尔逊通知国会，他宣布断绝同德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召回了美国驻德大使。战争眼看就要临近了。

丹尼尔斯当时不在华盛顿，罗斯福请求总统让自己指挥大西洋舰队。威尔逊不同意，告诉他美国必须“两手干净地被写入历史”。

开除丹尼尔斯是鹰派的意见，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掩护下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路易斯·豪向媒体吹风，说丹尼尔斯离去后将由他的部长助理替任（《芝加哥邮报》），而在此之前罗斯福仍对自己的上司表示忠诚。

威尔逊3月5日的就职演说中谈到了“武装中立”，而且他在就职游行时还坐在“玻璃罩”里面，这使得罗斯福很失望。罗斯福给他在纽约的朋友写信说自己准备回纽约，他想以辞职来表示抗议的决心。在就职当晚，富兰克林拜访了豪斯上校，此人是总统最亲密的顾问，也是参战的支持者。他们见面5天后，罗斯福就告诉他海军的战备不足，同时认为丹尼尔斯很懒散。豪斯催促威尔逊撤了丹尼尔斯的职，罗斯福表示愿意为战争做更多的准备。

威尔逊对英国实行海上封锁十分不满，他召见了在纽约的豪斯。然而，当天富兰克林却和很多总统的死敌在一起吃饭，包括西奥多·罗斯福、伦纳德·伍德将军、前国务卿和纽约市长等人。这是一个轻量级人物的聚会，他们要发挥作用起码还得等上15年。在这些人之中，罗斯福家族是最好斗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给政府施压。

富兰克林·罗斯福发现丹尼尔斯一直都在拖延时间。商讨武装商船的会议一点也不热烈，丹尼尔斯说美国船长不可以下令攻击德国潜艇。听到这里罗斯福不禁被激怒了，因为德国人要击沉一切同盟国的军舰和船只。美国的这种政策在事实上证明行不通，12日那天又有一艘美国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

如果德国人不把美国拖入战争，他们可能会取得胜利。1917年3月，又有3艘美国船只被击沉。20日，威尔逊征询了内阁的意见，当9

个部长都表示除了战争别无选择后，丹尼尔斯也不得不强忍泪水，同意了对德作战的决定。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宣战。总统穿着黑衣，看上去比以往更加憔悴。威尔逊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鼓舞，“他们是全民为了自由和民族尊严而战”，“我们现在接受德国人的宣战，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全人类，也为德国人民的自由而战。”

总统的发言不时地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世界需要安全和民主。让最爱好和平的人去打仗是最可怕的事，个人权利比和平更可贵。为此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一切，美国将为了自己肩上的责任而战。上帝保佑美国，我们别无选择。”

西奥多·罗斯福已经58岁了，身体不好，视力也不佳。人们认为这位前任美国总统不应再去冒生命危险。军队也不希望他成为志愿者，但他们都认为西奥多的四个儿子参战是一件光荣的事。他最小的儿子昆廷在执行飞行任务时被击落，壮烈牺牲。

富兰克林·罗斯福相信这位前总统将会有办法早日结束战争，并且把俄国人在战争中拖得更久一点。但这只是富兰克林一厢情愿的想法，列宁不会因为罗斯福而卷入战争，他把俄国（苏联）从战争中拉了出来。

西奥多·罗斯福劝说富兰克林辞职，而富兰克林认为他在海军部能使得海军更有效率，对无精打采的丹尼尔斯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对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有好处。他认为在海军部对自己利大于弊。事实上他曾经表示过要辞职，但是威尔逊和丹尼尔斯都不同意。但除了让他继续尽忠职守以外，他们对于再打造一个战时英雄罗斯福不感兴趣。“我觉得他是想当一名战时英雄，”丹尼尔斯这样写道，“西奥多·罗斯福就是这样爬上去的。”

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他的前人，尤其是叔父西奥多·罗斯福那里继承了斗争的本能，以及对于绥靖政策的厌恶。从威尔逊那里，他学会了如何耐心地培养民族的精神力量。他丰富的个性给他的政治生涯平添了很多绚丽的色彩，这种特质在领导人中是很少见的。在25年之后，他身上的这种理想主义和灵活多变的才能拯救了美国文明。事实上，人们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的这些品质，其实从1917年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

1. 美国宪法第17条修正案将参议员的选举权由各州的立法机构转给了选民，扩大了美国直接民主的范围。——译者注

03
这场战争仍有胜利的希望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20年7月18日对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谈起了国联及《凡尔赛和约》

I

富兰克林·罗斯福呼吁政府官员开展规律的运动来强身健体，这项运动是在耶鲁大学运动学教授瓦尔特·坎普的监督下进行的。罗斯福在坎普的眼中是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坎普这样评价他：“罗斯福先生身材健硕，有运动员的体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女孩子们都用爱慕的眼光看着她们的偶像健步走过。在《纽约先驱报》上也有相似的报道：“他身材修长，带着坚毅和自信；他高高的前额上有浅浅的皱纹，他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有力的薄唇仿佛随时会放声大笑，他的声音很有磁性。”

但纵观罗斯福的一生，漂亮的长相和充沛的活力并没有给他带来健康的体魄。他对各类感染几乎没有免疫力，饱受多种疾病煎熬，最后肺炎发展成了小儿麻痹症。他经常感到四肢无力，剧烈的咳嗽最终又加剧了他的心脑血管病。相比而言，他的头儿丹尼尔斯比他要大20多岁，是一个肥胖且对运动毫不感兴趣的人，却活到86岁高龄仍很少生病，直至罗斯福去世几年后才撒手人寰。

罗斯福待人彬彬有礼、性情温和、办事高效，又懂得体恤人，受到大多数部下的爱戴。有一次，他的一个下属冒充他的签名给妻子写

了一封信，说自己由于揭穿了一起间谍行为而将获得荣誉勋章。他的妻子信以为真，还告诉了一个地方报社，谁料这家报社又去向罗斯福询问更多细节。罗斯福了解情况后，把这个人叫进办公室，首先要他认错，并严厉警告他犯了伪造和渎职等多重罪名。直到这个人认定自己难逃被送上军事法庭且面临牢狱之灾的命运时，罗斯福却开怀大笑，告诉这个部下实际上他很喜欢这个玩笑。

鉴于美国驻英国大使瓦尔特·海尼斯·佩吉的建议，威廉·希姆斯海军上将已经被派驻伦敦，协调参战国的联合海军行动了。希姆斯是一个十分聪明而且卓有成就的实干家，他常去拜访自己的上司或是直接向民间组织求助。这些行动使得他在为西奥多·罗斯福工作时业绩斐然，却不大受他下属的欢迎。对于丹尼尔斯来说，尽管他深知希姆斯和罗斯福的密切关系，也了解希姆斯常常对海军部长大放厥词，但还是选他担任了这一重要职务。因为丹尼尔斯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把个人恩怨放在了民族利益之后。

希姆斯到了英国，很快便发现海军情势非常严峻。英国的驱逐舰不敢护送货船，因为它们不敢离开英国舰队的保护。这就意味着在英国皇家海军中，巡洋舰的地位十分被动，它们只能等着德国的舰队自己从军港开出来，然而这种希望十分渺茫。

英国现在已经缺粮三个星期了，饥荒在英伦三岛上蔓延。一个由前首相阿瑟·詹姆斯·贝尔福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和前总理率领的法国代表团分别于4月和5月到访美国。罗斯福接待了他们，并让他们提出各自的需求。他没有经过丹尼尔斯或是威尔逊的同意，便以个人名义承诺为他们提供30艘驱逐舰。这一大胆而机智的举动得到了上司批准后，即刻使同盟国护航货船的实力大为增强。

一次欢迎英国代表团的宴会上，在听了几个人发表的讲演之后，罗斯福表示，希望在确定的时限内，确定数量的军舰与人员都能各司其职，这给到访的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后声称是威尔逊亲自给自己下的命令，他认为征用物资不宜过急，以免最后部队的补给供应不上。罗斯福为了他的合作伙伴利益考虑，在斯普林伍德组建一个委员会，建设一个海军宿舍，并保证物资的储存。随着费用的下降，工程进程很快，罗斯福保证说："即使闭上眼睛也会签合同。"

罗斯福从德国驻纽约领事馆得到信息，他在德国人列出的黑名单上位列第二。自那之后，他经常在自己的手枪皮套里装着左轮手枪。罗斯福为了谋求更高的职位不断地努力，他一边支持豪向报社透露关于丹尼尔斯的负面消息，另一方面还通过威尔逊的一个熟人——著名的小说家温斯顿·丘吉尔（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与著名的英国政治家同名）不断向总统吹风。丘吉尔深谙海军事务，在罗斯福的煽动下，写了一封严辞批评丹尼尔斯的秘密备忘录。丘吉尔和总统相知多年，1917年7月，他把备忘录直接交给了威尔逊。

罗斯福建议设置防范德国潜艇的水雷群。在威尔逊眼中，这一招就像是瓮中捉鳖：将水雷布到英吉利海峡和位于挪威与苏格兰之间的北海上，而那里恰恰是所有德国潜艇的必经之路。这个计划遭到了丹尼尔斯和希姆斯以及英国其他海军上将的质疑。

威尔逊对于英国人的否定态度很不满意。"我们做事从未像今天这样有条理。"他对宾夕法尼亚号军舰上的军官们这样说。在他给希姆斯的信中也说道："英国海军部面对恐慌时不知所措。"对于英国人而言，美国人是天真的好事者，对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同盟国军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而对于美国人来说，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在恳求美国人提供帮助。但事实上，如果他们真的都如自己所想的这么能干，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他们各持己见，但是这种境况对于25年以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又是十分有益的经历。

威尔逊支持罗斯福设置水雷群的建议，认为要完成这项任务非罗斯福莫属。1918年2月，舰船护送着从大湖区运载的1.5万多米长的电

缆和10万吨的煤驶往英国，开始水雷设置计划。直到战争结束这些工程还没有完成，但至少击沉了三艘德国潜艇。罗斯福一直强调这个计划可以运转得很好。他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夸大其词的毛病，在评价这项计划时，称其“即使不是意义深远，也是对德国的最终失败和大战的结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这个计划并没有他说的那么重要，但不失为一个有创意的新颖想法，它对于挽救大西洋战局来说是一个耗费较少、相对可行的计划。丹尼尔斯和英美海军军官们没有理由反对这一点，而希姆斯后来称其为“战时奇迹”之一。

驱逐舰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丹尼尔斯在这一问题上支持了罗斯福，但对于罗斯福的许多其他想法，他却仍是坚决反对，并成功阻挠了其付诸实施。

罗斯福的大学密友以及同他有着社会经济联系的上层青年，大都认为罗斯福个性固执、不可一世，是一个唯我独尊的人。在他离开斯普林伍德去格罗顿公学之后，罗斯福身上体现出来更多的则是一种技巧性与灵活性。

再次回到竞选活动之中，罗斯福和豪都迫不及待地结束部长助理的身份，开创新的事业。1917年7月，罗斯福在独立日的宴会上发表演讲，报纸上刊登了他和坦慕尼厅头目查尔斯·墨菲并肩而立的合影。他们的关系并未改善，但两人都从美国1914年的参议员选举风波中吸取了教训，如果他们想赢得全国大选，就必须站在一起。

豪让罗斯福竞选1918年的纽约州州长，同年5月罗斯福向威尔逊提出自己的想法。可是，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总统对史密斯的推荐可比当年对罗斯福竞选参议员的提名时要热情得多。

罗斯福在海军中的工作表现毫无疑问是卓有成效的，威尔逊对他的总体评价也比过去好了很多。他后来告诉丹尼尔斯，并由丹尼尔斯转告了罗斯福，如果罗斯福得到提名的话，他应该马上接受。但罗斯福和豪很快就决定他们不会接受1918年的提名。对于罗斯福来说，在战争中途舍弃海军部而投身竞选并不合适，也不符合罗斯福的一贯风范；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会激起公众的某种怀疑，仿佛罗斯福对战争做出的贡献远没有豪不遗余力鼓吹性格崇拜来得重要。这一年对于民主党来说注定是难熬的一年。

II

罗斯福成功地将自己的视线转向了战争的西线。罗斯福的视察毫无疑问对海军的战势是有利的，但他也不能否认视察本身也是为他个人的政治生涯积累资本，同时近距离地观察重大战事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丹尼尔斯最初对此反应冷淡，认为这不过又是助手施展的公众把戏，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不是成果。但到后来，他的态度也变得缓和了许多。丹尼尔斯总结说，政府官员太过拘泥，这就像“在黑暗中下棋”一样危险，他还授权助手们“走出去”，进行更多的实地调研。1918年7月，罗斯福乘坐美军的驱逐舰出发了，即使在狂风巨浪中他依然胃口不减，也完全没有其他一些官员们的难受反应。

英国人一向善于接待那些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外国客人，来访的部长助理肩负着上司的很多指示。在伦敦，罗斯福住着豪华套房，更享受了贵宾级客人的礼遇，甚至在1918年7月29日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会面长达40分钟。国王对这个年轻的访客很是看重，而罗斯福更认为“国王开朗、思维敏捷、待人诚恳……我们谈得太开心了，有时我们两个人竟同时在说个不停”。罗斯福向国王讲起自己“曾经在德国上学，那时就看到他们在进行战争的早期准备”。其实，罗斯福对日耳曼的研究

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么深入。国王也告诉他，自己也在德国学习过一年（相比之下，罗斯福只待了6个星期）。国王眼中闪着光，补充说："我在德国有不少朋友，但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我还从没见过一个真正的德国绅士。"

在接下来的7月30日，罗斯福和首相劳合·乔治会面，双方探讨了广泛的话题。罗斯福被首相"充沛的活力"所吸引。乔治坚持认为，英国在大战开始时没有进行普遍征兵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在美国，很多人反对政府普遍征兵，但罗斯福却是征兵的坚决支持者，首相的话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件事在25年后对整个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当天晚上罗斯福去了英国下议院参加晚宴，和英国的外相、前首相阿瑟·贝尔福谈了很久，他们之前在华盛顿曾见过面。他们在夜色中的威斯敏斯特宫（议会所在地）的长廊上边走边聊，罗斯福写下了这样的话："让我最为高兴的是……英国内阁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并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7月31日，罗斯福一行又去了法国，从多佛尔到敦刻尔克，他们一路乘坐的是英国驱逐舰，上面一律悬挂着美国的海军标识，罗斯福得知这还是英国军舰第一次使用外国标识（虽然这不大可能，但这次不是罗斯福说大话，而是别人对他说大话了）。罗斯福一行穿过被战火严重毁坏的公路，从敦刻尔克来到了巴黎。罗斯福一到巴黎便和萨拉的姐姐一起畅游凡尔赛宫，就好像他13年前和埃莉诺度蜜月时的场景一样。

他又和小西奥多·罗斯福以及他的兄弟阿瑟见了面，阿瑟在战场上英勇负伤了，目前正在巴黎调养身体，他们的兄弟昆廷战死沙场。罗斯福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对自己亲戚的英勇无畏非常钦佩。

罗斯福觉得和法军总司令霞飞的会谈气氛也十分融洽。罗斯福对霞飞说，由于他的帮助，才能使自己1917年5月在华盛顿成功完成了使命。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有魅力又能干的年轻人，但他认为无论是打败德国（在北海设置水雷障碍），还是将美军派往法国，以及德国战败和法国人获救都是他的功劳。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判断局势不够成熟。虽然他有很多可贵的品质，但有时他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聪明年长的上司威尔逊和丹尼尔斯在同他打交道时常常会感到困扰。

富兰克林在五星级宾馆住了几天，1918年8月去了前线。即使离战场很远，战争毕竟还是很可怕的。军民死伤惨重，乡村被毁得乱七八糟，难民重建家园的感伤场景随处可见。罗斯福后来几天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他亲眼看到的如此惨烈恐怖的战争，可以说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时做出历史性抉择的根源。

夏尔·戴高乐于1915年3月负伤并被俘。他在此时道出了法国人在这次大战中的历史性宣言："他们不可能赢。"

罗斯福在视察途中遇到的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埃里克·格迪斯，他是英国海军的资深上将，他不同意富兰克林提出的要把英法美的海军和陆军都派到意大利去的建议。格迪斯劝他说，意大利人坚持不愿放弃自己的港口，也许他们更愿意听取美国人的意见而不是英国或法国。

更多的美国驱逐舰和更好的反潜艇策略提升了英法运送粮食和战略物资的能力，这迫使德国人要使用比1917年更加丧心病狂的无限制潜艇战，才能把美国人拖入战争。

罗斯福满心欢喜地开始了他的意大利外交之旅，如果顺利的话，不仅有助于同盟国的战事，对他的仕途更是有利。在丹尼尔斯的允许

下，他于8月8日出发，并先后会见了意大利的外长巴隆·索尼诺、海军部长和其他海军官员，最后他拜会了意大利总理维多利奥·奥兰多。

罗斯福觉得年轻的意大利军官们都跃跃欲试，但是海军部长坚持“海军的舰只不可以冒险”。罗斯福建议说：“若是全部的海军舰队都驻守在塔兰托，甚至一整年也不出来进行实战操练，这是不明智的抉择。”但意大利海军总司令却反驳说：“你可别忘了，奥地利的舰只也从来没出现过。”罗斯福听了很不高兴，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难对付的海军经典案例。”在这次旅行后，罗斯福认为意大利很难在战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罗斯福认为他和奥兰多的会面说明他的意大利之行是成功的，他向丹尼尔斯汇报意大利人同意接受统一指挥，但奥兰多当时只是说他答应一部分要求。罗斯福向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建议由英国人来控制地中海，这一点激怒了他们。他还建议由意大利人控制亚得里亚海，法国人控制亚得里亚海以外的地中海。英国战区司令建议组建的地中海委员会里还将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这两个国家在地中海都没有驻军）。罗斯福于1918年8月13日给丹尼尔斯写信，他从电报中推测出丹尼尔斯和国会会支持英国人控制地中海。

罗斯福很尽职，但他所处的位置制约了他发挥的作用——在当时的美国，罗斯福还没有太多的影响力。他在8月底给格迪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还没有吮吸到椰子壳里的果汁。”但是他对意大利的政治脆弱性和战争能力有限性的评估仍然是很准确的。

罗斯福像往常一样，根本没有因这次挫折受到任何打击，其实就相当于总统责怪了自己一次。很快，他回到法国去巡视大西洋的海军反潜艇基地，这次旅行决定了他最终会辞掉现有的职位，乘坐巡洋舰回到前线。他给埃莉诺写信说他在华盛顿待不了多久，几天后，他则告诉3 000名美国官兵：“我访问了前线，看到你们正在从事着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我再也不愿回到华盛顿那无趣的办公室里去了。”战列

舰对他非常有吸引力，因为这些战列舰把他对海军与潜艇的热爱和他在前线工作的渴望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写了一封没能寄出的信给丹尼尔斯，希望辞掉部长助理的职务，留在前线“从事适合自己的职责”，并希望能建立一个潜艇委员会之类的机构。

与此同时，埃莉诺在一次家庭葬礼上遇见了西奥多·罗斯福，这位前总统要求埃莉诺叫她的丈夫马上参军。埃莉诺竭力为丈夫辩护，对老罗斯福的多管闲事非常反感，但她也察觉到丈夫的想法和叔父的有许多相似之处。

罗斯福又开始咳嗽不止，但他还是拖着发烧的身子去巴黎见了福煦元帅等人。他被福煦那直截了当的态度所感染，他们围绕着美国与法国海军协调的问题谈了一个多小时。

兴趣爱好使然，罗斯福还去法国的书店买了几本书，然后又去了苏格兰视察反潜艇水雷和美国战列舰的部署情况。在回家的前一天，他和戴维斯等人直到凌晨4点30分才睡觉。他7点钟就起床了，在乘坐利维坦号回家时，他彻底病倒了，患上了严重的肺炎。9月19日船在纽约靠岸时，必须靠担架才把他抬下船来，他被送到了65号街的母亲家中。

他需要休息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写了一封有关这次旅行的备忘录给丹尼尔斯。丹尼尔斯在威尔逊面前夸奖“他的报告明确、简洁、引人深思，富兰克林很能干而且思路清晰”。在罗斯福卧床期间，他收到了许多来自亲人和孩子们的问候。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富兰克林，我们很为你的病情担心，相信你很快就会康复。我们为你骄傲。你的孩子以及爱你的西奥多·罗斯福。”

III

随着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小儿麻痹症病情也日益严重起来，这不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灾难。他还爱上了一个未婚的女人，除非丘比特之箭夺去了他的所有判断力，否则他怎么也不会认为这种关系的结果会令人愉快。

这个女人名叫露西·默瑟，是埃莉诺的公关助理。埃莉诺在萨拉纽约的房子中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露西写给富兰克林的一堆情书。埃莉诺觉得自己被蒙骗了，以往种种怀疑和猜测都涌上心头。她对丈夫感到失望，更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她觉得被一个自己请进家门的雇员出卖了。

露西·默瑟比埃莉诺小7岁，和罗斯福的暧昧关系曝光时才27岁。她是一个有教养、魅力十足的女人。最初，在埃莉诺刚到华盛顿不久，是埃莉诺的婶婶介绍露西帮助埃莉诺打点社交事宜的。自1914年起，她开始为罗斯福工作。那年夏天，在埃莉诺带着孩子去了坎波贝洛后不久，她就和富兰克林发生了关系。她以雇员的身份常伴在罗斯福左右，并很快成为罗斯福家的一员，经常和他们全家一起进餐。

即使是富兰克林和露西为了避嫌，表面上常常拉开距离，但埃莉诺对他们的猜忌却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为了防止埃莉诺起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两个人一起去参加某个聚会，即使是当埃莉诺不在身边的时候，露西的身边也总会特意安排一个男伴——通常是那个英国使馆的三等秘书，一个罗斯福彻头彻尾的崇拜者。1917年夏天，埃莉诺用战争时期没有必要兼顾社交活动为借口，辞退了露西这个社交助理。但这并没有结束她和罗斯福的亲密关系，因为露西应征入伍，成了美国的海军三等兵，后来更成了海军部的一名秘书，在罗斯福办公室旁边工作。埃莉诺当然也认为这是某种幕后的蓄意安排。

《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如何拯救一个大家庭》的文章。埃莉诺在文中被称作是一个知道如何节衣缩食和整理家务的家庭主妇。罗斯福还向埃莉诺索要一张“家庭主妇”的照片，还说整个华盛

顿都在讨论“罗斯福家的计划”。埃莉诺责怪记者引用自己的话。这一对夫妇在结婚12年后的唇舌之战表明他们的婚姻遇到了危机。

特别是艾丽丝·罗斯福开始对这件事评头论足，关于罗斯福家的谣言更是随处可闻。艾丽丝说罗斯福娶了埃莉诺这样的女人，就应该懂得去自寻快乐。艾丽丝看见了罗斯福和露西在罗斯福的敞篷车上，还叫她的表弟去嘲弄他们一番。

1917年10月，丹尼尔斯，这个对婚姻问题非常保守的人虽然有时对露西和富兰克林的关系不满，但总的来说他还是对助手的工作非常满意的。他将露西提升为二等兵，夸她有办事能力。

由于埃莉诺的怀疑和艾丽丝的不慎，以及富兰克林大意地把信放在埃莉诺可以找到的地方，使得埃莉诺在1918年9月找到了证据。她告诉富兰克林，如果他想要离婚的话她完全同意。萨拉告诉富兰克林，如果他由于这种原因离婚了，就再也不能继承财产，甚至再也不能住在斯普林伍德了。豪也告诉他，离婚将预示着他未来仕途的终结。埃莉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她知道丈夫除了孩子和家庭外，更不舍得放弃的是他的政治抱负。“如果你想做总统，”埃莉诺用甜美的嗓音告诉丈夫，“那你就必须带上我。”（如果她当时真的这样说的话，那声音一定不可能是真正“甜美”的）。罗斯福听从了母亲与助手的建议，认识到自己如果不结束婚外情，他将不能得到埃莉诺在政治上的支持。

露西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根据教义，她是不能够破坏别人的婚姻或是和一个离婚的男人结婚的。除非罗斯福得到某种特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埃莉诺则趁机使用了手中的全部砝码，她威胁富兰克林，如果他和露西再见面的话就和他离婚。

在这种情势下，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露西比埃莉诺漂亮很多，与人相处融洽，声音温柔，表达看法的方式也很委婉。而埃

莉诺则是一个喜欢争辩、咄咄逼人的妻子。露西对于富兰克林的缺点和虚荣心能够采取包容的态度，而埃莉诺却选择一次又一次向丈夫挑衅。即使是后来罗斯福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露西还是充满深情地评价他：“他有着惹人疼爱的外表……他的笑声洪亮……他有着绝顶聪明的头脑。”埃莉诺却从没这样评价过自己的丈夫。虽然埃莉诺的个性让人感到不大好相处，但在这一事件中，从道义上来讲她还是能够得到人们的同情的。幸而有埃莉诺的理智、萨拉和豪的苦口婆心，才使得这件事没有葬送富兰克林的政治生涯。

但无论露西多么富有吸引力，性情多么动人，罗斯福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世界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却把自己偷情的证据留在家里的确十分愚蠢。

富兰克林与露西分手一直没有让外人知道。很有可能，罗斯福对露西说他们必须分开，因为埃莉诺不会和他离婚。尽管这不是真相，但却是结束他们这段感情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这是很多年以后在露西的亲戚中普遍流传的解释。

在丹尼尔斯将露西从海军部调出以后，她变成了温斯罗普·拉瑟弗德的女管家。这个人是一个50岁刚出头、受人尊敬的有钱鳏夫，他和罗斯福一家非常熟络，关系也很好。露西帮助他度过了1919年冬天他十几岁的儿子死去后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两人于1920年2月结婚。他们的婚姻非常美满。

一位颇有才干的记者莫瑞·凯普敦写了一部关于露西和富兰克林结婚的幻想曲。他假设罗斯福和埃莉诺离异，和露西举行了平民婚礼。这简直是格林童话的翻版。婚后，富兰克林变成了一名自由的律师，而露西则继续恪守天主教的戒律，时常出入教堂做祷告或是点亮烛光。这是一篇不失滑稽的讽刺文，但从中却不难看出当时罗斯福处于多么艰难的抉择挣扎中。为了能够自由选择，他险些葬送了自己。归

根结底，他是一个野心十足的人，而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罗斯福与埃莉诺这一对不和睦的夫妻在1918年10月回到了华盛顿，这时罗斯福的身体已经痊愈了。他给威尔逊写了最后一封要求参军的信，那是在1918年10月31日晚上，威尔逊告诉他和平就要到来了。

9月28日，德国陆军元帅几乎都精神崩溃了，他向部下们绝望地高喊，他和最高统帅都不得不承认大势已去。无论是面对福煦部队不留情面的反击，还是民间的骚乱与革命的冲击，德军已毫无还击之力，处于崩溃的边缘了。巴登亲王马克斯主导的议会制民主政府向威尔逊总统提出休战，直到达成全面的和谈决议为止。

在缔结和约的过程中，威尔逊在判断局势时缺乏策略性的弱点暴露无遗。威尔逊命令同盟国从占领的领土上撤军，罢免德国皇帝，把德国变成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些固然都是合理的要求，但他在与“相关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时考虑欠妥。这些“相关国家”为了共同的敌人在战争中付出了600万条生命的代价。威尔逊也没有同参议院领袖协商一致，他没有考虑到他所签署的任何和平协议最终还要由参议院通过才能生效。

为了结束战争和保障世界和平，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并由他的顾问陆军上校豪斯代表他，在巴黎举行的最高战时议会上向其他协约国提出。在此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提醒了这位美国总统，他是不能把自己的世界秩序构想强加于他人的。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以及其他国家的外长们表示他们不可能不假思索地通过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豪斯则认为，美国的立场是只要接受休战，就等于接受了“十四点原则”。可克里孟梭这个希腊人却表示一定要一点一点地讨论。

当晚，豪斯向美国国会提出，美国是否同意以十四点原则作为同德国休战的条件，是否要劝说德国也满足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条件。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做法，劳合·乔治提议以“十四点原则”作为对德国休战的基础，对原则给予一些限制后予以通过。而限制就是，保留战时的海上封锁权并对恢复被占领土做出明确认定。他和克里孟梭都表示应该肢解德国和土耳其帝国。豪斯意识到这个讨论正在步入无法解决的争议之中，有悖于美国对德的约定，于是他宣布休会。豪斯巧妙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但是他也提醒威尔逊，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威尔逊对这些告诫根本不予理睬。

Ⅳ

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又重归于好了。埃莉诺偶尔去跳跳舞，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罗斯福还说服丹尼尔斯批准了他和埃莉诺一起去欧洲出差（萨拉在其中起了作用，她在丹尼尔斯批准之前给他打了电话）。他们在1919年新年的第一天就出发去了法国，乘坐的是乔治·华盛顿号，随行前往的仍然是形影不离的戴维斯以及其他几位党内人士。巴黎和会于1月18日召开。

西奥多·罗斯福于1919年1月6日早上去世了。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幸灾乐祸地说：“死亡使他进入了睡梦之中，如果他醒着的话，他就要战斗。”他去世时才60岁，要不是在1909年的那次旅行中染病，恐怕他还有气力，也有机会逐鹿1920年的总统大选。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在途中听说了这一噩耗，悲痛万分。

威尔逊则是在去意大利的火车上听说这件事的，他写信给前总统的夫人伊迪丝·罗斯福。在信寄出之前，他又把“悲痛”改成了更可信的“惊愕”二字。威尔逊和罗斯福是继亚伯拉罕·林肯之后最伟大的美国

政治家。现在老罗斯福已经辞世，威尔逊便成为了美国公众心目中无可匹敌的总统。

然而，他当时的地位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了，这从对德休战前几天举行的中期大选的结果中已经表现出来。威尔逊在同德国人讨论和平与宪政的同时，写信给美国人民要求人们把信任的一票投给他。他在没有进行任何商议的情况下，于10月25日向媒体发布了一份声明："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如果你对我的领导力表示认可的话，请允许我继续作为你在国内外的代言人，投我一票"，"在国会的共和党人可能会分裂我们的领导"，如果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情况下，"两院将会否认我的领导地位"。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公众对这些不予理睬，"相关国家"的人们也在嘲笑威尔逊，共和党赢得众议院中的237席，而民主党只获得190个席位，共和党人胜出。参院中共和党也占优势，共和党足以左右外交关系及其他委员会的事务安排了。

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州的罗斯福医院中做了最后一个重要的讲演，他说："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敌人应该知道这一点，威尔逊没有权力代表所有的美国人，他的领导地位被他们否决了。威尔逊先生和他的'十四点原则'再加上补充的四五点原则并不能代表美国人的心声。"

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位将要带领美国人民经受大战洗礼的美国后任领导人，从这两位政治巨人的较量中领会到了和平是何等来之不易。

罗斯福家在利兹有一处不错的公寓，而巴黎的场面更让人难忘，战争胜利后的辉煌和眼前大量的孤儿寡妇、伤员以及来参加和会的欧洲、亚洲、中东的各国代表团们混杂在一起。人们拭目以待，看威尔逊、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如何重新划分世界版图。

罗斯福对于和谈一无所知。谈判愈加艰难，情势变得更为复杂。劳合·乔治告诉议会：“我怀疑还会有什么谈判比这个更加艰难。有人往屋顶上、窗户上砸石头，还有疯子从钥匙孔里对我们叫喊。”

1918年12月劳合·乔治以绝对多数再次当选联合内阁首脑，人们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绞死德皇”，“赶走德国兵”。12月21日，克里孟梭被国民大会授予一项重大使命——向德国人要回和平。这不仅与威尔逊的和平幻想背道而驰，而且和他最近在大选中的不幸落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先前威尔逊曾经表示：“只有美国总统，而非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不仅能够代表美国人民，还能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美国是大家唯一可以信赖的国家。”他的这番话也仿佛一下子成了彻底的谎言。

在巴黎和会上达成的协议和威尔逊预想的“十四点原则”有很大不同。他在第十四点中提到要设立国际联盟，并设有一个由五个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即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但他对各国权利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国联的盟约中共有23条条款，其中有相当多的条款涉及威尔逊关于和平的设想，但是剩下的部分就要等和平协议的规定来解决了。

威尔逊把他所有的希望与信念都放在了国联上，在他看来，一旦国联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起来，将是美国人第一次参与世界性事务，其他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国联对历史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也将是毋庸置疑的。国联在当时人们眼中还是个新鲜事物，而伍德罗·威尔逊则身处于人们敬仰和期望的焦点上。尽管这种期望未必一定能够得以实现。

罗斯福夫妇同威尔逊一起乘乔治·华盛顿号于1919年2月15日离开了欧洲。总统回国后继续兜售他的“十四点原则”和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上的国联。一路上威尔逊少言寡语，比平日里更加排斥社交活动。

富兰克林·罗斯福现在又回到了原先的次要地位上，只有美军从前线撤回和党内民主事务之类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国联的要义以及和平协约的文本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威尔逊则只和豪斯上校以及其他一些亲信保持联系，分享荣耀。从表面上看，威尔逊对罗斯福是相当欣赏的，但威尔逊太聪明了，不可能不知道罗斯福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在他眼中罗斯福不过是一个做事不够沉稳、精力充沛的年轻小伙子而已。这个时候，整个世界的希望都寄托在伍德罗·威尔逊身上，罗斯福帮不了他什么忙。

1919年2月26日，在白宫召开了一场迟来的会议，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成员悉数出席，但博拉拒绝参加，他没有改变作为共和党中坚成员的强硬态度。威尔逊于3月返回了凡尔赛，继续为和平协议而努力，他没有考虑参议员洛奇等36人提出的建议。他们认为不能按照现在的版本接受“十四点原则”。豪斯认为应该保持公众的热情从而压制国会中反对派的意见，威尔逊没有听取豪斯上校的建议。他认为西奥多·罗斯福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对手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这一点上是民主党方针的坚定支持者。他于5月份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民主党内委员会上发言时，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罗斯福认为两党内都存在着进步派和保守派势力的斗争。共和党关心那些年收入在一百万以上的企业主，他们制定出来的对外政策也处处和威尔逊作对。至于在民主党内部，“布赖恩可能走得太远了”，而且在1904年平息反对派的斗争也是一场灾难。罗斯福两个小时的演讲表现得才华横溢，使得党内人士大都情绪高涨。他的一部个人传记中记录了这一段，称之为“罗斯福的第一个伟大的政治演说”。自1920年民主党开始考虑下届总统候选人时，人们也开始提起他的参议员身份了。

他的婚姻慢慢修复了，但是埃莉诺自欧洲归来之后，就跟罗斯福抱怨：“所有的华盛顿的社交人士都认为她‘没有魅力、很无趣’。”后来

她逐渐成了医院红十字会的常客，并渐渐地融入社会改革事业中。

1919年至1920年间，罗斯福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纽坡特事件，即情报人员提供的关于海军中的同性恋问题。在调查这一事件的过程中，罗斯福遭遇了不少尴尬场面。丹尼尔斯要求一些海军人员澄清纽坡特基地内的丑闻。基地指挥官组织了一群人装作同性恋者，混入军营去调查军队中的同性恋事件。

美国航海局代理局长向罗斯福提出了中断这种做法的请求，但是丹尼尔斯将这一事件交给了海军情报局。他们认为军队里的牧师也有嫌疑，牧师被送回密歇根调养，然后对他提起了公诉。罗斯福试图建议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阻止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以免影响海军的征兵工作，但这一建议未被接纳。

丹尼尔斯是个能干的好部长，而罗斯福也是一个出色的助理。虽然在战时，海军主要发挥的是后勤保障功能，但是他们的工作干得很漂亮。1918年德国投降后，德国的海军实力也大为减退，从而提升了美国海军的地位。美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海军强国，而这一重大成就恰恰是在丹尼尔斯和罗斯福主管海军部事务期间取得的。

V

国际联盟建立后，伍德罗·威尔逊于1919年2月回到美国，这将是他人生的又一高峰，但同时也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威尔逊在3月重返法国，制定出一份和平条约。他于7月8日回国，带回了《凡尔赛和约》，两天后他向国会递交了此条约，并声称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福煦了解其中的条款后，说道：“这不是和平，是休战。”他的话在两个月内就应验了。当然，如果美国通过了这个条约，并且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话，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中第五到第十二点的主张都遭到了否定。其他的四个同盟国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以及非土耳其部分的奥托曼帝国，只对土耳其的阿拉伯领土“不侵犯主权”。英国和法国成为了亚洲阿拉伯国家的宗主国。

为了建立国联，威尔逊多次做出让步。如果不是个人健康状况不佳的话，他可能依照1918年10月豪斯提出的建议，与德国单独进行和谈。

美国和平委员会中的一些理想主义分子被激怒了，有三个人辞了职。他们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后来也被总统的反对者们引用（辞职的三个人后来和罗斯福的关系都很密切）。罗斯福自己也承认1918年去了欧洲之后，他对于国联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1919年7月，欢迎威尔逊回国的人群比起他5个月前回来的时候人数少了很多。反对国联的行动也在秘密展开。

洛奇以及对条约持强硬态度的反对派在参议院的态度更是“不可调和”。1919年7月，当威尔逊把条约递交给参议院后，条约中只保留了原来的14条。到8月为止，对于总统的决策者来说，他们要想通过此条约就要做一些修改。威尔逊在总统的第一任期中行动很有技巧，通过巧妙的联合通过了全面的改革方案。但是现在由于他健康状况的恶化，他的决策能力也在下降，他没能像第一任时那样纵横捭阖，取得成功。

胡佛承诺支持国联，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党派的支持，美国加入国联成为泡影。民主党等待着大选之日，胡佛公开宣称自己是进步的共和党。此时罗斯福如果要倒戈共和党的话非常容易，而且如果他参选，胜算的机会要比胡佛大得多。因为胡佛对于国联的态度让人感觉他是一个投机主义者。

美国政府对于美国国会不同意加入国联这件事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一年后，希望新政府能够做出一些改变。以西奥多·罗斯福去世之前的教训为鉴，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有做出以前那样的任性表现。

6月，共和党在洛奇的主持下在芝加哥举行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变成了对威尔逊的个人抨击。

民主党党内预选7月28日在旧金山举行。当威尔逊的支持者情绪高亢地向他致敬时，罗斯福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亮相。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州长和他的妻子出现了，他把罗斯福拉到一边问他能否以纽约州候选人的身份，支持自己竞选总统。罗斯福立即高兴地表示同意。

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一个脸色红润的爱尔兰裔纽约人。他比富兰克林大9岁，比他矮4厘米。1873年，他生于布鲁克林桥边，做搬运工的父亲在他初中二年级时死了，他只好辍学，而那时罗斯福则去了格罗顿公学读书。

史密斯在福顿鱼市上干活，还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民主党人俱乐部。他声音洪亮，喜欢历史，十分聪明，并且有着远大的志向，这使他颇受欢迎。他的第一份白领工作是在法庭上担任调查员，协助陪审员办案。他在1903年当选为纽约州议员，后来便开始自学法律。他老实忠诚、勤勉体面，是一个聪明的州长。

在罗斯福事业起步阶段，史密斯和他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史密斯认为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势利，没有真本事，只是借他母亲的钱和叔父的名声罢了。对于史密斯，罗斯福也是很不以为意。

虽然他们的关系并不总是非常融洽，但他们经常为两人的友谊庆贺。史密斯取得的成就超越了他原来社会经济上的不利地位，而罗斯福也克服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表现出来的意志软弱的毛病。这时，他们开始真正地仰慕对方了。

史密斯的一个老朋友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变成了一个庆祝会，甚至连罗斯福也主动去找女代表团团员跳华尔兹。当他看到大会恢复秩序后，罗斯福走上乐队的指挥台，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会上露面。

罗斯福口若悬河地夸奖起了这个纽约人："我把他看作我的朋友，我把他视为真正的男子汉，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人，全国都知道他的事迹。这次大会的候选人将在这里选出。"他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自信但不傲慢，富有活力又没有年轻人的稚气。他富于政治艺术，而且能把他的魅力化作政治本钱。

当考克斯的代理人给他打电话，问他希望什么人作为他的副总统时，他回答说："年轻的罗斯福。"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在民主党占不了上风的情况下，有罗斯福这样的姓氏对于共和党的进步派而言，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后来罗斯福对于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的原因，使得自己的姓氏出名一事很敏感。他认为他的姓氏"是在战争中出名的"。他成了考克斯和政府之间的桥梁，考克斯从未在政府中工作过，但考克斯却不承认其中的理由。

墨菲认为："这个年轻的罗斯福没有什么能耐，但是如果你坚持用他的话，我会投他的票。"相对于在威尔逊和布赖恩时代遭到排挤的命运来说，对于墨菲而言，有人对他表示尊敬并向他征求意见，他自然心存感激。

法官蒂莫西·T·安斯伯里提名罗斯福，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包括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在提名宣布之前，丹尼尔斯到指挥台上说："对于50万海军和500万在美军服役的官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因为大会一致通过提名一个爱国的、有能力而又聪明的纽约公民为副总统，这个人就是海军部长助理富兰克林·罗斯福"。

虽然选举的前景很不被看好，但是罗斯福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给全美的民主党人和公众留下深刻印象，对他来说也是很值得庆幸了。他为自己能够比两个人更具有竞争力而感到高兴，一个是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另一个就是西奥多·罗斯福。他比起西奥多·罗斯福20年前当选副总统的时候，要年轻3岁。

罗斯福于7月13日回到海德公园。他的母亲萨拉在家门口等待他，她说罗斯福的父亲会十分为他感到骄傲的。威尔逊总统没有像往日那样热情地祝贺他，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职务不便。他给罗斯福发了一份祝贺电报，内容与给考克斯的差不多。胡佛给罗斯福的电报内容是："我给老朋友的个人祝贺，这将会使一个有才能的公务员走上前台。"罗斯福于7月17日给他的妻子写信，他看到了考克斯的车有"大群的人在欢迎，热烈的场面在华盛顿第一次见到"。

考克斯和罗斯福在5天后拜访了威尔逊。罗斯福在10个月中第一次看到总统，威尔逊的妻子说，她忘不了罗斯福看到威尔逊健康状况恶化时那惊讶的表情。威尔逊坐在椅子里，眼睛半闭，完全处于一种半瘫痪的状态。考克斯对总统表达了敬意，表示支持威尔逊建立国联的倡议。威尔逊虽然觉得罗斯福是一个"荒唐的"候选人，但他还是表示："这场战斗仍有胜利的可能。"考克斯在总统的助理办公室，签署了声明，他要把国联作为大选中的首要事件来对待。不久后，威尔逊就告诉丹尼尔斯，他对罗斯福在政治上的早熟以及作为政治家的忠诚性感到"很不满意"。

威尔逊在民主党内有一群支持者，威尔逊用他微弱的声音表示，民众应该把国家的荣誉放在第一位，选出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国家荣誉的候选人。威尔逊至死也还对自己没能实现的和平理想和伟大事业念念不忘，他可以算得上是美国政治史上唯一能和托马斯·杰斐逊相匹敌的聪明政治家了，而这一切荣耀使得他在垂死之际显得尤为凄凉。

罗斯福要求驱逐舰送他回坎波贝洛度一个短暂的假期。这一举动使得赫斯特旗下的报社对他进行了负面报道，他们指责罗斯福是在自我放纵。在他去了坎波贝洛后不久，他写信给埃莉诺说："既然报社对我小小的举动就这样大做文章，说明我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得胜的机会很大。"

他从坎波贝洛回来后，于8月6日正式辞去了海军部的官职，受到了2 000人为他送行的礼遇。他说："我的心永远都和海军连在一起。"这是事实。他给丹尼尔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在我只想做一番大事业时，你却教会了我如何踏踏实实地工作，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过任何异议。"最后一句话和事实有一点点相左。

部长在给他的回信中则说："我对你的感情就像对我的亲兄弟一样，愿你的家庭幸福美满，我会为此而高兴。我们共同为国家出力，我们曾经好似亲兄弟一样并肩作战。"罗斯福最后对他上司的评价也显得很公正，他们的关系是成功的，并且一直延续了下去。事实证明，25年之后，富兰克林也仍然乐意对丹尼尔斯夫妇和他们的儿子表示友好。

罗斯福充满了信心想要把副总统这个职位变得更加重要，但他向考克斯提出想要进入内阁的请求后，被考克斯拒绝了，考克斯不希望参议员们认为副总统是白宫派来的"第五纵队"。罗斯福向他保证，他将"把那些敌对分子请出去"。

罗斯福接受提名的仪式在斯普林伍德举行。5 000人出席了这个仪式，包括丹尼尔斯、威廉·麦卡杜、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等人。罗斯福邀请了很多当地农夫和普通百姓出席仪式，还邀请了他很多经济拮据的邻居和高官见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他出生时就认识他了，并且一直都很喜欢和仰慕他。

在发言中，这个副总统候选人表示：“在世间生存却不谋世事是不可能的。”罗斯福谴责孤立主义，他说：“国联不会消失，因为这个点子和我们在座所有人母亲心中的希望是一致的。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再也无法回到多年以前曾经存在的平静港湾中去了。”对于国内事务，他表示：“我们反对金钱政治，我们反对金融垄断，我们反对把人作为交易的商品，我们反对宗派主义统治。我们要帮助低收入家庭。”这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演说，15年之后，当罗斯福向更多的听众通过广播发表演说时，也重申了这次演讲中的一些精神。

这场竞选战于8月10日开始，罗斯福一行驱车自芝加哥向西，行程将近13 000千米。很多年以后他提起这段经历时说：“只有联邦竞选者和生意人才有可能了解这个国家。”他每天平均要做7次演讲，而且很多都是即席演讲。他的助手斯蒂芬·厄尔利战时为欧洲的一家报社工作。他是一个坦率的南方人，更是一个对罗斯福后半生的政治生涯影响巨大的人。他在后来告诉自己一个熟识的人，罗斯福那时的表现像一个“花花公子”，因为他很多演讲不会事先准备，只是即兴发挥。

由于西奥多去世，牡蛎湾和海德公园两派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小西奥多·罗斯福在1919年被选入纽约州议会。但是在提名共和党州长时，以微弱的劣势输给了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他的叔父和兄弟一直都很关心，他为小西奥多·罗斯福在共和党的努力献计献策。

罗斯福在竞选中表现出色，没有辜负考克斯的期望。考克斯对他的英俊外貌、自信派头、流利谈吐以及他的睿智和丰富的肢体语言印象深刻。他不知疲倦地忙于竞选，克服了自己在竞选中可能被对手和媒体利用的各种弱点。

1920年8月，罗斯福在蒙大拿反驳了共和党人有关英国会控制国联的言论。共和党人认为多米尼加、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会支持英

国。罗斯福言语犀利地反驳道：“有人认为拉美国家的选票，如古巴、海地、智利、巴拿马、尼加拉瓜的选票和美国的会不一致吗？我们就像是这些小国家的大哥一样……”虽然这番话在措辞上还可以更准确一些，但是这种说法是强有力的。12年后，他用“友好邻邦”一词替代了“大哥”，但是拉美国家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在演讲过程中还说：“你知道，我参与了海地宪法的编写，我认为那是一部很好的宪法。”

罗斯福又犯了自找麻烦的错误。他同海地宪法没有任何关系，他在那里唯一的经验就是和当地人吃饭，以及在1917年的旅途中和加勒比海几个国家的总统打过交道。

沃伦·哈定对这种说法很是不满。他打趣地说：“我不会让一个把自己意志强加给无助邻居作为宪法的人出任海军部长助理的，成百上千的海地人死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枪口之下，我们的海军也牺牲了很多士兵。难道他们献出宝贵的生命，就是为了部长助理能‘制定’宪法并保证投国联的赞成票吗？”哈定认为：“这是美国第一个现任政权践踏海地和圣地亚哥主权的行为。”

共和党旗下的报纸对罗斯福进行了一番调查。《纽约电报》认为他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后来，罗斯福在竞选过程中再也没有提起过海地了。这也许对于选举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海地罗斯福宪法”的概念却经常在共和党以及各个媒体的报道中曝光。罗斯福继续把这个故事的起因归结为记者的编纂，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无辜的。

缅因州的选举于9月19日举行，罗斯福在那里参加了几天的竞选活动，希望把共和党占优势的情况压下去。他没有成功，共和党以压倒性多数获胜了。哈定和柯利芝在缅因州获胜之后，喊出口号“像缅因州一样，全美都是共和党的了”。

在罗斯福去了纽约的民主党总部后，他在海军部里安插了助手查尔斯·麦卡锡，麦卡锡发现了民主党人行将失败的痕迹。对于副总统的竞选来说，可用的资金少得可怜。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都不能激发投票人的兴趣，他们只对威廉·布赖恩、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感兴趣。布赖恩为人真诚，但是他大部分的竞选纲领都无法起作用，不过他是一个成功的演说家，也是对社会持不满态度的人士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考克斯和哈定不具备西奥多·罗斯福或是威尔逊的个人魅力。

事实证明，把哈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考克斯在竞选中虽然很努力，但是方法不对。哈定几乎不怎么说话，只是认真地做记录，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提名，也是因为在党魁眼中他总是显得温良敦厚。哈定说他反对“巴黎国联”，但他确实喜欢有一个“国际委员会”的想法，尽管他从未对此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对于共和党中像胡佛这样的国际主义者已经足够了，而对于病重中的威尔逊来说也是一个安慰。这个国家已经认识到，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在罗斯福竞选的过程中，最有意思的是埃莉诺和豪。豪对于罗斯福这桩危机四伏的婚姻很了解。豪知道，如果罗斯福要达到事业的顶峰，埃莉诺的支持很重要。他知道有时罗斯福太过傲慢了，他必须给埃莉诺一种家的感觉。豪对于在演讲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听取了埃莉诺的意见，埃莉诺和豪也渐渐熟悉了。埃莉诺学会了在听罗斯福那千篇一律的演讲时，也得装出兴致勃勃的样子。她通过豪的帮助，融入到了竞选的过程中来，并且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她有时还会让候选人及其随从安静一点，以免打扰到码头上正在休息的搬运工。

民主党的竞选很快遭遇了挫折，上千的黑人家庭收到了传单，上面说哈定有黑人血统。这是哈定自制的家谱，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在捏造事实。

毫无疑问，在竞选的后期，罗斯福对于竞选的结果产生了幻觉。埃莉诺认为他不可能赢，她的判断是对的。但是罗斯福和考克斯还在互相鼓励，发电报说："我们胜利了。"罗斯福保证他会拿下纽约州，但是他却没有足够的心理能力来承受失败。

尽管罗斯福很现实，但他还是没有办法承受11月2日失利的结果。哈定和柯利芝获得了61%的直接选票。共和党获得404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党只获得127张选举人票。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两党之间罕见的一边倒现象。自从1820年门罗就任总统以来，两党之间还没有出现过更大的选举差距。

和罗斯福想象中的不同，共和党人赢得了纽约州的每一个县。

依照罗斯福一贯的个性，他表示当不成副总统这个职务倒是轻松了不少。他打趣地把这次竞选描述成"缝缝补补的破帆船"。他最大的担忧是共和党人如此反动，他们甚至会把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和中间派变成极端主义者。这也表明了他对美国政治的洞见之深。

但他不可避免地需要为他的失败做出一番解释。他个人认为是由于德国裔美国人的捣乱，还有关于哈定有黑人血统的说法使然。

西奥多·罗斯福的老盟友们欣喜若狂，虽然他们知道哈定不是一个合格的继任者。"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根除了威尔逊主义。"亨利·洛奇狂喜地说道。而此时垂暮的威尔逊已经把情势看得很清楚了。他对一个工作人员说："美国本来有机会掌握世界的领导权，但是我们丢掉了这个机会。事实会证明悲剧即将发生。"

大选后，罗斯福和他的妻弟一起去了路易斯安那，他们在那里除了打猎以外，还救起了一个陷入沼泽地的14岁男孩。当圣诞节即将到来时，罗斯福给身边的每位工作人员都准备了一份礼物——金质的链扣。后来，他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链扣俱乐部"，他们每年都要聚

会一次来表示对罗斯福的追忆。随着罗斯福事业的发展，该俱乐部的势力也越来越大。

由于共和党的围追堵截，罗斯福很快就放弃了他支持国联以及庞大海军的计划。前者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罗斯福现在支持德国和其他国家单独和谈。由于德国的海军力量被大大削弱了，他要求暂缓美国海军的扩张，这使得罗斯福由原先的海军扩张主义者变成了哈定政府维持现状的支持者。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叫作玛格丽特·利汉德的助手，她既勤奋又聪明，在之后的20多年里始终跟随着罗斯福。她在罗斯福1920年的大选中为他安排日程，是罗斯福的一个得力助手。她谨慎勤劳，既有魅力又有活力，她能认真地听取埃莉诺的建议，在罗斯福事业的后期一直是他的亲信。

罗斯福在纽约州活跃地发表巡回演说，他的名字在媒体上的曝光率很高，他还积极参加民间活动，参与诸如童子军基金会、国家民间基金会、近东救援基金会以及盲人基金会等组织的活动。埃莉诺变得勤劳了，她决心从萨拉的管制中解放出来，走出她丈夫的阴影。经过不懈的努力，她变成了打字和速记的好手。她还注重学习，一直培养自己在烹饪方面的兴趣。萨拉对埃莉诺的成就却不以为意。埃莉诺参加了妇女投票董事会，还在那里结识了一些亲密的朋友，如伊丽莎白·瑞德，以及其他的一些女权运动中的好友。另外，她还去行政学院进修，又重新学习了法语和诗歌。她自从离开了艾伦斯伍德后，有20多年没有进课堂了。

她开始和丈夫一样，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特别是在妇女权利问题上，而且她的观点对丈夫很有启发性。随着他们不同人格的日益凸显，埃莉诺变得越发独立和自信。她不再唯丈夫的命令是从了。

家庭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小西奥多·罗斯福出任哈定政府的海军部长助理。由于竞选的需要，他要抨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意见和做法，他在事前就此事与富兰克林进行了讨论。富兰克林是家族中出了名的牛脾气，他拒绝接受小西奥多的观点。这小小的摩擦随着艾丽丝的介入，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罗斯福由于竞选非常疲惫，他离开了纽约后乘坐游艇于8月5日回到了坎波贝洛。这是一次艰苦的旅程，他得自己驾驶着游艇穿过浓雾弥漫的海域。他于8月7日到达坎波贝洛。罗斯福在码头上受到了家人和路易斯·豪的热情迎接，他一路旅途劳顿但是十分高兴。

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04
烈火的考验

埃莉诺对罗斯福同小儿麻痹症做斗争情况的描述

I

1921年8月8日，富兰克林·罗斯福起得很早，和他的助手范·布莱克及其他一些人一起乘坐布莱克的游艇去钓鱼。和往常一样，罗斯福精神饱满，可是，他一不小心失去了平衡，跌进了芬迪湾的水中，当时海水冰冷刺骨。当天晚上，他感到很疲惫，腿上的疼痛显得更加剧烈。

8月9日下午，布莱克驾船从海湾驶出，驶向纽约州。第二天，罗斯福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詹姆斯和埃利奥特出海了。当他们下午4点钟回来的时候，罗斯福觉得很累，决定以后要多加锻炼。于是，他带着全家人，从家里跑步出发去3千米以外的游泳池游泳。

罗斯福疲惫不堪，甚至都没有力气脱下泳衣。他坐在那里读起了信件，一个小时后，他开始全身发抖，就上床用毛毯把自己裹起来，晚饭也没有胃口。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他醒来后感到腿部剧痛，而且还波及颈部和背部。他到卫生间刮胡子，因为太过虚弱，站都站不稳，而且身上的剧痛使他不能穿衣服。他艰难地回到了床上。他把孩子托付给格雷斯·豪——一个雇员的妻子，让格雷斯带孩子们去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野营，本来罗斯福说好了自己带孩子们去的。罗斯福

高烧到了39度，开始只是身体左半边麻木，后来周身都不能动弹了。他试图活动一下筋骨，但是身子根本不听使唤。

埃莉诺请了一位当地的医生，但是对于罗斯福的病，这位医生无计可施，他认定罗斯福患了重感冒。罗斯福心里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医生答应明天再来一趟，第二天，他的病人已经站不起来了，甚至连小便都成了问题。因此，豪和医生一起给美国东部各州打了很多通电话，他们最终找到一位住在费城的84岁外科医生，他当时正在度假。

这位医生8月14日到达后，诊断认为在罗斯福脊柱内有一个血栓，诊断的理由是罗斯福一只脚上的脚趾还能活动，这说明血栓正在消解。埃莉诺从纽约请来了一位按摩师，她和豪还轮流替罗斯福按摩脚趾，但是罗斯福的状况却急转直下。他的内脏和膀胱也出了问题，原本可以活动的脚趾也不能动弹了。医生告诉埃莉诺怎样正确使用灌肠剂，以及如何准确地把玻璃管插入尿道。埃莉诺利用玻璃管的吸力把尿液引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对于像罗斯福这种自尊心很强的人来说，这种境况实在让他难以忍受。

虽然埃莉诺和豪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也没有办法阻止罗斯福精神上的崩溃。他大小便失禁，高烧不退，他害怕自己已经被上帝抛弃了。

但是在8月15日，他开始有所好转，并且恢复了一些自控能力。高烧已经退去，他的几个脚趾又重新恢复了知觉。他的希望暂时恢复了。那位80多岁的费城医生写了诊断书寄过来，他仍认为病因是血栓，是由于脊柱损伤引起的。这是一个古怪的结论，因为罗斯福的背部似乎没有任何毛病（这位医生最终开出了一张高达8 000美元的账单，罗斯福很不情愿地付了这笔费用）。

对于罗斯福的病情诊断意见不一，路易斯·豪也感到无所适从，他写信给罗斯福的叔叔弗莱德·德拉诺，在信中豪对罗斯福的病情进行了

总结，希望能请纽约和波士顿最好的医生来诊治。当德拉诺请来名医来给罗斯福诊断后，最终结论竟然是罗斯福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他们要求德拉诺把侄子交给美国顶级的小儿麻痹症专家罗伯特·洛维特，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治疗小儿麻痹症的首席权威。

洛维特博士于8月25日来见他的病人，此时罗斯福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星期了。洛维特注意到罗斯福的半边脸已经麻木，他的一个大拇指不能弯曲，膀胱还是麻木的。埃莉诺的工作做得很好，所以罗斯福没有发生任何感染。罗斯福臀部和腿上的肌肉都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但是好在没有完全萎缩。洛维特和他的同事们商量后，没有异议地确诊这是小儿麻痹症。

他告诉埃莉诺，孩子们不会得病，并且要求立即停止按摩，因为这么做只会加剧罗斯福的疼痛。他建议找一个职业护士，使得埃莉诺能从劳累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在小儿麻痹症的病人中，罗斯福并不算非常严重的，罗斯福的四肢还有恢复的可能性。罗斯福在接到这个诊断后稍稍松了一口气。埃莉诺在后来说，他当时的表现就像日本轰炸珍珠港时一样，埃莉诺称这段日子为“烈火的考验”。

萨拉9月1日从国外回来，鲁西和她的兄弟弗莱德·德拉诺去码头接她。鲁西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富兰克林不能来接她是因为“病得很严重”，于是萨拉立刻赶回坎波贝洛。

当她到达的时候，她的儿子虽然对于病情很沮丧，但是却很镇定，就好像他小时候撞破了前额却装得很沉着一样，他跟母亲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会勇敢地面对病魔。萨拉用感动的笔触回忆道：“富兰克林成了一个勇敢的、面带微笑的、英俊的儿子。”

利汉德女士在8月的最后一周里，在坎波贝洛帮助他们回复来自朋友们的信件，大家对罗斯福的病情都很关心。罗斯福让利汉德对朋友们说，他就是由于掉进了冰冷的水里而患上了“严重的伤寒”。因为四

肢麻木，他无法亲自签名。路易斯·豪模仿他的笔迹，瞒过了记者，甚至包括美联社的记者。他们不准备让整个事件曝光。第一篇有关罗斯福病情的报道出现在8月27日，报道称罗斯福正处在恢复过程中。

洛维特博士要求罗斯福在9月份好好休养。罗斯福和他的家人则认为，只要坚持按摩和锻炼，他的肌肉萎缩状况就会缓解。洛维特认为情况恰恰相反，他要求每天都要用温水洗浴，这样罗斯福的四肢就可以得到放松。因为如果他成天躺在床上，听着孩子们的叫喊和大海的声音，会容易得褥疮。谁也不知道罗斯福以后会有怎样的生活。对于这样一个有理想而且自信的人来说，如果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对他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夏末秋初之际，家人想办法让罗斯福从屋子里出来呼吸新鲜空气。9月13日，一趟火车专列开到了伊斯特港，罗斯福由6个当地人用担架抬着，从他躺了一个月的房间出来，去了海边。路易斯·豪把罗斯福的帽子放在他那几乎不能动弹的左手上，罗斯福则对他报以微笑。豪的孩子们非常惊愕，他们自从罗斯福生病之后第一次见到他，罗斯福还试图和他们挥挥手。当罗斯福一行人快到山脚时，罗斯福对孩子们高声喊道："我会好的。"

他乘坐一艘小船从海湾到伊斯特港，这几千米的颠簸对于这个病人来说非常难熬。埃莉诺和护士就坐在他身旁。当浪打过来的时候，人们极其小心地看护着他，因为如果他掉入水中，就会有生命危险。他不能游泳，也没有能力采取其他自救措施。

靠岸后，大家成功地让罗斯福躺到了一辆平底手推车上，妻子和其他人走在他身边挡住别人的视线，以免引起围观。大家在把罗斯福送上火车时遇到了一点小麻烦，因为车门太小，罗斯福不可能躺着进去。他们只能把火车的玻璃取下来，从窗户里把他塞进去。为此，大家耽误了不少时间。豪点燃了一支雪茄，插在罗斯福的烟斗上，这样一来罗斯福看起来自然多了。骗过了那些记者的眼睛。记者们后来才

意识到错过了一条重大新闻。在此之前，他们报道的罗斯福总是面带微笑。民主党内也报道称罗斯福的病情不是很严重。他这一次离开坎波贝洛，直到12年后才再次回来。那时候，他本人和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变。

罗斯福对于火车司机很是感激，因为他的减速行驶使得罗斯福不至于太难受（后来，在罗斯福任美国总统时，他规定火车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64千米，因为超过这个速度，他就有可能从椅子上摔出去）。

他于9月14日回到了纽约，在中央车站下车后走进一个特别通道，以躲避记者的追踪。一群朋友等在那里，其中有洛维特的学生和罗斯福的“疯狂的爱尔兰玫瑰”汤姆·林奇。一辆救护车把罗斯福送到了纽约长老会医院。9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罗斯福患小儿麻痹症，但他正在恢复之中的消息。这种表述明显是由豪向媒体透露的。

他在医院一直待到10月28日，开始只有埃莉诺、萨拉和豪被允许进入病房。慰问和鼓励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包括亲朋好友和皮博迪博士。

罗斯福开始掌握技巧，知道如何使别人认为他对病情是很乐观的，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给人留下开朗积极的印象。在患小儿麻痹症的人群中，罗斯福确实是相当乐观的一位。他的前领导丹尼尔斯来医院看望他的时候，惊愕自己往日那位“大步流星、英俊潇洒”的部下，如今变成了瘫子。罗斯福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用手敲打着丹尼尔斯的大肚皮说：“你不要认为自己现在是在看望一个病人，这个人能把你击倒。”

罗斯福天性机敏，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得到别人的同情和理解，而不是得到别人施舍的怜悯。罗斯福一向坚韧不拔，他认为小儿麻痹症是上天要苦其心志，让他从幸运的青年时代过渡到能承受挫折的中

年时代。有些人原来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而已，现在这些人也开始钦佩他的决心和毅力。那些过去憎恨他的人开始称赞他的勇敢无畏。人们也不再指责他那爱吹嘘的毛病了。

他于10月28日回到了自己位于65号大街的家中，众人将他抬到了顶层的阁楼。他的病历本上写着："病情没有改善。"他的背部、胸部以及手臂上的肌肉都没有好转的迹象，但好在他内脏的功能得到了恢复。他开始慢慢地调养，虽然有时候也会发烧，情绪也有波动，但是他再也没有像开始那样高烧不退、全身疼痛的症状了，病情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

12月初，富兰克林开始由一位能干的理疗专家雷克夫人照料，她负责监督罗斯福每天进行四肢恢复的训练。罗斯福从来没有放弃过在几周之内站起来的想法，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但他还是意志坚定地执行着雷克夫人所规定的锻炼计划表。

这对于罗斯福的家人来说是一个调整时期。年轻的詹姆斯从格罗顿公学回到家中的时候，他都不敢正眼看他父亲的模样，詹姆斯后来这样回忆道："父亲躺在一堆器械中间，这些器械支撑着他的上身，他才能够坐在那里。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伸出双手来欢迎我。父亲说：'欢迎你回家，小大人。'我冲过去扑进他的怀里，虽然我是罗斯福家的人，也是格罗顿公学的学生，但我还是忍不住哭出声来。不过爸爸拍着我的背，说我长大了也很英俊。我很快就和他聊起天来。"罗斯福向孩子们展示了自己萎缩的四肢，并且对他们能记住一些肌肉的名字表示赞许。孩子们看到父亲能够控制自己的脚趾，于是开始欢呼。他们对于父亲病情的恐惧很快就消失了。

"这一场劫难使得罗斯福的精神受到一次洗礼。"尽管有人夸大了这种进步，但是弗朗西斯·珀金斯认为，富兰克林的进步是"精神世界的巨大转变"。埃莉诺更是给了丈夫更多的赞美，她认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场疾病使得罗斯福拥有了"无比强大的力量和勇气，无

穷的韧性和不懈的奋斗精神”。詹姆斯和他父亲的观点则是一致的，认为即使不是这场浩劫，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会成为一代伟人，成为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

当然，罗斯福的病情使得他对于自己的政治事业更加珍惜，他回到了现实之中，意识到如果自己远离脆弱，富有力量，就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可以克服疾病带来的种种不便，这不是为了完成应尽的义务，而是彰显自己的力量和勇气。没有一个残疾人可以像他这样，竞选如此高的职位，但是这也没能使他对自己的理想动摇半分。他的健康状况一旦稳定，他就开始为竞选做准备。他在受到小儿麻痹症折磨之前，参与竞选的成绩是两胜两负，但是他在此后的6次竞选中，成绩却更加出色，并且其中4次都是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对手。

Ⅱ

埃莉诺担心由于罗斯福染病，会毁了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独立生活。她和豪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萨拉和孩子们的警惕，他们怀疑豪别有居心。埃莉诺和豪帮助罗斯福重建他的事业。此时，埃莉诺认为罗斯福的政治事业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她还是鼓励罗斯福从政，为的是带给丈夫一点自信。豪向往白宫权力的个人野心没有丝毫减弱，他对罗斯福个人能力的信心也没有丝毫动摇。萨拉的想法却恰恰相反，她希望罗斯福回到斯普林伍德的家中，由她来照顾他，就像她曾经照顾罗斯福患有心脏病的父亲一样。

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以及豪的想法一致，所以萨拉的愿望注定会落空。豪住进了罗斯福家，但是由于他的生活习惯很不好，给罗斯福的家人造成了很多困扰。1921年年底的那个冬天，是埃莉诺觉得一生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时刻。一位家庭护士搬了进来，又占了一

间卧室，埃莉诺只能挤在一张很窄的床上。大家由于房子空间狭窄发生了摩擦，家庭气氛变得不和谐。

因为罗斯福坐在轮椅上，半身瘫痪，所以他和前任上司伍德罗·威尔逊的关系有所好转。在威尔逊1921年3月离开白宫后不久，罗斯福就成立了一个有50万美元资金赞助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并且以威尔逊的名字命名该组织。起初，威尔逊拒绝和罗斯福会面。直到1921年6月，在威尔逊一个私人顾问的葬礼上，他俩见面了，他们还谈到了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的组织。

但是威尔逊对于罗斯福还是有所不满，他拒绝了在罗斯福离开华盛顿的演讲致辞上签名。当这位前任总统知道罗斯福在拐杖和别人的帮助下自己站起来的时候，他对罗斯福说："我不得不说，你很让人钦佩。你康复得很快，而且充满自信，我对此感到高兴。"1921年11月9日，威尔逊在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请转达我的祝福，我很高兴看到你丈夫的康复。"在罗斯福生日当天，威尔逊写信祝贺："对于罗斯福的友情和无私奉献，我心存感激。"由此可见，这两位重量级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自此改善了很多。

在罗斯福1922年1月30日过40岁生日的时候，他开始碰到新的麻烦。他的腿部韧带收缩了，可能终生只能坐在轮椅上。他的腿上安装了一个支撑架，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罗斯福始终一声不吭，没有半句怨言。

他的肌肉本来处于逐渐康复的过程中，到了2月份，这种康复也停止了，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罗斯福有丝毫的消沉。他开始尝试拄着拐杖走路，走起路来非常艰难，姿势不太优雅，甚至有点歇斯底里，但这毕竟是一个大的进步，对于罗斯福恢复士气很重要。洛维特博士也对他表示称赞。

由于罗斯福一家在65号街的居住条件太拥挤了，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们全家于1922年夏天搬到了斯普林伍德。罗斯福每天睡到上午10点左右，在床上进餐，然后用器械训练背部、胸部和手臂上的肌肉。萨拉在家里安装了一部电梯，这样她儿子就可以在书房和阳台之间自由活动了，并且能在书房里看书或集邮。罗斯福1点吃午饭，之后午休，下午和母亲一起喝茶聊天，看看书，然后吃晚饭。晚上读书到11点，然后睡觉。罗斯福穿衣需要别人帮助。萨拉为了能让儿子高兴，请了一批客人到斯普林伍德做客。

埃莉诺加入了州民主党妇女部，罗斯福对此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使他的名字在媒体曝光。埃莉诺和萨拉之间矛盾不断，埃莉诺希望罗斯福加强锻炼以恢复健康，但是萨拉希望儿子多休息。她们之间的分歧让罗斯福心烦意乱，以至于医生建议他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

罗斯福6月份去了波士顿，目的是接受治疗从而提高自己的行动能力。有一个漂亮的护士埃德娜·罗基常常陪在罗斯福身边，这引发了埃莉诺的嫉妒。洛维特博士的助理也是治疗小儿麻痹症的专家，他建议罗斯福学习跳舞和滑冰等技能。他教会了罗斯福如何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罗斯福身上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他不断地尝试，还称这种病只是一个“稚气”的孩子，不难对付。

爬楼梯是最困难的了。罗斯福只能把两个拐杖同时放在一个手臂之下，用一只手艰难地抓着扶梯，还要拖着另一条腿往上走。从楼梯上走下来更是困难，很有可能失去平衡摔倒，对他来说就像是在玩杂技一样。

其实，如果他坐着爬楼梯的话会更加方便，虽然姿势不好看。但即便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这样的勇气，他也爬不了几级台阶。这种折磨使得很多小儿麻痹症患者自杀，但是罗斯福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着，并且动作变得日益灵活。

这个夏天，萨拉带着孩子们去欧洲旅行，他们去了法国、瑞士、英国，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去欧洲。埃莉诺学会了开车，带着孩子和两个朋友去露营。虽然他们在坎波贝洛的日子遇到一些困难，但生活总体来说还是宁静而又幸福的。

罗斯福喜欢上了游泳，他认为“游泳让我又找回了自己”（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有人认为他1921年7月去熊山的途中感染了小儿麻痹症病毒，8月他失足跌进了芬迪湾的水中才加剧了病情）。他先在斯普林伍德的一个小泳池里游泳，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那里学会了游泳，里面的水温非常低。一周后他又在一个加热的游泳池里游了几回。他在水中时，四肢可以部分活动，这对于罗斯福而言，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治疗方式。他在斯普林伍德的一块草地上利用双杠进行大量运动，每天下午他都在那里做前空翻练习，姿势虽然算不上优美，但是强度很大，这可以使他得到很好的锻炼，身体恢复得也更快了。

他在来访者面前总是不停地说话，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虽然他很乐观，但是他所受到的这种长期折磨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可以击败病魔的人真的是不平凡的人。

1922年10月9日，富兰克林·罗斯福病后在政坛上初次亮相。他在司机的帮助下来到位于百老汇街120号的F&D公司。他自己下车，司机在身后搀扶着他。由于动作太慢，尾随其后的汽车发出了不耐烦的喇叭声。司机过来递给他拐杖，过路的人给他找回了被风刮飞的帽子。他汗流浃背地走过大厅，汗水湿透了夹克衫。

在大厅里，他们向电梯走去，他左边的拐杖滑落了（他的左臂不如右臂那么有力）。虽然司机想要搀扶，但罗斯福还是失去平衡摔倒了。当众人都很尴尬的时候，罗斯福却能处变不惊，颇为幽默地将窘境化解了，他让两个强壮的男人扶他起来，其中有一个人名叫巴兹尔·

奥康纳。这是奥康纳和罗斯福第一次见面，后来他成了罗斯福的终生伙伴。剩下的一天都在平静中度过，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23年，罗斯福和巴兹尔·奥康纳成立了罗斯福–奥康纳律师事务所。奥康纳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在哈佛法学院学习十分用功，甚至有一段时间都差点失明了。罗斯福每年能有1万美元的进账，而且他对自己的名字能够出现在公司信笺纸的抬头中感到高兴，他也为有这样一个能够精诚合作的伙伴而感到高兴。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们盲目投机，罗斯福开始也不例外。他在10年后对一大群欢呼的观众说“这是虚幻缥缈的9年”。在这9年中，他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他对于新鲜事物的兴趣常令他出轨，像大多数政治家一样，他也缺乏经济头脑，对财政和金融事务不够敏感。

1925年间，罗斯福的经济状况很不理想，他拍卖了在海军部供职时留下的一些物资，但是只卖了不到1 000美元。他经常穿着磨破了的旧衣服，但是他的投资兴趣始终不减。在商业道路上，罗斯福就像他打扑克牌时一样，充满了热情而且喜欢虚张声势。

在1934年的《芝加哥论坛报》上，曾经引用了一段罗斯福的炉边谈话，那是罗斯福对自己的一番评论：“在20年代，我曾经盲目地追求财富，费尽心机但却一无所获。”除了这段引用，对他经营自动贩卖机一事，有人评论说：“他过高地估计了前景。”他公司的股票从18美元跌到了20美分，最终公司只得以重组收场。

罗斯福在美国建设协会担任了6年的主席。罗斯福对于政府的法规很不满意，他说“政府的法规不仅无用，而且浪费钱财”。这番话刊登在1922年的《纽约时报》上。

事实上，美国建设协会的会员自己都常常忽视政府的规章，这使得罗斯福对于政府规章是否可行产生了怀疑。他称赞体力劳动的重要

性，他写道："如果我们的祖先不开垦土地、开拓水渠，而只是坐下来建立各种房地产公司，制定各种发展规划的话，美国肯定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

罗斯福认为就像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时一样，技工的社会地位应该和专家相同。他认为如果高技术人才都能积极参与建设，那么建设事业将会变得更加科学，而不仅仅只是一种行业。他批评一些建设项目"品质低劣，而且有财务问题"。罗斯福认为住房贷款早晚会出问题，最后他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罗斯福在商业上还是有一些成功的例子的。例如，他在联合欧洲投资者有限公司中持有股份，这个加拿大的公司乘德国马克贬值的机会，投资濒临破产的德国公司。1922年至1924年仅两年的时间，他们的利润就飙升了200%。

对于罗斯福的商业投资历程，埃莉诺最常用的评价就是"没有经验，不精明"。但是，在生意场里他也学到了政府和商业投资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他作为海军部长助理所学不到的。在生意场上，他也显现出了投资者唯利是图和报复心切的本性。一位著名的罗斯福传记作者说过："他作为商人的失败，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大有裨益。"

III

1923年2月在佛罗里达州，罗斯福病后第一次出海游玩。他们的船到达迈阿密，在那里见到了1920年罗斯福的总统竞选搭档詹姆斯·考克斯。考克斯看到罗斯福瘫痪的样子时，认为他得了不治之症随时可能会死去，考克斯忍不住伤心地哭了。罗斯福对他的反应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罗斯福在给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的信中写道"除了夹着双拐以外，我的身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健康"。

戴维斯和路易斯·利亚德恰好和罗斯福他们在一起。利亚德钓到了一条差不多有40斤重的海鲈鱼。利亚德夫人打趣说："他们为了躲避犹太人才来这里，没想到还是遇见了"注。罗斯福也被她逗乐了。

罗斯福对犹太人就像他对待黑人一样，从来就没有过半点歧视，对他们从来都是非常尊敬的。他对种族问题的看法就像是看待客船里不同舱位的船票一样，他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持有自己的一张票，能够乘船到达幸福的彼岸，在彼岸人们可以得到基本的自由，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他对任何族群都没有偏见，对于各个种族的文化都能包容。他相信在这一点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清教徒文化和美国黑人文化可以共存。他对于那些在美国建国初期没有太多的优势，但是后来发展得很好的文化非常尊重。

纽约丰富的社交生活帮助罗斯福分散了精力，他身体上的伤痛也渐渐好转了。罗斯福的理疗师雷克夫人认为，他的主要烦恼来自妻子和母亲对他的控制。洛维特博士认为埃莉诺和豪的照顾很有效。一年之后，当罗斯福来到波士顿时，他给罗斯福做了全身检查，发现罗斯福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洛维特觉得罗斯福过于固执，不爱听别人的劝告。1923年之后，洛维特和罗斯福就很少见面了。

罗斯福从法国精神学家爱迈·库尔那里得到了很多的鼓舞，因为库尔认为"无论日子怎么过，我总是会变得更好的"。但是这个法国医生也通过一个熟人告诉罗斯福，他对于小儿麻痹症也无计可施。

罗斯福又重拾起往日的一些爱好，特别是集邮、看书、制造木船模型等。但是这些事情都需要手和眼的配合，例如让轮船模型在水中航行。他变成了制造木船模型的高手，用的工具还是他父母在1896年他去格罗顿公学读书时送给他的。他尝试着写文章，但是不太成功。罗斯福是一个演员，而不是一个作家。他在当上了美国总统后，就可

以自由地改写历史了。他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

1923年后期，罗斯福和朋友约翰·劳伦斯一起出游。他把他们一起乘坐的那艘船称为拉洛克号（劳伦斯也是一个腿部有残疾的人）。埃莉诺责怪罗斯福一点都不考虑经济因素，但罗斯福并不会为这种事情担忧。

他们于1924年2月出发，这次航行花了3 750美元。拉洛克号并不是一艘装备先进的轮船，初冬的天气也不利于航行。当航行到南部时，他们有几次被困在了热带的暴风雨中，也曾经几度在沼泽地国家公园中被红木挡住了航道，但是罗斯福总是不屈不挠地要求继续前进。

德拉珀博士告诉他，他的肌肉再进一步恢复的可能性不大了。他在航行的过程中时常会感到很忧郁。就医生的角度来说，他们已经尽了全力，剩下的就要看罗斯福自己了。米西·利汉德说，罗斯福经常整个下午都待在船舱里不出来，也许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愁眉不展的样子。

米西25岁时参加了首次拉洛克号之旅，她为罗斯福无私地奉献，付出了自己接下来的一生。她是一个颇具魅力的女人，长着一张瓜子脸，蓝灰色的眸子含情脉脉。她办事富有效率，是罗斯福得力的私人助理。后来，还有人猜测他们之间是否有过罗曼史。米西爱着罗斯福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她在给罗斯福写信时，用的是妻子或亲密伴侣的口吻。从挪威冰河回来之后，她给罗斯福带来了那里的花，并且告诉罗斯福在读他的信时，感觉很甜蜜。

她从不像埃莉诺那样，在公共场合抵触罗斯福。她的忠告总是出于善意，所以比埃莉诺的忠告更管用。如果是其他的男人，早就迷上

米西了，她的追逐者中包括后来出任美国驻法国和俄罗斯大使的威廉·布利特等人。

检查的医生表示病情并没有让罗斯福丧失男性的本能，但是他的心里有阴影。1925年至1928年间的208周里，罗斯福有116周是离开家度过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恢复性锻炼。在这116周时间内，埃莉诺只陪伴了罗斯福4周，萨拉陪了他2周，而剩下的110周都是米西陪在罗斯福身边。

他们有很多进一步增进感情的机会。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调皮地称他们两人是一对“情人”，但是罗斯福其他儿女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埃莉诺永远都处于无止境的嫉妒中，她对于米西和自己丈夫之间的这种暧昧关系憎恶透顶。不过，米西始终都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合作者，有些时候，米西还会竭尽所能地去安抚萨拉和埃莉诺。

一旦罗斯福当上总统，各大媒体就开始争相报道他的情感生活和莫须有的绯闻。罗斯福也许和米西以及其他一两个女人有过关系，但是他必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事业的追求中，最终使他在世界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真相没有人了解，但是考虑到罗斯福本人的身体状况，并且考虑到萨拉和埃莉诺的严格“管束”，罗斯福发生绯闻的可能性不大。

1924年2月23日，伍德罗·威尔逊与世长辞。他非常长寿，甚至参加了哈定的葬礼，但在他中风以后病情始终没有好转。罗斯福写了一篇文章悼念威尔逊，他说：“威尔逊让人类重新认识了民主。”罗斯福乘坐的拉洛克号也降半旗30天致哀。

罗斯福在处理国际事务和禁酒事宜的时候，表现出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惯用的一些技巧。罗斯福认为国际联盟的失败是很明显的，他建议放弃国际联盟，而以一个美国大众可以接受的国际组织来取代

它。他认为避免列强之间战争的最好方式就是美国置身世界事务之中。为了反击愚蠢的孤立主义，罗斯福很有预见性地指出，美国应该让民主的和负责任的国家联合起来。

1922年，共和党人、驻菲律宾总督伦纳德·伍德将军拒绝了菲律宾人要求更多自治权的请求，罗斯福对此表示支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后当出现类似情况时，罗斯福却谴责英国对新加坡的占领。他的观点和2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由从前支持殖民地转为对新建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支持，他认为只要当地人民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可以独立。

他对于禁酒令的态度也随着公共的意见在转变。从个人立场上说，罗斯福认为禁酒令纯粹是一派胡言，因为他自己就有喝酒的习惯。在20年代中期，大部分美国人都支持禁酒，但是大部分城市居民反对禁酒。他最后诉诸全民公投，他个人认为他所支持的那一派将会获胜。

罗斯福1923年建议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在州议会通过禁令。如果投票的话，会激怒城市中大部分拒绝禁酒的人，而这批人中有很多史密斯的支持者。罗斯福坚持应该投票表决，因为纽约有义务支持联邦通过禁酒令。换句话说，他要用投票的方式堵住反对禁酒人士的嘴。但是这种做法不是史密斯的风格，他认为这样不够光明磊落。史密斯个人希望通过平和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相关议案，但是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

IV

罗斯福一家在1924年又重返政界，埃莉诺回到了民主党纽约妇女部。

在罗斯福回到政界后不久，史密斯的两个亲密顾问拜访了罗斯福，并且请求他就任史密斯1924年美国总统竞选委员会的主席，因为史密斯相信罗斯福有能力帮助他成为当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其实并不认为史密斯有希望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更不认为他能够当选总统，但是罗斯福觉得，这可以巩固自己在纽约地区作为民主党第二把交椅的地位，所以就答应了。

罗斯福和豪预测到在1924年的大会上，反对禁酒的史密斯和保守派的麦卡杜之间会有一场殊死搏斗。罗斯福催促史密斯赶快发表关于国家事务的见解，从而提高在全美的知名度。史密斯拒绝了这一要求，这使得他作为候选人的信誉降低，在大会上遇到的质疑越来越多。

在哈定去世之后，罗斯福欢迎卡尔文·柯立芝接替他的位置，继任美国总统。不过罗斯福认为柯立芝“不是一个适合全美竞选的人”，但是事实证明，柯立芝的沉默寡言和保守主义姿态在全美很受欢迎。罗斯福准确地判断：“贫穷的哈定很诚实，但是他却看不出真朋友和表里不一的人的区别。他的身边有一群伪君子，而他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

罗斯福认为“柯立芝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不可能带动全国范围内的长久繁荣。整个中产阶级过得很好，而工人阶级只是勉强度日，农民的利益没能得到保障。不排除罗斯福有一些个人偏见，但是总体而言，他对于共和党政府统治下繁荣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罗斯福写道：“因为柯立芝自己不能把问题阐述清楚，所以全国民众都认为他是一个神秘人物。”

1923年6月10日至13日，共和党人在克利夫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提名了柯立芝和查尔斯·戴维斯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他们承诺减轻农民税收，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救济。因亨利·洛奇对威尔逊的攻击过于残暴，即使是共和党人也和他疏远了。1920年他曾在共和党全国代表

大会上担任主席，而在1924年的代表大会上几乎成了一个被人忽略了的普通党员。

出于竞选策略上的考虑，史密斯接受了罗斯福担任他竞选负责人这一提议，罗斯福也表示同意。他们认为罗斯福出身于名门望族，相貌堂堂，声音洪亮，没有太多坦慕尼厅背景，也没有太多竞争力，不会对史密斯构成威胁。

史密斯认为罗斯福的母亲太过于自命不凡，也认为罗斯福“不是一个可以拉进卫生间，然后和他说悄悄话的人”。在罗斯福生病之前，他一直持这种观点。罗斯福和豪希望在大会上多得到一些选票，以提高知名度。

普斯卡让罗斯福发表一个演讲，在演讲稿中，普斯卡引用了华兹华斯的“快乐斗士”来描述史密斯。罗斯福认为普斯卡的文章过于文学化，所以动手修改了讲稿。最后，由《纽约世界报》的主编来选择到底采用哪一个讲稿。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大家同意使用普斯卡的讲稿，罗斯福稍做了一些修改。

这件事情对于罗斯福的政治影响很大，在他生病以前，史密斯等人就不看好罗斯福的政治潜力；在讲稿风波以后，他们更是没有把罗斯福放在眼里。但是在1924年代表大会上，在冗长乏味的演讲中唯一的亮点就是罗斯福提出的“快乐斗士”，这让每个人都记在了心间，而且给了罗斯福一个展现个人的平台。这让他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前台上，他的风采让史密斯都显得相形见绌。

1924年6月24日，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广场召开。他虽然淡出了三年，但仍是民主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又重新成为党内的焦点。他很高兴，也有些担心。两天之后的下午，他将发表演讲。萨拉、埃莉诺和孩子们以及埃莉诺的朋友都来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上台之前反复地演练：他16岁的儿子詹姆斯陪伴着他，他练习用单拐

走路，而另一只手则抓着詹姆斯的胳膊。在他上台的时候，为了不让台下的观众过分关注他不优雅的姿势，他不断地和观众进行眼神的交流。这是他第三次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亮相了。

在一个参议员确认了讲台没有问题后，罗斯福一个人拄着双拐走向前台，虽然只有5米多远，但对于罗斯福而言却非常艰难，全场一片肃静。他个人奋斗不息的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汗流浃背，人们只看到了他的背影和坚定的笑容，这背影和笑容在多年以后为全世界所熟悉。在场的2000人同时起立，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在广场上空回响着。

他那富有磁性和自信的声音振奋了全场。受到现场气氛的鼓舞，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得每位听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结道："他有力量指出对手的错误，让对手望而却步。他有个性使在场的每一人都感受到真诚。他就是'快乐斗士'艾尔弗雷德·史密斯。"

当史密斯出场时，观众让开道路并且为之喝彩。罗斯福在一旁站了半个小时，虽然他面带微笑地和周围祝贺的人群打招呼，但是他的手开始颤抖，他站不住了。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另一位女代表冲上前去祝贺他，并且帮助他离开情绪高涨的人群来到后台坐回轮椅上。

在这场演讲以后，代表大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最后，约翰·戴维斯当选了，他是美国前驻英大使，原来是一个华尔街的保守派律师，麦卡杜发现自己没有当选的希望了。真正的胜利是属于罗斯福的，他在这场大会中崭露头角，一个来自堪萨斯的代表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富有吸引力的领导者，我认为他在1928年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柯立芝赢得了1572.4万张直接选票，而戴维斯只获得840万张直接选票。柯立芝获得382张选举人票问鼎总统，这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又是

一个丰收之年。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现在成了民主党内的领导。由于医学技术不断进步，罗斯福的身体也在不断康复，他俨然成为民主党的二号人物。

此后，罗斯福和豪广泛征求每一位代表的意见，让大家献计献策，如何才能避免在1928年大选年再次败北。罗斯福和豪还建议每年都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来商讨对策，但是这一努力受到了反史密斯势力的质疑，就连史密斯本人也没多大兴趣，所以最后不了了之。

罗斯福还深入民间，收集大量资料，询问了诸多人士关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泡沫繁荣的看法，也由此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其中就有一位年轻的犹太裔裁缝，他和罗斯福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通过这位裁缝，罗斯福了解到城市中贫困的工薪阶级是如何生活的，了解到这些弱势群体心中的悲伤和梦想，而这些都是他的对手柯立芝和胡佛所全然不知的。

罗斯福也开始更多地接触南部的民主党人，他的身体也在不断康复。罗斯福政治事业的进步就像他的身体一样，都在慢慢复苏，按照既定计划一步一步走向成功。

埃莉诺也开始了她新的事业，她交了不少朋友，并且有很多关于埃莉诺同这些亲密女伴之间关系的猜测。自从她的丈夫生病之后，埃莉诺是否同女伴之间有同性恋关系一直是罗斯福的对手紧追不舍的话题。

安娜·罗斯福于1926年嫁给了一位保守的经纪人科提斯·达尔。她后来写道，当时这样做很大成分是为了“逃出”这个有问题的家庭。

皮博迪博士在海德公园的圣詹姆斯教堂为他们主持了婚礼。总的来说，婚礼还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其中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萨拉没有

经过埃莉诺同意，就私自把在纽约的一栋住宅送给了这对新婚夫妇，埃莉诺为此感到很不满。

1927年5月7日，詹姆斯·罗斯福在纽约去世了，享年73岁。富兰克林·罗斯福非常伤心，詹姆斯为人友善，虽不聪明但很可靠。他在遗嘱里给富兰克林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这对于改善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很有帮助。埃莉诺再也不需要向萨拉讨要孩子们的学费了。1928年对于民主党来说是1924年的翻版。罗斯福和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就豪的职位问题发生了分歧。

作为一个民主党成员，一个有着政治野心的人，罗斯福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机遇。由于豪的支持以及妻子和老朋友的鼓励，他始终坚信自己将成就一番事业。

没有人知道他在20世纪20年代所经受的种种磨难。由于他坚强的意志和不灭的斗志，他最终摘取了王冠上的宝石。即使是与伍德罗·威尔逊10年之久、戴高乐12年之久的等待生涯相比罗斯福身体上遭受的折磨也不知要大多少倍。

罗斯福通过这些年的磨炼，铸就了坚韧的意志。他也因此获得了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家精神。最终凭借着这种精神，他在人类历史上书写了一段关于信念、勇气和智慧的新篇章。

---

1. 因为海鲈鱼的英文是Jewfish，是犹太人（Jew）和鱼（fish）两个词拼写而成的。——译者注

05
用你全部的聪明才智，来解决这个州的问题

1929年1月1日，艾尔弗雷德祝贺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纽约州州长

I

罗斯福18岁的儿子埃利奥特无疑是他有力的帮手。1928年6月17日，罗斯福在其陪同下，一起搭乘火车去参加休斯敦的民主党提名大会。罗斯福又一次被告知要提名艾尔弗雷德·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于是他和儿子一起辗转各地为史密斯举办了多场演讲。尽管罗斯福受到疾病的困扰，而且他的表现也没有4年前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那样精彩，但这些演讲仍在政治上对艾尔弗雷德大有帮助。在纽约，罗斯福的勇气和风度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没有人想到他会参加竞选。在休斯敦，他甚至不用双拐，行动自如而且充满自信，这尤其让人感到震惊。埃莉诺今年并没有参加提名大会，她不习惯提名大会上的喧闹，宁愿和1 500万美国人一同在收音机前聆听丈夫的演讲。

多才多艺的克劳德·鲍尔斯是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他以惯用的深奥语句指出，共和党不可能再现林肯或汉密尔顿时代的辉煌了。

在1.5万名群众的欢呼声中，罗斯福父子走上演讲台，罗斯福步履稳健，看不出一丝曾遭受痛苦投下的阴影。他不吝引用一段话来赞美艾尔弗雷德："无论是活泼可爱的孩童，还是麻木冷血的动物……都用

忠诚和爱信任着他，爱戴着他。”“成功和他如影随形，这就是政坛上的‘快乐斗士’艾尔弗雷德·史密斯。”

罗斯福是一个完美的演说家，他的演讲相当鼓舞人心。他能够同时用一只手做出优雅的手势，另一只手则扶住发言台来让自己保持平衡。他威严地仰着头，宽阔的肩膀后倾，声音浑厚有力。这次演讲空前成功，艾尔弗雷德轻易地赢得了提名，但是公众似乎都把眼光聚焦到了罗斯福身上。

甚至是那位颇有名气的出版人麦考米克也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撰文称赞罗斯福是“民主党中唯一的共和党人”。其他的评论更是充满溢美之词，“罗斯福……他高大自信，古典的轮廓上印着岁月的沧桑”，“……庄严冷静，却又不失祥和的绅士与学者风范……”

艾尔弗雷德本人给罗斯福送去了《纽约时报》的剪报，赞扬罗斯福的精彩表现，并告诉他，史密斯一家人在听到罗斯福的演讲后，都情不自禁叫出声来。事实上恐怕也只有艾尔弗雷德自己是当局者迷，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罗斯福的口才应该用在他自己身上，而不是用在这个矮胖粗犷的艾尔弗雷德·史密斯身上。

很少有人希望史密斯会获胜。柯立芝已经退休，所以共和党方面的候选人将是胡佛，他是哈定和柯立芝这两届政府经济迅速增长时期的商务部长，至今仍很受尊敬。

令罗斯福感到沮丧的是，史密斯选择了约翰·J·拉斯考比担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拉斯考比反对禁酒，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与杜邦家族联系密切，他本人还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财阀。他创建了通用承兑公司，给消费者提供使用信用卡付款的便利。他还率先提出了“鼓励顾客成为持股人，鼓励持股人成为顾客”的观点。

史密斯并非是一个忠心耿耿地坚持改良派观点的候选人，虽然他在纽约竞选时曾坚持这一观点，但他现在是在和胡佛竞争，正如当年戴维斯为了保守派的选票而挑战柯立芝一样。但这根本就行不通。双方候选人宣扬经济繁荣的现状，却没有人去关心那些被繁荣社会排斥在外的人。他们都滔滔不绝地称赞国家的商业领袖，使得这场竞选的焦点最后集中在禁酒令和罗马天主教徒是否适宜出任高级公职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无疑是美国政治史上一个绝好的讽刺。史密斯坚信只有罗斯福才能担当起民主党的重任，没有他就不能与胡佛抗衡，所以他请求罗斯福竞选他现任的职位——纽约州州长。罗斯福和豪则都认为胡佛可以获得连任，在1928年竞选州长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如果再给罗斯福4年的时间，那时他的身体就会恢复得更好，到那时也许就可以拄着拐杖行走了。

史密斯从未考虑过，如果罗斯福竞选州长获胜而自己竞选总统落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并非不可能，但他认为多年的病痛已把罗斯福折磨成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史密斯是个聪明人，但他对上层社会缺乏深刻的洞察力。他并没有发现，罗斯福绝非上层社会里养尊处优的无知少年，而是一个在随性的外表下潜藏着成为美国总统伟大抱负的人物。

史密斯也并没有留意到，在罗斯福参加竞选的时候，他已经从瘫痪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恢复了健康，也能够行动自如了。他也向世界证明了，尽管他的下半身很虚弱，不能够连续站立超过45分钟，但他看起来顶多也就是有点“瘸”而已。罗斯福明白，当他和史密斯在1910年于奥尔巴尼会面时，他们就是站在一条阵线上的战友。当罗斯福越来越了解史密斯后，他就越发崇拜这位州长。这一次，罗斯福也完全明白他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性质的选举，只是他不清楚史密斯究竟有没有看清局势。

总统竞选开始时，史密斯又给罗斯福打了多次电话，试图说服他竞选州长。当他得知共和党的州长候选人是纽约市备受尊敬的犹太裔首席法官艾尔伯特·欧汀格时，他的恳求变得更加迫切了。

民主党需要在10月1日提名出他们的候选人。此时罗斯福去了温泉疗养胜地休养，很难联系到他。他特别嘱咐门房，如果史密斯找他就说他去野餐了。史密斯也不给埃莉诺以喘息的机会，9月30日晚，史密斯告知雷曼将会竞选副州长并打算全力以赴，拉斯考比的公司也会处理好罗斯福在温泉的一切费用。史密斯一方面恳求埃莉诺，一方面又以金钱利诱，但他所献谄的对象罗斯福却并不接受他的好意。

罗斯福的助手们对于是否参加州长竞选也存在意见分歧。埃莉诺保持中立，豪坚决反对。罗斯福甚至给赞成他竞选的安娜发回了这样一封电报："该打你的屁股。"随后打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美国和世界历史，拉斯考比先在电话里游说罗斯福说，他将负责处理温泉的一切费用。那时，史密斯仍然认为罗斯福只不过是一个无能之辈，而且告诉罗斯福可以让雷曼帮助处理政府工作，罗斯福依然每年可以在温泉胜地待上9个月。

雷曼也打电话告诉罗斯福说，如果罗斯福参加竞选州长的话，他就会竞选副州长，并乐意尽己所能为罗斯福效劳。

史密斯在这次长时间的交谈结束时说："富兰克林，告诉你吧，我不想把这件事放在个人角度上去考虑，可是我不得不这么做。"史密斯最后再次询问罗斯福是否接受这次真诚的提名，罗斯福表示他并不想参加竞选，但是如果代表们依然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他也不确定最后是否会同意。罗斯福最终的表态正是史密斯所需要的。

拉斯考比提供给罗斯福一张25万美元的竞选支票，罗斯福退了回去，并告知他决定接受这一提名。后来，有好事者传言，拉斯考比成功地以5万美元贿赂罗斯福参加州长竞选，罗斯福不能不付这笔钱就溜

掉。这样的谣言实在太卑鄙了，因为谁都知道财大气粗的拉斯考比一出手从来都不会少于10万美元（直到现在人们还不清楚为什么拉斯考比不向人们出示那张被退回的支票，或建议进行会计审查温泉基金的账目来驳斥这一谎言）。之后，各种各样有趣的捐献蜂拥而至，埃德赛·福特向罗斯福捐赠了一个玻璃室内游泳池。

第二天，当纽约市市长詹姆斯刚一提名罗斯福为州长候选人时，提名大会上的代表们就都站在了罗斯福的一边。罗斯福接受了提名，他给即将被委以重任的秘书米西·利汉德发了电报："这将会是场精彩的竞选。"

事实上也是如此，共和党不再在媒体上质疑罗斯福参与选举的竞争力。《纽约邮报》形容罗斯福得到提名是"可悲而无情"的。史密斯响应道，基本上所有州长的事务都将会在他现在的办公桌上完成，因此州长并不一定得是一个杂技演员，而罗斯福的智慧足可以胜任州长一职。罗斯福也随后于10月7日在纽约召开发布会，他风度翩翩地讲道："很多人被提名后不得不加入竞争，但是很明显，我并不是抱着不负责任的侥幸心理，我将和纽约州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努力，获得胜利。"他在竞选中精神饱满，雷厉风行，因此媒体们也从未捕捉到他分心出席其他活动的场面，选民们彻底放心了。

随后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有些人争论的那样。"罗斯福其实并不想赢得竞选。"米西断言，如果不考虑罗斯福的身体因素，她也不希望他能当选。路易斯·豪也曾向他的妻子表示了同样的疑虑。毫无疑问，罗斯福面临众多劝说后决定参加竞选，他也就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罗斯福觉得史密斯很可能落败给胡佛，这反而可能是他自己迈向白宫的绝好时机。史密斯在这个问题上对他的纠缠不休和胡佛咄咄逼人的竞选攻势，使得罗斯福越来越意识到，总统的竞选结果可能是具有打击性的。

罗斯福天生就对事态的发展有着敏锐的直觉，当史密斯的恳求无法拒绝时，他认识到也许他当州长正是大势所趋。于是他组织了一支以豪为中心的竞选班底。豪被任命为竞选经理，而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领袖爱德华·J·菲林睿智又内敛，菲林被任命为经理助理。菲林和豪相处得很愉快，菲林觉得豪的许多小缺点看起来很可爱，而豪的政治洞察力也深深感染了他。

雷蒙·莫利是一名41岁的政治学教授，他被任命为分析员和演说撰稿人，他在犯罪问题上尤其得心应手。豪和雷蒙曾在美国国家犯罪委员会里相识。另一名罗斯福的政治帮手是詹姆斯·法利，他是民主党州立委员会新到任的秘书；而农业方面的建议来自罗斯福在海德公园的邻居亨利·摩根索。他对罗斯福夫妇相当忠诚，也是一位成功富有的农场主，还是《美国农业学家》杂志的负责人。他的父亲曾任威尔逊时代的驻土耳其大使，为罗斯福提供过相当多的经济支持。威廉·伍定也是一员重要的资金筹集人，他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发表过一些交响乐乐曲。罗斯福任命塞缪尔·罗森曼为纽约市民主党的领导人，塞缪尔这样形容他印象中的罗斯福："他有惊人的能力，能把一堆枯燥的事实变为一篇激动人心的政治演讲。"

罗斯福雄心勃勃地展开了他的竞选工作，在各个方面扫清了人们对他的偏见，也因此受到了纽约天主教徒乃至犹太人的爱戴。他承诺，他将继续推行史密斯开创的改革，尤其是要为妇女争取每天最多8小时和每周48小时的工时标准。他提议为老人提供补助金，并为穷人制定相关法律解决贫困问题。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号召要善待残疾人，他谈到了自己的遭遇，坚信是家人的爱才让他得以康复，他也希望这种爱应该播撒到每个人身上。

在10月上旬，支持罗斯福的选民还只占到所有选民人数的33%左右。但是，他那饱满的热情、在残疾人问题上的妥善处理方式和迷人

的风度让他在11月初就扭转了局势，甚至有媒体称这次竞选看来难分胜负，甚至已经向罗斯福这边倾斜了。

Ⅱ

11月6日大选开始，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在他们的“司令部”——纽约比特莫尔酒店会了面。当天中午形势就已明朗，史密斯惨败，而罗斯福本人似乎也将失去纽约州长票数。

州长的竞选相比之下要激烈得多，而且选票也十分接近。罗斯福打电话警告迟迟不报投票结果的那些选区的行政司法官员们，以确认他们并非是在作弊。他声称，他可以要求史密斯州长动用本州警察力量去接手计票程序。

埃莉诺的表现并不出众，她没有参与丈夫的竞选。尽管她支持禁酒令——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她的家人因为酗酒遭受了许多麻烦，她倒是非常支持史密斯。“史密斯的竞选才更有意义，至于罗斯福有没有入主奥尔巴尼，相对而言就没那么重要了。”她曾经对她的一个友人说。在竞选结果揭晓后，在接受《纽约邮报》的采访时，埃莉诺也表示对她丈夫是否获胜并不在意。

报纸上开始大肆猜测欧汀格会由于胡佛的获胜而顺利当选州长，但罗斯福没有明确表示他会放弃竞选。在向支持者致谢后，罗斯福连夜回到了家。豪觉得还有一线机会，但他也非常担心：如果罗斯福这次落败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所谓的残疾人不可能竞选成功的理论。

菲林和法利继续待在“司令部”里电话催促着其他选区的选举结果。菲林在深夜打电话，告诉罗斯福，他在纽约市的计票结果已经开始超出欧汀格，胜利还是有希望的。罗斯福并没有完全相信，又接着

睡了。菲林向新闻界发表了不甚友好的讲演，表示会请“1 000位律师”统计竞选结果。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随着更多选区选票统计出来，罗斯福与欧汀格之间的平衡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凌晨4点刚过，结果一下了变得明朗了，罗斯福成功了。萨拉和弗朗西斯·珀金斯以牛奶代酒向罗斯福举杯庆祝。在4 234 822万张选票中，罗斯福只以25 564票险胜。看来不同于反对犹太教的欧汀格，罗斯福选择雷曼作为副州长的候选人，这似乎为他赢得了很多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选票，这些人对罗斯福对他们的自由开明政策表示支持。另外有7万多胡佛的支持者也投了罗斯福的票，他们中大部分是被罗斯福在纽约州之外的选区演讲时的精彩表现和亲民态度所深深打动。

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史密斯表示他将不再参加其他职位的竞选。而那位史密斯出于自身地位的策略性考虑而恳求参加竞选的罗斯福，那位每年在温泉胜地度上9个月假期的罗斯福，却一举成为整个民主党中风头最健的人。史密斯没有想到自己不但竞选失败，还把州长一职让给了自己的后辈——罗斯福。《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已经开始猜测罗斯福将来竞选总统的可能性，这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南北战争后的16位总统中有9位是纽约州的政党领导人。美国南部民主党人看到了史密斯的天主教信仰和反对禁酒的立场让民主党在南部也处于了劣势，开始拥护罗斯福。

组建新一届州政府是罗斯福面临的首要考验。史密斯建议罗斯福保留他主要的智囊团和演讲稿起草人。贝尔·莫斯科维茨女士是前任州政府的秘书长，能力十分出众；而敢于作为、说话尖酸刻薄的州务部长罗伯特·摩西也很引人注目。莫斯科维茨女士深谙如何处理政府事务，摩西则是位有魄力的行政人员。即将到任的副州长雷曼事事都对莫斯科维茨女士言听计从，也会忠实地听取史密斯的指示。因此可以断定的是，当罗斯福在温泉胜地游乐的时候，州政府可能还是得听命

于史密斯。曾与史密斯的竞选班子合作过的埃莉诺提醒罗斯福，莫斯科维茨、摩西和雷曼很可能会置他于不顾。除了埃莉诺以外，弗朗西斯·珀金斯也从别的渠道得到消息证实了这一情况。史密斯的设计可能会有一些成功的机会，但是对于罗斯福来说，他不可能会被这么明显的阴谋算计到。甚至有消息说，这位即将离任的州长仍在奥尔巴尼的德威–克林顿饭店保留了一套住房，罗斯福估计他会自认为能从场外来遥控操纵这个新州政府。

但罗斯福从来都不吃这一套。他完全不在意自己身体上的虚弱，并急切地想向所有人证实州长职务对他来说轻而易举。12月14日，他和史密斯在65大街上的一间房间里会谈了近4个小时。当史密斯建议让贝尔·莫斯科维茨女士留职时，罗斯福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罗斯福称赞了贝尔的过人才能，但并不同意让她留任原来的工作。

他排除了一切有关让摩西仍然担当重任的想法，这位新州长说，他将保留摩西的职位，让他担任州园林委员会兼长岛园林委员会委员，但不会让他做州务部长。他还轻描淡写地补充说，“他有些地方让我恼火。”（摩西曾经预言：“罗斯福可以是一名优秀的候选人，但当州长还略显贫贱。”）

讨论会议在一团和气中结束，对于史密斯仍然固执地认为罗斯福毫无影响力的观点，罗斯福也未加驳斥。史密斯认为州长的职位是罗斯福亏欠他的，但罗斯福并不这么认为，他已经为史密斯的竞选尽了力，他也给史密斯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史密斯没有听从便和他无关了。

据罗斯福说，史密斯12月18日回来看望了罗斯福，传达了让莫斯科维茨女士撰写就职演说的想法，但是罗斯福坚持说他自己就可以写，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渐渐地，史密斯也就彻底打消了让莫斯科维茨女士仍然挂职的念头。

当爱德华·菲林从欧洲度假结束回到纽约时，罗斯福罗列了许多优点，譬如“魅力十足，有说服力”等，来鼓励菲林替代摩西担任州务部长。尽管史密斯从前对珀金斯不大看好，认为她无法胜任州工业委员一职，但现在珀金斯却还在竭力为了留住莫斯科维茨女士做最后的努力。罗斯福最终还是拒绝了，莫斯科维茨女士和史密斯一样将面临失业，而这样也就能更进一步地束缚摩西的手脚。罗斯福最后还是任用了摩西作为园林委员会委员，在史密斯时代的18个政府高级官员中也保留下16个。在得到任用的官员中，珀金斯和菲林都是佼佼者。尽管罗斯福给史密斯提供了比较理想的职位，但是史密斯不再愿意担任除州长以外的任何职位。1928年末，想必史密斯本人的感觉并不好，这就好像他自己在政治上创造出了一个怪物，最后反被自己的造物所毁。

尽管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希望自己的影响力可以在纽约州多维持一段时间，但仅仅6个星期以后，他的光芒就已经被罗斯福彻底掩盖了。如果这看似无限的繁荣景象出现了扭转，罗斯福可能会当上总统。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史密斯的判断出现了失误，罗斯福却走了运，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胡佛则似乎是既缺乏判断力又没有运气。随着这些人的宦海沉浮，世界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

III

州长权力的移交进行得很顺利。罗斯福在1928年的最后一天来到了位于奥尔巴尼的办公大楼，汽车刚停在州长官邸的门前，史密斯就出来迎接，他热情地伸出手：“愿上帝保佑并永远眷顾你。万分欢迎，富兰克林，房间里已经生好了火，住在里面非常舒适。”显然他事先准备了很多这样动听的说辞，之后他们分别亲吻拥抱了对方的妻子。

史密斯夫妇和罗斯福一家共进了一顿晚餐，气氛非常融洽。房间里为新州长装上了电梯，从前史密斯的私人动物饲养园和花房被改装成了一个游泳池。在史密斯最后将要离任之际，罗斯福夫妇仍然对他示以相当深厚的友情和尊敬。随着新年钟声的响起，史密斯执掌纽约时代就宣告结束了。罗斯福对他的前任颇为关心。史密斯毕竟是一位勇敢、杰出的州长，正如罗斯福后来对一位著名传记作家坦承的那样："没有人愿意从政治舞台上退场，凡是真正品尝过那种滋味的人想法都一样。"史密斯就是这句箴言的最生动写照。

新州长正式就职典礼和宣誓在1929年1月举行，罗斯福在史密斯面前表现很低调。这位即将离开的州长发表了离职演说，他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发表演讲了。史密斯对新任州长说了一些发自肺腑的话，尽管其中有一点追悔莫及的意味："富兰克林，我希望你能够用你的全部聪明才智，来解决这个州的问题。"

在罗斯福的演讲中，他再次歌颂了他的前任，承诺将会在史密斯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并极力减弱共和党人狭隘的政党观念。他们的施政纲领很相似，但是在规模和反响上有着很大的反差。1929年1月13日，此时留在了纽约市的路易斯·豪，则已经悄悄开始负责起罗斯福的总统竞选工作。豪代表罗斯福发表了对于1928年总统竞选的经验总结。罗斯福和豪再一次与千千万万民主党人团结在一起，总结了共和党人获胜的理由，他们得出结论，民主党的失利是因为"对民主党的党纲不够重视，也没有阐述清楚……没有采用美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但史密斯毕竟落后共和党人700万张选票，这么大的差距并不是仅仅靠取悦反天主教的歧视者就能弥补上的。

罗斯福一家非常好客，在奥尔巴尼时，埃莉诺每天下午都会举办一个茶会，每周会举行多次晚宴，并且每周至少放映一部最新的电影。

这位新任州长的日程中也体现了他一贯的充沛精力。温泉胜地的勒罗尔·哈巴尔德医生曾公开表示，罗斯福只要每天能保持12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身体健康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但罗斯福对医生的话置之不理。每天8点，罗斯福被管家叫起床，接着在床上吃完早饭，读完报纸，洗漱一番后就下楼会见一些来宾，大概10点半时他开车去办公室处理一小时左右的文件。午饭就在办公室内解决。然后经过一整天的忙碌之后，罗斯福一般傍晚6点多钟回家。当然，有紧急事件除外。他经常在家里处理一些工作，直到深夜才休息，所以也总是睡得很香。这样的作息时间并不是病人理想的生活方式，但罗斯福非常适应，而且总是红光满面。

罗斯福从不认输，而且永远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甚至在收到邮件炸弹时也是如此。当罗斯福后来得知这个恐吓邮件只不过是一个失业的公务员为了得到些钱财而制造的恶作剧时，罗斯福就给他寄了100美元，并让珀金斯替他安排了工作。

为了对付纽约大多数小报受共和党控制的局面，罗斯福号召民主党富豪们每年拿出1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民主党新闻处，加强民主党的新闻宣传工作。

同时，罗斯福也是美国政治人物中尝试利用广播进行广泛宣传的第一人。每月至少有一次，罗斯福会在全国性广播节目中露面，对着麦克风发表精心准备的演讲稿。他给人的感觉非常亲切，就好像是在每个听众身边一样。

议员选举的时刻到了，罗斯福为了民主党能取得优势加快筹备工作。比起他在海军部队时的豪爽，现在更是毫不吝啬地资助竞选活动。他在每一个部门和机构中都安插了民主党人，而这些被任命者无一例外地保持着对民主党的忠心。

罗斯福主张成立一个农业问题委员会来与共和党竞争，这使他成为近代第一个关注农场主利益的民主党人。他以农场主的身份，提出对农业救济、植树造林、由州政府来开发电力资源等问题。纽约州拥有19万个农场，比堪萨斯州还多出3万多，但在史密斯时期却忽视了这广大的农场主的利益。因而，这些农场主们在罗斯福的政策中尝到了甜头，在政治上也开始支持罗斯福。

罗斯福还提议斥资2 500万美元，建立一项老年人补助金保障制度。为了减缓这一社会矛盾和压力，他批准为一些有能力照顾老弱者的机构发放许可证。

罗斯福关于水利设施的倡议让他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作为这个事项的主要倡导者，共和党进步分子、参议员乔治·诺里斯认为，虽然他对罗斯福没有承诺给综合性国营企业参与建设竞争表示遗憾，但他仍然很赞成这个提议。罗斯福也要求组建一个考虑使用者利益的股份评定机构。但议会认为，在反动的共和党掌握参议院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重视罗斯福的建议，认为他与诺里斯的理想在纽约是没有办法启动的。

显然罗斯福通过这项议案给自己赢得了很多回旋的余地。为了减弱罗斯福在水利建设上获得的优势，共和党领导人在1929年圣诞节前夕向罗斯福提议，建立一个五人委员会解决圣劳伦斯河上的水利设施问题，并为1931年的议会提供咨询。罗斯福认真思考后，似乎也同意了这一提议，并向他的对手表示感谢。他的对手们因此认为罗斯福现在并不具有显著的优势，对于罗斯福的回应彻底放松了警惕。

但这却是罗斯福最拿手的“以退为进的政治柔道”策略。其后，罗斯福宣布了国家参与发电计划的成功和共和党人在这点上的失败。他运用惯用的夸张手法说道：“这是我生命中最高兴的一天，也是纽约州人民最重要的一天。”他将共和党的建议看作是投降，而不是对他胜利的阻碍。共和党人不但没有收到压制罗斯福的效果，反而促使罗斯福

借此机会进一步承诺，他将在10年内完成这项工作。罗斯福给史密斯发了封电报，并收到了热烈的祝贺和回复，就像运动员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进球而得到了裁判最后的肯定。总之，所有赞成这个计划的人都加入了庆祝的队伍。

公众并未注意到这一事件的内幕，然而他们的大致印象则是，一个在政治上锐意进取并且相当高效的州政府已经形成了。无论是政治团体还是大众传媒都在赞扬罗斯福的智慧，就连对罗斯福能力持怀疑态度的瓦尔特·李普曼也将这样的进展称作“彻底的胜利”。

在选择公共服务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时，罗斯福听从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建议。这位教授对罗斯福百依百顺，以求得以进入罗斯福的行政班子，因为他预见到罗斯福的政治生涯将会前途无限。

在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阴暗面。美国当时充斥着愚昧的孤立主义、大规模的官僚腐败和种族隔离政策，而且对当时占人口总数10%的黑人也存在歧视与压迫。经济基础很不稳固，而且这种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很快得到了证明。美国的经济被工厂主和金融家冷酷无情地操纵着，绝大多数人盲目相信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永远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Ⅳ

富兰克林·罗斯福这10年来将自己的大多数时间用在思考上，所以在身体日渐复原和逐日冥想的过程中，他意识到社会的许多不足之处，从而避免了与它们同流合污。这可能也是他的疾病带给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优势。

那时，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最活跃的一位政治家。他彻底改变了整个意大利，并且让世界开始关注意大利。

1929年3月，利率的急剧波动暗示着华尔街牛市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这一现象极为罕见，在距当时最近的7年中只是偶有发生。“黑色星期二”之后的第一个月里，罗斯福还没有意识到灾祸已经降临，但他仍对经济制度中存在的盲目追求利益和欺诈性的股票买卖持正面观点，正如20年前的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一样。

3月29日，罗斯福警告说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严峻——他还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州长。他看到了很多诸如周期性、技术性的原因，也因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社区紧急事件的救济、创造就业机会等。尽管他并不是很热心此事，但这毕竟也是一个开端。罗斯福常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好比他认为经济繁荣并不稳定，急需一些改善措施。但由于他在经济方面并非一个行家，他并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具体操作。

拉斯考比和史密斯一派面对每况愈下的经济情况，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民主党还没有着手在经济政策上去攻击共和党。拉斯考比谴责胡佛过于放任经济发展。在罗斯福看来，这是一个理想的战略，因为这两人已不再积极坚持改革，他们过于关注反对禁酒令。史密斯也已经和拉斯考比及其他的富人朋友们搅在一起，现在只有罗斯福一人坚持改革。

在1930年4月26日的杰斐逊纪念日演说中，罗斯福宣称美国50%~60%的公司企业控制了美国80%的经济资源，金融市场的垄断问题也非常严重。“如果托马斯·杰斐逊仍在世的话，他早就会质疑如此集中的经济控制力。”他义愤填膺地说。

早在罗斯福下定决心竞选州长时，他就考虑到要领导尽可能多的选民，要在电力改革、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建设上做出了很多努力；

他执政清廉，也不在党派钩心斗角上大做文章；他善于利用无线电广播感染听众的激情，而且他庄严的演讲也为他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在1930年6月30日的盐湖城州长会议上，罗斯福第一个提出了要加强对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和对老年人的救济。另外，他也反对单一救助，他提倡用保险来对抗失业，而不是毫无区别地给所有无所事事的人发放津贴。

罗斯福声称，“正是胡佛一手捏造了‘只顾高工资高收益，而不考虑供需平衡的新经济繁荣政策’”，而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

罗斯福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是解决纽约市的腐败问题。因此，希望同罗斯福共同竞选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抓住了坦慕尼厅的贪污丑闻不放。虽然罗斯福没有受到坦慕尼厅过多的影响，但是他确实依靠坦慕尼厅获得了部分选票，尤其是1929年纽约市长沃克的巨大优势也证明了这一点。纽约州地区法院方面也麻烦缠身，尤其是有人揭发一位被谋杀的赌徒曾经贿赂了纽约地方法院的法官瓦特尔。沃克和坦慕尼厅主席回应说，尽管这个名叫瓦特尔的法官是向坦慕尼厅花钱买来的职位，但实际上也是得到罗斯福任命的。共和党声称，罗斯福是坦慕尼厅种种龌龊勾当的同情者和纵容者。

沃克市长和坦慕尼厅的民主党党魁约翰·克里立刻做出了回应。他们透露，瓦特尔实际上总共收受了3万美元，然后把他保释了出来，并让他免受审讯。

共和党要求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并要求州长对这件丑闻做深入调查。1930年7月20日，罗斯福在给民主党的公开信中巧妙地表示，州立高级法院有权力调查此事，而且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他还准备让司法部长召集大陪审团来对瓦特尔做出审判。

在要求采取行动的强大压力下，罗斯福以超越党派利害关系的姿态，将此案交给了共和党的州司法部长。他在采取了这些不同寻常的步骤后，就想办法让这些共和党的调查员陷入繁文缛节之中，而自己则退居一旁，避免使自己直接卷入那种以调查为名而对坦慕尼厅进行的攻击。同时，他的耐心解释也让坦慕尼厅认识到，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之。因此，这件事并没有像共和党所期望的那样损害他与坦慕尼厅的关系。

共和党州长提名大会在1930年9月25日举行，前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并定下了“只颂扬胡佛政权，淡化本地共和党人”的口号。共和党最后以3:1的比例赞成取消禁酒令。罗斯福也随即告知民主党的主要发言人，要求他也表示“号召取消禁酒令，并允许州内贩卖含酒精饮料”。

罗斯福并不打算让共和党用计胜出。和他的前任不同，罗斯福出言谨慎，尽可能避免因禁酒令的问题再让民主党内部发生分裂。纽约的共和党人还在观望是否提名一个主张不禁酒的州长候选人和一个主张禁酒的副州长候选人，这一举动被罗斯福讥笑为“两栖鱼”，他甚至还用“两栖鱼”的拉丁词语来特指共和党人的选举人名单。

9月30日，罗斯福再次被提名为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罗斯福利用政党大会之机，确立了一个忠诚的助手班子，任命法利为州民主党主席，而弃用了史密斯提名的人选。和豪以及菲林等人一样，法利也愿意永远追随罗斯福。豪创作了第一部政治脱口秀电影——《罗斯福记录》（第一部未加删节的脱口秀电影诞生在1927年）。这部未加删节的脱口秀电影被上百家电影院预订，并且在民主党的整个竞选期间，在民主党的阵营中不间断地播放着。

罗斯福的另一常用策略也派上了用场，那就是夸赞理性的共和党人中的佼佼者，这种怀旧的情绪无疑激起了罗斯福追随者中的改革派的斗志。同时，罗斯福筹措到了非常充足的竞选资金，这主要得益于

身在好莱坞的制片人亨利·摩根索、他1914年的对手詹姆斯·杰拉尔德大使和成功的铁路实业家。埃莉诺的姐妹们则负责印发传单，传单上印有纽约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用电器价格对比表，以至于附近的人在很久以后还在谈论“蛋糕烤箱竞选活动”。

罗斯福的竞选队伍在胡佛统治下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上大做文章。他语带讥讽地引用了胡佛在1928年竞选时所做的一些演讲。胡佛特地派了一位高级官员来纽约回答罗斯福提出的问题。

这次的竞选丝毫不同于两年前的那次竞选，当时罗斯福只不过是临时决定要参选，而这次罗斯福和他的助手们则都准备得相当认真。他掌握着可信的资料，也不必再去忍受史密斯（他很少在这次竞选中出现）的横加指责，他也不用再在共和党两年前的“太平盛世”下逆风前行了。

罗斯福是在11月4日的晚上知道竞选结果的。只有他的家属和亨利·摩根索、史密斯等亲信才准许进入他的私人寓所。到了晚上9点钟，他收到了塔图承认竞选失败的电报。当他回到家时，他在纽约市取得压倒性胜利的结果也很明朗了，甚至超过了两年前的沃克，并且在纽约边远地区也有很大的优势，这种情况在十几年来是从未有过的。他的票数几乎是1924年史密斯夺魁时38.7万票的两倍多，更是远远超过塔图。这是罗斯福卓越的战略思想和竞选智慧的第一次集中体现，也是以后多次竞选举胜利的预兆。连埃莉诺也比两年前热情多了，她因为第二天有课所以早早入睡，但是她在给罗斯福留下的便笺上写道：“送给你全世界的祝贺和爱，这是一次全面的胜利！亲爱的，你太棒了，祝你在以后两年里好运，上帝保佑你！”

还在丑闻困扰中的坦慕尼厅则给这位州长留下了简短的信息：“纽约地区91%的支持率，其他边远地区为71%”。由于罗斯福提倡禁酒的副州长候选人的帮助，他在边远地区也不可思议地获得了16.7万张选票，其中有很多选票是从共和党的支持者中争取来的。

民主党走势强劲，自从1916年以来第一次控制了众议院，并且把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领导人数减少到了两人。而这两个进步主义派的罗伯特·拉夫特和乔治·诺里斯，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而已。

通向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道路并非像罗斯福想象得那样容易，他一直致力于在民主党召开政党代表大会之前积聚起足以拔得头筹的领导力量。要想获得最终的提名，罗斯福必须通过层层选拔并获得2/3代表支持的绝对优势。历时艰辛，罗斯福作为参加过3次提名竞选的老兵（分别是1912年，威尔逊获胜；1920年，考克斯获胜；1924年，戴维斯获胜），他知道如果在政党提名大会之时没有明显的优势的话，结局将会是很危险的。为了击倒竞争初期就可能出现的对手，罗斯福在初选大会上措辞激昂。尽管他在1930年第二次竞选州长时把坦慕尼厅腐败丑闻处理得十分得当，但是这个事件在全国性竞选时仍会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在政党提名大会逐渐临近之时，这件事并非不值一提，而是涉及了非常出名的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本人。

罗斯福近乎完美地掩饰自己没有任何竞选总统的野心。1930年11月，他写给埃莉诺一个非常活跃的妇女选民团体代表的信中透露："我自1892年以来看了太多白宫官员的尔虞我诈……对于成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我并没有太大兴趣。"他这么说就好像一个年轻人想过过嘴瘾，以此来减轻心中翻腾着的抱负。他请求布朗克斯地区有名望的政党领袖爱德华·弗莱因负责全国代表的宣传事务，但是弗莱因认为自己寡言少语，并且他得照顾家人和孩子，没办法在全国各地游说。于是，罗斯福又请求法利出马，法利很高兴地答应了这项工作。豪在麦迪逊大街上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总统提名竞选办公室，凑巧的是，这条大街和比尔特摩酒店正好位于两条交叉的大街上。

1930年选举刚一结束，拉斯考比随即就给胡佛写了一封示好的公开信。这封信的署名是前三次获得提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密斯、戴维斯和考克斯），以及即将成为众议院议长的民主党领袖约翰

·N·加纳，还有参议员约瑟夫·罗宾逊。这封信表达了两党制对于加速经济复苏的好处，并声称要摒弃民主党内长期以来对高税收的反对意见。拉斯考比仍然努力把民主党转变成一个重商的新党。这种观点后来被瓦尔特·李普曼概括为：凡是拉斯考比认为对党派有经济贡献的人，都可以成为政党受宠的中坚力量。

由于史密斯还沉浸在对罗斯福的偏见中，他居然也同意了自己成为增选上来的候选人，这种作风实际上是与他以前即使失败也要堂堂正正的风格并不相符。

拉斯考比的下一步棋打算在1931年2月10日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而且赶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之前召开，为的是转变民主党的态度，完全主张废止禁酒令、倡导高税率，这些主张和一年前被否决的议题基本类似。罗斯福和豪认为，这一举动实在是对他竞选活动先发制人的保守进攻。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法利收集反对这些不利观点的舆论报道，另一方面罗斯福通过信件、电报和电话来向其他民主党人质询，以表示他对这种试图篡夺党内领导权的先发制人举动的抗议，他认为这简直是共和党人胡佛派来的特洛伊木马。

3月2日法利召集纽约民主党委员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斯福、豪、菲林和法利起草的一份旨在谴责拉斯考比的提案。当3天后全国委员会议召开时，虽反对天主教并提倡禁酒，但在1928年和史密斯配合竞选过副总统的参议员罗宾逊，用傲慢的口气做了一篇指责拉斯考比的讲演。接下来的史密斯的讲演稍显中立，看着这样的局面，拉斯考比实在大丢面子，他只好收回了自己的倡议。至此，第一个尝试破坏罗斯福竞选的阴谋完全失败了。

罗斯福的一个重要的军师和经济赞助人就是威尔逊时代深藏不露的巨人——爱德华·豪斯，他是罗斯福最早的总统竞选班底中的15名成员之一。豪斯是与威尔逊时代老民主党员沟通的便捷桥梁，他也不欣

赏以前民主党候选人（考克斯、戴维斯、史密斯等人）惯用的派系分裂手段。他经常出入白宫，将民主党视为一个改革的党派。

正当罗斯福准备离开纽约去温泉胜地享受其一年一度的4月假期时，他得知远在法国的母亲染上肺结核的消息。因循罗斯福家族的传统，罗斯福放下了所有的事情，穿越大西洋和儿子一起去了法国。当罗斯福抵达时，母亲的病已经好了大半，他在法国待了5个星期，和伊里亚特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的战场。罗斯福欣喜地发现，以前那些分散着的农场和城镇都已经得到了重建。同罗斯福一块搭德国蓝色豪华邮轮回来的有一个叫查尔斯的人，他曾任副总统，现在是美国驻英国大使，和罗斯福在头等舱中吃过两次饭。这两次晚餐非常成功，查尔斯在他的日记本中回忆道："如果罗斯福是下任总统的话，他将会全身心地为国家和自己的荣誉尽责。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的实力、协调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6月12日，罗斯福在格罗顿公学的学位授予大会上发表了讲演，并且得到了皮博迪的衷心称赞。而在罗斯福的讲演中，也可看出他对皮博迪这位他从前的校长的无限敬意。罗斯福的四个儿子都出席了典礼，小富兰克林和约翰还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詹姆斯已经和一个热情美丽而又高贵的姑娘结了婚，他一心想开创自己的保险公司，并不喜欢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习。他打算退学从商，用他父亲的名义，靠他有钱岳父的人际关系和经济援助在商界搏上一把。

第二天，豪斯上校在马萨诸塞州农场为罗斯福召开了一个大型欢迎宴会，这个州大多数民主党人都来参加了。出席者中有一位史密斯以前的竞争对手，他就是政治家、现任波士顿市长的爱尔兰人詹姆斯·克里。克里后来劝说罗斯福来访问马萨诸塞州的初选大会，并保证罗斯福肯定能够在选举中获胜。听信克里的承诺是罗斯福全盛时期鲜见的错误之一。见多识广的豪斯在1933年曾推荐克里为美国驻意大利大使，结果没有成功。

法利于1931年6月29日开始了征集民主党代表的全国巡回演说，该举措也是为了先发制人地预防对手的攻击。罗斯福、豪和法利一起拟订了行程，这时豪多年来与大量政党组织打交道的经验派上了很大的用场。法利的政治地位也很突出，他热情饱满，非常乐意为民主党四处奔走。他在民主党三位候选人罗斯福、史密斯和商人欧文·杨之间持中立立场。

法利送回来的报告说，他发现只有为数不多的选民支持史密斯，这些人多半是军队中的罗马天主教徒或是反对禁酒令的民众。威尔逊时期的战事理事长也被选民多次提到。至于罗斯福，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支持率则不是很高，法利分析了一下原因，认为作为当地宠儿的候选人威廉·麦克阿多在当地人气很高，而且麦克阿多一心希望自己成为罗斯福和史密斯的中间角色来取得优势，但实际上往往是政治家过于天真的幻想而已。

其实，法利最担心的问题还是罗斯福的身体情况和精力。当他回到纽约州时，发现罗斯福已经放下竞选事务，看《自由》杂志以暂时休整一下。在这期1931年7月25日发行的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写道，这篇文章的作者、资深记者露克跟随医疗队对罗斯福进行了跟踪调查，并陪同州长访问了很多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罗斯福要比小他10岁的人遭受更多的痛苦。

罗斯福对记者在他身体残疾问题上做文章表示非常生气，指责道："实在是低俗的文章!说什么我重心不稳、走路蹒跚，这全是胡扯。你也知道，我装了一个支架固定我的膝盖，有一次我演说的时候是因为支架出现了问题，我的身体才倒向一边。我现在身体很好，工作起来也精力充沛，我实在没看出来这篇文章到底在说什么。"罗斯福的这些话是想佯装他只是装了一个支架，而并非两个。这些和他7年前一封信上的内容有矛盾，当时他抱怨自己不能在柯立芝的荣典上站立自如。当时他写道："我佩戴了一副膝盖支架，拄着双拐，就好像有了

两个人的帮助，但实际上我感觉并不舒服。”这两次的不同描述并不是因为身体的恢复已取得多大的进展，其实不过是他想要把自己病痛的严重性最小化罢了。

V

直到1931年秋天，经济大萧条的趋势仍在恶化。这时候，城市里无所不在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等待免费发放面包的队伍、卖水果的小贩、硬纸板拼接起来的贫民区，以及城市空旷地带丢弃的废金属碎片搭建的房屋。这些经常被称作“胡佛村”。悲哀的是，胡佛本人对这种震撼全国的现象并不了解，他还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水果商贩是市场经济下自然产生的一种职业。他解释说，卖水果可以让一些聪明的人从他们原本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去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他对这种状况的想法也表明，他似乎从未跟这些社会最贫穷的失业者在街上碰过面。他的这些话在大萧条后不久被大篇幅报道出来，这样的回忆也导致了他其后政治生涯的改变。

失业人口不断攀升，达到了400万。到了1930年夏，已经有9%的工人失去了工作。1931年的失业人口大概又翻了一倍，并且一直到1932年都还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1931年1月，罗斯福召集了周边几个州的州长在奥尔巴尼开了一次大会。他反驳了一些州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杰斐逊主义式的右派做法。来自华盛顿的专横态度也证明了纽约州在这项事务上的特立独行。但是，此时罗斯福认为解决失业问题也确实需要一个国内通行的方案，因此将国内的经济形势看得如战争般危急。

从1929年8月到1931年，股票指数几乎每周下跌一半，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到1932年依然狂跌不止。1930年，钢铁产量下降了30%，小汽车产量下降了55%。在城市信托公司破产后（更多是因

为公款挪用，而非大萧条的原因），纽约第一起大型银行的倒闭发生在美国联邦银行，这家银行于1930年12月10日倒闭。城市信托公司在以前是意大利籍美国人常去的地方，而美国联邦银行则是犹太人建立的机构，常常被谑称为“小气鬼的银行”。在这一事件中，绝大部分是因为单纯的管理不当造成的，但是后来也有人披露，坦慕尼厅与这些机构存在某些关联。

罗伯特·摩西受副州长雷曼指派前来调查城市信托银行事件，他曾经发出过美国联邦银行也将会破产的警告。虽然对摩西怀有厌恶情绪，但也没有阻止罗斯福任命美国联邦银行的行政长官帕莱克为处理摩西调查意见委员会的负责人。（很多调查结果都被共和党议员们忽视了，他们也并不清楚，罗斯福在这方面有没有对结果施加压力阻止其通过。）

在银行业务处理上，罗斯福一般都是听从雷曼的意见，因为雷曼长期受到华尔街金融市场的熏陶和历练。雷曼的建议也符合当时绝望时期中金融机构管理的实际和能力。1930年10月，罗斯福一边竞选连任，一边召集美国联邦银行的代表和其他一些大银行的代表在他家中召开了一次会议，寻求办法以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这次谈话看似很有成果，但实际上并不成功，但是在一系列恰当的管理和规定机制下，至少美国联邦银行系统的储户利益得到了保护。

这只是美国银行系统崩溃的前奏，其后的两个大型银行也随之倒闭。罗斯福并没有表示他对任用帕莱克为银行委员会委员的困窘，此时一些观察家的言论也及时、公开地表示要保证储户的利益。那时候美国还并没有过多强调保护储户的利益，只是可能有些储户出于个人的警惕考虑去买保险加以保护。如果银行和信托机构自己都身处困境的话，储户的利益也就很难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伤感情绪很容易产生并且很容易传染；在这种危急的时刻，政治敌人很容易抓住机会加以渲染，当时上街游行抗议的

事情也屡见不鲜。尽管这些预兆都已摆在眼前，但是共和党议员们居然虔诚地相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反对罗斯福州长关于保障储户利益的提案，这就给罗斯福竞选的火药桶中又增加了一枚随时可以引爆的手榴弹。

纽约市贪污丑闻的调查仍然折磨着罗斯福，西伯里的调查进展缓慢。西伯里打定了主意要引起公众对改革的重视，当然他也想顺便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这位法官曾经非常尽职尽责地处理业务，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罗斯福挨过困境。但是整个1931年，公众对于罗斯福和坦慕尼厅的关系议论纷纷，这的确让罗斯福很不好受。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西伯里的主要顾问克莱塞尔又在美国联邦银行倒闭的事件上受到牵连，并被勒令从法官委员会中解职，尽管他的工作很出色。在纽约市长沃克奢侈无度的拜占庭式迷宫中，精于世故者和玩世不恭者随处可见，他们就像中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灵感启发者，让调查工作很难进展下去。

这时，纽约的一些妇女被误判卖淫，但她们又没有钱交保释费，结果身陷囹圄。当西伯里将此事曝光后，见怪不怪的纽约公众都感到很丢脸。沃克市长也不得不承认他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很震惊，随后躲到棕榈泉度假去了。这越发加重了罗斯福的忧虑，他按照西伯里的建议，给这些涉案妇女签发了6道赦免假释令，并把处理大权交给了西伯里。坦慕尼厅此时又开始散布谣言说，罗斯福手下负责银行改革的监督者约瑟夫·布罗得里克公然地违法乱纪，而罗斯福却听从西伯里的建议，为了保护布罗得里克而把坦慕尼厅当作了替罪羊。

后来，一位被误抓的妇女接受了西伯里派来的调查员的调查，可第二天有人发现这位妇女被勒死在布朗克斯区的一个公园里。这个不幸女人尚未成年的女儿惊闻母亲过世后，一个星期后也选择了自杀。纽约市民之前那毫无顾忌的自满情绪，瞬间转变成了义愤填膺的博爱心理。舆论界一时哗然。城市事务委员会理事长威尔斯和其他一些宗

教团体或民间组织的领导人，包括社会学家诺曼·托马斯和哲学家约翰·德威在内，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控诉纽约市的黑暗，并将其比作《圣经》中的罪恶之城索多玛城和蛾摩拉城。

1931年3月17日，罗斯福参加完一个爱尔兰式的庆祝晚宴后，回到他位于65大街上的家中。一进家门，他便发现威尔斯和社区教堂的主教豪尔摩斯都在客厅里等着他。他们是来提交一篇4 000字的起诉书，里面控诉了市长沃克的十大罪状。罗斯福当时正着力竞选总统，不想把自己的精力过多地投入到纽约市的具体工作。但是他一见到这两位来访者立刻怒火冲天，一个星期后就把沃克的案件移交到了法院处理。

沃克没有让他那些“顾问”提供帮助，而是自己起草了一份声明，虽然条理混乱、用词情绪化，但是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在解释他的好意，罗斯福接受了他这份声明作为他的书面辩护。后来，罗斯福谎称自己慎重考虑过此事，把辞退沃克的建议否决了，州议会成立了纽约市政府调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此事。同样也是在州长的任命下，西伯里负责这项调查。

看来罗斯福对于沃克有些放纵，他只是将沃克看作一个恶作剧似的人物，时而像个风流的无赖，时而又是一个可圈可点的政治人物。从这件事上，他认为威尔斯和他的助手们多少有点天真不理智了。（罗斯福非常看重威尔斯，自1929年为老年人争取福利救助之后，就对他委以重用。）威尔斯在各个方面都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经表态，不会给予被起诉的欧洲犹太人帮助，但他会支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像威尔斯这样敢做敢为的人，或许到最后会发现他们草率的决定是错误的，就好比这次沃克事件一样。

罗斯福竭尽全力去捍卫地方政府那带有欺骗性的纯洁与正义，在以后一段日子里，他仍然用那些陈词滥调去宣扬城市间的平等权利。在审时度势几个月后，他便开始张满风帆地主动出来挑战了。在这样

的主动举措中，罗斯福也有过许多次被吹落到民心丧失殆尽的边缘地带。

西伯里并没有催促由坦慕尼厅任命的地区法官托马斯·克莱下台，因为在很多条被告发的罪状中，许多都是跟他的领导人有着紧密联系。克莱本人也是出了名的不理正事，成天混日子。沃克和坦慕尼厅民主党党魁克里已经放出话来说，不管西伯里如何处置克莱，他们都将再次提名他当法官，所以西伯里也不得不听之任之。

按照州立法院法官关于上诉的司法规定，西伯里要求罗斯福增设一次特殊的开庭审判，以便给予一些证人法定的豁免，这样法律程序就会加速进行。罗斯福刚刚度假回来，虽然并没有多大热情来处理此事，但还是准许了这项要求。

VI

在1931年6月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州长大会上，罗斯福抓住机会，提出了要解决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的计划。他详细地提出了诸如减税、建立更人性化的税率机制（比如说从有钱人身上征更多的税）、资助失业者、完善健康保险等建议，当然他还提出要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建立更和谐的平衡。

计划中最后一个意见其实是对长期被忽视的农民的一个小小安慰，计划也模糊地规划了如何让农村的年轻人更愿意留在土地上。这与强制性地让城里大量的定居者回归农村相比，罗斯福更了解前者的可行性。毕竟罗斯福有着浪漫的保守主义情结，加上受到西奥多·罗斯福的乡村生活的影响，以及他从前童子军赞助人身份的影响，所以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表露出他的这种倾向。在很多被大萧条折磨的地区，回归土地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是成功的例子却很少，而且

想要让城市变得人口稀疏也是近乎异想天开。由于这个计划，罗斯福又一次成为了州长大会上的明星。

珀金斯在1931年秋天考虑的是纽约州100万失业者的问题，这个数字无疑是空前绝后的，但又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也就是说，纽约州24%的工人都已经失业，在下一年这个数字又会攀升到将近34%，全国的状况也是如此。经济危机好比《旧约》中形容的大灾难一样，克制的美国人民已经不能再忍受这样的灾难，他们的灾祸之船正驶向另一个世界，可惜也不是祖先神话中的美好世界。

罗斯福将失业问题看作当务之急，他授权塞缪尔·罗森曼起草一份关于在紧急时刻给失业者提供食品、衣物和住所，并尽可能提供救济的救济法案。考虑到罗斯福对于直接施舍的厌恶——直接给钱打发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在大萧条的时代，罗斯福偏向于建立工作福利制度。罗斯福在1931年8月28日将他的意思分别传达到了议会的每个成员，并且迅速有效地成立了“暂时紧急救助中心”，这也是为了能在当年冬天就能把设想落到实处。政府通过对相当富裕的人士有节制地增加附加税的方法来给这个机构提供资金，其实税率也算合理。

罗斯福在法令中表达得很清楚，他认为胡佛应该为国家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负责。他还谴责胡佛，既不让那些有钱老板为百姓谋福利，也武断地拒绝直接给百姓福利的可能性，总统要为此负责。

到1931年10月上旬，“暂时紧急救助中心”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在举国上下同大萧条和高失业率斗争的年代，罗斯福无疑利用这一机构把其他政治家或是政府领导人都抛在了后面。当时，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其他州政府大都没能快速地对这场危机做出反应，所以罗斯福的行动得到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和赞扬。具体实施主导者是罗斯福的朋友和资金赞助人——杰西·斯特拉斯。“暂时紧急救助中心”的策略是拉拢西部的进步主义派别人士，并向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示好，尽管

这些人在选民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仍然很有帮助。1931年4月的民意测验表明，罗斯福作为候选人的领头羊地位已经大大得到了巩固。

该救济项目的具体负责人是一名42岁的民政工作者，叫哈里·霍普金斯，他来自艾奥瓦州。在同罗斯福一起迎接惊天动地的挑战过程中，他逐渐成了罗斯福最亲密的伙伴，他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合作者。霍普金斯身材消瘦，做事认真，烟瘾很大，酒量惊人，但是他聪明绝顶，精力旺盛，性格和能力都出类拔萃。到了1932年2月时，“暂时紧急救助中心”已经给16万纽约人民提供了援助，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失业率在6个月内也上升到50%。罗斯福根据这种情况，要求“暂时紧急救助中心”一定要延长工作时间并且提高工作效率，又进一步划拨给它500万美元的款项，并提议利用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发行总价值为3 000万美元的专门债券来推动救济工作。罗斯福同时保证，到1934年更要拓展该中心工作覆盖的地区，只要是经济危机的受灾群众都应该得到帮助。这次经济危机让共和党人也感到了责任在肩，他们竟然一反常态地同意罗斯福所提出的提议（事实证明在1932年的公决上，发行特殊债券的想法得到了极高的支持率）。为了实现罗斯福对农村生活的浪漫主义的憧憬，他提议“暂时紧急救助中心”为那些到农村定居的失业者供以补贴，并给他们发放农具，教授农作物培育技巧。“暂时紧急救助中心”在6年中帮助了500万人民，其中有60%是纽约州外的民众，共花费了155.5万美元。到1937年，已经有大概70%的人可以不再依靠政府的救助了。

当时，史密斯不过是出于竞选战略的考虑才恳求罗斯福竞选州长，现在他不仅遭遇了挫折，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接班人地位迅速上升。史密斯为了非难罗斯福，没动脑筋就急着置自己的立场于不顾。1931年10月15日，他对罗斯福最得意的政策提出了挑战——11年内发行1 900万美元的公债用来购买荒地，植树造林，并留出开采用林和公园规划场地，这样既能够利用土地又能够在环保的基础上获得经济收益。史密斯将这种办法视为社会主义化的工程，他认为这样一

来，州政府就得插手木材市场并同私营企业进行竞争。实际上，这种理由和史密斯从前大力倡导政府开发水力发电的构想是完全矛盾的。

菲林和雷曼就这个问题分别去找史密斯谈过，在史密斯帝国大厦的办公室里，他们问起史密斯能否履行他竞选失利后许下的退出政治纷争的诺言。他们两人都对罗斯福和史密斯很尊敬，因此也想把这个问题体面和善地加以解决。

史密斯强调他并没有说过要退出政治舞台，因为在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儿子和侄子都已经破产，还债的责任也只有他这个长辈才能担负。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一打商业借据说道，他可能得用余生来偿还债务了。他当时在儿子们欠款的农村信托公司当主席；而他的前任，也是他从前的经济赞助商，在1929年年底因为财务危机和公司经营问题自杀了。史密斯任职是为了让储户们放下疑虑，这也确实起到过作用。

罗斯福接受了史密斯的挑战，一方面也在谨慎地寻找破解的机会。他写了封信让法利送给州内支持民主党的每个工人。令人惊奇的是，共和党也支持罗斯福的做法，甚至仍把史密斯看作头面人物的坦慕尼厅居然也没有反对罗斯福这位在任州长的指令。罗斯福将提案和修正案通过广播播放，结果在1931年11月3日的全民公决中获得了通过。

罗斯福试图跟史密斯这位前任和解，就邀请他来家里吃午餐。但11月17日第65号大街上的家庭聚会并不融洽。他们两人几乎讨论了全天下的论题，但就是没有提到政治。他们的一个朋友，一家报纸的发行人后来告诉罗斯福，史密斯对于罗斯福的桀骜不驯和自作主张很不满。自从罗斯福就任州长以来，罗斯福从未就任何重大问题征询过史密斯的意见，请他吃饭居然也不提一下罗斯福竞选总统候选人的事。

应该说，史密斯对罗斯福的能力和动机存在误解是不难理解的，但他的幻想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他会因罗斯福只顾谈笑风生，而不提他们之间存在的实质问题而被激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恶化并不能责备任何一人，实质上是由他们现在的职位决定的。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杰出的政治家，可是罗斯福却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

芝加哥市市长安东·策马可在11月5日与史密斯、拉斯考比进行了一次商谈，他透露了想要找一个坚定的反对禁酒令者作为总统候选人，这明显是对罗斯福提出挑战。后来，这位市长还在伊利诺伊州安排了一次选举，其中民主党获得了胜利，如此一来，该州的候选人就是代表民主党的。拉斯考比一再要求芝加哥——美国第三大城市，作为民主党全国政党大会的召开地时，策马可的地位也变得更加重要。罗斯福本来打算在堪萨斯州举行的，在那里政党领袖们还可以为他举办一次画展。罗斯福这边开始意识到，策马可是打算拉票和他竞争了。罗斯福阵营经过努力，确立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杰克逊获得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秘书长提名，此人在政党大会上如果能够提供协助，作用将是无法估量的。

不仅如此，马里兰州州长作为一个坚定地反对禁酒令的民主党人，也被视为是阻碍罗斯福向白宫进发的一个障碍。

伯纳德·贝鲁奇是一个在政治上和财务上非常有进取心的人，他反对罗斯福的一个助手在报纸上的说法，他自己和拉斯考比以及史密斯是一派的，是要来阻挠罗斯福竞选的。贝鲁奇对于罗斯福这样评价道："他不过是个只会提建议的人。"得知贝鲁奇把他形容为"童子军州长"，罗斯福利用这个机会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做了答复。罗斯福写道："当然，我无意之中得知一些人的谈话，他们虽自称重感情，但却笑里藏刀，暗地里对我冷嘲热讽，背着我散布错误言论，却侥幸地以

为他们这些话不会被我知道。”自此以后，贝鲁奇做事就更为谨慎，对罗斯福也更加讨好了。

竞选中的另一张王牌在1932年1月2日也被公开，那就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正如当时发行的《时代周刊》说的那样：“他的影子长长地笼罩在大地上。”赫斯特利用电台媒体严厉责备罗斯福、史密斯、贝克、杨和其他一些他认为会像威尔逊那样危险的国际事务专家。赫斯特建议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隔一天后，他在他创办的所有报纸上又开了一个头版专栏来阐述他的这个观点。但是赫斯特并没有在此事上和加纳进行协商，加纳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加纳对于竞选一事很排斥，甚至在公开场合也不愿谈及此事。但是一旦他当选，就会给罗斯福带来很大的威胁，他将夺去罗斯福可能在西南地区、西部偏远地区的很多选票。因为赫斯特和史密斯之间发生了一场恶毒的争吵，所以赫斯特不大可能和史密斯合作，但是如果史密斯和拉斯考比的那一派落后于加纳的话，罗斯福在政党提名大会上所要面临的激烈挑战自是不言而喻了。

这次也就算是赫斯特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最后一次产生影响了。赫斯特熟悉欧洲的程度不亚于熟悉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拥有敏锐的观察力。结果让人惊奇的是，赫斯特不管在把西方民主引入美国，还是让美国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上所付出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

赫斯特的介入给候选人的态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贝克在1月26日开始墨西哥之旅以前对记者说，他还是希望美国能在国联取得一席之地，他也并不希望民主党党纲中对这件事有所保留。观望的态度让每一个人都不太高兴，但是这证明贝克也很渴望被提名。阻挡罗斯福的政党人士变得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也都在谋求不同的政治需求。

罗斯福针对北达科他州将他列为该州总统候选人一事，于1932年1月22日给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中宣布，实际上当选为总统候选人并不是他所渴望的。在这封信中他泛泛而谈，说了些

诸如“被提名我感到很荣幸，但是我并不能够到你们州开展活动，因为在纽约州仍然召开立法大会时，这样做会显得我对1 300万纽约州民众漫不经心”。罗斯福还是改不了他对美国这个最大的州的眷恋和渴望，当然，这和他那永不能满足的野心也脱不了干系。

过了几天，罗斯福和豪把法利打发到了赫斯特旗下的《纽约美国人》的编辑那儿进行一次拜访。当时其他人也在试图用罗斯福的美德感化赫斯特。法利告诉编辑，赫斯特之所以在1月2日对罗斯福发泄了很多不满情绪，实际上是因为他脑子里对罗斯福的成见所造成的，罗斯福虽然从前主张参加国联，可是现在他的观点也发生了改变。赫斯特没有听进去，又把法利的拜访公开曝了光，他要求罗斯福停止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并且补充道：“如果罗斯福真的想发表自己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声明的话，他就应该告诉美国民众，而不是偷偷摸摸地跟我说。”赫斯特一度认为，罗斯福要想跟他和解的话，就不要这么任性，莽撞地找自己的手下来处理这些问题。

罗斯福现在更加清楚了，李普曼等人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滑头、没有原则、无足轻重的人，而这些人最大的担忧莫过于罗斯福实际上“敢于铤而走险、野心勃勃、从不屈服，对于周围的人都是威胁”。李普曼由于罗斯福在处理坦慕尼厅腐败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已经丢尽了脸，因为他是支持塔图在纽约州的州长选举的。他在兴建水利设施和进行贫困救济问题上，对罗斯福也是尖酸刻薄。罗斯福总是暗示李普曼一些他真正需要做的事，但是就像其他很多的职业政治家一样，也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他总是瞧不起罗斯福。李普曼在1932年是这样形容罗斯福的：“他在任何方面都一无是处，只是举止尚佳，而且他非常喜欢当一名总统。”

李普曼和那些曾经支持罗斯福的人一样，对于罗斯福对赫斯特的姑息放纵态度很反感。罗斯福一直都试图表明，他所认为的经济和政治国际主义两者是不同的，同时也坚持着民主党历来反对高税率的立

场，这一点和拉斯考比是不同的。他还要求其他国家付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美国的欠款。接着，罗斯福宣布放弃对国际联盟的信仰。他也表明，他并不因为在威尔逊时期、在他参加副总统竞选时支持国联的信念而感到不好意思。他解释道，如今的国联并不是按照威尔逊总统当时的构想建立和发展的。他谴责美国的加入将会加速国联的衰退，国联现在“不过是一个通过政治对话解决欧洲国家政治问题的平台”。他认为，国联在一些诸如武器装备等重要问题上并没有发挥本该起到的作用，最后他总结道：“我并不赞成美国加入国联。”

在他所有亲信的关注下，他也反对美国加入“国际法庭”，而这在哈定和柯立芝时代都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但是赫斯特对这位党内领头人的顺从表示相当满意，他已经别无他求了。赫斯特和其他一些国际主义者一样，不再攻击罗斯福了。

埃莉诺此时有着民主党人普遍持有的想法，她对丈夫失望透顶，以至于好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说话，但豪还是坚持劝说她面对现实。埃莉诺的朋友们也拒绝和罗斯福一起用餐，因为不想充当他们两人之间的调解人。正像埃莉诺的一位朋友所说的：“罗斯福的演讲实在太卑鄙了。”

也许演讲确实“卑鄙”，但也收到了实效，从这一点上看，罗斯福是有先见之明的。国联已经蜕变成了纸上谈兵的场所，美国即使加入也无法改变这种趋势，只有美国的军事同盟和民主政策才可能制止战争的发生。美国的公众舆论并不能左右这种高度政治性的政策，一般人也不能大加反对。埃莉诺和她的朋友们除了对一些女权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表达了她们的看法，并没有跟任何人交流意见。

真正让一些评论家气愤的是，他们认为罗斯福对赫斯特这个政治名声不好的暴发户最终做出了让步。但罗斯福也并非等闲之人，他有着战略上的考虑。他需要考虑他的选举，而赫斯特却不用负任何责

任。罗斯福仅仅是为了竞选考虑才向赫斯特让步，待将来一旦当选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他就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

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够对罗斯福构成威胁了，他就是史密斯。而罗斯福在表面上也不像是一个贝克那样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了。赫斯特又不会不计前嫌地支持史密斯，可以说，罗斯福又向白宫迈进了一步。

既然坚持对国联的支持不过是一条死气沉沉的传统的想法，那么对于对权力有着特殊偏好的罗斯福来说，何不用战略政策或怀旧的具体情结来灵活变通呢?

只要获得了勇气和得以安身立命的原则，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会所向披靡。当取得优势需要智谋时，罗斯福也非常够格。不管专家、学者、评论家、军事家或者女权主义者对他如何评价，罗斯福确实是能让共和党下台的卓越民主党人。他是坚强地战胜病魔的男人的典范，是美国最大一个州的成功州长，是极其机敏的政治领导人，也是在危难时刻灵感四溢、体贴他人的长者。国家需要他，也永远能够信任他，因为他对政治总是充满了热情。

第二部分 在大萧条废墟上打造新政 1932~1938



06
要死也要等到11月

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加纳建议罗斯福如何赢得1932年的大选

I

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并没有履行他几个月前曾经对菲林和雷曼许下的承诺，他于1932年2月8日宣布他将会参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这个消息在罗斯福正式开始竞选活动不到三个星期时传了出来。10天后，威廉·G·麦卡杜也宣布他将支持约翰·加纳。史密斯的举动将给纽约的代表大会带来很多不可控因素，麦卡杜也可能吸引很多加利福尼亚的选民支持加纳和赫斯特一派。这样的变化总体上带来的影响就是，原本将支持罗斯福的提名大会变得四分五裂，呈群雄鼎立的局面。

坦慕尼厅身陷道德和腐败的危机中，史密斯和罗斯福的竞争使情况更加危险。他们为了争取到坦慕尼厅的支持，也为了争取纽约以及纽约外其他城市的投票领先优势，都竭尽全力地明争暗斗。罗斯福试图走一条中间路线，想让坦慕尼厅有足够的机会洗脱罪名。罗斯福对坦慕尼厅宣称，要在奥尔巴尼成立最亲民的政府；对于纽约和其他城市的改革派而言，罗斯福也是扫除纽约几十年来腐败的先行者。而且他也有坚定的决心要铲除这一陋习，防止沉渣泛起。但罗斯福似乎并不能在这根钢丝上走得太久，因为这一机构也在谋求对罗斯福的报复。拉比·瓦兹和福尔摩斯主教坚持要辞退一些小官吏，这些人大多有着不容置疑的犯罪行径。

3月30日，罗斯福发布了一封谴责瓦兹和福尔摩斯的公开信，指责他们在公众舆论中只关心自己的名望而不考虑政府的清廉。很明显，这一指责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恰当的。这两人可能是过于虔诚，过于“正义凛然”了，但是他们的动机并没有任何错误，他们的指证也是经得住考验的。另一方面，罗斯福对于教会对世俗政治的过分“干涉”而感到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要真正解决问题，让牧师等神职人员回归田园，只有用传统的方式来肃清政府机构。

反过来，在回应对他的银行监管者布罗德里克的指控上，罗斯福显示出了他让人景仰的一面。当1931年10月西伯里的委员会已经对布罗德里克提出了控告的情况下，在其他竞争者摩拳擦掌要削弱罗斯福的时候，罗斯福仍然力挺布罗德里克。罗斯福时常给他寄去鼓励的信笺，尽管这给罗斯福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他仍然主动出庭给布罗德里克作证。迫于州长的威严，西伯里的检察官自然不能审讯州长，布罗德里克得以被宣布无罪，后来罗斯福还任命他为美联储的成员。

李普曼、埃莉诺和其他人在这件事上比在赫斯特的国联问题上投注了更多的注意。罗斯福对他的支持者无疑也保持了不可动摇的忠诚。他也保持警惕，不让坦慕尼厅将他拖上被告席。他还向那些革新分子表明：如果想要对政府提起诉讼，最好明辨什么是罪恶，什么是无辜；如果有人对他轻视或者无视他在美国内政上的地位，他要让他们明白，这么做对于他们的政治前途将有不利的影响。

1932年3月中旬，被罗斯福提名纽约州高级法院法官的塞缪尔·罗森曼建议罗斯福组建一个大学教授顾问团，这个顾问团既可以在诸多问题上给罗斯福提供专业性的意见，也能保证给罗斯福提供保质保量的演讲稿。这就是后来让罗斯福享有很高声誉的“智囊团”的雏形，这使罗斯福在出现新情况时能够快速做出应对（罗斯福开始将他们称为“私人顾问”，其后认为这样称呼不妥，所以改变了叫法）。在此之前，一直是由豪来制定战略，而菲林和法利则在特定问题和拉票活动

上出力，罗森曼负责撰写演讲稿。这些人几乎大都与政策制定无关，只是得到豪的经常指点。罗森曼则只在涉及法律条文的事宜上给予帮助。

雷蒙·莫利，作为罗森曼从哥伦比亚大学请来的政治学教授，给州长提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并通过他的关系请了很多帮手，确保为罗斯福的竞选提供智力支持。政党的纲领不像是政治宣言那样，而只是在一些基本原则性问题上阐述一些立场，罗斯福也希望做些改变。

罗森曼、莫利和罗斯福的法律搭档奥康纳碰头，决定吸收两名新成员：农业专家雷克斯福德·G·塔格威尔和金融与信用制度专家阿道夫·A·伯利。选用塔格威尔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决定，因为他坚持集权观念，反对自由市场的举措。罗斯福对这一点早有察觉，因此对他的建议也持谨慎态度。莫利在3月下旬带着塔格威尔来见罗斯福，说起这次与罗斯福会面的经历，塔格威尔25年后回忆道："有些像和命运在交流的感觉。"

4月7日，罗斯福在塔格威尔的建议下发表了一个全国广播讲演，倡议采用综合规划来重新提升农业部门的购买力，通过救济当地部门来补偿抵押的财物，用公共设施规划来减轻就业压力，另外也提到了减税措施。罗斯福这一举动冲击了胡佛的金融复兴公司。罗斯福创造了"在经济金字塔最底层被忽视的人民"的说法，并准备为他们谋福利。这次讲演造成了很大的反响，莫利也担心罗斯福可能不高兴。但罗斯福并没有表现得不高兴。正是由于这位经济学家的洞察力让他无法忘怀，他才不会轻易做出肤浅的决定。

4月13日，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在杰斐逊纪念日的晚宴上回应道："如果有任何候选人煽动劳动群众掀起阶级对抗，或者引起贫富冲突，我都将会抗争到底，绝不允许这类事情发生。"这句话很明显是回应罗斯福的攻击，而党内的提名争夺战也随之正式拉开了帷幕。

塔格威尔在华盛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有着资深的学术背景，伯利的经历也很丰富，他18岁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威尔逊时代，仅仅24岁就已经是一个出色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和别人合著过《现代企业和私有产权》，这本书很多年来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基本观点是关于美国经济的集中控制力。这本书于1932年出版，但在这之前至少一年书的内容就开始出了名。这本书预测到，如果不出台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国不久后就会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他们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主要观点是：规范社会保障体制，承认苏联，减税与减少贷款并重，重建银行体系和零售环节，调整垄断法并关注垄断给经济带来的影响等，并且要建立针对老弱者和失业人士的保障体制。这就是一系列富有想象力却又不平衡的建议。

罗斯福让莫利领导包括塔格威尔、伯利和罗森曼在内的一个团体，制定在这些问题上的具体立场，以便他1932年5月度假回来后之用。

阿肯色州和肯塔基州的本州候选人退出了角逐，其中一位候选人巴克利也转向了罗斯福。罗斯福让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劝说巴克利取代舒斯，担任民主党代表大会临时主席和主旨发言人。因此，巴克利也把肯塔基州的选票投给了罗斯福。

在底特律市长墨菲的领导下，密歇根州的民意也是倒向罗斯福的。但事实上，这个城市真正的操控者则是埃莉诺的兄弟豪尔。密歇根州的电台牧师也主动在电台节目上为罗斯福造势宣传。

休伊·朗在名义上是一名共和党人，但在惠勒和乔治·诺里斯的劝说下，也遵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意投向了罗斯福。休伊对罗斯福也是极其忠诚。

坦慕尼厅还在坚持维护史密斯。布朗克斯的民意在菲林的影响下投向了罗斯福，但在坦慕尼厅的影响下，纽约市的其他四个区仍然是

支持史密斯的。

4月26日，马萨诸塞州开始了预选，波士顿市长提名罗斯福进入了选举，但依然以1:3败给了史密斯。同一天，罗斯福在宾夕法尼亚州险胜。罗得岛、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支持史密斯。加利福尼亚州支持了加纳，他以21.4万张得票高于罗斯福的16.9万张得票，也大大高于史密斯的13.7万张得票。史密斯和麦卡杜形成了一致的同盟。这造成了民主党在1924年党内派系分裂。这并不是罗斯福希望看见的结果，这种针对他的分裂不仅束缚了他的手脚，也并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击退的。

俄亥俄州支持他们本地的州长乔治·怀特，但如果怀特最终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可能会支持俄亥俄籍的贝克。其他各州的支持情况也是林林总总。最后，史密斯、麦卡杜、加纳、瑞奇和贝克给罗斯福需要在最终获得2/3的支持率带来了很大压力。

这种选票分散的选举局面，即一个州内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将得到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的做法，使得选举格局很不明朗。

纽约市的丑闻问题此时又愈演愈烈，西伯里揭发市长沃克在五年内往自己的银行账户中存进了100万美元。这些款项和沃克的政府职位息息相关，西伯里传唤了沃克，沃克也在1932年5月份承认了自己的罪状。但是他没有接受法庭的审讯，他利用自己的机智巧妙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沃克事件使罗斯福的压力变得非常大。李普曼绝对不是唯一谴责罗斯福的人。李普曼形容这是胆小无能的州长造成的“卑劣的混乱”。主流报纸也要求罗斯福将沃克撤职。罗斯福把西伯里的审案材料副本拿给沃克看，并让他回应被控诉的15项罪状。罗斯福有言在先，说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沃克免罪，这位市长回答道，他可以在政党代表大会之后再做出回应。因此，正如一名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在整个

政党代表大会活动过程中，沃克事件令罗斯福脖子上的绳索越勒越紧。”6月16日，胡佛也令人沮丧地再次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10天之后，民主党人们将移师芝加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豪作为麦迪逊大街上竞选总部里“智囊团”的领导人，将细节策划得无微不至。他在美国的放大地图上用红笔标出了支持罗斯福的州。这样色彩缤纷的地图也给芝加哥指导中心的法利发了一幅。豪又写了一篇90秒的致辞让罗斯福在广播中用他那和蔼可亲的嗓音读出，另外，豪还给每一个代表发放了这篇致辞的复印件、候选人的亲笔信和一份罗斯福的个人简历照片集。

豪动员了他自罗斯福12年前竞选副总统时就开始形成的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事实上，好多人都以为是和罗斯福本人保持着联系，因为豪使用的是罗斯福的行文格式，还有一个能够模仿罗斯福签名的秘书）。豪让法利在大会会场附近订了一个三居室的套房。这样，法利可以方便地找代表们谈话或鼓动支持，甚至是和罗斯福在其中商议对策。这几间房子还进行了隔音处理。

豪暗示电话主机接线员接入了罗斯福房间的电话。他又和奥尔巴尼的“后方”取得了直接的连线，并在卧室里的电话上安装了喇叭，这样罗斯福就可以直接对豪召集的代表进行对话。因此罗斯福在其后的会议日程中可以不受拘束地发出例如“弗吉尼亚，我的朋友!”这样的号召。而要想进豪的房间必须经过他儿子和他秘书的同意。

豪在6月23日搭乘豪华火车，离开纽约前往芝加哥，在令人愉快的晚宴后，豪和一行几人各自睡去，并约好第二天早上一起吃早饭商量竞选事宜。但第二天早上豪并没有出现，他的同伴们开始惊惶失措并说服乘务员打开了豪的房间，发现豪面如死灰，哮喘病复发，在床上挣扎，看来奄奄一息。好在一会儿以后，豪恢复了意识，止住了咳嗽，坐了起来。一切恢复正常后，他向试图帮助他的人大声呵斥了一

番然后就要看当天的报纸，研究形势。几年前，他也曾犯过病，当他被宣布死亡后，却又睁开了眼睛，并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

在豪抵达芝加哥的头一天晚上，法利召集了65个关键的支持者商定策略。路易斯安那州政党领袖呼吁要废止2/3多数票当选的规则。豪和法利都怀疑这项提议能否通过，因为尤其是南部各州为了保存在政党代表大会上的影响，已经多年坚持这一原则了。法利的努力也没能阻止人们讨论这个议题，朗提出了他的观点一并且得到了大家的许可，收到了他和豪所预想的成果。大家都对这个规则深恶痛绝，尤其是现在仍在世的一些前总统候选人、一些议会领袖和党组织的领导人更是对废除这一游戏规则拍案叫好。

约翰·拉斯考比宣布：大会将在周一即6月27日早上开始。同时罗斯福从奥尔巴尼发来了指示，也声援要废除2/3多数票当选的规则。罗斯福认为，这个规则实际上既不民主又不公平，他要求他的支持者——显然是在大会中占多数的人抵制这一规则。他真的去向条约委员会提出了要求，希望能够采取一些步骤以保证在大会中不会出现毫无希望的僵局。他在委员会中的支持者在休伊·朗的率领下坚持这一要求，并且在六轮投票后使委员会采纳了这一请求。罗斯福的反对者指斥他玩弄权术。在一片反对者的尖叫声中，法利勉强使这个提议在条约委员会中获得通过。

芝加哥仍然处在让人绝望的经济大萧条中，这个城市里有70万失业者，占总劳动力的40%。金融市场也进一步萎缩，就连芝加哥中央共和银行（芝加哥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的副主席也在破产的边缘摇摆不定。只是到了千钧一发之际，胡佛总统才亲自下令重建银行组织，并由金融复兴公司向这家银行提供了9 0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即使这样，似乎还是不能阻止这家银行最后的倒闭。芝加哥市还拖欠了教师2 000万美元的工资。就像全国面临的窘境一样，芝加哥也不得不承受同样的打击。

6月26日晚上，麦卡杜和史密斯等人在史密斯的总统套间里见了面，当时罗斯福面临的反对力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史密斯和麦卡杜都相信，如果他们可以在四轮投票中都不让罗斯福的支持率达到2/3，他们就会吸引到一些罗斯福的支持者。因此，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一起来推测谁将会是最后获得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当然不会是史密斯，但是谁的可能性最大也不太确定，尽管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可能会是贝克。

为了给罗斯福设置障碍，史密斯、拉斯考比、坦慕尼厅头目克里等和一些轻视罗斯福的人在芝加哥大会上制造了一片混乱。但他们相互之间也并不怀有好感。

参议员巴克利做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讲演，讲演中充斥着对时局的猛烈抨击。党纲修改委员会也提出了一份关于减税、平衡预算、增加公共设施投入、解决失业率、为老年人与失业者提供由国家执行的保险计划等经济方面的文件。

党纲修改委员会基本是接受罗斯福的指示，这也让他感到满意，但若想实现其中的许多内容难度很大。没有人配合这个新党纲，甚至最后投票赞成的代表们对此也不是很热情。在失业率接近30%的压力下，一个国家既想要减少开支又想要提供如此大幅的救济金，不难想象实施起来的难度会有多大。但是这并没有降低李普曼对新党纲的评价，毕竟他认为这个委员会是20年来两党历史中最好的一个。

这次大会最终提拔了罗斯福的忠实支持者、蒙大拿州参议员托马斯·沃尔什替代舒斯成为了会议的主席。

真正严肃的辩论是关于禁酒令的，史密斯用掷地有声的话语来号召全面撤销禁酒令。当时会场外还有人扮成酒桶大叫：“没有酒，我会死!”罗斯福并没有因为他的立场而失去任何选票，选民们更喜欢罗斯福的政治口号，那些希望撤销禁酒令的民众更多地认同罗斯福的路

线，正如他在1930年竞选连任纽约州州长时倡议的那样“面包胜于烈酒”。对于这个问题，罗斯福态度的强硬不逊于史密斯，但罗斯福很清楚如何不去触动一些党员的敏感神经，就如同他辅佐史密斯时曾向他建议过的那样。

大会上，很多竞选者浮出了水面，大会的气氛在政治流言和讨价还价中变得非常紧张。法利和得克萨斯州的代表团领袖见了面，同他们随意探讨了如果加纳失败后他们支持罗斯福的概率。他们对罗斯福的印象都很好，也同意不会把大会拖到泥潭里去。麦卡杜则很高兴能和他的宿敌史密斯合作，但是他没有和他另外一个敌手贝克和好，贝克倒很可能成为在反对罗斯福的混乱中渔翁得利的人。豪认为这帮得克萨斯人难有什么作为，因此他更关注弗吉尼亚的状况，当时这个州还在支持着他们本州的候选人。罗斯福在电话中斟酌着法利和豪的做法，他催促两个人都沿着既定方针继续努力，也就是法利要争取到得克萨斯，而豪则要说服弗吉尼亚。

提名的过程是冗长的，一直延续到7月1日的早上。罗斯福阵营希望提名结束后立刻进行投票，他们希望这个折磨人的过程能够起到一些效果。凌晨4点25分，开始了第一轮投票，曾经站满史密斯支持者的走廊空荡荡的。结果是罗斯福获得了664票，史密斯201票，加纳90票，余下不多的票数被其他州的提名者瓜分了。罗斯福得到了多数选票，但仍然不够总数的2/3。

第二轮投票即将展开，结果大同小异。罗斯福的选票上升到677票，史密斯减弱到195票，其他竞选人的情况大体和第一轮的结果一样。罗斯福的对手们坚持立刻展开第三轮的选举，结果却又给罗斯福带来了更多的选票。罗斯福此时得到了682票，史密斯194票，加纳101票。

豪的身体状况在代表大会的压力下开始每况愈下，尽管他在到达芝加哥后在饭店里一直待了5天。到了星期五早上，豪平卧在地板上，

似乎丧失了听力，他的两个崇拜者吃惊地注视着他的脸。法利、菲林和其他一些高级助理于11点来看望了豪。法利趴下身子凑近豪，不住地在他身边耳语："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得克萨斯。"

后来的结果在其后很多年内都争论得沸沸扬扬，因为罗斯福确确实实是因为后来争取到了仅有的几张票而获得胜利的。有传闻说这几票原本是要投给贝克的，但很多罗斯福的支持者自始至终都很坚定。当时史密斯可能支持贝克，麦卡杜不会，加纳由于听从于赫斯特的意见所以也不会支持贝克，因此这次大会与1912年威尔逊的选票逐渐上升的情形相似。罗斯福本可能会遭遇滑铁卢，但相比之下，贝克这个60岁的老头儿虽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但和罗斯福比起来显然不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角色。

尽管史密斯从前受人爱戴，但他在芝加哥的影响却变得苍白无力。仅仅依靠着坦慕尼厅和一些地方党魁的支持，他基本没有可能获胜。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只有在谈起罗斯福时，史密斯才会变得咄咄逼人，虎虎有生气。他已经不再是美国东海岸那个奇人了，甚至开始变得日薄西山了。"

加纳的候选人资格完全得益于他的个人魅力，也得益于加利福尼亚本州人民的眷顾。虽然赫斯特尽力为他四处奔走，但麦卡杜却鲜少帮忙。麦卡杜并不完全听命于赫斯特，他本人也有着十足的政治野心。

著名的历史学家C·H·克莱默后来写道，在一次访问中贝克透露，7月1日下午，罗斯福曾经主动向他表示，如果贝克希望的话，他可以退出竞选。再没有别人提起过这段对话，也没有什么可以作证的事实。也可能是罗斯福曾经表示过，如果他自己的支持率降低的话，他就会临时支持贝克。罗斯福善于和任何人说客套话，拉拢关系，所以他说这番话仍然是有可能的，但他是绝对不会无条件提出退出竞选的。可惜贝克被迷惑了，而罗斯福仍然清醒。

7月1日凌晨5点，约瑟夫·肯尼迪致电赫斯特。肯尼迪强调说，如果赫斯特和加纳不支持罗斯福，史密斯或贝克就有可能获胜，而如果贝克获胜，赫斯特反对的国际主义、上层社会利益衰微的局面就有可能出现。赫斯特表示赞同，也答应劝加纳退出竞选。赫斯特给妻子写信时说："加纳也很绅士地答应了。"

赫斯特通过华盛顿的办事处向加纳传达了他的意思。法利也向雷伯恩说了这件事，雷伯恩回应道："我们要观望下一步都能做些什么。"下午3点，加纳果然就给雷伯恩打了电话，提议这正是罗斯福获胜的最明显标志。他也不打算竞选副总统了，用他的话说就是"顶个屁用"。似乎他更乐意留任众议院议长。

雷伯恩仅以两票的优势在得克萨斯州取得了胜利，这将罗斯福的成功又推进了一步。在出席政党大会之前，雷伯恩就和麦卡杜商议了一番，决定成立一个四人委员会，麦卡杜任主要负责人。当第四轮投票开始的时候，发言机会靠前的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就很快阐明了立场，并且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先是说，加利福尼亚的民意归结到底就是让芝加哥的主导力量选出一个能够代表美国的总统，而不是造成大会的僵持。此话引起了近半小时的骚动，直到主席让市长上台才平息了骚乱。麦卡杜接下来总结说，感谢政党代表大会给民主党创造了对付共和党的机会，而不是自相残杀。说完就把他整个州的选票投给了罗斯福，代表们在台下更加喧闹了。等了好久，史密斯落败的消息传了出来。而本来只想安分留任众议院议长的加纳也否定了最初的想法，他获得了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史密斯只获得了190票，其中在纽约州中的94票中获得了63票，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史密斯在纽约州仍然还拥有很强的支持率，也由此可见罗斯福在州长竞选中的优势甚为微弱。如果史密斯没有参加上届总统竞选，如果没有劝说罗斯福参选州长，史密斯就很有可能获得

这次提名的胜利。假使那样，他在处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问题上却依然会不及罗斯福那样成功。

这样的话，罗斯福在1932年仍然可以被选为州长，然后参加1936年或1940年的总统候选人竞选。但是，史密斯提拔罗斯福竞选州长比罗斯福其后参加的任何竞选的意义都重大，也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史密斯在选举结果正式公布之前就黯然离开了芝加哥的选举大厅。民主党内财务主管让史密斯的一个好朋友去劝他参加最后结果的确认表决。史密斯冷冷地回复道："我不想投。"看来在史密斯心中，对罗斯福的偏见以及坚持认为是罗斯福抢了他州长宝座的想法是永远无法抹杀掉的了。史密斯这样离开民主党的领导阶层既不冠冕堂皇，也出人意料。其实即使他被自己曾经的下属超过，如果处理得当，他还是可以重振雄风的。可史密斯这样的处理方式，使他这个曾经的风云人物滑向了苦涩的政坛边缘。

1932年7月1日晚，政党大会主席沃尔西最终宣布罗斯福以945票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喜讯，接着他宣读了政党大会上的第一份候选人声明。罗斯福表示他将会在第二天接受党的任命。

Ⅱ

1932年7月2日早上7点半，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夫人、孩子们（除了小富兰克林）和助手的陪伴下，搭乘飞机离开奥尔巴尼。在10小时的飞行中，飞机中途在克利夫兰停靠过，也遭遇过气流带来的威胁。但这位候选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安睡，浑然不觉，和他在风浪中航行时一般安详。这也反映了他能在政坛立于不败之地的过硬心理素质。

路易斯·豪也总算不用再闷在酒店套房里，他到芝加哥机场迎接罗斯福，并陪同他穿过拥挤的人潮来到市区。20年来他为了罗斯福兢兢业业，常常为了撰写罗斯福的演讲稿通宵达旦，也只有他有资格在这个时刻陪同罗斯福。

罗斯福似乎天生就能够一心二用，他在幼时起就能一边听母亲讲故事，一边摆弄邮票。现在的他在乘着敞篷汽车去往市中心的路上，一边看着车后的群众，一边隔着车窗向他们脱帽挥舞致意。

晚上7点刚过，罗斯福在政党大会上开始了他被豪称作“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讲演（由于疲惫，豪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词其实意思重复）。罗斯福提出了很多种解决就业问题的方案，其中包括一个曾在纽约州取得成功的植树造林计划。

尽管和民主党委员会的很多人一样，罗斯福对于解决这么多经济问题的款项来源和平衡财政之间并不能自圆其说，但是这次演讲还是在很多地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罗斯福的讲演给全国上下盼望从苦海解脱的人民带来了希望。

罗斯福用以下激动人心的语句做了总结：“对于那些希望缩小贫富差距的人们来说，对于这几百万人民来说，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让你们空欢喜一场的。我会把新政贯彻到每个方面……这不是竞选演说辞，这是全民动员。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投我一票，让我们一起建造一个属于人民的美国!”罗斯福的演说永远是那么激人奋进，连史密斯的女儿都谨慎地表示罗斯福的演讲“实在是充满艺术性，也充满了让人愉悦的字句”。加纳认为罗斯福讲演很有理论水平。罗斯福出人意料的到来和振奋人心的演说无疑是成功的，他俨然像一位已经成功当选的总统了。

尽管很多人攻击罗斯福许下的承诺会在不到一年内破灭，尽管他的演说词有些模棱两可而且过于笼统，罗斯福还是在很多选举场合中

定下了他的基调。他宣扬要减少政府支出，通过救济机构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废止禁酒令，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力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并且降低税收。这也是他总统任期前两年主要的施政纲领，除了李普曼等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报以嘉许。

在这个胜利的时刻，罗斯福没有忽视政治的现实性。他也向党内许多活跃分子表达敬意与感谢，仍然对他的“老朋友”史密斯报以很高的评价。罗斯福在谈到他的“老朋友”拉斯考比时，还把他的身份说成是党委员会的主席，其实他已经把拉斯考比撤职了，换上了法利。这样，罗斯福不费吹灰之力就控制了党组织。

正式接受候选人提名的第二天，“新政”这个词就通过一个卡通短片全面流行起来。在这个短片中，一个虚弱的农民抬头看着蓝天上呼啸而过的飞机，机身上写着“新政”。很快，“新政”这个词就进入并在美国政治史上变得人人皆知。

埃莉诺还是担心自己将会被困在白宫里。她和她的一些闺中密友交换了这种想法，她们中有人悄悄告诉了豪，自然，豪缓和了她的一些担心。

罗斯福回到纽约后告诉他的几个儿子，他打算带着他们沿着新英格兰的水路做一番视察。结果他后来决定取消这个计划，来到白宫和总统讨论纽约州在圣劳伦斯河上的水利工程，并准备和加拿大进行谈判。他清楚胡佛会狡猾地否决他这个提议，事实上确实如此，谈话曾一度受挫。这一计划在以后的20年内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

7月17日，他在汉普顿海滩给5万名群众做了一次演讲，但是却和政治没什么关系，因为那天是星期日。罗斯福在沿途各个港口和当地的新英格兰党党魁会了面，并用他的魅力和感召力毫不费力地笼络住了人心。史密斯的残余势力也开始支持罗斯福。最有意义的是媒体登

出大量有关这次行程的照片、新闻专栏和故事，这充分证明了这位候选人的身体还相当不错。

罗斯福接见了来访的伯纳德·贝鲁奇，他的高级随从和合作者约翰逊将军也一同到访。约翰逊也是智囊团的一员，他撰写的演说稿妙趣横生。贝鲁奇也总能在罗斯福的对手面前泰然自若地四两拨千斤，所以他自己也经常给罗斯福提建议。另外一个加入智囊团的合作者是海里曼，他是联邦太平洋铁路集团的继承人和现任董事会主席。他的建议涉及各个方面，也很具体。

罗斯福告诉塔格威尔，现在这个关头最可能质疑民主党的两个危险人物是麦克阿瑟和休伊·朗。罗斯福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就已经认识麦克阿瑟了，这个英勇又有才干的陆军司令无疑也是一个政治独裁者，经常用他自负又未经充分考虑的想法给民主党议会的观点造成混乱。朗是罗斯福的助手们原本忽视的一个人，但是他善于用亲民的姿态换取民意，因此需要充分重视他的作用。朗要求和罗斯福一起在全国巡回演说，但是法利只把他派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州，显然这个举动让法利后悔了。

罗斯福始终对事态发展非常敏感。他不仅能够准确抓住民众舆论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有时甚至如女性般思维细腻，而且能够察觉到一些公众人物的潜力。罗斯福也很容易察觉到助手们潜在的不忠或者民主机制里的弊端。他也从来不会夸大或者低估对手的实力，他总能拿捏得很准确。

坦慕尼厅就是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扰。沃克和坦慕尼厅头目克里在政党大会上力挺史密斯，根本不把罗斯福放在眼里。罗斯福还要应付西伯里，西伯里看来是处心积虑地要和他对着干了。这个法官对于罗斯福的重用绝不感恩，他根本是个彻底的党派主义者。

沃克市长也没有对西伯里的指控做出有力的应对。现在正是下手的好时机，在这个盛夏，罗斯福完全控制了民主党，而向白宫进发的最后竞选也还没有迫在眉睫。巴斯·奥康纳是为数不多的说话能让罗斯福信服的人，他向罗斯福提出暂时不去触动沃克的建议。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可信度没有平时那么高，因为他曾是沃克的律师。

罗斯福重新指派著名律师马丁·康保尔来处理此事，大概交代了事实和处理状况后，罗斯福就召集沃克和他的顾问们于8月11日出席听证会。起初罗斯福还有些紧张，随后他就他义正词严地阐明了自己的论点。沃克的顾问们想要把这次会议变成罗斯福和沃克两者交锋的场合，罗斯福毫不费劲就戳穿了这一企图，他反应灵敏，判断准确，言语流利，沃克的罪状被活生生地揭露了出来。9月1日晚，罗斯福在行政大厦和奥康纳、法利等助手们讨论后决定，基于种种证据，应当将沃克免职。就在这时，电话响了，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罗斯福，詹姆斯·沃克主动辞去了纽约市市长一职。

对这件事的处理，可以说是罗斯福又一次高明地运用了极富技巧性的政治手段。他总算把连任州长以来一直受到西伯里质询的困扰给解除了。他利用听证会把沃克的渎职公布于世，他毫不留情面，咒骂沃克把纽约变成了一个游乐场和杂技场，舆论的压力逼迫沃克辞了职，这免于罗斯福亲自将其解雇的尴尬。

这样的结果无疑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罗斯福则不留痕迹地切除了这个党内的毒瘤。

坦慕尼厅头目克里试图通过否决罗斯福，并重新提名罗森曼为法官作为报复。克里又打错了算盘，罗斯福从他西部竞选之旅回来后，已经同史密斯在几千民主党人的面前和解。罗斯福又给罗森曼写信让他就任法官，后来克里也无法继续担任坦慕尼厅的头目了，雷曼接了他的班，而史密斯也开始为罗斯福的竞选出谋划策，坦慕尼厅这个威胁也解除了。

有一段时间，罗斯福和麦考米克上校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罗斯福多次在家接见他，两人还经常通信。麦考米克给罗斯福推荐了一位有前途的年轻记者约翰·保廷格来全程报道罗斯福的活动（几年后，这个人成为罗斯福女儿安娜的第二任丈夫）。而赫斯特和他庞大的媒体也给了罗斯福巨大的支持，使罗斯福获益匪浅。

1932年8月27日，罗斯福接见了曾经支持过自己的泽西市的党魁弗兰克·海格。海格在禁酒令废止闹得最轰烈的时候，曾发表过“让我来决定镇上的酒价”的言论，当罗斯福在新泽西州演说时，海格带领大约10万名听众反对禁酒令。

罗斯福9月14日开始他自西向东的全国巡回演说。在踏上这个艰苦旅程之前，他的助手们曾建议他先休息到11月，但罗斯福没有听进去。

罗斯福很喜欢竞选活动，他慷慨激昂的言辞和丰富的表现力征服了美国的每个角落。他知道脱离选民的严重后果，也不想只依靠大老板和商人，而是希望把民主党的恩泽撒遍每个角落。他鼓励了美国受苦的大众。在现任总统软弱无能时，他的冲劲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罗斯福的助手们对于如何解决大萧条后遗症存在着不同意见。罗斯福没有阐明他的具体立场，他的观点更像是折中后的杂烩。

他对胡佛那一套要增税、减支、紧缩货币供给的方法非常不屑。

但问题是罗斯福怎样能冒着被人讥笑的危险将他自己的措施阐述清楚。就在税收这个最明了的问题上，他的智囊团也是莫衷一是。一半人提议实行高税率，另一半人则要求减税。莫利在写和税收有关的演讲稿时向罗斯福征求了意见，让莫利大惊失色的是，罗斯福回答道：“把两个方法融合一下。”

权宜之计就是每个观点的讲稿各备一份，以针对不同的听众，不同讲稿之间观点的反差又不要明显到让人抓住把柄。9月20日的西雅图，罗斯福在演说中的观点是降低某些税种的税率。9天后在艾奥瓦州的苏城，他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罗斯福在这个模棱两可的税收问题上没有被质疑的主要原因在于：胡佛的政策太过荒唐。胡佛为了促进国内的消费，对外国商品课以重税，尽管大多数税款是拖欠的。罗斯福一方面大力反对这“高得过分”的税率，另一方面也不赞同有些民主党人提出的完全开放市场的观点。

胡佛则预言减税会让城镇野草遍布，农场荒芜，一片荒凉。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但也提醒罗斯福要重视农民的利益，尽管他以前曾经反对给农民减税。胡佛讥笑罗斯福的税收政策就是“一条变色龙”。

相对在解决农产品价格和产品过剩的问题上，罗斯福则处理得很好。在芝加哥接受提名的演说上，罗斯福建议农民适当减产，而不是把产品低价倾销到外国去。

罗斯福兴高采烈地坚持这项决定，好像他完全忘记了以前曾经多次赞同胡佛的倾销政策。还好共和党的提名过程进行得毫无新意和精彩之处，所以罗斯福的自相矛盾之处也就没有被注意到。

胡佛在接受他连任提名的演说上乐此不疲地发表着与罗斯福不同的意见，他反对和谴责把直接贷款发放给农民。

9月14日，罗斯福在堪萨斯对两万名民众发表演讲时，勾勒了他的农业政策，这也是他25个讲稿起草人共同合作的结晶。所以这个政策是一个综合品，塔格威尔也因此佩服罗斯福可以把这么多不同意见没有瑕疵地整合在一起。他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演说才能，和农民们融为一体，受到了农民们的欢迎，演说也很有成果。除了他在国内政策上

苦心经营，承诺给减少积压货品而削减产量的农户以补偿，他还有着一整套模棱两可但系统化的政策。

9月23日，罗斯福在洛杉矶发表了他在竞选中最富哲学意味的演说。这是伯利费尽心机撰写的。罗斯福说，杰斐逊曾经是个人权利的杰出代表，汉密尔顿是财产权利的代言人，这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最原始的差别所在。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初级的经济和历史观点，但罗斯福却能利用这一点很好地为自己的观点服务。罗斯福引经据典地阐述道：在共和党的经营下，跨州铁路的建造虽然付出了高额成本的代价，但收益更大。但是现在由于边界的概念模糊了，移民也区分得不是很清楚，所以美国“要开始为国内人民谋福利了”。

他感叹在走廊上不曾有一个乞丐的那个年代，他歌颂人们之间没有太多贫富差距的岁月。他也怀念那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人们和他一样，对现代资本主义并不痴迷，也不用去忍受工业革命时期那些资本家。这警示了真正的人权包括相对的分配平等，也是联邦政府应该致力解决的问题。金融不能只解决短期的问题，罗斯福再次保证要“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他已经暗示了他要进行财产的重新分配，但是他只节制地说出“投机者、操盘者，甚至金融家都不应该侵害个人权利，而应该使之得到保护”。

罗斯福重申他认为生存权应该是“过上舒服的生活”。一个人“也许因为个人的懒惰和罪孽不能完全实现，但是这种权利不能被否认”。他还认为每个人“都有财产权”，包括他的存款。除了非难那些臭名昭著的投机者，他还透露了他在税收上的政策，要通过征税来尽量使不能直接得到政府援助的人得到好处。

这番话的意义是可以通过打击不负责任的金融操作者来解决问题。但是聪明细心的听众会发现这些想法也有“胡言乱语”的成分，因为要让穷人得到好处，并不是从一两个恶棍身上重新分配非法所得就能解决的，那些诚实的经营者劳动者也要无辜地分出自己的所得。这

一点罗斯福也清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预计政府开支将会减少20%，但是他明白如他在纽约的经验中得来的那样，那些创建工作机会的工作者将得不到补偿。除非他对富人征税或是出现大笔的财政赤字。

细心人士发现，罗斯福把大萧条看作一个改写历史的工具，他要重新实施100年前的政策，建立一个带有家长制作风并为穷人说话的政府。

罗斯福把他这次保守的讲演稿发给了豪、贝鲁奇和其他一些有微词的官员，再次谴责了胡佛“尽管提高了税率，还是高额赤字缠身”。他认为当时政府每年要每人支出125美元是无法长久维持的举动。胡佛的政策“既不计后果又夸张……”，他暗示他可以处理好解决就业需要的资金来源，比如通过削减其他方面支出。但是一些年后，他会发现他的这次演说中有些观点是欠考虑的。实际上，这次讲演是他早期思想的代表，备受争议，也是符合这位候选人一些保守的传统经济思路的。

宣讲的过程中路过了很多不停靠的小站，罗斯福总是会在车窗前出现，微笑着，说着“很高兴回来”（也不管他以前是否真正来过此地），说他要向民众聆听学习，并向群众介绍着自己的女儿女婿。接着火车继续前进，这位候选人也没有和任何人聊天，更谈不上学习。但这实在是很管用的作秀。正如有作家描写的那样：“罗斯福从不会厌倦……他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喜欢微笑。”罗斯福旅行了2万多千米，发表了16个主要的讲演，进行了67次即兴演说，在火车上致意更是不计其数。

10月25日在巴尔的摩，罗斯福说共和党“只不过是在破坏、拖延、欺骗和带来失望”。10月31日，在波士顿，他承诺给失业者直接的救助。在11月5日的麦迪逊广场，他又把他的政策纲领重申了一遍。李普曼最终认同了罗斯福，尽管他还是对罗斯福抱有成见。一些其他的共

和党参议员也开始赞同罗斯福。民众们显然也需要一些改变，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出罗斯福保持着领先优势。

选举前夜，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针对全国听众的广播讲演。他总结说：“伸出你的援助之手，保持你的耐心，坚定你的意志，我们可以战胜困难。”

胡佛同样也很卖命地撰写自己的演讲稿。他用词精美，但多是申辩之辞，也没有新意，让人们看不到希望。他在1928年的提名大会上就“保证要结束贫穷”。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也不是他的错，但是他只能下台。他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说道：“即使坐在胡佛的卧室里，也像是坐在污水中。”还有人说即使是玫瑰花，放在胡佛手中也会“枯萎”。

投票当晚，选举结果马上就出来了，民主党取得了胜利。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路易斯·豪拒绝相信这一切，并且离开了巴尔的摩的竞选总部。埃莉诺和詹姆斯·法利11点钟找到他时，罗斯福马上在饭店前向支持者发表演讲了。路易斯·豪和詹姆斯·法利当时站在罗斯福的身边。罗斯福表示：“他们是全美国比其他任何人更有资格享受这一伟大胜利的两个人。”这的确是一场伟大的胜利。相较于胡佛的15 759 930张直接选票，他赢得了22 815 539张直接选票。在参议院，民主党占据的席位几乎是共和党的2倍，而在众议院则接近3倍（民主党310席对共和常的117席）。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当时的美国政界人物中出类拔萃，他对自己努力领导的国家的多样性发展具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还是出自本能的。他还急切地去学习每个领域的知识。他相信各个方面的综合才是国家的全貌”。

这个绝望国家的民众差不多竭尽自己的所能来支持罗斯福。这可能是最严峻的时刻，但是他最终还是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在选举的前

夜，他和莫利坐在起居室的火炉边，平静安详而又充满神秘感。在选举的当天晚上，当他的儿子吉姆将他扶上床时，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足够强壮，有能力完成这份工作，并让儿子为他祈祷。尽管如此，当他返回第65号大街时，他的母亲拥抱了他。新闻记者听见他对萨拉说：“这是我平生最伟大的一个晚上。”

III

经济危机在各个领域出现，现在已经足以让整个国家都感受到生存的威胁了。国际关系的稳定也受到很大影响。这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传统的经济循环会在振荡中自我调节复兴，所有的指标在近两年来一直呈现下滑的趋势。

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沉闷的抑郁情绪之中。不仅经济上低迷，人们的心理也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在美国，人们所有的希望现在都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

选举结束后当晚，罗斯福和胡佛就用电报联系，互相客套了一番。但很快，罗斯福就感觉自己将要被胡佛拖进这个遭人反对、几近失败的决策中去。胡佛也承认他只是同他的继任者例行公事地走个礼节上的过场，为了顺利交接而已。胡佛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对外发展，而欧洲国家则大都怪罪美国的大萧条。罗斯福不赞同胡佛的观点，在竞选中甚至称其为“历史上最无耻的托词”。罗斯福还嘲弄胡佛连哪里是外国都不清楚，“他还不如说都是爪哇国的错”。但是他现在也在考虑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胡佛希望自己也能参加接下来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大会，会议将会从胡佛的任期末延续到罗斯福的任期之初。此时罗斯福由于选举中受

了风寒，在家里静养了五天，耽误了原定要去温泉过感恩节的计划，他一般都会亲自给那里有残疾的孩子们分火鸡肉。

11月22日，罗斯福在他南下旅程中途经华盛顿，和总统见了面。他在车站受到了他的表兄、政府礼宾司司长罗宾斯的接待。尽管宴会的气氛很不错，但罗斯福与胡佛的会谈进行得很冷淡。胡佛也就瞟了罗斯福几眼，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胡佛做了将近1个小时的关于国际债务问题的长篇大论的演讲，他总结说，美国借出的大量外债亟待追回，再拖欠下去或者赖账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胡佛打算成立一个债务委员会，与20世纪20年代签订借款协议的委员会类似，从参议院和各个行政部门中选人担任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谦虚谨慎，笑脸迎人，认真地记录下胡佛的建议，并让莫利做出回应。莫利一丝不苟地配合罗斯福一贯的原则，也就是他同意贷款和政治分开，对德国的贷款和德国应给的赔偿没有关系，美国也会考虑暂时还不起贷款国家的实际情况。

莫利表示没有必要成立总统建议的委员会，通过行政机构谈判就足够了。罗斯福和莫利都同意12月15日是债务国应该还钱的最后期限。胡佛还是低估了罗斯福，他对史汀生说他们正在“给一个无足轻重的年轻人上课”。罗斯福自然要比胡佛聪明得多，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罗斯福在当晚会见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这次会议很友好。民主党计划把议会平稳地从原任过渡到新任，然后倡议部分解除禁酒令（将酒精度分级），提供一些农村救济和一些谨慎的平衡财政措施。但是收效甚微，因为休伊听信了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士的教唆，认为帮助那些不景气的银行会威胁到几家主要的大银行的利益。

在罗斯福和胡佛会面的当天，英国归还了贷款，但法国没有归还。12月17日，胡佛给罗斯福发了一封长电报，电报中说明了应该赶

快成立专门机构解决此事。他建议，参加世界金融和经济大会的代表中最好有一些曾经参加过裁军大会的成员，并且应该授权讨论贷款和相关论题。他询问了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在把胡佛的建议提交议会的19日会议上做出了回应。胡佛的提案中呼吁不要将金本位和汇率分开，并要求要迅速恢复金本位制度。这是当时很自然的保守的想法，但完全不可行。重建金本位制度会引发通货紧缩，而在当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盛行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胡佛也提到了建立委员会处理世界经济、国际债务和裁军等相关问题。

在给胡佛的回复中，罗斯福一针见血指出了对把这三个问题捆绑解决的疑问。他赞同胡佛在裁军上的态度，但反对让同样的人员在参加世界金融和经济大会的同时也参与债务和裁军的讨论。他也不同意自己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因为在就职之前他还没有权威，不应该和胡佛一起参加任何会议。

第二天胡佛在回复电报中说，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家广泛协同处理，他认为单个解决是浪费时间，他还进一步希望民主党能派出其他人参与会议决策。

罗斯福实质上认为，把大萧条归咎于外因是欺骗性的借口。他认定大萧条是美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也应该从美国自身去寻找解决方法。在解决办法上完全依靠国际大会根本就是推卸责任——现任的总统、8年前的商务部长胡佛实际应该负的责任。21日，他回电说，他不想在这个思路上继续探讨下去。

胡佛暴跳如雷，他向公众发布消息说，罗斯福一点都不愿意合作。罗斯福当天表示了否认，22日，他又开始乐意参加一些讨论。但是他有意暗示了他并不赞赏受人摆布，也不愿意和这个失败的、不讲信用的政府达成政治妥协。他和很多议会中民主党领袖的谈话都有大家风范——坚定、执着而富有魅力。

罗斯福在年底想到了“双轨预算”，也就是把日常开销和紧急救济或是投资分开来。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投资需要提交一份报告。这种区分很模糊，但也表明了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已经开始把救济投资和平衡财政融合在一起了。

对于胡佛要求增税、减少赤字的提议，罗斯福没有回应。议会中胡佛的支持者甚至包括加纳在内，都认为罗斯福对此是持赞同态度的。但到了12月下旬，罗斯福郑重地宣布他反对增税，胡佛的增税计划最终破产。

1933年1月9日，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与国务卿进行了关于世界金融和经济大会的谈话。胡佛本来不认可这次会谈，经过了11月的那些不和谐，他认为罗斯福是一个“危险而且固执的人物”。由于史汀生的坚持，才让会谈最终得以举行。史汀生在日记中回忆说，他被罗斯福的许多方面打动了，尤其是他的儒雅和面对疾病时的平和心态。

史汀生原来认为“罗斯福不过是胡佛眼中的小角色”，但是这次他改变了看法。罗斯福在远东问题上的看法与史汀生非常一致，却与胡佛存在着冲突。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问题上，史汀生的立场是美国不能承认任何违反1928年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领土或主权改变，在这个条约中禁止战争被视为解决争端的工具。

和罗斯福一样，史汀生并不是反对制裁，具体情况（为了制止或者回应侵犯）要求下的军事行动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正如史汀生在1932年3月9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绝不能允许文明国家（美国和日本）爆发战争。”这次会谈后，罗斯福赞同了史汀生主义，并且在纽约发表了一篇温和的文章，文中表明：“美国必须依照国际关系不可玷污的准则来制定对外政策。”

罗斯福一直支持史汀生主义，甚至有一次塔格威尔告诫说，史汀生可能会导致美国和日本两国的战争。罗斯福承认，如果日本执意继

续推行侵略政策并实施帝国主义的话，战争迟早会到来。他讲这番话完全是出于他的感性，其中包含了家族历史的感情和对中国的同情。塔格威尔又说日本的帝国主义可能还没有英国的强烈。1922年，罗斯福在文章中没有再表示对日本的宽容，重新拾起了他在“一战”前认为战争可能还会爆发的态度。罗斯福和史汀生的这次会谈，也成为他们后来十多年友情的开端。

从罗斯福当选到就任的这段时间，他对外政策的其他方面也初现端倪。当胡佛正在南美进行访问时，罗斯福希望到欧洲旅行，会见主要的领导人。由于美国的经济恶化，罗斯福后来不情愿地放弃了这次在当时并不实际的访问。他试图让欧洲领导人来访问美国，但是在弗兰克福特的建议下，还是没有发出邀请。

罗斯福和英国、法国驻美国的外交官罗纳德·李丁西和保罗·克劳德尔进行了广泛和成功的访谈。李丁西在1月29日到温泉拜访了罗斯福。李丁西注意到，罗斯福在外交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套自己的构想，也认为议会不会通过一些零碎的举措。他发现罗斯福在一些问题上有些轻描淡写，喜欢顺其自然，也发现这位将来的总统在经济上所知甚少。罗斯福对主要国家间关系拿捏到位，这令李丁西惊讶不已。李丁西向国内报告说，罗斯福正在赞成更广泛的国际贸易合作和裁军计划。罗斯福倾向于遏制日本，他还主张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对日本加以限制。

1月10日时，罗斯福也在纽约的家中接见了克劳德尔。克劳德尔称这次会谈非常鼓舞人心。“他是一个朴素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伟大人物……一个法国真正的朋友。”在债务问题上，罗斯福给克劳德尔上了一节历史课，回顾了1777年法国曾借给美国1500万的历史。这笔借款直到1815年美国才还清本息，此间，法国一点都没有非难美国。“我们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们不认为法国是在拖欠，这么高尚的国

家不会拖欠。我们理解法国可能有着自己的难处，法国可能也正在为没有按期还贷而感到不安心呢。”

这位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也为法国的安全形势感到深深焦虑。他援引克里孟梭1918年说过的话，大意是说：安全的定义就是一个初生的法国小孩在他的一生中都不用去担心战争的危险。罗斯福也考虑可以从法国进口高质量的香水，不过废除禁酒令或许还需要两到三年。当他知道扛着酒桶的矮人形象在法国也被称作“罗斯福”时，他很受触动。

1月20日，罗斯福和胡佛等人在白宫的会谈还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诺曼·戴维斯自荐代表罗斯福出席世界金融和经济大会，他和史汀生、胡佛、米尔斯已经开始为会议做准备了。罗斯福坚称：裁军与世界经济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除非他3月4日上任后，现在他不会同意派出什么代表参加会议。第二天他视察了田纳西河沿线，承诺要增加农村的电力供应，发展硝酸盐工业、灌溉工程、洪水控制，并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给农村带来改变。罗斯福在蒙哥马利给围观的大量群众做了关于如何开发田纳西河的即兴演讲。

罗斯福一路来到了佐治亚州的温泉，在那里他惬意地度过了他51岁的生日，同一天也是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新总理的日子。罗斯福就任后的第二天，3月5日，希特勒就重新召集选举，一举扫除了他的竞争对手们，实施集权，在欧洲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希特勒和罗斯福先后几星期内走马上任国家元首，两个人的关系则几乎从最开始就是公然的敌视。但是在他们当政时，尽管他们各自国情完全不同，但如果三个星期内没有听说对方的消息，两个人都会坐立难安。他们在如何治理国家和人类社会，以及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观点简直就是南辕北辙。

无论是在国际形象还是利益的争夺上，希特勒和罗斯福的较量都可谓是世界史上的一段传奇。除去政治问题不谈，罗斯福厌恶希特勒的种族主义、集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他认为这位德国传奇人物的政策既滑稽又可怕。而希特勒则憎恨美国的财富，也看不起它多变的国际关系政策。由于罗斯福内阁中任用了犹太人，他家中也雇用了黑人，希特勒出自本能地排斥罗斯福。他把美国看作是欧洲的“排泄物”，在他看来，美国有着大量既自私又不懂音乐的“犹太人和黑人的杂种”。

希特勒唯一欣赏美国的就在于美国作家卡尔·梅笔下的西部牛仔或是战争前线。罗斯福则很了解德国，但是却厌恶到极点，他眼中的希特勒简直就是最低劣的日耳曼人的异化产物。

IV

当胡佛还在任的时候，罗斯福和胡佛在公共关系上的较量上，胡佛稍稍处于优势，尽管罗斯福并不在意。实际上他并不想和这个无所作为的政府打交道。2月3日他离开了温泉，和他的朋友沿河而下去了杰克逊维利，就算把这次视察当作欧洲之旅的替代。

菲林希望罗斯福在这个萧索的冬季可以选择更好的休养方式。当他看到他们包裹得严严实实站在船上时，菲林不无调侃地想：“他们真像是要被扔到海里的布丁。”

国家的银行系统还在持续地陷入崩溃。国家最大的几家银行都陷入了崩溃的深渊，休伊·朗宣布银行休业一天。十天后，由于亨利·福特拒绝保证给每个危机银行750万的保证金，密歇根州的州长不得不关闭了州内所有的银行，这其实应该是胡佛的金融复兴公司从前保证过的。

罗斯福在挑选他的内阁成员时，其实也比较“集权”。任何曾经反对他竞选候选人的人他都不会考虑，他也对那些大工业家、银行家和大律师放心不下。这样，贝克、贝鲁奇和麦卡杜他就根本不会考虑。

法利则毫无悬念地被任命为邮政总长。芝加哥竞选大会上的主席托马斯·沃尔西成为司法部长的不二选择，而珀金斯小姐则作为第一位女性内阁成员担任了劳工部部长。

伯顿·惠勒是第一个支持罗斯福竞选的主要政治家，他还想继续留在罗斯福麾下做事。罗斯福却坦白地说他看中的是惠勒在蒙大拿州的同僚沃尔西，如果加上法利，就能保证内阁中有两名天主教徒。罗斯福说服惠勒来帮助他劝说沃尔西来担任司法部长。惠勒也变成了统筹安排罗斯福下属职位的专职工作者，还一边要说服可能不愿意就任的能人来加入罗斯福的内阁。

罗斯福是打算让现任电力总局局长欧文·扬担任国务卿的，但是消息走漏后，西部反对公共事业国有化的议员们就不同意（实际上扬的公司也只是公共用品的生产而已），所以当扬以他妻子身体不好为由拒绝的时候，罗斯福暗自松了口气。另外一个国务卿的有力竞争者就是诺曼·戴维斯，他外交经验丰富，党派经历老到，又非常儒雅。但是弗兰克福特强烈反对戴维斯出任，并声称他在十几年前在古巴做生意时就蒙上了丑闻的污点。

科德尔·赫尔被任命为国务卿，雷蒙德·莫利则被任命为助理国务卿，并专门负责外债管理及世界经济会议等事务。威廉·H·伍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罗斯福本打算安排自己的朋友杰西·斯特拉斯出任商务部长一职。但麦卡杜则强烈要求由丹尼尔·罗珀出任此职，并声称他在竞选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罗斯福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说服斯特拉斯出任驻法国大使。亨利·A·华莱士子承父业，出任农业部长。来自芝加哥的进步共和党人哈罗德·L·伊克斯以其仪表和诚实被罗斯福一眼相中，出任内政部长。

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命可谓毫无悬念，路易斯·豪、米西·利汉德、斯蒂芬·厄尔利和马文·麦金太尔等人只是继续从事本来的工作罢了。

胡佛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向罗斯福发难是在2月18日，他给罗斯福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信，信中宣称，国家内部正有一股威胁复苏的趋势，对此，胡佛本来是稳操胜券的。胡佛说，罗斯福应该在征税的同时保持财政稳定，金本位制度也应该保持，通货膨胀是要避免的。罗斯福认为这简直太无耻了（因为胡佛的秘书把罗斯福的名字都写错了）。罗斯福11天后才给胡佛回了信。罗斯福借口他早已回了信，但是罗斯福的秘书误以为是文件就没有寄出。这当然是托词，罗斯福不会不在给总统的信件上签字，而文件是不需要签字的。胡佛也就明白了罗斯福没把他当回事。

即将离职的胡佛还是很风光的。2月20日，在给宾夕法尼亚参议员戴维·里德的一封备忘录上，胡佛写道：国家不稳定的问题存在于罗斯福上台可能带来的恐慌，他也可能无力提高税率，也不能处理好财政赤字问题。总之，这些都是胡佛为了缓和危机在努力实现的。胡佛的备忘录主要写道，1932年以前有起色的经济复苏只是一些经济的短期行为造成的，美国公众却在很多细节上得不到收益。

在即将离任的时期，胡佛宣称复苏已经踏上了正轨，只是罗斯福要把国家置于不稳定之中，才出现了恶化的迹象，除非他继续胡佛的方针。在大选的时期，胡佛就确认民主党正在股市抛售股票，制造熊市，以此来阻碍经济好转。罗斯福这边也坚信，共和党的宣传机构正在编造复苏的谎言来给胡佛贴金。尽管这些说法都没有有力的证据。

在宾夕法尼亚，失业率自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上升了28%，并且在州长就职那天失业总人数超过了150万人，当时全国有1300万~1800万的失业者。很多州负债已经达到了法律极限，很多州和城市已经无力赎回他们自己的债券，也没有实力发行新的债券了。只有联邦政府还有不受经济崩溃和社会混乱的影响赎回国债的可能。胡佛宣

称，在1930年夏天“萧条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国家收入从那时起却下降了50%。银行前挤满了前来挤兑的人群。珀金斯写道：“救助机构由于没有资金而关门。饥饿的示威者挤在街上。哄抢食品实属司空见惯。仅仅是由于抢夺食品、衣物或其他必需品所造成的犯罪此起彼伏。农业地区就更是恐怖，局势相当不稳定。这样的趋势非常危险。”1929年以来，投资额也减少了90%，汽车产量下降了75%，几乎一半的农村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胡佛却给参议员里德写信说，只要给罗斯福实行胡佛的经济政策，社会稳定就能实现，这就意味着要“放弃90%将要实行的所谓‘新政’，否则，金融上的危机将永远得不到解决”。根据当时紧急的局势，实在很难窥探到胡佛为什么还抱有这样的想法。

在胡佛几近丧失政治威信时，他还是保持着他在自己政策上的傲慢态度。不过就像罗斯福1920年竞选副总统时对他评价的那样：“即使胡佛是一个尽力的社会公仆，也很上进。但是他确实被大萧条彻底打垮了。”胡佛一直认为公众被罗斯福及以后的政府吓怕了，他也坚信自己能够把罗斯福诱入泥潭，让他放弃所有的“新政”计划，脱离那些支持他的民众。

2月，银行危机不断加重，罗斯福面对着潮水般涌来的信件，也非常着急。有一封是他的老友汤姆·莱蒙写来的，他说：“情况糟透了。”美联储主席的夫人也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蹂躏着地球。”胡佛被“银行破产的声音折磨着”。2月中旬，危机非常严重，胡佛都觉得需要得到美联储给他提供银行存款的保证，他才能感到安心。

民众的信心更是降到了低谷，倒不是因为罗斯福，而是因为危机持续蔓延而且参议院银行金融和货币委员会丑闻不断。首先是查尔斯·G·戴维斯承认了挥霍公款。同样，委员会的顾问也揭出了查尔斯·米歇

尔，这位很有势力前国家城市银行的主席，把储户的存款作为抵押进行投资，违反了银行法。

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接见了国内很多工业和金融界的领袖、大学领导和知名出版人，他们都提出了对国家现状的看法，但是没有什么能够分析出大萧条的原因，也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就算是像伯纳德·贝鲁奇这样精干的金融家也只给罗斯福提出了关于征兵的想法。1933年年初，民众们从没有如此厌世，也从没有如此憎恶私营业主。国家好像全然丢失了灵气，失去了生气，丧失了活力。

到3月2日，大约有一半州都关闭了州立银行。纽约股票交易所、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其他地区的一些交易机构都关上了大门。“曾经熙攘热闹的芝加哥和华尔街，现在门可罗雀。”

美国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查尔斯·伊万斯·休斯2月28日写道：“真诚地希望您能在这一届政府中取得成功……我尤其珍惜能和您一起合作，为美国人民掌舵。”毫无疑问，基本上全国的金融系统都陷入了瘫痪。曾经历史上繁荣的美国，曾经吸引了成千上万欧洲人移民来到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然而今天美国的民主和个人主义就要陷入崩溃的境地，尽管它宣扬的民主和个人主义在世界上已经盛行了150年之久。

回眸过去失败重重，眺望未来危机四伏，而这些失败和危机都压在了罗斯福的肩上。他和莫利正在准备3月4日将要发表的就职演讲。在去往华盛顿的车上，罗斯福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高贵而且镇静，但是却和法利一样心潮澎湃。“法利告诉我，他一直笃信，人民比所有其他都重要……这将是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最重要一环。”罗斯福在即将开始的新政中也贯彻了这一精神。

克服了个人的疾病，罗斯福在心中唤醒了年轻的精力，他深信他是领导美国人民重拾信心的人。如果他失败了，美国也将会葬身坟墓，就像林肯当年所发挥的决定性力量一样。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笃信上帝，更信赖他的人民、美国的政治机制和他自己。在1933年3月3日深夜开往华盛顿的列车上，罗斯福这样告诉自己。

07
他就是力量、权力和命令的化身

后来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回忆早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时如是说

I

1933年3月3日，天气寒冷阴郁，但是在联合车站，成百上千狂热的华盛顿市民欢迎了乘坐9点25分到站的列车的罗斯福。保镖们手持机关枪站在建筑物周围，给人一种威严肃穆的气氛。罗斯福前往五月花酒店的总统套房，和民主党议会领袖商谈到中午时分。埃莉诺则和一个朋友参观了岩溪公园中亨利·亚当斯墓前的雕塑。

与即将离任的总统胡佛进行的晚餐非常精简，双方只有一番客套的寒暄和下午4点钟的一个茶会，这样的安排使胡佛和罗斯福两家都感到非常轻松。

但胡佛仍然没有放弃最后一次机会，他想把罗斯福拖入经济政策失败的泥潭。刚当选的罗斯福总统，以及他的妻子、儿子詹姆斯和儿媳到达白宫官邸后不久，胡佛就召集财政部长、美联储主席等待进行一次关于银行危机的讨论。罗斯福让他的表亲、礼宾负责人沃伦·德拉诺·罗宾斯把还在小睡的莫利叫来，待莫利到时，讨论已经开始进行。

讨论进行了一个小时，罗斯福立场很明确，他认为危机是胡佛的责任，他只希望能够听取他的建议。罗斯福补充道：他理解将要离任的总统会给继任者传授一些经验和指导，但是在现在的危机中，这一

环节可以放弃。胡佛则很冷淡地表示：“如果罗斯福在华盛顿待久了，就会明白总统并不会要求听取任何人的建议，这是一个传统。”罗斯福决定以后一定要经常走访民众，而不是高高在上，不理民情。

罗斯福就职前夜，胡佛给他打了两个电话，还在劝说罗斯福同意限制银行取款和黄金出口。罗斯福拒绝了他的提议。伍定和莫利去财政部了解了危机的情况，也计划在周末开始施行既定的解决方案。

3月3日（星期五）晚，32个州宣布无限期关闭银行，其他有6个州几乎停止所有银行的营业活动。剩下的1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则把提款额限定在存款总额的5%，田纳西州更是限制到每天最多提取10美元。掌控着整个国民存款的美国金融系统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而这个体系一旦崩溃，几千万人的毕生储蓄也将随之毁于一旦。

3月4日上午10点，罗斯福一家离开白宫，穿过拉法耶特广场来到了圣约翰公会教堂参加礼拜。礼拜仪式由恩迪克特·皮博迪主持。皮博迪先是称赞了胡佛“能力非凡”，然后表示了对他从前的学生登上美国权力顶峰的由衷的喜悦之情。他对罗斯福一向非常欣赏。

回到五月花酒店时，伍定和莫利向罗斯福简要地汇报了前一天在财政部了解到的情况。他们建议最好让全国的银行先暂停营业，然后紧急召开国会会议来制定银行系统的重组计划，这个措施得到了罗斯福的批准。紧接着第二天，3月5日（星期天），美国全国各地的银行家都被召集到华盛顿讨论银行立法事宜。罗斯福同意并要求在他参加完总统宣誓仪式后，要看到成形的有关文件。胡佛政府的官员也做了相关准备工作。

罗斯福和胡佛一起乘一辆敞篷车，从白宫前往国会山去参加新总统就职仪式。当时，车上的气氛极为冷淡。罗斯福像往常一样发挥了自己活跃气氛的能力，当经过商务部大厦建设工地时，他打趣地谈论“可爱的钢铁”并打开了话匣子。在没有得到胡佛的回应后，他就向

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群众挥帽致意。罗斯福来到了议会大厦，聆听了约翰·加纳宣誓就职美国副总统。下午1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式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华盛顿市一半以上的民众——40多万人将国会大厦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观看了这一仪式。他们不像以往那样喧哗，陷入了寂静。在美国的历史上，大概只有林肯的就职仪式能和罗斯福这次总统就职仪式相媲美了。其后大概也只有肯尼迪1961年发表的演讲能和罗斯福这次的演讲一样千古留名了。演讲者把这一场面描述成“国家的神圣祭典”。罗斯福信誓旦旦地告诉美国民众：“值此我就职之际，我确信同胞们希望我能考虑到国家当前情势的迫切要求，用一种坦率和果断的态度来发表演说。现在尤其有必要坦白而果敢地讲真话，告诉大家全部的真实情况。我们不必畏缩，不必躲闪，我们要敢于正视国家今天的现实。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像从前那样经受住考验，它将复兴起来，并繁荣下去。因此，首先让我表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种恐惧会使我们向后退转为那种无可名状的、没有缘由的、毫无根据的害怕。”

罗斯福接着说道：“感谢上帝，我们的困难都只是物质方面的：货币贬值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赋税增加了；我们纳税者的纳税能力降低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商品交换难逃贸易的长河冰封；工业企业尽成枯枝败叶；农产品失去了市场；千万个家庭多年的积蓄付诸东流。

“更重要的是，大批失业公民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但我们并没有遭到什么蝗虫之灾。大自然的施惠依然未减，人们会更加努力。我们手头的资源并不匮乏，然而我们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这首先是因为统治者们的顽固与无能。他们被迫承认失败后溜之大吉，贪得无厌的金融家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他们面临着信用危机，他们只能向外借钱。剥去引诱人们的虚假自私的外衣，他们必

须洗心革面，他们只能含泪求饶来重建信誉。他们只知道自我满足的自私法则，他们毫无想法和见解。”

“金融家们从我们文化殿堂的高位逃走了。现在我们可以让这殿堂仍然回归到古老的真理。”罗斯福充满自信和激情的声音通过无线电广播，传到了全美千百万守坐在收音机旁民众的耳中。新总统以简洁缜密的语言向人民剖析了大萧条中一切苦难的根源，尽管胡佛就坐在离他不到两米远处，而且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

这就是罗斯福连贯而且奏效的政策的开端。通过这种方式，他巧妙地消弭了国民的愤怒，并且在国外敌人的面前，保全了民族的自尊。随着时代的发展，他可以责难包括金融家在内的被告：战争投机者、垄断者、骄横跋扈的大资本家、保守的实业界巨头等等。当感受到身边弥漫着改革净化的气氛后，观众们无不大快。

但是一些和总统有着相似背景的商人和政客却为罗斯福的煽动感到恼怒，就如同他们被罗斯福抛弃了一般。这是美国商人常有的情绪，他们没有领悟到政治的微妙之处——他们只不过被罗斯福拿来先当一下替罪羊，给国内80%的人民一个交代，最终他们的财富还是会受到保护的。

对于其他大多数保守的传统商人来说，罗斯福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有利的。但罗斯福只是表面上的保守罢了，他希望能够对社会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使之避免走上极端，并要保证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繁荣。但是，这一过程并不会通过强制的平均主义的再分配实现。

不管在什么时候，罗斯福都清楚大部分选民的利益，也不愿看到人民中出现分化。在动荡的时代，罗斯福的这一才能不仅帮助美国逐渐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也在左右派别的平衡中始终维持着中央的权威。

除了慷慨激昂地呼吁人们提高自身道德约束以外，罗斯福还认识到：“这个国家需要行动，立刻开始行动。我们最伟大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人们立即就业。”他保证说，通过以工代赈来实现就业救助，这样做“会完成美国亟须的工程计划，可以重新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同时刺激经济增长”。他还保证说，国家会干预农产品价格，帮助城市和农村的小有产者。他再次呼吁“敢为天下先的美国精神”，也保证美国在对外交往时将奉行“睦邻友好”的政策。

他呼吁同胞们“要像训练有素的忠诚士兵一样，为了国家的利益敢于牺牲自己。这样伟大的精神能使我们成为一个神圣的整体，背负着光荣的使命，就像战时的军人一样”。这一说法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而且理由充分，但这也成为罗斯福遭到攻讦的借口。然后，随之而来，民众中间产生了罗斯福可能会推行独裁统治的疑虑情绪。产生这样的情绪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罗斯福的任期刚刚开始，他还没有办法充分展现自己。罗斯福保证将会提出一切“可以恢复这个伤痕累累国家的办法”，而且如果国会不能有效地配合，他还“有最后一种办法来解决危机——通过巨大的行政力量来打一场胜仗，就像战争时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样”。

“我不会辜负美国民众给予我的信任，我将把勇气和努力全部奉献给这个时代，鞠躬尽瘁。

“我们现在面临着严酷的现实，但是我要万众一心……我们丝毫不怀疑民主社会的美好未来。美国人民永远不会失败，但是他们需要直接有力的指挥，他们需要纪律和指示。正是美国人民委任我来帮助他们实现愿望的，我非常珍视这个机会，我会赴汤蹈火，竭尽所能。”

罗斯福的演讲振奋人心，当他结束15分钟的演讲后，所有的人都相信一个崭新的美好时代就要来临，没有任何噱头而只有目标和努力的时代就要来临了。这是美国第一个向全世界范围广播的政治演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首相麦克唐纳和前首相劳合·乔治都收

听了演讲。辛西娅·莫斯利女士写信给罗斯福说，劳合·乔治听到演讲异常激动，并认为演讲空前绝后得精彩。

胡佛总统和他的继任者握手后就离开了纽约。自此以后，尽管有时两个人也会经常同时出现在同一所城市，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1933年3月5日，内阁于午餐后再次在白宫聚会。罗斯福发布命令，宣布全国银行“休假”至3月10日。全国所有的银行都关闭了，禁止金银外运，禁止外汇买卖。

3月6日星期一，罗斯福开始了接任总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3月8日，星期三早上，罗斯福召开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他一生中共召开过998次记者招待会。1921年，沃伦·哈定总统曾经在回答有关海军裁军问题上说错了话，自那之后，也就是罗斯福的前三任共和党总统便形成了惯例，都要求事先写好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罗斯福例外，他从来都是即兴回答记者的提问，并且还将记者招待会增加到一周两次。记者们也得到允许可以随时拿着纸笔到总统办公室进行采访。总统坐在办公桌后，记者们大多看不到他的双腿，他也不自觉地用着例如“我得闪了”、“像拐杖一样有趣”这样的口头禅。他的评论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全白宫式的官话，一类是可以被记者任意使用的背景知识，还有一类则是没有被记录的即兴发挥。

作为一个能言善辩、措辞伶俐圆滑的演讲大师，他折服了在场的125名记者，他也懂得该如何适当地给记者们一些有用的信息。他暗示自己对记者的需要，也巧妙地利用着他们，而许多记者由于受了总统的恭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总统利用了。罗斯福一上台，就得到了媒体的支持并且将之保持到任期结束。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会场立刻爆发出掌声。

和银行家们商议银行立法的过程紧张激烈。芝加哥第一国立银行首席执行官梅尔文·泰勒也积极地参与了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他有好几

次情绪过于激动。白宫的参议员们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伯利和莫利就为此事争论不已。

3月9日，国会特别会议在战时危机的气氛中召开，并在几个小时内通过了刚刚赶拟出来的《紧急银行法》。晚上7点30分，法案即经总统签署生效。该法案授予总统管制信贷、通货、黄金、白银和外汇交易的紧急权力；为了解决银行资金缺乏的状况，它委托各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各银行资产发行货币，授权金融复兴公司用购买银行优先股的办法给它们补充流动资金；为了恢复国民对银行的信任，它规定由财政部对全国银行采取逐个审查并颁布许可证的制度，审查合格者方可领取重新开业的执照；为保护银行储备和防止黄金外流，它授予政府完全控制黄金流向的权力，其中也包括对囤积和输出黄金的行为实施严厉惩罚的权力。

3月8日，各方对《紧急银行法》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最后磋商。与此同时，罗斯福没能成功地说服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出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

3月10日，罗斯福向议会提交了他的经济法案。这个关于指导预算的法案是由刘易斯·道格拉斯起草的，并被命名为《重建美国国家政府信用法案》。它赋予总统降低老兵的抚恤金，并把政府所有职员工资降低15%的权力。其实质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严酷，因为生活所需费用也降低了远不止15%。

3月12日，罗斯福于东部时间晚上10点发表了一个演讲，解释了银行业危机和政府的相应处理措施。美国有1 700万家庭拥有收音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收听了这次讲演。对政府持支持态度的播音员向6 000万听众介绍了总统。他说：“总统想要来到你们的家中，坐在你们的壁炉边，和你们进行炉边谈话。”这一说法很快变成了时髦用语广为流传。

总统确定了银行重新开业的时间表。就在第二天，3月13日，经过财政部审核，认为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会在12个城市重新开张。再过一天，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会在全国250多个城市里重新营业。政府会鼓励当时的银行持股人对有需求的银行进一步投资。金融重建公司也会做这项工作。

在格拉斯参议员的坚持下，各州的银行被排除在立法案的范围之外，只有联邦储备体系的成员被包括在内。不管怎样，罗斯福获得了干预两种类型银行的政治权力。联邦储备体系也对各州的银行提供了资助，使它们中的很多纳入联邦储备体系的监管范围之内。

两天后，情势就很明朗了。总统的银行业法案和他对其的解释大获全胜。在3月底，12.5亿美元银行储蓄回流，4月份又有10亿美元回流。在银行重新开业计划的第三天，也就是3月15日，联邦储蓄体系76%的下属银行恢复营业，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月稳步回升。储蓄者的损失相较于储蓄额总量来说，只占了一个很小的比例。

3月15日，英国驻美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向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汇报道："毫无疑问，罗斯福充满活力，又能够果断地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这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人们的信心。"

Ⅱ

罗斯福的下一步举措就是摒弃荒唐的禁酒令。1933年4月7日，是1920年以来美国国内第一次合法开始售酒的日子。

除此之外，罗斯福还有两个重点关注的问题，一个是分区域试点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另一个是引导人们到环境保护项目中工作。新的农业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要鼓励农民主动减少耕地面积，将产量保持

在一定水平，同时国家针对减少的耕地面积给予一定的补偿。同意此项措施的生产者将可以就产量配额加以讨论，并就补偿标准进行公决，各方观点协商一致后再付诸实施。这项法令实施的目标是稳定农产品和加工品的价格，同那些享受税收好处的工业生产者一样，政府要给予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更多的实惠。而且这实质上也是民主机制的一种体现。对那些非洲裔美国农民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有权利对国家的重大事件参与投票。

由于罗斯福不赞成进一步扩大政府的财政赤字，所以这项法令的资金来源将会是农业加工业上缴的税收。那些受到影响的磨坊主、罐头工业主和批发商则聚集在议会门口反对该法令。他们有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私利，有的仅仅只是为了拖延法令的实施进程。罗斯福则发挥了他一贯的善于协商的精神，并已经想好了对策。3月27日，他召集9个国家行政部门成立了一个独立性的农民救助机构——农户信贷管理局（FCA）。这一机构将负责在接受一些农场主的抵押后，向他们重新提供贷款。这个问题以前一直困扰着农民的生活，因为一半农民都担心他们将会失去自己的土地。亨利·摩根索出任该机构的局长。

4月3日，罗斯福向议会提交了农业抵押救济的提案，并作为农业调整法案的附属第二部分获得通过。第二天，他将全部法案提交到了农业委员会，并声称该项法案必须得到通过。他说，在这样糟糕的情势下，需要快速采取行动降低农业生产，这一法令越早颁布效果会越好。他警告说，如果没有及时实施这一法令，农业生产情况如果继续恶化，委员会要负全责。

议员们当然不敢和这样的警告唱反调，这项法案在第二天就得到了通过。

罗斯福还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创造工作机会，正如他在担任纽约州州长时所做的那样，但是那时的成效并不大。他决定成立一个民间护

林保土工作队计划[注]，来雇用25万失业者从事各项公共事业服务。他在3月21日就向议会提出了关于此设想的提案。联邦劳工协会主席威廉·格林最先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担心这会导致削减受聘工人的工资，他也对军方介入失业者住宿、交通和监督问题持保留意见，他认为有些做法与法西斯相像。罗斯福指出，全国现在有大概1400万失业者，所以不能再考虑这些细枝末节。这项法令很快得到了通过。

纽约临时紧急救助部门的领导哈里·霍普金斯和纽约福利委员会的威廉·霍德森5月中旬抵达纽约。他们想和总统面谈，向他汇报他们向各州直接发放失业救助金的计划，而这与民主党要求重铸各州信誉的政党纲领有所不同。因为得到和总统面谈的机会很小，于是他们就同遇到的弗朗西斯·珀金斯谈了他们的计划，由珀金斯代为转告总统。

总统接受了他们的这个建议，并宣称：除了在广为人知的信用制度和财产让渡方面与之前的承诺存在差别外，这个计划与党纲并不相悖。罗斯福要求议会建立紧急救助机构，并很快得到了答复。霍普金斯被提名为联邦救济计划执行官。他的工作效率很高，并很快使自己成为总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和最全能的合作者。

3月末，参议院在农业救济法案上迟疑不决，相比之下，众议院却无事可做，于是政府向众议院提交了一系列关于安全保障措施的法案。罗斯福习惯将同一项工作分配给他的政府中相互平行又相互竞争的组织去做。这次，他同时让雷蒙德·莫利和商务部长丹尼尔·罗珀去分别起草一个立法提案。之后，他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直到两份报告都交了上来，他又让莫利去负责商品和股票交易，而让罗珀去负责证券市场。

罗斯福于4月10日回到改革的主要进程中。他要求议会建立田纳西流域工程计划——“一个拥有政府权力的公司，也是一家具有自身灵活性和原创精神的私人企业”。这一点对于总统来说至关重要。它也将成

为全世界范围内工程学成就的一次成功展示。从诺克斯维尔[注]到帕杜卡[注]将建造起1 000多千米长的一条可供航行的河道，那里也会建造起巨大的相关企业。

4月和5月，罗斯福想要进一步深化激进式的改革，却在议会里遇到很大的阻力。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雨果·布莱克提出每周30小时工作制的计划，并宣称这样将会推动各地就业形势的改善。其他议员也提出了一个60亿美元的就业计划。罗斯福对这两个方案都不甚赞同，但又不想和以前曾共同推进改革的伙伴发生争执。

罗斯福在白宫的工作状况同过去在奥尔巴尼的情况类似。他8点半起床，在床上享用早餐，之后就开始阅读《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或其他报纸，还会阅读豪为他准备好的剪报。无论是阅读，还是刮胡子，抑或穿衣，罗斯福都需要侍者的帮助。在他执政之初，除了他的亲人外，他的密友还有莫利和道格拉斯会帮助他料理饮食起居。有了他们的帮助，罗斯福才能在每一个工作日游刃有余。

10点30分，他来到办公室，在那里他会一直待到晚上6点。他会和每位到访的客人交谈大约15分钟。但是他经常忘了时间，结果满屋子挤满了相互之间根本不认识的访客，他干脆一同接见。起初他在办公桌上草草结束一顿午饭，白宫开始甚至无法确保给他提供热的午餐，后来才提供了加热炉。2点至3点是他处理信件的时间，他每天会收到4 000~7 000封来信或来电，然后让他的助手们帮他进行一番筛选。罗斯福在回信的时候总能做到平易近人，他很少用专用的公文纸写回信，信中也只字不提他本人。

3点后，总统有可能出席记者招待会或是每周一次的内阁会议。所谓记者招待会不过是罗斯福的宣讲大会，他一向和媒体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下午5点是他的“孩童时间”，此时一天的工作大体已经结束。接

下来他可能会在室内游泳池畅游一番，然后再自己调上一杯鸡尾酒尽情享用。晚饭后，他还会考虑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午夜时分才沉沉睡去。

III

新成立的德国政府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它让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试图通过一项裁军计划，并同时保证给德国军队两倍于《凡尔赛和约》中限定的军队上限，还想把法国军队降到同一水平。但这一计划中既没有体现出英国对法国的保证，也没有体现出任何倾向德国的边境修改措施，因而双方都未能接受。

应罗斯福之邀，麦克唐纳在4月底访问了华盛顿。当他还在途中时，他得知罗斯福已经脱离了《托马斯修正案》中所限定的金本位制了。他的助手建议说，他们还不如在船一到纽约就直接坐上回程的船回英国，因为美国的这一举动让他们事先希望的货币协议化为了泡影。这事情有些滑稽，麦克唐纳却是一个乐观的领导人，他支持和平，而在他政治生涯的末期，在英国国王的敦促下——实际上也是被他的对手保守派所操控的，竟然决定和美国总统签订什么协议。

罗斯福和他的妻子、女儿在白宫会见了麦克唐纳和他的女儿及助手。这次出访无果而终，但罗斯福给麦克唐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麦克唐纳在等候罗斯福的时候，法国刚刚卸任的总理赫里特也来了，他现在仍然是法国国民大会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就这样，在4月24日下午，英国代表团、法国代表团再加上到访的加拿大总理理查德·伯奈特，挤满了白宫的走廊。

希特勒上台没多久，反犹太主义者的压迫就已经出现了，并且还呈现出逐步升级的趋势。罗斯福和国会将这视之为一种大屠杀[注]，虽

然对之感到十分厌恶，但也认为这只是德国的内部事务。4月时，希特勒在回应由于他的行为而挑起的民间批评时，公开指责美国的顽固和虚伪。

布兰代斯和弗兰克福特非常小心地试图说服罗斯福，争取让更多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进入美国。但国会拒绝了这一提案。他们认为这是对德国内政的干涉。

1933年4月初，在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两个月之前，罗斯福便告诉法国驻美大使保罗·克劳德说："希特勒是个疯子，他的顾问中有几个人我认识，也都是疯子，而且比希特勒疯得还厉害。"

希特勒于1933年5月派沙赫特来到华盛顿，讨论德国债务问题。沙赫特声称，当他告诉罗斯福德国将不再支付他所欠贷款的利息时，罗斯福乐了，他拍了一下大腿并且评论说，这可是"华尔街上的那些银行家们自找的麻烦"。但关于沙赫特的这段往事无法得到证实。

第二天，罗斯福代发了一个语气十分严厉的备忘录，他在里面写道，自己对德国的表态感到震惊。罗斯福描述了他和沙赫特的会面情况，毫不留情地斥责了沙赫特。在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访问华盛顿的一个月后，当希特勒停止付款时，罗斯福也顺水推舟地给英国和法国帮了点小忙，帮他们缓解了一定的压力。

但国际裁军大会仍继续陷入僵局，并于当年秋天休会，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达成过任何协定。1933年底，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并公开宣称不承认《凡尔赛和约》。

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内，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和最大的投资商。1929年，美国的出口额占世界总额的1/6，进口额占世界总额的1/8。从经济角度而言，美国之于世界比世界之于美国重要得多。1933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大会在伦敦召开。与会者认为美国几乎与所有其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经济不平衡问题。胡佛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持相似的观点，他也认为大萧条是外部经济使然。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出现了大萧条。

罗斯福一直对这次会议抱有异义，他认为胡佛是想推脱自己对大萧条应负的责任。罗斯福也了解，欧洲会认为美国应该对这次大萧条负主要责任，是因为这样可以为他们找到逃避处理自身问题的借口。对于欧洲的这种反应，罗斯福比起绝大多数他的继承者而言，没有太多的耐心。

从罗斯福确认的参加这一会议的代表名单中不难看出，罗斯福没把这件事看得太认真，只是由赫尔带队参会。

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重建金本位制，稳定货币并且降低关税壁垒。在主要工业国家之间，关税水平千差万别：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平均水平大约是30%，而意大利是17%，法国和德国是12%，英国仅为4%。

不管能否重建金本位制，如果各国同意稳定货币间的汇率，那么困难很快就会接踵而来。欧洲曾经希望重新确立金本位制，罗斯福则拒绝在这一问题上发表任何评论。罗斯福仅仅准备承诺单方面避免美元对英镑的比价跌至1英镑兑换4.25美元以下，而这一承诺对于美国人而言还是可撤销的。

罗斯福于6月17日乘火车离开了华盛顿。他的黑眼圈很深，摩根索从未见过他如此憔悴。他将前往马萨诸塞州，然后乘船出海，重游他12年前离开后一直无缘再见的故地。

罗斯福下了火车，改乘敞篷车经过波士顿，并前往格罗顿，大约25万狂热的群众向总统欢呼。罗斯福很高兴地在这里与妻子和儿子聚首。然后，他驱车前往马萨诸塞州，开始了他的航行。

由于大雾的影响，罗斯福在缅因州多停留了两天。在休整之后，他得知美元已经在1英镑英镑兑换4.3美元处止跌的好消息。伍定生了病，财政部副部长艾奇逊等人则告知总统，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瑞士已经发来了电报，不同意美国这种单方面行动，不允许美国通过在海外出售黄金并回购美元来拉动美元的做法。而美国这一行动如果失败，他们也会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度。代表自身小集团利益的艾奇逊则反驳说，这样会耗尽美国的黄金储备。艾奇逊建议在特定的基础之上，同英国、法国进行协商合作来控制货币的稳定。

正如罗斯福事先预料到的，美国在这次会上遇到的问题是美国提高商品价格水平的行动，这项行动在美国国内已经奏效，尤其是在农产品方面。小麦的价格也已经从每蒲式耳(注)30美分升到1美元。罗斯福认为需要采取反紧缩的政策来使经济平衡实现良性循环，同时刺激经济活动并增加就业。美国的这种做法是与大会希望在金本位制度下达到货币稳定这一目的相悖的。罗斯福竭尽所能来将大会的这一倡议和自己的通胀政策相结合，当然罗斯福更加倾向于自己的经济政策。他无法让自己的政府和大会的倡议完全保持一致，尽管他已经尽力了，显然在这次国际大会上要统一观点是不可能的。

6月27日，莫利来到英国，第二天参加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对赫尔的支持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总统认为，无论是部分国家或所有国家都放弃金本位制度，对美国都不会有什么损害，他对法国能坚持金本位制度也没有信心，他认为即使维持国际货币稳定，也没什么实际好处。艾奇逊认为总统的这一想法既不明智也不恰当，所以没有把这些消息告诉赫尔。莫利随之参加了一系列关于稳定货币的谈判，同样为罗斯福的观点进行多方交涉。

6月29日，罗斯福受不了大雾的多日耽搁，决定起航。尽管他离开海军已经12年了，但他熟知地理环境，技术熟练。经过大概10小时的航行后，总统一行人到达了帕萨马科迪海岸，这里阳光明媚。在接近码头的时候，罗斯福向岸上的人群挥手致意。罗斯福当时一定非常激动，因为他又回到了自己曾经面对挑战的地方。战胜疾病的胜利喜悦超过了他的想象。但是他没有太过夸张地表现出来，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受过病魔的侵扰一样。

6月30日，海滩上举行了上百人共同参加的野餐会。结束后，总统等待莫利将要发来的重要电报。

夜静悄悄的，总统和官员们的讨论继续进行着。摩根索继续坚持着他的经济理论，他坚持可以通过在时价之上购买黄金来把美元变为商品，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他还用图表和图片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然而罗斯福是对的，任何关于稳定货币的计划都没有成效，而只会让美国耽误时机。但他也同意一些《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注)（Kellogg–Briand Pact）里无伤大雅的经济观点，只要对新政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就行。

由于罗斯福在国内政策所制定的战略，他的决策班子对他都有所不满，而在欧洲，很多人更是给他扣上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针对胡佛认为大萧条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言论，罗斯福需要进行反击。此外，罗斯福也不认为非要死守着金本位制度不可，或是仅仅通过平衡收支就能解决问题。如果那些主要的工业力量侵害了金本位制度和固定汇率制，那么人们就只能让大萧条持续下去，而这也会阻碍经济的复苏。另外，由于罗斯福的变化无常和“目空一切”，伦敦会议并没有带来罗斯福希望的经济成果。在美国议会拒绝通过《凡尔赛和约》14年后，罗斯福无意中强化了欧洲人的想法——他们认为20世纪的国家力量是不平衡的，美国人也是靠不住的。戴高乐建议罗斯福挽救法国的

衰弱，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也谴责罗斯福用“铁幕”将欧洲分为两个阵营，欧洲的环境学家认为全球变暖主要是美国的责任——欧洲已经习惯把世界所有的缺陷都归结到美国人身上。

在伦敦，奇·皮特曼已经让美国政府买断未来4年全国的银矿工业，这可能是会上最重要的成果。内华达州颇有名望的银矿业大亨皮特曼劝说罗斯福不要通过参议院来通过这项决议，而要利用托马斯降低通胀修正案得到授权。罗斯福于12月21日通过了这项决议，并宣布要以高于市价21美分的价格购买全国的银矿。

V

休·约翰逊曾经这样评价《国家工业复兴法》：“开始时热火朝天，后来蔫得像死猫……就像把动物零星的杂碎放到断头台上，斧头根本起不了作用。”罗斯福和他的主要同僚明白，股市的上扬和商品价格上升不过是心理作用的结果，这都是建立在部分放弃金本位制度后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预期之上，也受到了罗斯福支持的反通货紧缩政策的影响。工业产量指数在1933年3月到7月上升了45个点。同一时期，农业产品价格也升了32个点，纽约股票上涨了85%，贸易额更是涨了5倍，但就业率并没有比同期提高。1933年3月到7月，工业产量增长了67%，尽管工资涨了35%，但工厂就业率只提高了22%。失业人数虽然减少了很多，但这毕竟主要是由国家复兴署采取减少工作时间的方法带来的。

但国家复兴署成功地顶住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制定了全国工资和工时标准，并禁止雇用童工，还废除了其他一些剥削制度，给200万人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

休·约翰逊原来的设想是通过减少工作时间，7月一个月内就能提供5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两个月后会缩小到300万。由于通货膨胀，很多存货得以以高价卖出，获得了很多不正常的收入。这也引出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是否存在违宪的问题，当时赋予《国家工业复兴法》的权力暗含了该组织可以提出或者坚持工业法令，而这样的权力则可能违反了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也可能剥夺了各州的权力。

《国家工业复兴法》和国家复兴署（后者是前者的执行机构）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它们刺激了价格和工资的提升，但价格和工资水平同时上升并不会解决就业问题，也无益于投资。虽然有了更多的钱，但还是只能买到和过去等量的产品或服务。国家复兴署正是一只手把东西往你口袋里放，另一只手又把它给拿走了。提高价格就会抑制产量的增长，当然也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了。

从国家复兴署中得利更多的是有产者，而不是法令起草人原本希望惠及的那一部分群体。从一开始，官僚主义的因素就不可小觑。由于国家复兴署本来就与工业、劳工和消费者咨询理事会纠缠不清，国家复兴署的首任署长还得由商务部长提名。

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作为国家复兴署的署长，休·约翰逊将军决定开展更有效率的工作，并尽可能地多方寻求资金，更多拉动内需，让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休·约翰逊为国家复兴署制造了很大声势，并把纳瓦霍[注]雷鸟作为国家复兴署的标志，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蓝鹰标志。

雇主们对成立工会的抵制，推动了休·约翰逊和他的同僚们开始改变观点。他们开始接受在公司内成立公司工会，也简化了执照发放程序。

6月底，通过了比较容易实现的《棉纺织品法令》，这是第一个巨大成功。约翰逊焦急地等待着结果。7月，赞同该条款的人数开始增

多，到8月随着500多人的加入，国家复兴署的签约人已经增加了9倍，人们纷纷支持《总统再就业协定》。罗斯福在8月签署了多项文件和法案，到了秋天几乎一两天就要签署一份。有些较大型的法案仍要在工资数额基础上，再同国家复兴署的工人们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以此保证他们既能得到实惠，也能参与竞争。7月底8月初，关于船舶制造、发电和服装业的一些重要法令都获得通过。

罗斯福从海德公园回来后，就于8月14日到20日进行了石油、钢铁、煤炭和木材领域的谈判。他召见了美国联邦钢铁集团主席泰勒和钢铁公司大亨查尔斯·斯奇威伯，但是因为这些大型钢铁公司不太愿意同政府谈判，他就授权劳工部来代表钢铁业界的工人。珀金斯谨慎地担负起这项重任，不遗余力地游说着宾夕法尼亚及其周边州的钢铁公司，而她的所见所闻却让她大吃一惊。

在将这些钢铁业大亨的高工资和奖金与珀金斯统计的数据进行比较后，罗斯福更偏向于泰勒和斯奇威伯一边，最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钢铁行业中的统一标准。

在煤炭业内要达成统一更不容易。矿工联合会的负责人约翰·路易斯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自他在1919年接手工会以来，工会成员就减少了3/4。《国家工业复兴法》通过后，路易斯就派出成批的人手到矿区分发印有“总统要你们加入工会”的小册子。不料，工人们竟开始了罢工，宾夕法尼亚还因为混乱造成一死多伤的事件。

在此情况下，罗斯福的朋友，也是该州州长吉福德·平巧特紧急召集国民卫队。罗斯福成立了一个专门法庭，并让参议员瓦格纳就煤矿纠纷做出评判。他对该工业了解的深入与丰富还打动了一些煤矿头子。他警告这些老板们，不要让煤矿成为流血之地。10月，煤矿业也终于通过了该法令在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和库存等方面规定。但此时钢铁公司还是不同意进行全国秘密投票，也不为罗斯福的诱惑和恐吓所动摇，因此钢铁业内进展还是不大。

汽车制造业于8月底通过该法令，包括同意在工人做出成绩后可以被提升到管理层的决定。自从3月起爆发罢工后，罗斯福和史密斯就设法协调国家和工会之间的利益，最终也在保留公司工会、营销商店及一些工会的整合上达成了一致。亨利·福特在这些问题上都表示弃权。

罗斯福试图在认可工会这一问题上持两面态度。1934年他还承认统一交易单位的代表权，但是几天后，约翰逊就表示这样有可能导致持异议者组成另外的交易单位。

实际上，国家复兴署总体上制止了低于成本价格的恶性竞争行为，《工业复兴法》中的这个目标大体上也已经实现了，但约翰逊还是会愤怒地看到一些不法商贩借“上帝之名”蓄意压低价格。

VI

与《国家工业复兴法》相比，《农业调整法》实行得更为顺利。农产品价格从3月到7月上旬上升得很快。到1933年夏天，美国各种农产品都存在一定的剩余。当时全国共有1亿多英亩(注)耕地种植了玉米，有4 000多万英亩的小麦，这些都超过了规定。在《农业调整法》的计划下，农业部长需要把多余的耕地作为他用，否则农民要么就得签约放弃耕地，要么就得自行处理积压农产品。

《农业调整法》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派驻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做的，他们雇用了一些技术过硬的农技人员和农民来工作。这样一来，《农业调整法》和美国农场联合会的关系也加深了，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有想法农场主的利益。

实际上，销毁数以万计的粮食可能会遭到社会千万饥贫者的反对。于是，大约有1/10的积压粮食被分配给了有需要的穷人，杰罗姆·

弗兰克是提出这个绝佳建议的人，他也是被新政吸引到华盛顿来的。

弗兰克、塔格威尔和霍普金斯为联邦剩余产品救助公司制定了一个方案，呈给罗斯福。罗斯福于1933年9月21日签署了行政令拨款7 500万美元，并增加了处理积压衣物的法令。这个公司为商品信贷公司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后者给农民提供了略高于物价涨幅的贷款，农民可以用农产品作为抵押获得贷款，贷款的年利息是4%。这样农民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商品并得以偿还贷款。这是新政中罗斯福引以为傲的一项经典策略。

1933年秋，尤其是在农业大州都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国家复兴署实际上是政府支持的为大企业谋福利的垄断机构，对农民而言只不过是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而已。这样，《农业调整法》不得不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并进一步开放农业抵押信贷。但是7月在农产品价格和市场都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只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将剩余产品脱手。这种绝望的状况使得米洛·里诺和他的农民假日协会威胁罗斯福要进行农民大罢工。罗斯福对摩根索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拿枪对着我。"里诺的农民组织在华盛顿受到罗斯福、华莱士、匹克和摩根索的接待，并且鼓励农民行使自我保护的权力。

罗斯福和往常一样，关注着政治上的危机，也在着手解决这些危机。政府内部对是应该健全货币体制还是恢复金本位制存在争论，在是否应该通货膨胀问题上观点不一。

罗斯福考虑到，现在农民正处于爆发的边缘，再渊博的理论家也解决不了问题。农民们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了太多的苦痛，经济上和心理上的负担已经到达极限。《农业调整法》只是刚开始发挥作用。

罗斯福开始认定，甚至里诺也认同，经济复苏最大的绊脚石就是"银行家的阴谋"，他们策划要把罗斯福束缚到不合时宜的"健全货

币”政策中去。罗斯福在回应货币委员会的报告时说“我既不喜欢也不赞同这个报告”，罗斯福还批评了这些委员根本不了解情况。

罗斯福在10月上旬最终决定通过乔治·沃伦的建议，同意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买黄金，然后使美元略微贬值，但却遭到了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的阻挠。他根据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反对这项计划。罗斯福在面临农业崩溃的危险下，很有魄力地处理着这种细节，他没有时间同艾奇逊多费口舌。罗斯福要他辞职。

伍定此时也因喉癌病重，提交了辞去财政部部长的申请，罗斯福一贯关心他病中的同事们，他建议伍定留职休假。

摩根索手下的农场信贷局的律师们在睿智的赫曼·奥利芬特的带领下，要求《农业调整法》能够提供更多的水利自主权，并给予总统必要的授权，他们还建议金融复兴公司在市场上购买黄金，并以这些黄金作为抵押从财政部获得贷款，并用这些贷款在市场上继续购买黄金。

1933年10月19日的白宫会议上，这些建议被提了出来。艾奇逊激烈反对，而反对方的律师们此时则极力维护自己的立场，罗斯福最后拍了板：“我认为是合法的。”

莫利虔诚地给罗斯福撰写炉边谈话稿，尽管他个人并不同意购买黄金的政策。这次电台演讲是第四次炉边谈话，于1933年10月22日向全国广播。总统宣布说：全国已经有超过100万人重新找到了工作，30万人参加了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计划，很多人已经在不同的岗位谋到了新的职位，不再需要政府的救济了。他宣称33亿美元中的21亿美元已经发挥了作用，也承认资金没有得到完全利用的唯一原因就是官员的浪费。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伊克斯谨小慎微，在采取行动前犹疑不决造成的拖延。

罗斯福提到了在帮助拖欠贷款人们重新获得抵押中取得的成果，他说道：“如果美国境内有家庭要失去房屋，可以立即电报美国农业信贷管理委员会或者房主贷款公司来寻求帮助。”

罗斯福宣布说，农民收入已经比一年前增长了33%。他还补充说，由于这一数字只是平均值，也有一些家庭并没有变得比以前富裕。罗斯福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对农业收入的增幅并不满意……我们的政策还没有收到太大的成效。如果这种方式不行，我们就再去试另一种。只要努力，我们就一定能行。”

罗斯福对国家复兴署的成果做了高度评价，尤其是在结束雇用童工问题上的成果。最后，他表明一定要提高价格水平，并打算进一步使美元贬值。他说，事实上，他打算用适当的通货膨胀来拉动经济复苏，然后再像政府内部某些人主张的那样去稳定货币。这样难题就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同时解决失业问题和财政平衡问题。罗斯福娴熟地依次实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消费、通货膨胀、整顿，然后是稳定和平衡财政。

在美国开始重振之时，罗斯福开始寻求与他国更自由的交流，因为美国的市场和货币已不再受到他国事件的很大影响了。于是自由贸易倡导者、财政平衡者和金本位制度支持者又加入到罗斯福的旗下，罗斯福需要创建“一个政府主导的黄金市场……并且拥有明确清晰的权力……政府需要继续保持威信，稳定的货币制度需要商品以保持一定价格水平为前提”。

还有一个艺术性的政治决策。罗斯福承诺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实现货币的长期稳定，并宣布他将对接下来的通货膨胀享有权力（尽管那个财政部副部长认为是非法的）。

黄金价格制定的程序在开始时进展得并不顺利，以至于3天后，即10月25日，艾奇逊又开始了进一步挑衅。摩根索和杰西·琼斯来到了罗

斯福的卧室进行讨论。罗斯福将金价由每盎司（1盎司=28.3495克）29.8美元提高到了31.36美元。此后，金价每天的变动幅度控制在10美分至22美分之间。这一举措是要把黄金价格稳步提升而不至于造成金融市场动荡，也避免计投机者钻空子。

11月中旬，金价已经涨到每盎司33.56美元，每一元美金的含金量也从66美分降到了61.6美分。罗斯福并没有事事征询摩根索的意见。11月3日，摩根索要求将金价提得再高些，罗斯福揶揄了摩根索，责怪摩根索自作主张地把金价提高了21美分，理由仅仅是21是总统的幸运数字7的3倍。

10月29日，白宫召集了财政部、美联储、金融复兴公司和司法部的一些相关官员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罗斯福阴沉沉地说："如果谁要是不同意黄金购买计划的话，可以离开，想留下就不要反对。"谁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有伍定由于身体太虚弱提前回去了，并告诉艾奇逊说，总统要他批准财政副部长的辞职，而他自己也想要同时辞职。

摩根索将沃伦的商品美元理论介绍给罗斯福，并激发了赫曼·奥利芬特有力的法律观念。作为回报，罗斯福任命摩根索取代艾奇逊的职位，尽管摩根索不太精通经济理论，也比不上艾奇逊那样聪明。

艾奇逊的辞职信写得礼貌又值得尊敬。后来，当罗斯福听说艾奇逊并没有失职，而路易斯·道格拉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时，他又后悔了。20年后，当艾奇逊回忆这段经历时，认为他当时的举动"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也没有认识到总统的难处"。他不确定他做得到底对不对。

这次会议结束后，罗斯福表示"如果他不重定黄金的价格，国内将会爆发土地革命"。实际上，弗兰克福特认为这只是一时的辩解，太过"不成熟"。几个月后，罗斯福把价格定在1盎司35美元，这一价格维持了40年。1934年1月颁布的《黄金储备法案》使这一价格得以确定，

也对总统在贬值美元上做了一些限定。黄金购买计划尽管收效不大，却是罗斯福抵御里诺和他的农民组织的一个重要举措。其实，罗斯福并没有对这个计划寄予太高的期望，它只不过是自己在公开场合的一种象征性的表态而已。

1933年11月，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来到华盛顿，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剩余产品救助公司试图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已经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小麦、黄油、苹果，但收效甚微。罗斯福和匹克看来都赞同来访州长的建议，但亨利·华莱士却认为州长们的建议可行性不大，因为这需要投入50万名工作人员，而这样的价格机制也很容易催生腐败。

罗斯福和他们足足会谈了4个小时。会后，州长们并没有完全达到原有的期望值，但是他们5人中的4位已经被罗斯福的言谈举止、个人魅力和对公共关系的把握深深感染了。

Ⅶ

根据1933年11月17日美国和苏联签订的协定，美国与苏联互派了大使。双方都在庆贺“两个伟大的共和国家”的建交。

罗斯福认为，在苏联没有外交关系的时期内，它可能会偏离航道，但随着希特勒不断叫嚣加强德国力量，如果让苏联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害处将会更大。

伊克斯在公共事业和鼓励就业的问题上行动迟缓，1933年冬，罗斯福终于大动肝火。在11月上旬的一次视察后，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进行了午餐谈话。罗斯福有意让霍普金斯承担伊克斯的很多任务。霍普

金斯告诉总统，他们必须在冬季创造400万个就业机会，罗斯福和霍普金斯都认为该计划可以使用伊克斯未充分利用的预算款。罗斯福派霍普金斯、华莱士和珀金斯就这个决定向伊克斯提出建议。伊克斯难得地欣然接受了建议，随后根据总统的指令成立了民用工程署（Civil Works Administration），联邦救济计划的执行官霍普金斯理所当然成为了领导人。

民用工程署纯粹是一个联邦政府倡导的计划。一半的工作人员是救助者名单中的，还有一半是需要得到经济救助的。霍普金斯和他的同事极大地展现了自己的才智，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在没有影响到原有工人的前提下，为400万失业者安排了工作。在1934年萧瑟的冬天，民用工程署兴建或修缮了80万千米的公路、4万所学校、3 500座广场和公园以及1 000个小型机场。民用工程署承揽的最大工程当属蒙大拿州的议会大厦。民用工程署还建造了巧夺天工的匹兹堡学习教堂（Cathedral of Learning in Pittsburgh）。如果没有这些规划，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民的生活将会更艰难，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

四位领导中，霍普金斯将公共事业看作是对民众的帮助，而伊克斯认为是劳民伤财，休·约翰逊相信这样做可以刺激工业发展，而道格拉斯则完全不屑于这些观点。

霍普金斯还提出在1934年春天将这项计划推广的想法。罗斯福让人对民用工程署的功劳进行了报道，从正面进行宣传。民用工程署有1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其中80%的资金用于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直接花在以现金形式支付的工资上；而剩下的20%的资金也都直接流向了个人消费。

借着这股东风，霍普金斯在民用工程署的名义下开展了“联邦文艺计划”，这个计划提供了3 000个类似作家、音乐家、雕刻家或是油漆工这样的职位。这个计划和帮助那些从事服务工作（比如铺路修墙）的计划不同，得到的支持更多是来自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文化社团。

罗斯福深知那些知识分子就像电影演员一样，他们的地位已经沦落到了平民，需要得到总统的关注与支持。当数年后他遇到戏剧奇才奥森时，他真诚地说道：“奥森，你和我都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罗斯福和霍普金斯都坚持要让那些付出的人得到回报，而不是单纯地给些援助。这种想法在商界存在着异议，他们认为这样做会给社会的福利体系和最低工资制度带来冲击。罗斯福认为要给工作者以尊严，也要让他们养成工作的习惯，当失业者得以通过工作养家糊口时，他们的人格会比等待救济的人要高尚得多。

1934年春，罗斯福让民用工程署保持低调，因为他担心受救助的人们会逐渐兴起，成为一个阶级。他还考虑到这个计划的成本，不想让政府取代私人部门成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原动力。“我们不能老是救助，好像国家永远陷在萧条中一样……人在温暖的天气里是饿不死的。”这些话道出了罗斯福的心声，他可不是个软心肠的人。

1933年底，曾占国民人口总数比例2/3的失业人口基本上都摆脱了困境，他们已经不用担心会失业了。他们对这位新总统充满信任，也乐观地认为困难总算过去了，经济正在蓬勃复苏。罗斯福已经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把那些极端分子远远地甩到了身后。

总统曾经失望地向弗兰克福特写道：“那些有产者应该意识到，在所有的利润回报机制之下，我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可是他们眼拙都没能看出来。”其实他不该为此感到惊讶，他完全知道美国最富有的股东和管理者都缺乏政治热情和政治智慧。他明白要想得到那些人的赞许，还得说出更肉麻的溢美之词。

罗斯福还是能够把握政府中大多数人的导向，能够洞察大多数人的需求。他更像一个熟练的指挥家，他的乐队能够和谐地奏出一首交响曲，完全不受杂音的干扰。罗斯福度过了他前10个月的任期，他确

实是个优雅、精明、受欢迎的领导者。但是在他的伟人风范背后，经济发展还远不成气候。要证明他是一个卓越的伟人而不是只会耍小聪明，尚需时日。

---

1. 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计划是受攻击最多的一项计划，它吸纳18~25岁的失业青年，由陆军部、内政部、劳工部和农业部共同管理。——译者注
2. 位于美国田纳西州东部的城市。——译者注
3. 位于美国肯塔基州西部的城市。——译者注
4. 此处的原文是pogroms。在当时，这个词指沙俄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来泛指集体迫害，通常是受到官方鼓励的大屠杀或迫害，尤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或屠杀。——译者注
5. 一蒲式耳合36升。——编者注
6. 弗兰克·比灵斯·凯洛格（1856~1937）于1925~1929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他倡议签署了《凯洛格–白里安条约》（1928年），得到62个国家认可。他因此而获得1929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7. 纳瓦霍是居住在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东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是美国同时期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人口最稠密的。纳瓦霍族人以豢养家禽、纺织、制陶和银器而著名。——译者注
8. 1英亩=40.4686公亩=6.072市亩。——编者注

08
永远别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1935年5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亨利·摩根索如是说

I

受人尊敬的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向罗斯福总统表达了对他的敬意，称颂他没有凭借专制或压迫来维护统治，是唯一能给经济复苏带来希望的领导人。凯恩斯反对当时已在实施中的黄金购买计划。他建议采取一项大型的以政府债务来提供资金的公共工程计划。罗斯福对于这位英国学者的建议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还是让弗兰克福特转告凯恩斯，美国的公共工程预算将会在1934年翻一番。

1934年春天，弗兰克福特安排凯恩斯去拜见罗斯福。两人都向朋友们称5月28日到29日的这次会晤非常成功。但他们还是恐怕有些过于乐观了，罗斯福虽然总是能很好地伪装自己，但他对于居高临下的学者感觉并不是很好，除非他们像弗兰克福特那样谦卑。

罗斯福是一个理性、有学识的人，但他首先是一个继承了罗斯福家族传统的行动派，而并非生来是理论家的崇拜者。凯恩斯曾是罗斯福一个狂热的崇拜者，但现在面对面，却发现“总统说话不够有涵养，对经济的了解也不深”，这让他颇感失望。凯恩斯还善于根据人们的手相去评价性格，他发现罗斯福的手浑圆有力却不够灵巧，并且有着“像生意人似的短而且呈弧形的指甲”。从社交层面上看，这次会面是非常

顺利了，但两人之间却没有以此为契机建立长久的友谊，尽管凯恩斯的建议仍然使罗斯福感到有用。

1934年1月30日，也是总统52岁生日那天，在名为“出现缺陷基金会”（March of Dimes）的推动下，小儿麻痹症研究的年度基金启动了，同时，遍布全美的6 000多个大小政党都同时向“温泉基金会”提供了捐助。总统同时向他们做了广播演讲。由商界领导者组成的一个强大的团体被召集来支持总统钟爱的事业，仅第一次的游说就筹集到了100万美元。

他的生日也是“链扣俱乐部”（Cuff Links Club）聚会的场合，这一俱乐部是由1920年罗斯福竞选副总统的支持者组成的。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以罗马为主题庆祝会上，罗斯福像恺撒那样穿着长袍，戴着桂冠，而其他人则穿着比较普通的衣服。

1933年到1934年的冬天，对国家复兴署的谴责在不断增加。固定价格协议遭到强烈反对，商会被国家工业复兴法中第七部分第一款所批准的集体谈判原则惹怒了。尽管政府仍受到民众支持，而且也确实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在协议被通过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国家复兴署还是被视为1934年春天的一个败笔。而进步的功劳却都落在那些大型企业和大型工会身上。

1934年2月参议员海拉姆·约翰逊成立了一个国家复兴评估理事会。理事会召开了公开听证会，并对复兴法的大量主要条文进行了评估，5月达罗提交了他的初步报告。报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他公然指责复兴法制定者对垄断的偏好，还声称国家复兴署压迫小商人。这引发了一场分歧，但达罗在公共关系论坛上仍坚持己见。

自由主义者之间广泛散播传言，说国家复兴署偏向大型实业家。作为回应，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于1934年5月提出了《劳务纠纷议案》。

罗斯福默许了瓦格的提案，但多数改革派的参议员有些异议。有的参议员虽仍是罗斯福计划的支持者，却认为总统很狡猾而且表里不一。

新政中，机制改革的一个基础就是确立证券事务法规。罗斯福从未停止抨击那些投机交易者以及有着类似想法的无耻之徒，而这正是一个既有象征性又有实质内涵的机遇。本·科恩、詹姆斯·兰迪斯等在1934年初起草了一份证券与交易法草案，并在2月10日呈交国会。草案要求对新局势进行认真总结，及时公布上市公司的业绩，并禁止股市上一切可疑的暗箱操作行为。

出于理查德·惠特尼为领导的对现行金融业强烈敌视势力的压力，草案做了一定的修改。最终，这一被认为是理智而必要的改革的《证券与交易法案》在1934年6月6日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为执行新的法规，法律规定成立由总统指派5人组成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罗斯福任命了5人，其中包括詹姆斯·兰迪斯。最令人吃惊的也是最鼓舞人心的，是任命约瑟夫·P·肯尼迪为主席。当时舆论对于肯尼迪的股市欺诈行为的悲叹和惊讶甚嚣尘上，罗斯福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让贼去捉贼吧。"他正确地判断肯尼迪非常清楚新法案所要制止的那些投机行为，而且他会诚实地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此外，国会还通过了一项通讯法案并建立了联邦通讯委员会，还通过了铁路退休法案为铁路工人提供养老金。

如我们所见，罗斯福总是密切关注那些显要的美国人，他认为这些人拥有在正常民主政治之外唤起大众支持的潜在危险性。肯尼迪将会有一段时间忙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而赫斯特难以抵挡罗斯福的劝诱。罗斯福将麦克阿瑟作为陆军参谋长的任期又延长了一年，然后在1935年把他派到了菲律宾，负责准备适当的军事力量为该国独立做准备。罗斯福解释道："我们必须驯服这些家伙，使之为我们所

用。”罗斯福要把麦克阿瑟和肯尼迪放在一个可控制而又不会妨碍到他的地方。

尽管在拨款给军队的问题上存在激烈争论，罗斯福还是维持了对麦克阿瑟的职务安排。陆军部部长乔治·德恩和麦克阿瑟拜访了罗斯福，后来麦克阿瑟写道：“总统把一大堆讽刺加在我身上……我感觉全身无力，还有点倒胃口。”他声称他曾对罗斯福说：“当我们（已经）失掉下一场战争，一个被刺中的快死掉的美国男孩说出他最后的诅咒，我希望被诅咒者的名字不是麦克阿瑟而是罗斯福。”总统的脸色变得铁青。他吼道：“你不能这样对总统说话。”

麦克阿瑟道了歉，也提出了他的辞呈。罗斯福用一种冷静超然的态度（这显示出他有非同寻常的自制力）回答说：“别傻了，道格拉斯，你和预算必须是连在一起的。”罗斯福用这种口气是不想使麦克阿瑟成为一个普通公民。即使20年之后，麦克阿瑟写回忆录的时候，这位将军仍然无法得知罗斯福对他有怎样的政治评价。

国会任期结束后，罗斯福通过副总统约翰·加纳和众议院议长亨利·雷尼给议员们发去了祝贺信。罗斯福写道：“这届国会对民族福祉的巨大成就将载入史册。”在给雷尼的私人信中，他写道：“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届国会。”两个星期后，罗斯福沿着大西洋海岸踏上了22 500多千米的旅途，穿过巴拿马运河，到夏威夷群岛，再乘美国休斯敦号返回。

他在很多地方做演讲，这些演讲通过广播向全美播送。在蒙大拿新建成的世界最大的大坝上，他把焦点放在民间资源保护团体的造林以及在防洪抗旱的工作上，还特别提到在国家公园中工作的那7.5万名原来的失业工人。大平原的土壤近年遭到了严重侵蚀，总统部署了大量失业工人投身工作，使土壤肥沃，更有抵抗侵蚀的能力，这一政策在西部各州都深得民心。

当罗斯福在威斯康星停留时，他清楚地表示，如果拉·福利特能当选他将很高兴。小罗伯特正在竞选参议员，而菲利普则正忙于竞选州长。罗斯福希望在共和党内制造永久分裂，就像1912年在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追随者中造成的那种分裂，这确保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当选。罗斯福试图在选举入之间撒下一张尽可能广的网。

Ⅱ

罗斯福更在意“分享财富”运动的发起人休伊·朗。这个组织的座右铭是“每个人都是国王”，它建议对实际收入500万美元或者是普通美国家庭收入的300倍以上的个人征收100%的税收。他还保证每个美国人的年收入不会低于国民平均水平的1/3，每周工作30小时，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假期。这个计划并不可行，但罗斯福看到，在朗巧妙的指导下，这种宣言将吸引大批的拥护者。到1935年初，朗就宣称他已有2.7万个“分享财富”运动俱乐部，750万的俱乐部成员。

朗在新政府的最初几个月中就与罗斯福分道扬镳了，他悲叹：“我们从士兵那里拿走了4亿，又把3亿花在了种小树苗上。”

罗斯福曾经关注在11年后被温斯顿·丘吉尔称为“浪潮”的美国民意，他在1934年6月8日对国会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两场运动的重要动机。总统对“帮助把农业和工业从完全衰败的状况下解救出来”表示满意。在他转而谈到宪法时，他又把“提升大众福利”作为联邦政府的责任，这表明他要利用捐赠手段为失业者和老人提供保障，而并非从国家税收中拿钱。他已经建造了可能抵制休伊·朗等人的壁垒。

新政为了消除极端的农业军事化，在减轻抵押贷款、支持农产品价格、控制干旱、实施农村电气化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那些仍然

不满的农民被吸引加入了农民的州地方政党，尤其是明尼苏达州的农民和劳动党以及拉·福利特的威斯康星改革派。

罗斯福在努力解决拉·福利特的改革派这个麻烦。拉·福利特曾经是一个农业利益代表者。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不接受任何版本的阶级制度。总统让他们在威斯康星自由运作，然后他们中的一个在1934年11月成了州长（菲利普），另一个成了参议员（罗伯特）。

在美国公众生活中，还有另一股新兴的力量，即发起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结束加利福尼亚贫困运动”（EPIC）。这场运动由一位具有十字军精神的作家和记者厄普顿·辛克莱发起。辛克莱曾经为社会主义政党服务多年，待他认识到在美国若想有所改变只有通过两大政党才能实现时，他便成了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提名的候选人。社会主义政党领袖诺曼·托马斯谴责了他的背叛。辛克莱提倡加利福尼亚州购买或租用剩余的工业生产设备，允许失业者用这些设备生产满足他们的自身需求。这是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半公社合作主义的结合模式。

辛克莱从一开始就很努力地竞选，在8月下旬的选举会议上，他的竞争对手聚集在加利福尼亚，在党内初选中他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威廉·G·麦卡杜。在竞选中，他还一度领先于共和党的州长。

在罗斯福同意辛克莱做一次“非政治性拜访”后，辛克莱1934年9月4日到了海德公园。辛克莱误以为罗斯福允诺会支持他的。在他回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他在底特律稍作停留以取得库格林神父的支持。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在总统那诡秘的笑脸下握紧了双手。关于辛克莱的竞选，罗斯福嘱咐他的妻子：“第一，什么都不要说；第二，什么都不要做。”

罗斯福委婉地拒绝在加利福尼亚选举中去施加任何影响，以免使该州和其他地方的那些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感到震惊。自从辛克莱成为

正式的民主党提名人后，罗斯福理性的选择也就确定了。除了接收来自辛克莱烦人的电报以外，罗斯福始终像个斯芬克斯(注)那样。

梅里安姆州长与当地保守派的民主党做了一桩交易，作为换取他们支持的条件，梅里安姆州长同意他胜利后不会反对总统和新政策。随着辛克莱的优势渐渐一消退，罗斯福的立场也变得越来越中立。梅里安姆最终以113.9万票对辛克莱的88万票获胜。

在这场犬儒主义者和来世论者间的激烈竞争结束之后，加利福尼亚州的政治变得令人费解。一位记者称之为“僵化症和癫痫症之间的选择”。无论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其他地方罗斯福都没有受伤，反对派分裂得越厉害，对于他来说加强中央集权就越容易，只把一些边远地区留给极端主义者去应付就可以了。

法西斯主义者则由威廉·达德利·佩利领导。

德裔美国帮直接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援助，号召好斗的德裔美国人、向往德意志帝国的纳粹分子团结在一起，拥有大约20万狂热分子。

在美国，这种模仿纳粹的政治从未得到过巨大的支持。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用他的名为《这不能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出版于1935年）的书唤醒这个民族，书中有好几位鼓舞人心的人物值得一提。他的书引发了对新闻业的进一步审查，但并未抓到任何蛊惑人心的具体证据。

在极左翼势力方面，在被问及如果罗斯福不执行他的大部分计划时，将会有怎样的局面。社会主义领导人诺曼·托马斯说：“是的，那他将在棺材里执行。”对托马斯而言，这绝非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幽默。

如果罗斯福没有对大萧条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就，这些人将对他构成更大的威胁。他们逐渐变得更加放纵，这只能说明罗斯福赶走所有竞争对手后，只剩下一些可敬的主流的共和党人在政治边缘捣乱喊叫，可以说罗斯福已经完全占据了政治的中心。

III

刘易斯·道格拉斯被罗斯福认为是一位政治明星，他于1934年8月30日在海德公园得到总统的接见，并辞去了预算主任的职务。考虑到这个辞职可能会对11月中旬选举造成负面影响，罗斯福强烈要求道格拉斯留任到12月1日，但遭到了他的拒绝。道格拉斯是个预算平衡和金本位制者，他无法继续待在罗斯福的通货膨胀政策之中。他确信通过自然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复兴国家，而公共工程计划则是个巨大的错误。几天后，他写信给罗斯福，信中再次阐述他那相当沉闷的节制政策：文明社会应当建立在美国预算平衡的基础之上。

罗斯福召来他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并在洗澡时接待了他（这是他和丘吉尔的另一个共同点，寄宿学校学生不怕在他人面前袒露身体）。摩根索到达时，总统坐在他的澡盆里引用了约翰·保罗·琼斯的话：“亨利，我们才刚开始战斗。”他建议由托马斯·科科伦出任预算主任，而摩根索自己作为金融保守派尽管有妥、协的准备，但还是坚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科科伦完全不合适，并另外提名丹尼尔·贝尔，他曾经是财政部会计委员会委员。罗斯福同意了，新的任命与道格拉斯的辞职同时在劳动节的那一周宣布，以便减少它可能引起的关注。

休·约翰逊在1934年变得越来越古怪，国家复兴署也分裂了。重要人物纷纷辞职。工商业界使用它的操纵价格，却忽视或者回避了集体谈判条款。工会成功增加了成员，并且达到了改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

件的目标，但是集体谈判还远不能立刻增加工人们预期得到的权利。约翰逊没有放弃或缓和他那过激的公共言论以及常与同事发生摩擦关系的倾向。罗斯福曾让伯利调查国家复兴署的状况，罗斯福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持它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的至高地位，这番调查只是当中一个新的小波浪。在罗斯福看来，能够找到重新掌握权威的感觉是至关重要的，再没有什么比让由他任命的人向他报告其他官员的工作表现更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了。伯利对约翰逊相当挑剔。

罗斯福建议约翰逊去研究比较那些工业发达国家是如何与大萧条做斗争的。约翰逊的回应是递出另一份戏剧性的辞职申请，这一次罗斯福热情地接受了。这实际上不过是罗斯福的一个手段，约翰逊精神状态良好地离开了政府，并且也没有立刻就追随刘易斯·道格拉斯加入自由联盟或是其他反对派的团体。

事实上，约翰逊在一段时间内还继续担任着国家复兴署名义上的领导人，但其实是由他的下属在具体管理，每周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而此时，伊克斯的老搭档唐纳德·里切伯格却还在继续拿一些陈年旧事去找罗斯福，劝说总统把约翰逊彻底赶走。最后，约翰逊完全引退了，也彻底结束了他所有的戏剧化演出。

1934年10月1日，约翰逊在商业部礼堂向国家复兴署的职员们进行演说。当时，罗斯福、库格林、朗、约翰·L·路易斯和其他人都能用强有力的演讲术给大部分人带来鼓舞，约翰逊的这番演说则使得不论是演讲者自己还是听众都潸然泪下。

接着是国家复兴署的重组计划浮出水面，其中包括建立了一个5人委员会去代替曾一度占优势的独裁机构来行使职能。罗斯福对那些大商人完成这一工作的才能持怀疑态度，于是缔造了由学者和工会领导人占多数的委员会。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的校长罗伯特·哈金斯作为伊克斯的候选人。哈金斯得到了大学的允许可以请假接受这个职位，但那个憎恨约翰逊的里切伯格，现在又开始跟哈金斯作对。哈金斯也不

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他是个极端保守主义者，曾宣称他认为美国是个堕落的社会。里切伯格说服总统相信工商业界是不会接受一个利他主义、怪癖的大学校长来担任这一职务的，所以罗斯福把哈金斯架空了。哈金斯发怒了——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最终他气冲冲地退出了。

在1934年9月30日悠闲的炉边会谈中，罗斯福说约翰逊相当明智地主持了国家复兴署第一阶段的工作，现在已经到了进入第二阶段的合适时机了，这一阶段将关注制度调整和加强前一阶段的改革成果。这与他最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相去甚远。

罗斯福发现，想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保持平衡越来越难了，在他9月30日的广播演说中，他流露出对工商业界对新政不支持的不耐烦。他与很多商业人士保持联系，但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包括约瑟夫·肯尼迪在内，都是极端利己主义、无趣又缺乏想象力的人。

尽管罗斯福的政治直觉超乎寻常的敏锐，却也不免有一些偏执。这种直觉开始提醒罗斯福，国家工商业领导权的那种进攻本性已经被唤醒了，这种进攻本性足以使他们要求政府放弃改革倾向，并尽可能恢复到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状况，总统甚至怀疑会出现资本罢工的现象。这对道格拉斯是不公平的，他非常坦诚，只是与罗斯福意见不合而已。而且罗斯福的这一估计也是对工商业团体的误解，它们从来没有太多的恶意或是要合谋反对总统。很多工商业界的领导人意识到，要恢复到20年代无异于重新回到经济大萧条。

罗斯福预定于1934年10月24日在一个美国银行家大会上讲演。他的哥伦比亚老教授杰克逊·雷诺德，现在是纽约第一国家银行的领导，摩根索曾劝阻他不要指出罗斯福作为一个法律专业学生的不足，也不要对其他一些政府和银行界的相对状况过多评价。后来，无论是雷诺德的介绍还是罗斯福的演说，都对他们原来各自倨傲的态度有所收

敛。雷诺德有礼貌地认同总统“为拯救和恢复我们被击溃的银行业，做出了比我们中的任何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要多的贡献”。

罗斯福审视了自己的思想，得出结论说：他在1933年3月曾要求人们重新确立对这个国家银行的信念。“他们听了我的话。今晚我要求这个国家的银行家也要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树立信心，我希望你们也能听我的话。”其中的意思很清楚，即如果银行和大工商业者不加入到消除已经有所起色的大萧条“军队”中来，政治气氛可能变得险恶。《纽约时报》报道罗斯福受到了“热烈欢迎”，但事后莫利却称气氛很“冷淡”。

在竞选的最后几天中，法利还认为有机会保证民主党在两院中的多数。但实际情况却是，出现了大批对总统和他的计划充满信心的选票。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多获得了9个席位，并惊人地在参议院中多获得10个席位。这样在众议院中，民主党以322席对共和党的103席占据了优势。在参议院中，民主党现在以69席对共和党的27席保持绝对优势。

整个中期选举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罗斯福阵营的大胜利。大体上仍然支持罗斯福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发电报给罗斯福说：“自托马斯·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以来，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如此广泛的支持……连健忘的人都无法忘记。”

让罗斯福感到失望的是改革派的共和党人布朗森·卡汀以微小的优势在新墨西哥州再次当选。卡汀和总统之间积怨极深，所以总统努力帮助卡汀的对手。在纽约，罗斯福的老对手，同时也是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的亲信罗伯特·摩西输给了罗斯福内定的继承者赫伯特·勒赫曼。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比这个更使总统感到愉悦的了。

Ⅳ

总统的团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朝廷）很快就成型了，而且相当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罗斯福在不断地挑动部下互相竞争，自己则乐在其中，不论是出于公正的考虑还是任性使然，这都能保证他永远处于权力的顶端。

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推崇宗教神秘主义和科学至上论。他性格古怪，缺乏超常的政治勇气，但却很聪明，而且富有想象力，知识渊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部长。他是个坦诚的自由主义者，罗斯福认为他可以胜任更高的职务。

司法部长霍默·S·肯明斯，是一个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北方佬，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个禁欲主义者，话语犀利。他这个人既不和蔼也不聪明，但却是个经验丰富的律师，长期在民主党组织中暗中施加影响。他缺乏司法部所应当具有的宽容品质，但却又是总统狡猾而精明的辩护人，他总能顺利地执行总统的全部指示，即便是不太光彩的意图也不例外。

政治工作者总是有着不寻常的才干。詹姆斯·A·法利，担任邮政总长兼民主党主席，尽管还算不上一个睿智的战略家，却也是一个有着非凡才能的政治活动家。爱德华·J·菲林是一位开明的上司，他不仅诚实、有学识，而且深谋远虑。

提起路易斯·麦克亨利·豪，那可是罗斯福身边的大红人，也是总统的指向灯，他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陪伴在罗斯福左右。他身体羸弱、生性暴躁，既不羡慕长寿也不喜欢社交活动，这些性格特点反而使他得到总统格外的赏识。但他极有政治天赋，而且是除了埃莉诺以外，唯一能够左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

摩根索很可靠，但作为财政部长，并不是特别有智慧，他能够坐上这把交椅是因为罗斯福感念他和他父亲的忠诚。摩根索是个彻彻底底的审计员，他小心翼翼地看管着每笔资金的流向，尽管他在财政上天性保守，但总是能够为紧急事件和军事突发事件提供便利。他经常会使罗斯福发笑，有时还很幽默，他由于自己的人格而受到总统的欣赏。更公正地来说，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胜过一个智慧的财政部长。就当时的要求来看，他足以胜任财政部长一职。

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是个粗犷的得克萨斯人，他对自己的职位没有太大兴趣，对总统也不是很尊敬。他不赞成罗斯福的新政计划，觉得这些计划过于奢侈。加纳认为这些计划不过是出自那些来自东北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对自身局限认识不清，而且又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加纳把他的上司视为一个狡猾而油滑的生意人，尽管总统才华出众是毫无疑问的。他几乎无法将罗斯福称作“总统先生”，通常只是称他为“头”。他是个令人敬畏的独特的人物，但完全不是这个团队中发挥作用的一员。罗斯福曾对内阁说：“我们可以畅所欲言，那个人不在这儿。”罗斯福感到加纳只是对他在国会中的那些朋友们才够忠诚。

另一个重要的内阁成员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他常会给罗斯福带来一些小小的失望。他性格忧郁，伪装虔诚，又缺乏想象力。当罗斯福做政策决定时，通常会避开赫尔。但总统也很清楚，赫尔在国会中受欢迎程度很高，毕竟他曾在国会中任职24年。赫尔在国民中也拥有相当高的声望，他的才智和高贵的举止受人爱戴。赫尔对罗斯福如此对待他也有怨言，但他敬佩罗斯福的判断力和领导才能。

杰西·琼斯作为胡佛金融复兴公司的负责人，可以算是该机构中的一抹新鲜空气。他身材魁梧，性情直率，是个白手起家的得克萨斯木材商，也是个银行家、房地产开发商。在新政府中，琼斯负责金融复兴公司，他通过解释紧急银行立法中包含的对清偿能力保证的要求，

说服了那些不情愿的银行家接受了来自公共部门的股东。到1935年，金融复兴公司在全国半数的银行中已经持有优先股，总计超过10亿美元。这使银行能够确保储户的利益，毫无疑问拯救了美国的整个银行系统。

罗斯福将琼斯视为政府高层官员中的一个保守派。琼斯赞成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合作，但在政府的社会计划问题上，他还是站到了右派立场上。尽管他意识到在新一届政府就任的早期，迫切需要较大规模的救济金，他还是倾向于民间直接投资，而非政府支出。

智囊团的成员都没有能够长期起作用，莫利已经离开，只是偶尔接受起草演讲稿的任务而已。塔格威尔是个独裁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即便有实现的可能，在美国的应用性也非常有限。

令人印象更深刻的是罗斯福的法律智囊团——弗兰克福特、科科伦、科恩、兰迪斯、弗兰克和其他一些人。弗兰克福特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国内法学界的领军人物，如果他是个迂腐的奉承者，“罗斯福则可安心地从他那儿得到直接的赞扬”。他聪明过人、多才多艺，对罗斯福无限忠诚，判断力准确，还是个杰出的最高法院法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威尔逊总统手下的牛顿·贝克办公室工作。

汤米·科科伦是国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有很好的法律头脑，也是个多愁善感的爱尔兰人，他满怀热情地为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效力。与在那个艰难而动荡的年代在罗斯福身边的很多人一样，科科伦魅力十足又不失机智幽默，只是有时候有些傲慢，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他为之效力的总统。

本·科恩是个博学、内向的杰出人物。他能力极强，有着能够把握现实的法律头脑。他帮助科科伦抚平了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同样，在科科伦的帮助下，科恩也变得更善于与人打交道，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一些天真救世的想法。与其说他是

一个现实主义者，不如说他更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他很聪明，令人愉快又为人正直。

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名字中，弗兰克福特、伊克斯、摩根索和弗朗西斯·珀金斯是仅有的直到最后也没有被削减权力的人。其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弗兰克福特提出的建议都得到了总统的重视。

V

在1934年选举胜利的光芒下，哈里·霍普金斯认为，要想把新政向前推进一步，当前正是最佳时机。在经济方面，他倾向于以增加工资和消费支出来拉动系统需求；在社会方面，最迫切的还是要解决数百万人的失业问题、推动社会保障和全面的工资、工时改革。在1934年10月下旬一系列的白宫会议中，罗斯福也已经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罗斯福认为如果必要的话，要深化新政来避免给被朗、汤森和库格林从侧翼围攻的任何可乘之机。

为了维持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虽然罗斯福面临多方的压力围攻——激进的社会再分配论者、改革者、改革运动中的左翼（包括卡汀和其他一些参议员在内）以及保守派都给总统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但是总统从未动摇过，更没有退让过。当时在20世纪30年代，制定所有的政策都要有高超的策略并采取灵活机动的方法，而罗斯福在这些方面已经表现出了令人瞩目的才能。1935年春天，他担心休伊·朗发起袭击，而自己的改革派追随者则会感到焦虑不安。总统已经放弃了任何把朗放逐回保守派民主党的地位中去的努力，而开始进入到了对朗政治斗争的第一个阶段。对罗斯福而言，这意味着要隔绝政治对手资助的来源，进行税收检查，并且采用其他打压手段。

按照罗斯福的命令，摩根索对休伊·朗和他的高级助手进行了所得税调查。他们中的4个人在1934年年底被起诉，但休伊·朗自己不在其中。罗斯福下令所有的机构都不准帮助朗。为此，路易斯安那州和用来紧急解决失业问题的几十个亿救济金擦肩而过。

罗斯福用一项合法的计划来回应“分享财富运动”，这项计划有时被称为第二新政，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的内容。“一战”后不久，不同的团体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措施。罗斯福于1934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咨询建议，起初曾选择把社会保障的含义解释为失业保险。他知道医疗保险不会与美国的医疗协会冲突，也不想给他的对手一个随意攻击总统的机会，特别是在总统被夹在美国大众和医生之间的时候（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他的继任者要在宦海浮沉之后才能学到的东西）。他还推迟了领取养老保险的年龄。以上就是1934年罗斯福在国家经济安全会议上演讲时所表明的立场。

《纽约时报》和很多支持罗斯福的其他媒体评论家认为，在这次演说中，政府的雄心壮志表达得不够充分。罗斯福犯了个不寻常的错误，就是放任传统观点左倾化，甚至还跑到了它的前面。折中性的计划最后终于确定下来，计划中包含了失业和养老保险，并建议增加对儿童和公共健康的资金支持。罗斯福于1935年1月17日将该计划提交给了国会。

该计划的反响也不错。但是，极左翼愤怒而反感，认为这个计划在内容上过于软弱，在主旨上又过分慷慨；同样，右翼也像往常一样愤怒而激烈地回应。在起初进行摸索之后，罗斯福很快就恢复了主导优势，并重新在他周围召集并组建了一个巨大的联盟，该联盟一直延伸至左翼和右翼中的温和派。

除此之外，社会保障也是一个合乎时宜的概念。美国曾经饱受经济危机打击，使这个国家中1/3的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这一措施唤起了民族的希望，人们认为通过这一计划，美国经济就不会在遇到冲

击时显得手足无措，因为这种手足无措比人们所能想到的要更加危险。

当新一届国会于1935年1月召开时，朗和总统的冲突升级了。朗在参议院激烈地谴责罗斯福，声称总统是被和他自己一样的改革派选上台的，现在总统背弃了他的支持者，成了一个懦弱无能的保守派。罗斯福把一个要求美国支持国际法院的议案送到参议院，这个议案内容本是双方政党在1932年的选举纲领中同意的。休伊·朗号召孤立主义者反对这项议案，并最终引发了对抗。不仅如此，当库格林神父加入以后，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朗让库格林神父发动他众多的听众给参议院发来声援电报。

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超过5万封电报如暴风骤雨般飞了进来，大部分对美国在国际法庭中的成员身份持敌视态度。这一议案于1935年1月29日在参议院未能获得要求的2/3多数通过。罗斯福很生气，但他仍然保持了克制。他写信给90多岁的艾利胡·鲁特，他是战后国际法院的创始人之一。在信中罗斯福谴责了那些议案的反对派。这对罗斯福来说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举措，他被不断扩大而且不负责任的激进力量包围着，尽管他很早就预料到这种事情迟早会出现。1935年2月11日，朗指控詹姆斯·法利腐败，指控他滥用邮政总长的职权。当然，这项指控证据不足明显站不住脚，经过参议院稍做调查和辩论后就被否决掉了。

在知道了一年前罗斯福把罗伯特·摩西从三区桥梁管理机构（Triborough Bridge Authority）主席的位置上赶下台（他是被新当选的市长费奥莱罗·拉·瓜迪亚任命的）后，朗又开始攻击法利。

在摩西于1934年竞选州长惨败之后，罗斯福和伊克斯拟定了一个指令，如果公共工程管理处中有人既是受援区行政机构成员，又是市镇当局中的公共事务官员，那么管理处就不具备批准市政工程的权力。这个行政命令的目的其实主要是针对摩西的。但事实上也影响了

一些本以为不会牵扯到自己身上的人。拉·瓜迪亚把这项指令给摩西看了，之后摩西就上演了一场调动民心的好戏，这倒使他部分挽回了些许由于竞选州长时的滑稽行为而失去的威望。艾尔弗雷德·史密斯作为他的保护人也卷入了冲突，他指出整个三区工程都是摩西的主意。

伊克斯不得不对新闻界撒谎说罗斯福从未对他谈起过有关摩西的事。当朗抓住这件事并把它跟法利联系在一起时，罗斯福清楚这不是跟朗、库格林、摩西、史密斯和拉·瓜迪亚（他是罗斯福坚定的盟友）这些非常好的盟友进行争斗的场所。这是对休伊·朗斗争不幸的开始，显示出罗斯福具有报复性，而且不够圆滑。

朗、库格林、汤森和雷诺有可能形成政治联盟，这让罗斯福的政治顾问们很是担心，特别是法利。法利下令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部进行一次重要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如果朗参加竞选，将可以得到275万张选票，这无法动摇罗斯福的地位，却会给总统的成功连任带来不便。法利的一些竞选专家担心朗实际上可能会得到比民意测验结果更多的选票。朗在南方的受欢迎程度不高，但在南方以外的地区，他几乎受到所有大萧条受害者们的热烈欢迎。然而，罗斯福总统却是成竹在胸，他相信自己可以分化并瓦解敌对者的势力，出奇制胜，最终可以挫败这些难对付的反对派小集团。

罗斯福第一次发表炉边谈话是在1935年4月28日。在谈话中，他提及了他的立法计划，包括社会保障计划，还谈到了罗伯特和瓦格纳参议员提出的最新劳动关系法案，尤其是为了消除那些有权势的公司滥用权力的工作福利计划和增加联邦政府权力、加速经济增长的内容。罗斯福还出于针对遏制休伊·朗的政治目的，建议增加税收。他还打算提出一个议案调整煤矿工业，提出一个意在约束军火生产的议案。这些议案吸引着那些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总统需要他们的支持来通过“第二新政”，并驱逐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势力。总统的立法议程

实现了他对伊克斯和其他亲信的承诺——“对付休伊这种人，要先下手为强”。

4月29日，也就是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的第二天，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商会会议上，美国商会的一位显要的官员指责罗斯福试图“把美国苏维埃化”。其他发言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而该组织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总统的整套立法计划。

尽管存在这些类似障碍，总统还是在火药味十足的国会中获胜。

社会保障议案被复杂化，该计划的资金主要来自一般性的比例税而非来自累进税，若强迫实施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1937年的经济恢复。事实的确如此。罗斯福清楚把计划建立在雇员贡献上会出问题，但出于政治原因他仍然坚持这样做。总统解释道，薪水贡献“使贡献者享有合法的权利去领取他们的养老金和失业补贴。有了这些税收，就没有哪个该死的政客还能破坏我们的社会保障计划了”。罗斯福对他的亲信明确地表示，他意在建立一个终身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与私人医疗体系并存，并为后者提供了一张可靠的安全保障网。

1935年5月14日晚上，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参议员波拉、约翰逊、拉·福利特以及伊克斯、华莱士、弗兰克福特和波士顿智囊团主任戴维·尼尔斯（正是尼尔斯建议要开会的）。这些参议员表示，他们担心政府似乎有些精疲力竭，而朗却正在发动攻击。他们总觉得无法安抚工商业界，并恳求总统对新政重新进行考量。罗斯福的反应给他的这些访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专注以及他对所讨论问题细节的把握和判断，使参议员们对他感到相当放心，相信他会采纳他们的建议。

在提出社会保障计划后，1934年“第二新政”的第二项关键要素，则是由霍普金斯领导制定的《1935年紧急救济法》。这项法案将为雇用失业者进行的公共工程提供近40亿美元的巨款，堪为美国历史上到

那时为止最大一笔单项拨款。该法案还造就了一个奇特复杂的政府机构，即工程发展总署（WPA）。这个机构起初看来，倒像是罗斯福的一个恶作剧，试图使伊克斯和霍普金斯处在磨合期的关系变得更加充满敌意。在工程发展总署中，还成立了三个平行的官方机构：工程执行与信息部、工程分配部和工程改进部。工程执行与信息部由颇得人缘的弗兰克·沃克领导，负责对救济资金的使用进行评估，并把资金划拨到工程分配部。

工程分配部由伊克斯领导，主要以24位官员召开圆桌会议的形式来献计献策，这些官员包括几乎所有政府支出部门的代表、劳工组织的代表、农业协会的代表、美国市长大会代表、美国银行家协会代表和来自其他不同组织的代表。

罗斯福和法案起草者在工资标准问题上也小心翼翼地提出建议，在建立社会保障立法的同时，并没有大幅削减劳工组织的议价机制，这给失业者带来了动力，使他们能够摆脱纯粹的失业救济。尽管民主党还在国会中占尽多数，这个议案在参议院中还是受到很多阻挠。休伊·朗仍然是主要反对者，罗斯福通过一名资深议员，成功地使一项修正案以一票的微小优势获得了通过，他把薪金提高到超出政府可以接受的水平。

最终，经过总统个人大量艰苦卓绝的游说，《1935年紧急救济法》在国会获得通过。总统然后就去休假了。

工程发展总署的工作就是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霍普金斯和他的团队极富创新精神，悉心经营着这份事业。

在紧急救济预算中，美国全国青年工作委员会也得到了相当的拨款。这让成千上万年轻人找到了称心的工作，并为他们安排了充足的假期和进修的机会。

工程发展总署相对而言不成功的地方则是在住房方面。然而从整体上讲，这些新政计划的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它们将数以千万计的人从彻底的悲惨绝望中解救了出来，还在这个国家中建造起了广泛的基础设施。大约350万名这些计划之外的失业者也由社会保障来供养，并在总体经济复兴中渐渐恢复了元气。

《1935年紧急救济法》的最后一个成果是建立了农村电气化工作委员会，这也是罗斯福新政中一个成功首创。

1935年5月1日，罗斯福采取了一项比较贸然的措施，并建立了重新安置工作委员会（RA），其任务在于重新安置贫困的城市和农村家庭，同时也处理其他很多机构的工作，例如处理土地经营活动，并为农民提供农业贷款。

农业部副部长雷克斯福德·塔格威尔出任这个新机构的负责人。塔格威尔于1933年就曾提出过食品与药品议案，其中就包含了很多以事实为依据的条款。由于没有得到总统的支持，该议案在两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国会两院任何一方的支持，所以一直没能成型。

可能塔格威尔认为农业是要和土地打交道、原始落后的生产活动，这一认识让他感到很兴奋，他开始积极地投入到为他新安置的工作中。

塔格威尔重新安置工作委员会接手的工程中还涉及西弗吉尼亚的合作公社，这可是埃莉诺·罗斯福的精神成果，她对这个公社的支持赞助程度可以同她丈夫对温泉市的支持热情相媲美。

但塔格威尔的工作无论是在农业部里，还是在重新安置工作委员会上都收效甚微。他在1937年初辞职。

VI

1935年1月7日，由于受到最高法院的攻击，新政前景很不乐观。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预兆，但最后法院又利用斯切齐特的案件，于1935年5月27日发起了对国家复兴署如狂风骤雨般的攻击。

甚至出乎埃莉诺的预料，罗斯福并未受这些攻击的干扰。他对弗朗西斯·珀金斯说，国家复兴署已经“一团糟”了，它在各个方面已经铸成“严重的错误”。罗斯福指出，国家复兴署已经执行了它的使命，并告诉弗兰克福特他只是想要保住国家复兴署对工资、工时、集体谈判和童工部分的规定。

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在斯切齐特的判决被否决不久之后，将科科伦和科恩召集到最高法院的审讯室。布兰代斯让他们转告罗斯福，他将不得不重新设计他的整套立法计划。他对两个年轻人说：“我们不会让这届政府控制一切的，这是最后一次。”

在听取了弗兰克福特和其他一些人的建议后，罗斯福最后总结道，对这种新出现的威胁的最好回应就是继续他的立法计划，并且尽可能按照宪法来制定这些立法计划。他决心正面挑战最高法院，要求修正宪法或其他法案，除非法院能使普通公众相信，政府主要的经济复兴措施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攻击法院，他现在显得很暴躁。

尽管罗斯福为了改变国家复兴署蹒跚前进的状况不惜挑战最高法院，但如果类似斯切齐特案件的情况被套用在对付政府的其他重要措施上，比如用来对付社会保障计划，会使事情变得很严重，还可能牵涉到国会。

罗斯福在1935年5月31日记者招待会开始时，他表现得很高兴。他短暂地悲叹，曾在不到两年之前，他还为自己制定了共和国历史上最

重要的决定（建立国家复兴署）而感到兴奋，可是现在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被搁浅。总统再次使用了自己擅长的夸张方式，他把这个决议称为自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以来最重要的决议。当他对记者谈到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即最高法院怀疑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合乎宪法的时候，气氛变得很凝重。他说："谢天谢地，战争在遭到质疑前就结束了。"罗斯福还直接引用别人的说法，说这一议案已经把国家间的商业带回到"马车和童车的时代"。

1935年6月，国家复兴署庞大的组织机构和诸多理事会不得不解体，只剩下一个数据信息服务处。

在对付朗、库格林和汤森为首的反对轴心以及应对爱管闲事的最高法院时，罗斯福仍然保持优势。无论是否合法，法官们正在挑战一个危险的对手。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中有7人已经年过七旬。罗斯福比法官们更早看到这些公共关系的脆弱性，布兰代斯的行为则显示出法官们并不习惯于做出如此考虑。

因为私人部门的失业人数在不断稳步下降，罗斯福保持了公众对他的信心。大部分仍旧失业的人也受到许多福利计划的帮助，剩下的大多数人也能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援助。

这是罗斯福作为总统惯常的做法，他会不可思议地等着，直到看清楚哪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哪些是无法克服的，同时还保持着引导公众舆论的能力。然后他会对反对派和他认为可以攻击的障碍，突然发起强势进攻。

罗斯福身上有些特征似乎是他从伍德罗·威尔逊那里学来的，他表现出来的那种职业耐心，甚至是他身上时而展现出来的惯性，都和威尔逊有些许相似。他时常还会爆发出初生牛犊一般的能量投入到行动中去。在诸多美国总统中，他对迎合公众之所好有着精妙的直觉和准确的判断能力，这些更强化了他的鲜明性格。

“西奥多·罗斯福身上缺少威尔逊那种强大的号召力，也没能激发起真正的道德与社会信念。

“有一个关于长久的领导才能包括哪些的思考（在这个国家，有着自由敏感的新闻界，人们讨厌每天在报纸头条上看到相同的名字，每晚在收音机中听到相同的名字）……我倾向于认为：现在是激励美国人团结起来行动的时候了。我想这件事会在今年结束之前出现。”事实上，不到半年他就做到了。

罗斯福1935年5月22日又一次否决了增加退伍军人津贴的提案，强烈要求保留他对参议院通过议案的否决权。在做这些事情之前的几个小时，他用很强烈的语气告诉摩根索否决它的原因和可能让它通过的原因，摩根索被吓坏了。总统曾告诉他的财政部长——那个认真正直的政治家，他的做法是：“永远不要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干什么。”当摩根索问他自己是总统的哪只手时，罗斯福回答道：“你是我的右手，但是我把左手放在了桌子底下。”罗斯福在1935年的春天和夏天都在推动他的新政计划。

罗斯福的特殊税收提案是传统的“搜刮富人”措施，目的是要让朗和库格林闭嘴，并且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它推行继承税和赠予税，把公司的最高所得税从13.75%提升到16.75%，又对过高的个人收入征收附加税。

在同他的税收提案一起递交国会的咨文中，罗斯福开始与朗公开争夺那些被财富分配不公激怒的人们的支持。他写道：“我们的税法几乎没有阻止财富和经济力量过度不公平的措施。”

罗斯福认为他需要赶走那些身处非政府职位上的不开明人士。如果罗斯福是很认真的，他可能已经开始向中产阶级（这是政府大部分财政税收来源）征税，而增加的税收将会补贴给穷人。然而，他想出一个比较低级的手法来对付大萧条可能引发的最卑劣的政治进攻。白

宫于1935年8月15日高兴地签署了一项声明，引用自8天前科伯兰兹的备忘录：“赫斯特指示在谈到政府的税收计划时，一律使用‘搜刮成功人士’的说法。”和赫斯特9个月前选举后的赞美相比，这完全是个戏剧性的转变。

由于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裁军和和平主义的兴趣，一项禁止军火出口的提案产生了。北达科他孤立主义的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奈，担任一个检查军火和武器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从罗斯福以下的每一个人都在抨击武器制造商的罪恶。人们发现武器制造商（并没有确实的证据）的许多做法很卑劣，并指责他们不仅从战争中获利，还引发了战争并积极地推动战争的发展。

罗斯福抓住这件事并试图控制它，以免它向不良方向发展。他在1934年12月12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讲过：“是我们从战争中获益的时候了。”自那之后，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是各种派系的集合，包括伯纳德·巴鲁克、休·约翰逊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乔治·匹克、一些内阁部长（包括赫尔、摩根索和珀金斯等）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官员都被列在委员会成员名单。从成员性质上看，这个团队不会对外交和安全政策提出什么激烈的和平主义策略，倒是提出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约翰·麦克斯恩的提案。麦克斯恩建议在出现任何战争或者国外紧急事件时，美国都要防止军火商抬高武器销售价格。

相对于好斗的和平主义者，奈和他的同党无疑会同意这个建议，毕竟这个相对温和的措施让工商业界松了口气。

经济学记者约翰·T·弗林建议，在战争状态下，应该立法要求武器制造商把他们的产品贡献出来，从而对正义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罗斯福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但他也指出，希特勒在三天前已经撕毁了《凡尔赛和约》的重要部分，并在德国恢复了征兵制。墨索里尼也显然准备好了入侵埃塞俄比亚。罗斯福曾设想签订某种条约来联合意大利；可能的话，还可以利用苏联包围德国。德国会被邀请加入这个条

约，如果不同意，签字国就将对它实行完全禁运。不过他马上发现那些国家对挑战希特勒没有兴趣，也只好放弃这个想法。

罗斯福也日益确信，自从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就表现出来那种丧心病狂的、野蛮残暴的扩张欲望。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也相信不除去希特勒，欧洲的和平就永远无法得到保证。

随着20世纪30年代逐渐逝去，罗斯福打算用一种机智高超的手段，使直接受到德国威胁的邻国的人民更加坚定地反对纳粹，同时要把美国的和平主义者赶到角落里去。

强国之间战争的危险性还远不只体现在6个月之后，而国会也无法制止通过第三方出售武器给交战国家。

国会议程结束后，所谓的“第二新政”也最终获得了通过。罗斯福又赢得了一个政治大满贯。这再一次显示了他以策略战胜了对手，继续掌握华盛顿政治控制杆，并对舆论界有着卓越的驾驭能力。

---

1. 古埃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译者注

09
富兰克林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

1936年4月，路易斯·豪在弥留之际如是说

I

罗斯福在海德公园放松时，总结出来：他已经削弱了朗、汤森和库格林的很多权力，并且有些人已经厌倦了改革，而且对财富的分配不满意，现在到了安抚这些人的时候了。罗斯福已经准备好了如何应对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挑衅，现在需要的是击退来自温和的共和党右派的进攻。总统把政府平静的一面展示出来。罗斯福对莫利占据了上风，并且准备好了回应来自出版商罗伊·霍华德的一封信。霍华德曾在其信中表达了许多工商业人士的担心，他们担心罗斯福是反对工商业的，在罗斯福新近对富人征收附加税之后，他们的这种担心就更强烈了。

罗斯福改进了莫利的方案，回应道，税收政策是“基于广泛的、公正的社会经济目的……并不是要消灭有钱人，而是创造更多的社会机遇，遏制不健康的增长势头并扭转社会财富积累不足的局面。”在国家税收中，消费税的比例从1929年的30%上升到当时的60%，对此罗斯福表示遗憾，但他也表示自己的改革方案“现在已经收到了实质性的成果”。股票行情一路攀升，而且在很多政治评论家眼中罗斯福的受欢迎度也不断飙升。

罗斯福赞同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观念，认为如果经济活动是一种零和游戏，那么财富的创造能力是不足的，对社会是无益的，也是不公平的，富人们如果仅仅把他们的钱放在床垫下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罗斯福认识到，如果过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个社会将会不稳定。罗斯福对大部分富人没有好感，这也是促使他加快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动力。几十年后人们称罗斯福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倡导者。

但是在罗斯福政治权术和政治天赋背后，潜藏着把财富从它的拥有者（或其继承者）那儿夺取过来，再在全社会进行二次分配的野心。然而，罗斯福没有认识到其实私营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有一个始终无法回答的问题——即在极差的经济条件之下（他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当选为总统的），罗斯福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他必然会招致敌意，但是罗斯福是否引起了过多不必要的嫉恨?

罗斯福邀请伊克斯、霍普金斯和塔格威尔在9月来到斯普林伍德，讨论大型公共工程的预算分配。伊克斯先到达，他对罗斯福抱怨霍普金斯是个“没有法律头脑”的人，还抱怨霍普金斯是总统连任的最大掣肘。霍普金斯、塔格威尔和一些助手第二天到达。霍普金斯得到了差不多30亿美元的工程预算款，伊克斯为公共建设管理处只争得大约5亿美元，塔格威尔为重新安置工作委员会争得大约1.5亿美元。伊克斯非常失望，以至于都没有留下来吃晚饭，但是他没有威胁说要退出政府。

9月13日，罗斯福邀请瓦尔特·李普曼来吃中饭，罗斯福试图通过这一方式来缓和与这个老冤家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一招并不是很成功。李普曼和已故的布朗森·卡汀一样，对罗斯福总是会充满妒意，不时感到怒火中烧。李普曼和罗斯福年龄相仿，而且太了解罗斯福了。在他来白宫赴宴的几天之前，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罗斯福非常富有心机，但算不上一个伟人。”他还担心罗斯福政治上不够成熟。但是，罗斯福的魅力和给予李普曼个人的关心也没有完全白费。李普曼

离开白宫时很高兴地说：他和罗斯福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尽管他发现罗斯福有些疲倦而且急躁，不像他往日那样自信。

Ⅱ

9月26日，总统和夫人、霍普金斯、伊克斯和总统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乘火车离开了华盛顿，前往美国西海岸。总统一行将登上休斯敦号邮轮，罗斯福致力于缓和霍普金斯和伊克斯之间的紧张关系。豪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再发挥他往日的影响，于是霍普金斯和伊克斯就成了罗斯福的左膀右臂了。

罗斯福在他穿越美国东西海岸的途中，发表了三次演讲。9月28日在佛蒙特，他向许多民众介绍了政府在农村事务上的政策。9月30日在科罗拉多，他登上大坝，这个大坝高约221米，大坝截住的水流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倘若大坝决口，整个康涅狄格州都会水漫金山。在谈到防洪抗旱和廉价电力等话题时，罗斯福非常兴奋。

10月1日，当罗斯福在洛杉矶乘坐汽车旅行时，有将近100万人夹道欢迎。他对7.5万名群众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追忆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功绩，言语间对威尔逊充满了敬意。罗斯福还称赞了自由主义，他认为自由主义是完美无缺的。

10月2日，罗斯福在圣迭戈国际博览会上发表讲演，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在20年前出席过该博览会。

罗斯福、霍普金斯、伊克斯和其他一些总统的心腹登上了休斯敦号，离开了圣迭戈。休斯敦号继续向南航行，经过加利福尼亚南部，驶向巴拿马运河。此时，墨索里尼终于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这是他蓄谋已久的计划。在休斯敦号上，关于中立法的适用范围引发

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当时美国生产世界近一半的石油，也是各种战略物资的重要生产者，意大利的很多物资也是从美国进口的。一些和平主义者建议扩大中立法案的禁运范围，把石油、铜、钢铁甚至棉花都定义为“战争要素”，这样能够使美国获利更多。对此罗斯福不是很赞同。

在总统离开华盛顿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谨慎正直的科德尔·赫尔就曾经提出了这种说法。罗斯福认为赫尔这么说也有他的道理，因为美国工业还在大萧条的危机中苦苦挣扎，渴望因为战争的爆发带来商品价格的上涨，这样他们通过出口就能获得更多利润。

罗斯福遇到了这个颇具争议的“道德禁运”，这种禁运要求美国厂商自愿拒绝来自意大利的订购。罗斯福绝对不会低估美国工商业者贪婪的本性，不认为这一倡议会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罗斯福希望霍普金斯和伊克斯能够改善关系，这一想法在这次旅行中显然取得了成效。他们两人虽然还会在预算和司法问题上意见分歧，但是二人毕竟已经能够互相欣赏对方的才能和个性了。

当休斯敦号经过科克斯岛时，国际联盟已经给意大利冠上了侵略者之名，并且开始讨论对意大利实施制裁。国际联盟还考虑让非国际联盟成员国在制裁方面予以配合。罗斯福赞成赫尔的说法，即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国际联盟不要让美国加入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行列，因为在这一点上美国国会可能会采取不配合的姿态。

10月22日，休斯教号经由巴拿马运河和南大西洋返回南卡罗来纳州，最后驶向华盛顿。这次巡游使罗斯福变得精力充沛，他的黑眼圈不见了，他的皮肤也晒成了健康的古铜色，身体感觉也非常好。

正如预计的那样，“道德禁运”在美国国内遭遇“滑铁卢”。11月6日，国际联盟投票决定将对意大利的禁运范围扩展至石油。众所周

知，对意大利进行制裁，是国际联盟影响力的试金石。如果国际联盟对意大利都不能采取任何制裁措施的话，面对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和来势汹汹的日本，国际联盟对于这些威胁和平的势力就更不可能会有任何约束力。

罗斯福早先对意大利的军事能力并不看好，这一次意大利军队面对落后的、毫无训练的埃塞俄比亚军队，都无法速战速决，充分证实了罗斯福的观点。罗斯福之所以能够判断准确，是因为他在1918年参观过意大利的舰队。罗斯福非常憎恨法西斯主义，打心底希望意大利这次有预谋的战争会以失败告终。但是民主党的其他成员，或是直接向总统进言，或是间接地通过法利传话，希望总统不要给反对派留下任何机会。他们恳求总统不要给人留下美国外交政策受到国际联盟或英国影响的印象。1935年底，美国运往意大利的石油和战略物资增至年初的3倍。17年来，美国人第一次有了发战争财的想法。

丘吉尔把墨索里尼看成一个自以为是的小丑，他认为任何一个强国只需几天就能让墨索里尼臣服。美国舆论界对意大利的侵略行为表示遗憾，但坚持认为这不关美国人的事。罪恶再次在世界上发生了，这种罪恶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或者他们的祖先跑到新大陆时希望能够躲避的，他们不想再与他们甩在身后的世界绑在一起。

1935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差不多有一半的美国人倾向于和国际联盟合作，并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罗斯福知道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其实只是法西斯势力露出了蓄谋已久的更大规模侵略的冰山一角，国际联盟并非是值得信赖的抵抗运动的组织者，也没有必要在英法表态之前，就把美国舆论引向一种坚决的反侵略的立场之上。

罗斯福的策略是要让美国民众相信：在使美国远离战争这一点上，国内没有任何政治对手比他更值得信赖，同时他可以通过灵活的方式，给反侵略的国家提供实质性的援助。此时，很多美国人考虑是

否应该伸出援助之手，从而保证正义能够压倒邪恶。罗斯福很清楚，这些人的想法过于草率鲁莽了。

1935年11月底，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表现就证实了罗斯福的担心。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拉瓦尔（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和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就默许把埃塞俄比亚的大部分领土交给意大利，各方还就该计划签署了一个妥协性的文件。丘吉尔说，如果能够及时制止意大利的野心，说不定能给希特勒安上刹车，这一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是没有英国和法国的参与，而仅凭美国就想给希特勒安上刹车是不可能的。

英法向意大利做出了这种令人诧异的让步，目的其实很明显，他们是想联合意大利来共同遏制重新崛起的德国。这真是一个愚蠢的、软弱的举动。英法两国舆论哗然，霍尔被迫辞职，接替他的是具有反法西斯情结的安东尼·艾登；而拉瓦尔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在一个月后引咎辞职。意大利永远都不会站在希特勒的对立面，尽管在德国人看来意大利的军事价值微乎其微，但是意大利看到了英法这种软弱性的缺陷，也开始和希特勒走得越来越近。

这个不光彩的游戏传到罗斯福那里，在他看来这是对集体安全机制的削弱，它造成了对国际联盟和其支持者以及对英法两国的反感。当时，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盛行。美国的想法是，如果这种妥协就是集体安全力量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那么美国人最好完全远离它们，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构造一个“美国安全带”。

在1936年1月3日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警告美国民众说，在当今世界上危险正在上升，希望大家做好准备避免卷入战争。尽管美国公司希望得到意大利人的更多订单，罗斯福还是要求限制向海外的交战国出售武器军火，并将战争物资的出口维持在和平时期的水平。当中立法到期时，罗斯福让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奇·皮特曼重新制

定一个提案，该提案如果能够获得通过，就能授权总统自由决定继续还是终止向交战国出口迫切想要得到的物资。

参议员杰拉尔德·奈提出一个提案，反对向交战国出售任何武器。这两个提案的拥护者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当大西洋的另一边战云密布时，美国国内并没有给罗斯福提供良好的环境来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政策。罗斯福发现，当他和奈为了提案竞争时，他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把现有中立法延长一年了，罗斯福这样做了。

2月底，法国批准了《法苏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没有要求双方承担很多义务，但至少把苏联重新纳入欧洲国家的综合防御体中来了。希特勒把这个条约视为法国重新占领莱茵地区的序曲。这是对《凡尔赛和约》的违抗，也是对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违抗，按照这一公约，比利时和法国应从莱茵地区撤军，德国承诺莱茵非军事化。英国和意大利是这一安排的保证国。希特勒宣告法国与苏联之间的协定已经破坏了《洛迦诺公约》。

正如罗斯福所担心的，法国一如既往地要求得到英国的道义支持，而英国则摇摆不定。意大利是《洛迦诺公约》的另一个保证国，它已经陷入非洲的泥潭而且也不打算向德国发出警告。

希特勒表示他正在收复德国领土，以使国家更加强大，并对抗有可能来自东方的威胁。他发誓，他对西方的德国邻邦没有不满情绪，他还暗示德国将是他们“反赤”的桥头堡。“德国人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打破和平!”希特勒向世界“信誓旦旦”地保证。西方几个大国知道，除非放弃把纳粹德国改造成一个负责任国家的最后一丝希望，否则它们无法拒绝德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主权的要求。

这就是罗斯福跟英法以及其他民主国家内部的绥靖者和姑息者的不同之处，罗斯福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是一个无法控制的战争狂人，也是一个精神错乱的谎言家，对他绝对不能姑息纵容。英法的退

让不仅加强了希特勒打压国内和平外交政策支持者的决心，而且加深了希特勒对于西方领导人的鄙视，并且促使他加快了发动侵略战争的脚步。所有这些未来的历史必然罗斯福都预见到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大利正做着英国和法国曾经骄傲了几个世纪的一件事——将一个国家殖民化。

这些都没有阻止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麦克尔·科雷对墨索里尼的称赞，他赞扬墨索里尼是"和平和基督教的卫道士"。几乎与此同时，更受人尊敬的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等人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痛斥希特勒破坏文明的罪行。非洲裔和意大利裔的美国人，在埃塞俄比亚战争问题上分为两派，他们在大城市里举行游行。美国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同情者也对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和日嚣尘上的军国主义提高了警惕。

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悲惨命运刚过去几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次的硝烟离侵略者和绥靖者的后院就更近了。1936年7月17日，在西属摩洛哥，一场由军官领导的反抗新当选的西班牙左派政府的叛乱开始了，第二天叛乱就蔓延到了西班牙本土。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随即爆发，在内战中将近100万人不幸罹难，几乎整个国家都沦为废墟。意大利和德国立刻向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领导的法西斯主义军方叛乱分子（或民族主义分子）提供支持。英国则公布了一项完全不干涉声明，还向法国施压，要求法国和英国的立场保持一致。自从拉瓦尔6个月前惨败之后，法国现在正处在一届中左翼政府的统治之下。德国和意大利表面上声称同意英法的禁运、封锁和中立，暗地里却不断给佛朗哥提供援助，并把西班牙当成德国空军力量的实验场。

这就是欧洲人一贯的权宜之计，懦弱而且背信弃义，但同时又要假装自己道德高尚，这让人感觉更加可恨。

罗斯福知道，他永远不会和这些纵容希特勒的懦夫同流合污，所以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西班牙危机，同时逐渐巩固他作为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权威。一方面由于中立法在内战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西班牙内战爆发距罗斯福第二任总统提名还不到一个月，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罗斯福最后同意了英国的完全不干涉政策。

罗斯福认为共和派和社会民主要义相符合。1936年夏天，罗斯福告诉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大使说，如果佛朗哥获胜，他将帮助“建造一个自由政权”。罗斯福没有撤回驻西班牙大使，但是当西班牙政府要求向马丁公司购买8架战斗机时，美国政府婉转地拒绝了这笔交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佛朗哥没有理睬希特勒的诱惑，保持了真正的中立，这种中立不像西班牙内战时大国的伪装中立。佛朗哥是个克制的法西斯主义者，他让经济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改革了君主立宪制，为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他对受纳粹压迫的犹太难民也非常宽容。

III

1936年4月18日，一颗巨星陨落了——路易斯·豪辞世。当豪处于弥留之际时，罗斯福去看望了他的这位老朋友和亲密战友，罗斯福向豪保证：尽管豪因为身体太差，无法参加内阁会议，但是他如果要做出任何重要决策，都会事先征求豪的建议。豪曾经不无感伤地对一位探访者说：“富兰克林现在只能靠他自己了。”在豪病重期间，罗斯福经常去看望他，埃莉诺差不多每天都去探访。尽管总统和夫人早就预料到豪迟早有一天会离他们而去，但是豪的去世对他们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无论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私下，豪都是他们的挚友。在罗斯

福多次发生危机时，豪总是鼎力相助；豪忠心不二、无私奉献；豪的判断总是准确无误。总之，在罗斯福心中，豪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罗斯福为豪举行了国葬，所有政府机构都降半旗致哀。罗斯福站在豪的墓前，无限哀伤地陷入了沉思。他让人在豪的墓碑上刻了这样一句话："总统无限忠诚的密友、顾问和伙伴。"

1936年1月，罗斯福政府最大的威胁——美国最高法院再次宣布新政的一个顶梁柱，新政中的农业复兴政策，即农业调整工作委员会不合宪法。最高法院的法官以6:3通过了这项判决，而且首席法官没有加以否决。

2月，最高法院又否决了《烟煤矿工工资和工时法》，这项法案是约翰·L·刘易斯起草并由罗斯福在9个月前强制通过的，罗斯福当时给国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强制通过这项法案而不要过多地考虑宪法的限制。

6月1日，最高法院又宣判《纽约州妇女最低工资法》触犯宪法，这项法案也是刚刚才通过的。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其他很多州已经相继执行这项法律了，而最高法院则认为它违反了法定程序。

听从了来自弗兰克福特和其他人的建议，罗斯福对最高法院否决国家复兴署的举动保持了克制，并且决定等待着法院触怒民意的那一天。法院最近的频频干涉，甚至对州事务也不断插手，势必会引起公众的担忧，他们会担心一个太过活跃的法院会侵占国家立法和行政部门的职权。

在1936年6月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回避了关于修改宪法必要性的问题，但是他却要求所有美国人认真关注一下最近的舆论报道。他说，很清楚有一片"法院现有的多数派创造出来的行政真空"。

美国政府在这块真空中无法行使行政职能。当别人问及是否应该解决这一问题时，罗斯福拒绝发表任何看法。

自从赫伯特·胡佛领导的那些可怕岁月以来，1936年的国会是最不平静的一届。国会主要关注的是受到法院攻击的新政立法。新议案只要不引起太多纷争，就能轻松地获得通过。在大选年，罗斯福也已经摆出财政紧缩的姿态。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于1936年6月10日召开。获得总统提名的候选人是堪萨斯州州长艾尔弗雷德·兰敦。兰敦靠石油工业起家，1912年曾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者。他是一位笃诚的、富于勇气的公民自由运动领袖。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当时认为罗斯福“忘恩负义”，而且对他也不再言听计从了，恨得咬牙切齿，就转而开始吹捧兰敦。赫斯特称兰敦是“来自堪萨斯州的柯立芝”，赫斯特的报道很快让兰敦变成了全美家喻户晓的名入。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委员会还发表了一份文件，文中指责罗斯福政府歪曲了宪法、道义和美国人民的自由精神。这份竞选纲领向美国民众允诺将为民众提供新政所规定的一切，但却表示各项措施如果由各州来实施，效果反而会更好。

兰敦曾经试图发挥一种温和的影响力，但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1936年6月23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举行。法利坚持大会要开够5天，因为为了这届大会能在费城召开，当地很多商业人士慷慨解囊，法利希望这些商业人士感到有所回报。这使得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勒德将其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最肮脏的、最愚蠢的、最喧闹的而且最病态的”一届政党大会。

随着大会召开，罗斯福就已经嗅到了胜利的味道，尽管他失去了路易斯·豪，但他确信自己知道应该如何挖掘成功的机遇。在他任期

内，失业率持续下降，和他就职时相比，现在失业的总人数下降了40%，大约有600万人重新找到了工作。

仍然处于失业状态中的70%的人数，大概有600万人，从联邦失业救济中领取了救济金。因而，像其他国家所估计的那样，4年前刚开始实施新政时的失业率超过30%，而目前已经下降到了大约5%，几乎没有一个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帮助。农民的收入也在大幅增加。

1936年春天，《纽约时报》商业指数自1930年以来第一次重新破百。这些令人鼓舞的数据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比起总统与自由联盟之间的决斗来说要重要得多。

1936年6月，《财富》杂志的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大萧条时期已经结束，并且60%以上的美国人对罗斯福总统的表现很满意。自美国建国以来，罗斯福政府是最伟大的一届励精图治的改革型政府，而且新政带来的种种转好迹象都受到民众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共和党人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当然新政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也有关于新政不成功之处的指责，但是无论如何，罗斯福政府的政策都极大地改善了大多数极端贫困居民的生活条件，并且对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了改革。当把新政和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政策相比较之后，美国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罗斯福政府的表现比反对派的承诺要实惠得多。

此外，罗斯福是一个能够激发国民斗志的公众人物。他有学识却不迂腐，不易屈服却不会轻举妄动，地位显赫却不会让人感到华而不实。他总是显得和蔼可亲、胸有成竹、执着而又高深莫测，在必要之时他总能鼓舞人心。在杂志、新闻片和广播中，罗斯福的受关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届总统，而且他的人格和信服力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罗斯福是1936年大选年民众最关注的话题。罗斯福自己也知道大部分美国人（以及大部分外国人）喜欢他，而且尊敬他。

罗斯福在这次大会上的著名演讲是两个讲稿起草班子共同的产物，莫利和科科伦组成了一个班子，罗森曼和神父斯坦利·海组成了另一个班子。罗斯福和莫利两人因为观点分歧，已经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合作了。莫利同意帮助科科伦起草讲稿。这两个起草班子于6月24日来到白宫吃饭，当时代表大会正在费城举行。因为莫利之前在《今日》杂志上撰文并以批评的语气谈及总统，罗斯福紧紧抓住这一点不肯罢休，两人之间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

罗森曼很多年后回忆道："这是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总统忘记了自己是位绅士。"罗斯福和莫利谈话时言语尖刻，而且互相嘲讽。罗森曼写道："我知道，虽然休·约翰逊和莫利对总统政策的攻击非常尖锐，总统也非常生气，但我认为总统当时所发的脾气和用语是非常不妥的，不仅因为有其他人在场，也因为大家都是他邀请的客人。这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很难堪。"尽管后来莫利和罗斯福之间还有几次直接会面或电话，但是这次争吵给他们两人的关系画上了一个悲哀而不光彩的句号。

总统在费城对超过10万名群众发表演讲，数百万听众也通过广播收听了总统的讲演。演讲稿最后基本采用了罗森曼和海的版本，尽管罗斯福自己又做了多处修改。

随着演讲渐入佳境，罗斯福的气势就好像是一个斗志昂扬的革命者。在这次演说中，罗斯福阐述了他熟悉的主题，从保卫国家自由的美国革命说起，谈到了从经济保皇派（斯坦利·海的说法）那里夺取人民的自由。他从莱克星顿的枪声说到新政，说到世界上日益紧迫的对民主的威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番演讲过于前卫，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它不但形式灵活而且意味深长。哈罗德·伊克斯认为这是他所聆听过的最伟大的政治演说。

“通过企业、银行和证券，通过工农业的新机器，通过劳动和资本，通过所有这些建国之父们没有想到过的新方法，现代生活的整个框架中融入了新的内容。”

在政治上没有归属的杰拉尔德·史密斯、库格林神父以及汤森的余部聚集在一起，并选举北达科他州的众议员威廉·勒姆科作为他们所谓的联合党的总统候选人。

库格林神父攻击汤森和杰拉尔德·史密斯，并且夸下海口表示，如果他无法为勒姆科拉到900万张以上的选票，他就退出广播业。除了这些夸夸其谈以外，其实他一直都没有重视过勒姆科。

几天后，也就是6月28日，库格林在他的主教的命令下，也许是在梵蒂冈教廷的命令下，就自己称罗斯福为“谎言家”和自己“放肆的”言论公开表示道歉。罗斯福无论是对他先前的污蔑，还是对他此时的反悔都没有公开发表评论。伊克斯和罗斯福的其他心腹对此很在意，但罗斯福并没有过多理会。

9月14日，这个国家最具影响力的罗马天主教神父芒德林，在登记投票时表示，他的国人“应该为降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而感到庆幸，较之其他国家，我们拥有繁荣、幸福和自由……”芒德林说他已经指示神父们催促信徒们去投票，但是并没有暗示他们应该把选票投给谁。其实，这位红衣主教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倾向。罗斯福就任以后，就一直在做这位红衣主教的工作，对他以礼相待。

罗斯福乘船返回华盛顿的途中，顺道视察了美国东部遭受洪灾的地区。他于8月14日访问了纽约，并且发表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谴责了战争。他说：“我经历过战争，我经历过海战，也经历过陆战；我目睹鲜血从伤员身上流出；我见过人们因肺部充满毒气而咳嗽不止；我见过死去的士兵凄苦地躺在泥浆中；我见过被摧毁的城市；我见过200个瘸腿的士兵从前线的炮火中侥幸活下来，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他们是两天前一个先遣团的幸存者，他们的战友都已战死沙场。我痛恨战争!”（他的这番话无疑是很真诚的，但是在战争日益迫近的几年里，罗斯福继续声称他比任何美国人都更多地目睹了战争的惨状，这就刺激了数万名真正参加过战争的美国军人的神经。）

罗斯福旅行到了受干旱困扰的中西部各州，和当地的州长们见面，其中也包括兰敦。兰敦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他的言谈举止都还不具备总统的风范。不过他和总统相处得很好。兰敦说罗斯福是“一位出众的、富有魅力的绅士”，罗斯福则说：“州长，无论结果怎样……要么你来看我，要么我来看你。还有……记得千万不要工作太累!”罗斯福回到了白宫，并于9月6日发表了一个关于防洪抗旱的炉边谈话。第二天恰好是劳动节。他把劳动节视为全美庆祝经济自由的节日，就像7月4日美国人庆祝获得公民自由一样。

Ⅳ

9月29日，罗斯福总统终于在纽约开始了自己连任的竞选活动。此时，美国国内形势喜人，“人们远离了饥馑之苦，家庭和农场获救了，银行重新开张，工业复兴，而企图颠覆我们政府的危险力量也被挫败了”。罗斯福认为，正是由于新政的推行，才制止了血腥的革命。他驳斥了对政府赤字的指责，他解释说这种投入并非常规性的资金使用，而是对民众和资源的一种理性“投资”，这种“投资”具有长远意义，日后会有回报的。

10月初，他在中西部的几个州做了一次火车旅行。

汤姆·科科伦参加了总统举行的晚会，有一天晚上，当时罗斯福问他当天是否学到了什么政治技巧，科科伦回答说，每一个登上这列火车的地方领导人都带着这样一个想法离开，那就是“如果罗斯福当选，

我就会成为农业部部长助理”。罗斯福惊奇地回答说，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

10月14日在芝加哥，罗斯福非常坦率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企业的看法，以及自己拯救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功绩。

罗斯福成为了政治中心的主导。对于保守派而言，他是从极端主义者那里保护他们的救世主。对改革者而言，他不仅仅是救世主，也是他们最伟大的领导人。

而兰敦则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最严重的是他攻击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残忍的恶作剧”。他那回归金本位制的建议也不高明。

兰敦把一切赌注放在攻击社会保障体系上面。而罗斯福则以他政治生涯中又一次强有力的演说来予以回击。罗斯福列举了几种不利因素：“工商业和金融高度垄断，投机行为司空见惯，银行违规操作屡见不鲜，阶级对立严重，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军工企业大发战争财……然而，在美国历史上，上述这些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团结。如果它们都很恨我的话，那就恨吧！我很欢迎。”（讲到此处，听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竞选前夜，罗斯福在他斯普林伍德的客厅中对全美民众发表讲演，就像4年前那样，他的这番讲演几乎不含任何党派情绪。绝大部分民意测验显示出这位在职总统的获胜优势明显。

1936年11月3日全美进行了大选，罗斯福获得了美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胜利。总统赢得了46个州的523票，而兰敦只获得两个州的8票。罗斯福共获得2748万张直接选票（占总选票的61%），兰敦获得了1668万张直接选票（占总选票的37%），勒姆科只获得88.2万张选票。

罗斯福取得了胜利，尽管有很多美国人对罗斯福关于总统和政府作用的定位持怀疑态度。当时的民意测验比较落后而且不准确，但是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而非自由主义者；45%的美国人认为罗斯福的政策会导致独裁；大部分人希望当经济危机消除之后，应该把社会援助的责任重新返还给州政府。在盖洛普的民意调查过程中，也有人对罗斯福持有偏见。《财富》杂志的民意调查则更加精确，它指出总统的支持率高达60%。

美国的政治重新改头换面了。自从林肯时代起，共和党占优势的政治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了。

罗斯福长久以来追求的大城市工人阶层和农村改革派的联合阵营正在成型。在美国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中，罗斯福在其中104个取得了胜利，而兰敦只在两个城市中获胜。

盖洛普和罗伯民意调查都显示出，罗斯福在罗马天主教徒、犹太人、非洲裔美国人（这几大团体占了全部选民的将近1/3），以及传统的南部白人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些团体向民主党靠拢，是罗斯福努力的结果。

1936年的选举是罗斯福政治生涯中又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在他之前的总统中只有9位获得了连任。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的71年间，只有另外的3位曾获得了连任。自从詹姆斯·门罗以来，也没有任何人取得过像1936年这样明显的胜利。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将他视为时代的巨人。《伦敦时报》把罗斯福的胜利描述为“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上，英语国家作为民主先锋的地位正在不断削弱，罗斯福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V

尽管罗斯福在工商业界赢得了很多支持，但在一些显要的工商业界人士对他依然充满敌意。罗斯福认为传统的工商业界人士不赞同他以及他的政策，这是带有恶意的。罗斯福低估了几乎所有工商业人士都希望更加繁荣的渴求，他认为大工商业者都是有意拒绝为经济复兴出资。1935年9月罗斯福曾在给罗伊·霍华德的信中表示，他对于大力推动深化改革迟疑不决。但到了1936年5月，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愤怒，向莫利大叫道：工商业界简直是"一个愚蠢的阶级"。"富人们也许认为罗斯福背叛了这一阶级；但是罗斯福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阶级正在背叛他"。要想让罗斯福和工业领导人能够互相欣赏，那就需要一个比大萧条还要严重的突发事件。

罗斯福动用了国内财税机关和司法机关来对付他的敌人，这最能说明罗斯福和工商业界之间关系紧张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看起来罗斯福像个领导才能的滥用者。"而且这一招不只是用来对付工商业界人士，罗斯福还向他的反对者开刀，包括休伊·朗、约翰·L·路易斯、安德鲁·梅隆和摩西·安内伯格，派出了税收稽查员和检察官。

罗斯福的这些动作，和其崇拜者对他的评价大相径庭，很多人认为罗斯福在挑衅面前能够不温不火、富有自制力。在他所有带欺骗性的政治手腕中，他最爱使用税收工具，这可能是对他最有利的，也可能是对他最不利的。1934年司法部控告了安德鲁·梅隆，梅隆是美国最伟大的工业家和慈善家，曾担任过美国的财政部长，后来还出任过驻英国大使。

历史学家阿瑟·斯切勒辛格认为这一指控看起来是"罗斯福的个人报复"。

罗斯福惩罚他的敌人而奖励他的朋友。从某种意义而言，这并没有错，但是罗斯福作为著名的政治家，他也经常宣称自己是平等和正义的代言人，而他却用这种变幻无常的手段来对付可能完全无辜的人，这与他的正面形象是极不相称的。

就算不是工商业界人士，但至少大部分人注意到了政府的不当行为，以至于工商业界和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一个像罗斯福那样身处高位、权力巨大而又深受爱戴的人，因为不能宽宏大度地对待他的政敌反而削弱了他的历史地位。我们在其他一些事件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有时罗斯福会让人们害怕他并且折磨他们。这是有先例的，而且有时也是必要的。即使这样做能弥补由于身体缺陷给他带来的沮丧感，但这种狭隘的心理和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也是极不相称的。

从这方面看，罗斯福的行为和同时代的其他伟人相比是有些卑劣的，例如永不言败、宽宏大量的温斯顿·丘吉尔，以及厌世的天主教徒戴高乐。如果罗斯福能够丢弃，或者是完全掩盖自己身上隐藏的那种或有或无、或多或少的恶意，他或许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曾经这样描述道："罗斯福表面上谈笑风生……但是他的性格变幻莫测，而且不够诚实。"

VI

罗斯福决定亲自去参加为了维护和平而召开的美洲国家大会，这一大会是他于一年前为贯彻美洲国家的和平精神而倡议的。

他乘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海上运输的繁忙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指着停泊在加勒比海域的一艘德国战列舰幽默地说，那艘船"鸣了21炮，向我们致敬呢!"他的这番话还真的会让人信以为真。尽管罗斯福努力想把美国塑造成美洲各国的友好邻邦，但是在谁掌握美洲各国的最高领导权这一问题上，罗斯福从不含糊。

罗斯福总统受到了巴西总统和近百万群众的热烈欢迎，欢迎的人群向罗斯福大声致敬，其中一些群众称赞他是民主的化身。听到这样的赞美后，巴西总统有点尴尬，后来当两位总统的敞篷车开过里约热

内卢市的时候，巴西总统喃喃自语道：“那我可是个独裁者。”也许当他低声说的时候，罗斯福也听到了。罗斯福继续向人群挥手微笑致意，同时对巴西总统说道：“或许你也听说过，有人说我也是个独裁者。”巴西国会在介绍罗斯福时，称赞他是“一个英勇无畏、慷慨大方的人，他面临着近代以来最严峻的政治挑战，而他正在克服这些挑战迎接辉煌”。

当他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200多万阿根廷人给予了他热情的欢迎。他的车队和所经之路都撒满了鲜花，他所经过的街道两旁人群围得水泄不通，连阳台上都挤满了人，大家高声呼喊，对他赞不绝口。

这些都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罗斯福在拉美受欢迎的程度。在这里，就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罗斯福被视为自由和民主的象征，他使美国的金融业绝处逢生，而且还向世界证明了在争取经济正义的同时可以确保民主原则不受践踏。他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尤其在拉丁美洲，他也是第一位访问拉美的美国在职总统。

第二天，12月1日，他宣布会议召开，这一会议旨在庆祝美洲的和平，并且为世界树立榜样，同时与会各国决心团结一致，共同抗击一切针对美洲任何国家的侵略行为。但是，把美国的中立法案扩展到所有美洲国家的提议遭到否决，主要是来自东道国的干涉。这次会议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成果，但它毕竟是美洲国家之间互相协商的一个开端。罗斯福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又受到了夹道欢迎，然后罗斯福一行乘坐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继续北上。

罗斯福认为此时美国的经济恢复已经度过冰冻期了。工业生产几乎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农民收入显然提高了很多，失业率降低到了1933年的一半，而且还在逐步下降。总统对继续降低失业率胸有成竹，他打算通过新的工作法令减少工作时间，让老人在65岁退休，并且让年轻人在校就读时间更长。罗斯福计划减少救济拨款，力争使1938年的财政达到平衡，这使摩根索非常高兴，但却吓坏了美联储主

席伊克斯。伊克斯警告说，如果减少政府开支的话，会导致经济重新滑坡，退回到大萧条时期。

12月29日，罗斯福签署了一项声明谴责一个武器出口商，因为该出口商把飞机卖给了西班牙的共和政府，罗斯福还表示要把别国内战也列入中立法的范围。在这次事件中，罗斯福的意图并不明显，但明眼人却能看得出来。他个人偏爱民主的共和派胜过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盟，也胜过佛朗哥的法西斯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知道共和派是由极端分子领导的，他或许也看到了共和派胜利的危险。罗斯福推断：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出现类似的内战，所以他把中立法案的范围扩展到此类战争，其实也没有放弃太多利益。佛朗哥宣称罗斯福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绅士”。

通过这种做法，罗斯福瞒过了一些孤立主义分子，使他们认为总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这是罗斯福下的一招妙棋，罗斯福能够为了长远战略考虑而暂时忍受尴尬的处境。1932年年初他通过安抚赫斯特，让自己同国际主义者之间保持了距离。而罗斯福现在则以在财政问题上公开打压赫斯特为乐（罗斯福让伊克斯和其他政府官员攻击赫斯特）。所以他今天会如此对待孤立主义者，是为了使自己在关键时刻能够得到他们中间温和派的信任，而未来美国的命运可能就取决于这些人。

他心中越来越迫切地感到美国可能会参战，但是在他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参战以前，他必须说服大多数美国人他最有可能让美国免于战争。这是一项严峻的政治挑战。

在罗斯福的亲信中就有人抱有这样的担心，他们担心罗斯福因为大选获胜而变得刚愎自用，而且担心总统过分夸大在克服大萧条中取得的成就。

1937年1月6日，当罗斯福出现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次演说言简意赅，考虑到了各方的立场而且鼓舞人心。总统发挥了自己就职演说中那高超的演讲技巧。他对国会说："最重要的是以一种更加开明的方式对我们的基本法做一个修改。在对它的解释中已经遇到了困难；但是它仍然是进步的工具，而不是阻碍我们行动的路障……"

"人们也要求法院执行其职能，从而使民主取得成功。我们并不要求法院发挥它本不具有的职权，但是我们希望法律中赋予的权力，能够成为提升社会福祉的有效手段……"这是对坐在他正前方的法官们的当头一棒。每当他谈到最高法院，国会议员们就会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表示支持。

从1937年初到就职为止，罗斯福都专注于推动政府重组，以使政府更高效。总统让6位高级顾问在不同政策领域内辅佐他，总统希望能够切实加强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政策可行性研究、行政计划和人事工作。

1月20日，就职典礼当日天寒地冻。罗斯福检阅了军队，但是缺少了麦克阿瑟将军的陪同。麦克阿瑟在担任陆军参谋长（罗斯福还曾将他的任期延长了一年）届满后，经罗斯福批准退休去了菲律宾。

罗斯福、罗森曼、科科伦还有里切伯格为了准备总统的就职演说下了很多工夫，为的是向民众准确地传达总统的观点。罗斯福说："我们见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那就是美国道德氛围的改变。我们重获生机，我们重拾勇气和信心，我们拓展了精神和道德的新境界……然而，如今要保持这些进步的趋势则极富挑战性。良知泯灭，责任心淡漠，人们自私自利，这些丑恶今天重新出现了……

"我看见数百万的家庭收入微薄、生活拮据，而家庭的阴影日复一日地笼罩在他们心头。我看见城市和农村中的数百万人仍然生活窘

迫，而我们这个国家半个世纪之前就自称是一个文明社会，这两者实在是太不协调了。

“我看见数百万人失去教育和享受生活的机会，失去了改造自身和改善孩子们命运的机会。我看见数百万人没有能力购买工农业产品。我看见的国民住在破房子里，穿着破衣服，营养不良。

“我给你们描绘这样的景象，并非出于绝望。我给你们描述这番景象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希望。我们的国家存在这种不公正的现状，要求我们去改变。我们决心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成为国家利益的受益者，成为受关注的对象；我们绝不会把我们国土之上任何值得信赖的合法团体视为累赘。我们面临的考验不是让已经富有的人更加富足，而是让穷困的人能够丰衣足食。”

4年前，罗斯福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危机之上，他多次指出这种危机其实与战争一样非常危急。如今，这一伟大的斗争已经成功。现在他号召这些满足于现有成就的美国人来拯救社会上1/3的弱势群体。这次演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它给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带来了希望，同时演讲也没有冒犯富有的人。

到1937年底，就像罗斯福在南美所受到的礼遇一样，他不仅在美国各地享有极高的威望，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在当时所有的大国领导人中，他是唯一一位果断有力、精力充沛并且亲切和蔼的领袖。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都显得有些萎靡不振，缺乏领导魅力和想象力，虽然他们中间也许有几个例外，但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无法令人信服。在一些小国里也有很多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但是他们根本无法和罗斯福相提并论。因为只有罗斯福才能算得上是西方自由和民主信念的楷模，他具有创新精神、勇气和才华，他能够吸引无数崇拜者。他能够打消民主信仰者心中的疑虑。

罗斯福表现出众，乐观开朗，成功地重塑了美国的繁荣，激发了美国人的斗志。罗斯福能够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而且口才绝佳。罗斯福经常面带微笑，但从不会因此而显得愚蠢、过度自信抑或不庄重。他的领导才能是与生俱来的，他调动民意的技巧堪称炉火纯青。以上种种品质使得罗斯福对于全世界无数的民众而言，他都是一个独一无二、振奋人心的领导人。

10
把宪法从法院中拯救出来

1937年2月7日，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致罗斯福的信中这样写道

I

1937年2月初，罗斯福与最高法院之间积怨已久的冲突终于爆发了，这场冲突早就在预料之中。罗斯福决定不再被动等待，他征求了他身边最精明能干的两位法学家科科伦和科恩的建议，也征求了司法部长霍默·肯明斯等人的意见。科科伦和科恩主张采取宪法修正案提案的办法，这将要求国会2/3多数投票同意，从而使最高法院对联邦和州立法的判决无效。

肯明斯则提出了另一种建议，他建议给每一位年龄超过70岁的联邦法院法官增派一个助理法官。大约50名法官获得提名，他们将参与每次审判。

肯明斯指出最高法院尤其需要改变，而且他直接对那些上了年纪的法官提出了非难。其中还包括布兰代斯，他虽然是罗斯福的支持者，但是罗斯福认为他是一个司法帝国主义者，也是很多愚蠢的经济设想的来源，而且还吸引了很多年轻有为的官员成了他的追随者。罗斯福和肯明斯都想对过于强大的法院给予强有力的回击，而且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得到了人民和国会的支持。

这一改革草案的理由是为了减轻法官过重的工作负担。1月30日，当总统过55岁生日的时候，邀请了司法副部长斯坦利·里德、塞缪尔·罗森曼和唐纳德·里切伯格在白宫吃午餐。这时，罗斯福把司法改革计划告诉了几位副部长。总统自己缺席了白宫每年为他举办的生日宴会，这一天罗斯福同他的智囊团待在他的起居室里，闭门磋商。

罗森曼重拟了将和立法草案一起呈给国会的司法改革建议书。他强调这些法官因为年过70，判断能力下降了。罗森曼对罗斯福和肯明斯的计划感到气馁，他认为这个计划“聪明过头了”。罗森曼说服罗斯福采纳了“由于精力和体力下降，难以应对复杂的情况和变化了的形势”和类似的语句。罗森曼还说服罗斯福，让科科伦和科恩以更严谨的态度来起草立法建议书，同时不能让肯明斯知道征询了他们的建议。罗斯福这种让两个班子同时运作的做法，导致了荒唐的结果，而且也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科恩，甚至于科科伦都被吓倒了。他认为政府提出的这种司法改革方案，虽然有利于提高最高法院效率，但是这样一种攻击毕竟是对民主传统的一个威胁。他认为这正是罗斯福被大选胜利冲昏头脑的一个证据。

罗斯福放弃了宪法修正案的办法，因为它太费时，而且难以争取到修正案通过所必须达到的36个州，所以他决采取立法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放弃了部分多数的立法，因为它也不足以抗衡法院再一次宣布它违宪，这将会造成一种僵局，而这种僵局将会使美国政府无法采取行动。

罗斯福认定当前的形势必须加以改变，这种判断无疑是对的。总统、国会和公众都不会因为最高法院中那五六个惯于欺骗、讲演含混而且七老八十的法官的阻挠，而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

令人诧异的是，罗斯福貌似虔诚地说要帮助法官们减轻工作负担，这其实是很不诚恳的，这必然会减少大多数美国人给予他的极度信任。但是最令人吃惊的还是这位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平时即便是在一些小事和毫无争议的事情中也会表现出高超的处事技巧，而在这次法院风波中，他并没有表现出自己一贯的果敢和睿智。

每年一度的司法界舞会于1937年2月2日在白宫举行。罗斯福总统出席了，而且像往常一样笑容可掬。所有的最高法院法官，除了讨厌社交的布兰代斯和正在康复中的斯通以外，都出席了舞会。而且首席法官[注]也接受了总统的盛情，参加了舞会。肯明斯、罗森曼、里德和里切伯格也都出席了，罗斯福在近百位客人到来之前还私下里向最高法院的法官敬了酒。总统、司法部长和他们的亲信的眉宇之间明显带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第二天，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继续对文件加以润色。在黄昏时，总统签署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命令，他要求白宫工作人员第二天6点半来上班，并且在早上10点召开内阁会议，11点开记者招待会。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参议院领袖和司法委员会委员都受到邀请参加此次内阁会议。总统的新闻和公关秘书们，都不知道这次内阁会议的主题，所以他们也无法回答受邀者的提问。这天夜里，华盛顿的消息灵通人士都知道有大事要发生了。

到2月4日，罗斯福决定公开他的计划时，白宫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油印的许多份材料，包括司法部长的一封信以及总统致国会的咨文，还有给内阁、国会领导人和新闻界的一份改革草案。他只给内阁和国会领导人一份改革大纲和一些摘要让他们过目，然后要求他们离开时不要把材料带走。那些材料在那天晚些时候将会亲自寄到他们手中。总统很自信，也没有让与会者提问。他在那儿待了整整一个小时，然后坐着轮椅到椭圆形办公室去接待新闻记者。

罗斯福对新闻界则要豪爽得多了。他相当幽默地阐述了他的改革方案，而且强调了中间的某些重要部分。他指出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最高法院867次听证会上，政府的提案717次遭到了拒绝。他谈到“年老体衰的法官问题——一个微妙的话题，但就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坦诚的探讨”。

司法机关重组计划和相关材料当天下午在国会分发下去，让议员们阅读。

对总统的举措，最初有很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对布兰代斯，罗斯福做到了先礼后兵，他让科科伦去给布兰代斯传信，布兰代斯自然表示了“无可改变”的反对立场，但是他很高兴总统事先通知他。主要的南方参议员和众议员都表示反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南部各州的议员们都把宪法当作对抗人口和经济实力都占绝对优势的北方各州的均衡器。

新闻界的反应则比较复杂。赫伯特·胡佛很生气，指责罗斯福终于卸下了他的假面具，暴露出了自己想成为独裁者的野心。甚至对罗斯福持同情态度的编辑和记者们，也因为这个议案的合理性中隐藏着虚伪的成分，感到深受困扰。

大众认为罗斯福的魔法能再次奏效，使他的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纽约时报》的头条表示“总统希望国会通过”这一提案。总统给最高法院提名了几位最高法院法官候选人，尤以菲力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兰戴斯、加里森、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和哈顿·萨姆纳引人注目。

弗兰克福特是一位相当杰出的法学家，但他头上的光环却因为他和罗斯福交往过密而受到影响。他在2月7日致信罗斯福，赞扬罗斯福总统“计划周密”，并果断地说：“我们必须找出办法，把宪法从法院中拯救出来，而且把法院从它自己手里拯救出来。”

罗斯福立刻回信，向弗兰克福特说明了自己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罗斯福说："国家不能再消极等待下去，不能等到1941年或1942年，期望届时国家的立法会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同步。"他担心经济复苏会使国民缺乏紧迫感，这无疑是罗斯福想法的一次真实表露。

从一开始，信件就像雪片一般飞入参众两院，其中十有八九都是反对政府司法改革提案的。哈顿·萨姆纳本人在公开场合的表态非常谨慎，然而却游说他自己所在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对这个议案。参议员伯顿·惠勒（他是最具有影响力的改革派之一）很早就表明了反对。一向忠诚的怀俄明州的民主党人约瑟夫·欧马哈尼和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也表示反对。他们两人这么早就如此表态，使得总统很是震惊也很生气。

共和党人，显然是一致反对的，但他们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深知如果他们作为反对派对总统发动攻击，反而会使民主党人紧密团结在总统周围。众议院议长班克海德和众议院多数派领导山姆·雷伯恩告诉罗斯福，就算议案能够顶住萨姆纳司法委员的反对，并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在参议院也将会面临重重困难。

罗斯福在班克海德和雷伯恩两人的鼓励下，做出了两个明智的决定。他们将在参议院公开议案，反正他们相信司法委员会肯定会去向参议员们报告的。罗斯福决定丢弃似是而非的托词，不再提什么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也不再提通过指派另外50名法官就能保证国家的司法公正。总统将召开一个理事会来攻击这个难以管束的、古板的、反动的和僭越权力的最高法院。他将亲自领导这次议案之战，并将充分利用他所享有的威望来使公众和国会与他站在一起。如果出现党内的变节者，他还会给他们扣上反动的共和党之徒的罪名。这将是背水一战。

3月4日，为了纪念罗斯福第一次就职4周年，民主党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庆宴会，并且已经决定要向全美直播这场宴会。之后3月9日，

总统将会对全美发表一次炉边谈话。科恩、科科伦、罗森曼和里切伯格正在为起草发言稿而彻夜工作。

3月9日的炉边谈话收效甚大。总统说现在的最高法院“已经不是以一个司法机构的身份在行事了，而是以一个政策制定机构的身份在行事”。他还引用了当时很多对最高法院判决持反对意见者的看法，他们认为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凭自己的“个人经济偏好”来诠释宪法的，包括最近斯通法官在《纽约州最低工资法案》中的裁决也难逃此嫌。

对于有些人指责他企图“囊括”法院，罗斯福也委婉地予以了讽刺。

“我的这一计划不是要攻击法院，只是寻求将法院回归他本来的位置。”他宣称那些赞成宪法修正案的人，只是出于他们自己可疑的动机，试图使国家陷入法律、社会和经济的泥潭。

罗斯福努力使联邦的三权分立达到平衡。“你们中了解我的人会相信我的承诺，我保证在这个民主受到攻击的世界里，使美国民主获胜。你们和我都将发挥我们各自的作用。”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战略。把最高法院和当年在1936年竞选中使用诡计的共和党无赖相提并论是很危险的。同样，把反对者和那些支持或屈服于极权统治的外国人相提并论也是行不通的。另外，暗中讽刺法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党派主义和陈腐的极端保守，这也是很草率的。

像往常一样，支持总统的信件和电报如雪片一般飞向白宫。民意测验显示：在总统演讲之后，对总统和法院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是罗斯福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国民不赞成法院的判决，但是显然对这种干涉司法独立的举措也觉得不舒服。肯明斯在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听

证会上给人留下了冷漠的印象，在这次听证会上，他仍然就法官的负担过重问题喋喋不休。

科科伦和罗斯福开始担心反对派的策略是用冗长的、大量的问题来进行阻挠。罗斯福下了赌注，他的一个筹码是他的支持者抨击反对派的能力，另一个筹码则是他自己能用更深入直接的号召来打消公众的疑虑。

Ⅱ

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相信就算参议院的反对声不绝于耳，法院也会通过一系列新的判决来使最受欢迎的新政措施夭折。或是法院为了自救，不得不明智地做出转变并停止攻击新政措施。

没有预料到的是，反对派参议员和法官开始联合，而且这种联合的亲密程度是史无前例。

3月29日，卡特·格拉斯参议员回应了总统3月9日的炉边谈话。格拉斯把罗斯福的议案说成“完全缺乏道德意识……企图用独裁政府来取代民选政府”。

就在格拉斯广播演说这一天，在对最高法院一战中最重要的也最难预见到的事件发生了，最高法院在《纽约州最低工资法案》的判决上自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弗兰克福特于3月30日写信给总统：“就算是瞎子也能看出法院在耍花招，也会知道他们是怎样‘聪明’地解释宪法条文的。休斯的信是很有特点的，休斯装出从政策上考虑要做出让步的样子，实际则是要

把生米煮成熟饭，这就是他们的诡计，参与其中的人都有罪。”他也对布兰代斯的行为表示遗憾。

事实证明了法院尤其是休斯的两面派做法：1937年4月12日，最高法院通过对三项提案的判决，认定《瓦格纳劳工关系法》没有违宪。

民意调查显示，罗斯福的地位又有所滑落，同时有人强烈建议他在此时妥协。参议院多数派领导人乔伊·罗宾逊告诉罗斯福，他可以力争最高法院增加两名法官而不是6名。

在这一点上，罗斯福的技巧值得怀疑。罗斯福无视罗宾逊的建议，在4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仍将继续寻求他的议案在不做重要修改的情况下获得通过。然后他就去了墨西哥湾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钓鱼之旅，留下他的下属们在华盛顿苦苦支撑。

当他回到华盛顿后，他把罗宾逊、班克海德、山姆·雷伯恩邀请到白宫。他们3人在5月14日告诉总统：在当前形势下，他的议案根本没有通过的可能性。他们劝总统接受妥协的方案，或者到下一届国会再提交议案，因为到那时也许可以再从几桩关键的裁决来判断，最高法院是否又回到它反动的老路上，或者真的成了一个锐意革新的机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在5月18日将议案提交参议院大会，而且是以10:8建议否决该议案。

然而5月18日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使得事态变得更加复杂：范·德万特法官向罗斯福递交了他从最高法院退休的辞呈。布兰代斯和休斯强烈要求范·德万特继续留任，尽管他已经精力不济而且身体羸弱以至于不能正常工作了。

罗斯福曾答应乔伊·罗宾逊让他坐上最高法院空出来的那把交椅，那是罗宾逊最大的野心和期望，也正是他一直效忠罗斯福的原因。

范·德万特的辞职进一步削弱了最高法院改革提案的必要性，因为罗斯福最后可以在法院提名一位法官了。这也使得罗斯福身处两难的境地：如果他提名罗宾逊，就会出现另一个保守派法官，同时参议院将失去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如果他不这么做，他也会疏远这位参议院领袖。

最后，罗斯福不得不做出决定。整整两周，罗斯福都在考虑他那毫无希望的议案，在此期间，罗宾逊也在焦虑不安地等待。6月3日，罗斯福把罗宾逊请到白宫，向他保证将提名他为最高法院法官，罗斯福还向他询问最好的妥协方法。罗宾逊感激万分，同时承诺他会竭尽全力提出一个建议，允许总统为每一位达到或超过75岁的法官提名一位副手，同时限定每年可向最高法院任命一位法官。

罗斯福已经耽搁了太久了。总统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也跌至大约35%。总统的处事方式也激怒了国会中的很多人。这个经常被贬低为白宫橡皮图章的机构，以一种反抗的情绪来保证它不会受到最高法院的攻击。

忠诚可靠的参议员罗宾逊于7月2日提出了妥协的法院改革方案。如果采用该方案，政府和法院之争将势必是场不太艰苦的战斗。但是政府并没有像2月和3月提出最初方案时那样用心，在罗宾逊的方案上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

第二天，在显然已经无法把他效力大减的措施解释清楚的情况下，罗斯福觉得有必要接受进一步的妥协。于是提出了一项新的措施，其中接受了法院扩大的原则，可以授权总统为最高法院任命一位副职的法官，但不是最高法院每位在职的法官。

罗宾逊后来死于冠心病，然而总统并没有参加罗宾逊的葬礼。在回华盛顿的火车上有很多国会议员，在总统的指示下，加纳认真地和他们讨论，并试图游说参议员支持总统关于最高法院的提案。7月19

日，罗斯福在当天的报纸上读到了休·约翰逊将军写的专栏，专栏里有敌视总统的内容，而且还读到一封勒曼州长致瓦格纳参议员的公开信（信中要求瓦格纳投票反对法院议案）。

就现在所知，罗斯福没有对勒曼州长的无理表现做出回应。法院不是纽约州长应该直接关心的事情，而且勒曼跟约翰逊一样欠着罗斯福的人情，他能得到那时的职位全靠罗斯福的鼎立支持。

7月21日，巴克利成为参议院多数派领导人，但只是以38:37票险胜。而且罗斯福对哈里森的职位安排，也引发了一些怨恨。然而，巴克利并没有忘记，至少没有很快地忘记罗斯福对他的关照。司法委员会最后提出了折中的解决方案，即1937年7月29日的司法程序改革法案。

这一法案规定，最高法院在审理涉及宪法解释的案件时，要提前告知联邦政府，而且联邦政府有权旁听这些案件的审理。

斗争暂时结束了，但一切并没有风平浪静。

罗斯福真诚地希望能够改善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工作条件，但是不喜欢工会领袖或是其他任何人在幕后操纵。他认为占据工厂然后激化到使用暴力的行为是反动的，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尽管他认为一些工人的过激行为是因为管理层的长期剥削。

由于在芝加哥南部发生了国殇日大屠杀事件（媒体使用了“大屠杀”这一措辞），罗斯福于6月29日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表示罢工中的双方都是违法的：“对双方而言，这都是场灾难。”。所以当罗斯福的司法改革议案告一段落后，他就和这些工会的领导人保持了距离。

虽然法院改革事件让罗斯福在政界的声誉受损，然而他在美国民众心中的地位依然稳固，罗斯福也从未怀疑过公众对他的一贯支持

（事实也是如此）。他得以任命一位新法官，而且使法院在对他的改革方案做出判决时态度不再那么咄咄逼人，这使得他的很多方案都能得以通过。他在这次风波中所做的公开演讲也打动了很多人，他也高姿态地接受了最后的裁定。有些人原本认为他是个狂热的独裁者，现在他们的这种疑虑尽管没有完全消除，但也开始减退。他仍然很受欢迎，而且1937年的失业率仍在持续下降，他的政敌的日子也不好过。当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位有才能的领导人，在处理如此重要的事件时，手法会不够高明。

III

尽管法院之战闹得不可开交，政府的一些法案还是在第二年春夏之交时获得了通过。

罗斯福还通过立法达到了防止逃税的目标。他断言："逃税问题涉及所有美国人的道德与良知。少数富裕阶层如果成功地逃税，那么将会产生连锁反应，会带动其他人像逃税那样逃避法律。"

罗斯福把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不公以及与大萧条做斗争作为首要大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位公民宪法权利（其中又以财产权最为重要）的捍卫者，对公民的财产权并没有太多考虑。

罗斯福认为从富人手中拿钱不应该有什么道德约束，他把拿的钱分配给日益膨胀的政府机构，同时把剩下的钱分给需要的人，这种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也比较武断而且不科学。罗斯福的这种以纳税人利益为代价、广泛给予公共机关补贴的做法，激起了他的政敌心中的怒火。

罗斯福似乎从未考虑过他的一些政治姿态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在他对经济问题所发表的评论中，也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漫不经心的姿态。

1937年春天，在举国关注的小罗斯福和艾斯特·杜邦的婚礼上，罗斯福总统表现出来的一些品行也让人不敢恭维。尽管艾斯特的父亲亿万富豪杜邦是罗斯福总统的死敌，但是罗斯福表现得还是像个绅士（当然他本身就是个绅士）。然而，总统和很多到场祝贺的朋友过分亲昵，这与婚宴的气氛很不协调。罗斯福还很喜欢众星捧月的感觉，也喜欢铺张豪华的场面。用他儿子詹姆斯的话说："父亲亲吻了所有的伴娘。"

罗斯福最终决定让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雨果·布莱克来替代范·德万特，担任最高法院中的法官职位。

Ⅳ

罗斯福因公前往芝加哥，给一些新政的大型公共工程助威呐喊。约有七八十万狂热的群众夹道欢迎他。他在途中多次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这表明尽管他与最高法院之间进行了殊死斗争，但是他在美国民众心中受欢迎的程度丝毫没有因此而减弱。

总统此时的外交政策也进行了及时的调整。1937年，西班牙内战升级了。1936年底叛乱的民族主义分子对马德里发起攻击，但被100多辆苏联坦克和军队打败了，紧接着是双方的长期对峙。在整个西班牙，战争双方都犯下了残酷的暴行。民族主义分子也许罪行更加突出，但是共和派也开始对罗马天主教牧师进行了有计划的大屠杀。这当然点燃了美国3 000万罗马天主教徒心中的怒火。这些天主教徒几乎占了美国总人口的1/4，而且占到了罗斯福稳定票源的1/3~2/5。

1937年4月26日，纳粹空袭了西班牙的一座小城格尔尼卡，而该城镇里没有任何军事目标。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遭到了公众的谴责，也被毕加索永远地保存在了他的名画中。对罗斯福而言，他有意淡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幸运的是2/3的美国人对西班牙交战的双方都没什么偏向。在那些有偏向的人中，支持共和派的人和支持民族主义者的比率大约是5∶3，这个比重悬殊并不大，较之美国国内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比率要小得多，所以不会引发直接的宗派主义分歧。西班牙的共和派日益倚重于苏联，而民族主义分子则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纳粹的支持，这加深了大部分美国人对双方的嫌恶。

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于1937年3月致信亨利·摩根索，希望美国能够修改《中立法》，从而能够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威来区别对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张伯伦深信任何的联合行动（美国和英国）都将让世界各国人民重振信心，还可以消除目前世界面临的危机。

不久，张伯伦当上了英国首相。罗斯福很高兴，因为他认为张伯伦较之鲍德温目标会更加明确。但是罗斯福也担心“他（张伯伦）根本就不喜欢美国人”。罗斯福的朋友托马斯·拉蒙特曾在欧洲待过，对张伯伦很了解，他说：“如果英国有一个人会反对美国，那个人肯定就是张伯伦。”

张伯伦升职后，罗斯福马上就邀请他来美国协商国际事务，但是张伯伦却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关系自此逐渐恶化。

1937年春，当《中立法》需要延期时，罗斯福成功地表明了他那准确的判断力。他得到授权可以要求交战一方用自己的船只从美国运输需要购买的商品，这就是所谓的“现购自运”。同时，如果罗斯福认为禁运有利于美国的和平安全以及美国公民的生命时，他有权对战略物资实行禁运。这一变化使他可以阻止美国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向意大利直接出售石油。

1937年夏天，随着日本再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国际形势更加恶化。8月17日，美国公民被迫离开中国。罗斯福拒绝执行禁运，因为那样做只能是对中国有害。但是9月14日，罗斯福禁止挂有美国旗帜的船只运输战略物资给中日交战的任何一方。国务卿赫尔像以往一样号召和平地解决争端，当然他的这番呼吁也像以往一样，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通过广播向全美听众发表了一个讲演。他说："对灾难挥之不去的恐惧代替了对和平的渴望……没有宣战，没有事先给予警告，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是大量无辜的平民，包括很多妇女儿童，被空投的炸弹残忍地杀害了。在这所谓的和平时期，船只被潜艇毫无理由地击沉。

不要让任何人以为美国会逃避，也不要让任何人以为美国在祈求怜悯。不要以为西半球就不会受到袭击，这里的人民可以继续享受宁静，可以让艺术和文化继续繁衍……热爱和平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坚持和平……

世界上9/10民众的和平、自由和安全，正因为剩下1/10的人企图破坏国际秩序和法律而陷于危险的深渊……我们必须唤醒世界的道德和良知……为的是尊重条约的神圣性，为的是尊重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为的是早日结束这种侵略行径。

不管战争爆发之前是否宣战，战火都会不断蔓延，战火甚至会吞没遥远的国家。我们决心置身战争之外，然而我们无法保证一定能够免受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无法保证一定能够避免卷入战争。我们要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卷入战争，但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无序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的信念和安全感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战火也有可能烧到我们的国土之上。"

总统的这番演讲是巨大的进步。它再次重申了美国人民不愿直接卷入战争的心愿，但是总统演说的核心精神却是呼吁放弃中立，维护集体安全。在面对侵略者的时候采取两种对策，如果可能的话，就与他们和平相处；如果必要时，就拿起武器保卫家园。

罗斯福在国内和国外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这次演说意义重大。

罗斯福开始在外交事务上走在舆论前面，然后在迈出一大步以后又会后退一小步，这样舆论就能紧跟上他。同时，他还试图激发参战国人民的斗志，而同时他又要确保这些参战国不会误以为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参战了。

各项民意调查一致显示：在美国，关于和国际联盟合作对日本或者西班牙内战各方实行禁运这一问题，赞成者和反对者的人数是2:1。有后人曾经指责罗斯福没有更早明确地提出干涉主义政策，并号召公众舆论支持它。其实，罗斯福本人对于能否打败共和党的和平主义候选人，从而获得第二次连任并没有信心。罗斯福也不想重蹈威尔逊的覆辙，即把国家带到新政策的边缘，然后被他的继任者抛弃。罗斯福更喜欢吹响模棱两可的国际主义号角，让人捉摸不透，然后指责反对派喧嚣的反对声正是造成战争恐慌的祸因，然后他会静观时变，并再使用一次这个技巧。这样一来，美国的舆论就会慢慢地向着国际主义发展。

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旨在通过谈判或者通过国际干预的方式来解决中日纠纷。但是会议破裂了，因为日本拒绝参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和德国让意大利加入了它们于1936年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公约》。

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上海，并开始围攻南京。南京城已经饱受沉重而无情的轰炸，日军的暴行就像不到两年前德国人在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的豺狼行径。11月11日，停泊在离南京30多千米外扬子江面

上的美国军舰帕奈号被日本军队炸沉，造成2死30伤的惨剧，尽管帕奈号处在战区之外，而且清楚地标明了是美国船只。不仅如此，日本人还炸沉了美孚公司的两艘油轮。

虽然生病的海军部长克劳德·斯旺森要求立刻对日宣战，罗斯福还是选择了要求日本首相立刻“真诚地道歉”。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他明确地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拍下了事件的全过程，所以日本方面宣称的所谓“误炸”完全是一派胡言。美国给日本开出了一张补偿事故损失的账单，日本大约需要赔偿美国200多万美元，日本人二话没说，立刻就把这笔钱付清了。

V

当年整个秋季美国经济有疲软回落的迹象，这令罗斯福很恼火。

11月10日下午，罗斯福“看起来”打算加大政府支出。但是到了同一天晚上，财政部长告诉纽约的银行家们政府已经决定“坚决向平衡预算方向努力”，而且将减少支出，同时财政部长还声明他讲演时用的每一个词都是事先和罗斯福确认过了的。埃克尔斯写道：“11月10日下午和晚上，政府的立场完全相反，这让我怀疑新政是否只是个政治口号而已。”罗斯福会再次向埃克尔斯保证，这就像总统通常对埃克尔斯的同事所做的那样。罗斯福最后的确按照伊克斯的建议做了，这使得“节俭的”摩根索再次失望透顶。

经济衰退的迹象在这年秋天不断涌现。10月19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各只股票出现了自1932年以来最大的跌幅。经济形势的这一大逆转令政府非常被动。商务部长说经济结构“根本上是健康的”，但事态并未好转。罗斯福命令他不要像胡佛一样大放厥词。

霍普金斯劝说总统召见政府中的年轻官员，因为他们更了解百姓的命运。这些年轻官员们建议政府大幅度增加在救济、政府采购以及住房建设上的支出。他们还建议在1939年保留原来预定的平衡预算目标。

失业率在1937年春天快结束时下降到大约12%，几乎不到1933年3月的1/3。但是1937年底失业率又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了1938年3月，原本曾一度从1933年初的1 300万降至600万的失业人口又迅速增长到1 000万。

没有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像美国那样，给民众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失业紧急救济。如果把这些获得救济的人也视为就业人数，那么失业人数相对就会有所降低，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像原来那样令人欢欣鼓舞。

罗斯福于1937年11月15日召开了一届国会特别会议，收拾当年春天被司法改革给打断的尚未完成的立法事件残局。这届会议于12月21日结束，收效甚微，罗斯福不得不把他的计划推迟到1938年。

随着1937年终于在担心中即将过去，一直对摩根索心怀不满的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和哈罗德·伊克斯在没有得到罗斯福认可的情况下，在经济衰退事件中跳到了前台。12月26日，杰克逊还发表了一个由科恩和科科伦起草的广播演讲。杰克逊在科科伦的鼓动下，准备竞选纽约州长。

1937年12月27日，特立独行的伊克斯表示，那些控制了经济命脉的“60个家族”已经导致了“金钱权力和民主本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警告这个国家正面临来自“工商业寡头法西斯”的威胁。这种煽风点火不太合适，但是这显示出政府最高层由于经济形势不景气变得不安，而且正在寻找替罪羊。总统好像允许他的下属攻击大工商业者。

罗斯福个性独特，总是对结果持乐观态度，而且除了个别对他死心塌地的人以外，他对所有人的动机都持怀疑态度。因为罗斯福向来刚愎自用，从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妥之处，所以他产生了大资本家可能会对抗国家的忧虑。

事实上，甚至是那些极端讨厌罗斯福的工商业者也期待着国家的经济能够复兴。在这一时期，很多人认为罗斯福将会在两年之内离开人世，到1941年，届时将会出现改变政权的绝佳机会。

面对经济滑坡的局势，罗斯福在埃克尔斯的刺激政策和摩根索的紧缩政策之间很难取舍。

罗斯福在1938年1月3日以一份观点含糊的国情咨文开始了新的一年。他没有提到经济倒退，其实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是尽人皆知的。他的反对派已经称之为“罗斯福衰退”。他谈到了他把国家的收入从1932年的380亿增加到了1937年的680亿，而且将在今后几年增加到900亿或者1 000亿。他几乎没有提及1937年搁浅的立法，却谈到了他要对一些工商业实行改革的意愿。

随着罗斯福容许摩根索为了财政预算平衡而努力，联邦福利制度已经退回原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也给总统敲响了警钟。

3月30日，霍普金斯度假回来，他身体健康而且充满活力。他和利昂·亨德森已经制定出大规模支出计划的具体建议。当霍普金斯发现总统不需要说服就会接受这一建议时，他松了一口气。霍普金斯发现总统同意他安抚工商业的努力，而且认为“罗斯福衰退”必须立刻扭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一起花了几天时间，制订了一个全面的复兴方案。

摩根索在继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后不久也结束休假返回。摩根索是在4月11日回到白宫的，当时罗斯福向国会领导人简单介绍了政府建议

中的措施。国会领导人一离开，罗斯福的怒火马上就爆发了。他指责摩根索是个捣乱的人，而且碍手碍脚，总统认为摩根索背着他制定这些建议是错误的。

“对我大喊大叫也无济于事。”摩根索温顺地回答罗斯福。摩根索在4月12日再次回到白宫与罗斯福、霍普金斯、埃克尔斯、伊克斯、赫尔、法利、预算主任丹尼尔·贝尔等人举行会议。摩根索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罗斯福和其他人称赞了摩根索的智慧，并把他的建议加入到他们即将执行的计划中去。

摩根索觉得他对罗斯福已经失去了信心，他曾经以一种赤子之诚尊敬着他的领导人。摩根索强烈反对总统等人将要采取的行动。摩根索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当我不在的那个星期里，他们只是蜂拥着他……围堵着他，让他匆忙做决断，就像赶牛一样。”其实这并非仓促行事而是明智的举措，这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英明决断。

摩根索于4月13日再次回到白宫，这一次他向总统递交了辞呈。罗斯福感谢摩根索在财政部的出色表现，并劝告他不要“赌气”，不要在“生气的情况下退出”，更不要因此让共和党又得到一个可乘之机，借以攻击民主党内部存在着左派和右派之争。罗斯福的这番话既是在私底下鼓舞士气，也是恳求摩根索留任。总统和摩根索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摩根索因为年老体衰当时几乎体力不支，但是他却纹丝不动地站着聆听总统的讲演。两人的这次谈话效果不大，摩根索还是声称他别无选择只有辞职，而罗斯福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也不会接受他的辞职。这一天夜里，摩根索终于同意继续留任。

第二天晚上，罗斯福发表了他1938年的第一次炉边谈话，谈话主要是关于经济事务的。罗森曼、科科伦和霍普金斯在谈话前几小时一直在为他起草讲演稿。

罗斯福说："我从未忘记我住在所有美国人共同拥有的房子里。"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提法，但是却遭到一些在经济问题上持保守观点的媒体的批评。《纽约时报》悲叹："政府选择把水倒在井里，而不是修好水泵。"《时代》周刊要求减少公司税，把社会保障支出降到最低，并且修改劳动法，不要对工人阶级那么慷慨。罗斯福觉得他已经尽力向工商业妥协了，但却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他还认为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是必要的。

罗斯福的计划很快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美国经济又开始走向一次重要的复兴。到1938年底，美国经济至少重新收复自1937年以来失去的一半失地。到1939年8月，工业产值比1937年5月增加了28%；和同期相比，就业人数增加了200万。而且在那些失业人口中，由于增加的救济拨款，超过一半的人又一次享受到新政工作福利计划的照顾。

美国经济的表现再一次变得生机勃勃。1939年8月，美国失业率降到8%以下。当时英国和法国的失业率大约是6%，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因为国防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扩张失业率才大大下降的。德国因为希特勒的国家军事化，已经实际上消灭了失业。

1939年初，罗斯福可以再一次自信地宣告：他正领导他的国家逐步走出经济低迷的深渊，并迎来了强劲的复苏。

VI

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还有另一件让罗斯福分心的事情，那就是关于勒德洛的提案，这也是国际危机逐渐逼近的一个预兆。这一提案强烈要求修改宪法，规定美国在宣战时必须经过全民公决。罗斯福给众议院议长班克黑德写了一封公开信，说这个提案确实很诚恳，但它

的制定将促使战争的爆发，而且让其他国家相信“可以不受责罚地侵犯美国人的权利”。罗斯福得到了一些明智的共和党人的支持，包括艾尔弗雷德·兰敦和亨利·史汀生。最后，勒德洛的提案也被否决了，但是最后的投票数很接近，是209∶188。

罗斯福与国会的关系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而变得错综复杂，即他在国内事务中最大的支持者在外交政策上是他最大的反对者，反之亦然。改革派的西部议员是他国内救济和改革措施的可靠支持者，但他们在国际关系上却是孤立主义者。南方民主党在国内事务上不仅反动而且难以驾驭，但是他们对于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应该发挥的作用和总统观点很接近，而且几乎没有和平主义的倾向。他们的国际主义信念可以追溯到与英国联盟的良好关系的历史开始，而且他们相信美国人应该武装起来。

罗斯福在对待非洲裔美国人的问题上，比起胡佛来要改善了许多。在胡佛当政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美国士兵的母亲去法国给儿子扫墓，但是黑人士兵的母亲乘坐的船却和白人士兵的母亲的船隔离开来，而且黑人士兵的母亲的食宿条件非常恶劣。胡佛的副总统查尔斯·柯蒂斯甚至拒绝同来访的一个代表团中的非洲裔美国人握手。在胡佛任期中，共有57起虐待黑人的事件，而白宫对此未做任何评论，尽管共和党（林肯所在的政党）在南部各州几乎拉不到什么选票。

在这些事件中，就像给西班牙内战各派提供帮助一样，无论是可选择的目标还是要反对的计划，罗斯福总能把握好轻重缓急。为了挫败勒德洛修正案，为了推行他酝酿之中的重整军备计划，他需要那些阻挠反私刑议案的议员为他提供支持。为了得到足够的克服大萧条的紧急救济款，他需要那些赞成“勒德洛修正案”的议员提供支持。

令人不可思议是，罗斯福不仅没有在他的几次立法倡议中失败，而在几乎所有的倡议中获胜。在这样一个政治迷宫中，如果对于政治

权术的使用稍微欠缺一点火候，都有可能英寸步难行。

罗斯福又一次把1937年悬而未决的立法问题在国会上提了出来。这一问题先是被法院之战打断，然后又是在勒德洛修正案上与孤立主义者发生冲突。一项建立在瓦格纳参议员提议基础之上的《新住房议案》在2月获得通过。1937年国会没能通过的《农场议案》，在1938年2月18日也在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的情况下获得通过。

1938年1月，最高法院的一位重要的保守派法官乔治·萨瑟兰退休，罗斯福几乎毫不费力地就让司法部副部长斯坦利·里德替代了他的位置。1938年3月28日，已经汲取了教训且做出革新姿态的最高法院表示支持政府的《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

罗斯福在他的行政重组计划上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劳工组织担心总统今后会武断地使用他的权力，压制一些能让工会运动组织获益的机构，但是他们大体上还是对现任总统表示出了信任。重组计划最终还是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但是，这一计划又在众议院阴沟里翻船。哈顿·萨姆纳说行政重组计划要经过他的司法委员会审议，如果众议院获得通过，就必须将建议中的新社会福利部门独立出来。在众议院中有人嫉妒哈里·霍普金斯的权力，因为霍普金斯是最有可能出任新重组计划中的高职的。罗斯福拒绝向众议院妥协，议案最后没有获得通过。

罗斯福并没有完全专注此事。没有改革，他照样可以生活，他打算在稍后用一切办法使大部分提案获得通过，而且他也没有打算给一群拉帮结派的反动议员们以任何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威。丹尼尔·罗珀就要从商务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了，罗斯福决定把这个位置留给霍普金斯。

1937年未获通过的最后一项提案是工资和工时提案。这项提案在1938年得以通过，成为《公平劳工条例》。这一法律禁止聘用童工，而且规定了在两年后劳工每周工作40小时，还规定了劳工每小时25美分的最低工资（这一标准6年后上升到60美分）。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克劳德·佩珀在竞选连任时，受到了来自一个保守派民主党对手的挑战。这场竞赛或多或少变得像是就《公平劳工条例》和政府新改革计划的公民投票。佩珀获胜了，罗斯福从中帮了大忙，他安排科科伦为佩珀筹集资金。

罗斯福关于美国财富分配的惊人提案在国会中吸引了很多注意力，又因为伊克斯发表了支配美国经济命脉的“60个家族”的言论，国会掀起了轩然大波。根据这种说法，1/10的大型公司拥有全美公司总资产的52%，4%的大型公司的利润占到了全美公司总利润的87%（这些数据的确是真实的，但是别忘了这些公司有着数以百万计的股东）。在1936年，47%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1 000美元，而与此同时，占全国总人口1.5%的最富有阶层所占有的财富和这47%的社会下层民众的财富总量相当。这些数字出现在罗斯福1938年4月29日提交国会的咨文中。总统请求并得到了50万美元，对“国家经济力量展开一次全面而集中研究”。

1938年7月1日，罗斯福宣布在海德公园建立一个图书馆，以保存他的文件和各种个人收藏。事实证明这是个有效的倡议，因为所有在罗斯福之后任职的总统（除了理查德·尼克松由于某种原因，他的图书馆是私人出资建造的）都得到了政府资助，建立了总统图书馆。一些总统曾把他们的图书馆作为退休后的办公室。在1938年夏天，这一举措被视为罗斯福在任期即将结束后退休的证据。

自从1837年安德鲁·杰克逊（他当时已经将近70岁）以来，没有总统曾经在良好的健康条件和与选民关系良好的情况下完成两届任期。

如果总统的任期“结束”，正好离他的59岁生日差10天。他很受欢迎，被认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总统。他也乐在其中，另外国际形势也许将产生不寻常的情况。罗斯福谈到他希望退休，但是委婉地否认他不考虑第三届任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想再连任一届但是却不想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他的权威，免于蹒跚步入“跛脚鸭”的凄惨境地。

罗斯福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选，所以也强化了自己的这一想法。副总统加纳他完全看不上。因为年龄限制，他把赫尔也排除在外。伊克斯不仅好斗而且情绪不稳定。法利则总是考虑狭隘的一己之私。亨利·华莱士、罗伯特·拉·福莱特和弗兰克·墨菲也都不是适合的人选。霍普金斯显然是内阁和华盛顿高层最青睐的人选。霍普金斯感到很荣幸，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向霍普金斯说明了想让他当商务部长的意愿。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1938年5月12日（霍普金斯没有记下他与罗斯福谈话的日期），总统与哈罗德·伊克斯也谈了一次话，伊克斯认为罗斯福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应该再次竞选。罗斯福说他“太爱说教，太容易自我膨胀”，伊克斯也同意罗斯福对自己的评价。罗斯福还认为华莱士为人过于“清高冷漠”，罗伯特·杰克逊缺乏政治头脑。

无论是国会领导人还是民主党人州长中都没有合适的候选人。只要除去南方人（雷本）、罗马天主教徒（墨菲）和犹太人（勒赫姆），剩下的人都不可能当选。罗斯福有个很能干的政府，却没有合适的继承人。罗斯福不想因为提到霍普金斯而勾起伊克斯尽人皆知的多愁善感。霍普金斯此时看来是罗斯福最偏爱的“继承人”了。（事实上，伊克斯和霍普金斯在此时相处已经融洽得多了，但是伊克斯肯定是无法面对一位“霍普金斯总统”而心悦诚服的。）

总统舒服地坐在他的轮椅中，果断地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的候选人。伊克斯最早就认定，在总统的矫揉造作背后，罗斯福其实只是想

要保持他的现状，并竞选第三届总统，从而打破一项跟共和国历史一样悠久的传统。罗斯福从来没有在两任后退休的意愿，他只是想把第三届任期解释为事关责任而不是利己主义，这也正是本书作者的观点。这是一项挑战，但对于这样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而言，他足以将其驾驭妥当。

Ⅶ

在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继续恶化。早在1934年，希特勒就已经对奥地利垂涎三尺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也遭枪杀。威尔斯向罗斯福建议，在1938年11月11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周年时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罗斯福觉得威尔斯的想法很吸引人。

罗斯福无法想象这样一次会议能取得成功，但是他认为通过这样一次会议，能够将加强他对国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控制力。

早在当年1月，罗斯福就准备给11月举行的会议发出邀请函。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在收到罗斯福致张伯伦的邀请信后，感到非常高兴。但是，那位英国首相对此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也没有通知他正在休假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而是告诉了外交副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并让他有礼貌地给美方做出一个官方答复。张伯伦实际上反对任何这种会议，并且说罗斯福“异想天开”的计划“很可能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嘲笑”。

卡多根与林赛大使两人持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能增进与美国政府关系的机会都应该好好把握并加以利用。张伯伦却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完全沉浸在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绥靖政策之中，沉浸在把他们的战争引离英国战略区域的臆想之中。这其实是一种悲剧性的战略错觉。

罗斯福回复了张伯伦，罗斯福对他的怒气毫不掩饰，而且强烈反对向墨索里尼做出任何让步。威尔斯和赫尔要林赛牢记：如果把征服埃塞俄比亚合法化，那么将会给美国舆论造成一种非常负面的影响。艾登说服了张伯伦要征询内阁的意见，张伯伦同意将给罗斯福更多的支持。

1938年2月11日，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来到希特勒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别墅。希特勒想要和他“讨论”一些双方的“误会和摩擦”。希特勒“讨论”的含义就是对着奥地利总理的脸咆哮、尖叫、威胁加谩骂近两个小时，然后逼他拿出一份“协议草案”。

通过这一协议，可以明显地看出希特勒是如何对待小国的。奥地利对纳粹政党的禁令被解除了，所有的纳粹罪犯将得到释放，而且奥地利纳粹领导人成了奥地利的内政大臣。纳粹还接手了奥地利的国防部和财政部并掌管着军队，而且还把奥地利整个并入了德国。

科德尔·赫尔比以往更加担心，他认为德国正在“成为欧洲的巨人”，就像日本在东方的表现一样，而且“它们将试图统治世界”。

在奥地利总理遭到希特勒恐吓之后，张伯伦竟然告诉下议院说：“两位政治家就改善两国关系和其中一国的国内政策调整达成了一致。”

张伯伦在处理与罗斯福的关系时表现笨拙，这也把艾登给激怒了。因此他成了继温斯顿·丘吉尔之后，议会上第二位令人敬畏的反绥靖者。丘吉尔、艾登、希特勒、墨索里尼、罗斯福和赫尔（后来显示还有斯大林），都对于张伯伦当时所执行的方针不以为然。

萨姆纳·威尔斯于3月7日召见了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他语气坚决地告诉林赛，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认同“英国政府……寻

求政治绥靖”的努力。林赛承认他和外交大臣只是看到美国官方的沉默态度，而没有考虑到美方的立场。

罗纳德·林赛大使在美国收到大量信件，看到很多评论，都指责英国支持独裁者，林赛感到非常震惊。他向威尔斯保证英国不喜欢独裁者，但是既然独裁者存在，“为了阻止战争，唯一能做的就是试图并找到与他们和平谅解的基础”。英国寻求“重拾意大利和英国之间的信心和友谊，而这将会在地中海创造令人满意的持久和平”。

罗斯福感到他与欧洲主要国家敌对是没有好处的，所以他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当然美国很显然是不赞成这种绥靖方针的。但是如果那些直接承受希特勒侵略风险的国家也不打算反对，美国就不打算插手它无法掌控的国际事务，同时避免承受国内舆论反对的痛苦。

在威尔斯与林赛会晤的同一天，罗斯福给他的老朋友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写信，信中说张伯伦已经决定“同意大利和德国努力协商甚至是做出让步，例如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

由于国会提出请求，罗斯福公布了最近违反了与美国签订条约的国家。意大利是首当其冲的。张伯伦和艾登之后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恳请罗斯福公开支持英国和意大利签署的协议。罗斯福和张伯伦之间观点的分歧几乎无法弥合，但是罗斯福想尽量先维持美英关系，直到英国调整自己的政策，或者英国人会选出一位更强有力的首相。罗斯福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低调地声明：美国对英国和意大利签署的协议表示关切。

从罗斯福的外交通信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罗斯福已经预见到了绥靖政策的未来，认为这是在希特勒发动全面战争之前换取两三年和平的错误政策，而且对能否实现两三年的和平都很难把握。

VIII

在奥地利事件后不久，在纳粹占领的奥地利就传出了令人痛心疾首的种族迫害事件，针对犹太人的迫害尤其惨绝人寰。美国人震惊了，但是美国民众还没有热心到为深处囹圄的难民敞开美国的大门。在美国也不乏反犹太主义情绪，但是几乎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如此恶毒地对待犹太人。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变得令人发指时，罗斯福对美国驻德国大使说："我们必须保护他们，必须尽我们的所能，用非官方的途径来减轻这种迫害。（但是）这不是政府的事。"美国的确通过私人途径对犹太人提供了帮助，而且从1933年到1937年间，美国共接纳了3万名犹太难民。

罗斯福1938年3月25日在温泉签发了关于难民会议的邀请信，他认为将有大量非官方组织参加。当天晚上，希特勒也在德国发表讲演。希特勒用自己一贯反常的逻辑表达了他的观点，他希望那些对罪犯抱有如此深切同情的人士（例如：罗斯福），至少应该拿出点实际行动，把慷慨的同情转化为实际的帮助。希特勒声称已经做好准备，打算把德国的犹太人"疏散"到"豪华轮船"上。正如往常一样，希特勒很清楚西方民主道德背后的优柔寡断。

希特勒没有料到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那就是罗斯福。在策略上，罗斯福可以说是和他一样灵活，也几乎同他一样狡诈。罗斯福为希特勒的暴行感到惊骇，但是罗斯福知道希特勒对人类道德而言是一个威胁，只有在西方舆论完全认识到绥靖对希特勒是行不通时，纳粹才有可能被打败。罗斯福知道他要让人们在正义的旗帜之下齐心协力。罗斯福将继续保持自己作为自由化身的形象，这也是威尔逊传统的另一个方面，但是罗斯福不会让美国过早地卷入战争。

罗斯福不会在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前，以他的国家为赌注轻率地做出承诺，也不会在一件和国家生死存亡没有关系的事件上做出承诺，就像张伯伦在1939年所做的那样。

但是罗斯福了解德国，罗斯福也知道希特勒这位疯狂的、精神错乱的煽动者的心理，因为有史为鉴。而且罗斯福的政治洞察力极其敏锐，从一开始他就看穿了希特勒的如意算盘。

希特勒把罗斯福视为另一个愚蠢的西方理想主义者，比张伯伦更倾向利他主义，但是两人同样脆弱，而且罗斯福的似乎更容易上当。然而，希特勒醒悟得太晚了，其实罗斯福和他一样充满仇恨，和他一样奸诈，而且与他势不两立。罗斯福从一开始就知道希特勒是他的一个心腹大患。罗斯福知道只要希特勒的统治不结束，只要纳粹主义不死，在这个世界上民主就不可能巩固，美国的第一大国地位也不可能是安全的。

希特勒一向精于权术，但是如果他曾经注意美国的事务，或者虚心聆听过他那精明的驻美大使的建议，他就会对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反纳粹的态度有所察觉。倘若如此，那么希特勒的行动可能就会更加谨慎些。然而，希特勒直到处于军事失败和黔驴技穷的死胡同时，才认识到了罗斯福的威胁性，但为时已晚。希特勒这一错误的政治判断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他对疾病缠身的罗斯福不屑一顾，而且认为罗斯福内阁中有犹太人而恨之入骨。

通常而言，罗斯福不会受任何人的影响。他认为美国是肩负特殊使命的世界领导，他还认为自己是上帝委派的和众望所归的使者，他要领导这个国家实现正义，倘若有人冲击到他的这两个想法，他势必会还以颜色。

---

1. 此时的首席法官是查尔斯·休斯，由胡佛总统任命，他的政治观点摇摆于最高法院法官中的“新政”反对派和温和派之间。——译者注

第三部分 是参战还是观战
1938~1941



11
我相信现在已进入和平时期了

1938年9月30日，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会议返回唐宁街后如是说

I

在1938年6月24日发表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总统总结了刚刚结束的议会会议成果。总统用他一贯的夸张语气，把《公平劳工条例》称为“前所未有的、高瞻远瞩的关乎工人利益的计划”。有一点非常有趣，在总统重申对最高法院采取的主动策略时，他声称那是一个真正的胜利：“最高法院关于宪法问题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它这是有意与政府合作，这是民主实现的不容置疑的证明。”

罗斯福一路前行到俄克拉荷马州，在那里总统发表讲演，支持参议员埃尔默·托马斯，然后到了得克萨斯州。在那儿，他讲演支持约翰·加纳和其他得克萨斯州民主党成员。他也支持29岁的林登·B·约翰逊，此人曾在上一年赢得特选进入议会。这次竞选巡回旅行一直进行到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总统的追随者在各地随处可见，不但人数众多，而且群情激昂。

在加利福尼亚州，罗斯福致力于加强党纪的努力宣告终结了。在那里，总统在1939年金门国际博览会的建筑工地上做了演说，这也是总统第一次走过金门大桥和奥克兰海湾大桥。他没有称威廉·麦卡杜为“老朋友”（他从来都不太欣赏此人），也没有这样称呼此人的对手谢里登·唐尼。7月16日，在圣迭戈，罗斯福登上了休斯敦号重型巡洋

舰，沿墨西哥海岸而下，穿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墨西哥湾，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假旅行。

罗斯福于8月9日在佛罗里达弃舟登陆，坐专列前往温泉。之后他于8月11日去了佐治亚州，号召他的“佐治亚追随者”们击败强大的现职参议员沃尔特·乔治，还把民主党的提名资格交给劳伦斯·坎普。对于像罗斯福这么精明的政治领导人来说，这可真是一次轻率的主动出击。

表面上，罗斯福到那里是为了去考察一个农业电气化工程，乔治参议员和坎普参议员都陪同访问了。罗斯福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我的朋友”这个词，然后把它进一步夸张，变成下面的说法：“乔治参议员，我相信我们能成为私交很深的好朋友。”在告诉佐治亚的选民们抛弃乔治，支持坎普之前，总统一直唱着这个老调子。他转过身来和乔治握手，参议员接受了他的问候，然后不温不火地说道：“总统先生，我很遗憾，因为你在这个场合来质疑我对民主的信念，还抨击我过去的经历。我希望你明白我已经接受了你的挑战。”（即使是罗斯福最死心塌地的仰慕者也很难想象，倘若总统真的把乔治从美国参议院里挤走后，乔治还会是他的“亲密朋友”。）

至少是在南部各州，像罗斯福的对手们所形容的那样，总统正在进行“大清洗”，这种行为与希特勒和斯大林（后者的大清洗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极为相似，并且注定会清除掉最棘手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尽管总统对此从未进行公开说明，为的是使南方逐渐形成一个更具种族容忍性的社会，但这毕竟也是一个值得称颂的成果。

同日晚些时候，罗斯福在南卡罗来纳州，站在火车上对大群民众发表演说。不赞同总统大部分立法的国会议员科顿·埃德·史密斯在他自己的选区受到挑战。在反对《公平劳工条例》时，史密斯说：“一家人可以靠50美分过一天。”这句话使他臭名远扬。罗斯福结束了他的简单发言，他说：“我相信这车再过一两分钟就开了。”（就好像火车司机会无视总统正在火车后面给群众演讲，会发动火车出站似的。）总统

再次申明："我不信任何家庭或任何人能靠50美分过一天。"这就是他对史密斯的论述针锋相对的反驳。其实为了使自己的政策更加有效，肃清对手应该比罗斯福所涉及的面还要再广一些。

在回华盛顿的路上，罗斯福还把纽约议员约翰加在了8月16日记者招待会的他要攻击的黑名单上。总统说："这几周以来，约翰一直致力于逐条批驳新政的力度和新政的相关立法。"记者会前一天，他还把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参议员列入了黑名单中。

在劳动节周末，罗斯福乘着他的专列从纽约市来到马里兰州，其间做了6次反对参议员泰丁斯的演说。这可能也创下了总统在马里兰州发表讲演次数的最高纪录，但这些讲演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总统所发表演说支持的一些参议员落选了，但议员林登重新获得提名。尽管罗斯福反对泰丁斯，还做了马拉松式的演讲来批评泰丁斯，最后泰丁斯还是以较大优势胜出了。沃尔特·乔治参议员和那位罗斯福支持的劳伦斯·坎普全部名落孙山。

罗斯福在火车上只讲了一句关于科顿·埃德·史密斯的话，但史密斯作为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在重新选举中险胜，成为南卡的一名众议员。罗斯福并没有为麦卡杜落败于唐尼感到不安，反而为杰里·沃里斯能够从洛杉矶偏远地区进入国会山而感到高兴。

这次喜忧参半的清洗活动富有戏剧性。20世纪30年代晚期，民主国家内清洗不是建立在想象中的活动，而是在法院努力配合下展开的。这也肯定了那些把罗斯福看作是有抱负的独裁者的观念。它没能加强罗斯福的威望，南方的大资本家们用自己的方式，成功地排挤了这位无可争议的美国政坛佼佼者。罗斯福知道如果一个领袖人物丧失了魅力，就像岩石滑坡一样，种种不测将接踵发生。罗斯福还没有到那种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年末大选的前景并不乐观。但他进入了第二个任期的后半段，国外情势也前所未有地紧张起来，国内人们也开

始对总统的第三任期存在争议。几乎每个人都感觉到：像当时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暴风骤雨即将席卷美国。

Ⅱ

到9月中旬，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苏台德危机上。一战过了20年后，这场危机威胁着要把整个欧洲再次拖入大战。

苏台德区的纳粹领导人康拉德·亨莱因曾于1938年4月24日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了他的要求。亨莱因最主要的目标是要把苏台德区变为纳粹德国的一个州。苏台德地区有300万人口，其中90%讲德语，而且大多数毫无疑问是纳粹分子。

张伯伦没有试着去按从前的保证来保留苏台德区英法的权利（法国曾做出保证，英国与法国结盟）。捷克当局无畏地坚持抵抗，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什进行了一次包括40万名战士在内的动员。法国则在3月中旬，民主党左翼政府逐渐式微时重申了它坚持它的捷克条约的义务。法国和英国都警告德国：袭击捷克势必会引起战争，苏联也做了类似的警告。

罗斯福派驻法国的大使威廉·布利特神经高度紧张，敦促罗斯福邀请希特勒、墨索里尼、达拉第和张伯伦去海牙开会，商讨如何和平解决危机。如果可能的话，罗斯福很希望能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一个似是而非的角色。但他不想在欧洲召集欧洲领导人开会，因为在那里，美国只能油腔滑调地重复他人说的话，而不能真正地参与进去。同样，他也不想触怒孤立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他不想扮演一个不受人重视的角色，从而让国家和他自己都成为别人的笑柄。

7月份，张伯伦派前内阁大臣洛德·朗西曼到捷克斯洛伐克，试着与贝内什和亨莱因达成和平共识。他所做的这些“与希特勒亦步亦趋”。朗西曼是个地地道道的墙头草，只知道见风使舵，他不会比张伯伦更倾向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他只不过起到了刺激作用。

德国政府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认为，希特勒是个疯子，德国如果和英法开战，苏联也许也会卷入，这样一来德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于是他们采取了许多行动。这些官员们无疑勇敢而忠诚；但希特勒注定了让他们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会以失败告终。

丘吉尔于1938年8月31日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一份备忘录，旨在促进与苏联和美国更密切地合作。他主张在处理德国造成的苏台德危机时，与苏联、法国和至少怀有同情心的中立派美国结成试探性的联合阵线。同一天，罗斯福和摩根索开始制定一项计划，允许英国和法国把黄金转移到美国换成现金，再从美国购买武器。另一个对德国和意大利贸易限制的计划也在展开。但总是小题大做的卡德尔，却担心这会有悖于他的自由贸易主张。

罗斯福所处的位置极其微妙，他不能完全反对伯利的建议。伯利作为美国国务卿，说道：“我们的感情正在使这样的事实变得模糊，即行动者并不是那个野兽般的狂人希特勒。”然而，他们对付的不是别人，正是希特勒。而且罗斯福也不认为希特勒是可以加以利用，或是可以不断安抚得了的。他与丘吉尔持相同的观点，即越快对希特勒进行抵抗效果会越好。他也敏感地意识到，如果希特勒的魔爪压制了美国的良心，而英法领导能够激发起美国人坚定的信仰与决心，这将是美国在英法抵抗中发挥真正作用的唯一出路。但张伯伦没有机会做这件事，他力不从心。

罗斯福觉得应该尽快把美国的舆论带上正轨，鼓励英国和法国坚定信心，重整军备。这最后一个过程至少能够让他把整个国家从沮丧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他声称美国不参战的最好的保证，就是把自己用

最有威慑力的军备武装起来，使自己可以保护西半球并能够援助值得援助的战士。无论谁在1940年当选，都注定会难逃希特勒的魔掌。举国上下都在猜测罗斯福是否会有第三届总统任期。尽管日子很艰难，罗斯福还是找到了结束人们消沉情绪的方法，使美国成为不可或缺的世界和平警察，危机并没有削弱他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信念。

在纽伦堡的纳粹党年度集会从9月6日开始，持续了一周。希特勒在党派大会上做最后发言之前，哈利法克斯透露给派往柏林的亨德森一个消息，让他警告希特勒，英国政府将会对任何针对捷克的活动保持密切的关注。亨德森把消息带回伦敦，内阁废除了向大使下达的指令。

结果，9月12日晚，希特勒做了一次浮夸而没有实际意义的演讲，尽管演讲充斥了威胁和不满。这是第一次在美国广播希特勒对大批听众公开发表的演讲。

根据霍普金斯的说法，罗斯福当时正和他一起在明尼苏达等待儿子手术的结果。总统从广播里听过希特勒的两次讲演后，他便认为战争可能已经迫在眉睫。罗斯福把霍普金斯派到西海岸去秘密调查美国的战斗机生产潜力，因为罗斯福预见到空军将会在大国间的又一次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III

1938年9月13日，捷克一个边境小镇上，一位捷克警察在一家旅馆里执行搜查任务时被纳粹分子杀害了。一场枪战爆发了，一名警察和8名纳粹分子丧生。接下来暴力活动席卷了整个苏台德地区，政府宣布了战时法案，捷克军队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

可想而知，德国政府暴怒了。张伯伦已经决心尝试进行个人外交。他向希特勒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打算马上过去与您会晤，以找到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希特勒的回应大概是这样的：“这纯属意外!”

69岁的张伯伦是个缺乏自信而且妄自尊大的怪物，他只带了4个随从前往柏林。张伯伦返回伦敦，对等待他的记者们说道，他和希特勒进行了一场“坦诚友好”的谈话，而且还会再次见面。

张伯伦在回唐宁街的路上受到民众欢迎。他告诉内阁，希特勒是条“庸俗的小狗”；但张伯伦本人也认为，在和希特勒交谈的时候他发现，希特勒其实是个可以依赖的人。

罗斯福对此很反感，他对哈罗德·伊克斯说，英国领导人去“讨好那个从前的下士和室内画家了”。“英国和法国，”他说，“无论是在这场国际动乱的过程中还是动乱平息以后，将洗清犹大手上的血。”

达拉第和更摇摆不定的外交部长邦尼特于9月18日去了伦敦。英国内阁已经分成了三派：一派人包括哈利法克斯在内，认为把成千上万的苏台德区的非德国人交出去是不公平的，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一派是那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换取和平的人；还有就是以达夫·库珀为领导的直接的反对者。库珀提醒内阁注意，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方针是，防止欧洲大陆任何国家占据领导地位。这个政策使英国有义务和苏联一起支持苏台德和法国。法国代表团和张伯伦及哈利法克斯一起制定了一个规则。哈利法克斯很快就放弃了他对苏台德区捷克少数民族的关心，和张伯伦一起开始压制内阁里的反对派。捷克人将不得不交出整个苏台德区，这比德国整个国土面积的一半还要大。英法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详尽制定了他们对捷克人的要求，并要求尽快作复，因为张伯伦预计将于9月21日再次与希特勒会晤。

到19日下午，罗斯福召来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并警告他说，如果国会里孤立主义者的领导人知道总统要说什么的话，很可能会尝试着弹劾他。总统把英美在苏台德上的要求比喻成向任何其他国家都未要求过的“最恐怖无情的牺牲”，并且预言捷克人可能会拒绝。他又说，如果张伯伦和达拉第能用这种手段成功地不断安抚希特勒，再把它强加于布拉格政府，他一定“第一个欢呼”。但他怀疑希特勒不会因任何让步而安静太久，或者捷克不会接受这种粗暴的分割。

罗斯福建议，如果布拉格确实拒绝这个提案，英法就应该行动起来，在法德边境上采取防卫的姿态（这也正是希特勒在战争爆发时，希望他们做到的）。而且，在未经宣战的条件下可对德国实行全面封锁。罗斯福提议，此后他们应该宣称，自己是鉴于避免伤亡的人道主义才采取这一步的。他还答应美国会观察这一封锁，并以优惠条件向西方盟友提供军火。尽管总统的战略计划很牵强，但在当时，希特勒如果能够屈服于封锁就放弃战争的打算，对各国都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罗斯福的这番谈话讲得感人而诚挚，在他看来，美国舆论最终会赞同他所勾画出的政策的。

林赛马上把总统的建议转达给政府，但没有得到回音；甚至当他随后又发了一条消息要求至少要有“一个友好的赞赏”时，也仍旧没有得到回复。在伦敦，英法部长们看不上苏联的援助，也认为美国帮不上什么忙，张伯伦称美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罗斯福的战略观点成为了没人响应的废话，但他对形形色色的欧洲领导人——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和贝内什的洞察还是极其准确的。罗斯福不愧是一个深谙欧洲事务的美国总统。

当英法等待捷克做出决定时，捷克总统也在等待苏联确定支持自己。9月20日，苏联政府最终确认它将与法国一起同德国作战；而如果法国不遵守条约义务，它将会接受捷克联合行动的请求。如果波兰分

裂出去，苏联又将如何领导这样场战争，这可以说将永远是个谜。斯大林的信条简单说来就是：怀疑。

苏联的鼓励尽管似是而非，但推想起来大概是罗斯福观点的暗示。像罗斯福对林赛预言的那样，这对捷克总统拒绝英法提案来说已经够了。贝内什也反对关于公民投票的号召，并鉴于捷克与德国在1925年制定的一个条约的仲裁条款提出追索权。不幸的是，在这一点上捷克首相米兰·霍贾突然反戈，出卖了他的国家和总统：他召来法国大使，并告诉他总统已经批准了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捷克政府将放弃抵抗。

这样，最后一个希望也破灭了。捷克人、苏联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来自美国的公开的非战争的支持，能够令人信服地牵制希特勒。波兰和匈牙利正召回它们居住在被围攻的苏台德区的少数族群，而墨索里尼又在大声赞颂匈牙利这一做法的好处。波兰人这种滑稽的做法是尤其可鄙的，因为众所周知，尽管希特勒一直宣称“在欧洲没有领土野心”，但波兰几乎肯定是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有霍贾的请求做后盾，英法政府起草了给捷克的最后通牒并于第二天送交贝内什。贝内什向英法大使让步了，他被彻底击垮，精力耗尽，只能无声饮泣。但在那些给他承诺又可耻地背叛了他的国家面前，他仍保有尊严。

IV

贝内什那“全国拥护”的内阁政府引咎辞职了。张伯伦在9月22日，也就是第二天回到德国，英国首相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众多警卫替他护送开道，一支乐队为他演奏《天佑吾王》[注]。张伯伦坐上渡船，“像一个患了关节炎的少女一样，被摆渡过莱茵河”。他在古老的罗蕾莱[注]的土地上见到了希特勒。

张伯伦被希特勒领进了楼上的会议室。他们面对面地在那张众所周知、覆盖着长长绿色绒布的桌前坐下。张伯伦陈述了自己在处理捷克、法国和他的盟友的事件时遇到的困难，但得意地宣布他能接受德国领导人的要求，即苏台德地区可以不经公民投票就移交(整个过程可由一个三人使团监督)，而且法国和苏联与捷克签订的条约将会被捷克斯洛伐克中立的国际保证所取代。希特勒就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要求再次保证英国、法国和捷克同意把苏台德区交给德国。张伯伦微笑着肯定了这一点。

在几秒钟的停顿后，希特勒回答说：“我非常非常抱歉，但这已经没有用了。”他得到的比想象的要多，为此他感谢张伯伦。但他已听说了苏台德区德国人的悲惨遭遇，认为需要马上提出一个解决办法。

会议拖沓冗长但始终无法达成协议，晚上又在希特勒的官邸会晤了3个小时。最终希特勒将捷克48小时之内从苏台德撤军的期限宽限到了10月1日，这就和张伯伦一开始提出的建议十分接近了。这是一次艰难的会议。张伯伦将于23日上午提前返回伦敦，原定当天与希特勒的会面取消的消息一传开，全世界就已经清楚地知道，谈判破裂了。

张伯伦回到伦敦时，外交气氛一度非常紧张。欧洲各大媒体都充斥着有关征兵入伍和扩充军备的报道。肯尼迪大使对此的对策是把林白邀请到伦敦。对于罗斯福来说，这就是一次在关键时间和地点制造祸端的法西斯聚会。罗斯福常常提到肯尼迪是个法西斯的同情者，并向伊克斯解释说肯尼迪曾向他建议不要在演说中批判法西斯主义，因为他认为这种政府模式将会对罗斯福及他的继任者治理美国有所裨益。

罗斯福拒绝了贝内什对于让他正式要求英国和美国站在捷克斯洛伐克一边的请求。美国除了发点战争财，并不打算走得太远，罗斯福认识到他没有任何立场怂恿其他国家也加入战争。他还拒绝了肯尼迪

关于让张伯伦直接对美国进行公众演讲的请求。罗斯福试图唤起美国人民对纳粹威胁的警觉，而不是借宣扬息事宁人的美德来麻痹群众。

英国内阁9月24日、25日的会议争执不断。哈利法克斯支持以达夫·库珀为首的反对派。外长说希特勒“专断地制定条款……好像他已经赢了这场战争”。

面对希特勒最近提出的要求，马萨里克通知英国，捷克将会对德开战，无论获胜的希望多么渺茫也绝不投降。处于围困之中仍摇摆不定的英法同盟最终决定派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去见希特勒，督促其实施已达成的伯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条款。如果此举失败，英法将和捷克斯洛伐克并肩作战。

罗斯福于9月25日致电各国首脑要求继续谈判。第二天他又追加了一封电报，明确指出一旦战争爆发全世界都将追究德国的责任。希特勒迅速回复道：“总统先生，当你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整个事情的发展趋势时……你也应该意识到，德国政府绝不缺乏耐心和达成和平谅解的诚挚愿望。”9月26日晚，希特勒在柏林广场再次当着大批群众做了一次面向全世界的广播演讲。罗斯福在给玛格丽特·苏克雷的信中说道：“你听到今天希特勒的叫嚣，看到他的表演以及对听众的影响了吗？他们没有喝彩——而是发出了像动物一样的叫声。”

威尔逊于27日到达希特勒的官邸。一提到捷克，希特勒便立刻大发雷霆，以至于威尔逊都来不及递上最后通牒。威尔逊还没来得及张嘴，任务就已经失败了。

但是希特勒开始注意到比结结巴巴的英国特使更有说服力的因素。罗斯福一直命萨默·吉尔斯等人向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汉斯·迪克霍夫施压。迪克霍夫向希特勒进言，如果英国也卷入捷克的战争，“美国将会把全部砝码加到英国的天平一端”。海军总司令雷德也警告希特勒，以德国的海军实力根本无法与英美抗衡，甚至还不及法国和意大利。

德军参谋部的代表也小心翼翼地表达了需要更多时间准备与强敌对抗的希望。这些使得希特勒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些相对平和的方法。张伯伦的想法更令人费解。9月25日，他告诉内阁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希特勒施加了个人影响”。

1938年9月27日晚，希特勒给张伯伦发了一封相对礼貌的信函。张伯伦当天下午刚刚对全世界做了一次演说。英国首相说：“多么可怕，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我们竟然要为了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之间的争吵而挖战壕、戴防毒面具……如果我们必须打仗，那也得为了比这更大的事。”如果有人“相信有国家想借由武力统治世界，我相信这必将遭到反对……但是战争是个可怕的东西，在卷入战争之前我们必须清楚，这的确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罗斯福让他的所有大使向驻在国政府寻求支持，以用于还在进行着的危机四伏的谈判。他还致电墨索里尼，后者被认为（据他本人声称）对希特勒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英国大使林赛认为，罗斯福想通过这种方法让议题得到解决，总统恐怕注定要“失望”了。总统正在玩一个幼稚的游戏，企图鼓励一些胆小鬼帮忙，但又不给任何实际的好处。

1938年9月28日是英国国会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日子之一。首相决定，向全世界广播对议会所做报告的内容。首相的报告于下午3点开始，他将由一系列历史事件一直讲到最近的时局。他刚讲完前一天晚上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了一封电报，希特勒上午的回电就到了。卡多根将其概括了一下，写了张条子递了上去。接下来这个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停顿之一持续了将近5分钟。张伯伦看了卡多根的条子，下议院的议员们一片肃静，紧张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作为对张伯伦和罗斯福的回应，墨索里尼打电话给他在柏林的大使，让他通知希特勒安排会面，并说他（墨索里尼）“被请来调解苏台德问题。分歧其实很小。告诉总理阁下……我将会站在他身后。他必须做出决定。告诉他我希望他接受建议”。希特勒答复表示接受了意大

利领导人的建议，接着就致电邀请张伯伦和达拉第前往慕尼黑。而这正是打断张伯伦议会讲演的条子的内容。

哈罗德·尼科尔森写道：张伯伦的“整个脸色，整个身体都好像变了……所有焦急和消沉似乎瞬间被一扫而光；他又欢欣鼓舞了起来，一下子仿佛年轻了10岁”。最后张伯伦说：“希特勒先生刚刚同意了将军事行动推迟24小时，并将与我、墨索里尼先生、达拉第先生在慕尼黑的会议上会面。”一阵沉寂之后，连日来，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几分钟之内那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立刻化为欣喜若狂。只有温斯顿·丘吉尔，走进议院时“带着一脸即将发生历史悲剧的神情”，离开时也没有祝贺和赞扬张伯伦。丘吉尔说：“政府不得不在耻辱和战争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耻辱，从而必将得到战争。”

像每一个热爱和平的人一样，罗斯福也松了口气，但同时也质疑着这种和平能持续多久。而罗斯福的其他助手的兴奋之情却溢于言表。布利特大使致电说：“我真希望能到白宫，在您的脑门上深情地吻一下。”罗斯福总统却远没有这么高兴，而且不明白这位大使缘何如此激动。

和通常一样，故事的结局总不会一帆风顺地向已知的方向发展。会议进行了16个小时，连议程都没有达成。希特勒虽然是大会主席，但对于会议没有任何计划，他只是要求别人让步，进而提出更多的要求。最终结果和在德国与英国首相会面时并无多大变化，之前10天的煎熬实在没有必要。捷克将从10月1日至10日分5步从苏台德地区撤退，具体的边界将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制定。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及他们人数众多、衣冠楚楚的随从会议一结束就离开了，只留下张伯伦和达拉第来通知捷克人他们伟大祖国的悲惨命运。从头至尾无人过问捷克人的意见，他们只需要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

罗斯福了解发生的一切。他让肯尼迪给张伯伦带个口信，并严禁肯尼迪向首相提交任何书面信件，除非明确标注为私人信件或声明与美国总统及政府无关。他还不准肯尼迪透露任何美国关于慕尼黑决议的官方对策。罗斯福的口信是这样的："我和您一样希望并相信，现在正是多年来在正义和法律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新秩序的最佳时机。"罗斯福仍然如履薄冰，但已日渐成为一个成熟而灵活的政客。

张伯伦一夜都没有睡好，于9月30日将近中午时与希特勒在其寓所私下会了面。

条约顺利签订。张伯伦和属下愉快地共进午餐之后即启程返回了伦敦，在机场面对狂热的欢迎人群时手中还挥动着这张纸。归来的张伯伦受到白金汉宫的召见，接受了乔治六世国王的祝贺。回到唐宁街之后他应要求发表演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首相从德国回到唐宁街，光荣地给国人带来了和平。我相信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了。"

张伯伦最大的错误就是过分吹嘘了慕尼黑协定。苏台德人有权选择做德国人，英法不能为此而加入战争，但根据一个渐进的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可以保留边境上的防御工事，这倒可以使英法师出有名。

英法与苏联的关系亟待一个条约来确定。然而，张伯伦显然更倾向于对英国构成巨大威胁的希特勒，此时毫无威胁可言的斯大林就被抛到了一边。张伯伦将斯大林留给了希特勒，为了保护自己抛弃了他的巴尔干伙伴，并且大力协助德国摧毁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坚强勇猛的民主主义盟国。

比起加强与罗斯福的关系，张伯伦显然对安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感兴趣。而一些更有先见之明的人，比如丘吉尔和艾登，则已经预见到英国的将来还得多靠罗斯福。罗斯福宽容了张伯伦可能带来恶劣后果的对姑息绥靖的错误估计，容忍了他的冷落怠慢、盛气凌人。他

期待着在即将到来的更紧迫的时期内，与英国更强有力的领袖共同合作。

罗斯福开始像美国已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样部署一切。和其他大国不同，美国不会与任何对他的安全有潜在致命威胁的力量共存，他有能力也觉得有必要消除这些威胁。

如果张伯伦没有极力鼓吹他是如何忠于国家利益，并信誓旦旦会将一切做得尽善尽美，但引起了危机后又放任不管，他的垮台恐怕还不至于那么迅速且无人惋惜。

在华盛顿，有人认为罗斯福对于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也有功劳，但很快就不再提了。罗斯福可一点也不想要这样的“功劳”，他只希望别人不要拿这件事来戳他的脊梁骨就行了，他在国内的政敌一定乐于以此来指责他对和平事业缺乏热情。

罗斯福行事一向让人捉摸不透，但需要表明立场的时候，他则会无比坚定。从他的信件和谈话中我们可以推测，他认为慕尼黑会议的成功是不可靠的，战争不可避免，最终美国也可能被卷入欧洲的战争。如果他对于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决心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的恐惧成为现实，他设想美国加入战争的最好的情况就是：尽可能地推迟，战前准备充分，并争取舆论的一致同意。

丘吉尔和下议院张伯伦的一群吹鼓手进行了辩论，丘吉尔说出了一些关于慕尼黑事件的“最值得纪念的箴言”。丘吉尔发表了其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一次演讲，他无视那些政府支持者的嘲笑声，这样说道：“我们已经取得了一次彻底的胜利……但不要以为这就是结束……这只是我们今后年复一年将要尝到的苦酒的第一口。除非我们能重整旗鼓，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为了自由而战。”

丘吉尔比以前更被英国的政府精英们孤立了。但是罗斯福却对他的话饶有兴趣，他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位英国领导人，能够与之结成一个神圣同盟，共同对抗野心家阿道夫·希特勒。

英国究竟该何去何从开始备受关注——是同美国结盟，即使处于从属的位置，还是急功近利地与希特勒讨价还价？最终丘吉尔克服了对美国的不满情绪。1939年1月，罗斯福对一群参议员说，希特勒是个受“偏执狂”和“圣女贞德情结”困扰的“野蛮人”……自认为是“恺撒和耶稣转世”，而实际上却是个“疯子”。在这种情形下，丘吉尔和罗斯福携手合作的可能在慕尼黑会议之后越来越明朗。

V

慕尼黑会议后的一段时期，虽然有一些和平主义人士表示担忧，罗斯福经过国会同意，还是把军备用品的订单放到了首位。最初的订单金额就高达5亿美元，主要用于购买新型战斗机和军舰。

罗斯福接见了法国银行家让·莫内，并且接受了这位远见卓识的银行家在加拿大建立大型飞机制造厂来供应法国空军需要的建议。也就是说，将在美国制造的飞机零部件运到加拿大完成组装，然后再由海上运往法国。

罗斯福的“一战”老友阿瑟·默里爵士10月21日来到白宫。罗斯福让他将一封详尽、绝对私人的信件带给张伯伦和空军总司令金斯利·伍德。罗斯福希望张伯伦明白，三周前的慕尼黑协定在与独裁者的战争中起不了什么预防性作用，英国需要“美国的工业资源”，而从某种程度上，“罗斯福，作为美国总统能够做到这一点”。

罗斯福将和加拿大总理麦肯瑟·金商讨关于从美国进口飞机零部件、在加拿大组装的计划，以及其他对中立法的回避问题。罗斯福告诉默里，不出一两年他就可以通过在加拿大快速组装，每年供应给英法两万架飞机。

同时他直接和乔治六世国王商讨关于次年夏天英国国王和王后出访美国的事宜。

虽然罗斯福觉得张伯伦很“滑头”，但其实他还是比较天真的，希特勒发现这一点后非常高兴。在慕尼黑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张伯伦仍在为持久和平的胜利自鸣得意，他根本没有想到还需要两万架飞机来驱逐倾巢而动的德国空军。因此他对默里12月初送来的信表现得十分礼貌却反应平淡。

罗斯福做了一系列演讲，以此来引起美国公众对欧洲局势进展的重视。他在《先驱论坛报》上的讨论通过广播和新闻短片向全美播送。总统说：“现在越来越明显了，恐惧畏缩换来的和平绝不会比用炮舰刀枪赢回来的和平更持久。”

“如果法律的权威被对武力的崇拜所取代，我们将不会有和平。

“如果国家政策带来了战争的威胁，我们将不会有和平。

“如果国家政策使那些无助而遭到迫害的人流离失所无处容身，我们将不会有和平。

“如果人们无法自由思想，无法自由表达意愿，我们将不会有和平。

“如果本该用来进行社会和经济重建的资源消耗在大规模的军事竞赛上，人们势必会感到疑惧，更会威胁到各国的经济繁荣，我们将不

会有和平。”（事实上，正是军火制造业成为了世界最主要大国经济繁荣的支柱。）

11月4日，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发表了全美讲演，希望民众不要因为政府正在进行中的改革而动摇信心。他向听众保证，经济正在好转，就业率仅在10月就上升了3.5个百分点。

然而种族纷争破坏了美国引以为傲的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也破坏了总统一向的泰然自若。“在你们选择满意的候选人投票给他时，请不要考虑他的种族、肤色和信仰。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有最早的殖民地血统，也可能是在童年时为逃避旧世界的残暴专制而来到美国的。但是请记住一点，他们现在都是良好的美国公民。”

罗斯福预料到这次选举民主党可能会遭遇挫折，因为民主党已经在1930年到1936年间连续4次获胜，这次共和党一定会有些“反弹”迹象。但是11月8日的选举结果却比他预料的要坏得多。共和党取得了11个州长职位，8个参议员席位，81个参议员议员席位，幸好国会的控制权还掌握在民主党手中。

选民开始有右倾的倾向，并且很明显已经厌倦了新政。保守派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现在能够阻止总统的自由主义措施了。罗斯福转而寻求南方人的帮助来武装美国，并继续以加强国防工业来消除失业。罗斯福的敌人当然把选举结果说成是总统的失败，国民显然也对总统近期的表现不甚满意。但他仍旧很受欢迎，经济也在继续好转。罗斯福像以往身处逆境时一样，十分平静而且丝毫不感到愧疚。

VI

1938年7月，正当罗斯福穿越美国为他支持的候选人做宣传时，原定在瑞士召开的有关难民问题的会议在法国埃维昂召开了，瑞士拒绝了这个“荣幸”。在埃维昂的法国代表说，法国已经接收了20万难民，没法更多了。而英国由于其自古以来就更加偏向阿拉伯人而不是犹太人，专横地拒绝讨论有关巴勒斯坦的问题。

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本人在这一问题上则主张对德国和其他迫害国进行道德上的质问，但对英国和其他国家则不行。希特勒在1938年3月的一次讲演中表示，他本来是非常乐于给德国犹太人放行，让他们去其他西方国家的；但西方国家除了斥责德国，拒绝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这一点，恰恰验证了希特勒对西方民主人士的一贯看法，“他们接受着一群胆小鬼和伪君子的领导”。

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可以说是罗斯福公众表现中最受争议的一点。像对待其他问题一样，他有着自己的判断，他知道美国舆论能够接受什么。他看穿了希特勒的把戏，认为对犹太人和政敌的迫害正是他给其他西方领导人们挖的一个陷阱。希特勒以此拉他们下水，让他们在自己的人民面前丢脸，逼他们做些徒劳无功的事，离间他们与国内舆论的关系。希特勒早就知道他们是不可能接收所有犹太人的，最后不过是装腔作势或冷眼旁观。

罗斯福想出了一个能够表达抗议的两全之策，但这个策略实施起来风险很高，既要考虑到美国人对受迫害人士的同情心，又要考虑到美国人在失业情况严重时对外来移民的恐惧感。

但难以解释的是，罗斯福接受了一份有12万德国犹太人同情者签名的请愿书，请愿书请求将没有用到的外来移民名额用于接收难民。1938年4月13日，罗斯福同意成立政治难民总统咨询委员会。但很大程度上，这个委员会只是用来装门面的。

考虑到政治现实，罗斯福此时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很快人们将会迎来一个战火燃遍全球的时代，罗斯福将获得连任，政治上更坚不可摧；美国的失业情况将得到控制。而他的政策虽然更为大度，却容易产生更严重的问题。

Ⅶ

1938年11月7日，一个在巴黎的波兰犹太人格林斯潘在德国驻巴黎使馆枪击一名三等秘书并致其重伤，他因德国人野蛮驱逐1万名在波兰的常住犹太居民而恼羞成怒。戈培尔煽动了一个反犹太民族的小浪潮，希姆莱和他的副手指挥在德国的党卫队（SS）报复所有犹太人。戈培尔发出“自发游行”的命令，这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注]。2万犹太人被送进了集中营，800多家犹太人经营的商店被破坏，大量犹太人受伤或遇害。德国政府在全德50万犹太人身上征收4亿美元的罚款。

德国当局的野蛮行径引起了美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强烈反应。罗斯福在11月15日对报纸媒体做了以下讲演：“德国在过去几天内的新闻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震撼……我简直难以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根据赫尔的建议，他将驻德大使休·威尔逊紧急召回国内。直到1949年希特勒帝国终结，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之时，美国才再派出驻德大使。

在伦敦，尽管英国民众对这场集体屠杀表现出了同美国人一样的厌恶，但张伯伦及其政府保持了缄默。美国国务院指示肯尼迪，告知英方他们的不动声色将引起美国对英国的憎恨，张伯伦则温和地评价道：“德国犹太人应该被彻底安置到其他地方。”但他也不便向外透露是哪儿。巴勒斯坦就更不必谈了。德国犹太人倒是非常乐于整体移居

国外，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收他们，因而无论是罗斯福发自内心的恼怒，还是张伯伦那种不光彩的漠不关心，都没有真正帮助到这些纳粹受害者。

尽管难以置信，但1939年67%美国人反对1万名儿童难民进入美国。当他们被证实主要为犹太人时，反对比例下降到61%，这至少说明人们对遭受迫害的欧洲犹太人的怜悯（有缓慢的）在上升。罗斯福没有能在1924年的移民法中加进承认犹太儿童难民的内容，他通过调解人设法使得15万犹太人在国际贷款的资助下离开了德国。

直到1946年，当死亡阵营的恐怖面纱被掀开，同时美国的失业率被最大限度控制时，72%的民众反对允许更多的犹太人和其他难民住在美国。1984年，在回应是否接受来自苏联的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时，79%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水晶之夜”以后的日子里，有许多方法救助希特勒魔爪之下的受害者。罗纳德·林赛爵士向萨默·韦尔斯建议，英国每年给出的6.5万个外来移民配额应转给德国。这样可以使德国的移民名额有效地增加两倍。韦尔斯当即否决了这个提议，并用一番演讲教导林赛这些名额不可随意转手。

就在林赛拜访白宫的当天，弗朗西斯·珀金斯也拜访了总统并提议将德国3年的配额合在一起。罗斯福礼貌地拒绝了该提议。若将林赛和珀金斯的提议综合，那么德国的配额将在一年之内增长到战前的10倍，达到25万人。在这种姿态下，美国就能强迫其他的接受国获得另外的25万人，然后拯救所有的德国犹太人。这样虽不能拯救最终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中所有犹太受害者，他们中许多人都在恶劣的环境中死去，但这对于这个复杂民族的迁移，无论是那些获得拯救的人，还是美国人的拯救行动本身，都使世人对美国肃然起敬。

罗斯福的确曾允许1.5万名持有将在1938年底过期的奥地利护照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美国永久居住，否则他们将在6周之后重返德国。罗斯福向报纸媒体表示：“这是一个关于集中营的问题。”在这些德奥难民中，包括了一些已然或即将成为美国公民的卓越人士，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库尔特威尔等等。

正试图从特拉法尔加日演说的大惨败中恢复过来的约翰·肯尼迪，接受了张伯伦对于重新安置德国犹太人的评论，还陈述了他自称为肯尼迪计划的方案。该“计划”不过是一堆废话，因为除了“人口稀少地区”这类字眼外，他没有对他们的去向再发表任何意见。

几个月之后，这个意义含糊的“计划”的愚昧之处逐渐显现出来。当豪华邮轮圣·路易斯在1939年5月中旬载着936名乘客从汉堡驶出，除了6人以外，几乎所有的犹太难民都持有古巴的入境签证。古巴总统拉雷多·布鲁在该船出发之前宣布这些签证作废，而汉堡–美国轮船公司的船主被迅速告知此事。当轮船靠岸之时，哈瓦那方面则通知船长签证作废。

在被告知古巴的立场之后，一名乘客患了严重冠心病并不幸逝世。包括两名古巴人和4名西班牙旅客的非犹太乘客和22名拥有着高价签证的犹太人被准许入境。很明显，纽约共同遣送委员会（JDC）提供了购买高价签证的必要资金并承认了所有去古巴的乘客。代表共同遣送委员会的古巴律师尝试同古巴政府争论，政府方面中止了讨论并抵制难民入境。

劳伦斯·贝伦森律师在6月2日拜访了古巴总统布鲁。同罗斯福和所有政治领袖一样，布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巴蒂斯塔更强大的影响力努力保住自己的位置。当贝伦森建议在签证份额上略微缩减时，布鲁表示他充分考虑到国际人道主义而要求圣·路易斯号离开哈瓦那和古巴海域。

财政部部长摩根索介入了赫尔和韦尔斯的争论中，他建议将难民送往美国维尔京群岛，但赫尔发现如果没有国会的通过，这样做是违法的。他利用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快艇掩护圣·路易斯号，在乘客入境取得突破的时候确保轮船的下落。

施罗德将船沿着佛罗里达海岸线慢慢向北行驶。圣·路易斯号成了轰动一时的热点；734名乘客排着队等待入境。来自美国国内各种团体以及圣·路易斯号乘客的申请书向罗斯福飞来，在请求中他们强调他们中的400多人都是妇女和儿童。还有许多报社发表社论要求罗斯福对这些不幸的人抱有同情心。他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考虑到希特勒下一步的策略会利用其贫穷和恐惧的难民来淹没美国，罗斯福没有改变胡佛针对移民申请者所颁布的经济情况调查。尽管美国的犹太人是当时除了苏联和波兰以外在世界上最多的，但他坚持认为德国犹太人的地位不是美国要去优先解决的问题。

最终在实施了一系列外交策略后，在被其他许多国家拒绝之后，施罗德船长绝妙的表现赢得了比利时的同意，圣·路易斯号和它的乘客们在6月最终进入了比利时。很难理解为什么罗斯福没有在这一问题上给古巴总统施加更多的压力。即使他对圣·路易斯号乘客进入美国一事缺乏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完全可以坚持说服贝伦森在压力下出钱，并要求布鲁承认那些在汉堡上船前往古巴的诚实的人们是有签证的。也可以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应是JDC有责任抓住机会同古巴政府将事实理清。整个故事就是一部令人伤心的悲剧，除了施罗德船长外，几乎没有人是讲信用的。

在美国，最复杂的意见一般也是最开明的。罗斯福曾收到一封来自一群知名作家的联名信，呼吁美国的入境条件能更加开放。这个提议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好莱坞巨星的支持。

切断同德国贸易关系是举措之一。美国接收了50万纳粹难民，这同战前区别较大并且无法操作。美国这么做除了基于人道主义考虑，

更是为了扩充国家自身的人才库。

美国的确在1940年大选和美参战之间3个月内接纳了5万德国犹太人，这本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举动，但罗斯福却只收获了很少的信誉。当罗斯福逐渐承担起一切，去做一个对抗德国的秘密斗士并伸展他的权力触角去帮助希特勒的对抗者时，他的理想没有被那些在德国受压迫的犹太人转移。

1938年11月14日开始，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乔治·C·马歇尔将军之间那极为重要、极富历史性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呢？罗斯福可以在白宫同一些高层次的百姓和军官探讨关于他增加空军军费计划的实施问题。他提议将一半金额定位为指标。他说如果美国拥有高规格的空军和吞吐量，希特勒将会在下一年有所收敛。他大声表示美国必须拥有足以保护全球的空军力量。

马歇尔有些犹豫。如他后来私下解释的，他认为罗斯福没有注意到那些辅助的问题，如训练飞行员等，并且不认为美国的抵御袭击能力如总统说的那样强。

大部分参谋人士在12月1日带来了18亿美元的额外防御预算，这曾因为政治和财政问题被罗斯福否决。

陆军部因为罗斯福而呈现一片混乱的局面。作战部部长哈里·伍德林和他的部长助理路易斯·约翰逊——一位大西洋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1月20日，罗斯福收到一封马歇尔让约翰·J·潘兴将军写来的信，信中他希望为陆军争取更多的资助，同时希望减少对空军的拨款。罗斯福对此没有做出保证，而是惊异于自己把美国最伟大的战争英雄带进了一场军事辩论之中。

罗斯福于12月13日在白宫接见了安东尼·艾登。尽管两人都反对绥靖政策，但是罗斯福还是避开了对外交政策的讨论，而是习惯性地对空军力量大唱颂歌。

年底，罗斯福为政府带来了一些新鲜血液。他准许司法部长霍默·肯明斯退休。密歇根州州长弗兰克·墨菲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罗斯福赏识，被提名担任司法部部长。

12月24日，新上任的商务部长哈里·霍普金斯在白宫宣誓就职，并于节礼日正式开始工作。来向霍普金斯道贺的第一批人中就有乔治·C·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对于霍普金斯而言，看似不可能却实为莫逆之交。马歇尔决定和霍普金斯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他知道霍普金斯能将信息传达给总统。他们首次为了军需生产的合作业务迅速扩大，因为罗斯福已经决定通过国有工厂扩大飞机制造。罗斯福率先提议用陆军部的资产建立7个大型军用飞机制造厂，这将使美国的飞机产量每年大幅上升，并向他的支持者们保证“霍普金斯可以不依靠财政部的拨款建立这些工厂”。新政过渡到第四个阶段，一个大规模的防御强化工程正在进行。

马歇尔也许会推测当克雷格将军退休之后，霍普金斯可能将帮助自己爬到军事阶梯的最高级。到那时罗斯福就能够欣赏到自己杰出的才能。马歇尔的支持者不光有霍普金斯、克雷格，还有潘兴。

第一眼看上去，马歇尔和霍普金斯的关系是对立方之间的互相吸引而罗斯福也在没弄清重点以前，在不同方面依赖着他们。

马歇尔对高位的渴求并没使他成为一个马屁精。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在重大问题上向罗斯福提出异议，拒绝霍普金斯频频要他去海德公园的建议，并且总是尽量避免在罗斯福面前成为一个“小跟班”。

起初马歇尔发现罗斯福开会时，总是傲慢自我、放任自由，但之后又逐渐觉察到罗斯福拥有伟大的力量、抱负和勇气。最后，他们之间建立了非常轻松的关系。1939年早春，罗斯福任命马歇尔为陆军参谋长。

国家的敌人不在内部，而是国外的野蛮独裁者。在避免成为大萧条的替罪羊之后，罗斯福把重心放在美国对外国专制的气愤和疑虑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过渡期，也预示着一个定将影响眼前这场战役的政策即将出台。

在罗斯福的帮助下，西班牙的公正救济委员会（Impartial Relief Committee）成立了，委员会中的委员背景各不相同，既有孤立主义者也有国际主义者。美国的罗马天主教统治阶级断定这是一个主要帮助共和党人的机构。1938年底，在西班牙发生了一场关于支持或禁止武器的巨大动乱。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于1939年初访问罗马，再一次试图说服墨索里尼能在他的影响下使希特勒平静一点。张伯伦承认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但仅仅让意大利统治者更加轻视英国，而在英国政府看来，当时的墨索里尼仅仅是德国人手里一个吵吵闹闹的傀儡。

墨索里尼担心张伯伦受罗马民众的欢迎，便说“这些人……归根到底是富人家玩腻了的孩子，最终会丢掉他们的王国”。

罗斯福帮助英法强大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在飞机销售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在让·莫内访问美国之后，一个法国代表团将再次赴美，对美国出售的飞机做进一步检查。罗斯福本人不得不要求空军指挥官允许那些法国人靠近A–20飞机。

对于1月19日在洛杉矶的试飞事件中，阿诺德只是喋喋不休地说法国人正考虑买下那个“秘密”炸弹。恐怕只有罗斯福这位具备掩饰能力

的总统，才能将政府从这种潜在的难堪中解救出来。

罗斯福尽了他的全力。他总是能够处理好那些乱七八糟的玩笑、牵强附会的比喻、半真半假的言论甚至是彻底的谬误，最终智胜媒体。他在第二次会议上当着全体内阁的面告诉摩根索和伍德林：“继续如往常一样，让法国人买他们想要的武器。”

总统于1939年1月底邀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到白宫。他坚定地阐明了自己对于国家战略利益的概念。他的基本前提是法国陆军同英国海军已经提供了一个盾牌，美国依其发展到今日这般强盛。英国和法国人正被邪恶危险的德国政权所威胁，而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扶持这些国家。

他论述了美国的政治思想，并声明不会重蹈杰斐逊在1807年关于中立法的覆辙。美国目前已更加强大，应该对自己的实力有所认识。参议员们应该认识到他们拥有相同的利益，即在避开海外威胁并支持被威胁者的同时不参与战争。他简要谈及太平洋地区并希望日本能够被美国驻太平洋群岛的空军和海军所牵制，希特勒似乎要从那里的政治发展中求得好处。

罗斯福认为他应当从过度曝光中有所收敛。在1939年2月3日的记者会上，他收回了关于美国的“莱茵河边境”是一个“不堪一击的谎言”的言论。大多数人对他当时的立场投了赞成票。

罗斯福正在经历他总统生涯中最错综复杂和重要的政治时期。他知道如果要将国家从世界危机中拯救出来，他将必须第三次连任总统，而要赢得连任，他将必须作为一个成功将国家置于战争之外的候选人。他将，必须推销“以实力求和平”的紧急政策。在准备作战时找寻和平之路，这也是摆脱失业的方法。

1939年初，他曾对民主国家国会议员说，大规模军事生产将“意味着为这个国家带来繁荣”。直到他重新参加竞选的时候，欧洲同盟国可能选出比张伯伦和达拉第更坚决的领导人，能够刺激他们的民众从麻木中觉醒并协助罗斯福提升美国对民主国家的援助。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幕了。在“一战”时期，西方同盟离开美国的干预也许就会失败。斯大林不会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墨索里尼将按照希特勒的指示行动。日本甚至可能被诱使去袭击在远东的英法以及印度。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初期，罗斯福已然发现西方民主国家能够与之共存。他在1939年初相信美国将是世界消灭纳粹必不可少的力量。美国将是世界上杰出的国家。他如同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艺术家，在1939年初将把美国带上一个其他国家所无法达到的高度，而他自己也可以与华盛顿和林肯齐名了。

英国历史学家曾写道：“他的性格有着不可抗拒的庄严……他最亲近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则解释说：‘他谨慎地隐藏着他思想的轨迹。’”

如同一个敏捷的掠夺者，他知道何时展示他的设计并将其付诸实践，一旦他决定实施一项政策，他总是镇定自若、光明磊落，当最终决定之后，通常鼓舞人心。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领导人能够怀有罗斯福般改造世界的想法。也没有人能成功持久地实施一个重新调整国际关系的大计划。

其他国家大都被德国早期的冲击压垮了，并不得不忍受对付纳粹而遭遇的伤亡，这将使罗斯福更易于达成最终目标。他的国人给他的负担越少越好。在罗斯福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将高涨的理想主义热情与方法上严格的犬儒主义结合起来。

罗斯福同希特勒的斗争将更加复杂。就如同那原始的战斗舞蹈，直到两个你死我活的敌人完全控制了对方才戛然而止。

---

1. 《天佑吾王》，英国国歌。——译者注
2. 罗蕾莱（Lorelei），德国民间文学中传说的女妖。——译者注
3. “水晶之夜”在德文中为Kristallnacht，意指住宅、商店玻璃尽遭打碎的惨状。——译者注

12
罗斯福先生，你的干预在哪里都吃得开吧？

1939年4月28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大厦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说

I

1939年2月13日，犹他州参议员埃尔伯特·托马斯提出一项提案，赋予总统对敌对国家的战略物资出口实施禁运的权力，但是如果在别国成为他国侵略的受害者时，他可以在议会支持的情况下宣布放弃对该国禁运。

这项对现存法案的修正案得到了很多有力的支持，绝大多数美国人对现存规则的荒谬和不公都早有认识。《纽约时报》的社论对这一修正案表示支持，还刊载了前共和党国务卿亨利·史汀生表示支持的来信。然而，参议员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奇·皮特曼对这项提案和任何其他要修正中立法的提案并不支持。

皮特曼炮制了一个和托马斯相似的提案，并且在3月19日的一次全美范围的广播讲演中对之大肆鼓吹。博拉立刻对之做出了回应。他呼吁将这个完全贸易禁运扩展到一切可能的相关物资的范围。而罗斯福不动声色地通知皮特曼，说他想要连根铲除中立地位法案并且不愿它卷土重来。总统还说，对于有自己外汇储蓄和商船的欧洲国家来说，一手付钱、一手交货是行得通的；但对于在抵抗日本的中国来说会导

致不公正待遇。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仍然没有任何进展。

这次立法会议中另一个灾难性的提案，差点儿就在3月21日的第二轮投票中获得通过。也就是那一天，法利和斯蒂芬·厄尔利恳求密苏里州参议员哈里·杜鲁门从所在州返回华盛顿参加投票。他如约而至。

杜鲁门没有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那份赞助。他相信这是因为别人觉得他是个做事有准则的人，因而认为他的忠诚是理所当然的。杜鲁门在参议员投票前几分钟赶到，这次投票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第二天，罗斯福邀请了杜鲁门到白宫并且对他好言相慰，热情感谢他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罗斯福对堪萨斯错综复杂的党派政治如数家珍，这让杜鲁门深为折服。罗斯福说，赞助者们得到他的赞助是因为堪萨斯的民主党必须被“清洗”。只效力于一个市的杜鲁门和冷酷的现实主义改良派罗斯福坦诚相见。这是罗斯福和杜鲁门关系的转折点，也是杜鲁门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直至接任副总统职位的起点。也正是这一步，他才最终继罗斯福之后登上了国家元首的宝座，并成为了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

对行政机构的改革重组受到了长时间的质询，比如对最高法院的改革建议和对国家中立法的修正。罗斯福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他毫不懈怠的坚忍精神。

1938年深秋，一批杰出的犹太人的来访才扭转了局面。他们敦促罗斯福不要任命弗兰克福特，因为这会造成最高法院里代表中的犹太人数目过多，给人一种这一任命太过“亲犹太人”的印象，从而可能在美国掀起反犹太主义的狂潮。罗斯福声称他的答复并未做出任何承诺。但是苏兹格报告说罗斯福宣布：“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罗斯福当然不可能受人摆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斯福与苏兹贝格两人在很多领域都有联系，但是两人之间也充满了矛盾。《纽约时报》在1932年和1936年都曾赞同并支持罗斯福作为总统人选，但是对他在法院里安插自己人手的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对他的一贯评价也多带有批评性。

Ⅱ

英国接到了日本具有很强侵略性的警告，美英两国政府通过在伦敦的美国海军随员开通了秘密地下途径。英国人表示他们可能被迫将部分皇家海军的战列舰调动到新加坡。这让法国和罗斯福提高了警惕，他们对让日本成为在太平洋上拥有最多舰队的国家而心存忧虑。演习一结束，他就采取了哈利法克斯4月11日要求的行动，命令太平洋舰队重返圣迭戈。

罗斯福对科德尔·赫尔传统的国务院情报来源存有一些怀疑，甚或可能是鄙视，但还是听取了一大堆来自不同渠道的可信度不一的情报。

英国仍保持着与美国交换情报。罗斯福也阅读美国驻欧洲记者的报道，有时还会收到他们的特别简报。再加上篇幅不小的正规渠道的信息，罗斯福的信息来源相当不稳定。

1939年3月3日，慕尼黑协定的破产暴露无遗。在张伯伦推动下签署的这份协定墨迹未干，德国政府就开始大肆渲染所谓的捷克对斯洛伐克人的不公正对待。

贝内什在慕尼黑灾难后就退休了，接任他的是埃米尔·哈卡博士。

希特勒又发表了一段他擅长的长篇抨击性演讲，鼓吹自己的耐性特别好，但是现在也磨得差不多了，没完没了地发牢骚，对他的那个温和的来访者大叫了许多让人心惊胆战的威胁字眼。哈卡最终打电话给布拉格，命令他放弃一切抵抗。

哈卡最终签订了允许德国进入捷克本土的条约。这个选择对每个人来说都清楚地意味着捷克作为一个国家消失了。

德国一天内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匈牙利占领了鲁塞尼亚。被抛弃的捷克人只能接受屈辱的悲惨命运。罗斯福接受了这一事实，萨姆纳·韦尔斯签了字，罗斯福担心赫尔会太温和而并未向他做任何咨商。

正相反，张伯伦的答复是因为斯洛伐克已经在此之前退出了，所以英国不必履行慕尼黑协定中规定的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不管怎样，最后一段时间对张伯伦的同谋来说，事态已经发展到让他们无法接受的地步。内维尔·亨德森爵士从柏林发回电报说："德国的犬儒主义和不道德的行为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卡多根甚至是哈利法克斯，都抛弃了原有主张，法克斯以极其严正的语气向德国大使赫伯特·冯·德克森发出警告。

英国众议院的对外政策委员会现在要求召集征兵，所有的党派联合组阁国家政府，并与苏联结盟。英国此时处于破釜沉舟的境地，得出战争无法避免的结论。

虽然在政治上举步维艰，张伯伦还是一心想推行和平政策。他本该立即提出辞职，带着其他绥靖主义者溜走，来确保丘吉尔、艾登和达夫·科珀在新政府里的显著功绩。这是唯一能够凝聚足够的抵抗德国力量的方法。

不幸的是，张伯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死守着自己的宝座不放。英国政府认为与苏联比起来波兰的军事作用更大。波兰人民虽然充满勇气，但统治他们的却是一个腐败的专制政府。波兰人自己都认为相比于德国，苏联对他们的威胁可能更大。这是另外一点推动希特勒与斯大林合作的原因。

III

罗斯福总统于3月29日离开华盛顿乘专列去了温泉。第二天，佛朗哥的军队就完全攻占了马德里，西班牙恐怖的内战终于结束了。佛朗哥会积极地保持西班牙的独立，免遭它以前赞助者势力的渗透。罗斯福于4月1日取消了武器禁运，并在两天后与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表示对它的承认。

从温泉回来后，罗斯福解密了一封他于4月14日发给希特勒的信。信中要求他确保不染指31个国家，并列出了几个委任托管的领土和殖民地（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

罗斯福意图让独裁者们保证10至25年之内不攻击这些国家。在独裁者做出保证后，罗斯福从中获利并在这些国家间建立一个大会，这个大会不是明确针对德国与意大利的，这些国家进行军事限制与贸易自由的磋商。

他保证美国将参与这些讨论，并会为所需要的大量“政治讨论”提供便利。罗斯福又和往常一样发现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自己的主张困难重重。他的计划并不是想要进行仲裁，只是正如他费力想说明的那样，想要居中调停。

罗斯福判断独裁者们会置之不理，或假意答应，或对他的提议语加嘲讽，或是这三种态度都兼而有之，并认为通过他们的态度能更明确地区分民主和独裁。

墨索里尼觉得它荒谬之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没做任何答复。

希特勒命令里宾特洛甫去分别询问除了法国、英国、波兰、叙利亚和苏联之外的政府，让他们表态是否觉得受到了威胁，并赋予罗斯福权力来代替他们提出这一问题。除了罗马尼亚和瑞士未做反应以外，其他国家政府都给出了否定的答复。所有剩下的国防力量脆弱到不堪一击的国家都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希特勒的把戏正验证了罗斯福的观点。公开表示受到了希特勒的威胁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为棘手。

罗斯福认识到德国的这一意图并预感希特勒将很快做出答复。

希特勒私下表示了不愿意回复“像美国总统这么卑微的人写来的信件”。但是4月28日，他在国会大厦召见了戈林，让他一起倾听自己做的面向世界也是针对罗斯福的广播讲演。这与罗斯福的预期完全吻合，因为罗斯福预料到希特勒会非常傲慢地给予一个回答。希特勒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包括几千万美国人在内的数亿听众收听了这一演讲。

希特勒的政策是对罗斯福新政的完全否定。他主张所有的人要么征募到军队中去，要么塞到军火制造工业里去，虽然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解决了就业问题。

“我将历史上属于德国人的生存空间重新联合在一起。罗斯福先生，我曾努力不流一滴血、不给我的人民和别国人民带来可怕的战争就实现所有的目标。21年前我是一个无名的劳动者和战士，现在已经

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这一目标，罗斯福先生，你竟然一脚踩在世界上一个最伟大、最富庶的国家的头上。”

希特勒的讲演让他的追随者们感到骄傲，也激起了他的邻国的不安。

罗斯福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进展。对更多的美国人来说，富兰克林·D·罗斯福变成了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力量来维护和平的总统的不二人选。

Ⅳ

1939年4月17日，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将苏联驻英国大使召到莫斯科，并给了他一份苏法英三方防御条约提案。在任何一方遭受攻击和保卫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中任何一国免受攻击时，缔约任一方有参加战争并支持缔约国的责任。英国政府在漫不经心地与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进行咨商后，做出了模棱两可、冷淡的答复。斯大林解除了李维诺夫的职务，由近乎机械的老布尔什维克主义信奉者莫洛托夫接替他的职务。

迫于来自战争部长犹太人莱斯利·霍尔·贝利沙的压力，英国于1939年4月27日第一次表决通过了和平时期的征兵法案。而苏联人在5月11日拒绝考虑英国政府对李维诺夫5月8日提出的结盟所做的回复，他们认为结盟是不公平的。

莫洛托夫提出建立一个共同防御协定，以保障波罗的海与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安全。尽管这一建议来得不那么及时，它仍具有很大的潜在威力。6月中旬，张伯伦派到莫斯科谈判的特使并不是莫洛托夫所邀

请的哈利法克斯，也不是无疑会受到欢迎的艾登，而是职位较低但能力颇强的威廉·斯特朗。

斯特朗在的回忆录里，对于自己在莫斯科的表现以及于1939年7月23日移交给苏联的协议草案极为满意。草案申明：英国、苏联、法国三国之中，或者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波兰、比利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芬兰中的任何一方受到来自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攻击，其他两国或是英苏法三国将立即提供一切有效的援助。然而，在希特勒1939年3月吞并默默尔之后，立陶宛并没有遵守协定。同时，该协定没有为丹麦、挪威、荷兰、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提供预期的保护，也没有给出有效援助的定义。因此，对于斯大林来说，同希特勒议和可能更具吸引力。

1939年4月30日，在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举办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博览会表明，在发达国家，一些前所未有的便利设施已融入了日常生活。罗斯福总统致开幕词的场景第一次由电视转播，出现在距展会地点80千米之遥的大约200台9英寸电视机画面上。

罗斯福亲自筹划6月英国国王夫妇对美国的出访。

英国对美国的邀请欣然接受。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夫妇将会第一次出现在美国人民面前。这可能也是自1903年爱德华七世访问巴黎签署《英法友好协定》以来，英国皇家外交最重要的一次尝试。

罗斯福制定了访问行程，并将其连同一封私人信件通过布利特和在巴黎的英国驻法大使于1939年1月一并寄给了国王。6月7日下午4点，国王夫妇经尼亚加拉大瀑布进入美国，由国务卿赫尔的夫人迎接。随届，国王夫妇乘火车前往华盛顿。总统于8日在联邦车站欢迎他们，并引领他们至英国驻美大使馆。不久，他们参加了在白宫的国宴，餐后还为他们安排了系列演出节目。

接下来的一天，国王夫妇乘坐总统游艇沿波托马克河向北到达弗农山乔治·华盛顿总统的故居。在归来路上，国王还在弗吉尼亚阿灵顿公墓为无名烈士敬献了花圈。6月10日他们到达纽约，并简单参观了世博会，然后乘车向哈德孙以北到达海德公园。

在斯普林伍德享用了一顿家庭便餐后，国王与总统亲密地坐在一起交谈直到半夜一点半。就如广为报道的那样，这时候罗斯福拍着国王的膝头说道："年轻人，是该睡觉的时候了。"总统自己非常享受对于这样一位身居要职的年轻人所表现出的长辈般的感觉。罗斯福令人钦佩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能战胜残疾，能够花费几十年克服其语言障碍，还能如此有勇气地恪尽自己的职责。

罗斯福和国王之间对战略的讨论使他们彼此都受到了启发，且两人都认为战事在即。但与罗斯福不同，国王仍然认为战事是可以避免的。

罗斯福清楚地阐明，美国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伦敦遭到轰炸，美国可能参战。罗斯福的评论甚至动摇了国王对张伯伦的信任。尽管在以后的11个月里，这位首相还是得到了君主的信任。第二天，作为英国国教的最高管理者，乔治六世陪伴总统及其家人到达了海德公园的圣詹姆斯教堂。

国王和王后给美国公众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他们颇具皇室风范，国王英俊潇洒，王后端庄秀丽。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他们同大英帝国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

6月11日晚，总统一行开车将他们载到海德公园火车站。在那里，所有人齐唱《友谊地久天长》。而当罗斯福从车中挥手高喊"祝好运，一切好运!"的时候，整个美国也同总统一起祝福他们。11个礼拜后，英国就会参战。

V

中立法案给罗斯福带来了很大麻烦，却使希特勒感到欢欣鼓舞。这一法案使希特勒认为美国总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索尔·布卢姆被要求在众议院发起一个动议。但实际上，他毫无领导委员会的能力，他的位置不过是靠他的资历得来的。众议院议长班克黑德和多数派领袖雷伯恩曾警告总统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总统认为，在这危机重重的时刻必须孤注一掷，同时他保证白宫会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

因谨慎而举棋不定的矛盾时期已经过去了，布卢姆于1939年5月29日提交了他的议案。议案大部分由国务院起草，其中包括彻底废除中立法案的提议，只保留了原法案中现购自运的条款。这一议案于6月6日以11∶9在委员会通过。

7月1日罗斯福让司法部长弗兰克·墨菲提交一份关于其执行外交事务权责范围的报告。而布卢姆法案及其修正案也得以进入参议院皮特曼的委员会。

为使法案最终通过，罗斯福邀请知名议员参加7月18日晚在白宫举行的会议，旨在说服他们支持该法案。

他雄辩有力地讲了一个小时，主要是关于即将发动的战争，而美国是如何不能为邪恶力量所俘虏等等。在罗斯福之后发言的是国会红人赫尔。赫尔严肃且庄重地阐释了他的观点。罗斯福认为奈的观点将威胁世界和平。

一如既往，罗斯福的策略是复杂的。他不相信美国国会能够以任何方式阻止或是影响希特勒。他坚信战争终将爆发，并希望将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孤立主义者身上。民意调查显示，2/3的美国人支持在战

时向欧洲提供援助。如果罗斯福真的认为博拉、奈、希勒姆·约翰逊和与他们持相同政见的人会破坏世界和平，那么他就会开展一项支持自己政策的全国性运动。

孤立主义者伯利则认为，在政府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由伊克斯领导的“战争党”。伊克斯常常撰写并发表亲英、反纳粹的言论。而无知的伯利在许多年后才知道罗斯福曾鼓励这一行动。罗斯福已经构想了一个同盟，并且美国已经接管了一些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军事基地。而1938年1月，由罗斯福组织的与英国的海军情报互换机制，自那时起也在稳步向前并得到了更全面的发展。这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完全情报交换的开始，而这一形式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

1939年6月，罗斯福邀请开朗友好的英国大使林奇访问白宫，并提出在战争期间，美国将宣布西大西洋800千米地区为中立区。作为回报，他希望租借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尽管惊诧于罗斯福的提议，林奇仍然强烈建议英国政府对总统的提议做出积极的反馈。

然而，外交办公室却将这一方案描述为“无法实现的政治”。7月8日，林奇将这些反馈呈递给罗斯福，这让总统大为光火。

到8月中旬，一向谨慎的海军部队向泛美航空公司，以及特立尼达岛、圣卢西亚和百慕大私人租借军事设备。罗斯福正日益挣脱中立法案的枷锁。

希特勒已经对其认定的下一个目标展开了他惯用的恐怖打击。他大肆抱怨德国少数民族在波兰遭到虐待，并要求在波兰的部分地区举行公民投票、但泽自由市（当时在国联统治下）重归德国、开辟穿过波兰走廊到东普鲁士的道路，还吞并了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对于波兰人来说，他现在极具侵略性。他不相信张伯伦和达拉第有能力抵抗

他。罗斯福对于英、法签署投降条约的担心，要比对于战争的担心大得多。他认识到，战争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必要发动的。

只要一听到罗斯福的名字，希特勒就会大发雷霆。戈林关于研发轰炸机以进攻纽约的幻想也已是尽人皆知。1939年在德国的一场媒体运动中，罗斯福被形容为一个犹太泥瓦匠。迪克霍夫大使已经警告柏林："下一次，美国不会等到战争开始两年半才去参战，时间会短得多。"迪克霍夫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特别专断的人"，并认为罗斯福将对战争的爆发和延续承担主要责任。希特勒对于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漠然置之。同时，希特勒还指责罗斯福，认为他阻碍了德国和南美的经济谈判。

8月5日国会休会后，罗斯福立即离开华盛顿去海德公园待了几天，然后离开纽约去休斯敦的一个姐姐那里。离开的那个早晨，他接到布利特来自巴黎的一个警告电话。罗斯福向萨姆纳·韦尔斯求教此时离开是否明智。韦尔斯告诉他，应该离开两个星期去度假。罗斯福向北去了新星斯可提亚海岸，此间韦尔斯不断寄给他一些外交新闻摘要。

8月17日，韦尔斯报告说，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发来电报，说德国大使拜访了莫洛托夫，并表示愿意就领土等其他问题进行实质性的会谈。

罗斯福已经考虑到张伯伦将成功"促成"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战地联盟。驻莫斯科的前大使布利特和戴维思不断警告说，如果英国不积极商谈，苏联和德国将很快签署一个条约。罗斯福尽可能去阻止这一联盟的成立。他在8月致电斯大林说，在攻克法国之后希特勒肯定会进攻苏联。

8月21日，韦尔斯报告说，根据布利特的材料，战争会在未来的四五天内爆发，并建议总统回到华盛顿。罗斯福于8月24日晚返回了华盛

顿。

就在他到达之时，一个德苏10年互不侵犯条约刚刚签署。斯大林向希特勒敬了酒，里宾特洛甫则回敬了他。战争正威胁着波兰。8月24日晚，罗斯福给希特勒、意大利国王及波兰总统都发了信，呼吁避免战争。当然，这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1939年9月1日凌晨2点50分，罗斯福被叫醒了。白宫的当值官员把从巴黎来的大使布林特的紧急电话接到了他的床边。在此之前，驻华沙的大使德雷克塞尔·比德尔给他打了电话，但是没有接通。德军已经开始侵略波兰，并轰炸了华沙。罗斯福的回答是："它终于还是来了。上帝保佑我们。"

罗斯福给赫尔、伍德林、韦尔斯等人打了电话。在战争宣言发表之前，他给德国、波兰、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写了信，要求禁止轰炸平民。即将就任美军总司令的马歇尔将军让全体美军保持临战状态。罗斯福在此时显示了他钢铁般的坚定意志。在叫醒了自己的首席副官之后，他继续回去睡觉，直到几个小时后再次被布林特叫醒。布林特告诉他，达拉第已经派人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以尽自己对波兰承诺的义务。罗斯福感谢他的信息，又一次轻松进入了梦乡。

罗斯福知道，假如英国决心参战，那么军事力量将会很难控制。

罗斯福坚持要把英法绥靖者和美国孤立主义者们所刻意夸大的泡沫彻底戳破。肯尼迪说，没有罗斯福"不断的刺激"，英法是不会参与到波兰的战争中去的。一些文件也证明了这个说法。赫尔随后告诉肯尼迪，不要提出或赞成任何"使得一个武装侵略政权可能继续得以存在"的提案。这条信息于9月11日送出，而当时罗斯福正公开宣称中立。

罗斯福与孤立主义者的持久战最终还是以他的胜利告终。截止到8月底投票显示，支持向英法出售武器的人从31%上升到50%。8月30日，印第安纳州前孤立派议员约翰·W·博拉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已经认同了总统关于修改中立政策的正确性。

8月26日，罗斯福告诉即将离开的大使林赛说，他将推迟几天推行中立法，以促进英法对任何所需的战争物资的购买和转移。他还接见了新任的英国大使洛西恩侯爵。后者在8月31日给哈利法克斯写了信，信中说："总统个人对战争的态度绝非是中立的。"墨索里尼提出了在德国和波兰之间进行调停，罗斯福及其他一些观察者立刻看出，这个独裁者在履行与希特勒之间的协定。张伯伦则充分表现出他的优柔寡断，他两次推迟了向众议院的演讲，最终在9月2日晚上发表了一个深表遗憾的演说。工党代理领袖阿瑟·格林伍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回复。在他之后，保守党的利奥·埃默里叫道："阿瑟，为英格兰说话吧!"

格林伍德做了一个简短而鼓舞人心的演讲，远比张伯伦那些废话更能打动议院和全国人民。"我在想我们还准备犹豫多久……当英国和英国为之奋斗的人类文明处于如此危难之时。"格林伍德的话得到了雷鸣般长久的欢呼。议院于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紧随着这次会议，9月3日晚上8点一份最后通牒发给了德国，要求其保证在3个小时内准备从波兰立刻撤军，否则英国将向德国宣战。

上午11点15分，沮丧的张伯伦出现在广播里，几个小时后他向议会发表演讲。较之战争这个事实，他两次都更加强调他个人的失望。"我不得不告诉你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任何保证，所以英国即将与德国开战。"这也是世人所知的"二战"开始的标志。他对议会说："我所做所想的一切，我所坚信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

在罗斯福看来，张伯伦极有可能把坐了10年冷板凳的丘吉尔带进政府和战时内阁，丘吉尔重新获得了他在"一战"爆发时的职位，成为

了掌管皇家海军的上将。尽管丘吉尔还受到张伯伦、哈利法克斯、约翰·西蒙爵士、塞缪尔·霍尔爵士、韦尔逊以及其他一些绥靖者的牵制，但一场反对邪恶纳粹的正义战争还是沿着适当的轨道发展起来了。

法国在几个小时后也向德国宣战。

罗斯福在9月3日晚上发表了炉边谈话。他详细叙述了他和他的政府为避免战争所做出的努力。他宣称："没有任何美国人有从战争中牟取暴利的权力。"并总结道："美国将继续保持中立，但是我不能要求每个美国人都在思想上保持中立。即使一个中立者也有权利去思考事实……我希望美国能够继续置身于战争之外。我相信我们能做到。我也向你们再次保证，你们的政府将不遗余力向结束战争的方向发展。"

1939年9月11日，罗斯福与丘吉尔达成了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共识。1933年10月8日，丘吉尔通过儿子詹姆斯送给罗斯福一本书，是他写的关于他那著名祖先马尔伯勒公爵的传记的一卷复印本。丘吉尔对罗斯福早期的新政给予支持，并支持美国废除金本位制、废止禁酒令等。

罗斯福当时没有对这份礼物做出回复，却在6年后1939年9月11日做了回复。在给丘吉尔的信中，他写道：

> 亲爱的丘吉尔：
>
> 因为你我在世界大战中处在相似的位置，所以我希望你知道我多么高兴你又回到了海军大臣的位置。我意识到，许多新因素把问题弄复杂了，但本质上并没有太多不同。我想让你和首相知道，如果你愿意和我保持私人联系，并愿意告诉我你想让我知道的任何事情，我都是随时欢迎的。你写好的信随时可以寄给我。
>
> 我很高兴你在这开始之前完成了马尔伯勒卷——读它让我感到非常愉快。

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你忠诚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

在和张伯伦谈过之后，丘吉尔积极用电话给他答复。罗斯福也写信给张伯伦说："我们将在下个月之内废止武器禁令。"张伯伦对总统"富有同情、给人鼓励"的讲演表示感谢。

VI

9月21日，罗斯福召集国会特别会议。他最终决定向他的孤立派敌人和中立法案正面开战。

为了使共和党孤立派受挫，罗斯福招募了该党1936年的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敦和弗兰克·诺克斯上校及前国务卿亨利·史汀生，由他们担任反对中立法案的代言人。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科南特和麻省理工大学校长卡尔·康普顿则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示学术界对总统提议的支持。

在中立法修正案过程中，威廉·艾伦·怀特联合主持了支持和平的无党派委员会。麦可铭上校的堂兄弟约瑟夫·帕特森船长甚至用他的《纽约每日新闻》来支持罗斯福。

罗斯福的反对者看到他的偶像效应出现，便试图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参议员博拉在9月14日通过全国性广播演讲时，不像从前那样咄咄逼人了。而更危险的是，9月15日林白上校在他的讲演之后，也发表了一次全国广播演讲。

罗斯福显然想到过拘禁林白。他的确可以这么做，因为这位陆军军官已经退伍成了一名官员。但他放弃了这么做，因为在政治上这很

危险。林白的朋友们说罗斯福企图用空军秘书的职位来贿赂他，并且用查税来威胁他。

当林白在9月15日晚上从华盛顿的奥克拉酒店发表演说时，他拥有数量庞大的广播听众。林白否认了纳粹和西方民主间有本质差别。他宣称希特勒不是“赫勒克利斯”，而且在精神上和张伯伦以及达拉第没有区别，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1933年航空邮路大失败后，罗斯福一直都关注着他。现在罗斯福看到了机会来对付这个他一直视为是纳粹同情者的危险的反对者。

信件、电报以及电话留言潮水般涌向白宫。对于林白所做的亲纳粹以及公然的种族歧视演说，批评声排山倒海。这是一个愚蠢的失误，因为每天美国的报纸上和图片中都充斥着纳粹机器疯狂地侵略波兰，以及犹太家庭，包括幼童被枪口逼出他们家园的新闻照片。几天之后，纳粹和苏维埃的密约得以实施，苏联在背后闪电袭击了波兰，并且占据了该国的1/3，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

9月21日，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科恩、科科伦、罗森曼、伯利和赫尔等人齐心合力，在最后一刻之前赶出了对国会的讲演稿。总统严肃地走进了国会，这样开场道：“考虑到国会的每个成员以及执行机关都是公平的，而且要完全保护我们国家的中立、安全与完整，同时使我们不介入战争……不要去设想给自己贴上‘和平阵营’的标签，我们所有人都是支持它的。”这是又一项战略性的杰作，它打击了孤立主义者对政府的无端指责。

对《1935年中立法案》被议会通过并由他签署，罗斯福感到后悔。他责备了那些在1939年初反对他修正或终止该法案的人。他宣称，终止该法案将使国际法恢复本来的面目。他提议保留禁止美国船只和公民前往战区或者让他们自己承担前往战区风险的规定，禁止美国公民登上交战船只，禁止向交战方提供贷款。他要求议会两院的两

党领袖待在华盛顿直到1940年1月例行会议的召开，这样，当有突发事件发生时，他能够及时通知他们并与他们一同处理。

罗斯福，像林白一样，宣称要在美国保护西方文明。他沉浸在拉美各国都在实行民主制的田园诗般的梦境里。而事实上，大多数拉美国家实行的都是由军人掌权的腐败的专政体制。他们中饱私囊，并将一切归咎于美国。尽管罗斯福对那些所谓的“兄弟共和国”的政治情况非常了解，但这并不能改变其政府的观点。

支持的信件如潮水般涌向白宫。罗斯福在其冗长辩论的第二轮中以绝对优势击败了林德伯格。民意调查显示，有60%的美国人支持撤销中立法案，84%的美国人希望同盟国能够取胜，仅有2%的美国人希望德国取胜（尽管有15%的美国人是德国后裔）。9月28日，最终以16:7在他的委员会通过该法案，紧接着还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辩论。

正在淡出的博拉在10月2日说，中立法的废除将有助于传统国际法的恢复。但他的言论影响甚微。史汀生于10月3日告知赫尔，他将在10月5日通过全国广播告知公众该法案的废除，这将有助于民主国家抵抗希特勒的侵略。赫尔感到万分震惊，并要求他谨慎处理该决定。史汀生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按原计划发表了演讲。

许多共和党商人，其中一些人被认为可以从该法案的废除中获益，开始支持总统。在辩论在议会和媒体中激烈展开的时候总统却保持着谨慎的沉默。罗斯福甚至推迟了计划中的对加拿大总督特威兹穆尔勋爵的私人访问。罗斯福直到盼望已久的立法改革确定无疑后，还一直在担心媒体对该访问的诠释。

兰登要求罗斯福让政治远离辩论，这无异于搅了浑水。罗斯福宣布他将退出于1940年举行的总统大选。总统没有搪塞其辞，也没有在

聚会上和政府里禁止任何人对此发表评论。直到1940年7月的民主党提名大会，这件事始终是美国政治中一个大大的问号。

林白在1939年10月13日发表了第二篇广播讲演，但是该讲演听众寥寥，甚至造成了比9月15日更不利的影响。他宣称这场战争不过是欧洲的均势战争，与民主毫无关系。

在1939年11月的《读者文摘》上，林白明白无误地表示，他更倾向于将希特勒的胜利比做是保护白种人免受亚洲非洲那些病态邪恶势力侵害的强有力的声音；比做是“能够抵挡劣等种族入侵的种族和武装之墙”。这使罗斯福坚信，林白原来像温莎公爵、肯尼迪和其他绥靖者一样，希望通过谈判来获得和平。然而正是这种想法，才使得波兰沦陷，使得英国、法国没有盟友来抵抗纳粹的侵略。

罗斯福与林白的公开论战还将持续两年，但这已经是一场不平等的竞赛。在日常生活和私下里，罗斯福称林白为纳粹。

10月份，在行政当局谨慎地施压之下，关于《中立法案》废除的辩论进展缓慢。最终，在11月3日，罗斯福在议会中获得了他最激动人心的胜利。参众两院分别以63:30和243:172废除了中立法案。张伯伦再一次亲切地致电罗斯福，对美国实质性的支持以及“深刻的道德鼓励”表示“作为朋友的感谢和祝贺”。

但这场胜利仍不尽如人意。中立主义者的明哲保身和对美国船只前往战区的禁令支持了德国对英国的封锁，“我们所有的船只似乎都被鱼雷击沉了。”在某种意义上，德皇威廉二世赢了。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入是受到见不得人却又无处不在的战争投机商们的怂恿，而孤立主义者们的确助长了此种观点。

总统一直主张在对中立法案修改案的理解上要有创造性思维。他本人倾向于采纳美国海军委员会的建议：即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

下，在美国的商船上插上巴拿马的旗帜，以规避现购自运条款。威廉·艾伦·怀特和参议院哈里·杜鲁门尽管都是亲同盟国和反纳粹的，却都认为此举不可行。罗斯福不得不收回此建议，但同时批准了将美国商船卖给英国、法国和比利时。

早些时候，美国和英国建立了一项机制：在离开美国港口之前，英国将检查美国船只并颁发认证以避免在公海被搜查。此办法的确降低了事故的发生率，但仍有一些不愉快的片断：美国船只被拦截，并被领航到所在国港口，等待法律的修改以确保其通行。扣押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其间信件被拆开并受到检查。国务院尽可能不去抗议，但罗斯福最后（1940年2月1日）写信给丘吉尔："相对于拘留和搜查美国船只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而言，这件事给你的人民和法国人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

无能的波兰领导人于8月31日下台。9月5日，克拉科夫沦陷。尽管对华沙的包围持续到了9月27日，有组织的抵抗已于9月23日停止。60万装备落后的波兰士兵奋勇抵抗120万装备精良的德国士兵，而后者还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当70万苏联士兵进入波兰境内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苏联在1939年9月占领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之后，又有4个独立的国家沦陷了。它们是：埃塞俄比亚、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它们在1935年到1939年间被攻陷或吞并。曾经苏联有1 300万波兰人，德国有波兰人2 200万，而现在总人口已经达到了1亿，比英国和法国的总人口还要多1 500万。

1939年10月6日，希特勒于克罗尔大剧院（他通常喜欢将这里比作是德国的议会大厦）发表演讲。他发表了自慕尼黑协定以来（大约1年前）最具有安抚性的讲演。他表示德国和英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是世界的需要。他庆幸自己没有提及阿尔萨斯和洛林。既然波兰已被攻陷，凡尔赛的耻辱已被洗刷，德英法之间的战争没有任何持续下去的

理由了。“为什么西半球会发生这场战争呢？”他很巧妙地问道。在伦敦和巴黎，也有相当多的人在问自己相同的问题。在一次有德国、意大利、苏联、英国和法国参加的会议上，在经过了充分准备后，希特勒想解决以下“实质”问题：军备问题、殖民地和犹太人问题。他还警告说，如果丘吉尔和他的支持者获胜的话，势必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张伯伦在众议院拒绝了希特勒的建议。希特勒的建议是“模糊和不确定的”。这在张伯伦看来是一种冒犯。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和法国在发动战争。

来自海面和海底的袭击减少了。更出人意料的是，除了不幸的波兰，对主要战区城市的轰炸也停止了。1939年9月，在斯卡珀湾突破了皇家海军的防线后，一位老谋深算的德国潜艇艇长击沉了英国的一艘老式航空母舰勇气号和一艘老式战列舰皇家橡树号。

10月11日，罗斯福最欣赏的科学家亚历山大·萨克斯博士向总统大声宣读了一封爱因斯坦的来信。紧接着，在普林斯顿大学，总统又收到另一封里利奥·西拉德博士的来信以及萨克斯本人的附函，其中简要介绍了核裂变的可能性、破坏性或其他特性的意义。其中还说明了德国人在民主世界发展出此类武器的危险性。一个总统核问题顾问委员会随即挂牌成立了。西拉德和爱德华·泰勒博士在10月21日与该委员会见面。通过与委员会成员的交谈后，他们对其持谨慎乐观态度。罗斯福最终建立了一个国防研究委员会，并将核顾问委员会收归旗下。总统与其保持一定距离，直到1941年才给予其真正的重视。

VII

在瓜分完波兰和占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不久后，苏联又向芬兰提出割让凯尔廉半岛的要求，以便将列宁格勒排除在芬兰炮火攻击范围之外。由于畏惧与德国联合的苏联，尤其是在看到了波兰的惨剧后，芬兰同意了苏联提出的要求，但是没有同意苏联提出的租借处于芬兰湾出口处的汉科湾作为海军基地30年的额外要求。接着，就像希特勒对捷克人和波兰人所采取的手段一样，斯大林发动了一场诬蔑芬兰的宣传战。但是，芬兰人坚守他们的阵地，结果是推动了美国人民进一步支持罗斯福的民主立场。

1939年11月13日，当芬兰拒绝从边境撤出军队时，芬兰与苏联之间的谈判宣告破裂。

英国和法国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犯下的罪行反应消极。国联认为苏联“不配”享有国际联盟成员资格，于12月14日将其开除（到此为止，大国在国际联盟中只有英国、法国还保留着成员资格，德国、意大利、日本已相继退出，而美国则自始至终就没有加入过）。丘吉尔提出，可以利用挪威的纳尔维克港来阻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铁矿石运往德国，并且通过挪威和瑞典来支持芬兰人抵抗苏联人入侵的提案，国联对此进行了长时间辩论。达拉第强烈要求法国军队遏制处在芬兰的苏军。由于最终没能使该议案获得通过，他的政府倒台了，他自己的位置也于1940年3月1日被更坚定和果敢的保罗·雷诺所取代。

丘吉尔和达拉第的计划没有实行似乎是天赐佳运。因为对这两个中立国家的入侵，一方面会使情况变得更复杂，另一方面会使同盟国一方失去对于德国所拥有的道德优势。在任何同盟国军队抵达芬兰之前，斯大林已经重新整顿了军队并将之置于他最得力的将军谢苗·K·铁木辛哥和格奥尔基·K·朱可夫的领导之下（后者是二战中所有国家中四五位堪称最伟大的将军之一）。

如果丘吉尔和达拉第派遣了军队，即使苏联没有坚决果断地消灭他们，德国人也会乐于如此。这种做法可能会促使苏联在战争中同德

国联合起来抵抗英国和法国，而这势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印度将被孤立，整个中东将可能沦陷（随着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淡忘纳粹的屠杀）。在斯大林和希特勒闹翻之前，英国人本该承受更大的压力。最终，芬兰的事可能将成为丘吉尔最惨痛的失败，并导致他无法成为英国首相和强硬的战时领导人。在1939到1940年之间，人类文明生死系于一线。

罗斯福像通常一样对那些侵略者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1939年12月1日，当他得知苏联的空军和海军对芬兰进行轰炸后，他表示“极为震惊”。他停止向苏联出售铝和钼，但他比丘吉尔和达拉第更担心这将进一步促使苏联和德国走到一起。他委婉地拒绝了芬兰大使要求美国提供更多军事支持的请求。他于1940年1月16日要求国会领导允许金融复兴公司和进出口银行更慷慨地向芬兰提供用于非军事用途的贷款。

就像在处理战略问题的时候一样，罗斯福始终保持着绝对的理性。除了寻求非军事途径解决问题，以及对埃塞俄比亚战争喋喋不休地要实施“道德禁令”外，他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但希特勒有个失误，他没能区分开这究竟是罗斯福出于不让苏联和德国结成永久同盟的战略考虑，还是他在涉及国家利益时确实不愿意采取强硬手段。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分散罗斯福在战略优先权上的注意力，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少数集团的利益，更关系到世界文明的命运。芬兰可能被苏联占领，但西方和苏联的关系得以保存，这对于在罗斯福感觉中即将爆发的战争中保护西方的利益极为重要，尽管这场战争还不清楚何时爆发。

罗斯福希望芬兰人民的坚决抵抗、苏联人和西方全面对抗的忧虑乃至对希特勒的依赖使斯大林变得温和一些，而不去占领芬兰所有的土地。在芬兰人冬季伏击下损失两个师后，斯大林于1940年1月中旬将部队撤回至国境线。

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重新集结了军队，于2月11日在史上最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芬兰的阵地被摧毁了，在牺牲了近2.5万人（占参战人数的1/10）后，芬兰要求停火。尽管他们给苏联人以迎头痛击，使苏联为此付出了差不多是他们10倍的代价，但芬兰人认为这是不能持久的。斯大林提出了比以前更苛刻的条件，要求割让1.6万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2.59平方千米）土地，包括镍矿和皮查摩港，并取得了汉科湾30年的租借权。

英国在1939年12月13日的河盘战斗中为9月斯卡帕湾被击沉的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复了仇。在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途中，德国军舰与两艘英国轻型巡洋舰和一艘重型巡洋舰遭遇了。英国舰长们让他们的德国对手大吃一惊，德国军舰也遭受了重创。英国重型巡洋舰遭到破坏，其他两艘船只也被击中，但仍然能够航行。

同英国和法国一样，美国坚持严格的中立立场。罗斯福召开了一次美洲国家会议，旨在采纳新的领海定义，而发生在蒙得维的亚近海的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战已将领海的观念破坏殆尽。丘吉尔在1939年圣诞节向罗斯福通报了战斗的细节。

VIII

1940年1月3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的年度咨文中再次体现了他在战争中的冒险心态。“我实在无法理解那些坚决反对将我们的年轻人派往欧洲战场的人们的感受。但据我所知，没有人想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没有人期望此类事情发生。”他邀请他的同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反映出真实情况，“这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如果世界在少数人的武力统治下，那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不公正和危险的世界，即使对于美国人来说，也将如此。”

在法律方面，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修改贸易协定条约，该条约将在6月到期；还有实质性提高国防开支。至于互惠贸易条约，在经过激烈辩论后，4月获得了通过。过去曾被议会拖延的18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则由于欧洲发生的重大变故而在国会获得通过。政府要求的预算提高了将近一倍，但由于情况变化了，预算便轻松获得了通过。

当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告诉罗斯福失业问题没有被解决时，罗斯福回答道，他预感欧洲发生的事情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扩充和重新武装美国的军队来解决失业问题。这要算是罗斯福大战略的出发点了，他感觉到那些事件会推动他的计划的实现。

2月9日，罗斯福宣布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将对西欧各国首都进行访问。当被问及韦尔斯是否将代表罗斯福总统或美国政府来对和平解决方案发表意见时，总统回答道："我们这次去不是为了说教。"罗斯福拒绝在苏联进攻芬兰时访问苏联，并预计韦尔斯此行能产生积极效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2月早些时候，张伯伦写信给罗斯福，信中提到韦尔斯此行是"潜在的尴尬"，因为这很可能是为和平谈判推波助澜。

罗斯福于3月16日对全国发表讲演，在认识到那些独裁者已经非法获得利益后他试图通过韦尔斯来促进和平。他说："今天我们为和平寻找一个道德基础……如果压迫、饥饿和残暴依然存在，或是人们的生命掌握在少数军事集团手中，真正的和平就不可能存在了。"至于罗斯福派遣韦尔斯前去欧洲的目的还不是很清楚，也许是为了给自己塑造一个向往和平的形象，也许是他想要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突出其敏锐的国际事务洞察力，但根本目的似乎不仅如此。

希特勒认识到如果法国安然无恙或者苏联对德国口是心非，美国将变得十分危险，但令他高兴的是罗斯福至少在一年以内不可能真正协助武装他的敌人，因为他与国会之间还有很多矛盾，即使是像他这样的美国政治大师，要想赢得第三任期也绝非易事。为了助长美国的

孤立主义情绪，希特勒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严禁任何反对美国的言论和行为”。他尽可能地降低罗斯福将这场欧洲战争转变成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希望在一年内能看到一个怀着较少敌意的美国领导人。

为了进一步推动该计划的实现，德国政府针对波兰外交部的文件发表了一份“白皮书”。该报告揭露了德雷克塞尔·彼得和布利特在1938和1939年的活动是要建立一个以德国为目标的“反侵略阵线”。

当达拉第的言论在美国引起争论时，德国攻克了丹麦。德国士兵通过商船进入哥本哈根并攻克了丹麦首都。希特勒在对无害的和不设防的弱国宣战书中称其为“堕落的资本主义骗子”。在没有实质性抵抗的前提下，第9个独立的国家在独裁者的铁蹄下沦陷了。德军继续向挪威推进。

4月3日，英国内阁在丘吉尔几周的穷追猛打后，通过了他关于在挪威、瑞典和德国的航线上布雷以使英法联盟能够在纳尔维克和其他几个挪威港口登陆的建议，为的是阻止斯堪的纳维亚钢材和铁矿运往德国，以阻止德国占领挪威——英国情报机构认为这已是迫在眉睫。这并没能阻止张伯伦在4月5日晚间向保守党党员称希特勒已经“错过了班车”。这成了张伯伦所有误判言论中最不幸的一次。

在一次德国引人注目的军事行动中，德军于4月9日清晨发动了进攻，从挪威的奥斯陆和纳尔维克全面登陆。英国海军部开始担心德国国内的空军优势，皇家海军在有着绝对优势的纳粹空军面前恐怕会变得不堪一击。尽管如此，德国一只小型舰队仍然损失了4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其中8艘被英国战列舰厌战号击沉了。

但海军所取得的这些胜利无法弥补盟军在挪威军事远征中的几次失败：军队尽管登陆了却又不得不立即撤退。在挪威纳粹的帮助下，4年内第10个独立国家消失了。

在伦敦，议会忙得不可开交。很明显，假战争[注]将要结束。在关于发动战争的辩论后，于1940年4月7日至10日制定了一项信任案。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对于结果过于乐观，没有料到该辩论会如此激烈。在首相的要求之下，丘吉尔和政府保持一致，并为张伯伦进行辩护，而他在18个月前还是丘吉尔的崇拜对象。哈利法克斯对首相遭到如此多的反对感到震惊，他对此还进行了严厉的反击。他指出，“我在议会有很多朋友”，但这已不足以在这场世界危机中维护现任政府。

劳合·乔治，这位在议会工作了52年的前战时首相劝张伯伦主动辞职。这表明在张伯伦是否继续执政的问题上议员们有着很大的分歧，尽管该政府在和平时期获得了支持。有41位议员投票反对，50名弃权。

羸弱沮丧的张伯伦意识到一场恐怖的危机正在袭来，便于5月10日正式向乔治六世国王提交了辞呈。

张伯伦推荐大臣哈利法克斯作为他的继任者，国王也很赞同。哈利法克斯认识到，在新的紧急环境下，丘吉尔更适合做战争的领导者。这能让议会、整个英国、法国和美国更有信心。哈利法克斯对战争没有什么兴趣。他既没有战争才华，也没有号召民众的能力。相反，丘吉尔却对战争很着迷，并有很深的了解。哈利法克斯在辩论时的表现就像是得了胃病，而丘吉尔却在享受辩论。哈利法克斯知道，如果自己当了首相，丘吉尔依然会控制政府。他也不愿意像戴维·劳埃德对赫伯特·阿斯奎斯那样，成为丘吉尔的傀儡。一些保守党的贵族对丘吉尔的耐性依然持怀疑态度，认为他太冲动。张伯伦依然是政党领袖，而哈利法克斯或许认为自己有另一个机会去取得政府的领导权——如果丘吉尔的强硬政策失败了，抑或形势的变化让他的政策显得不合时宜了。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

问题关系到了整个民族的未来，而事实证明丘吉尔是对的，哈利法克斯错了。这个选择是明智的。65岁的温斯顿·丘吉尔——拥有39年议会工作经验，并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8个不同的内阁职位上任职，包括议会大臣、内政大臣，以及战争、空军、殖民地、贸易和海军的主管。作为民族联合政府的首脑，他还被授予了特别、不受约束的权力。丘吉尔沉着地认清了现实，并“竭尽所能去应对”。从历史上看，在别的大国恶战的时候，英国总能成为战争的关键：例如7年战争中的皮特政府、拿破仑战争中的小皮特政府、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帕默斯顿政府和1916年的劳合·乔治政府。

丘吉尔于5月13日在议会发表了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演说，并通过广播向全世界播放。“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了，除了鲜血、力量、泪水和汗水……我们的政策是通过从海洋、陆地和天空，尽一切可能去与人类有史以来最凶残的暴政对抗。我们的目标是胜利，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会遭遇什么可怕的事情，无论路有多长，有多艰难。”对纳粹和他们的支持者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开始。当然，对美国总统来说更是如此。

最后，这位领袖团结了英国——整个英联邦，他鼓舞了被压迫的民族并赢得了美国民众的赞誉。富兰克林·罗斯福正需要这样一个人——他了解人类文明的敌人与道德战争的诉求，更能够与罗斯福共同制定计划，最终实现反击。正是这样，美国永久地融入了世界，并通过持续参与世界事务实现了国家地位的历史性提升。这出现代历史舞台上最著名的剧目已经拉开了帷幕，四位主角已经粉墨登场：他们是斯大林、希特勒、罗斯福，以及刚刚上台的丘吉尔。

---

1. 假战争：从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开始，直到1940年5月10日，德国和英法才爆发正式冲突，这段和平时期被德国人称作“静坐战”，西方则称为假战争。——编者注

l3
他们一只脚都已经踏上战船了！

1940年10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戴尔·L·威尔基警告说，如果富兰克林·罗斯福再度当选，美国的年轻人可能会卷入国外的战争

I

在即将退休的1940年5月9日夜里，美国驻比利时大使约翰·库德西（刚离开都柏林，取代了约瑟夫·戴维斯的职务）向罗斯福报告了西欧遭受德国闪电战攻击的情况。总统致电摩根银行，要求冻结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美国的资产，以避免它们落入德国人之手。

盟军的西部边界战事恶化之快，超过了包括希特勒在内所有人的想象。德国人在猛烈空中轰炸掩护下，对比利时和荷兰进行了地面袭击，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不加限制的空袭范围影响到了包括鹿特丹在内的文化中心。德国人还利用伞兵袭击和牵制性的外围骚扰活动来分散对真正主攻点的防卫。盟军曾周密计划安排英国远征军推进和法国北部兵团会师，帮助比利时军队保卫国家。东部军团和北部军团的会合点是在法国的色当附近。1870年，德国就是在这里取得了对拿破仑三世的普法战争的胜利，导致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覆灭。在此基础上，俾斯麦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5月13日，德国的坦克和机动部队以强大的冲击力和极快的速度从法军防守最为薄弱的地方大批突入，并向北驶往英吉利海峡，将行动缓慢的比利时和荷兰军队抛在身后。

1940年德国计划的希格斯韦伯行动，主要是由埃里克·冯·曼斯汀将军和希特勒的天才的个人才智设计出来的，其目的是要将北部联盟军队挤到海峡边，逼迫他们投降，然后利用压倒性优势来袭击南部，同时用在莱茵地区的牵制性袭击使马其诺防线后面的法军无法轻举妄动。到了5月15日，东部兵团与北部兵团之间已经被撕开了一条80千米的缺口，德国的武装部队和步兵如洪流般不断涌入。荷兰的抵抗在几天后崩溃。荷兰王室开始流亡国外。

丘吉尔于当天给罗斯福发了急电。“如你所知道的，情况正迅速恶化。”他描述了德军的战术，并对罗斯福提出了以下六项请求：提供四五十艘旧驱逐舰；几百架最新型号的飞机；反空袭武器及弹药；高质量的钢；派一个中队去访问爱尔兰的港口来提醒德国，爱尔兰的中立地位可不像其他小国一样可以被轻易破坏；美国确保“日本在太平洋上安安分分地待着”，必要时，丘吉尔则提供给美国新加坡海军基地的使用权。

虽然从布利特和别人那里得到的报告已经让罗斯福感到忧心忡忡了，但事态比他预料的还要严重得多。罗斯福于5月16日告诉丘吉尔，他无法批准出借驱逐舰，因为这必须在议会通过一个法案。他大致上同意了飞机和反空袭武器以及钢的请求，也会考虑派海军出访爱尔兰，但谢绝了新加坡海军基地的使用权。

丘吉尔于5月20日回信罗斯福，对驱逐舰一事表示理解与遗憾，并认为他们如果能在6周内到达的话就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丘吉尔让罗斯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原谅我，总统阁下，这么直接地将这个噩梦呈现在你面前。我明显无法为我的继任者的行为负责。在没顶的绝望和无助下，他可能会屈服于德国人的意志。不管怎样，幸福的是，至少目前我们没必要一直想着这个。”（这其实恰是他希望罗斯福一直想着的事情。）

5月16日，罗斯福已经向议会要求增加14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来维护几个月前他做出的对伊寇斯和马绍尔群岛的安全保证。总统那一天亲自来到议会，提议将下一年美国飞机的生产量从12 000架增加到50 000架，这使很多人大吃一惊，有人对实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有人甚至认为是荒谬可笑的。当听说此事时，希特勒对它大加嘲讽，并不肯相信，认为这大大超出了美国的生产能力。当最终的生产的数字不仅达到而且大大超过预定数目时，举世震惊。参议员与众议员们一致给了罗斯福在议会所得到的最热烈的一次喝彩。

5月26日，罗斯福通过赫尔和布利特向达拉第和雷诺兹转达：“如果真的走到了最坏的一步，我们至少要保住法国海军的力量，那将是法国复国的关键性力量……也是以尽量小的代价争取和平的关键性因素。这意味着法国的舰队不能被堵在地中海……”

当坏消息传来时，罗斯福外表看起来总是十分平静的。他在5月26日的傍晚向全国讲演呼吁支持他的国防计划。他的语调比平时更为温和与流畅，并没有流露出一丝对美国的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盟友法国将要崩溃的感慨；而英国首相则设想他的继任者可能会“在废墟中”向信奉纳粹主义的野蛮人投降。

罗斯福用最能使人信服的语调宣称，抵抗力量和国防生产对帮助那些正在为民主而战的国家至关重要，对保护美国目前所取得的社会进步和援助“自由人民的精神与道德”有重要作用。他还要求向红十字会捐款，来帮助欧洲战祸中的受害者。

5月28日，比利时国王突然向德国人无条件投降，让北部的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更加暴露无遗。他们以高超的技巧和坚韧的精神想要在敦刻尔克围筑防御工事。海面风平浪静，皇家海军在这里无人可敌。从5月28日到6月4日，一支由约900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比如游艇、拖船、渡船和游轮）组成的舰队持续不断地将身陷困境的士兵们运走。令人震惊的是，竟有34万人获救，其中有10万人是法国人。他们的辎重全

都被留下，德国人抓住了大约40 000名俘虏。这对于英国军队来说，已经极大地保存了有生力量。

远征军力量的保存巩固了丘吉尔在政府里的控制地位，并让他那绝不妥协的战争政策更为不可动摇。战时内阁由丘吉尔、张伯伦、哈利法克斯、艾德礼和格林伍德组成。全体议会成员都坚定地支持首相和他的政策。

6月4日，温斯顿·丘吉尔对议会和世界做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讲让美国人民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并对富兰克林·罗斯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首相警告说："不要把这次解救行动看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疏散取胜的"。他也没有忘记庆祝制空权方面取得的优势，这毕竟为德国可能采取的对英国本岛的侵略作战计划增加了难度。

丘吉尔还发表了一项激烈的、无可争辩的宣言："我们应该坚持到最后一刻。我们应该在法国作战，我们应该在海上和大洋里作战，我们应该以不断增加的实力和不断增长的自信在空中作战，我们应该保卫我们的岛国，不管会为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会在海滩上作战，我们会在陆地上作战，我们会在田野和街道上作战，我们会在险峰上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便如此，我从不相信这个岛屿以及岛上的大部分居民会屈服和挨饿……"

罗斯福对此做出了戏剧性的反应。他责成一个战争部门去满足英国的要求，并巧妙地利用国家中立法的漏洞将这些设备和军火卖给私人公司，然后再转手卖给英国。除了坦克以外，英国军队将会被逐步重新武装起来。

5月28日，罗斯福宣布重新启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内阁和国防理事会，并确定了理事会的咨询委员会人选。罗斯福知道，要保证战争

中的武器生产，他需要得到国家工业资本家的支持。他会逐渐重新推行改革计划。

6月10日，德国在法国明显不抵抗的情况下步步推进。巴黎宣称自己不会设防。此时，墨索里尼也向法国和英国宣战。当天晚些时候，罗斯福在由托马斯·杰斐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做了一个计划已久的毕业典礼致辞。在紧张的局势下，他正确地预见到了世界的危机。这次演说通过广播电波传遍了整个世界。他谈到了“那些（美国）人到现在还有明显的错觉，以为我们能把美国变成一个以武力哲学统治着的世界里的孤岛……”而这样的一个孤岛“就像身陷囹圄，岛上的居住者们都戴着手铐，食不果腹，隔着铁窗被人喂食……”

丘吉尔于6月11日在信中说：“我们昨晚都听了您的演讲，您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我们的决心。”他再一次提出了飞机的问题，但是特别强调了对驱逐舰的需要，只是将数目减少到了30至40艘，并将归还期限缩短到了6个月。

丘吉尔于6月12日巡视了在德国的侵略下逐步南移的法国司令部后，再一次写信给罗斯福。他敦促罗斯福尽一切努力来鼓励那些想要战斗的法国人。“我冒昧地向您提及这一点，虽然我知道您一定和我同样清楚这一点。当然，我会让法国人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退缩。希特勒不可能在征服我们之前赢得战争或统治世界，而要想征服我们，从来就没那么简单。”英国希望取得战争的胜利，并愿意为之承担责任。

6月14日，丘吉尔从法国回来就立刻去找罗斯福。他还说，他坚信如果法国还坚持战斗，美国会参与英法联军的作战。这是他又一次不小的自由发挥。因为正如丘吉尔深知的那样，罗斯福没在这种问题上发表过任何评论，哪怕是德国被消耗到丧钟长鸣，而美国也已武装到牙齿，恐怕罗斯福也不会想到美国会作为交战一方卷入战争。果然，

罗斯福在6月14日的晚些时候简单地回答说，他并没有考虑过美国参加战争的问题。

6月15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发电报设想了最为绝望的悲惨结局。希特勒可能会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抵抗力量用法国舰队目标做交易。他可能会用不摧毁法国的城镇为条件来要求法国交出舰队。执政刚刚36天的丘吉尔面临着如此之大的压力，以至于这位伟大的英语大师在用语平衡上也出了问题。罗斯福对英国和法国领导人的处境感同身受，就像他一刻也不放松地告诉迟钝的孤立主义者们的那样，“他们是美国民主的前线”。

最后，美国做出了宣战的意向性声明，但表示美国只发挥道义上的支持，不会过早承担加入战争的义务。然而这体现了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以与德国抗衡的大国，美国已经被卷入这一事件。

法国于1940年6月22日向德国投降。签字仪式在贡比涅森林附近当年福煦元帅乘坐过的火车车厢里进行——1918年的“一战”停战协议也是在这里签订的，希特勒亲自主持了他一生中的最大胜利。包括巴黎和整个大西洋海岸的法国领土在内，大半个法国被德国吞并了。

夏尔·德·戴高乐于1940年6月17日飞抵伦敦，开始了“自由法国运动”。丘吉尔让他在BBC里向法国人发表演讲。而丘吉尔自己也用基本上可以被听懂的法语向法国人发表了演讲。

法国的战斗结束了，英国的战斗即将开始。因而，同时期的美国总统大选成为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次。

Ⅱ

1940年6月17日，罗斯福最终罢免了陆军部长哈里·伍德林的职务。伍德林是个顽固的孤立主义者，他拒绝执行总统直接下达的向大不列颠运送12架B–17飞机的任务。事实上，罗斯福经常打发人开路，有时是直接解职。但更多情况下，他会把人“遣送”到令人痛苦、令人受折磨的，经他精心设计的地方去，并暗中以此为乐。就像埃莉诺沮丧地发现的那样，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某种程度上对每个人都十分冷酷、毫不关心。他还外调了仅任职一年的海军部长查尔斯·爱迪生，因为他对海军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工作效率也不高。在共和党大会五天前，罗斯福巧妙地玩弄政治和行政手腕，让老将亨利·史汀生和芝加哥日报的出版商、1936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弗兰克·诺克斯分别接任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职务。这两人都与罗斯福私交颇厚。这些任命极大程度强化了罗斯福的内阁。

1940年6月24日，共和党大会在费城开幕。选票数领先的几位竞争者是38岁衣冠楚楚的地方律师托马斯·E·杜威、50岁的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和华尔街实业律师温戴尔·L·威尔基。

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们还在为罗斯福何时决定参加角逐大选争议。但是毫无疑问的是，罗斯福那时的确累了。他不仅工作十分辛苦，还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他已经58岁了，虚弱的身体让许多事情对于他来说显得更加难以解决。他知道必须打败希特勒。希特勒不被消灭，美国就必定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只要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分子继续统治德意志帝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如果希特勒得到机会巩固现在的地位，德国不仅可以拥有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工业力量，纳粹也能更为成功地与民主制度争夺效仿者。这一争夺也势必会在拉丁美洲给美国带来麻烦。

不管是哪一条，罗斯福都完全无法接受。即使他并不享受自己的总统任期，即使已经有了看中的继承人，即使他对国内政治环境抱乐观态度，认为民主党人能重新获得总统职务，罗斯福还是更情愿接着

做总统来保证美国不会被德国代替，并在未来的15个月里帮助英国，引导美国公众的意见，组建起美国的力量，并且逐步走向战争边缘。除了罗斯福，当时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这些。

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人想。

罗斯福是能够使民主党再次当选的唯一候选人。除了一些自不量力认为他们可以取代罗斯福的人，例如法利和加纳。于是民主党请求罗斯福参与竞选。罗斯福喜欢法利，但认为他想当总统的愿望是可笑的。当法利第一次对他说自己想获得提名时，罗斯福忍不住笑了起来。

罗斯福不能容忍加纳这个顽固的得克萨斯保守派，选他是为了顺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尽管罗斯福很喜欢威士忌和纸牌，他仍然同意约翰·路易斯在一年前一次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关于加纳的描述：“一个欺负劳工、玩扑克牌、喝威士忌的邪恶老人。”有时他会在没有加纳出席的内阁会议上说：“副总统不在这里，我们可以畅所欲言。”

6月末，罗斯福就他是否应该寻求第三任任期征求弗兰克福特的意见，这就像是一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去征求一个和善的薪酬顾问的意见，询问是否该采取加薪计划。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弗兰克福特认为罗斯福成为下任总统责无旁贷。他撰写文章并无条件支持罗斯福寻求第三任任期。

丘吉尔也发挥了作用。虽然法国沦陷后的形势令人沮丧，丘吉尔恳求美国立即参战的想法也不现实，但他个人坚定的决心使罗斯福对英国独自作战并取得胜利的能力的估计比以前乐观，更别说丘吉尔在军事方面的才干也比张伯伦要高出一筹。

1940年7月3日，英国皇家海军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袭击了法国舰队，并使其他在亚历山大的法国船只丧失了战斗力。在达喀尔，几乎所有法国商船都被毁掉了，或长期不能使用。罗斯福从这事件看到了丘吉尔的决心，他决定不同情法国，因为法国卑鄙地退出战争，并且对他们的前盟友也没有给予足够的保证——保证法国舰队不会被用来对付英国。罗斯福还注意到，这位英国首相向议会解释政府的行动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如果英国不参战，美国除了遭到袭击外没有理由参战。从1935年起到1940年5月10日，罗斯福就一直在期待一位口才出众、不屈不挠的斗士领导下的英国，现在终于实现了。

Ⅲ

作为迷惑对手的一部分，罗斯福基本上接受了一个应对国际紧急情况的草案。罗斯福不准备继续或更新他在1932年党魁斗争中所达成的妥协。加纳的离去使罗斯福必须另选副总统提名人选。根据自由主义原则，民主党将会用一种不会吓倒明智的商业社团的声音替总统宣传：将会声明绝不插手外国战争，坚定支持民主主义者对独裁者的斗争；将会声明武装美国、准备抵抗侵略、保卫美国合法权益的必要性。在竞选伙伴的挑选上，罗斯福决定不给党内保守派机会——他们在国内政策上不相信他，也不理解他的外交政策，他们跟随他只是为了得到利益。

有时不恰当的任命会给他带来麻烦。罗斯福选择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作为副总统就给大家带来了不好的印象。这是个愚蠢的决定，就像任命悲观主义者约瑟夫·肯尼迪担任驻英国大使，任命反斯大林的约瑟夫·戴维斯担任驻苏联大使一样。罗斯福认为华莱士作为一个自由派和国际主义者，既健康又年轻，擅长写作和演讲，可以在农业州帮他争取选票，还能树立一个有学识的公众形象。

在开始时一切顺利。但华莱士也是一个神秘的家伙，法利称呼他为“大眼睛的家伙”，他是个容易被各种政治或宗教观点蒙骗的意志不坚定的人。当罗斯福告诉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和1940年大会主席巴克利，他想通过华莱士增加他在农业州的获胜把握时，巴克利回答说华莱士“是你在农业州力量较弱的原因”。然而罗斯福决心已定。

詹姆斯·法利宣称他想获得民主党总统提名。罗斯福便邀请他7日到海德公园，希望劝阻他参加竞选。

15日，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罗斯福没有露面，只是让霍普金斯作为代表，并让他在大会上宣读一个声明，说自己从未想到连任总统之事。但霍普金斯并没有宣读这一声明。因为总统的顾问们认为，发表这一声明，会引起强烈反响。虽然罗斯福并不这么认为，但顺从了大家的意愿。

16日，巴克利在他的讲演中谈到了过去8年的成就并攻击了共和党，但没提到总统的名字。最后他说：“罗斯福真诚地希望澄清一点，那就是每个到会的代表都可以自由地投票给任何候选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罗斯福总统要我转达给大家的。”“任何候选人”当然包括总统本人。

会场陷入一片寂静。一个强有力的声音通过扩音器响彻整个会场：“我们要罗斯福!”这个声音被重复了无数次——每个州每个城市。“芝加哥要罗斯福”，“纽约要罗斯福”，长时间的“世界要罗斯福”的呼喊将大会气氛推到了顶峰。走廊里的人们也都叫喊着要罗斯福。许多代表踮起脚尖，举着写着“罗斯福”的牌子，在大厅里绕圈游行要求总统获得提名。这个游行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很明显，罗斯福再次获得提名不会有什么大的障碍了。

17日晚，罗斯福获得提名。唯一的悬念是罗斯福将以多少票胜出。最后罗斯福赢得了946张选票，其他候选人总共才148张。法利走

向罗斯福向他表示祝贺。

由参议员伯顿·惠勒、大卫·沃尔什、班尼特·克拉克领导的一场战斗打响了。他们要求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支持会议。孤立主义分子要求通过一项声明，宣称美国不会参与外国战争，且不会向海外派兵。罗斯福不同意，认为这是对希特勒和日本的姑息。最终，参议院贝尔纳斯做出让步，在条件中增添了“遭到袭击除外”。

当霍普金斯18日早晨宣布华莱士为副总统时，许多人表示反对。印第安纳州前州长、菲律宾总督等人都行动起来。华莱士被认为是个古怪的、不可靠的人，如法利所说，“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人”。

埃莉诺·罗斯福在大会上发言说，如果她正承担着战时巨大压力的丈夫“感到第三届任期很吃力……，华莱士先生最有能力应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他需要华莱士的帮助。她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掌声雷动，全场安静下来。

保罗和许多其他候选人都弃权了，因为副总统必须遵循总统的意愿。但发言人威廉仍然要与华莱士竞争。投票在18日晚进行。罗斯福在白宫通过收音机收听了投票进程，并逐渐被激怒了，他放下手中的纸牌，写了一份声明，一旦情况恶化就在大会上宣读。在这篇稿子里，罗斯福宣称民主党在20世纪已经赢得选举：“进步自由的民主党正在分裂，就像今天这样。民主党只有通过这次大会阐明自己支持进步和民主的立场，驱逐保守主义，冲破思想束缚，才能取得胜利。”

他谴责民主党内的孤立主义分子姑息党内的不和谐，并宣称为了给民主党权力去解决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间的斗争，他将拒绝提名。他在白宫对助手说这话时非常严肃。

如果华莱士未获得提名，他将在那晚发表这番讲演。虽然在刚开始时形势对农业部长不利，但最终他以628比459战胜了对手。

埃莉诺·罗斯福分担了她丈夫在芝加哥大部分的负担。如果华莱士落选，最可能的结果是，鉴于罗斯福对总统一职和对纸牌的热爱，他必须在拒绝一个临时文件后屈服于一个真正的草案。他选择华莱士，像他要求精简最高法院和1938年的党内整顿，显示了他在触及他个人权威的一些问题上的无法理解的固执。这极可能毁掉他的总统生涯和他第二任任期里所取得的成就。

罗斯福和他白宫的伙伴们在芝加哥停留期间，由于闷热的夜晚没有空调，人人汗流浃背。当华莱士最终获得提名，霍普金斯建议他在接受提名的发言中不要给对手过激的答复。罗斯福浑身是汗，从书房走到隔壁卧室，洗了澡，换好衣服，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白宫外交接待室，通过麦克风向芝加哥大会发表了接受第三次成为美国总统的提名的发言。他在19日中午开始讲演，罕见的是，华莱士坐在主席台上，但大会却听着罗斯福从白宫传来的讲演，副总统提名者一句话也没说。

一切都很清楚，国家的重担再次压在了他肩上。他讲了他再次竞选的原因和矛盾心情。他描述了“我为了避免战争，避免大屠杀所做的努力”。他决心让“美国实行全面防御”，在人们的劝说下，“不分党派，不分个人”。

他在备忘录里采用了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语言，显示出大胆的策略，“像许多晚上一样，我躺在床上问自己，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是否有权号召人们报效祖国；同时，如果我被号召报效祖国，我将竭尽全力。现实是国家正遭侵略，美国社会和政府正遭破坏，没人能幻想能保全在和平年代人人享有的选择权利。只有人民才能选举出总统。如果人民选择我，我会接受。”

罗斯福的优势和雄辩的口才使得他不需要震动大会和全国就能揭露对手的伪装，并能在白宫起草法案来激励自己的阵营，让大家学会在战斗中使用来复枪。

他感谢大会选举华莱士，赞扬他的竞选伙伴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并“向我的老朋友詹姆斯·法利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此次竞选“不同于以往的竞选”，他没有时间去“参加纯粹的政治辩论，但我愿意提醒全国应注意到，有时由政客无意造成事实的扭曲”。

罗斯福以“姑息主义者”的名义开始瓦解他的孤立主义反对派，称他们的行为事实上等同于卖国贼。他们不能支持国外为自由而战的英雄的人民，他们将使美国毫无防备地面对野蛮的独裁者。

在芝加哥混乱的会议中有个神秘的观察家，他是苏联新的副大使安德鲁·葛罗米柯，不久前他曾环游美国以使自己熟悉美国。他不能理解这次大会：“曾有人断言所有的人都需要民主党，但要从震天的吼声中分辨出来并不容易。这些吼声就像地震将要来临时的声音。当每次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常见有人喜极而泣。”

Ⅳ

总统为在消除失业和建立国家防务两件事上建立联系下了一番功夫。1940年1月4日发布的预算信息显示，他认为18.4亿美元已足够，而一些参议院的蛀虫则抱怨当纳粹进攻挪威时过多的防务是不必要的。当英国军队5月31日敦刻尔克大撤退时，罗斯福请求参议院通过10亿美元的防务开支并获得批准。7月10日当德国飞机从埃菲尔铁塔起飞后，英国终于对德宣战。罗斯福再次向议会请求并获得了50亿美元。随后他发表讲演：“美国必须有全面防务，我们不能这一点那一点地抵

抗，我们必须能全天候全方位地进行防御。”因此他订了8艘战列舰、24艘航空母舰、数以百计的其他船只和5万架战斗机，并号召年轻人踊跃报名参军。

罗斯福的政策很明显是明智的。他认为这是捍卫民主的唯一途径，那种逃避战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8月8日，罗斯福再次增加90亿美元的防务开支，并更坚定地开展他建立一个强大战争机器的计划。

到1940年秋，国内仍有关于农业问题的争吵，甚至一些支持罗斯福的时事评论家也宣称，在罗斯福开始第三任总统竞选时，美国的失业人口在900万至1000万之间——这是因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因为预测数以万计的人放弃寻找工作而高估了失业人口。人口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有550万失业人口，大约为11%的失业率。如果这些人参加复兴计划，失业人口将下降为300万人，失业率将下降为6%。

9月20日，征兵法案获得通过。当总统竞选在劳动节进入白热化时，这个法案开始成形，这肯定会吸收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其中许多都是失去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这会使失业率降到10%以下，大约只有400万失业人口。

“一半的男人和大部分女人一年收入低于1000美元，在1.32亿人口中只有4.8万人年收入超过2500美元。”这或许是真实的。

失业的恐慌已经过去。“二战”使罗斯福新政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他宣誓就职时，美国本是一个破烂的、颓败的、没有希望的国家，只有垮掉的财政系统，33%的失业率，以逃避战争来保存民主的做法。经过7年半的时间，现在的美国每月新增工作岗位超过30万个，失业保险或劳动福利计划里还包含救助金。

投票结果显示，在8月和9月，罗斯福比威尔基领先5到10个百分点。有些美国人不赞成连任三届总统。有些人认为威尔基在振兴经济上能够有所作为。考虑到新政的不足之处被它巨大的成功所弥补，这给罗斯福继续实行新政带来了信心。罗斯福也预见了希特勒的危险性，预见了英国的抵抗力，还有武装全国的必要性，并能帮助最适合的人选择做正确明智的事，同时避免美国参战。

罗斯福发现，威尔基很讨人喜欢，像他一样有活力，是个难缠的对手，是个“防守严密的老共和党员”。但威尔基发现罗斯福也很难对付。如果他攻击罗斯福太自由主义，罗斯福会说威尔基是胡佛的继承人；如果他从孤立主义方面攻击罗斯福，罗斯福会说他是受希特勒蒙骗的人，一个姑息主义者；如果他攻击罗斯福不注意防御，罗斯福会指责他是个好战分子，并领导一群“由孤立主义者组成的党派”，他们直到希特勒的军队开到家门口才会想到要防御。

在这年秋天，无论是英国的战斗，还是罗斯福史无前例地寻求第三届任期的努力都取得了胜利，罗斯福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

希特勒在7月19日向全世界发表演讲。一长串汽车车队簇拥他来到柏林剧院，在全力保护英德现状的基础上，他曾在那里与英国寻求和平。所有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被迫长期让步于德国，希特勒称之为“达成共识”。他预见“战争没有必要继续进行”，但警告说，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英国会被消灭。他在对现状做概括并在提出和平可能性的提纲中间戏剧性地做了停顿。丘吉尔收听了这次讲演，但立即对之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又一次背信弃义，没什么价值”。

丘吉尔在劝说罗斯福参战以帮助法国的6周后，于7月31日收到了罗斯福的答复。“我们急需驱逐舰，总统先生，是时候了。1941年我们正在建设。但危机会影响到以后。我知道您会尽力而为。”

7月中旬后，英国上空的空战明显增多。无论是英国的顽强反击，还是英国对法国舰队的攻击，以及丘吉尔拒绝了希特勒所谓的“和平计划”，都使罗斯福更加认定英国是个勇敢的盟友。所有迹象显示，英国空军每击落3至4架德国飞机，自己只损失1架。德国飞机在飞机和飞行员水平上与英国不相上下，但却很容易被英国飞机击落。德国飞机被机枪和飓风毁掉一大半，经过一段灾难性的日子后，再也没能进入英国领空。

丘吉尔的名望也获得空前提升。7月，威廉·多诺万上校被罗斯福派往英国，回来后对英国的抵抗非常有信心——他会成为罗斯福的重要军事智囊团首席顾问。

现在全体美国民众对英国的实力都信心大增。调查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同意出售飞机给英国。公众、议会、高层的意见都在迅速变化。

6月25日，盖洛普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坚信远离战争比帮助英国更重要。10月20日，同样的调查显示，公众的态度基本上是一半一半。11月19日，60%的人认为应该协助英国，40%的人认为应远离战争。罗斯福的宣扬、丘吉尔的口才、英国人民的勇敢，以及希特勒的残暴，都促使美国民众改变了想法。

在8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伊克斯、史汀生、华莱士、摩根索和其他人都强烈支持罗斯福关于向英国出售50艘“一战”时期的驱逐舰的绝妙想法，作为交换，美国将可以长期租借英国从纽芬兰到西印度的军事基地，通过这些基地，美国将能时刻监控西海岸的动静。而英国也将从中获益，因为通过这种监控，罗斯福将能向英国传达美国海军获得的关于德国潜艇的信息。海军部长诺克斯已经就驱逐舰换基地问题和英国大使在前一晚进行了商讨，大使表示同意。

罗斯福已经卓有成效地宣布了扩大领海的第一个步骤——从3海里扩大到200海里，他宣布，美国的太平洋海岸200海里以内都是“中立区”，在这一区域内，所有潜艇和其他可疑船只的行动必须向英国皇家海军“明确报告”，他计划将“中立区”扩至英国岛屿。

8月28日的内阁会议后，罗斯福召来了威廉·艾伦·怀特，让他与威尔基联系，让威尔基去游说共和党议员们支持向英国出售驱逐舰法案。威尔基私下里说，他本人支持这一法案，但对其他共和党议员却无能为力，他不能支配他们的想法。

11日，一封致总统的长信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作者为艾奇逊，还有其他三个著名的律师和罗斯福的亲信。信里指出，总统在现行体制下有权通过行政命令向英国出售驱逐舰。

英国的战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整个8月份，德国空军都盘旋在英国上空，皇家空军的每架战机都投入了战斗。

在竞选中期，罗斯福向他的人民证明，以过期的战列舰来换取绝佳的战略基地是个好主意。这在丘吉尔看来或许不太舒服，在对德殊死空战中，他想使借战列舰和租基地成为友谊的表示。国会做出了让步，纽芬兰基地是以友谊的名义出租的，加勒比基地则作为借驱逐舰的贷款。

马歇尔做出了证明，驱逐舰如7月2日修正案所要求的是“作废的”和“没用的”。在丘吉尔的要求下，罗斯福在威尔基煽动的战争恐慌和保持自己的实力之间找到了绝佳的平衡。

罗斯福希望推迟宣布驱逐舰协定，但英国方面没有时间了。到了9月已不能再等，总统在9月3日向跟随他去西弗吉尼亚视察一个重建工厂和防御设施的记者宣布了这一协定。20多个记者像沙丁鱼似的挤在火车上的小包间里。总统把驱逐舰交易看作“美国自托马斯·杰斐逊购

买路易斯安那以来最重要的防御行动”。这使美国能精确、简单地从另一个友好的大国获得领土。

虽然威尔基承诺不攻击这笔交易，并签署了一个文件表示支持，但很遗憾，这份声明文件没有被送到国会，他感到共和党失去了国会的领导权，称罗斯福为“美国历史上历任总统中最独裁专横的行为”。威尔基在竞选中开始了对罗斯福的猛烈攻击，指责新政并未解决失业问题，指责罗斯福是孤立主义者，打乱了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并对慕尼黑采取不适当的姑息，对英国的援助和征兵工作不适当。

罗斯福的军队、军工厂还有军营之行，事实上是一次竞选旅行，为了保证他能够再次当选。威尔基对于没能损害罗斯福的形象而感到失望，于是，他开始集中精力抨击罗斯福想让美国卷入战争。

“他们一只脚已经踏上战船了!”威尔基提到美国的年轻士兵时，号啕大哭。他狂热的演讲中时常发出刺耳的声音。

9月初，在征兵法案未获国会通过，驱逐舰还没交给英国之前，罗斯福又提出了关于中立的进一步打算，他命令舰队司令斯塔克为扩大中立区制定一个计划，从纽芬兰到英国的圭亚那，包括离东海岸1000海里远的一部分大西洋区域。让斯塔克惊愕的是，27日国务院让他制定出详细计划，这肯定是和总统讨论过的。

10月10日，总统在一封备忘录中表示了扩大中立区的困扰。尽管处在紧张的竞选中，罗斯福仍详细地阐明了他希望美国海军能尽快完成对这一地区的一个完整的巡逻，包括对潜艇和其他相关的英国海军截获的加密电报，并说“对船只的不完全了解是不能容忍的”。即使他的对手指责他使美国卷入战争，总司令仍然对中立重新定义：即对一方怀有敌意，而对另一方予以大量援助。

9月7日，英国首都遭到空袭。伦敦这个30代人花了1000年才建成的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在1940年8月和9月，皇家空军每天大约要损失12架飞机和十几名飞行员。但德国几乎每天要损失30架飞机及全部机组成员。为了鼓舞英军士气，丘吉尔在8月25日到29日组织了80架英国轰炸机空袭柏林。

这加重了德国空军的损失，促使德军停止了白天的空袭，转为大规模大范围的夜间空袭。同时双方的高级军官都错误估计了对手的实力。德国认为英国皇家空军无论从规模还是技术都略逊一筹，英国则认为德国空军实力比自己强。当德国转为攻击广泛区域时，德国智囊团断言英国皇家空军飞机数量在177架以下，英国的月生产能力为250架，他们相信英国的损失会比自己大，并认为事实上已经打垮了皇家空军。事实上，9月19日，皇家空军拥有1084架战斗机，月生产能力是428架，这还不包括即将购买或美国提供的。

英国估计德国前线的空军在1940年8月大约有6 000架飞机，年生产24 400架，而真正的数字是3 000和10 247架。在1940年的7月10日到10月31日，皇家空军损失915架飞机，德国空军损失了1733架。当德国开始夜间空袭后，杀伤率由3到4架比1架下降到2架比1架，之后双方损失持平。不过德国的飞行员损失比英国严重。英国制造的飞机比德国损失的多，而德国的损失超过制造的。如果德国继续他们白天的精确目标袭击，他们可能会使空军力量更加被削弱，而不像英国，他们能够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购买战机。

改为夜间袭击后，德国的损失减少了，但赢得空战的希望却几乎没有了。这使德国受损飞机的数量减少，却不可能精确命中像飞机场之类的军事目标。空袭虽然在继续，但却不能再打击英国民众的斗志了。到了10月中旬，很明显，英国已取得在本土空战的胜利。伦敦连续57个夜晚遭到空袭，议会大楼和其他一些著名建筑一样严重受损。10月后，双方都有效控制了各自的领空。

1940年8月20日，丘吉尔对皇家空军总司令发表讲演，向世界宣布：“从没有如此强大的敌人输给如此弱小的对手。”他声称德国空军的飞机比皇家空军多7到8倍。德国的失败和相应的英国空军取得的巨大胜利形成鲜明对比。英国官方估计，英国与德国空军实力为1∶3，真正情况则是2∶3。

丘吉尔深谙美国政治，他特意发表了这篇鼓舞人心的讲演，还宣布英国军事力量的全面复苏。这对罗斯福帮助很大，使这位竞选中的总统在选民眼中显得慷慨而富有远见。军事上的胜利也促成了外交和政治上的成功。

丘吉尔的口才和那些富有同情心的播音员，尤其是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爱德华·R·默罗等人，彻底改变了美国民众的观念，使美国人开始甘愿为英国人提供坚定的支持。英国的检察员们也放松了他们一贯严格的限制，与美国广播网合作，使美国听众能收听到伦敦的消息，听到德国轰炸英国，听到英国民众的恸哭声和火警鸣笛声。默罗有着低沉的嗓音、清晰的吐字，带有明显爱憎分明的感情色彩。

英国情报部制作了一部关于闪电战的影片，片名为《伦敦能拿下它》，由美国作家昆廷·雷诺兹编写剧本，华纳兄弟公司发行。这部描述战争的影片在12 000家美国影院上映，仅1940年11月就有超过6 000万美国人观看了该片。这也对影响美国民众的观念发挥了巨大作用。

丘吉尔当然也要为自己的人民说话，他宣告：“我们会还击的，把他们给我们的打击加倍还给他们。”英国继续承受德国更猛烈的空袭，还击的力度也在逐步加大。由于占据了空中优势和明显的海军优势，以及部队快速的再装备能力，英国到10月下旬已基本脱离了空袭的危险。

V

经过艰苦的辩论，《选择兵役法案》于9月中旬被两院通过了。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宣称该法案“将会改变美国国民的本质”，“他们会变得好战……毫无疑问……即将参战”。伯顿·惠勒也认为这一法案将“扼杀现有的最后一个民主国家”。

尽管威尔基支持这一法案，但他所属政党中的大部分人对选择性兵役投了反对票，他也感到无能为力。这更坚定了罗斯福的想法：即使威尔基是个相对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安全机构中也是难以信任的，他充其量不过是1909年他的叔父西奥多·罗斯福退休后充斥在共和党中的那些保守的孤立主义者和贪婪的商人们的遮羞布罢了。（他认为，从那以后直到威尔基的共和党主席的候选人都是保守的或不称职的。）

众议院议长威廉·班克海德于9月15日逝世。为了摆出他同国会中持异议者达成谅解的姿态，几天后，罗斯福参加了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举行的葬礼。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院多数派领袖、极有才能的山姆·雷伯恩成为了众议院议长，而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麦克科马克则接替他成了新的多数派领袖。

罗斯福必须再次保证美国黑人选民的利益，原来他们都倾向于把票投给林肯所在的政党。如今，正是通过新政，民主党使美国黑人获得了财富和工作的权益，所以他们把票投给了民主党。

1940年9月16日，埃莉诺在卧车搬运工大会上致辞。该组织由菲利浦·兰道夫组建并领导，他是美国最有才干和最杰出的黑人领袖之一。埃莉诺为兰道夫以及另外两位黑人领袖——前国家城镇联盟的领导人阿诺德·希尔和国家有色人种发展协会的领导人瓦尔特·怀特安排了9月27日与总统的会见。

之所以安排这次会面，最主要的原因是，非洲裔成员在军队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罗斯福强调国防部已经决定在军队中所有单位按比例分配黑人，并确认黑人是适合战斗岗位的。兰道夫和其他人承认这是一大进步，但同时递交了一份详尽的计划书以实现军队中完全的平等与团结。罗斯福说："那你们就要为之努力了。"每当爆发争论时，他通常采用渐进的做法。他认为黑人和白人士兵在战斗中并肩作战后会团结起来。他还建议让黑人军乐队登上军舰演出以示团结。

在妻子的帮助下，罗斯福成功地劝服国防部在每个征兵管理处都安排了黑人录用部门，并开始训练非洲裔美国驾驶员。这本是一项可喜的进展，但总统的新闻秘书处犯了一个错误。斯蒂芬·厄尔利，一个来自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隔离主义者，错误地向公众宣称：兰道夫、怀特和希尔对罗斯福的努力感到满意并支持继续保留种族隔离政策。于是，黑人领袖们发表声明，指责政府"在民主的背后捅了一刀"，是对"1 200万黑人公民爱国热情的挑衅"。瓦尔特·怀特给埃莉诺·罗斯福写信，后者将这一问题又一次提到丈夫面前。罗斯福不得不发表了一个声明以安抚黑人公民。对于当前世界的危机，他写道："我们不能将参战准备问题与一项新的社会实验混为一谈，不论这项实验多么重要和紧急。"

这时候非洲裔美国人几乎占据了所有选票的5%。他们准备集体到作为他们移民目的地的大城市去投票，在那里，他们的选票将能够左右所在州的选举。厄尔利发表的谎言使得罗斯福在曾被信任的选区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罗斯福授权霍普金斯做了一次小规模调研并发现，为了安抚非洲裔美国人的领袖，可以将本杰明·戴维斯上校（军队中地位最高的黑人官员，他的祖父曾是奴隶）提升到将军级别，并且任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威廉·哈斯特为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的参谋。

黑人领袖们感到，只有在军队中使黑人能够享有一定的领导权，他们才能成为保证团结稳定的动力。罗斯福认可了这些任命，戴维斯

被任命为准将，哈斯特也向史汀生报了到。民权领袖们和黑人社团新闻界将这归功于总统。史汀生写信给诺克斯说，下次他带着他的黑人准将去拜访时“会毫无疑问地遇见一名黑人海军司令”。他认为这两项任命是错误的，并把他们归咎于“罗斯福夫人冲动而愚蠢的干涉”。

而实际上，这件事要算是埃莉诺所做过的最好的事情了。

就在罗斯福与兰道夫等人会面的当天，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对外联合宣布了他们之间的三方协定。协定表示，当三国中任何一国受到来自欧洲及中日战争以外的国家的攻击时，其余两国必须全力援助。这一协定很明显是针对美国的，希特勒以此作为对美国向英国出售驱逐舰一事的回应。

VI

9月下旬，罗斯福的竞选活动进展得无可挑剔。他并没有沾沾自喜地坐在白宫，而是精力充沛地在全国巡回演讲、接见群众，同时视察各地的备战情况。他的巡游不完全是为了政治，但在政治上的收效自然也是毋庸置疑。他的军备计划使得失业率几乎减少为零。

整个国家都爱戴并敬佩罗斯福总统。他在艰难的时候接过重任，改善了国内状况，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维护了国家尊严，这一点上比软弱的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强了许多倍。他与小儿麻痹症带来的残疾顽强抗争，这种无与伦比的勇气更是赢得了广泛的敬意。而且，正如他在之前关于选拔征兵和出售驱逐舰的辩论中所表现出的那样，他的道义勇气使得他最终会将国家利益置于政治收获之上。

罗斯福身上总会流露出亲切的态度、极度的自信和某种程度上像哈德孙峡谷般高贵的政治天才的气质。他总能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保

证获得最终的胜利。大部分美国人都希望领导他们的是位常胜将军，但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选票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希望看到他们心中的领袖接受勇气的考验，特别是在罗斯福竞选第三任总统时。在那个新闻片和电视刚开始发展的年代，罗斯福可以说是受到大众爱戴的第一政治人物，他有着乐观积极的外表，在强硬与机敏的作风之下，是他对美国民主和国家精神基本原则的诚挚热爱。之后的几位总统，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以及罗纳德·里根（他们都宣称从罗斯福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都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这些标准：尽管不完全属于罗斯福的类型，却大都有着温和而不失强硬的外表。

由于威尔基指责罗斯福关于平衡预算的承诺一直得不到兑现，他不参战的承诺也令人难以信服，到1940年10月初，威尔基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总统身边的随行人员和他自己的直觉都告诉他，已经到了反击威尔基的时候了，威尔基在全国的巡回演讲已经开展了很久。伊克斯、霍普金斯、詹姆斯·贝尔纳斯参议员、雨果·布莱克法官以及党主席埃德·菲林等都要求总统迎接挑战。白宫于10月18日宣布，针对“反对者一系列无中生有的中伤，（总统）已决定向美国人民陈述事实，并将在此后确定选举日之前举行五次政治演讲”。此时距大选剩下不到三星期了。但实际上，总统做的演讲远不止此数，因为他在乘火车往返演讲的五个城市之间一直在途中向媒体和群众发表演说。

威尔基夫妇在底特律、庞蒂亚克及其他地方则被听众，特别是好斗的工人们猛丢鸡蛋和水果。通常这种无礼行为会给竞选者带来更多的选票，这次也很可能如此。威尔基身边一直有位咽喉科专家（哈罗德·巴纳德）陪同，以防他嗓音太过沙哑而影响听众理解。威尔基的毅力和精力也为他赢得了很多支持者。

罗斯福的第一次正式竞选演讲于10月23日在费城举行。他将两件事作了一个对照，一个是从新政的成就到最近在就业方面的收获，另

一件事则是共和党统治下前12年中对“财神”近乎虚伪可笑的崇拜。大多数选民对大萧条记忆犹新，罗斯福那极富戏剧性的嗓音，则总能恰到好处地勾起人们的记忆。

共和党指出，罗斯福已经为参战签署了秘密协议。罗斯福回敬道：“这和8年来的每个事实、每个目的都不相符……我向每个共和党员和民主党员，以及祖国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保证：你们的总统和国务卿是沿着和平之路前进的……我所致力于并将终身致力于的，是和平。”

经过谨慎的考虑，罗斯福认为在他的早期政府中有七个人明显对权力充满无限的渴望，并可能为了获得权力而无视民主。在这七个人当中，休伊·朗已经死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则在半殖民的菲律宾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会回到美国人民面前的，但不是在罗斯福任内。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退休了，并且仍未从他自己的财务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罗伯特·麦考米克上校本人没有掌握权力的天资，他只能在啦啦队中带领大家振臂高呼。其他三个人，即约翰·路易斯、约瑟夫·肯尼迪大使以及查尔斯·林白上校，将在1940年的竞选高潮中发挥显著作用。

10月25日，约翰·路易斯在美国3 000万广播听众前猛烈抨击罗斯福。几个月前罗斯福就得出结论：路易斯已经成为一个妄想自大狂，把他视为对手而不是盟友时，倒能带来更多的选票。并且罗斯福本人也疏远了他。路易斯反对征兵，并以此对劳动者进行攻击，并声称国防咨询委员会极度右倾，完全不顾在场的工人领袖西德尼·希尔曼以及劳动者同盟证券交易委员里昂·亨德森。

路易斯认为，总统的连任必须得到劳动者的支持。基于这个理由，他要求美国劳动者选择“支持”或“抛弃”路易斯——似乎是他本人在竞选一样。他发誓说，如果罗斯福连任的话，他，约翰·路易斯，将辞去产业工会联合会会长一职。一个业余心理分析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产业工会联合会会长开始变得感知混乱了。罗斯福在工人运动中的朋友们震惊了，他们斗志昂扬地团结在罗斯福周围。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许多地方分部、大多数官员以及大多数其他的联合会，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在内，都抛弃了路易斯，并且指责他尖酸刻薄。

路易斯发表了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两天后，约瑟夫·肯尼迪乘坐一架小型飞机经里斯本从伦敦回来了。肯尼迪是一个著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同时也是国家世俗天主教的领导人之一。他举足轻重的地位会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对纽约、波士顿、芝加哥、费城及其他几个大城市中的爱尔兰团体的相关选票起到战略性影响。

当肯尼迪到达拉甘迪亚地区（那时是一个飞机中心）时，亨利·鲁斯已经在其曼哈顿的家中等待他了。亨利·鲁斯和他的夫人及其他了解大使的人都认为肯尼迪10月27日到达纽约时将会宣布支持威尔基。罗斯福也是这么想的。威尔斯许诺说："肯尼迪在和任何其他人通话之前将被送到白宫。"当肯尼迪从他的飞机中出来时，收到两条罗斯福的信息，其中一个是手写的，邀请他于当晚立即去白宫赴宴。那时他还在大使任上，无法一口回绝。

他通过特别专线立即和总统取得了电话联系。总统正和山姆·雷伯恩及他的亲信田纳西州议员林登·约翰逊在办公室里吃午饭。"啊，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今晚来白宫吃顿便饭吧。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你谈谈。"在去华盛顿的飞机上，肯尼迪夫人提醒她的丈夫，除了罗斯福之外没有人曾任命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做驻英大使，如果他辞职或帮助总统的敌人的话，会被看成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正是处在这样的境地。

罗斯福和参议员贝尔纳斯一同接待了肯尼迪夫妇。贝尔纳斯和罗斯福希望肯尼迪为总统连任说几句好话。罗斯福对肯尼迪夫人给予了相当的注意力，而她则为罗斯福传奇般的魅力所深深吸引。肯尼迪本想和罗斯福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谈，但当他发现这不可能时，便闭口不

谈竞选演讲，只把自己的满腹牢骚发泄了一通。肯尼迪尖锐控诉了国会对待他的方式，说他完全没有得到驱逐舰交易的任何消息。

罗斯福接过这个话题，批评了一些人，夸赞了肯尼迪，并向他保证大选后将有一场“大扫除”以保证像肯尼迪这样老资格、高贵的朋友兼最重要的政府成员不再被如此对待。罗斯福还接受了肯尼迪的声明：支持竞选连任并效忠罗斯福。整个交易过程都充斥着肯尼迪的自欺欺人以及罗斯福狡猾操控的手段。

不论是什么诱惑了肯尼迪，他答应在两天后做一个支持罗斯福的演讲，条件则是他自己出钱，自行写稿而且讲稿事先不给任何人看。罗斯福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些条件。

10月28日，即第二天晚上，罗斯福又做了他四年一次的麦迪逊花园广场演讲。这是他最伟大最深刻的讲演之一。在竞选的紧张气氛达到最高潮时，富兰克林·罗斯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定与高效。对着花园内的2.2万人、花园外收听扬声器的3万人乃至4 000万到5 000万广播听众，罗斯福只字未提威尔基，仅仅尖锐地讽刺了保守的共和党反对新政每项改革的做法，并强调说明了他的政府在一战中为了支持民主力量所做的每一步努力。

第二天，即1940年10月29日，墨索里尼从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几个月后，意大利人被决心抗击的希腊人彻底打败了。希特勒认为德国有必要对此进行干涉。最初进攻的那一天，罗斯福不顾他许多顾问的反对，亲自出席了史汀生部长提交的第一个《选择兵役法案》听证会，基于同样的目的，这一法案使用了1917年的框架。《独立宣言》签署者曾坐过的座位上满是材料，这些材料蒙住了史汀生的眼睛。罗斯福理所当然地拒绝缺席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场合。不论政治上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罗斯福拒绝任何谨小慎微的建议，即推迟仪式至大选后或将仪式秘密进行。因为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这项措施是得到民众拥护的，他根本不认为这在政治上会过分危险。他反而认为，

作为美国军队的总司令和这项法案的主要支持者，出席是他的义务，不管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仪式结束后，罗斯福还对全国做了一个简短的广播演讲。

然后他想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策略，读了一封来自纽约的新任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弗朗西斯·斯拜曼的信（斯拜曼后来取代芝加哥的红衣主教穆德林，成为罗斯福在美国大主教中最好的朋友。在战时他曾为罗斯福完成了许多外交使命。在战后的第一次宗教会议中。斯拜曼升职为红衣主教。他很可能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神职人员）。大主教写道："'有保护但不需要'胜于'需要但是没有保护'……我们再不能当看不到的地鼠，也不能当不愿看的鸵鸟……我们美国人需要和平并且我们将为和平做准备，但不是定义为饥饿或死亡的和平。"在竞选最后的决定性时刻，美国天主教领导人为总统付出了一切。罗斯福已经不能再祈求什么更好的礼遇了。这也给未来红衣主教斯拜曼的教友约瑟夫·肯尼迪于10月29日晚的演讲打下了基础。

肯尼迪做了一个精心准备的有说服力的演讲：他刚"从备受战争折磨的欧洲回到我们深爱的祖国的海岸更新了我的构想，这个国家必须并且即将远离战争"。他很确信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这一点上观点相同。"不幸的是，在这场政治竞选中，美国总统被指控试图使美国卷入世界大战。这种指控是错误的。"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训练一任新总统了……我们的孩子和你们的孩子比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得多……而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将要继承的是什么样的美国？这需要我们所有人慎重考虑。"

"在这些考虑的启示下，我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应该连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肯尼迪的评论对罗斯福的竞选产生了戏剧性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大部分人本以为他将指责总统并支持威尔基的情况下。如果说美国

和英国有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并签署了秘密协议，肯尼迪当然会知道，并且他的个人倾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许多事情他是最后才得到罗斯福通知的人，但民众并不知道此事。）威尔基认为，这场演讲在大选一周前给了他致命一击。

当天晚上，即10月30日晚上，罗斯福的对手林白上校在耶鲁大学通过覆盖面很广的广播对总统进行了公开竞选前的最后一次攻击。林白以追述家庭历史作为他评论的开头。他的父亲年轻时在明尼苏达州曾被印第安人追逐过，他的父亲死后仅十年，他就勘测了跨越半球的航线。他出生在莱特兄弟首次飞行的一年前。他批评自己的国家——1917年卷入战争，1919年放弃欧洲和国际主义，对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重新武装无动于衷，然后决定发挥作用并把法国和英国推入战争。他说这根本就是没有政策的体现。“我们必须决定，我们的安全是建立在对美国的防御上，还是建立在试图控制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上？”他向听众表达了他爱憎分明的情绪。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演讲，没有以前演讲中的种族主义者和纳粹倾向的反映。但是他的目的达到了，无论是学界人士还是一般听众，大都礼貌地接受了他的演讲。

但不久后，罗斯福在波士顿的演讲又使人们把林德伯格忘到了脑后。早些时候火车停在开往波士顿的路上，离康涅狄格州新港的耶鲁大学不远的地方时，总统在他的火车里就已经演讲过了。他认为之前选择性征召1 600万男兵是一件普通的事。他说：“我们开始训练更多的人，不是因为我们希望利用他们，而是和你们今天撑开伞的道理一样——防止被淋湿。”尽管他的比喻很简单，但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寒冷雨天里，这可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分析。

VII

总统专列在从纽约到波士顿的路上做了许多短暂停留，罗斯福会短暂地出现并简要向当地的支持者们做演讲。在每一站，来自全国各地集会组织者发来的电报和信都被成袋地搬上火车。大多数信件的核心是在讲总统应该强调被征入伍的年轻美国人将不会被派去参战。

1940年10月30日在波士顿，罗斯福进行了另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竞选演讲："我能向美国的父母们保证，他们接受训练的每一个孩子会得到很好的寓所和饮食……当我和做父母的人谈话时，我将给你们另外一个保证。我以前曾经说过，但是我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你们的孩子将不会被派去参加任何国外的战争。"此外，没有人会认为应付对美国本土的攻击是不合适的。他已经向罗斯曼解释说："如果有人攻击我们，那就不是一场外国战争了，对吧？要不然他们是希望我保证我们的军队只会在另一场美国内战中被派上战场？"罗斯福对国民们和平主义优柔寡断的忍耐已经快达到极限了。

听到罗斯福在广播中的讲演，威尔基破口大骂："这个婊子养的伪君子!他这是在使诈!"这确实是罗斯福想要做的，但威尔基迫使罗斯福以最公正的措辞给出了一个不参战的保证。11月2日，罗斯福在纽约布法罗说："你们的总统保证，美国不会参战。"在参战与否这一关键问题上，威尔基开始相当礼貌地指责罗斯福在关系到数百万美国家庭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公然撒谎。有些人认为，罗斯福的保证让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不过他从未想过要求国会向一个从未表露过敌意的国家宣战。

候选人都对民意测验的结果表示失望。结果显示，罗斯福稍稍领先于威尔基。对于双方来说形势都极为严峻，他们在经济政策上的支持率基本持平，但在外交政策这一最受关注的问题上，罗斯福领先了15至20个百分点。

11月3日，罗斯福在克利夫兰重述了他那已经熟知的演讲词。听众人山人海，场面宏大。之后他又回到海德公园，并在选举日前一天游

历了他的家乡地区。这是他自1910年以来的一贯做法，除了1922到1926年他病情极为严重的那段时间以外。

11月4日傍晚，在罗斯福陈列着书架和高椅的宽敞客厅里，总统向全国发表了他四年一度的选举前夜的演讲。由于临近选举日，他照例避免谈及党派之争。他一向的原则是在国内事务上不显露出对对手的敌意，至少在公开讲演中如此；为团结反对者，尽可能多地保留余地，他总是让他的支持者如伊克斯等给对手以政治上的致命打击，而自己则袖手旁观。他总是力求保持美国在精神上的团结统一，以集中对付真正的敌人。自他就职成为总统以来，他一直不曾怀疑过，纳粹德国同它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帮凶们才是真正的敌人。

当天晚上他说："朋友们，在这个选举日的前夜，我又一次沉浸在我海德公园家中的安宁里。我想对你们谈的与党派政治无关，而是关于我们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的，我们对她都有着深厚的与生俱来的热爱和忠诚。今晚，当我与家人一起坐在这里时，我想其他的美国家庭——这片土地上数百万个家庭，也正坐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已经安静地用完晚餐，待会将安宁地入睡。明天他们可以自由地外出，平静祥和地继续他们的生活，自由地诉说心中所想，自由地实现心中所愿，自由地选择他们所热爱的事物。明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出他们的领袖。当选择一经做出，这位被选出来的领导人会成为实现所有人民意愿的执行者。由人民自然生成自由表达的意见，比任何一个人或是一小群人的想法都更明智。你们的意愿是整个美国的意志的一部分，你们的声音是整个美国的声音的一部分。明天，当你我站成一排准备选举时，我们是在向自由平等投出自己的一票。"（当然他是不可能站着排队投票的，但是这是个给人好感的形象。）

他赞美了美国和民主，却并没有请求听众投票给他。他知道并且也希望这样做人们不会将他的讲演与他的政敌屡屡责难的独裁野心联

系起来。第二天，罗斯福偕妻子和母亲去参加投票，之后一直安详地等待着人们的裁决。

这个夜晚比前两个总统选举之夜更加漫长。总统官邸的接待室里到处是亲戚、邻居、幕僚和朋友。而罗斯福本人只跟少数几个人坐在主餐厅旁的一个小餐室里。他一边听着广播一边计算，同时从通讯社送来的新闻带也在餐室的机器上运转。他的警卫队长麦克·雷里守在餐室的门口，阻止那些未经授权的人擅自闯入。一开始罗斯福显得很放松，但一会儿之后，他毫无预兆地让雷里把所有人都挡在了外面，甚至他的家人也不例外。这倒没有让埃莉诺有丝毫的难堪，倒是让摩根索有些不高兴，因为他似乎是以同总统的亲密程度来衡量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的。

罗斯福在小餐室里独自待了大约40分钟，据称当时他烦躁不安，汗流浃背。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曾试图对他当时的心理做更确切的分析。罗斯福可能是有段时间感到肠胃不适。尽管威尔基在一开始的成绩有些出人意料，但还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果足以让罗斯福感到震惊或泄气的。

到凌晨2点30分，形势明朗了，罗斯福比对手多了大约500万张直接选票，这次选举的投票数超过从前任何一次选举，罗斯福比对手多出的选票是总选票数的1/10。罗斯福得到了与1936年相同的2 700万张直接选票，但威尔基得到了2 200万张直接选票，而1936年的兰敦只有1 600万张票。第二天早晨，威尔基承认竞选失败，罗斯福赢得了449张选举人票，威尔基有82张。双方赢得的州数为38对10。威尔基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但每次他快要打开一个可以加以利用的局面时，罗斯福都阻挡了他前进的道路。

睿智的罗斯福当然不会在选民面前表现出傲慢；他极为擅长讽刺政治对手。威尔基承受着胡佛经济萧条和奈伊的孤立主义的沉重负担，而罗斯福从来也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根据他一贯准确的直觉，罗斯福没有采纳埃莉诺和其他许多人的建议，而是任命了共和党的史汀生和诺克斯，同大商业集团达成和解，并且缓和了新政中的党派行为，因为世界危机已迫在眉睫。当然，他在第三个任期中的这些做法还是遭到了激烈反对。

在这次竞选的一次演讲中，罗斯福曾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不会忽略任何人。”这句话被他的继任者们反复地引用。他费尽心血来团结这个国家，除了那些他认为是纳粹支持者的人之外。他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比起1932年经济和民众心理陷于崩溃边缘的那一次，1940年的大选可能更为重要，困难也是巨大的：总统只连任两届的传统、对战争的疑惧、大萧条的阴影，以及威尔基竞选带来的压力，所以这大概是罗斯福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场胜利了。

威尔基也从此改变了他的政治生涯。他不像那些保守的共和党人，而是能对他的政敌更加友好，只是他的身体状况和政治生命都开始恶化了。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约翰·路易斯如他承诺的那样宣布退休。后来他又担任了矿工联合会的主席，但并没有像在罗斯福的前两个任期里那样获得信任。查尔斯·林白继续向小范围听众宣传孤立主义，但终其一生，他最多也就被视做一个新纳粹分子而已。

议会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动。民主党得到了六个众议院席位，但失去了三个参议院席位。由于南部民主党是亲英和要求加强防御的，他们与共和党中孤立主义者的同盟也就宣告终结。罗斯福又一次牢牢掌控了联合政府。（众院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席位之比是268对167；参议院中则为66对30。）

11月8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回到了华盛顿，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向他祝贺的群众人山人海。几百个孩子追随着他的汽车奔跑，几万名群众列队在他从车站到白宫的街道两旁欢庆。他偕夫人埃莉诺和副总统华莱士夫妇在白宫的北廊向他的支持者们挥手致意。从此，罗斯福几乎成了美国总统的代名词。

14
汝欲何往，我将前行……直至灭亡

1941年2月，哈里·霍普金斯与丘吉尔首相讨论罗斯福对英政策时如是说

I

罗斯福终于对如何处理战争的问题下达了指令，他坚信，这个世界四年后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并且他决心去创造这种变化。按弗兰克福特的说法，他现在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心情正如面临着南北战争的林肯总统一样”。

选举结束三天后，约瑟夫·肯尼迪被请到白宫。他向罗斯福递交了辞呈，罗斯福也接受了他的辞呈。肯尼迪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告诫政府要置身于战争之外，而且他认为有必要在政府内部采取一些法西斯主义的工作方法。四天后，《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肯尼迪的专访。采访中，这位大使宣称“不列颠已经完蛋了。林白从根本上说是对的，我们可以从法西斯分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英国试图把美国拖入战争，并让美国背上战争的包袱”。

肯尼迪支持林白，支持绥靖政策与法西斯主义，并警告那些主要的犹太裔电影制片人和导演停止拍摄反纳粹的影片。

十天后，罗斯福邀请肯尼迪在海德公园度周末。星期六早上肯尼迪到达。两人交谈了十分钟，罗斯福便让他在屋外等他一会，然后把

埃莉诺找来，对她说："我永远也不想再见那个狗娘养的，拿来他的辞呈，让他滚蛋。"

肯尼迪已经风光不再，因为罗斯福不再需要他了。

罗斯福收到了丘吉尔的来信——后者在竞选期间一直保持着相对沉默。在11月6日的来信中他写道："我认为，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选举期间对美国的政治发表议论是不恰当的，我想此刻您不会介意我曾为你的胜利而祈祷并为此而感谢上苍。"

丘吉尔继续进行他的战斗，在他看来，不列颠和美国是同一个民族的两个分支，是友善并有着兄弟般情谊的伙伴。但罗斯福可能从来都没有如此全心全意地看待美英两国的关系。更奇怪的是，他也并没有回复丘吉尔的这封信。

1940年12月7日，丘吉尔向罗斯福做了一个冗长的战况概要。他不同寻常地在开头宣称："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笃信，美英两国的民主的未来……都与英联邦的生死存亡休戚相关。"他认为，无论是美国海军主导太平洋，还是英国皇家海军控制大西洋，都体现了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他好像是在暗示，基于这点认识，美国即将参战。

虽然德国入侵大不列颠的危险降低了，但1941年新的危险主要是：由于纳粹在周边海域上对向不列颠运输物资的船只展开了扼杀性封锁，整个不列颠几乎要因为缺少军备物资和食物而窒息了。

丘吉尔向罗斯福提出倡议，遵守"'一战'后达成的、德国也在1935年接纳认可的自由航海原则，从而摆脱违法和野蛮的战争状态"。

"最后，我向您提出关于财政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接近弹尽粮绝的境地，没有能力用现金支付货运和其他的货物了。"不

列颠几乎要耗竭所有，用尽一切渠道蓄积力量，才得以支撑这场战争。

罗斯福意识到，丘吉尔是在等待选举结束后，才向他说明英国所面临的军事和经济上的困境以及英国需要美国给予援助的范畴。罗斯福把丘吉尔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头脑中开始形成“租借法案”的构想。

总统的构想是这样的：美国无偿地向英国提供其所需物资，在适宜的时候，英国以实物交换或交纳等价的支付物。

孤立主义者表示，坚决反对援助英国的立场。

排犹分子亨利·福特和犹太裔的孤立主义分子莱辛·洛森沃德在美洲第一委员会理事会上，联合林白发表了明确的反对意见。

但《纽约时报》《先驱导报》《基督教箴言报》以及其他许多有影响力的报纸都支持罗斯福继续执政。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坚决支持总统和《租借法案》。在1月16日给丘吉尔的电报里，罗斯福回答了其关于什么时候《租借法案》能通过的问题。他说，他认为除非参议院阻碍议案通过，否则2月15日《租借法案》就有可能通过。即使有阻挠，这些小把戏也只能是使通过决议的日子延后一些而已。罗斯福有信心能够在必要情况下突破阻挠。自不列颠战役和大选结束后，美国国内事务上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美国的政治气候在转变，国人眼中的敌人从大萧条转变成了柏林–东京轴心国。官方对失业痛斥的焦点也从工作福利水平的下降转变成了对国防力量的关注。罗斯福这位伟大的政治舵手，乘风破浪，审时度势，轻而易举地扭转了整个政治时局。

哈里·霍普金斯以罗斯福特别代表的身份于1941年1月9日启程，开始了对英国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几个星期之后，白宫宣布改革派共和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约翰·吉尔伯特·维纳特将取代肯尼迪任美国驻英大使。1月19日，威尔基在白宫同其对手进行了一场诚恳的谈话。在一些国际问题和政见上的共识让他们之间产生了友好的感情。

在威尔基将赴英前夕，罗斯福请他“拜访”霍普金斯。此前威尔基并不认识霍普金斯，他用传统的共和党人视角推测霍普金斯是一个模糊、平庸、行尸走肉般的政治人士。威尔基问罗斯福为什么与霍普金斯交往甚密，总统回答说：“你会发现总统是个孤单的工作，需要像哈里·霍普金斯这样除了帮助你别无所求的人。”在这令人愉快的谈话之后，罗斯福请威尔基给丘吉尔递交一个摘有朗费罗诗歌中语句的便条。这可能是他们之间将近2000个便条中最著名的一个：

> 亲爱的丘吉尔：
>
> 温戴尔·威尔基将把这个给你，这将帮你消除一切政治障碍……
>
> 我觉得这句诗不但适用于我的人民，赠给你的人民也非常恰当：
>
> 邦国之舟，扬帆前进吧!
>
> 扬帆前进，强大的联邦!
>
> 忧患中的人类，
>
> 正全神贯注地将他们的一切未来希望，
>
> 寄托在你的命运之上。
>
> 你忠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

便条到了丘吉尔手中，并在2月9日的国际广播中播出。丘吉尔问：“我该怎样回答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呢？他已经三次被选为一个1.3亿人口国家的首脑了!”他即刻又回答道：“我们不应失望迟疑，不应犹豫不决或心存顾虑。不管是战局瞬息万变带来的震惊，还是长期精神高度紧张下的折磨，都不可能削弱我们的决心。给我们装备吧，我们就会完成工作。”他在几个星期以后做出了更加深思熟虑的回答。

英美两国的人民是幸运的，因为领导两国的都是对捍卫文明发挥了巨大影响力的伟人。

在就职典礼的前夜，丘吉尔发电报告诉罗斯福，新型的威力巨大的战列舰国王乔治五世号将于1月24日把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送往切萨皮克湾的安纳波利斯新港，并欢迎总统和任何他指派的人去参观战列舰。罗斯福坐着总统专用的快艇波托马克号以私人的名义去看了国王乔治五世号，从而表达了英美团结的姿态。尽管已经安排，但他没有上船去看，他的几名海军随从去看了，而他则在波托马克号上请哈利法克斯夫妇喝茶。

尽管霍普金斯在1月初会见哈利法克斯后，预测哈利法克斯和罗斯福会相处得很好，但是哈里法克斯对罗斯福仍持有不信任的情绪。他对罗斯福在丘吉尔身上施加的影响怀有敌意，并认为他是“一个熟练的幕后操纵者……有点像劳合·乔治。你永远都不确信什么时候能控制住他，也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从你的指缝中溜走”。起码在第一年里，他没有好好利用总统让他去“看望他”的邀请。在乔治五世号上，还有几位号称前来讨论军火采购的高级英国军官。其实他们是前来参加名为“英美对话”的秘密联合会谈的英方成员。该会谈一直持续了两个月。

几天后（在1月28~29日间），丘吉尔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我昨天接待了威尔基。对于您所引述的朗费罗的诗句，我深受感动。我将把它制成镜框作为我们在这些天中顶住强大压力、通过电报往来、

心灵感应所建立的友谊的见证保存下来……我尤其感激您对哈利法克斯的盛情款待，我还要感谢您为了确保能对我们提供及时帮助所做的一切。对我来说，和霍普金斯交朋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他给自己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带来了莫大的慰藉和鼓励。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他为何如此和您亲近。顺祝您寿比南山。”（1941年1月30日是罗斯福59岁生日。）罗斯福的信直到现在还挂在丘吉尔在查特威尔的卧室中。

1月20日，罗斯福乘车参加他第三任总统就职仪式时，成群的人们夹道欢迎。这很好地证明了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该调查显示，罗斯福的民意支持率达到了71%，是自他当选总统以来获得的最高支持率。这对一位在极其动荡的年代中创造了政治长寿纪录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成就。

罗斯福的母亲、妻子还有他的17个儿孙在国会山大看台上见证了罗斯福的就职典礼。罗斯福的演讲稿一开始是由国会图书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起草的，但后来却又用一些不那么诗意化的语言草草加以修改，因此，给人一种整体上不一致的感觉。罗斯福一如既往，有力而优雅地进行了演讲。他在形容美国人民时说，美国人不仅需要食物居所，更需要精神——“美国式信念”。这番比喻非常得体，恰到好处，不过还比不上他以后几个重要演讲所产生的影响，包括“伟大的民主武库”以及“四大自由”等，罗斯福还为自己没能很好地抓住听众的想象力而感到遗憾。

Ⅱ

对《1776号议案》的听证会于1月15日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展开。赫尔、摩根索、史汀生和诺克斯代表政府进行工作，给人印象深刻。在国会总是人缘很好并受人尊敬的赫尔称，自己对美国的国家利

益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租借法案》并非确定的战争解脱，而是“最安全的方针。”相对于这一法案的另一种选择，则是将公海的控制权交给那些醉心于肆意侵略的强权们。

摩根索由于担心自己的犹太血统会被人当作把柄，担心人们会说他对纳粹奉行的反犹主义怀有先入为主的看法，造成他的证词随之大打折扣，于是便透露了英国财政部给他的数据。这些数据原本是为放弃长期以来在出售军火给交战方的现金自购方式做辩护的。也有担忧认为，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前，英国就已经无法支付了。赫尔带着他固有的坚韧，曾以个人身份建议英国提供担保。而罗斯福的反应则是，他对印度的木材、新加坡的住宅以及原始热带小岛不感兴趣。赫尔十分反对摩根索将英国急需的情报透露出去，他担心这样将会取悦英国的敌人们。摩根索强调说，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授权将它的账目在另一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公开。他这么说，很有效地捍卫了这个提议的金融内涵。

史汀生接下来作证——他也是一个有力的证人。他是一名共和党人，被誉为一名在公共事业中绝对正直的人，任职长达40多年，历经七任总统。他强烈表示，这个法案对美国非常有益。他驳斥了美国给英国作嫁衣的理论。对于这个法案将会给予总统独裁权力的说法，他也予以了抨击。他解释说他曾身居高位辅佐过好几任总统，他们所有人，当然也包括现任总统，在战争期间都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和谨慎作风。“对于一个建立在完备体制基础上的法治政府，你完全可以相信它的决策者一定能够经受得住战争考验。”

海军部长诺克斯下一个作证，他相当成功地阐述了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对英国海军的依赖程度。但在被充满敌意的问题压制时，以及在表达他对美国武装防卫的反对时，他略微有些招架不住。

威廉·努森为政府在技术采购问题上作证。一些公民以个人身份也为政府提供了宝贵的证词，包括桃乐茜·汤普森、威廉·布利特、美国劳

工联合会的威廉·格林、艾夫里尔·哈里曼的弟妹杰伊·伯登·哈里曼女士（她曾出任德国人入侵时驻挪威公使）。桃乐茜·汤普森做了一个激烈而雄辩的演讲，表达了他对于纳粹主义的深恶痛绝。布利特用他特有的气势谴责了美国的“马其顿防线”心理。哈里曼对德军的突然进攻以及野蛮行径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反对方的证人由约瑟夫·肯尼迪牵头。罗斯福在1月16日白宫90分钟的会议上，再一次向肯尼迪展现了他超凡的个人魅力（两个月前他把肯尼迪从他的房间里赶了出去，还宣布再也不想见到他）。他已经听够了肯尼迪的抱怨以及那些肯尼迪对罗斯福事业无私奉献的虚假表白。他回忆道，在天花乱坠的一番话后，他答应为肯尼迪和他的儿子们在金色办公室安排个职位并给他相应的名誉，然后讲了个笑话把肯尼迪给打发走了。这个前任大使对他那些孤立主义支持者们非常失望，他表示，就目前议案的形式来说，他不会支持这个议案，因为它若是通过了，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国会就被排除在外。但他倒是非常支持对英国的援助。

不久以后，罗斯福的女婿约翰·保廷格给肯尼迪写了封感谢信，肯尼迪回信时很悲伤地说希望能成为“政府的社会编外人员”。当保廷格把这封信交给他岳父时，罗斯福对肯尼迪的性格给出了最贴切的解释：“约翰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爱尔兰小男孩，一直都是。早些时候被巨大的金融成就给宠坏了，他极其爱国，极其自私，也极其沉迷于这样的想法——就是他要给他的9个孩子每个人留下100万的财产……对他来说，一小帮资产阶级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比在丘吉尔的统治下更安全。他在潜意识里就是这么认为的……有时候，我觉得我比他大200岁。”

反对是徒劳的，反对方的声明也日渐微弱，除了林白之外。他一向关心空中防卫，据他说，空军现有1万架一流的飞机，用来保卫美国本土还只是马马虎虎，还不具备跨洋作战的能力。实际上，若是拥有

这个能力，无异于对德国和日本构成极大刺激。他拒绝在德国和日本问题上表现出任何偏向或是做出任何道德上的区分。这使得国会很高兴，因为孤立主义在国会中风头正强劲。

从赫尔和乔治·马歇尔将军那里得到证词后，议院就进入了审议期。赫尔强调德国恢复了元气，便很可能在春天入侵英国，他预计可能在90天内。而罗斯福则很悲观地谈到，若美国想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1月27日，罗斯福在白宫会议上同意了4个无关痛痒的修正案。1月30日，外交委员会将《1776号议案》提交议会辩论（17比8通过），在众议院在2月8日也获得了通过260比165（236个民主党人和24个共和党人同意，135个共和党人和25个民主党人反对），社会主义党议员维托·马肯托尼等人也反对。尽管威尔基不遗余力地努力，共和党的表现表明，当初罗斯福对他的共和党对手令人沮丧的判断是多么准确。

参议院仍在讨论《1776号议案》，反罗斯福的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和《芝加哥论坛报》的所有者罗伯特·R·麦考米克也在证人之列。在2月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问麦考密克的证词时，罗斯福非常不屑，他轻蔑地问："他是作为专家来说的吗？"这激起了在场媒体的哄笑。

罗斯福讨论了任命约翰·吉尔伯特·维纳特为英国大使的事情。他认识到，维纳特是共和党人，对他的任命是有利的。维纳特是个有着很深种族主义倾向的社会改革家，他将会积极地支持反纳粹运动，但却不会像他的前任一样，轻易就接受英国上层社会对他的豪华房屋、乡间运动场或是盛大庆典的奉承。

霍普金斯的英国之旅取得了巨大成功。从一开始他就把自己的任务界定为努力调节"两大首席男高音"之间的问题（随着战争的进行，这种说法变得很盛行）。他很清楚罗斯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脾气，也很准确地预见了丘吉尔的作为，但是却一厢情愿地相信这两大巨头能

够联合起来做事。霍普金斯希望通过在两个领导人之间建立建设性关系来促进大联盟的形成。根据丘吉尔的回忆录，在炸弹毁坏的、嘈杂的唐宁街10号，他们第一次会面时，霍普金斯就告诉他：“总统对共同赢得战争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中间不会有差错，他派我来这里就是告诉你这个。”

霍普金斯很大程度上着力于推动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伟大联盟做准备。尽管两人还存在着小小的分歧，但这个联盟还是符合双方愿望的。在访问途中，霍普金斯给罗斯福写信：“丘吉尔使这里的人民吃惊。如果只靠鼓励就能赢得战争——后果将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并且我肯定你不会允许任何东西挡你的路。在各种意义上，从每个角度来说，丘吉尔都掌握着政府的实际权力，他同时控制了大战略和细节。劳动人民相信他，陆、海、空军都是他的后盾。政客们和上流社会阶层装作喜欢他……丘吉尔想见你……我确信这次会面……十分重要，而且紧迫。”

在他长达一个月的访问中，丘吉尔为他举办了许多次宴会。在其中一次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霍普金斯站起来说，他相信首相对于他回到美国后将对罗斯福总统说什么十分好奇。“我将引用您在一本书里的一句诗：‘无论你去不去，我都将前行，你寄宿处即是我歇脚处，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他又加了一句）即使到了世界末日。”丘吉尔总是能在他的听众心中激起强烈情感，而同时他往往也能把自己感动。首相静静地落了泪，丝毫不觉尴尬。他面对的将是一次孤独而勇敢的斗争，唯有那不断映入眼帘的新世界能够带给人无以言传的安慰。

霍普金斯告诉丘吉尔，美国舆论有四个明显的分野，分别是：纳粹分子的同情者；以肯尼迪为代表的想帮助英国但又很悲观、不想把美国拖进战争的人；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大多数政府官员和那些无论冒什么险（哪怕是战争，但不打仗最好）也要援助英国的人。

罗斯福是最后这种观点的坚定支持者，是主战派偏爱的候选人，在所谓的肯尼迪集团里也占一席之地——由此可见，他赢得了四分之三的人的支持。这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是个非凡的成就。霍普金斯解释说，罗斯福多少属于主战派，但他明白领导一个联邦国家应注意什么。

霍普金斯预先为丘吉尔定位了他2月9日的讲演。他敦请首相在这次讲演中回应那首朗费罗的诗，使《租借法案》更容易得到通过，并对那些声称罗斯福总统正把美国引入战争的人们进行反驳。丘吉尔很高兴地照办了。

在首相发表这篇讲演的前夜，霍普金斯乘飞机离开了英国，并给首相留下了这样的字条："亲爱的首相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和您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您以无与伦比的信心与意志在追寻着胜利。我一直喜欢英国，现在我更爱她了。今晚，在我前往美国的时候，我祝愿您好运，祝英国获得胜利。您诚挚的哈里·霍普金斯。"

在这个阶段，威尔基也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霍普金斯回国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9日，威尔基也突然回到美国，目的是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为《1776号议案》作证。比平常顺利的是，威尔基在2月11日出现在一个挤了1200人的秘密会议室里。他说《租借法案》并不是对英援助广泛支持的升级，仅仅是使这种援助在逻辑上实现合法化。他认为，没有理由相信这一法案会把我们拖进战争。相反，这是我们远离战争的最后希望。

威尔基证词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则是他被质问《租借法案》赋予了罗斯福过大的权力时，以及被当众引用他在总统竞选活动中对罗斯福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责难时。他回答说："我尽可能努力打败罗斯福总统，但他被选中了，所以他现在是我的总统了。"但这个回答对讳莫如深的杰拉尔德·奈来说还远远不够。他特意强调了威尔基在大选几天

前的预言："如果罗斯福连任，基于他过去的表现，会在1941年4月把国家拉进战争。"威尔基只好微笑着回答："这不过是竞选辞令罢了。"屋子被笑声震动了。

1941年2月13日，能力出众的参议员瓦尔特·乔治出任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他将《租借法案》和《1776号议案》提交参议院辩论并表决。尽管孤立主义者、民主党人凯门普·克拉克和改革论者罗伯特·拉·福勒兹投票反对，这几乎仍不失为一次直接的党派投票。在参议院里，孤立主义者虽然拼命设置障碍，但仍未能阻碍法案的通过。法案中也接受了一小部分妥协性的修正条款。参议院于3月8日以60票对31票通过该法案（50个民主党人和10个共和党人赞成，14个民主党人和17个共和党人反对）。是夜，霍普金斯给首相的乡间别墅打电话（那是个周六）。

《租借法案》涉及许多领域。这使希特勒猛然发现在这场战争中，他不仅要与英联邦作战，还要与美国作战。德国国会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最终希特勒批准他的宣传家们去攻击美国，我们早就该这么做了。我们现在可不必管他们了。"

1939年，戈培尔曾对小克尼瑠斯·范得比克特说："如果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将把你们这个鲁莽的民族赶出去。"这也是埃德加·胡佛的联邦调查局所做的棘手工作，他们潜入美国盟国组织，但从事起真正的间谍活动来，他们又效率很低，很少达成什么破坏行为。在纳粹将美国看作很多低劣民族共存的下等社会的同时，希特勒认识到这个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有新的重要性。而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从任职的第一天起就对纳粹德国充满了仇视。他和绥靖主义持完全相反的态度而且软硬不吃。希特勒眼中的美国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领导下正变得日益强大，这带给他不祥的预感。

同时，英国也证实了他们的不屈精神。很难想象，张伯伦让出了位子后上台的丘吉尔会和他的反差如此之大。同时，也不要忘记还有

那第四个强大对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尽管当时希特勒进攻苏联，但斯大林在他眼中同丘吉尔一样是个未知数。在希特勒掌控的权力顶峰上，他的地位并不像一开始那样看起来无法动摇，他无法征服英国，还要同美国作战，如果他同时还要再和苏联作战，他将注定失败。

Ⅲ

3月19日，罗斯福乘坐总统专属游船波托马克号离开华盛顿，去佛罗里达享受为期10天的旅行。旅途并不舒适，后半程穿过巴哈马时非常艰难。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对内政部长伊克斯说，如果波托马克号沉没了，护航驱逐舰将没有机会派出救生艇。而这名不惯航海的水手伊克斯则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罗斯福在冒不必要的风险。"3月27日，罗斯福在海上签署了《租借法案》的第一笔70亿美元的拨款方案。由于英国急需该资金，签署的过程很快，送信的水上飞机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十分困难地降落了。

1941年，《租借法案》仅置备了为英联邦所使用的1%的军火，但在战争中，它弥补了英国50%的赤字，并缓解了英国进口国防必需品的金额。到战后，全世界有超过500亿美元的物资在《租借法案》下被提供给盟国。

返回华盛顿后，罗斯福召开了例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新租赁计划经由赫尔、史汀生、诺克斯和摩根索组成的内阁委员会直接负责，实际上委员会的秘书长兼整个计划的首席行政人为霍普金斯。摩根索希望由自己负责，史汀生则极力争取财政权，而总统的做法是选择他最信任的官员（那个唯一了解丘吉尔和战时英国的人），也是能使内阁成员矛盾缓和的人。

完全置身事外的伊克斯自从援助英国后，在内政部无所作为，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从哈里来到华盛顿，他对政府企业的管理运营非常失败。许多人不信任他，我也如此。”这里的“许多人”，也包括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内。霍普金斯还派空军将军哈普·阿诺德前往英国确定英国空军所需物资，因为马歇尔和其他人认为，英国会要求大量超过实际需求的物资。

霍普金斯与罗斯福在下面问题上观点一致，就是国家间的商业合作对重整军备和租借法案的成功非常关键。而且两人都对埃莉诺·罗斯福在新政方面的顽固态度持不以为然态度。一开始，霍普金斯是埃莉诺的朋友，她将他介绍给自己的丈夫，并和弗朗西斯·珀金斯一起将他举荐进入政府。现在她认为，霍普金斯已不再履行社会正义的责任了，但自从他成为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的亲信，并成为他和温斯顿·丘吉尔的主要联络员后，他整个人变了。

希特勒利用压迫和欺骗的手段把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拉入了轴心国集团，并获得了军队通过这些国家领土的权利。

4月13日贝尔格莱德被德国占领，4月17日南斯拉夫投降。

德国人同时也在北大西洋上对英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Ⅳ

总统认为，对土耳其只能进行道义劝说，对西班牙即使劝说也无济于事，但却认为形势比丘吉尔所想的更为乐观。

罗斯福没有对向他恳求的妻子、国内的左翼，甚至是议员奈就帮助西班牙共和派反对佛朗哥一事妥协。他应该对此感到高兴。这样的

帮助会改变内战的军事格局。而且无论如何，苏联在幕后主导着共和派，其对于西班牙主权的保护很可能比佛朗哥更少。希特勒与佛朗哥进行会晤之后，宣布他宁愿撤出所有的军队，也不愿再与之进行协商。如果罗斯福在西班牙内战中帮助了共和派，佛朗哥则有可能更偏向于希特勒。

罗斯福不认为有任何机会可以劝说维希[注]脱离德国，但认为维希城将会抵抗德军侵占其殖民地，正如它对英国的态度那样。他还提出再送去“两船儿童食品到马赛”以及一些燃油和军火给魏刚将军作为补给。“我们认为，德国从陆路到达喀尔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他们要考虑到那里还集结着法国陆军和海军。”

“从个人角度来说，德国不断扩大的侵略范围并不让我沮丧。这些地域全部加起来也只有很少的原材料——不足以满足大量占领军的需要。但唯一的例外是摩苏尔和伊拉克的石油，如果情势需要的话，我认为你也可以摧毁那些地方的生产。”

“你星期一的讲演非常棒。我将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进行广播演讲。继续努力。”（丘吉尔在4月27日发表了演讲，作为对罗斯福引用朗费罗诗句的回应，他也引用了克劳夫的语录。）

这样的交流说明英美之间对于殖民地军事基地的不同认识。英国把几乎所有的领土都看作其威信的体现，还把交通线上的港口和设施看作战略据点。美国则认为几乎所有的非洲和南亚地区都不是其地缘政治利益所在，不值得为其冒险。美国还倾向于认为大英帝国的众多殖民地，即使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地方，也并不像英国所认为的那样不可或缺。罗斯福毫不在意希特勒成百上千的士兵穿越沙漠、森林、山川侵入无关紧要的地缘政治区域要塞。而丘吉尔则对德国蚕食大英帝国领土并大肆扩张感到无法容忍，唯恐帝国稳定的根基会遭到动摇。

罗斯福5月1日的来信很令丘吉尔沮丧，因为信中似乎描绘了德国在埃及和中东将可能获得的骑士般的辉煌胜利。他对维纳特表示了他的不满。他身上再次出现了那种困扰他一生的症状——这种疾病被他和他的医生莫兰称为“意志消沉”。

丘吉尔在5月3日回复了罗斯福。在初稿中他甚至写道，他因罗斯福的信而感到“灰心丧气”，但在最终稿中却删去了这个句子。关于亚速尔群岛被占问题，他则写道：“我们绝不是想增加自己的领土，而仅仅是保护我们自己和你们的生命。”他劝告罗斯福（后者只是想激励丘吉尔）不要“过于确信埃及和中东失利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他在初稿中使用了“致命的”一词但后来也改掉了。）首相觉得，这两地的战局若急转直下，则有可能对西班牙、土耳其、维希和日本的态度产生消极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出丘吉尔已经处于几乎无法承受的压力了。这主要反映在他对美国发出的对德宣战的要求，尽管他自己知道这个要求并不现实。他说他将会“极为急切地等待你们所酝酿的下一次广播。而这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罗斯福每隔几周就会广播一次，而他的演讲和丘吉尔一样，大都是影响深远的佳作。战争中的“转折点”实际上已唾手可得，但它将会来自于一次强有力而具决定性力量的战役，而不是又一次加剧美德间紧张关系的罗斯福讲演。

尽管罗斯福当时正在病中，他还是在5月10日给丘吉尔回了信。5月2日，他在弗吉尼亚突感不适，便提前回到了华盛顿。他被诊断出患有肠道紊乱、心脏舒张式高血压以及由痔疮出血导致的严重缺铁。他接受了两次输血和一次补铁注射，并被要求完全休息，他第一次高兴地接受了。他在卧室里一直待到5月中旬，考虑如何加快战备生产和护卫英国船队。他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国内舆论，不希望在这个方向走得太远，拿自己的信誉冒险。

在他5月10日的答复中，罗斯福向丘吉尔保证：“我并不希望以任何方式低估（地中海）形势的严峻性……我很清楚其战略上的巨大重要性并且和你一样对其深感忧虑……我理解你们在此战线上取得胜利的决心，我们将会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你们。我之前传递的信息只是想指出，即使地中海成为……我们无法胜利的战场，尽管我不认为这样的失利将意味着我们共同利益的失败……我仍然相信这次战争的胜负在大西洋上才能分出，除非希特勒能在此取得胜利，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获胜。”

“我不能用言语表达美国人民对你们从希腊转战到地中海和非洲的那些将军、海军司令、军队、飞行员和船员所怀有的敬慕之情。我认为美国感到，为了阻止希腊掀起法西斯浪潮，你们的国家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并且你们在那儿所实行的拖延战术一定极大地削弱了轴心国的力量。”

罗斯福承认，当法国维希政府拒绝停战条款时，他们也绝不会反抗德国对其城市地域的侵犯。但他仍然希望法国将会抵抗德国对其殖民地的侵犯。

为了鼓舞其受到围攻的同盟国的士气，总统采取了新方针，提到他正在扩大“我们海岸巡逻队的活动范围……到大西洋一带”，并已经“让我们海岸防卫的全部重装甲部队加入……巡逻。我也随之送上我热忱的祝福”。

实际上，尽管在克里特岛[注]又出现了溃败，但丘吉尔的运气在5月也有了一些好转。5月7日，丘吉尔以447对3的票数赢得了下议院的信任选举。5月10日，纳粹德国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在一次神秘行动中空降到苏格兰，开始在英德之间进行调停。尽管丘吉尔在5月17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看不出他（赫斯）有任何精神错乱的征兆”。但这个人的行动的确近乎疯狂。他没有希特勒的任何委任书，而且他的和

平计划也完全出于幻想，他甚至幻想着解散丘吉尔政府。他的背叛使希特勒蒙受了极大的羞辱。赫斯是他最老的合作者之一，并且当他们在1923年那次不成功的慕尼黑暴动后还一起被关进兰斯伯格监狱时，希特勒正是向赫斯口述了《我的奋斗》。

在整个海战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之一：战斗力强大的德国战列列舰俾斯麦号通过丹麦海峡驶入了大西洋。5月24日，著名英国战列巡洋舰胡德号和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在格陵兰岛拦截它时，俾斯麦号的炮弹从20千米以外准确地穿透了胡德号的甲板并炸掉了其弹药库。在这艘曾是世上最大最有名的战列舰上的1500人中，仅有3人幸存。胡德号有着巡洋战舰设计的普遍缺陷：舰上装甲薄弱，而从远处飞来的炮弹在急剧下落至击中胡德号相对轻薄的甲板时，已经获得极大的速度。俾斯麦号还追击了崭新的威尔士亲王号，随后继续南行。

这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丘吉尔所受到的最大打击之一，但是皇家海军很快恢复了元气，以一枚空投鱼雷破坏了俾斯麦号的导航设备，并在5月27日将其包围。俾斯麦号无法确定撤退方向，只能像将被处决的斗牛场公牛那样等待英国重装备部队的到来。由旗舰指挥的英国战列舰流浪者号和国王乔治五世号把它变成了一堆冒烟的废铁，随后巡洋舰以鱼雷将其彻底击沉。最后，这次战争行动完全转变成了英国的胜利。

5月27日，罗斯福就俾斯麦号被击沉一事向丘吉尔发去了热忱的祝贺。为了支持美国不断扩大的中立地带，罗斯福在5月、6月将三艘战列舰、一艘航母、四艘巡洋舰和小型飞机从太平洋调到了大西洋。

当日晚些时候，正如丘吉尔所希望的那样，罗斯福做了一个将成为“转折点”的演讲。那天是“泛美日”演讲，而罗斯福宣布“全国进入无限紧急状态”，则是他在美国对德国谨慎扩大的冲突中所走出的又一步。他非常直接地警告了德国潜艇计划的危险性，而人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将立刻开展护航行动。总统对纳粹德国的谴责在广播里大

范围播出时，一些英语不太好、有时会在错误的时候鼓掌的拉美外交官这样总结道："纳粹的世界将希特勒奉为他们唯一的上帝……我们的孩子，是否也会在寻找新的神明时步入歧途呢？"

罗斯福在5月27日还告诉丘吉尔，75000吨补给正由美国船只直接送到埃及（好望角附近），其中包括200辆坦克和700辆卡车。第二天丘吉尔向罗斯福表示了感谢："我们感到大受鼓舞，因为你所发表的那个值得纪念的宣言以及……你尽最大可能所做的努力。"

英国在5月31日占领了巴格达，把支持德国的拉希德·阿里政府赶下了台（正如丘吉尔5月17日告诉罗斯福的那样，鲁道夫·赫斯坚持保留该政府）。英国于6月8日出兵叙利亚，同时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也派出了一个援助分队。大马士革在6月21日被攻陷。英国护航（舰）队带着30辆坦克经过地中海到了亚历山大。英国的中东指挥官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在此期间由于被伊拉克和叙利亚分散兵力而无法反攻隆美尔。但他重整了希腊和克利特战场的剩余部队，并以新到的美英护航（舰）队兵力予以补充，从而又能更好掌握形势了。他在6月初对隆美尔发动了战斧行动。行动并不成功——战线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并且双方的伤亡和战俘数都相差不多，但至少是一次反攻。和林肯一样不断变换将领以追求胜利的丘吉尔，在1941年6月中旬，让英国的印度驻军将领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接替了韦维尔。而韦维尔则成为了印度总督。

这时的希特勒有几种选择：大举进军非洲、入侵英国、入侵苏联，或者是坐享他的征服者地位。非洲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会困难重重，尤其是土耳其和西班牙对于德军从其国内通过有不少武装阻挠，而从意大利运来的空军和海军的补给也很容易受攻击。进犯这些国家需要人力和资源部署的重大调整，占领军还会面临消耗力量的持久战。对英国出兵可能性不大——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会消灭他们面前任何部队四分之三的力量以及随后的援军，而英军海岸线防卫则

会迅速消灭剩下的战斗力。但是安享胜利果实并不是希特勒的性格。如果在战争后期阶段，他能像黎塞留或是俾斯麦那样统治得更为自由一些，发表一个单边不扩大战争声明，与战败国签订一些即使是明显偏向德国的协议，从而成为一个某种程度上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者，事情可能会更为顺利。但这意味着要完全改变他的人格，也就会降低希特勒那神秘吸引力：绝对的独裁、凶残、拘束、无所畏惧、充满仇恨和虐待狂式的毫不妥协。这种情况甚至比前两种更为不可能。

这些考虑都没有涉及苏联。但希特勒确信，当罗斯福完成了备战，而德国又已经由于与难缠的英国交战多年而被削弱时，他将与美国成为交战方。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可能不为了美国的大把金元和为了获得中欧主导权而从背后夹击德国。如果希特勒能够在此时，也就是在美国备战完成之前瓦解苏联，罗斯福和丘吉尔抑或是他们的继任者就将无法使他交出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如果没有如他所愿达成德、英、美、日四分天下的和平模式，他可以横扫中东，穿过北非，甚至到达印度，并利用他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甚至乌克兰的卫星部队来扫清重要障碍。

当然，这可能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因为如果他在苏联陷入苦战，而同时还要应付美国和英国，就该轮到他输得一塌糊涂了。希特勒的整个事业都像是在豪赌，尽管在和那些与慕尼黑腐败分子不同的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等杰出的政治家竞争时不是这样。他至少能够像他在法国那样建立殖民地。即使进攻苏联可能有极大的风险，但他会做出这一决定也是合乎逻辑的。

同样，罗斯福在1941年5月1日也向丘吉尔提到，希特勒正由于其在巴尔干地区和非洲的行动而出现战线过长的问题。如果英国没有干预希腊问题和插手贝尔格莱德之战，希特勒可能早在6周前就已经入侵苏联了，并可能已获得决定性胜利。所以从表面看来，这也许是英国的惨败，但却从战略角度上保证了全局的胜利。

罗斯福是一位极有才能的战略家，既在某些领域有着从不失误的直觉，又博学多识，有着高级军事将领的判断能力。这些和他对国内政治的掌握以及他鼓舞美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能力结合到一起，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战争领袖。

斯大林则较为传统。1941年6月12日，他对他的将军们说："德国正忙于与西方世界的战争，而我可以肯定他不会冒险把苏联作为他的第二前线。希特勒不会这么傻。"

米西·利汉德在6月上旬时轻微中暑，到中旬病得更严重了，已经不能再工作。罗斯福去医院看望了她多次。但随着她逐渐变得烦躁不安甚至歇斯底里，他探访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格雷斯·塔利接替米西成为主管秘书，但是自从路易斯·豪五年前去世后，米西的因病离职恐怕要算是罗斯福在得力助手上的又一损失，对罗斯福影响很大。

V

1941年的6月22日，丘吉尔一直在焦急寻找的重要转折点终于到来了。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德军180多个师入侵了苏联。这次行动被称为巴巴罗萨计划，是希特勒发动的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德国大使将战书递交给斯大林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之后，还发表了一番虚情假意的不平与愤怒，此时莫洛托夫半开玩笑地问道："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是我们应得的下场吗？"

希特勒下了一个大赌注。在法国沦陷整整一年后，丘吉尔对于纳粹的挑衅与进攻不再沉默。希特勒也并没有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对挑起战争过度自信。因为他知道他在冒一个很大的险。希特勒把苏联看成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就像瓦格纳的《漂泊的荷兰人》（瓦格纳的著名歌剧）。德军在前10周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大进展，俘获了超

过100万的战俘。虽然面对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和斯大林及其高层指挥人员的顽强坚守，苏军还是采取了有秩序的分批撤退，撤走后的这些空缺则由斯拉夫人和多语种组成的苏联军队进行补位。德国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在他1941年8月11目的日志簿上记录着，德军预计苏联将会派出200个师的兵力，可实际被确认的有360个师。

苏联大片的土地很快就被德军占领了，而且德军还在不断地向东推进，不断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希特勒明白，事实也证明，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政治气候，还是民众的抵抗情绪都不会使他的这一行动像击败一个弱者那样容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硬仗，而且刻不容缓。

丘吉尔很快便对德军侵略苏联的行径进行严词谴责。在西方，他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就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产主义者。从1919年起，他就是武力镇压共产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经常哀叹没能将布尔什维克扼杀在摇篮之中。他在1941年6月23日向全世界的讲演中，尽管并没有避免涉及他经常会谈论的共产主义，可这次他却把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描述为“生活在数以万计的村落中，虽然依然靠土地维持生计，但无论少女或是孩子都有着纯真的笑颜”。就在丘吉尔讲述这田园般生活的前一天，强大的纳粹战争机器已经罪恶地运转起来。他向他的听众们描述着“叮当乱响的破旧坦克车、鞋跟敲地发出响声的普鲁士军官……”为了挫败“一小撮强盗有组织实行的针对全人类的计划”，英国再不能袖手旁观，一定要竭其所能帮助苏联。

罗斯福言行都非常谨慎。几周来，他除了宣布解冻苏联在美国的4000万美元的财产外，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宣布美国将会援助苏联，但同时他没有明言是否这一援助会在《租借法案》框架下进行。罗斯福的军事顾问曾表示，德军可能会在1到3个月的时间内占领苏联，而且德军无疑具有一举颠覆苏联的

能力。由马歇尔为首的一部分人则较乐观地认为，英军击退德军在北非西部沙漠针对埃及的进攻，可能性是很大的。

而罗斯福要显得比他们更有信心。他在给丘吉尔的信中说道，德军现已把战线拉得过长，后勤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并不会对对手产生太大威胁，而反抗斗争也在日益壮大起来。尽管如此，罗斯福也多次明确表示，他绝对不是在讨好苏维埃政权。他始终认为，苏联像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一样不能承认自己的侵略行为（除了芬兰，还有波罗的海的一些小国也曾被苏联占领）。他同时感觉到，比起纳粹的种族大屠杀主义来说，共产主义比较温和，进攻性较小。他坚信，很多表面上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实际上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西方民主广泛普及与发展的时候，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民主思想就是在共产主义政权内部采用进攻手段实现民主的关键力量。

他是个资本主义者，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基督徒，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和大部分美国人置身于德苏战争之外，就像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实行的政策中所反映的那样。在苏军攻占芬兰后他曾痛斥苏军行为，在1940年7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指责苏联和德国、意大利一样通过撤销法庭和立法机构来绞杀民主。

罗斯福并没有像参议员杜鲁门那样走得过远。杜鲁门在1941年6月24日曾说过："如果我们看到德军快赢了，我们就应该去帮助苏联；而看到苏联快赢了就应该去帮助德军。那么，这样只会使伤亡无限地上升。"根据盖洛普7月13日的调查，72%的美国人希望苏联最终取得胜利，而仅有4%的人偏向于德国。共产主义并不受欢迎，但它至少对美国来说还不像德国那样构成威胁。

罗斯福在1941年6月26日写给驻维希大使海军上将威廉的信中说："苏联的转移意味着欧洲从纳粹统治下的解放。"同时他认为美国无须担心苏联对欧洲的占领。他认为苏联的治军理念非常落后，他们

只懂得如何去占领而不懂得如何去统治与管理。斯大林对各大国过分的提防，也正是他的可笑滑稽之处。

1941年5月28日，当哈利法克斯和当时正在访问美国的乔治·梅纳德·凯恩斯前来拜访罗斯福时，总统对他们说："欧洲的裁军是最终不可避免的，而英国和美国必须拥有具有一定规模的武装部队。"当凯恩斯问及苏联时，罗斯福露出了他那习惯性的高深莫测的笑容，回答道："你们现在把问题复杂化了。"他还声称曾对大主教斯培尔曼说过战争结束后，苏联是中欧地区的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

莫洛托夫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劳伦斯·斯特恩哈特表示，苏联想于7月上旬从美国那里得到18亿的战时供给。但莫洛托夫又不无讽刺意味地承认，他并不打算全额得到这些供给。罗斯福在7月10日接见苏联大使康斯坦丁·乌曼斯基时，避而不谈他所收到的苏联对其在军事、政治上的请求，而是许诺：10月1日以前，美国将会按照向英军提供援助的同等比例向苏联提供援助。他辩解说："希特勒是我们的头号大敌，如果美国不在此时向苏联人民伸出援助之手的话，那将是不符合逻辑的，而且必将造成民众的更多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的敏锐直觉往往会比那些专家政客们的建议更加富有预见性。

根据当时的情况，1936至1937年，罗斯福对来自莫斯科布利特大使的继任者约瑟夫·戴维斯近乎荒诞的报告非常重视。因此，之后他撤了戴维斯的职，改派他到布鲁塞尔的一个比较次要的职位上，这样罗斯福就再也听不到戴维斯那些无休止的对莫斯科的赞扬了。此时，罗斯福便开始在各种不同的会谈场合大加指责斯大林的统治。由于来自莫斯科的反美宣传毫无止歇，而两国的商贸往来也难有较大进展，罗斯福常常感到烦恼，而这些正是两国在1933年重新恢复外交关系时所承诺改进的项目。

罗斯福看到，没有必要与充满敌意的纳粹和苏联政府同时打交道，与它们有序地进行接触才是明智之举，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像丘吉尔、张伯伦、达拉第他们那样热情地推动芬兰问题的解决。罗斯福还相信，苏联与纳粹德国不同，是不必动武就可以制服的。事实证明，在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上，他都是正确的。在征服纳粹德国的联合战斗中，苏联付出了10倍于英美伤亡人数的惨重代价。

1941年7月13日，霍普金斯完成调研任务回到了英国，而且还为丘吉尔和罗斯福自1919年以来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议做好了安排。在罗斯福最新做出的对“中立”一词创造性的扩大解释中，他宣称西半球应当延伸它的势力范围直至冰岛以外的200千米，包括亚速尔群岛在内。北大西洋的大部分都已属于美国的有效海域。帮助英国的护航队穿越整个大洋要比帮助美国自己的护航队明智得多。这是一个与“现购自运”大相径庭的方式。

7月16日，霍普金斯和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花园中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霍普金斯也从中了解到了首相的很多想法。7月19日，霍普金斯在丘吉尔首相的乡间别墅会见了苏联驻伦敦大使亚当·梅斯奇。会谈中，梅斯奇向霍普金斯递交了两份斯大林给丘吉尔的私人回信。这是在未来三年中斯大林第一次向丘吉尔提出在西北欧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想法。丘吉尔则对这封荒谬的信有点不耐烦地做了回复。

7月22日，霍普金斯、梅斯奇、维纳特在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共进了午餐，梅斯奇还邀请霍普金斯访问苏联。7月27日，霍普金斯在配备有广播设备的首相乡间别墅向全英国民众发表讲演。他的讲演是对纳粹德国的严厉抨击，同时也鼓舞了英国人民，谴责了那些孤立主义者。他说，他这次是乘坐一架由20架轰炸机护卫的轰炸机来访问英国的，而这些轰炸机“在落地后将转交给英国政府。这些轰炸机也许会在今晚将炸弹投向布雷斯特、汉堡、柏林，以保卫我们的共同传承。我们的

总统将与贵国首相协力粉碎柏林那个罪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残暴统治”。

罗斯福批准了霍普金斯的苏联之行，而且还请他捎信给斯大林。信中说：“您在会见霍普金斯时就像直面我本人一样。霍普金斯将会把阁下想表达的意思直接转达给我。请允许我表达全美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在捍卫自由时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的敬佩之情。”在解决了意外的签证风波后，霍普金斯于7月29日离开了美国，开始了他危险而又不舒服的24小时远程轰炸机之旅，他坐在未被加热的尾舱座上，先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天后又继续向莫斯科飞行。同行的还有劳伦斯·斯特恩哈特大使，他们将共同在7月31日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晤。

斯大林对霍普金斯总体印象良好。斯大林身着一身朴素的灰色制服，脚上穿着一双油光锃亮、没有任何装饰的皮靴，宽厚的肩膀，健壮结实，但是因为长期吸烟，牙齿略微发黄，大概1.7米左右的身高。他回答问题非常诚恳，毫不矫揉造作，也不急功近利。众所周知，他曾经在德军战事最初爆发时颇受打击，在自己郊外的别墅中醉酒不醒数天之久。

斯大林向美国要求2万门高射炮、100万支步枪、大批量的机关枪及所需燃料和制造飞机用的铝材。最重要的是，斯大林向霍普金斯展示了一种处变不惊的品格和坚定不移的信心，并希望他能把这些一并带给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六周中，面对德军的疯狂进攻，苏军损失惨重，但他依然很自信，掌控着一切。

霍普金斯分别与V·F·雅科夫列夫将军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有关具体军需供应的讨论，但结果都不令人满意，之后他再次与斯大林会晤。苏联领导人估计德军现在苏联有232个师驻扎，有可能增加到接近300个师。尽管到那时会有相当大的损失，但苏联人民还拥有着260个师，在各方协作召集下可能还会达到350个师，将近700万士兵。斯大林认为德军在开始时有3万辆坦克，苏军有2.4万辆，现在双方实

力都有所下降，而苏联的军事状况比德国还要差。在这时，苏联不能“自负盈亏”了，需要美国来帮助他们生产坦克。斯大林考虑到，总体来说，苏联的坦克性能要优于德国。德军在空战设备技术上暂时处于略微领先的地位，但苏军完全可以通过调试改装，从而在性能上超越德军飞机。

霍普金斯的报告包括了一些个人的评价，仅供总统参阅。在这部分，他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同时总结了斯大林给罗斯福的一些私人口信。苏联领导者们讲到，希特勒的失策之处在于，他在被他践踏的土地上掀起了民众的憎恶情绪，在那些被德军占领的国家中又制造出了人为的恐慌，显示出了德军道德水平之低下。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从美国那里可以得到勇气斗志与精神信仰来抵抗希特勒。美国政府及总统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斯大林说他欢迎美国派一支远征军到苏德战线上自主作战（实际上没有人会把这话当回事，除非人们把它作为判断斯大林疯了的证据）。1941年8月1日，霍普金斯从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他表达了自己前线战士有着从未有过的信心：“苏联人民的士气很高，有着无比坚定的必胜信念与决心。”斯大林给他留下了“智能机器”的印象，而且强硬、有决断力、办事高效。

VI

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使日本人着实吃了一惊。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日本一直追求的德日反苏联盟政策受到了遏阻。此条约签订后不久，在诺门坎，苏联人又在朱可夫元帅的领导下果断地在多个师参加作战的边界冲突中击败了日军。五天后，日本平沼内阁辞职。当时，日本已投入了85万兵力在中国展开了无限期的作战。

日本重新调整了它的政策，他们非常勤政的外相松冈洋右则奔波游说于欧洲各国间，试图联合三个轴心国和苏联组织起一个羽翼丰满的四国联盟。作为第一步，他在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协商有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事宜。从而使得斯大林默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

轴心国为他们之间的协调不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希特勒此时则正在策划着袭击苏联的最终步骤。如果德国在此时给了日本人完全的信心，那么也许会在东京身上重新看到前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子，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在远东帮助德国抑制住苏联军队。而这同时会大大削弱同盟国一方的实力，以迫使美国加入与轴心国战斗的行列。

希特勒明白，进攻苏联是他奋斗一生的最后赌注，但让人们不清楚的是，他为什么不联合一个像日本那样既听话而又有一定战斗力的盟国。1941年4月，希特勒在柏林曾告知松冈洋右，他们与苏联的关系日渐恶化，因此对四国联盟的计划已没有了兴趣，但是并不会阻碍日本和斯大林的接触协商。还有一点令人费解的是，希特勒为什么不全力说服日本像自己一样撕毁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呢？由此看来，没能确保与日本联合对抗苏联是希特勒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日本正在逐步推行它的向南扩张政策，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开端，重点瞄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日本75%的石油需求都依赖美国，罗斯福和他那些持强硬态度的内阁成员们，诸如史汀生、伊克斯、摩根索等都对日本野蛮侵略中国的行为极为不满，因此在1940年的夏天便掐断了向日本的石油出口。罗斯福还不知晓，其实从1940年的7月起，它的下属官员们就已经拒绝了日本的石油请求。实际上，罗斯福只是想减少对日的石油出口，而并非完全截断。

美国的石油全面禁运没有明确的开端。1940年12月14日，美国驻日本大使，也是罗斯福在格罗顿时的朋友，约瑟夫·格鲁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私人信件，建议美国应该和日本展开一场面对面的斗争。此时，一次去卡诺萨德的普通旅行，使迪安·艾奇逊决定重新出仕。在接下来1940年的8月，迪安写给《纽约时报》的信中指出："我们的总统有权将驱逐舰派往英国，而无须议会的批准通过。"他还投稿给《巴尔的摩太阳报》，后又经《纽约时报》再次于10月2日发表，这次他表示："目前有一个考验，那就是谁能在文明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下最好地驾驶这艘大船。我们的总统遇到了这一考验，没有人能多问些什么，也没有人敢问。"

罗斯福给艾奇逊写了封回信以示感激，之后艾奇逊又回信说，这是他的一种愉悦也是一种责任去告诉公众："我们的国家有您掌舵是多么的必要啊!"艾奇逊一定是疯了才会重新回到政府，又重新拾起他谄媚的伎俩，而对象却是一个他一点也不喜欢，而且在6年前曾经因为他玩忽职守而将他解职的罗斯福。可事实却是，艾奇逊虽然比较鲁莽，但那次他是毫无罪过的。而后他成了英国的坚定支持者。

罗斯福邀请艾奇逊加盟他的白宫政策战略小组，在此艾奇逊又发表了诸多言论，譬如，他认为民主党人"过于谨小慎微……那些向民众们宣传新政及其相关纲领都不得不与到处蔓延正在威胁人们自由的危险联系起来，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同样存在）。"罗斯福要求艾奇逊将他那些有新意的观点总结成书面的东西，艾奇逊很快便完成了这一文献，其中，他还催促总统不光要重视国内事务的成效，还要有责任"用美国的威力来保护新世界，以免它像那个旧世界一样被恐惧所包围"。

这一切足以让罗斯福确认艾奇逊已经悔悟，而且他的才干是毋庸置疑的。在罗斯福连选成功不久，赫尔再次邀请艾奇逊担任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一职。1941年2月1日艾奇逊宣誓就职。

1941年7月，日本侵占了印度支那南部，罗斯福随后在7月24日便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财产，之后还迁怒于日本的石油购买等一系列在美贸易问题。同一天，罗斯福宣布菲律宾部队整合完毕，并召回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并任命他为新组建的驻菲律宾军队的指挥官。作为驻菲的陆军元帅，麦克阿瑟早已熟悉且适应了当地情况，但这次要完成的却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计划中的重要部分就是将美国新空中堡垒轰炸机初期部队的一半，总共165架B–17驻扎到菲律宾。罗斯福告诉他的顾问海军上将马汉，‘菲律宾不可防’的观点早已不能适用于当今这个空军力量占主导的现代战争。B–17可以到达日本本土，而且还是打破传统均势状态的重要战略因素。

对日本财产的冻结本可以稍微灵活些的。艾奇逊表面上表示，他期待着赫尔和威尔斯协力做出适宜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却在坚决地执行着冻结命令。艾奇逊表示，他正等待着出口控制委员会做出建议，在这之前则会先按照威尔斯的意见，不做任何行动。随后，1941年8月1日，在事先未通知总统的情况下，所有向日本出口原油产品的许可证被无限期地吊销了。这一举动就发生在罗斯福携威尔斯离开华盛顿赴纽芬兰岛与丘吉尔进行会晤几天以前。

之后到了8月，出口控制委员会建议艾奇逊和他的工作小组说，日本应当享有超过50万加仑石油和柴油燃料权利的决定，并告知有两艘日本油轮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彼得等候装载了。对这一决定，艾奇逊那丰富想象力中迸发出的最后的说辞是“无论我们是否准备好对策，事态都会照常进行。”因此，事件就暂时被这样搁浅了，直到总统结束了与温斯顿·丘吉尔的会晤回到美国。

日本从与苏联作战中获得的优势与利益并没有抬高它在西方国家眼中的位置，尤其是在同样不利的条件下，一个小小的芬兰表现得都要出色得多。英国人和美国人低估了日本的战斗力，他们认为只要将

美国太平洋舰队从加利福尼亚开进到珍珠港，再加上丘吉尔准备派往新加坡的大型军舰的支援配合，定会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威慑。

罗斯福和丘吉尔考虑到应当阻止日本加入到侵略苏联的战争中去。正像霍普金斯所坚信的，如果苏联可以抵挡住德国的进攻，那么战争的潮水一定会将希特勒淹灭的。霍普金斯并不是军事天才，但却是个精明的法官。如果美国卷入了战争，那么不论愿不愿意，都要及时地向苏联伸出援助之手，帮其战胜德国的侵略。现在看起来，美国最好是走太平洋这一后门进入战场。

希特勒如果要进攻美国的话，势必要与日本合作。尽管他有可能无视条约义务，但在罗斯福看来，希特勒还是很有可能会遵守这些条约义务的，即使是某个条约中有要求日本部分从中国撤军的规定，因为有些条约义务是会帮助他联合他国向苏联开炮的。

到了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的一举一动对战争方向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开始以来最能给西方各国领导人以希望的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目前筹备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其实早在1919年，两人就曾有过一次短暂会晤，只是那次会面不光使罗斯福大为不悦，而丘吉尔恐怕也已经记不清楚了。

---

1. 维希：法国城市，“二战”时为法国傀儡政府的首都。——译者注
2. 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东部，属希腊。——译者注

第四部分 战争岁月
1941~1944



15
罗斯福总统“将不宣而战”

1941年8月9日到12日与罗斯福总统参加阿根廷会议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向战时内阁汇报说

I

霍普金斯冒着危险千辛万苦重返斯卡帕湾。旅程刚一结束，他就躺在海军上将约翰·多维提供给他的威尔士亲王号舱房里，一觉睡了18个小时。这艘战列舰被俾斯麦号击伤的部位刚刚修补好，而胡德号却被俾斯麦号击沉了。丘吉尔和英国外交使团8月4日启程到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在那里与罗斯福总统会面。当他们动身奔赴这次横跨大西洋的会晤时，丘吉尔首相向罗斯福总统发去电文：“离上次野蛮人发动的那场战争已经27年了，这次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要他们知道‘事不过三’。”

此时，罗斯福也登上了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在5艘驱逐舰护航下动身前往纽芬兰。为了保证出行安全，罗斯福精心制定了种种隐蔽伪装计划，其中包括搭乘他的快艇波托马克号游弋于科德角和秃鹰湾，还让一名船员特意戴着夹鼻镜，抽着雪茄，到甲板上冒充总统以掩人耳目。游艇还发表定期的公告来显示“船上的所有人”都在那里享受着假期。在重重烟雾的掩护下，总统成功地从公众和媒体的视线中脱身。两位领导人都为能提前会晤而兴高采烈，同时，也十分兴奋地盼望与“一位在自由世界拥有与其伟大的威望和统帅能力相符，并且自己对之充满强烈好奇心的伟人”相会。

最初，两位领导人计划率领尽可能少的幕僚进行私下协商。丘吉尔表达了想带上几个军事与外交方面的顾问随行的愿望，以便对他目前所处的战略环境做出一个综合性的概括。罗斯福很快决定，幕僚们可以在两位领导人所定基调的范围内经常发言，这样可以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不久将召开联合会议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自罗斯福成年后，他一直致力于鼓励别人克服悲观情绪。例如，他在青年时期与小儿麻痹做斗争；在大萧条时期，与人们的悲观情绪做斗争；现在则是为了对抗纳粹发动的世界大战而斗争。为了防止意外不测，直到临上船的一刻，他才告诉随员们将要与谁会面。但对于像马歇尔将军、阿诺德将军，以及斯塔克、海军上将金等聪明人来说，这其实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丘吉尔带来了他的幕僚，同时也带上了深受欢迎的作家H·V·莫顿和霍华德·斯普瑞以及摄影师来记录这次会议。罗斯福严令所有出席的记者，包括英舰上的H·V·莫顿和斯普瑞，在会议结束前，未经许可不能发表任何文章。飞机制造部长比弗布鲁克爵士将参加这次会谈，而萨姆纳·威尔斯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接到了罗斯福的指令从伦敦返回。

罗斯福认识到丘吉尔会尽一切努力来加强英美两国间的团结一致，甚至会希望这两个国家组成一个共同体，但是，丘吉尔的某些努力会给罗斯福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罗斯福的舰船于1941年8月7日早晨抵达普拉森夏湾。他的儿子埃利奥特从纽芬兰乘飞机过来，经过当局批准后，也加入了这次会谈。

8月8日，罗斯福安排所有美国代表团成员（除尚未到达的霍普金斯）进行一次会谈的预演，以便在会谈中阐明美国的战略观点。虽然美国当时的官方立场是中立（或含糊的中立），但罗斯福对丘吉尔及他的幕僚可能会发表的发言更感兴趣。8月9日早，罗斯福在写给他表亲玛格丽特·萨克利的信中写道：“全新的英国巨舰威尔士亲王号在两

艘轻型护卫舰的护送下到达这里了。”哈里·霍普金斯一到达就立刻登上奥古斯塔号，向罗斯福做一个对丘吉尔和他的心态的总结性的报告。“在交换登船口令后，上午11点钟，丘吉尔登上了奥古斯塔号。”美国国歌奏响时，罗斯福接受了丘吉尔呈上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写给他的一封对丘吉尔的介绍信。他们两人单独进了午餐，正如罗斯福所说：“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一次破冰之‘餐’。他是一个异常活跃的人，我很喜欢他。”

两边的人马都聚集在奥古斯塔号上共进晚餐。罗斯福右边坐的是丘吉尔，左边是卡多根，双方的随行人员和服务人员围在桌旁。卡多根曾在他的日记中提及他第一次见到罗斯福时的印象：“他无疑是位伟人，那么随和自然，富有魅力。”霍普金斯在餐桌上介绍了关于他这次出访苏联的情况和与斯大林的交谈，对领袖们提出的问题也一一回答，这促使两位领导人下定决心要大规模援助苏联。在宴会上，罗斯福与丘吉尔分别致了祝酒词。随后在丘吉尔发表完演讲之后，英国各部门的首脑们也分别从他们个人的角度发表了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大家讲得都十分精彩且富有说服力。丘吉尔发表了他对战况的概述，听众们不仅包括在场的两国高官，也包括英国的高级官员和美国战列舰上的士兵。

尽管霍普金斯表示苏联战场十分重要，因为在苏联战场上，德、苏直接投入超过500个师的巨大兵力绞杀激烈。但丘吉尔仍然坚持主张，在纳粹统治的边缘地带进行机械化快速反应的战争，例如进行轰炸、封锁并策动起义，即展开具有强大空中优势的拿破仑式的战争。但罗斯福和马歇尔对这种作战方式心存疑虑，认为要想获得胜利就需要至少二三十年的时间。但是丘吉尔坚定的态度给美国的现役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战争必须从西部沙漠和接近苏伊士运河的地区开始。5月份，丘吉尔在与罗斯福的通信中喋喋不休地设想了最坏的境地。而此后三个月中，隆美尔几乎没有往前推进多少。苏联人吸引了德国人的大部分注意力。

对英国来说，出席纽芬兰会议的一项最有趣的发现则是，美国与日本关系的恶化。英国提议对日本发出一个联合的最后通牒，其中要特别提到日本对泰国的侵略，并以此作为宣战理由。双方通过这次会谈都认识到，对日本的最后通牒应该包括那些正在与日本作战的国家，这将促使美国对德宣战也能提早到来。威尔斯对卡多根表示，鉴于美国1940年9月下达了对日本紧缺原材料的贸易禁运，两周前，又对大部分石油实行禁运并对日本在美国财产实行了冻结，他认为，除非日本放弃其侵略东亚的计划，否则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

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对日下达最后通牒的建议，以及更广泛地实施对日贸易禁运的建议。最初，不论是罗斯福、丘吉尔还是斯大林都不希望美国因为要遏制日本而分散集中在欧洲战场上的注意力，渐渐地，罗斯福认识到，美日之间若爆发战争，就必然会很快导致美国与德国的战争。美国公众都希望与日本开战，却又希望保持对德国的绥靖政策。然而不论英国还是美国的领导人，都没有把日本当作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军事强国。

罗斯福只是把日本看作是一个会挑起战争的次级小国，但是公众却与他的观点不同。人们对日本宣战的情绪很强烈，而不是总统希望的先向德国宣战。这使总统对于自己能否把整个国家团结在他的周围没有丝毫把握。总统和他的发言人尽可能地把日本描述为德国纳粹的一个卫星国和爪牙（当然，罗斯福知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但他不得不考虑国内的情况。如果公众舆论、国家利益和道德责任都要求他以坚决的态度来对待日本，这也不失为在较为有利的时机下，团结全国上下提前参战。他不得不面对两种选择的折磨，他一方面渴望与日本政府在放松贸易禁运和减少日本的扩张活动方面进行谈判，以达成一个临时协定使美国有时间发展军备；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在德国人击溃苏联人之前，参加对德战争，并加强对苏联的援助。

日美两国的高层谈判于1941年3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方面派出了国务卿赫尔，而日本方面则派出了海军上将、日本特使野村。

罗斯福很快发现，他的官员们十分热衷与日本的谈判，但他并不打算改变既定的政策。他对于如何与日本打交道有了新认识。1941年9月5日，罗斯福与赫尔共进午餐，讨论目前与日本的谈判。尽管他对此已有认识，而赫尔、威尔斯也发出警告说，对日本的完全石油禁运势必会导致战争，但罗斯福并没有解除完全禁运。

丘吉尔之前准备了一个对日宣言，由英美两国共同向日本提出，声明内容是：如果日本在远东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动的话，可能会迫使美国采取严厉的对抗性方案，最终引发战争。丘吉尔承认，他低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使美国加入战争的绝好机会。罗斯福曾允诺丘吉尔，他会在返回华盛顿时将这个声明加到对日本条款中。但实际上，他并未向日本提出这一声明，而只是加了些满是外交辞令的含混不清的注释。罗斯福要保护的只是美国一国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利益。这一点使英国人感到很失望。罗斯福与日本走得越来越近，而且他也不准备保证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受侵犯。

与日本近卫内阁进行谈判可能会使日美两国达成妥协，但是天皇误把美国的照会看作是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的信号。所有的迹象表明，日本政府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在它的内部，主张与美国妥协的一部分人与主张与美国和英国开战的那部分人斗争十分激烈。

1941年8月10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战争开始以来最珍贵的画面出现在威尔士亲王号甲板上的祷告活动中。罗斯福带着他那特有的庄严和高贵的风貌，在儿子的搀扶下走了很长一段路，从一名皇家海军士兵身边走过。丘吉尔与罗斯福紧紧地坐在一起，坐在4门14英英寸口径回旋炮塔下，他们的幕僚们坐在他们身后。250名美国与英国的士兵混编在一起。两国国旗挂在高架台上，英美两国的军中牧师分享着他

们的祷告词，这征得了丘吉尔的同意。祷告词也是由丘吉尔选定的——丘吉尔一向被认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曾说他不是英国教会的“支柱”而是“支墩”，从外部来支持教会。

国王、总统、军队、纳粹侵略的受害者以及正义行动的能力都是祷告的对象。许多年后，丘吉尔写道：“紧密排在一起的美国和英国的士兵们……分享着同样的书，享受着相似的祷告和圣歌……每一个词都触动人们的心灵。”

罗斯福给每个英国士兵送去了一篮子水果、奶酪、雪茄和其他英国战时很难得到的东西，并以“富兰克林·D·罗斯福，美国三军总司令”的名义表达了致意。这无疑增强了两国之间的团结。

在8月11日的军事谈判会议中，马歇尔礼貌而坚决地反驳了英国提出的如何指挥战斗的提议。他说，飞机应当用于配合装备精良的部队作战，而不是不道德地、不加以区分地对居民区盲目轰炸。没有比英国更能体会到这种方法的邪恶的了。丘吉尔暗示说，美国首先是作为盟友向英国提供物资，而不是加入战团。他几乎不能想象美国的军队和国内领导人可以直接进入战斗。但是马歇尔很清楚地表明，美国方面相信只有用陆地上的力量对德国的心脏地带进行攻击才有可能击败希特勒。他这一观点得到了空中指挥官们的支持。

马歇尔对中东战区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苏伊士运河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重要通道而已。英国从印度到本土的交通线在地中海不可能不受到空军和潜艇的威胁，应该从好望角绕道而行。德国和意大利不是海上强国，不会有效利用苏伊士运河的。应当给予在苏联进行的战争应有的地位和重要性，苏联不仅是一个地缘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国家，也是一个工业强国。阐明他的观点之后，马歇尔礼貌地做出了一些让步，说美国将无条件支持英国。

8月12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及他们的顾问们忙碌了大半天来拟定《大西洋宪章》。丘吉尔起草了基本原则，在关于国际组织的论述部分，他对罗斯福做出了妥协。罗斯福认为丘吉尔提议的国际组织对美国来说是一场政治冒险。他希望建立一个意见统一的，有着比独立主义更加灵活的机制的国际组织。但是，他还不能马上实现这些。

宪章重申了各国的领土主权，反对任何违背人民自由意志与意愿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国家治理模式的自由；谋求帮助被武力剥夺主权与自治权的国家重建自治政权；尊重主权完整；促进贸易和物资的交流；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坚决消灭纳粹势力，把世界从恐惧中挽救出来；实现公海上的自由航行；裁减军备，建立全面安全体系和建立永久性的国际组织。

对于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充满“野心”而又能给人们带来巨大鼓舞的文件。丘吉尔发现，美国正从一个贸易保护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美国人希望不再有任何秘密协议，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几个强国之间产生的修改疆域的协定。

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家把《大西洋宪章》看作是对他们民族独立的支持。但丘吉尔向英国议会保证，这个重要的条款只适用于那些被轴心国征服的国家——“这和进步的英印自治机构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然而没过几个月，罗斯福便公开宣称大西洋宪章是“面向全世界的”。美国可以善意地帮助英国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但这不会用来帮助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

虽然美国的孤立主义者攻击《大西洋宪章》是把美国的主权出卖了给英国，而一些英国人也由于美国不能与德国作战而感到失望，但对整个世界来说，《大西洋宪章》仍然是意义重大的一步。正义与狡诈在这两个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身上得到了充分结合。丘吉尔一向是

个富有责任感而厚道的人，但是在1940~1941年间，他为了寻求与美国的合作，简直变成了一个固执的恶魔。

1941年8月16日，《大西洋宪章》被公之于世。罗斯福在缅因州的小石城告诉媒体“这只是双方交换彼此的观点而已”，“国家没有靠近战争”。

希特勒意识到了《大西洋宪章》将带来的危险，他禁止戈培尔发表它。他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到了英美结盟的趋势。1939年1月，他曾扬言，如果犹太人能成功地挑起一场世界战争，他就会把欧洲的犹太人全部灭绝。他试图以此来威胁美国这个“战争贩子”。希特勒一直坚信：犹太人左右着美国政府。

日本人一直在考虑这个声明，并试图弄清罗斯福最后通牒的真正意义，同时他们也认为，美国石油的停运实际上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宣言。据日本半官方的报刊《朝日新闻》报道，这项声明似乎是盎格鲁–美利坚人企图统治世界的蓝图，而且，他们还试图染指日本的势力范围。

在宪章达成的那一天，众议院仅以一票的优势（203:202）通过了这份文件。总统让众议院议长山姆·雷伯恩对那些支持文件通过的人表达了谢意。这次投票是战术上的成功，总统通过他的游说团说服了那些国会议员不再怀疑并接受了这项议案。

这次投票表明，尽管孤立主义者已被总统打败，但他们仍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这次众议院投票还暗示着罗斯福的思想正在被广为接受。在参议院，宪章更是轻松通过，这也暗示了公众们的主流想法是什么。

大西洋会议于1941年8月12日下午结束。所有人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双方都对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罗斯福和丘吉尔更是建立了极好

的个人关系。丘吉尔在下午3:30登上奥古斯塔号向罗斯福告别。丘吉尔首相载誉而归时，国王乔治亲自到甲板上迎接。5点钟时，在两艘轻型护卫舰和两艘美国驱逐舰护卫下，丘吉尔的威尔士亲王号起航返回。

丘吉尔告诉他的战时内阁“他与罗斯福站在同一战线上”。尽管国会还有些麻烦，但“罗斯福已经下定决心”参加战争。丘吉尔告诉他最亲近的一些内阁幕僚们，罗斯福说“他将参加这场战争，但却不宣布参加”。“罗斯福会‘不宣而战”’。

丘吉尔曾善意警告罗斯福，如果德国人把苏联人打败了，而美国仍未有丝毫参加战争的迹象，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丘吉尔又说，罗斯福十分清楚，他一定要在几个月之内，寻找到一个“事件”以开启战争。

丘吉尔的推测几乎完全准确。对于罗斯福来说，只有观察他的行动才能知道他心里的真实想法。他毫不讳言曾经怀疑希特勒是否会停止其征服世界的狂想而停下来巩固已得成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参战是必要的，但需要时间。当希特勒陷入苏联战事中时，日本开始疯狂对抗美国，而美国要从失业困扰中解脱并加紧训练军队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使得整个国家转到战争轨道上来，从而发挥出美国工业空前的生产能力，发挥强大的海空军力量。罗斯福可能刺激了丘吉尔对美国加入战争的乐观性，而丘吉尔也急切地相信了那些积极的话。但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美国将以自己的轨迹参战。

II

1941年9月4日，在希特勒所宣布的“战争区域”和罗斯福宣布的“泛美安全中立区”的交界点，德国潜艇还是向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开了

火。当时，从冰岛起飞的英国飞机发现了德国潜艇，立即将此消息通报给这一带的美国舰艇。于是，根据罗斯福一年前发布的指令，格里尔号紧紧跟在德国潜艇的后面，用声呐和雷达来测量其位置。就在格里尔号跟踪测量潜艇位置时，英国飞机向德军潜艇投下了四枚深水炸弹。潜艇的指挥官错以为是格里尔号用深水炸弹攻击他们，而且他根本不知这是一艘美国军舰，便向它发射了两枚鱼雷。格里尔号躲过了鱼雷，并以深水炸弹还击，但不久便失去了潜艇的踪迹。

在“格里尔号事件”中，罗斯福按照他的计划再次重申了公海的自由航行权。但正在总统处理“格里尔号事件”过程中，1941年9月7日中午，他的母亲萨拉·德拉诺·罗斯福与世长辞。

罗斯福再次回到海德公园时，他与格雷斯·塔利一起坐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他的新办公室里，从成箱的书本和文件中，找到一只看上去很陌生的箱子。打开一看，罗斯福发现里面放着他的妈妈满怀爱意地收藏起来的有关他的小纪念品。从这些小物件的选择和对它们非常认真的包装上，罗斯福感受到了那份深挚的母爱。在他贴身工作人员的回忆中，那是唯一一次见到他无声啜泣，他还要求自己单独待一会儿。

一开始，罗斯福所了解的有关“格里尔号事件”的信息只是：一艘德国潜艇攻击了一艘美国驱逐舰，并且两者间有了初步的交火。但仅根据这些很难得出德国的船只有侵略行为的结论。不管罗斯福是否知道这一点，他觉得他有了用它来进一步挑拨美国人民反德情绪的口实，而这就是他将近四年以来一直苦心寻求的目标。

1941年9月11日，他向全国和世界发表讲演，将事件的真相加以扭曲，并公开谴责德国的“海盗行为”——在当时世界上，这被认为是难以让人相信的。他还提到了罗宾·穆尔号的沉没其他几艘商船的事故，说这是“国际不法行为”。他说，这种不法行为表明了：“纳粹计划消除这个世界的自由，并且想完全获得对海洋的支配权与控制权……美国

人民不能对之抱有任何幻想。绥靖主义者的所谓希特勒对西半球没有兴趣的低语，所谓宽广的大洋将我们隔开的催眠曲，都不可能长时间对意志坚定、目光长远、实事求是的美国人民起到长期的作用……我们有两大堡垒来保卫美国人：一是我们对德国的敌人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二是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没有什么暴力行为，也没有什么恐吓举动能让我们改变丝毫。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不管这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会在这些防御性水域内保持合法商业航道的畅通。我们准备和希特勒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现在并不想主动挑起战争……但是当你看见一条眼镜蛇摆好进攻的姿势时，就没必要等到它开始攻击再一棒子把它打死。"

罗斯福总统接着宣布，为了保障海上的自由航行，从今以后对于任何进入美国海军视野内的任何德国或意大利的船只和飞机，只要这些船只和飞机"进入美国防务所必须保护的水域"，美国海军可以不加警告直接攻击。同时，他们还要在这些水域为所有其他国家的船只提供护航或保护。罗斯福宣布这一行动是"连续几个月来不断思索、焦虑和祈祷的结果"，并以他惯常的长篇说教做总结，大谈"当一个自由的民族认识到他们的责任时，会感受到自己内在的力量……正直……那些人会在自己的国土上抵抗最近的针对他们的民主、政权、自由的攻击。"

这项声明马上给各方人士造成这样的印象：美德两国紧张关系加剧了。希特勒拒绝了海军上将邓尼茨的建议，后者要求对美国开展无限制的潜艇战。希特勒认为，与美国一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一定要在美国加入战争之前消灭苏联。

罗斯福总统再次宣布了美国的利益范围，又增加了苏格兰岛周边640千米以内的海域。总统下令，对商船队的护航从9月17日正式开始。在北大西洋4/5的区域内，只要有德舰出现在视野之内，美国海军可以无限制地攻击。

9月17日当晚，当着全国的听众，查尔斯·林白又一次发动了对罗斯福总统、英国和美国犹太人的攻击。他对纳粹的反犹现象表示悲哀，并表示理解美国国内犹太人希望纳粹政权倒台，但他还是斥责国内的犹太人不应把美国拖进战争，因为美国只该停留在战争的边缘上。他还暗示说：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本人是英国佬和犹太人操纵的玩偶。

这次讲演利用了美国国民心中最古老的一种恐惧，即对外国殖民势力（尤其对于曾为其宗主国的英国）的忧虑。他（林白）粗鲁的讲演像是一场瘟疫般蔓延开来。罗斯福的在格里尔号事件上的讲演赢得了民众的信赖与爱戴，而通过这件事，林白被认为是一个偏激的煽动家，与他所享有的社会声誉不符，因而受到大家的谴责。一向支持林白孤立主义言论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报纸，也用毫不含糊的语气严厉批评他。赫斯特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还曾想过聘请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丘吉尔）为他的报纸写文章。他甚至试图与希特勒进行一次会谈，希望能够说服希特勒改正其极端仇视犹太人的错误。林白所做的一切尽在罗斯福总统的掌握之中，而其所作所为正中罗斯福下怀，总统对此十分自信。他早知道林白会走这一步。在罗斯福眼里，林白不仅是纳粹主义的同情者和盲目信仰者，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天真幼稚者，一个最终会毁掉自己的人。

1941年10月5日，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打败希特勒比远离战争重要。顽固的极端主义已不再为美国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四年里，美国人民的观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开始的完全避免这场跨洋战争，发展成了现在的支持正义的战争。丘吉尔和希特勒在两个相对方向上推动了美国人民的这一转变，当然，这更离不开罗斯福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大量地援助英国，这使希特勒感到很不安，对德国与美国交战的焦虑，促使他加快了德军在苏联的军事行为，希望在不得不面对英美的联合阵线时，先击败苏联。美国人根本不担心日本的挑衅，在他们心中，日本不像德国那样具有危险

性，并且在美国国内也没有多少支持日本的势力，日本人的组织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美国人对日本文化更是几乎没有什么了解。

罗斯福仅仅把日本当作是一个野蛮、粗鲁而讨厌的国家。他不认为日本会像德国那样毁掉西方文明。美国民众倾向于相信那些讽刺日本人的漫画中所描述的场景。在这些漫画里，日本人被描绘为罗圈腿、长着兔牙的小个子，他们只在中国杀气腾腾地无情屠戮；然而在日本人的眼中，美国人是软弱的懦夫。美国和日本彼此都错误地估计了对方，并贸然地对另一方发动了攻击。

在这个时刻，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结束了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谈。这次会谈主要讨论了如何援助苏联的问题。会谈间，斯大林因为不断向他涌来的德军而焦虑不安。8月间，斯大林曾向霍普金斯保证，俄国军队会在基辅挡住德国人的进攻，为此，他下令部队死守乌克兰首府基辅。但是在这次战役中，苏联军队伤亡了35万人，还有60多万人被俘，损失甚至超过了一年前的法国。9月18日，基辅被德国人攻占，占领军开始了烧杀抢掠。仅在9月底的一次大屠杀中，就3.4万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乌克兰籍的犹太人。

9月底，在与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再次会晤中，斯大林要求英国派军队到乌克兰的前线。8月，他也曾向霍普金斯要求美国派兵出战。但显然，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英国已经处于与德国交战的状态，斯大林的这个要求听起来很不可理解，然而，从斯大林的要求中，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察觉到，斯大林当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刻，德国军队正以每天16千米的速度涌进苏联，9月初雨季来临后，德国人的推进速度也降到了每天8千米，但此时德国人距离莫斯科仅有240千米了。

杰出的德国装甲部队指挥官海因茨·古德里安写道：“每个人都已经受够了这场战争。”10月初，他攻克了奥廖尔·距莫斯科西南只有320千米。他的部队进军速度极快，当他的部队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开进

时，街上的电车依然还在行驶中，但苏联军队的抵抗显然加强了。经过如此惨痛的损失，苏联军队开始熟识德国人的摩托化作战战术了，不像战争刚开始那么不堪一击了。随着天气越来越坏，德国人缺乏必要的物资来使士兵防御苏联恶劣的气候——这是德国总参谋部而不是希特勒的过失。虽然德军也尽力为士兵提供御寒的衣物，但是他们的行军速度慢了下来。

这一时期，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也已抵达莫斯科。苏联正经历一场大搬迁，许多工厂和政府机关也正转移到苏联东部亚洲部分，甚至连在红场广场的列宁的遗体也被转移到了东部。盗抢活动滋生，绝望的情绪也开始蔓延，国内一片混乱，斯大林不得不动用部队去维持秩序。斯大林则和他的战时委员会成员们一起留在了莫斯科。在三个半月的战斗中，苏联人的坚韧程度使德国大为吃惊，并使德国军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战斗中有超过100万的苏联士兵被德军俘虏，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战斗到最后一刻才被俘的。而且苏军很快补充上了军队的人员损失。

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是十分艰辛而充满火药味的。但这次会谈却以皆大欢喜而收场了，双方签订了《莫斯科协议》。在协议中，美国保证在1942年6月30日前向苏联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150万吨物资。英美保证每个月向苏联提供200架飞机和250辆坦克。

III

7月9日，罗斯福给诺克斯和史汀生写信，要他们认真地分析思考：一旦美国加入了战争，为了打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美国应当准备些什么。于是战略物资管理局应运而生，专门负责管理这些事务。总统和他的部长们决心建立一支大部队，包括：一支两洋作战的

海军；一支拥有5万架作战飞机的空军；一支拥有600万士兵的陆军。9月25日，罗斯福收到了对他7月份提出问题的一个全面回复，这个回复是由麦克阿瑟和斯诺克代表海军作战部写出来的。他们在报告中写道：“要想击败德国及其附庸国，美国必须参战。”这份报告上的论述对于太平洋西部和南部地区同样适用，要阻止日本在这些地区的侵略，美国必须参加战争。

他们估计，要想在1943年9月前打败德国和日本，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联盟国家，总共需要约1500亿美元的战略物资。这对于罗斯福总统不足为奇，但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10个月前还听总统说“你们的总统向你们保证，美国不会参加战争”，现在的状况怎能不让他们大吃一惊。

1941年夏秋，战争准备工作继续加快进行，这多亏了杜鲁门领导的委员会。杜鲁门使国防工业的大企业持续进行生产，但他让小企业加入国防物资生产的政策却未取得成功。罗斯福和他的高级顾问从未打算把国防生产分散交给小企业。许多自由主义历史学者都有对罗斯福这一有“缺陷”的措施感到遗憾，但不可否认罗斯福这么做是对的。

杜鲁门和他的委员会认识到：对国防物资生产进行分散经营，不仅会耗费时间、增加双倍成本，而且也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这在许多案例中也是不可行的。杜鲁门委员会在根除买方与供应方之间存在的效率低下和腐败安排上颇有一手。

10月9日，罗斯福建立了一个最高政策委员会，成员包括马歇尔、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B·科南特、史汀生、华莱士和工程师布什。这个委员会几乎从来没有聚在一起过，它的运作是高度机密，它的核心任务则是，汇报在布什担纲领导下的有关可裂变的铀原子核分裂连锁反应的最新进展报告。最高政策委员会只向总统一人汇报。

1939年10月11日，匈牙利科学家里奥·希拉德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并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附上签名，在信中他提到了制造原子武器的可能性。罗斯福同意了这一研究，但是这个过程却断断续续。最开始是由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官员负责，接着又有一个完全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管理这项工作。布什成为国家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负责这项工作。布什决定向总统建议加快这项工作的研究速度。1941年10月，副总统华莱士陪同他会见罗斯福，他是来向总统申请研究经费的。

会谈中，布什提到德国人在研究原子武器方面十分活跃，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取得了多少进展。这次不同于罗斯福以往的作风，他要求这项工作要秘密进行，因为这项工作不仅花费多，而且还难以界定其可实现性。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决定，而罗斯福总统只考虑了几分钟。原子武器的研究经费将由山姆·雷伯恩负责，无需多加解释。他和总统都认为原子武器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极其敏感，不能拿出来讨论。

同日，罗斯福向国会发文，询问是否可以武装商船，并允许他们为交战中的国家运送物资。“我们绝不会允许由希特勒指定我们的船应该在哪里航行。由于《中立法案》的关系，我们对自己的权利一年年地反复重申，但却不被人所重视……但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航海自由，不能允许它被外国强权所干涉。”第二天，10月10日，马丁·迪斯领导的委员会却拒绝通过对苏联的《援助法案》。

一周后，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和其他一些美国舰艇受到德国潜艇鱼雷攻击，11名船员死亡。当时，护航的英国舰队也遭到了“狼群”（德国潜艇的一种战术）攻击。10月27日，罗斯福正在出席美国海军节的纪念活动，听到这个消息，他停止了一切活动，大声疾呼：“射击已经开始了，历史将记住谁第一个开火，然而历史的长河中，问题的关键是谁最后开火——我们美国人将擦干我们的甲板，站在战斗的位置

上。”罗斯福说，卡尼号不仅仅是一艘属于海军的军舰，它也属于这个国家里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罗斯福宣称他有一张德国人的地图，地图显示，德国将把南美分为5个附庸国，并占领巴拿马运河。这个地图实际上是一名英国特工人员伪造的。罗斯福看上去不知道这件事，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出于他全盘的考虑，他是一定要把希特勒描述为对美洲充满幻想和野心的。

第二天，罗斯福宣布他将把苏联纳入接受《租借法案》的国家之中。

三天后，德国的潜艇向正离开冰岛的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发射了鱼雷，并把它击沉，全体船员包括115名美国人阵亡。这是美国第一艘在“二战”中被击沉的战列舰。即使有了如此之多的事故，罗斯福致力于武装商船的《中立法案》还是在参议院以50对37，在众议院以212对194票的微弱优势才得以通过。对罗斯福来说，中立现在只是一块遮羞布，他可以大声地对美国听众说德国元首像个“疯子”，而德美军舰一见面就会交火。但国会的观点不仅落后于总统，也落后于大众舆论。罗斯福对加拿大总理说：“现在对国会提出对德宣战的要求一定会被拒绝。”同日，1941年11月3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美国与各国外交关系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危机，他们将一直保持友好的状态。

Ⅳ

英国副首相、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于1941年10月来到纽约，代表英国出席世界劳工大会。此时，世界劳工大会把总部由瑞士迁到了美国。这是艾德礼对美国进行的第二次访问，第一次是在1907年。艾德礼在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的陪同下，参观访问了海军军港和飞机制造厂。“他对美国高效率的生产能力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艾德礼还访问了华盛顿，并拿出整整一天的时间与罗斯福总统在他的游艇上游弋。“他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同伴，一个健谈机智的伙伴，他有很多想法……他认为美国迟早要与英国联合在一起来挽救世界文明。他对纳粹的本质不抱任何幻想。我想特别值得回忆的是，我们何时并且如何开始讨论战争进程的问题，他拿出了一幅地图，用手指在地图上指出阿尔及尔，说：‘这将是我派遣美军登陆的地方。’这是一种预见，尤其当时许多人认为派遣美军到北非是对美国统帅当局的一种非难。但是，罗斯福曾在海军服过役，他的头脑中，有一幅整个世界的战略形势图。”

1941年秋天，罗斯福还是不得不处理工人罢工的动荡不安局面。一场煤矿行业的罢工在不朽的约翰·L·路易斯的率领下延续到近11月，直到罗斯福11月22日同意进行裁决。

罗斯福还不得不调停铁道工人与铁路公司的谈判，以防止再出现罢工的现象。他很清楚地表明，他不能容忍煤炭生产和铁道运输的罢工。在战争背景下，这两种生产和运输活动一天都不能停止。他感到在11月25日的会谈中，他有必要向丘吉尔再做出保证。

与日本政府的谈判已进行了几个月。日本近卫内阁希望能够避免日美之间爆发战争。罗斯福把这部分外交事务完全留给了国务卿赫尔处理。而赫尔则一反小心谨慎的作风，充分行使了他的权力。

在罗斯福的授意下，赫尔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撤出其全部的侵略军（但是日本可以在中国东北继续行使最高权力），并且正式宣布断绝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否则一旦美国与德国开战，日本就不得不按照德日意三国的协定参加战争。美国作为回报，将充分给予日本贸易自由。但是，罗斯福和赫尔知道，日本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罗斯福使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他在8月17日通知东京，要求他们派一名新大使来华盛顿。这打破了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平衡。但是，这个政策只适用于日本。它并不是在处理任何事情上都有效。

罗斯福把赫尔推到了台前，自己坐在幕后愉快地欣赏着事态的发展。国务卿本人并不想挑起与日本的战争。但他不得不这么做。他提出了“四点原则”，这使得战争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他看上去并不了解完全石油禁运到底暗示着什么。

日本国内只能生产其所需石油的10%；15%的石油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而75%则来自美国。罗斯福停止了对日本的原料供应，而日本正面临战略原料短缺的困境。罗斯福非常清楚这些，并把这些当作筹码，想迫使日本放弃称霸的野心。

1941年10月2日，美国国务院知会日本，除非他们接受赫尔的“四点原则”——即从印度支那、轴心国和中国东北以外的中国撤军，否则不可能达成双方高层会谈。近卫内阁倒愿意从中国撤军，但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出于军事考虑，坚决反对。到了10月17日，近卫内阁便倒台了。这明显预示了太平洋上产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比大西洋上更高。

东京的这些变故，使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感到非常不快。他早就因为没有收到去纽芬兰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会面的邀请而恼羞成怒了。尽管蒋介石的军队无论是在抵抗日本侵略军上，还是在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较量中都连连失利，但他仍声称，他的地位必须是与英国、苏联、美国平起平坐。他现在急切要求英国与美国给予他直接的援助来避免日本侵略昆明并切断缅甸公路。他还要求美国对日本下临时通牒，声明上述任何攻击都可能引发美国参战。罗斯福提出了他的请求，丘吉尔将这些蒋介石向他做的请求转述给他的军事顾问。

马歇尔在11月5日回答说，必须驳回蒋介石的请求。他们怀疑日本近期不大可能会有大规模的进攻，并认为不管怎样，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并不是美国参战的适当借口。他们还认为，对苏联西伯利亚的进攻也同样不具有这种效果。只有在日本攻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或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产油区，又或是当他们逼近澳大利亚或美国本土时，美国才能向日本宣战。

11月5日，马歇尔与斯塔克建议罗斯福不要理睬蒋介石的援助要求，而同一天，日本政府也决定向美国呈上另一份建议书——计划A，如果不成功的话，就拿出最后计划B。如果两个计划都没有被接纳的话，开战的决定将被提交给天皇，12月的第一周就有可能会采取敌对行动。

日本舰队司令已经做了很多关于补救意外的计划并进行了专门训练。他们也制定了制造突然威慑性打击的计划，堪与德国1939、1940和1941年的打击相比。他们和军队里热情的同事们只用了11月一个月来准备在太平洋上大举进攻的大胆计划。他们也成功学会了大不列颠在攻击意大利舰队时使用的鱼雷战略。

11月7日内阁聚会的时候，赫尔提出，日本随时可能在太平洋上发动多方向的进攻。政府里所有成员都认为议会应该授予总统宣战的权力。

同一天傍晚，野村拜访了赫尔在华盛顿的家，让他对计划A先睹为快。11月10日他又在赫尔的陪同下拜访了罗斯福。但是A计划中所保证的“和平与秩序”的评判标准却没有被明确给出，其他几个关键变量也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但是罗斯福和赫尔都毫无疑问地用最糟的情况来对A计划做了判定。罗斯福有礼貌但是坚决地拒绝了A计划。11月7日晚上，赫尔在家中向日本政府表达美国的意思，希望他们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与中国建立一种基于普遍和平与“精神领导”的积极关系。

11月14日，美国人破译了从东京发给野村的信息。其内容是：美国如果卷入欧洲战争，日本将会充分履行“它认为适当”的条约责任。根据设想，这是想要暗示美国的任何参战行为将会被日本抓住作为借口挑起对美战争。

11月17日，前日本驻德国大使来栖前来增援野村，他们一同对总统进行了一次彬彬有礼的拜访。这位大使先生兼海军上将不但个头比野村矮得多，更缺少野村的谦和有礼与幽默感。在赫尔眼中，他那厚厚的镜片后面的眼神躲躲闪闪，看上去十分猥琐卑鄙。后来破译的信息中，美国人发现，野村因自己的使命饱受困扰，但在内心深处，他其实是个诚实而心态平和的人。

罗斯福给赫尔提出了一个提议草案的框架，用以挫败太平洋上的敌对军事行动。当日本特使11月20日带着B计划重返白宫时，这些议案被整理起来，作为呈给日本特使的报告。

根据美国解密部门的分析，东京在提出顽固的B计划条件之时，充分了解美国人完全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罗斯福的反建议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他在11月17日与野村一行会晤后写给赫尔的那几点建议。这一反建议于11月22日以口头形式向日本代表提出。

11月24日，罗斯福也把他的反建议发给了丘吉尔，并且总结道：“它的接受或反对是日本国内政治中的一件大事。我对此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我们全都必须对实在的困难有所防备，可能这些麻烦就在眼前了。”丘吉尔于11月26日的回信中对此做了不甚热情的回答。他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关注。不过，丘吉尔对蒋介石没有多少好感，也不像罗斯福那样对中国的潜力抱有那么大的热情。

实际上，蒋介石的政权极其腐败无能，但是罗斯福对中国的兴趣则在于：战后既非白种又非殖民地的中国人对他所设想的国际秩序的支持。

在听取了罗斯福的口头提议后，野村向东京要求放宽25日的最后期限。东条英机首相勉强把最后期限延迟到了11月29日。中国方面则忙着将美国总统的反建议透露给了新闻界。

罗斯福拒绝取消完全石油禁运，同时也撤销了可以给予日本的最温和提案，此时他其实已经选择了战争。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人真正还在意国际法和道德。

11月25日，罗斯福召集史汀生、诺克斯、赫尔、马歇尔和斯塔克召开了一次战略性会议。在此之前两天，应野村之邀，斯塔克已经与其秘密会面了，野村明确地警告说，如果美国不放松对日本的贸易限制，东条政府将投入战争。据野村说，东条和他那些狂热的伙伴们并不了解美国的军事潜力。次日，斯塔克就对所有的海军司令们发出了明确的警告，警示他们，战争有着一触即发的危险。其中包括大西洋舰队的司令，海军将军欧内斯特·金。

据史汀生回忆，在11月25日的会议上，总统说："我们下周一很可能将要遭到袭击，因为日本人以其发动突然袭击而臭名昭著，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设法使他们打响第一枪，又不至于给我们自己造成太大的损失。"罗斯福在12月1日对哈利法克斯说，如果英国和荷兰在远东遭到袭击，那么美国将会支持他们。而且在12月3日他又确认了他所指的是武力支持。这一次是真的。但是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时，他又告诉丘吉尔和斯大林，如果日本不直接攻打美国本土，他"将很难说服美国人民参战"。

原计划将有165架B–17部署在菲律宾群岛，而事实上只有一半的飞机被安置在那里，该国的防御系统将会遇到极大的难题，但是如果美国人可以确保他们的海上优势的话，防御日本的攻击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考虑到日本海军的规模和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相当，防御起来未必容易。因此，直到罗斯福庞大的海军建设项目完成之前，这都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斯塔克和马歇尔申请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建设菲律宾的防御系统，并做出广泛的战争准备。支持可延续的三个月的暂时解决方案就是这一想法的表现。然而，赫尔刚一回到国会就得出结论，他宁愿回归到“四项原则”的强硬路线上来。罗斯福对此表示认可。并决定以此来取代暂时解决方案。赫尔起草了将在11月26日对日提出的公文，该公文也得到了总统的批准。此时，罗斯福也接到了情报部门的报告，说有大规模军事护航（舰）队从日本出发，前往不明目的地。

英美对苏联在莫斯科的失败感到极大的恐慌。正如斯大林在7月对霍普金斯所说的，美国的参战将给苏联带来不可估量的鼓舞。美国一旦参战，即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沦陷了，苏联人也不会比1812年拿破仑占领莫斯科时受到更大的打击，也绝不会因此被击败。德国即使与日本联手也战胜不了美英苏联合作战。但是，如果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沦陷了，而美国又没有迹象会积极地加入这场战争，那么如果希特勒对苏联提出的条件不比其强加于法国的更苛刻的话，对于苏联来说，就没有什么动力继续坚持这场殊死的抵抗了。

但是，如果希特勒真的把斯大林踢出了战争，对于盟国来说，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希望也就会变得格外渺茫了。

不可思议的密码破译使罗斯福确定了东条英机不会接受甚至是暂时的解决方案。现在已经不再是冷静下来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的时候了。10月16日近卫文磨离职之后，这种可能性就已不复存在。日本不准备撤出中国，而美国在日本撤离之前也不会放松对日本的封锁。

赫尔的新计划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温和的总体原则的阐述，第二部分是这两个政府将要采取的措施的列表。最后部分则包括：日本的军队和警察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以及（同时发表相关声明）不支持除蒋介石以外的一切中国政权（这在实际效果上来说，正如这一计划的作者所知道的那样，是一个没有任何可能被接受的最后通牒）。

11月27日，赫尔告诉史汀生，外交手段失败了。对中、南、西部太平洋的全体美国陆军和海军，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上将再次发出了正式而明确的战争警报。这两份电报都表示，和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了。“在近几天内，日本将发起挑衅。”最可能的水陆目标将是菲律宾群岛、泰国、马来西亚和婆罗洲。

甚至对自己的密友，罗斯福也没有给出任何暗示。在极大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推迟他在感恩节的温泉游览。但是一周后，也就是11月29日，他还是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他明显地感觉到，日本人反对赫尔提出的提案还需要几天时间，趁这几天，他还可以在佐治亚州的松树林和温泉好好休息几天。这儿的温泉水可以让他恢复体力。

赫尔之所以会要求总统立刻回到华盛顿，是因为11月30日晚，东条在东京的公共广场上对大量听众做了一个讲演。他指责美国和英国试图阻止日本完成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这本质上是一种煽动种族主义偏执情绪来支持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他指责英美企图以10亿亚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他们的贪婪。“我们必须通过报复将这些行为从东亚清除出去。”

12月2日，罗斯福要求日本使馆对日本军队在太平洋西部大规模的调动做出解释，并且他在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提到了这一问题。当被问及他是否需要在固定时间内得到答复时，他拒绝回答。因为他认为该问题很“愚蠢”。通常情况下，在这样热情友好的会议期间做出这种暴怒的回答，是很不正常的。而且他补充道：“我们和日本保持着和平关系。我们只是问了一个非常有礼貌的问题，仅此而已。”他试图警告日本，它的军队调动并不是未被发觉。当突然袭击来临时，他有更大的余地来正当地施暴。

12月6日，星期六，英国的空中侦察系统发现了46艘日本军队运输船，在一艘战列舰和多艘小型海军船只的护送下进入了暹罗湾。很明显，一场对泰国或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攻击即将爆发。罗斯福希望是

新加坡，因为如果这样一个明显的战略目标被卷入战争的话，对日宣战的理由就更好找了。

12月6日，他又向日本裕仁天皇发布了相当冗长生硬的电报（因为是赫尔写的）。“大约100年前，美国总统对日本天皇表明了发展一种美国和日本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提议。这一提议被接受了，和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了下来，友谊也随之在两国人民间增长。我们所尊重的国家，通过他们人民的美德和统治者的智慧，已经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并实际上推动了人类的进步。”罗斯福又一次满口豪言壮语。他对近来发生的事件随口乱扯，信口胡言：日本在印度支那布有重兵，“别的对这件事一直关注的国家一定会对之心存疑虑的……并非是防御性的”。

总统总结说：“我强烈地希望陛下能与我一起，在此非常紧迫的时刻，考虑驱散阴云的方法……”

12月8日，罗斯福对国会发表了演说，他提到了攻打马来半岛、泰国或荷兰东部独立区等持续的反美军事行动，这使他坚信，日本侵袭即将发生。

通过神奇的密码破译程序，周六时，美国获取了日方的信息，那是日本官方对赫尔流产的11月26日的计划的回应。下午9:30，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没有出席在白宫的晚宴，而是单独待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日本的回复被分成14个部分，其中只有13个部分被传送过来，并指示野村在第二天等待第14部分。总统海军事务助理舒尔茨带来了打印出来的15页日本回复的前13部分的破译文字，并将它们交给了总统。罗斯福仔细阅读而不做评论，然后就将它们递给了霍普金斯。他和总统表现的一样，只是看而不发表看法。但霍普金斯看完抬起头时，总统轻声说：“这是战争的信号。”

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讨论着除了等待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战争之外还能做些什么。罗斯福坚持要让他们首先开战，虽然这对于美国来说将具有破坏性。他也在考虑动员国内的大众。罗斯福曾试图打电话给海军上将斯塔克，但是被告知他正在国家大剧院观看表演。总统打消了通知他的念头，因为他不想惊动众议院。虽然罗斯福不知道日本会在哪里或是具体何时发动袭击，但是他在12月6日信心十足地就寝了。对于处变不惊的他以及美国来说，战争终于逼近了。

16
我们绝不会放弃，直到他们被教训一顿

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美国国会的演讲，1941年12月26日

I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上午10点30分，罗斯福总统在其办公室里收到破译出的日本密电文，内容是日本对美国上次那些提议的回复的第14部分。电文称："显而易见，美国政府打算与大不列颠及其他国家合谋，以阻挡日本旨在通过缔造亚洲新秩序来建立和平的种种努力。"接着哀叹日本出于善意的努力却遭遇失败，并得出结论：继续谈判已毫无意义。并指示野村和来栖：在东部标准时间1点整将该回复交给美国政府。

这令人不安，因为它暗示与其他行动（可能是军事方面的）相协调。午饭后，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1点40分，海军部长诺克斯打来电话：收到一份无线电报告——"珍珠港空袭。这不是演习"。霍普金斯表示难以置信，并认为一定是经夏威夷转发过来的来自菲律宾的报告。罗斯福当即否定了这种判断。在他看来，袭击珍珠港是战略上的聪明之举，虽然地点有点出乎意料，并且可能有机会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有生力量。罗斯福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已经截获了大量的日本海军电报，并已向整个太平洋周边地区发出了警报，太平洋舰队的战区大本营就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能够击退任何出现在其上空的袭击者。

2点过后，罗斯福给国务卿赫尔打电话。野村和来栖刚抵达国务院候见赫尔的那个房间，并已经请求（与赫尔的会晤）推迟一会儿，直到他们收到正式电文的第14部分（日本使馆的解码设备的效率不如美国海军和陆军的密码解析员）。罗斯福指示国务卿，不要显露出自己已经知道了珍珠港发生的事情。没有证据表明（日本）特使们知道珍珠港那边发生的事，野村当然也不知道。罗斯福告诉赫尔："正式而冷淡地接收回复，然后送客。"赫尔按此命令接待了他们，在象征性地将回复通读一遍的过程中，他让这两个日本人站在那里，接着便当着野村的面冷淡地对回复进行了一番指责："在我50年的公职生涯里，还未见过任何文件像这样充满了无耻的谎言和歪曲……"可敬的野村心情郁闷，但不容他开口作答，赫尔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在这一气氛冷淡的会面发生之时，斯塔克上将给罗斯福打来电话——这是总统在那天下午将接到的众多电话中的第一个，这些电话向他表明了日本给美国太平洋舰队造成损失的程度，并且表明：袭击者完全收到了突然袭击的效果——一些重要的海军主力舰像活靶子一样被击沉。

尽管收到的消息令人震惊，但罗斯福如释重负——他将最终借助无可辩驳的事实促成美国参战。在这样一场针对美国领土的偷袭之后，公众舆论将会联合一致。他也应该很自然地想到了希特勒，即使后者与其日本盟友步调并非完全一致。在罗斯福看来，最大的危险一直在于，日本针对一些与美国没有明确关系的次要目标进行挑衅之后，美国在缺乏公众舆论一致性的情况下与日本——而不是立即与德国交战。

其他一些敏锐的观察家也有同样的信心，并立刻受到鼓舞，其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甚至包括约瑟夫·斯大林。后者此时正得意于德军被牵制在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希特勒和日本人不了解美国那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工业实力，他们显然也没有意识到，与

之交战的那个国家能够将1200万~1500万人口投入战场，这些人装备精良，其指挥官领导有方，而且他们很快就会获得足够的实战经验。

丘吉尔是从收音机的一则新闻报道中听到日本发动袭击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契克斯别墅与艾夫里尔·哈里曼和维纳特大使共进晚餐。丘吉尔曾在1941年11月11日宣称，如果日本袭击美国，英国将在“一小时内”（对日）宣战。得到消息之后，丘吉尔立即离开他的美国客人，前往那座乡间别墅的办公室和通讯中心。维纳特担心他（即刻）要对日宣战，便追上首相，并建议说，他们应该首先确认一下。但丘吉尔事实上是去给罗斯福打电话。总统几分钟之内就接通电话上，他说：“毫无疑问……我们现在需要同舟共济了。”丘吉尔顿时有一种无以言状的如释重负感，他说：“这当然使事情变得简单了。愿上帝与你同在!”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 “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我是不对的。如果我宣布说，有了美国在我们这一边，这对我来说，是最高兴的事情。我不能预言事件的发展如何。我并不擅自以为已经精确地衡量过日本的武力，但是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知道美国已经完全和拼命到底地投入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是的，经过敦刻尔克；经过法国的崩溃；经过在奥兰的那次可怕的插曲；经过入侵的威胁，当时，除了空军和海军以外，我们是一个几乎没有武装的国家；经过那潜艇战的生死搏斗——险些输掉的第一次大西洋战役；经过17个月的孤军奋战和19个月在可怕的苦难中由我负荷的艰巨。我们已经战胜了。英格兰将生存下去；不列颠将生存下去；联邦和英帝国将生存下去。战争会持续多久，或者它会怎样收场，没有人能够预言，而且在这时我也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在我们悠久的岛国历史中，不管我们受到怎样的创伤和毁坏，我们将再次以安全和胜利的姿态出现。我们不会被消灭。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我们在孤立无援时，甚至都不会死亡。希特勒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要粉身碎骨。其余的一切只不过是把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予以适当地运用罢了。据我所见，英帝

国、苏联，现在又加上美国，他们戮力同心，生死与共，具有两倍甚至三倍于他们的敌人的力量。”

众所周知，夏尔·戴高乐对美国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感情上不如丘吉尔那样充满热情，他（在此刻）指出：“战争结束了。当然，战事还要持续几年，但德国人失败了。”

当丘吉尔给罗斯福打来电话时，后者的非正式战时内阁——史汀生、诺克斯、赫尔、马歇尔和斯塔克——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讨论了为确保拉美那些共和国追随美国政策而应采取的措施，并就英国参战的时机进行了反复讨论。英国于12月8日早上对日宣战，而且它已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遭到日本攻击。丘吉尔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后才收到罗斯福的一份电文，后者建议，英国紧随美国之后宣战。哥斯达黎加荣幸地成为第一个对日宣战的国家，时间是在12月7日晚上。

接着，全体内阁开会，讨论罗斯福应该讲些什么——总统已经请求国会于12月8日（星期一）中午12点30分召开一次特别全会。赫尔希望总统发表一篇内容翔实的讲演，讲述错综复杂的美日谈判进程以及日本在谈判中的诡诈。有些阁员呼吁总统同时向国会提出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的请求。罗斯福在一旁听了几分钟，但完全不为这些讨论所动。他已经打定主意：只寻求对日宣战，看希特勒是否会主动采取正式的敌对行动。接着他会简要地集中谈论日本极端过分的背信弃义行径。他将在几天内对全国发表一篇更详细的咨文。内阁会议一结束，罗斯福就向格雷斯·塔利口授那份简短的宣战演说。

整个下午和晚上，有关珍珠港损失惨状的报告不断传来。罗斯福不再有最初的那种如释重负感，他关切珍珠港蒙受损失的程度，对其完全措手不及被动挨打感到愤怒。尽管疲倦，而且有点紧张，但罗斯福完全保持镇静。

他甚至考虑下令保护日本使馆，不想让它被愤怒的示威者洗劫。下午3点左右，白宫与夏威夷地方长官约瑟夫·B·波因德克斯特通电话，后者证实了斯塔克收到的有关珍珠港损失情况的报告。波因德克斯特通话时，第二批日本战机正飞过其头顶上空，他只有在电话上大声叫嚷才能让白宫这边听见。罗斯福听见电话那边传来的敌机轰鸣声，对身边的人说：“天啊，又有一批日本飞机飞临夏威夷。”史汀生和诺克斯则担心日本发动侵略，进攻加利福尼亚。

国会领导人于晚上8点40分到达白宫，包括众议院议长雷伯恩、共和党领导人乔·马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巴克利、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L·麦克纳里（威尔基的竞选伙伴）、孤立主义参议员希拉姆·约翰逊、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以及众议员索尔·布鲁姆。罗斯福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旷日持久的日美谈判以及有关珍珠港损失的最新报告，并严肃地说：“我们损失了驻该地的大多数战列舰。”在众位议员中，康纳利特别想知道，为什么海军面对袭击时“处于沉睡状态”。罗斯福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肯定的是，一直都在充分提醒（他们）。他承诺将进行调查，并指出现在不是进行责难的时候。当前，所有的精力必须集中于将全国引入战时团结并尽快稳定战局、扭转军事上的劣势。

日本人精妙地实施了珍珠港袭击，而美国战区指挥官们对这样一场袭击所做的准备则是不称职的。但盟国领导人都松了口气，甚至连遭遇如此重大军事打击的罗斯福也是如此。这一打击十分严重，如果人们完全了解其程度，那至少在美国扭转战局之前，他作为战时领袖的信誉可能会受到影响。

指挥这次（夏威夷）远征的日本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上将远非兴高采烈。与日本海军的大多数高层指挥官一样，他此前一直建议不要与美国开战。他在美国待过四年，熟知美国国力和民族性格。1919~1921年，山本在波士顿学习英语，并研究石油在海军事务中的应用；

1926~1928年，他在华盛顿担任日本（驻美国）海军武官。美国海军当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他认为那只是一个由打高尔夫球和玩桥牌的人组成的俱乐部，但他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规模和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山本对赢得这场由他取得“开门红”的战争从未抱乐观态度。

在白宫，罗斯福与内阁成员、国会领袖、军事顾问等人的磋商已经完毕，并完成了自己第二天的演讲稿，他余下的事情几乎就是不断接收大量涌入的电文，内容不外是日本的进攻态势和美国的缺乏准备。美国著名新闻主持人爱德华·R·默罗刚从英国归来，他和他的夫人在很久前就被邀请在那天晚上去白宫赴宴。罗斯福希望听默罗讲述一下英国的生活。

默罗夫人（那天）下午打来电话，想证实此次预约是否由于太平洋上发生的事件而被取消了。罗斯福夫妇可不愿取消。埃莉诺说：“我们总得吃饭啊!”这次四人晚餐不太讲究，但它如期进行。默罗夫人于晚餐后离开，但总统请默罗留下。几个小时后，默罗应邀回到椭圆形办公室，与他同行的还有威廉·多诺万上校，后者即将领导新的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

战机整齐地排列在地面，仿佛就是为了便于让日本入侵者消灭——这种耻辱性的毁灭似乎最令美国当前这位武装部队总司令感到不安。他捶着桌子大声叫道：“我们的飞机毁于地面，天啊，在地面!”但给默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罗斯福很镇静，他的目光并未停留在眼下那场可怕的惨败，而是投向了胜利和一个得以重建的世界。

随着珍珠港袭击的消息传来，大批群众聚集到白宫栅栏外。官邸正面的探照灯为他们提供了照明。他们时不时地高唱《上帝保佑美利坚》、《美丽的亚美利加》或其他一些爱国歌曲。罗斯福在午夜12点30分就寝，在不借助药物的情况下睡了个好觉。

12月8日快到中午的时候，罗斯福根据日本陆地和空中进攻的最新情况修改完演讲稿，然后前往国会。

总统简短的演说迅速通过广播传到世界各地——这是他一生中最著名、最成功的演讲之一。他的演说慷慨激昂、雄辩有力，使国人和国会议员们在情绪上产生了共鸣。

> 昨天，1941年12月7日，将称为我国的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空军有预谋的突然袭击。
>
> 在此之前，美国同日本处于和平状态，并应日本之请同该国政府及天皇谈判，指望维持太平洋区域的和平。
>
> 日本空军部队在美国的瓦胡岛开始轰炸一小时后，日本驻美大使及其同僚居然还向美国国务卿递交正式复函，回答美国最近致日本的一封函件。这份文件虽然声言目前的外交谈判已无继续之必要，但却未有威胁的言辞，也没有暗示将发动战争或采取军事行动。
>
> 夏威夷岛距离日本颇远，说明此次袭击显然是许多天前甚至几星期前所策划的，此事将记录在案。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有意用虚伪的声明和表示继续保持和平的愿望欺骗美国。
>
> 日本昨天对夏威夷群岛的袭击，给美国海、陆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遗憾地告诉你们：许许多多美国人被炸死。同时，据报告，若干艘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之间的公海上被水雷击中。
>
> 昨天，日本政府还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袭击。
>
> 昨夜日本部队袭击了香港。
>
> 昨夜日本部队袭击了关岛。
>
> 昨夜日本部队袭击了菲律宾群岛。
>
> 昨夜日本部队袭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人袭击了中途岛。

这样，日本就在整个太平洋区域发动了全面的突然袭击。昨天和今天的情况已说明了事实的真相。美国人民已经清楚地了解到这是关系我国存亡安危的问题。

作为海、陆军总司令，我已指令采取一切手段进行防御。

我们将永远记住对我们这次袭击的性质。

无论需要多长时间去击败这次预谋的侵略，美国人民正义在手，有力量夺取彻底的胜利。

我保证我们将完全确保我们的安全，确保我们永不再受到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危害，我相信这话说出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大敌当前。我国人民、领土和利益正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我们绝不可闭目不视。

我们相信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有无比坚定的决心，因此，胜利必定属于我们。愿上帝保佑我们。

我要求国会宣布：由于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对我国无故进行卑鄙的袭击，美国同日本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讲到最后几句时，总统在其中几处提高了嗓门，以表达全国的愤怒；在整个演讲过程中，议员们适时地给予了阵阵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整个演讲稿只有25个句子——就篇幅而言，是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的两倍。即使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整个演说不到10分钟也就发表完毕了。

演说中最具有持久重要意义的一行文字是："我们美国将完全确保我们的安全，确保我们永不再受到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危害。"罗斯福正在使这个国家致力于保持足够的威慑力量，从而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不敢再公然对它发动攻击。该政策与他11个月前在同一地点对绥

靖‘主义’的竭力鼓吹者发出的警告结合在一起，将成为美国在进入下一个太平盛世时期的战略政策的基础。

美国不会安抚任何在它看来是某种威胁的国家，并且将维持足够的威慑力量，从而使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敢公然对其发动攻击。在战争的狂热气氛中，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简单的原则，但罗斯福的所有继任者都将其尊奉为美国两党一致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固有成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实现人们所拥护的战争目标，但上述原则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实现这类目标方面获得了成功。

（20世纪晚期，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时有发生。在进入21世纪之时，这类袭击达到高潮：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自杀性袭击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珍珠港轰炸中的死亡人数还多20%。珍珠港事件给发动袭击的日本带来严重后果，此后，没有一个国家会公开地将自己与一场针对美国的袭击联系在一起。）

Ⅱ

宣战决议案未经辩论就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分别是82∶0和388∶1。唯一的反对票投自和平主义者、来自蒙大拿州的女众议员珍妮特·兰金。她曾在1917年投票反对战争，支持非暴力原则。

罗斯福现在重点处理的事项是：使全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可能最迅速地扭转战局上，集中于日本的背信弃义而不是美国的缺乏准备上。他在12月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气氛轻松、活泼，看不出与他此前在和平时期举行的679次记者招待会有何不同。当晚，罗斯福对全国发表了战时的首次“炉边谈话”。他敦促人们不要传播或相信未经证实的战争报道，并且敦促大家竭尽所能，除此之外，他重点强调了德国和日本的关系。珍珠港袭击已经过去了48个多小时，柏林的无线电

广播已经就美国人得到了应有的耻辱性惩罚而向日本政府表示了祝贺，但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打算改变他与美国的正式关系。罗斯福开始着手让自己的国家对向德国宣战有所准备。他一直声称，德国像撒旦一样推动日本发动侵略，鼓动日本人犯下暴行。

他的开场白是：“日本在太平洋地区非法地发动突袭，这成为10年来国际道德堕落的顶点。”

“强大而拥有资源的匪徒们狼狈为奸，向全人类开战。美国现在也面临着他们的挑战。”他概括地谈论了日美关系史，讲述了轴心国无端地、“不经警告地”先后对一些国家发动的攻击——从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一直到此前几日发生的所有侵略行径，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动的所有侵略。

他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都遵循同一模式。永远不要忘记，无论是否正式宣战，德国和意大利此刻都认为自己与美国处于交战状态，正如它们认为自己与英国或俄国处于交战状态一样。”“德国还把美洲其余的那些共和国归入与我们同样的类别，也就是敌国。与我们在同一半球的那些兄弟共和国的人民真可以因此而感到荣幸。”

对美国海军遭受损失的程度，总统搪塞而过：“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在进一步的调查结论出来之前，我没有足够的情报，无法精确陈述我们的海军舰艇在珍珠港所遭受的损失。”这样的回答可不坦率。

（美国）在他的这类政策指引下，全速开动了战时生产，并向盟国提供除直接参战外的各种援助，从而“赢得了宝贵的几个月时间”，他对此表示赞赏。“我们的政策以这一基本事实为基石：从长远来看，保卫任何抵抗希特勒或日本的国家，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该政策一直被证明是正当合理的。”于是乎，既然孤立主义者的愚蠢（如奈、希拉姆·约翰逊和已故的威廉·博拉所表现的那样）或无赖行径（如林白甚至是肯尼迪所表现的那样）已经昭然若揭，罗斯福当然会通过

津津乐道地数落他们来获取莫大的额外喜悦——尽管他并没有在这篇演讲中进一步表现出来。战争结束后，就战前那些著名的孤立主义人士而言，只有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能发挥与战前同样的影响力，不过他曾经时不时地与罗斯福总统合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太平洋战争此后的进程来看，罗斯福使其听众对更多前哨基地（包括中途岛）的失陷有了（心理）准备。总的说来，相对于他本人在和平时期的一贯表现，罗斯福在战时显得更加能言善辩："在美国看来，当这个国家为其生存而战时，为国家竭尽全力无私奉献已不是某种牺牲……任何人，无论老幼，在美国陆军或海军中服役都不是什么牺牲；相反，这是某种殊荣。

"对实业家或工人，农场主或店主，乘务员或医生来说，纳更多的税、买更多的公债、放弃额外的利润、在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上加班加点地工作，并不是什么牺牲；相反，这是某种殊荣。

"当此困难时刻，在那些可能即将来临的黑暗日子里，我们会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站在我们一边。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与我们并肩作战。他们所有人都在为我们祈祷。因为我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我们都有作为上帝子民而获得自由的共同愿望。"

接下来的几天里，表达支持的信函雪片般飞入白宫，这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认为自己已与轴心国处于战争状态，并对罗斯福的领导才能充满信心。整个国家，包括其新闻界和各种派别的政治家都认识到，罗斯福已经被证明是勇气十足，远见卓识。当美国面临自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时，作为国家首脑的罗斯福获得了整个国家的支持。

丘吉尔开始躁动起来，久久难以平静，他急着想见罗斯福。而这位美国领导人及其幕僚却不愿将尽快与丘吉尔磋商视为当务之急。他们都了解他在推销自己的主张时所拥有的那份执着以及他与美国战略观点的分歧——美国主张尽可能早地介入西欧事务。美国政府正在着

手将整个国家巨大的资源调动起来，以最大限度地为这场世界大战提供保障，而战事的迅速蔓延迫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承担着巨大压力。罗斯福试图以自己的日程排满为由来委婉地搪塞这位英国领导人急于会晤的请求，接着他又强调安全问题——至于这是否能说服丘吉尔，罗斯福并不抱乐观态度。但罗斯福喜欢且钦佩丘吉尔，两人在阿根夏湾的会晤令罗斯福感到非常愉快。当丘吉尔不愿听罗斯福的劝说推迟会晤时，后者便期盼丘吉尔能够到来，不像他的军事顾问们那样忧心忡忡。

在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中，有这样一个现象：丘吉尔的外交顾问们觉得首相被罗斯福——特别是被罗斯福的信心、政治权威和技巧，以及美国雄厚的实力所吸引，有点头晕目眩了；而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不包括他的外交顾问）则认为，他们的领导人太容易被丘吉尔的滔滔雄辩所说服。双方的次级官员都显得紧张，但却丝毫不担心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会丧失独立性（尽管丘吉尔总能意识到美国的强大）。

罗斯福本不必担心自己需要再动一番脑筋才能到达直接与德交战的目的。当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仍然还待在东普鲁士的德军东线司令部——也就是所谓的“狼穴”。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1941年春访问柏林时，希特勒表示：他将加入日美之间的任何战争，无论战事以何种形式开端。（日方）于1941年11月23日询问德国驻东京大使，在一场由日本挑起的日美战争中，德国是否会加入日本一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于11月28日向日本驻德大使保证，德国会立刻加入这样一场战争。这样的保证显然得到了元首的完全授权。1941年12月4日，里宾特洛甫向日本和意大利方面提出一份条约草案，其中保证：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与美国开战，其他两方将会加入，并不得单独媾和。该条约没有来得及签署，但它表明了希特勒的战略观。

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柏林方面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将会使英国元气大伤，因为日本会攫取英国在远东的利益，甚至可能会侵入印度，而美国则会因全力对付日本而在军事上减少对德国的妨碍。戈培尔在日记中真诚地记录下了这一疯狂的战略误判："整个世界局势已经开始完全转变了。美国现在的处境将使它几乎无法向英国——更不用说向苏联运送宝贵的物资了。"

希特勒至少应该以此作为对美宣战的条件，即要求日本对苏联宣战，从而使苏联将部分军队用于保卫海参崴和西伯利亚，如果是这样，他要么赢得一个反苏盟国，要么迫使罗斯福说服国会对德宣战。日本人在预期中以为德国会提出这一要求，但当希特勒并未提出时，他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想法是：日本全力对抗英美，他单独对付苏联。

在约克公爵号上，丘吉尔的随行人员包括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首席海军军务大臣、海军上将杜德利·庞德爵士，空军参谋长、空军中将查尔斯·波特尔爵士，陆军元帅迪尔，丘吉尔的医生查尔斯·威尔逊爵士，以及租借物资协调员艾夫里尔·哈里曼。八天的航程大都行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他们在船上收到大量电文，其中许多是艾登发给丘吉尔的。

艾登作为丘吉尔的代表，现在正在莫斯科；首相认为华盛顿之行更为迫切，于是派艾登代表他与斯大林会晤。斯大林向艾登提出请求：（苏联）与英国签署一份秘密议定书，苏联据此将获得东普鲁士、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曾在苏芬战争中攫取自芬兰的全部领土以及寇松线——现有苏联–波兰边界以西约320千米的一条苏波分界线。

艾登宣称，在没有与丘吉尔和其他高层同僚协商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同意这样的要求，而丘吉尔还得与罗斯福协商。当在公海上了解到事态发展时，丘吉尔禁不住勃然大怒——他时不时地经常爆发这种

对斯大林的怒气。他的回电由伦敦转发给在莫斯科的艾登，他在其中指出，斯大林的要求严重违背了《大西洋宪章》。他希望任何这类事情都留待“我们赢得战争后，在和会上处理”。

当约克公爵号载着他们横渡波涛汹涌的北大西洋时，丘吉尔拟定了三份以备在华盛顿讨论用的文件，分别被命名为《大西洋前线》、《太平洋前线》和《1943年战役》。相对于美国人在年初的ABC会议上提出的战略观，这些文件的战略视角有很大不同，而且其中的一些要点不切实际。在《大西洋前线》中，丘吉尔承认，迄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被击退。西方盟国“在此事件中没有发挥作用，除了确保我们务必按时送去我们已经承诺的物资供应外。而我们也只有据此才能保持对斯大林的影响，才能将苏联巨大的（战争）努力融入到整个战争中”。

像丘吉尔这样睿智的政治家当然明白，从长远来看，斯大林绝不会只满足于获得物资供应。丘吉尔相当明了，一旦与希特勒的对峙稳定下来，斯大林就会尽其所能地寻求最符合其利益的协议，要么是与德国人（正如他在1939年表现出的那样），要么与西方盟国。而斯大林以巨大人员伤亡为由提出的要价将是一大片领土和（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德国人要么在谈判中，要么在战场上付出这种代价。斯大林不会仅仅为了“融入整个战争”这一荣誉而无休止地承受三大盟国中90%的伤亡。

丘吉尔和罗斯福面临的首要挑战将是防止这一噩梦——斯大林与希特勒单独媾和成为现实。具体方法将是，间接向斯大林展现这样一种前景：三大盟国联手击败并占领德国，苏联在此后的欧洲取得更优越的地位。消除德国这个竞争对手，苏联占领德国部分地区。这些比希特勒所能提供的条件更具诱惑力，也只有这类考虑才能防止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可能出现的单独媾和。第二项挑战则是，在战局发生逆转后，要确保做到这一点，即当斯大林在巴尔干国家和东欧清除德国

帮凶的时候，法国和意大利强大的共产党势力不至于夺取国家政权并投靠苏联。

丘吉尔在这份文件中进一步主张，做出最大努力，使维希当局接受西方对法属北非的占领。丘吉尔承认，此举会导致德国对法国全境实施占领，但这样的占领事实上与维希政权的统治没有多大差别。一位如此伟大的政治家竟然持有这种观点，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与贝当政权不同，德国人几乎可以无穷尽地使其统治变得更加沉重，即使他们不这样做，维希合作者也是宁可继续治理他们那遭人鄙弃的半壁江山，而不愿被剥夺哪怕是表面上的主权。

《太平洋前线》敦促（盟国）尽快集结一支比日本更强大的海军力量。他认为，到5月时，这应该有可能实现。但首相提醒美国不要把过多的力量投入太平洋战区。其实他根本不必担心这一点，因为这也是罗斯福或马歇尔最不情愿考虑的下策。他们总的战略先后次序是：德国是比日本更严重的首要威胁——这并未因最近几日发生的不测事件而被撼动。

第三份文件《1943年战役》引发了另外一些问题。丘吉尔设想把土耳其纳入盟国范畴，但没有提示如何做到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军队大规模对峙于西欧的情形（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极为反感，首相再次流露出对此类行动的热情：两栖（登陆）作战、援助抵抗运动、海上封锁以及通过大规模空袭解放西欧。

美国人持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概念。他们过去只是在被迫陷入战争之后才为打击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敌人而参战。美国为应对某种威胁或为某种挑衅做出反应而开战，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某种均势或某种利益，如发生于欧洲的王位继承战争或其他时代的战争所不断表现出的那样。美国为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开战，这个目标需要尽快实现。美国舆论可以承受一场不计时间或代价的战争，但前提是：为尽快地胜利结束这场战争而穷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丘吉尔的战略观——

在他于约克公爵号上所拟订的第三份文件中得以大致反映——绝不可能得到任何美国政府的支持。

正如曾在ABC会谈中所明确表述的那样，美国将尽快地为成功进袭西欧和突入德国而集结必要的力量。空战、海军封锁，以及占领区人民所能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有所助益，但并没有决定意义。丘吉尔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因此，可以理解，他不愿与德国陆军正面对抗。罗斯福同样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对此充满信心：借助于有近距离空中支持的机械化部队——截至那时为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成功体现的作战模式（主要由德国人实施），战争进程能够大大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人员伤亡却要小得多。在其回忆录中，丘吉尔试图否认他曾对一场渡过英吉利海峡、登陆西欧的重大作战行动没有热情，但这样的否认不大可信。实际上，他会以其全部的雄辩才能和智慧，努力试图将盟军无限期地陷于地中海的战事，并将极力主张登陆挪威和土耳其而不是法国。丘吉尔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直到距离登陆法国还剩几个月的时间——此项行动最终于1944年发动。

III

罗斯福在等待这位显要人物的来访。在此期间，他感激地接受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的保证，即为支持全国备战而暂停那些在正常情形下进行的党派活动。这适用于当美国（在战略上）处于守势之时，以及在它赢得主动权之前。这种保证的好处在于，它将避免恶意诽谤和责难。

他还组建了全国战时劳工局，并接受了劳工及产业界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承诺，即避免罢工和封厂，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他们一直未能就某种有约束力的仲裁机制达成一致，但罗斯福满怀信心

地认定，道义上的规劝、公众舆论、行政命令，以及必要时采取的立法措施，将使整个国家的工业保持正常运转。他的这一判断总的来说是正确的。

此外，为调查珍珠港在遇袭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罗斯福任命高等法院（陪审）法官欧文·罗伯茨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诺克斯于对日宣战的当天就飞往珍珠港，并在返回后证实，该基地当时完全措手不及，应该就此进行某种调查。调查委员会从127名证人那里听取了大量证词，并迅速地于1942年1月24日报告了调查结论。整个调查报告立即公开发表。该委员会得出结论：金梅尔和肖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收到了足够的警报，应该通过先进的侦察手段为防御任何形式的入侵做好准备，并使该基地处于戒备状态。

这是一个相当公正的判定。两人都被解除了指挥权。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接替金梅尔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罗斯福同时任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为美国海军司令，后者成为美国海军中仅次于总统本人的最高长官。

一直以来，形形色色的历史学家极力探究这样一种可能性：罗斯福确切地知道12月7日的袭击将在何地发生，但他故意对当地指挥官隐瞒情报，有意让日本人造成更大的损失，目的在于煽动起有利于投入战争的国内舆论。这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上最无说服力的阴谋论，其牵强程度只有那些围绕1963年肯尼迪遇刺而产生的各种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推论才能与之相匹。日本袭击珍珠港（尤其是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的情况下），这足已使罗斯福达到参战目的——即使没有一个美国人在袭击中丧生。任何对罗斯福执政生涯的考察都表明，他是一个狡猾、诡诈的政治操纵者。但其中并没有任何这样的事例：罗斯福草率对待美国官兵的生命，或者他在国际事务中作秀而不是竭力捍卫国家利益。这些指控没有根据且极其无耻，某些颇有名望的人士为它们提供可信度，这些人当然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信誉。

丘吉尔及其随员于1941年12月22日到达华盛顿。在未来三周里，丘吉尔将访问渥太华，向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说，并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秘密度假5日。除此之外，他都将住在白宫。

丘吉尔把门罗厅变成了一间作战室，墙上挂满了世界各个战区的地图。这触动了罗斯福，他也在电梯间对面的白宫地下室里设立了一间自己的作战室。白宫通常人手充足，但即便如此，丘吉尔的个人生活习惯也给他们造成了一定压力。

1941年12月23日，丘吉尔陪同罗斯福参加后者例行的记者招待会。第二天晚上是除夕夜，他俩将在同一讲台上公开发表讲演。罗斯福是这样介绍丘吉尔的："我的伙伴，我的老相识和好朋友。"

12月26日，丘吉尔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他非常明了：即使是那些美国孤立主义国会议员，对他领导下英国所进行的不屈抗争都心怀钦佩。

他对当前战况的总结涉及意大利人的溃退、苏联人的成功抵抗、大西洋海战取得的进展，以及即将在埃及和利比亚取得胜利的承诺。国会议员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就日本的此次袭击进行了一番详细讲述后，他以雄辩的措辞发问："他们把我们当什么人了？难道他们意识不到吗？我们将坚持与他们对抗，绝不放弃，直到他们被教训一顿——他们和全世界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教训!"与其惯有的做法一致，他以这番说辞暗示英美之间亲密的兄弟之情，并激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

他最后称："我公开宣布我明确而不可违背的希望和信念：在未来的岁月里，英美人民将为他们自身的安全和全人类的福祉而庄严地、公正地、平和地并肩前进。"所有国会议员立刻起立，一致对这位显要的来访者给予热烈的鼓掌，而绝大多数美国大众也反应良好。

1942年1月6日，丘吉尔和他的医生悄悄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棕榈滩度了5天的假。当丘吉尔在享受阿卡迪亚会议（人们对罗斯福与丘吉尔此次一系列会晤的称谓）期间的这一短暂休息时，罗斯福于1月6曰向国会发表了他的国情咨文。他照例措辞雄辩地对盟国的战争目标表示支持，对德国和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番贬斥。他演说中最重要的部分激起了热烈掌声——在他曾对国会发表的几十次演说中，也许这次赢得的掌声最热烈。他阐述了战时生产目标，这些目标是在他与产业界和劳工界领导人协商后亲自设定的，私营部门的目标比原计划有所提高。他在其中承诺：1942年生产6万架飞机，1943年则到达惊人的12.5万架，包括10万架战斗机；1942年和1943年分别生产4.5万辆和7.5万辆坦克；商用船舶在1942年和1943年分别到达600万吨和1000万吨。他提高嗓门、略带感情地说道："这些数字……将使日本人和纳粹稍稍明白，珍珠港袭击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整个国会欢声雷动。众议院议长不得不以锤敲击桌面，要求大家安静下来。

在丘吉尔于1月11日返回华盛顿后，他与罗斯福之间的会议以紧张的节奏继续进行。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区的联军司令部，称为ABDA（这四个字母分别代表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和美国），由英国的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任最高统帅。这一指挥结构后来证明很别扭，但却是成效巨大的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起源。参谋长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国家宣言》将是阿卡迪亚会议取得的两项主要成就。

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有两个总部，分别设在华盛顿和伦敦。英方常驻华盛顿的代表是陆军元帅迪尔，美方常驻伦敦的代表则是斯塔克。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英国的布鲁克、庞德尔和波特尔；美国的马歇尔、阿诺德和金。迪尔是一位非常讲求实效和外交礼仪、善于进行游说活动的人士，他与美国人相处融洽，甚至能与不善交际的马歇尔结下私交。他在1944年11月去世后被葬在华盛顿附近阿灵顿国家公墓

里的名人区，与美国最伟大的战斗英雄们相伴。这表明了他那些驻在国同行们对他的崇敬。

阿卡迪亚会议产生的另一项富有意义的成果就是，先期派遣四个师的美国部队去北爱尔兰完成他们的训练。这意味着爱尔兰共和国向德国人及都柏林政府显示威慑力量。

阿卡迪亚会议于1月14日结束。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丘吉尔乘一架“波音”快速飞机前往百慕大，约克公爵号及其护卫舰正在那里等着首相及其随行。在整个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哈里·霍普金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会议结束时已极度疲劳，又返回海军医院住了两周。

Ⅳ

战况依然对盟军不利。丘吉尔一直宣称新加坡是西方利益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支柱，但它于1942年2月15日被攻陷，英国守军（6.4万人）向日军投降。对丘吉尔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甚至比胡德号、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沉没更为严重。

香港和马尼拉分别于1941年圣诞节和1942年1月2日陷落。丘吉尔曾在华盛顿对奥金莱克于利比亚沙漠发动的攻势充满信心，但它也以失败告终。到2月初，足智多谋的隆美尔将奥金莱克赶回到靠近埃及边境的托卜鲁克。日军以其惯有的高速高效，无情地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展开进攻。1942年2月21日，韦维尔极力要求解散ABDA司令部。麦克阿瑟从此成为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唯一指挥官。（尼米兹则将成为中部太平洋战区指挥官和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从2月27日到3月2日，盟军在爪哇海和巴丹湾遭遇重创，这是他们在战时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海战失败之一。日军以微小代价击沉盟军5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

1941年，面对日军猛烈而无情的进攻，美军继续勇敢地在菲律宾进行防御。美国驻菲律宾的航空部队大多数被消灭。在克拉克空军基地，两个中队的B–17轰炸机在珍珠港事件9小时后就被毁于地面。这成为麦克阿瑟军事生涯中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他在回忆录中牵强地指出，自己只是很晚才意识到，日军的进攻卓有成效；日军抵达时，他部队中的战斗机已经升空，而轰炸机则在起飞时“行动迟缓”。艾森豪威尔则称，麦克阿瑟认为日本会尊重菲律宾的中立。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说服力。

当日军开始进攻菲律宾时，这些轰炸机按计划本应对台湾地区发起攻击，但这项任务被取消了。航空兵部队本应分散部署在棉兰老岛的各个基地。当地航空兵司令路易斯·布里尔顿将军因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而受到惩戒。就这一重大失败而言，麦克阿瑟既非无可指责，也非负有全责。

在1942年12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这一幕时，罗斯福试图通过掩饰来庇护麦克阿瑟。如果盟军没有在珍珠港损失如此多的火力，也没有失去在菲律宾的空中力量，那他们完全有可能对菲律宾实施一次重大援救行动。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判断是，面对日军的一场全面进攻，菲律宾不可能成功扼守。麦克阿瑟完全知道这一结论，因为在他担任陆军参谋长期间（1930~1935年），该结论已经是既定的了。

至此，盟军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发生在珍珠港和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灾难、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沉没，以及意大利对亚历山大港发动的攻击，即便如此，如果美英在1942年2月和3月集合起它们手头上所有的海军力量——如麦克阿瑟所敦促的那样，那么，它们也许能

重新补给吕宋岛上的部队并向过于自信的日军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海战。那么他们输掉此战并因而丧失大多数现存海军力量的概率大概会是50%，尤其是考虑到，日军因为有就近的陆基战机而在实力上大大占优；在击沉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的过程中，日军也显示了极高的战斗效能。

但倘若此项努力以胜利告终，那太平洋和欧洲的战争进程将大大缩短。在中部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用以击退日军的大量人力接着就有可能在1943年年中以后被调往欧洲，那时，盟军在大西洋所面临的德国潜艇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消除了。但不能责怪罗斯福没有就此放手一搏。这会是一场豪赌，而菲律宾本身的价值不值得冒这样的风险。

马歇尔在与麦克阿瑟的通信中解释说，倾全力防守菲律宾风险太大。在当时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所能履行的主要职责将是拖延敌人的推进速度，而他也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

曼努埃尔·奎松在马尼拉湾的克雷吉多尔岛宣誓就职，开始了他作为菲律宾总统的第二个任期。1942年2月8日，他通过军方渠道给罗斯福送来一份非同寻常的电文。奎松显得极度不安，他认为，美英放弃菲律宾是为赢得时间，以确保它们更为关心的太平洋其他地方的防御。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已主动提出给予菲律宾独立——尽管奎松应该知道，他（必须）以极大的怀疑来看待日方的这种主动。

在日本的扶植下，奎松以前的秘书瓦加斯担任了一个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成为卖国贼式的人物，并不断通过电台和传单散布反美评论。这进一步动摇了处于四面楚歌的菲律宾总统。

奎松在电文中提议，由于他认为日本人要做的将是取代美国人而不是专门想占领菲律宾，因此，如果美国不准备尽全力保卫菲律宾，那它就应该给予这个国家完全独立并撤出该国。菲律宾接着将会着手

撤除其全部的防御和军事设施，并宣布中立。而日本（奎松虔诚地希望）也会撤离。

这种设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驻菲律宾的文职及军事领导人弗朗西斯·塞里和麦克阿瑟将军均送来附函，似乎同意奎松的提议。

马歇尔和史汀生于2月9日将这些电文带到白宫。罗斯福立刻意识到，整个想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并且以错误的假设为基础。

他还认识到，若将任何如同奎松那样的建议付诸实施，绝对会被视为美国的某种投降之举。他同意马歇尔的评估，若将盟军所有余下的海军力量孤注一掷地用于一场对菲律宾的远征，这将是不负责任的莽撞之举。遗憾但不可避免的是，菲律宾暂时无法守住。一读到奎松、塞里和麦克阿瑟的电文，罗斯福就即刻说道："我们绝不能这样做。"马歇尔那时及后来都称："我立刻将过去对他的所有怀疑都抛诸脑后……我认定，他是一位伟人。"

罗斯福在回电中指出，驻菲部队可以投降——"在似乎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以及在你认为似乎有必要这样做的情况下……只要抵抗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美国军队就要让我们的旗帜在菲律宾继续飘扬。抵抗日本侵略，直到最后一刻，这一职责和必要性超过我们当前在菲律宾所面临的其他任何责任。因此，在交予你这项最困难的使命时，我充分领会到你也许不久就将会陷入的那种绝望（境地）。在当前这场正在展开的大搏斗中，你以及你指挥部中的美国人能为你的国家做出贡献，任何溢美之词都无法充分表达对这种贡献的赞扬。"

奎松回复说，他将完全遵从美国总统的意愿。麦克阿瑟的回复则是：我的家人和我决定"他们将与守军共存亡。我的计划……包括：在我现在位于巴丹岛的阵地血战到底，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守卫克雷吉多尔岛。我绝不打算放弃我指挥下的菲律宾人或让他们投降"。

华盛顿或东京都未料想到，麦克阿瑟及其继任者乔纳森·温赖特将军能够顽强坚持如此之久。由于日军严密的海上封锁，巴丹岛上的守军饥肠辘辘，疾病缠身，他们在火力上完全处于劣势，不断面临来自空中和地面的猛烈炮火。在坚持抵抗了四个月后，他们最终于1942年4月9日投降。一支骨干部队已经撤离到克雷吉多尔岛上纵横交错的地堡中，并在那里又坚持了四个月。即使是在双方交战的这一初期阶段，日本人也许已经在修正他们最初就对手的战斗意志所做的过低估计了。

根据总统在1942年2月22日直接下达的命令，麦克阿瑟最终于3月10日撤离。当时，为显示日军封锁并非密不可透，他坚持要乘鱼雷快艇而不是潜艇离开。一抵达澳大利亚，他就戏剧般地声称说：“我会杀回去的。”这一承诺鼓励了那些未来得及撤离的人，也打动了公众，并最终得以实现。但它听上去与某种陈词滥调相差无几，以至于在其后数月里，士兵们在上茅房的时候都会调侃地将麦克阿瑟的这句话重复一下。

美国海军没有用潜艇将克雷吉多尔岛上的部队带走，日军从而得以俘获勇敢而不幸的温赖特将军及其手下那些英勇的守军。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这其中的原因尚不清楚。

如历史记录所表明的那样，罗斯福和麦克阿瑟互不信任，但他们相识已久。罗斯福对麦克阿瑟想成为一名涉政将军的倾向有所保留，但他俩有一些共同特征，其中包括：（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外在气质，擅长雄辩和作秀。

麦克阿瑟与马歇尔这两位将军之间具有某种更强烈的竞争关系。他们分别毕业于西点军校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一直在潘兴的参谋部任职，而麦克阿瑟则是一名师级指挥官和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麦克阿瑟不喜欢潘兴及其周围人士。

罗斯福和马歇尔愿意承认麦克阿瑟在战争中的贡献——即使是在战争的这一初始阶段。尽管克拉克机场的飞机被炸成一堆废铁，但他们仍为他的决心所打动——如果必要，他将在妻儿的陪伴下战死疆场。他们对他抵抗日军进攻的坚强决心深表感激。面对更为强大的日本或德国对手，这是西方盟国首次在陆上发起的认真抵抗。

马歇尔雄心勃勃，但并不自大。他开始向国会为麦克阿瑟争取美国荣誉勋章——这样做，显然是马歇尔自己的主意。他于1月底开始着手，到2月底已为推荐麦克阿瑟找到了足够依据；他亲自写了一道对麦克阿瑟赞扬备至的嘉奖令，并在3月24日将它送交史汀生。他之所以提议陆军部长进行核准，乃是因为这会对公众及部队士气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因为我确信，对于该荣誉，麦克阿瑟将军当之无愧”。史汀生、罗斯福，以及国会均表同意。罗斯福于3月25日宣布了此项授奖决定。

1942年2月至5月，盟军在缅甸遭遇了另一场军事溃败。美国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被任命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和盟国驻缅甸部队司令。这些部队完全不听从指挥，而蒋介石的搅和及其对军事战略和缅甸地理的模糊理解又使形势更为复杂。史迪威无能为力，恼羞成怒，最终决定赶在季风来临前实施了一次著名的穿越崇山峻岭的撤退。这支114人的小部队悉数抵达英帕尔[注]，毫无人员损失。

史迪威前往韦维尔在新德里的司令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宣称自己厌烦英国的这种习惯：他们把所有撤退都描述为“战略性的”、“自愿的”和“光荣的”。

他对英军在缅甸的无能感到厌恶，并且根本不相信他们真正愿意帮助中国人。他对蒋介石的印象也好不了多少，认为他腐败、胆怯、无能。蒋介石会令他想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那位著名的“六不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史迪威来自

一个热烈忠实于共和党的家庭，而且他也并不很敬仰自己的那位三军总司令（指总统）。有趣的是，他日记中某些提及罗斯福的部分还显得尖酸刻薄。但他却与麦克阿瑟和马歇尔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尊敬他们，他们则欣赏他的品质。

V

在整个罗斯福当政时期，更具耻辱性的事件之一就是决定将特定军事区域附近的所有日裔美国人拘留起来，该决定于1942年2月19日实施。授权实施该决定的行政命令没有提及具体的种族群体，陆军部长被赋予按自己意愿决定驱赶和拘留对象的权力。但众所周知，这项命令针对的是日裔美国人。在随后采取的行动中，他们几乎就是唯一的实施对象。埃莉诺·罗斯福对此项措施感到极度不安，并将自己的感觉告诉了丈夫，后者没有理会，并且要求她不要再提此事。

加州某些肆无忌惮的政客和记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对此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则是当地对某种即将来临的日本军事进攻的恐惧以及这样一种神话：在最终导致珍珠港袭击的一系列事件中，一直有日裔人士在进行破坏——或者甚至是间谍活动。加州州长库尔伯特·奥尔森和总检察长厄尔·沃伦（在后来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时则是一位民权捍卫者）公开要求陆军部将日裔美国人集中关押起来。另一些受人尊敬的人士也加入到了这类莽撞的鼓动中。瓦尔特·李普曼就在其1942年2月12日的专栏文章中宣称：“事实是，海上的敌人与他们的陆上特工保持着通讯联系。”他以其惯有的那种肯定口吻预言，当“这类相互协调的破坏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加以实施时”，其规模将是巨大的。一直以来，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实：曾有任何这类通讯联系，或是有任何活跃于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特工。

为什么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的袭击完全令美方措手不及，并造成巨大损失？要就此进行解释，简单化的做法就是声称，日本与夏威夷的日裔居民相互串通。珍珠港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而瓦胡岛上有众多的日裔人士。但是，没有对这些人采取拘留措施，也没有发生破坏事件或任何已知的由这些人所从事的谍报活动。美国军队接受日裔夏威夷人的参军要求，他们在欧洲战区还曾有出色表现。

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在2月17日写信给罗斯福警告说可能会发生种族骚乱。1941年12月7日夜，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已有17年之久的J·埃德加·胡佛（他最终会在这一职位干上48年）给罗斯福送去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其中称，调查局有一份列有770名日裔的名单，有必要他们进行拘留和讯问。他提议，一旦总统签署授权令，他将尽快就实施这一措施进行安排。在大家眼里，胡佛从来就不是拥护公民自由权的人士，但他一直反对将整个日裔美国人群体集中关押起来，并认为，就针对公民的起诉而言，必须在具有充分理由的基础上按合法程序进行，且必须是针对个人。

相对于本届政府中历来为左翼人士所崇拜的那些英雄人物——首先就是总统本人，胡佛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要得体得多，但他却并未因此而博得左翼人士的多少信任。胡佛手下的特工曾潜入日本领事馆，并完全掌握了日本在美国谍报体系的总体情况。他确信自己能够对付它，并采取了相应措施。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门都一致认为，他们已经摧毁了一切存在于美国的日本谍报组织。

与许多信奉自由主义大政府的人一样，罗斯福从来都不是一位非常坚定的民权维护者。他曾在1936年私下说道，“任何一个美国籍或非美国籍的日裔”如果被发现在迎候那些造访珍珠港的日本船只，此人就应该被记入“一个名单，一旦出现麻烦，该名单上的人将被首先置于集中营中”。

比德尔承认，“宪法方面的障碍”没有“难倒”罗斯福，即使在顺境中，他也具有某种偏执倾向。罗斯福把这个问题交给陆军部长助理约翰·麦克洛伊处理，此人相对开明，但准备以军事必要性为名从事一切活动。在1942年2月1日的一次谈话中，他信口开河地称，相对于国家利益，宪法不过是“废纸一张”。史汀生让麦克洛伊代表自己（处理该问题），而后者在整个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也乐于如此。

总统于1942年2月19日签署了这项授权将11.05万名居美日侨（其中至少有7万人具有美国国籍）集中关押起来的法令，即第9066号行政命令。该法令允许陆军部长“划定那些任何以及所有人都可以被排除在外的……军事区域”。它还授权陆军部就“任何人进入、停留于或离开（这些被划定区域）的权利”进行批准。到1942年3月中旬，当麦克洛伊对日裔美国人联盟发表演讲时，竟标榜这项法令是一项宽厚而无痛苦的举措，旨在使居美日侨免受种族迫害之辱。

1944年12月，美国高等法院以6票对3票做出裁决：所有这些措施合乎宪法。持反对意见的是欧文·罗伯茨和罗斯福政府的两位前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和弗兰克·墨菲。墨菲谴责拘留政策是种族主义的和非法的，并认为“这与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措施存在某种类似，令人忧虑”。

军方认为，存在发生颠覆活动的危险，如果这样的见解正确，罗斯福是不愿为没有消除这些危险承担责任的。但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并不存在这类危险，但总统收到了各种相互冲突的建议。他采取那样的举措，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此举无助于他的声誉。这是令人哀叹的一幕，而且，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一旦那种歇斯底里的状况得到缓解，就要有条不紊地释放那些年幼、年长者和母亲以及那些被仔细甄别过的成年男性。但大多数人在战争结束时仍然被拘留着。

罗斯福于1942年2月23日发表了“炉边谈话”。在此之前，白宫宣布总统将提及许多外国地名，因此请大家手头备好地图。在全国各地的

书店，要求购买地图和地图册的人群蜂拥而至。有6 000多万美国人倾听了总统的这次讲演，其中80%以上的听众是具备投票资格的成年人。这是他又一次玩弄政治策略。他将最近遭遇的挫折与美国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那场长期斗争相比较，从而使这些挫折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按其惯例，他仍然想象自己是在与听众“对话”，仿佛这是一次互动的交谈。

罗斯福谴责了那些嘲弄美国为战争而付出的努力的失败主义者。其实美国当时（或在此次战争中的任何阶段）并无明显的失败主义言论。他实际上是巧妙地使批评者承担起失败主义者的罪名，正如他曾经将孤立主义者污称为纳粹同情者那样。他以其惯有的灵敏避免预期的批评。

他借助地图讲解了无法守住菲律宾的原因，并提及美国军方长期以来的观点：如果日军进攻，菲律宾不可能守得住，除非最终征服日本本土。他宣称，珍珠港（发生的一切）与菲律宾失守无关。“在日军控制制空权的情况下，（吕宋岛）处于完全包围之中，这才是我们无法派去援军的原因。”他赞扬“麦克阿瑟将军组织的防御，其持续时间之长，大大超过原先的估计；他和他的部下因而赢得了不朽的荣誉”。

他在头一天亲自命令麦克阿瑟撤离克雷吉多尔岛，现在又对他大加褒奖并授予美国最高军事荣誉，并同时结合地理和历史背景进行讲解，所有这些都是某一计划的组成要素——每一要素本身都有其合理性，旨在就菲律宾失守为本届政府开脱并降低（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所遭损失的严重性。“珍珠港袭击造成严重后果，但经由其他一些渠道，它们被不着边际地夸大了。这些夸张的说法最初源自轴心国的宣传家。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美国政府内外的人士不断重复这些说法。”他接着以推心置腹的姿态说：“你们和我都极度蔑视那样一些美国人，自珍珠港事件以来，他们传播或‘非正式地’宣称，太平洋舰队不复存在了——该舰队在12月7日被全部击沉或毁灭……轴心国的

几乎每一家广播电台——柏林的、罗马的、东京的，都直接引用这些美国人在演讲中或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正是他们制造了这些该死的假话。”

他解释说，在所有停泊于珍珠港的各型舰船中，永远退出现役的只有三艘。这是实情，但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三艘中有两艘是战列舰，还有三艘战列舰将丧失战斗力达18至30个月之久。

总统引领他的听众浏览了一番太平洋地区的地图，并赞扬了美国的那些盟友。他对联合国家的原则和目标进行了强调：解除侵略者武装；赋予各民族和人民自决权；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

“生活在纳粹重压之下是什么滋味，欧洲那些被征服国家深有体会。朝鲜和中国人民也切身体会着日本严酷的专制统治。”他号召其听众全身心地致力于战争。

讲演结束后，公众及媒体中涌现出大量表示支持的评论。显而易见，罗斯福又一次在人气和战术方面获胜。从此以后，针对本届政府在援助菲律宾问题上的批评偃旗息鼓了，而有关珍珠港事件的批评则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人们焦急地盼望美国在太平洋上恢复战斗力，终于，在1942年4月18日，他们迎来了复苏的第一个阶段。在一项经罗斯福亲自鼓励而实施的大胆行动中，美国轰炸了东京、大阪、神户和名古屋。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被截获的日本无线电通讯表明，日方几乎是在歇斯底里地报道此事。日本严密控制着通往其本土各岛的海上通道，因此，航空母舰本来是无法深入到距离日本本土这样的位置的——海军航空兵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并在完成任务后返回航母。可供美国使用的最近的机场位于中国境内，但对于陆基轰炸机完成返航来说，这些机场距离轰炸目标肯定是太远了。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罗斯福就询问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是否能够轰炸日本本土。日军往往会对那些可能成为陆上起飞点的地方迅速采取行动，因此不可能按常规实施空袭。罗斯福询问海军上将金，B–25轰炸机是否能够从航母上起飞，飞越日本海去轰炸日本，然后在中国着陆（金声称，该主意源于他的一名作战官员，而文献记录对此没有肯定结论，但罗斯福无疑促进了这个构想）。这样的计划有可行性，但实施起来有难度。总统下令执行该计划，詹姆斯·杜立特上校被任命为此次行动的指挥官。

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率领16架B–25轰炸机从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直扑东京。由于日本海军的巡逻范围超乎美国海军的预计，起飞处与日本本土间的距离比原计划远了320千米。16架轰炸机穿入云霄，除一架飞机外，它们都成功地将自己弹舱内的炸弹投向了指定目标。大多数飞机于夜间飞临中国的非敌占区，但却无法找到预先安排的着陆点，机组人员因而（只得）跳伞。有一架飞机在苏联着陆，还有两架迫降于日本领土。80名机组人员中，71人活下来了，其中4人成为战俘。遇袭的日本城市中，大约有50人死亡，100所房屋被毁。杜立特也因这项非同凡响的功绩而荣获国会勋章。

罗斯福故作神秘地对新闻界说，这次行动的出发点是“香格里拉”——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的神秘天堂。而日本人只好宣称这只是侥幸得手，不可能有第二次。此次行动鼓舞了美国舆论界，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日本的战略。日军总司令部希望将日军所有力量都集中于突入澳大利亚。山本五十六指挥下的日本联合舰队中的那些指挥官则还有这样的打算：在美国海军的制造系统能够弥补珍珠港的损失并使美国海军在舰载实力方面大大领先之前，迫使美国海军进行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舰队交锋。

山本五十六推断，朝瓦胡岛，特别是朝中途岛（夏威夷群岛中最西边的一个岛屿，被山本五十六称为“太平洋的锁眼”）进发，将迫使

美国在不利条件下投入战斗。杜立特的突袭促使日本接受了山本五十六这一派人的主张。他们提出，如果中途岛在日本掌握中，该岛附近的空中巡逻可以截获夏威夷以西大部分区域内美国舰队的动向。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是不可能发动这类空袭的。

日本人不可一世的傲气被挫伤了——丘吉尔下令执行的1940年夏对柏林的轰炸也同样挫伤了希特勒的傲气。那场行动促使德国空军将空袭重点从军事目标（尤其是机场和飞机制造厂）转向人口中心（尤其是伦敦）。

当同盟国团结起来，共同步入1942年春天的时候，双方的命运都走向了转折点。

---

1. 英帕尔：印度东北部城市。——译者注

17
你们为何如此害怕德国人？

斯大林元帅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讲的话，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942年8月12日

I

就国内这条战线而言，总统和国会一直在某些物资（尤其是汽油和轮胎）的配给问题上极其小心谨慎。罗斯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纳特、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以及活跃于各个领域的伯纳德·巴鲁克。1942年9月10日以巴鲁克为主席的这个委员会提出报告，就如何处理配给问题提供建议：实行汽油配给；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汽车限速措施，速度限制为每小时56千米；最大可能地翻新旧轮胎胎面；废除有关橡胶开发的专利限制；在具体实践中，鼓励合成橡胶生产。该委员会的建议被采纳，到1945年时，美国合成橡胶产量与1939年前的世界天然橡胶产量持平。

罗斯福在1942年4月27日向国会——并在次日晚上通过“炉边谈话”向全国陈述了一项全面的经济稳定计划。该计划包括：旨在将税后最高收入控制在2.5万美元的增税措施；冻结缔结商品及农产品价格，冻结工资和租金；加紧销售“胜利债券”；减少消费信贷；广泛地对稀有必需品实施配给。

罗斯福一心想避免战时投机的发生，他决意要使全国人民都为赢得战争肩负重担。“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一殊荣——在遥远的世界各地

与敌人战斗。”该计划就是为没有机会获得这一“殊荣”的那些人设计的。现在关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以及不法致富。失业率在1940年最初几个月里就已经下降到10%以下，在当年的选举日则低于5%。当罗斯福第二个任期快结束时，即1941年1月，失业率几乎为零。1941年的失业率保持在约1%的水平，在未来两年里甚至可能比这个水平更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极有可能发生工资和物价膨胀的危险。就避免这些灾难性后果而言，罗斯福的计划总体上看是成功的。

国会通过了他提出的1942年《经济稳定法案》，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他原来起草的内容。他在立法倡议方面依然保持着那种前所未有的成功纪录。

在该项法案的各种措施中，除特别的税收措施和物价控制外，还成立了经济稳定局，它与其他机构在管辖职权上存在那种常见的相互重叠、模糊不清的情况。在罗斯福的大力说服下，新近被任命为美国高等法院法官的詹姆斯·培尔纳斯离开高等法院，到这一新机构担任领导。培尔纳斯将在距离总统办公室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办公。他可以经常出入总统办公室。

在其“炉边谈话”中，总统没有可报告给大家的胜利消息，他有关战事的总结只限于这样的坚定声明：日军正在为取得进展而付出惨重代价，并面临激烈抵抗——尤其是在菲律宾。

罗斯福最终含糊其辞地承认，他的对法政策需要修正。贝当最近就法国维希政权的总理人选做出了调整，原先担任该职的达尔朗海军上将被皮埃尔·赖伐尔取代。前者反英但并不亲纳粹，后者就是一个叛国者了。在1942年4月28日晚上的讲演中，罗斯福惆怅地提到“我们过去所熟知的法兰西共和国……我们希望，那个国名和那种制度很快会被重新赋予其应享的尊严”。赖伐尔取代达尔朗成为维希政府总理，这促使罗斯福召回他的驻维希大使——莱希海军上将。

作为一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人，罗斯福继承了荷兰人和美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对大英帝国的合法性及道德性所持有的那种怀疑态度。他是一个真正的亲英分子，但前提是美国和英国没有因竞争引发各种问题。一旦这些问题出现，他性格中那种商业竞争意识以及那些敏感的、人民主义的、杰克逊似的东西就会显现出来。罗斯福不想看上去是在为保存和重建各殖民帝国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明白，随着有效的国际组织的建立，自决是未来的潮流。伍德罗·威尔逊的构想是远见卓识，但他在实施这类构想时却无能为力。罗斯福会做得更好，但他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他向丘吉尔提出印度独立问题，但后者情绪激动的长篇大论使他退却了，这可不是罗斯福交谈时惯有的姿态。正如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愉快地写下的，罗斯福没有再在口头上向首相提出这个问题。1942年2月26日，他请哈里曼询问丘吉尔，英国政府对印度目前发生的骚乱有何打算。甘地——一个集圣徒和苦行僧的特色于一身的人物，宣讲这样一种抵制英国人的方式：全体公民的不服从和非暴力手段，并希望对日本人做出某种和平主义的反应——即使日本侵略印度。他在政治上的副手及国大党创始人尼赫鲁则主张全力抵抗日军，但希望能得到某种给予印度独立的保证。此时，就在日本抵达通往英属印度帝国的门户缅甸之时，该帝国内部发生了严重骚乱。

正如丘吉尔极力向哈里曼所指出的，印度情况之复杂，远远超乎罗斯福的认识。在次大陆的3.9亿人口中，有2.55亿是印度教徒，有9 000多万是穆斯林，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严重对立。穆斯林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宁可选择英国统治也不愿被纳入一个独立的、但印度教徒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印度。美国人和印度某些民族主义者怀疑，英国人为保持他们对整个英属印度帝国的控制而人为地使这些分歧变得更加严重。

罗斯福承认自己有这种想法：就独立给予某种承诺，这将激励印度人更加努力地投入战争。丘吉尔指出，印度军队中，穆斯林士兵占了3/4，尽管穆斯林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1/4。他强调甘地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的确令罗斯福非常沮丧，因为总统意识到，甘地的那些斗争手法无法用以反对日本这类野蛮对手。

1942年3月4日，丘吉尔写信给罗斯福："我们正在认真考虑，在此关键时刻，是否应该做这样的声明：战后给予自治领地位以及（如果可取）脱离大英帝国的权利。我们绝不可与穆斯林决裂。"他总结说："我们当然不希望在日本入侵前夕使印度陷入混乱。"他接着在信封内装入支持其见解的信件，它们来自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和英国印度事务局军事部门。

丘吉尔现在开始着手就错综复杂的印度局势对美国总统进行速成教育。出于在当前这场战争中履行军事行动的考虑，他转来一封写自印度总督韦维尔将军的信：不应做战后给予自治领地位的声明。他接着又在当天晚些时候转来其结论与此大体一致的电文——分别发自韦维尔和旁遮普邦长官。

尽管丘吉尔做了此番努力，罗斯福还是在3月10日给他发去一封内容令人惊讶的电报，其中的建议是：应该按某种具有过渡性质的自治领来重新建构印度，其制度安排与《美国邦联条例》类似。1783年至1788年，当美国宪法尚处于准备阶段时，人们依据这些实施起来极不完善的条例来治理刚获独立的殖民地。尽管丘吉尔已向他引述了相反的证据，但罗斯福还是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承诺不久给予独立，这将提高印度军队的战斗素质。他最后相当虚伪地声称："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把我给搅和进来，尽管我的确希望有所帮助。严格说来，此事与我无关。"收到该电文后，丘吉尔对其助手们说，他只对电文中的最后这段评述没有异议。

具有罗斯福那样高度智慧和政治技巧的人士丝毫不该有这种想法——北美那13个殖民地和印度次大陆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哪怕是最细微的：前者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长达7年的、反对英国皇室的起义，但在文化及政治方面与英国类似；后者的人口比北美13个殖民地多150倍，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尽管声称事不关己，但罗斯福内心则是希望丘吉尔“把他给搅和进来”，并主动提议自己不偏不倚地进行斡旋。他想象，自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新的民主国家的教父和助产士，并在此过程中除去大英帝国对该国的统治。

丘吉尔被这封电文搞得不知所措，以至于根本就没有给予回复，尽管他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完整地重述了该电文。正如他本人所记录以及他的随从们所注意到的，丘吉尔时刻将罗斯福的愿望和偏好放在心上——通常带着担忧。一定正是这样的习惯才使丘吉尔受到莫大约束，它并非源于丘吉尔本人与生俱来的某种耐心，而是源于罗斯福所具有的某种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有他才能将英国从这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拯救出来。

他派战时内阁中声名显赫的社工党人斯塔福特·克里普斯去印度，以试图与国大党领导人一起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克里普斯当过驻莫斯科大使，并且是甘地和尼赫鲁的朋友。尼赫鲁愿意接受的底线——实际上是国大党领导层与甘地磋商的结果，是彻底而不容拖延的独立。他们准备为印度防务之需而让一名英籍军官指挥印军，但要求掌握国防部。克里普斯原则上毫无保留地接受印度的独立，且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一个丘吉尔式的帝国主义分子，但他得出结论：由于国大党的顽固不化，他的使命彻底失败，并且电告丘吉尔，他将在4月12日离开印度，踏上返回英国的路途。

丘吉尔在回复中感谢克里普斯做出的努力：“你已经尽责了，你的顽强、坚忍和足智多谋已经证明，英国人是多么希望达成某种解决方案。”这其中的含义更多的是针对罗斯福而不是克里普斯。罗斯福并不

满足于自己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干涉，对克里普斯使命的失败，尤其是对丘吉尔的声明——即英美舆论界都明白，谈判破裂，责任在于印度人顽固不化，罗斯福反应相当消极。他将一封给丘吉尔的电文发往契克斯，在那里度周末的霍普金斯在凌晨3点收到了该电文。丘吉尔和霍普金斯都还没有就寝，霍普金斯读了罗斯福的电文，然后将它递给别墅的主人。接下来的情景就令人头晕目眩了。

罗斯福写道："我遗憾地指出，我无法同意你在给我的电文中提出的观点。这里的总体印象恰好相反，人们几乎普遍持有这样的感觉：尽管印度人愿意将技术、军事以及海军防务方面的控制权托付给有能力的英国当局，但英国政府仍然不愿将自治权让与印度人，这才是造成僵局的原因。"罗斯福接着又重新提及他那不切实际的有关《美国邦联条例》的建议，并且请丘吉尔说服克里普斯，在某种更加灵活的基础上再试一下。

就某些方面而言，罗斯福无疑是正确的。英国人在次大陆统治着近4亿人，而他们从未在那里保留有10万以上的来自宗主国的人士，尽管这在殖民地管理方面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样的统治不可能持续下去。尼赫鲁和甘地表现出那种在丘吉尔看来足以使谈判破裂的不妥协性，毫无疑问，这令他兴高采烈。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就美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而言，罗斯福的判断比丘吉尔的更加准确。不过这终究是一个与美国无关的问题。

英国人正在认真考虑某些新的安排，而且印度政治远比罗斯福所认识到的复杂、微妙得多。在霍普金斯将信函交给他后，他们在两个小时后——凌晨5点才休息，在此期间，丘吉尔气冲冲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针对霍普金斯上司所提建议中的那些含意大发雷霆。

丘吉尔让霍普金斯帮他转发回电，其中包括这样的声明：如果同意国大党的条件，印度领导人将从中东撤回大量印军，从而严重削弱那条战线；他们将会与日本进行停战协定谈判，并将借助日本人来镇

压穆斯林。他无法想象，在此关键时刻，将英美间如此深刻的分歧公之于世，有何益处。如果美国舆论真是处于罗斯福所声称的那种状态，丘吉尔将准备辞职，去“重新享受私人生活”，但他不会按罗斯福建议的方针行事。

4月12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指出，他不打算让其内阁成员看到总统的信函，因为它标有“私人”字样，而且他确信，内阁与他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此关键时刻，如果一切都得被再次扬弃”，他们就无法对“印度的防务承担责任……在这场严酷的斗争到达高潮之时，任何你我之间所存在的类似严重分歧都会令我心碎，且一定会给我们两国都造成深深的伤害”。最终，即便是罗斯福也放弃了，这个问题最好留待战后解决。

在罗斯福于1942年4月28日发表讲演几天后，也就是在杜立特上校对日本发动空袭后不到两周的时间，本次大战中最重要的海战之一打响了。美军在巴丹岛和克雷吉多尔岛坚守了5个月，并在珊瑚海海战中占据优势，在一个月之后的中途岛海战中大获全胜。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这场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有识之士都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还会有异常激烈的战斗，日本也有力地重新发起了向澳大利亚的推进，但美国已经在近距离战斗中击败了敌人，并在太平洋上重新获得海军力量方面的微弱优势。

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德国于1941年在进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时所遭遇的失败，以及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这些都显著表明轴心国在海、陆、空实力方面所存在的局限。

有关美国入伍者缺乏军事能力的那些预言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而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以及山本五十六此前就知道。对一个在战争开始时被打得措手不及的国家来说，其军队在巴丹岛、克雷吉多尔岛、珊瑚海以及中途岛的表现堪称卓越。美国很快就会在世界各地的

陆地、海洋和空中尽情展现其令人目瞪口呆的庞大工业实力。东京惊恐万状，而华盛顿以及整个美国和英联邦则喜不自胜。

Ⅱ

到中途岛海战时，英美之间就何时在西欧登陆而潜藏已久的分歧开始显现为一个重大问题。罗斯福在1942年4月3日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并让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前往伦敦时带上它，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说服英国遵从罗斯福及其顾问制定的大战略。在4月3日的信中，罗斯福提及“建立一条战线，以缓解苏联人的压力，他们现在消灭的德国人和装备比你我的加起来都多。”

在涉及斯大林这个盟友时，罗斯福的动机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令三大盟国都担心的是，德国即将在东线发起无法抵御的强大攻势。希特勒明白，一切都有赖于他是否能在美国全力投入战争前就把斯大林给灭掉。希特勒现在面对斯大林所处的情势与德皇在1917年面对克里孟梭和福煦时所处的情势类似，罗斯福不希望斯大林被击败或与德国单独媾和。仅次于德国在东线全面获胜的噩梦般的场景就是，由于斯大林不再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会为了帮助他而及早地以足够兵员在西欧登陆，他会再度与希特勒合作。

霍普金斯和马歇尔于4月8日抵达伦敦，他们拜访了丘吉尔，后者在原则上对美国的战略初步表示同意。他们于8日晚到唐宁街参加晚宴，丘吉尔东拉西扯地谈了一通形形色色的与眼下这场战争无关的话题（如美国内战），这引起了马歇尔的担忧，也令霍普金斯感到不满。

霍普金斯所担心的是：英国人过去一直担忧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对与日本的战事过于投入，而他们自己现在却对太平洋战场过分专注

起来，急于保住其印度帝国并夺回在南亚和远东的其他利益。但他最终对丘吉尔就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略行动所承担的义务感到满意。霍普金斯和马歇尔于4月12日愉快地返回美国。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在这次的一系列讨论中不是那么坦率。

在他4月17日写给罗斯福的信中，丘吉尔写到，及早横渡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这一构想要服从于增援印缅战场、“防止德日会师”的需要。这纯属无稽之谈，隆美尔正受到阻击，而丘吉尔最近曾多次提及他认为日本无力突入印度。

应罗斯福发出的邀请，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前往华盛顿倾听罗斯福的战争计划。在前往华盛顿的途中，莫洛托夫于1942年5月20日在伦敦逗留，此时，盟国间战略目标的差异已经开始展现出来。莫洛托夫带来一份条约草案，其中提出苏联的边界要与纳粹–苏联条约中所划定的一致。丘吉尔和艾登拒绝了该草案，艾登提出而且莫洛托夫也接受了（得到斯大林授权后）一项不提及边界问题、为期25年的英苏友好条约。

在及早于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丘吉尔闪烁其词。莫洛托夫追问，如果苏联被德国新一轮进攻所压倒，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丘吉尔此时干脆把渡海作战的构想搁置一边，最终又退回到他一贯主张的那套想入非非的计划：封锁、空战、援助抵抗运动，以及在德战区周边实施两栖登陆。莫洛托夫一定将此视为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他离开英国前往华盛顿后，丘吉尔在5月28日电告罗斯福：“我们增进了相互间的亲密关系和良好意愿。”像丘吉尔这样的反共人士是不可能相信英苏间所谓的亲密关系或良好意愿的，因此，即使在战争初期，三大盟国间的某些交往已经笼罩着一种虚假的气氛。

莫洛托夫于5月29日抵达白宫，开始他与罗斯福的首次会晤。在罗斯福看来，莫洛托夫性情冷漠、难以接近。相比之下，即使是一贯不苟言笑的马歇尔将军“也显得是一位妙趣横生的陪伴者”。

霍普金斯曾在莫斯科见过莫洛托夫，他认为后者比那时要和蔼得多。莫洛托夫生硬地问道，是否会于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他指出，苏联渴望这样的行动，因为它会吸引德军的40个师撤离苏联前线。他的理解是，这主要取决于英国人，因为在此阶段，投入大部分人力的将会是英国和加拿大。

罗斯福知道，很久以来，丘吉尔对任何这类登陆行动都没有什么热情。英–美–加军队在海滩上遭遇一场大屠杀，这样的概率远远超过德军在东线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德国人已经部署于法国的军队足以应对西方盟国在1942年所能集合起来的任何入侵势力，因此整个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有极深厚的军事专业知识。

罗斯福把莫洛托夫的问题委托给马歇尔，请他就此作答。马歇尔称，正在就开辟第二战场进行准备，罗斯福则在此时插入说，美国的确希望在当年就开辟这样一个战场。马歇尔认为，这种说法不大慎重，因为这显然意味着将在法国北部登陆，而不是海岸突袭或如丘吉尔所主张的在边缘分散敌军的行动。马歇尔说，西方盟国希望发动这样一场进攻，同时迫使德军与西方盟国进行一场后者将会取胜的空中决战。

但马歇尔告诫说，虽然有可用于这样一场进攻的人力、装甲运兵车和飞机，但没有运输或登陆艇。正如罗斯福1月6日对国会所宣称的，美国具有一年内生产1亿吨商用船舶和近100万吨远洋船舶的能力，但奇怪的是，建造简单而小型的登陆艇总被描绘为难以逾越的障碍。马歇尔声称，他得克服来自海军方面的反对，他们想要的是真正的战列舰而不是登陆艇，他们把登陆艇视为陆军的嗜好。令人遗憾的是，罗斯福没有早点就这个领域施展总统的权威。

关于未来一年里（从1942年7月1日开始）生产的租借物资，罗斯福有一份计划表。它包括800万吨物资，但罗斯福指出，由于运力不足，其中只有半数多一点能够运往苏联。第二天，罗斯福解释说，如

果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即使那一半也会进一步减少，只有约250万吨物资能够被运往苏联。

莫洛托夫开始有点恼火了，他似乎无法理解这其中的困难：经过摩尔曼斯克和伊朗，将数百万吨坦克、飞机、军火、工业物资和一般供应品从美国运到苏联（实际上，美国3年时间里向苏联运去13 500架战机）。罗斯福告诉莫洛托夫，他“不可能既得到蛋糕，又把它吃下去”，莫洛托夫则回答说，他得就某种实实在在的而不是总统“期望”的第二战场得到绝对明确的保证，罗斯福试图巧妙地应付这一要求，但仍然没有给予保证。

他还阐述了自己有关战后国际组织的计划：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将在其中成为世界的“四个警察”。这似乎有助于改善会谈气氛。罗斯福当然明白，而莫洛托夫也敏锐地意识到，1942年不会有进攻西欧的行动，但旨在缓和气氛的同志似的保证仍在继续，莫洛托夫于6月4日返回伦敦。

在伦敦，丘吉尔在玩弄策略上甚至超过了罗斯福。他以这样的承诺来搪塞莫洛托夫：1942年进攻西欧，任何这类大规模行动看上去要显得“合理而明智”——否则这类行动会成为一场灾难。就在莫洛托夫即将返回伦敦之前，英国于5月30日首次出动1 000架轰炸机对德国城市进行空袭，目标则是科隆。双方空战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决定性逆转，而这距离已经过去的不列颠之战的最关键阶段只有20个月。

路易斯·蒙巴顿[注]海军上将是丘吉尔的门徒，并被后者任命为指挥突击行动的负责人。他在6月3日前往美国，英美参谋人员联席会议于第二天举行，此时不断传来中途岛大捷具体战果的消息。

显然，丘吉尔指派蒙巴顿去着手完成一项异常复杂的任务：使英国摆脱进攻西欧的义务。6月9日，蒙巴顿在霍普金斯陪同下拜会了总统，共进晚餐，但令他们懊恼的是，金或马歇尔都不在场。罗斯福对

此深感忧虑：苏联是否有能力顶住德国终于已经发起的那场攻势，他不想集合起1007万美国士兵，结果只是让他们无所事事地静坐于英伦三岛。蒙巴顿详细讲述了登陆艇的缺乏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德国人已经在法国部署了25个师，英国人不明白，如何能在1942年发起一场成功的登陆行动，他们同样难以理解的是，在海滩上遭遇的血腥屠杀以及随之而来的令人蒙羞的撤退，如何能有助于同盟国的——尤其是苏联的事业。这似乎是在为体育家作战行动——盟军在北非的登陆，进行舆论准备。罗斯福说，英国将其所有士兵都派往近东和印度，他可不想在此时将美国士兵派到英国，结果只是代替英国士兵保卫英国本土安全。

令马歇尔感到恼怒的是，日本战败于中途岛，这本来使得敌人抱有的哪怕是最后一丝入侵印度的希望也破灭了，但显而易见，该局面反而增强了英国向印缅战区派兵的决心。金和麦克阿瑟正呼吁大量增加美国陆军部队，以将日军击退并解放菲律宾。与此同时，英国人现在正试图在除英吉利海峡地区——最具实力的一个敌人最薄弱的防守环节以外的世界各地开战，而仅仅在6个月前，他们还一直担心，美国也许会由于对日复仇的迫切性而耽误对德作战。

6月13日，丘吉尔在发给罗斯福的电文中表示自己在5天后来华盛顿，罗斯福对此愉快地予以接受。6月18日，在丘吉尔和新任帝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爵士飞往华盛顿之时，德军正在位于苏联境内的东南战线竭力向前推进，扑向高加索油田，而在西线沙漠地带，德军正向埃及边境进发。

在海德公园，罗斯福和丘吉尔一开始就讨论了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他们同意，美英两国将平等地参与开发计划。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就原子弹的研究和制造而言——如果可行的话，美国将是实施者和出资者。

丘吉尔以不容辩驳的事实陈述了自己就1942年发动渡海进攻所持有的观点，任何这类计划都只会导致盟军令人蒙羞的溃败，这对苏联毫无益处。丘吉尔和布鲁克讲明他们的想法：苏联1941年面临未尝败绩、未遭受重大伤亡的德军所发动的突然袭击，相比之下，1942年的处境要好一些。丘吉尔建议，如果美国没有连英国都没有想到的有关进攻法国的计划，他们就应该考虑一下体育家行动——对法属北非发动的进攻。

罗斯福和丘吉尔乘总统专列返回华盛顿，他们6月20日通宵都在这列火车上。

6月21日下午早些时候，在与丘吉尔交谈时，罗斯福收到一封电报，托卜鲁克的守军已经向隆美尔投降了。3.3万名英国守军向人数少于自己的隆美尔部队投降，放弃而不是摧毁大量润滑油、汽油、航空用油、弹药以及各种物资储备。

罗斯福对此毫无批评或失望之词，而是立刻问道："我们能为此提供些什么帮助？"丘吉尔马上做出回答，请求立刻往中东运去尽可能多的谢尔曼坦克。这是一种刚投产的新型中型坦克，美军也才只装备了几百辆。被罗斯福安排与会的马歇尔说："夺走士兵手里的武器，这样做太残忍。"但由于英国人迫切需要，也只好如此了。在未来几天里，美国将300辆谢尔曼坦克和其他一些军火快速运往埃及，其中一艘货船在百慕大附近遭受鱼雷袭击后，马歇尔重新安排了船上的货物，并派去一艘更快的货船，以确保能迅速交货。这种慷慨——没有一丝责备、不信任或恩赐之意，给丘吉尔和布鲁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隆美尔以闪电般的速度穿越北非，对此，通常的解释是德军拥有空中优势。一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既然英国人能够以上千架轰炸机对科隆那类非军事目标发动空袭，那为何在北非战场提供足够空中支持方面就会如此困难呢？

丘吉尔迅速镇定下来，6月21日下午，在有更多参谋人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情绪激动地发出请求：以进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来补充（而不是替代）对法国的及早行动。马歇尔和其他美国人立即认为这其中另有隐情，他们担心，英国人眼下所提出的是他们长期为之努力的一项行动，即把时间和资源耗费在地中海和印度洋，避免与真正的敌人进行正面的殊死搏斗。在罗斯福和马歇尔看来，英国的战略似乎是：既害怕与德国陆军直接交锋，又希望美国能够出力，帮助他们支撑起那个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大英帝国的骨干。

丘吉尔称，攻占北非将会导致墨索里尼倒台，这使马歇尔觉得自己的担忧得到了证实，即丘吉尔这番言论所表达的（并非尽早对希特勒发起攻击）才是他的真正目标。马歇尔得出结论，丘吉尔打算进攻意大利，这将把希特勒引入意大利，而在这片领土上，所有的优势都在防守者一方；法国的计划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除非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坚决，否则必然改变他们原来的战略基础，先征服日本而不是德国。马歇尔一直准备放弃痛击作战计划——一项实施于法国的分散敌人兵力的行动，以换取英国就1943年全力进攻法国做出保证。马歇尔觉得自己被丘吉尔欺骗了，因此全力以赴地重新推动痛击作战计划，现在形成了某种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僵局。

丘吉尔在艰难中度过1942年夏季——这是他连续第三次在夏季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机。此时，斯大林也再次感到，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被拧得更紧了。但对丘吉尔来说，局势几乎不可能像1940年不列颠之战或巴尔干国家及希腊被征服时那样岌岌可危，也不可能像1941年苏德战争以不利于苏联的局面开始时（大西洋海战当时也正在激烈进行）那样危险。

由于美国沿大西洋海岸采取的反潜措施不够严密，这片海域成了丘吉尔所称的“德国潜艇的乐园。”仅在7月第2周，盟军竟然就损失了40万吨船舶。

隆美尔已经推进到距离亚历山大港不到120千米的地方，在他面前的是英国守卫埃及的最后一道防线。局势非常严峻，马歇尔在7月2日敦促霍普金斯去罗斯福那里，请求总统使全国对盟军在埃及的战败有所准备。罗斯福可不愿听到这样的请求，而且认为，就如何保持公众士气而言，自己没有必要听取马歇尔的建议。苏伊士运河、某种程度上与运河相关的英国统治印度的能力、中东的石油，以及西方和中东世界的宗教发源地的命运，现在都危在旦夕。英国备有应急计划：堵塞运河，使其在6个月内无法使用，即使德国人掌控了它。

德军向苏联腹地大规模推进，已经清除了克里米亚的守军，并正在涌向高加索地区。一旦苏联和中东战线崩溃，这场战争实际上将会变得极其漫长。与两年前的情形相比，英国现在不大可能被征服，甚至也不大会像一年前那样由于封锁而有发生饥荒的可能性。但英国的许多地方都处于近乎崩溃的状态，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苏联盟友也正接近忍耐力的极限。

7月4日，在得知40架A–20波士顿轰炸机在飞往苏联途中停留于伊拉克这个消息之后，丘吉尔向罗斯福请求：是否能够让它们改飞埃及。他表示，即使这样做不可能，考虑到苏联前线面临的困难，自己也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声称“我们的需要非常迫切”。罗斯福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并指出，如果英军在埃及战败，盟军就会丧失经波斯湾而向苏联提供物资的整条运输线，斯大林立刻表示同意。罗斯福还让一批原本给蒋介石的轰炸机改变交货目的地，而蒋介石则没有斯大林那么达观，他要求再次得到这样的保证：西方盟国认真对待中国战场（罗斯福倒是认真对待中国战场，只是蒋介石本人不是那么令他信服）。

III

1942年夏，同盟国三位主要领导人各自都在应对种种严重危机，他们均表现出自己的韧性。英国于7月8日发出通知，他们将不实施痛击作战行动。马歇尔认为，体育家行动是一项毫无理智的计划，因为他觉得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他希望与德国而不是与法国维希政府交战。马歇尔暗示，他宁可为麦克阿瑟发动的进攻派去援军，也不愿为体育家行动提供支援：前者至少是针对一个真正的敌人，而后者在他看来只是不切实际的愚蠢举动，旨在将美国军队诱入并陷在地中海地区。

在7月10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马歇尔使与会者通过了一份提交给总统的文件，文件提议，如果英国不为此毫无保留地承担义务——在1943年以某种令人信服的规模发动跨越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行动，那么美国就应该将战略重心转向对日作战。同样是海军上将，金未必就比达尔朗对英国人持有更多的好感，因此，他对这样的前景欣喜不已：把部队大量投入太平洋战区，打击那个曾给他的海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敌人。

7月11日，这份内含马歇尔有关建议的备忘录被送交给待在海德公园的罗斯福。他往华盛顿打电话，指示金和马歇尔立即把将太平洋战区替换为首要战略重点的详细计划给他送去。由于并不存在这类计划，奉命行事的这两人（即替代方案的倡导者）只得承认，将人员、船舶和物资从大西洋东海岸转移到太平洋西海岸，会耗费大量时间。

马歇尔在此项建议中所体现的任性及战略上的荒谬令罗斯福感到震惊。他并未对自己的陆军参谋长丧失信心，而是认为，提出如此愚蠢的建议，表明这位将军对英国人已经极其恼怒了。他于7月14日告诉马歇尔，他不赞成有关变更太平洋战区战略地位的建议，并将派马歇尔和金——在霍普金斯陪同下，于7月16日前往伦敦，以确保与英国人的关系不至于进一步恶化。7月15日，罗斯福告诉马歇尔和史汀生，撤离欧洲会导致将那一战区（包括中东和北非）拱手让与希特勒，而日

本的战败对他将毫无影响。而且，英国是卓越、勇敢且必不可少的盟友，他们现在处于穷于应付的境地，此刻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并以完全撤军至太平洋相威胁，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派马歇尔、霍普金斯和金去伦敦达成一项各方都会遵守的协议。他们获准可以极力要求实施痛击计划（丘吉尔、布鲁克、罗斯福——可能还包括马歇尔和史汀生都明白，这是一个糟糕的计划），但前提是，他们没能就某种切实可行的、将使美军于1942年在这一战区投入对德军事行动的计划达成协议。

这几位美国代表于7月18日抵达苏格兰。丘吉尔派出自己的专列去接他们，并邀请他们去他的契克新乡间别墅度周末。马歇尔没有理会这项邀请，而是要求将火车直接开往伦敦，他将在那里会见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英国各军种的某些参谋官。

在丘吉尔主持下，讨论于7月20日在唐宁街10号开始。此后的一系列讨论进行得非常激烈，只是在霍普金斯的巧妙协调下，气氛才得以缓和，没有陷入相互责骂的境地。双方最后同意，将在10月发起体育家行动，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岸实施两栖登陆。会议再次就最迟在1943年7月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法国的行动承担义务，尽管所有人似乎都不相信这种承诺会被证明具有可行性。

7月30日的会议最终决定，体育家作战计划将于9月15日启动。马歇尔仍然对有关准备工作设置障碍，其粗暴和狡诈丝毫不亚于此前为他所责备的英国人的这类表现。由于马歇尔的拖延，体育家行动的发动将会比修订后的最后期限晚上两周，直到过了中期选举，而这可能就是罗斯福在众议院丢掉20个席位的原因之一。随着选举日的临近，罗斯福没有就尽早发起体育家行动采取任何措施，也根本没有试图去影响那些纯属军事领域的事务。

罗斯福既安抚了英国人，又压制了自己那位怒气冲冲的参谋长，还制定出一项证明是可行的军事计划，他在这一过程中再次显示了自己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所具有的卓越领导才能。他现在的行为表明，自己也是那类为数极少的领导人之一：无论是在战时或是在和平年代，同样具有非凡的才能，同样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这一点不适用于温斯顿·丘吉尔——和平时期，他不是一位想象力非凡、成就卓越的首相；这一点可能适用于亚伯拉罕·林肯，但这也只是推测。

现在轮到丘吉尔再次显示其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那种令人信服的天赋了。开往北极地区的PQ第17号船队于7月14日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但丘吉尔在当天发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报中指出，运送的600辆坦克中，损失了近500辆。在一年当中的这个时候，由于白昼的影响，几乎无法对付敌人进行截击的战机和潜艇。丘吉尔建议中止北极地区的船运，他给罗斯福送去一份打算发给斯大林的电文的草稿，在其中将把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通告斯大林。

在给斯大林的电文中，丘吉尔要求将三个波兰师开往巴勒斯坦前线，而这曾是斯大林含糊地主动提出过的。丘吉尔就击败隆美尔照例讲了一通乐观的言辞，并最后指出："请相信我，我的同志和朋友，在你所从事的这场伟大斗争中，我们和美国将会为帮助你而做一切有利、有理的事。"

罗斯福在7月15日承认，"给斯大林的这封电文很不错"。在与金进行了一番讨论后，他没有就中止北极运输的决定提出质疑，而是小心谨慎地建议，美国接手经伊朗境内的铁路而实施的运输行动，言外之意就是，完善这条运输线，并通过北极航运重新给苏联盟友运去他们没有得到的某些物资。丘吉尔将电文发给了斯大林，后者则在7月28日的回电中显示出非常严重的对立情绪。他暗示：刚刚结束的有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参加的英美会议已经决定，不会于1942年在西欧发动

一场具有一定规模的登陆行动。斯大林称，对此决定，苏联“无法容忍”。

斯大林的怀疑是对的，因此，丘吉尔和罗斯福所考虑的是，在苏联处于对德战争绝境的情况下，如何将有关决定通知他而又不损害与他的同盟关系。丘吉尔已打定主意去莫斯科，并亲自告诉斯大林，不会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但会以体育家行动取而代之。丘吉尔请求斯大林发出邀请，并暗示，有希望在9月恢复北极地区的运输。7月29日，斯大林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及早前往莫斯科。丘吉尔于8月2日出发，8月4日抵达开罗，8月10日离开开罗经德黑兰前往莫斯科。

哈里曼先于丘吉尔来到德黑兰，以查看经伊朗通往苏联的铁路线。由于担任过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长，他被罗斯福指派到这里就此进行考察：是否有可能通过这条线路给苏联人运送更多物资。哈里曼最终指出，在使用内燃机车而非以煤做燃料的机车的情况下，运输量可以增加两倍多，即从每天3 000吨增加到每天7 000多吨。

丘吉尔和哈里曼于8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抵达莫斯科，在机场受到莫洛托夫的悉心接待，不久就被引领着去“克里姆林宫并首次会见那位伟大的革命首领”。正如所预期的那样，这是一次艰难的会谈，持续了4小时之久。丘吉尔一开始就称，不会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指出，他和罗斯福并非由于可能出现的人员伤亡而退缩，但是把部队消耗在法国的滩头阵地上，这对苏联毫无益处，并会使已经计划好的1943年的战争努力遭到削弱。他称，到1943年春天时，英美将会有50个师可投入进攻法国的行动，其中半数是装甲师。斯大林反问丘吉尔：“你们为何如此害怕德国人？军队就得浴血沙场。”

丘吉尔指出了不可能发动这样一场登陆的原因，他引用一个事实来说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登陆行动所存在的难度：希特勒在1940年一直无法入侵英国。斯大林指出这两种情势的差异，他所列举的是：西方盟国在1942年具有相对更强的实力；德国武装力量被陷入苏联；英

国人民在1940年誓死保卫本土，而法国人民在1942年则会欢迎解放者——这会给发动进攻者造成不同的后果。

当丘吉尔详细描述对德空袭战的规模时，会谈气氛略有改善。他画了一只鳄鱼，并把图画交给斯大林，强调指出（鳄鱼的）“软下腹”——他以此来代表地中海战区。随着会谈气氛的融洽，丘吉尔披露，预计第二战场能够而且将会于10月在北非发起。斯大林毫不掩饰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但他最初对此表示怀疑，不过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且称：“愿上帝保佑这次创举成功!”

他们于8月13日晚11点再次举行会谈。斯大林到来后交给丘吉尔一份备忘录，它表面上是前一天晚上有关讨论的总结，但事实上则是重复这样的指控：英美背叛了苏联，后者曾指望它们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以此制定了自己的计划。他指责西方盟国坐视苏联单独与德国交战，故意在提供物资方面打折扣，在首先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后才移交不那么充足的物资。

丘吉尔本可以雄辩滔滔、理由充足地回应这些责难，但他克制住了。他着重指出的是他本人以及他的国人在面临德国武力胁迫时的经历。丘吉尔称，英美已经做出了决定，不会改变。斯大林突然站了起来，将叼在嘴里的烟斗取出，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并举手示意，然后称：“你的言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精神。”斯大林实际上放弃了对丘吉尔的恶意攻击，并邀请他在第二天参加晚宴。

丘吉尔给罗斯福发去电报，全面讲述了自己在8月13日与斯大林的交锋，电文中附有斯大林的备忘录以及丘吉尔的有关答复。丘吉尔在电文中回忆说：“他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在我离开时向我伸出手来，我接受了。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我要参加今晚的晚宴……我经过考虑后认为，斯大林内心还是知道，我们是正确的。”

8月19日，5 000名加拿大士兵在法国实施了一次小规模的、类似于“痛击”的登陆行动。在为时一天的行动中，伤亡或被俘人数达3 700人。官方人士声称，通过这次行动，弄清楚了有关登陆艇类型等有价值的信息，但事实上这是一次血腥的惨败，而且具有警示意义：除非在西北欧发动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大规模登陆，否则就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美国军事参谋人员压根儿就不赞成火炬作战行动（为了保密，北非作战行动的名称已从“体育家”改为“火炬”），由于他们的拖拉、诡辩，该项作战计划制定缓慢。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负责此次行动的指挥官，他以讲求实效的调解精神来执行自己的任务，这种工作作风将使他在自己取得辉煌成就的一生中受益匪浅。

接近52岁的艾森豪威尔来自一个贫穷但受人尊敬的家庭。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一直是麦克阿瑟和马歇尔的门徒，尽管在更大程度上忠于马歇尔。他属于马歇尔而非麦克阿瑟的那个派别，前者强调军事组织能力和军事外交，而后者则是一个自负、哗众取宠但又才华横溢的战场及战区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的首要任务就是与其英国盟友一起建立某种整合的指挥结构，他极其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

马歇尔及其参谋人员坚持认为，美国部队应该进行一次全面的两栖登陆演习，这样一来，登陆行动就会拖延到11月。从某种意义上看，“火炬”是某种受灵感启发而做出的选择，因为这样一来，美国部队将会通过进攻维希军队开始自己的实际军事生涯，而这个对手的抵抗预计不那么强烈。罗斯福一直旨在使维希政权赢得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希望以此来证明它的正确性：说服贝当及其部长们，火炬行动更有利于法国的利益。要说服这位年过八旬的老元帅感谢人们夺取他那个傀儡帝国余下的大部分领土，即使是对一个具有罗斯福那样的魅力和权力的人而言，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但如果让初出茅庐的美军直接与久经沙场的德国人交锋，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是否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登陆，这是引起美英双方广泛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将战事集中于摩洛哥，在某种程度上开进地中海地区和阿尔及利亚西部；英国人则希望进发到阿尔及利亚东部边界更接近于突尼斯的地方，以尽可能凶狠地打击隆美尔非洲军团的基地。

丘吉尔在8月27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称，马歇尔最近旨在从规模上削减火炬行动的举动“令我们所有人都深感不安”。他提醒罗斯福，自己刚对斯大林做出承诺：火炬行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德军兵力；他强调该行动的主要战略价值——从背后打击隆美尔，斯大林曾即刻意识到这一点。丘吉尔的印象是，艾森豪威尔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因此他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予以考虑。如有必要，丘吉尔准备为攻占阿尔及利亚东部提供人力。

8月28日，罗斯福请马歇尔和霍普金斯到白宫共进午餐。罗斯福简要谈了一下他本人及丘吉尔所关注的事项，接着听取了马歇尔就这些事项进行的解释：需要进行某种适当的演习以训练那些刚征召入伍的士兵；由于手头资源有限，必然就要减少登陆的目标区域。

罗斯福认为，无论是实质内容或是表达方式，马歇尔的答复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他非常崇敬自己的这位陆军参谋长，但他不容自己以及本国最重要盟友所关切的事项被如此随意地轻视。至于给丘吉尔的答复，霍普金斯和罗斯福重新拟订了马歇尔的建议，并在那时提出一项妥协方案。他们认为，英国士兵登陆时会引起法国人抵抗，而一支纯粹由美国人组成的部队则可能不会。美国拥有的资源只能用于两场登陆，其中一场必须是在大西洋沿岸。

丘吉尔在9月1日答复说，推迟阿尔及尔登陆将会使德国人先于盟军到达那里，而且，他反对这样的计划重订：登陆时间被确定无疑地推迟到11月。

罗斯福于9月2日又回到原有的立场，主动提出同时发动三场登陆：一支由英美士兵混编的部队在阿尔及尔登陆，而纯粹由美国人组成的部队则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登陆。罗斯福准备告诉维希政权，英军只是在前去与驻突尼斯德军交战的途中路过法属北非。由于总统对维希政权已经算得上仁至义尽，这样的解决方案很得体。

罗斯福在他手下的参谋长们与英国和苏联盟友之间制造了某种合理的妥协，他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娴熟的技巧。丘吉尔试图诱使美国为地中海战事承担无限义务，但被马歇尔当场揭穿。此后，丘吉尔下令逮捕印度的叛乱分子，替换了中东的高级指挥并提升了这一职位的重要性，而且，他还亲自给斯大林捎去口信，以具有无比说服力的真诚向斯大林传达有关决定。最终而言，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刻。至于斯大林，尽管有其偏执和病态，但显示出深刻的战略领悟能力和令人钦佩的镇静，尤其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除少数重要地区外，他的国家已经备受一个无情的敌人蹂躏。

盟国领导层的素质正日益显现为同盟国优于德、日的另一个因素。希特勒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尽管偶尔还能灵光闪现，而日本领导人在所有方面都很平庸。大联盟正在开始发挥作用，“轴心”只是一种神话，根本没有柏林与东京之间的任何协调来支撑。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已经遭受重创，且遭人鄙视，现在成了希特勒的一个很重的包袱。世界大战正值其最关键的阶段。

当麦克阿瑟于3月抵达澳大利亚时，那个国家的防御计划以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击败日军为基础。麦克阿瑟拒绝了这个计划，下令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保卫澳大利亚。美国海军陆战队试图执行麦克阿瑟的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面的所罗门群岛保卫该国，但萨沃岛海战的失利使他们处于极其脆弱的地位。

珊瑚海海战和中途岛海战取得胜利之后，美国海军在舰船制造，尤其是主力舰和航空母舰方面，正稳步取得对日本的优势。达尔文港

遭到空袭，敌人的潜艇在主要港口附近活动频繁，但日军登陆澳洲这类事情将不会发生。

斯大林正着手准备在苏联南方战线发动他那场伟大的反攻。蒙哥马利即将对隆美尔发起反击，而火炬行动则会将美国地面部队引入地中海战区，并将促成墨索里尼和贝当这两个令人生厌、欺世盗名的政权的垮台。按丘吉尔的话说，未来几个月可能成为“开始阶段的结束”。

---

1. 路易斯·蒙巴顿（1900~1979），英国海军军官、殖民地总督，曾任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1943~1946年）及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1947年）。为爱尔兰共和军所暗杀。——译者注

18
他是我迄今认识的最伟大的人

温斯顿·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时对罗斯福的描述，1943年1月26日

I

应罗斯福的邀请，艾夫里尔·哈里曼1942年8月29日和30日在香格里拉讲述了自己对丘吉尔—斯大林莫斯科会谈的印象。哈里曼满怀信心地表示，苏联有能力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顶住德军，他称赞丘吉尔出色地传达了美英的旨意，但指出，战后西方是否能与苏联进行合作，罗斯福与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前者对此持乐观态度，后者则表示悲观。

罗斯福对共产主义制度存在严重疑虑，但当涉及未来的美苏关系时，他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些疑虑和担忧。他认为，西方政治生活会在某种程度上朝着他所追求的社会民主模式演变，从而缩小两种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他至少在这时还未预见到西方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对苏联实施遏制，他也没有意识到，表面上的意识形态差异的减少会在多大程度上与苏联—西方关系无关。

作为一个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人和愤世嫉俗的政客，他所具有的那种玩牌者的本能使他永远提醒自己不要过度轻信。他当然期待最好的结果，但也认识到，实际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不尽如人意。他决意努力在美苏关系中创造尽可能好的结果，但也决心避免《凡尔

赛和约》以及威尔逊为批准该条约而采取的笨拙举动所产生的具有灾难性的后果。

在罗斯福看来，在其所有盟国中，英国伟大而成就辉煌，但落后于时代；苏联是一个勇敢、庞大，但非常原始的政治突变体；中国历史悠久、令人尊敬，完全有可能成为欠发达世界令人生畏的代表——罗斯福对之寄予厚望。此时的法国是一个附庸国，几乎与西班牙一样，其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削弱。英国不可能维系它的帝国，而苏联也不可能永远与血腥的异端邪说联系在一起。战后，英国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

苏联将需要美国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而中国将会成为美国的一个追随者，只有美国拥有足以对整个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规模。罗斯福认识到，必须防止欧洲和亚洲国家再次诉诸大规模战争，他确信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美国和全世界迈向这一伟大的境界。

他的这些信念当然都是正确的，就对战后世界的认识而言，他在许多方面比丘吉尔和斯大林准确。但罗斯福低估了法国的复苏能力，而戴高乐也不会忘记盎格鲁–撒克逊领导人对他的怠慢，尽管他承认，这些人为将他的国家从德国人手里解救出来而承担了义务。

随着年事已高、精力衰退，罗斯福更多地集中于未来世界的宏观图景，较少关注有关战后安排的不那么光彩的细节。在这种宏大的理想主义背后以及在实践这种理想主义时，国际政治中的罗斯福如同其在国内政治中的表现——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一个为实现自己崇高目标而不择手段、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

罗斯福绝不可能完全将平凡俗气的国内政治抛诸脑后。美国正面临自1918年以来的首次战时中期选举，而种种迹象表明，总统所在的政党前景不妙。罗斯福希望在选举日前发动火炬行动，他近乎乞求地

向马歇尔表示，行动发起日要定在选举日（11月3日）之前。但这证明是不可能的，他此后也就不在时间问题上向马歇尔施压了。

政府面对的是这样一群选民：他们由于配给和管制措施而怒气冲冲，农村地区的选民更是因为农产品价格控制而怨声载道。由于迟迟不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整个国家显得更加不耐烦了。

9月7日晚，罗斯福就物价问题发表“炉边谈话”。采取何种途径对付通货膨胀：是颁布行政命令——国会已授权他可以这样做，或是提出立法倡议？在这个问题上，他收到大量相互冲突的建议。霍普金斯和物价管制局局长亨德森建议采取后一种做法，但媒体开始确信，他将通过行政命令采取行动。9月7日，他把皮球踢回国会，按民主国家和责任政府所要求的程序行事。他不把与一批杂乱无章的管制条例有关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表明了他在政治上惯有的那种精明，但把责任抛给国会，这将不会——也的确没有奇迹般地为两个月后争取连任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赢得人气。

11月3日，总统回到设在海德公园家乡的投票站，参加中期选举投票。全美各地的选举结果表明，这是共和党自1928年以来赢得席位最多的一次。他们分别在参、众两院获得10个和47个席位，但民主党人仍然控制着两院：参议院的席位分布是57:38，外加一名独立人士，众议院则是222:209，另有3名独立人士。共和党人赢得大量州长席位，包括杜威在纽约州的轻松获胜。罗斯福没有感到不安，他完全了解选民们在中期选举时所特有的变化无常，他满怀信心：两年后，自己将成为领导美国走向胜利（或者至少是接近于走向胜利）的总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是一个仍在试图克服珍珠港后遗症的总统。即使是对身边最亲密的人，他也没有表现出自己有丝毫不安。

II

选举日次日，即1942年11月4日，丘吉尔给罗斯福传来一份他收自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陆军上将、英国中东战区司令官）的电文，称“经过12天的激战后”，英军在阿拉曼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当战事打响时，隆美尔还因病待在德国，在希特勒命令下，他随即返回埃及。他熟练而顽强地进行防御，但在兵力及火力上大大不及陆军上将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后者是一位通晓军事、意志坚定的指挥官。

蒙哥马利一直毫不留情地对隆美尔施压，逐步消耗其坦克部队；在巧妙运用自己集结起来的优势兵力的同时，蒙哥马利也承受了更多的装备损失。在阿拉曼之战结束时，隆美尔手头的坦克减少到只有300辆，其手下尚能战斗的士兵则只有约25 000名，而蒙哥马利则有600辆坦克和近4倍于德军的士兵。令人惊讶的是，凭借这样一支小规模部队，隆美尔竟然对苏伊士运河构成如此严重的致命威胁。

在太平洋地区，虽然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仍然进行得异常惨烈，但美国海军正在使日本人付出惨重代价。在所罗门群岛的战役中，新型的美国战列舰联合其他舰只击沉了4艘日本战列巡洋舰。大黄蜂号此前刚刚被击沉，这是美国在此次大战中损失的第四艘航空母舰，但罗斯福两年半以前下令制造的一系列航母现在开始编入现役。他还下令把即将下水的某一级别的重型巡洋舰改造成航空母舰，这突出表明了他从自己一生的研究及在“一战”的经历中所积累的有关海军事务的丰富知识。这就是9艘最终成功建造而成的独立级航母的由来，它们将在1943年全部被编入现役，而独立号则在1943年元旦首先服役。在所有战时领导人中，谁也没有如此明智地干预过舰船制造。

大黄蜂号被击沉，而著名的企业号航母也于1942年10月底在圣克鲁兹岛之战中被损伤。但日军也有三艘航母遭到严重破坏，并损失了100多架飞机，因此美国此后能够重新向驻守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提供补给，并且能够确保空中优势。在选举日到来之时，这个战区的形势也发生了逆转，但不可能将这一事实透露给选民，至

于利用这类新闻为政党服务，这恰是罗斯福拒绝采取的做法。又经历了两个月的激战后，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日军才最终屈服。

除极少数知情者在关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外，所有人都在注视斯大林格勒。德苏两军在该城的废墟中进行着殊死搏斗，但正如斯大林曾向丘吉尔提到过的，苏军已经准备在德军侧翼发起反击，丘吉尔则向罗斯福转达了这一信息。如同上了断头台的人伸长脖子去领受铡刀，德国人将15个师投入到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而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侧翼留给那些不那么顽强的部队去防守。德军向高加索油田的推进在2月初就被遏制了，他们无法突入通往高加索山区的任何一条通道，大批兵力被苏联守军牵制。珍珠港事件近一年后，同盟国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更加优秀的最高领导最终开始发挥威力，而德、日巨大凶猛的攻势此时已是强弩之末。

随着火炬行动发起日的临近，罗斯福写好了一封准备发给贝当的信。他希望，当大量美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海岸登陆并从贝当部队手中夺取这些领土的控制权时，该信能起到抚慰贝当的作用。罗斯福声称，这些登陆行动旨在先于德军进攻北非并帮助法国人击退德军入侵。他还指出，就1940年与德国达成某种不光彩的解决方案而言，贝当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罗斯福丝毫没有预见到这样一封信对英国人、“自由法国”人士以及法国各派抵抗运动可能具有的影响，这一点证实了法国当时在他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之低。一个对政治有着如此敏锐判断的人士竟然对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给予重视——一旦解放，注定要成为欧洲最重要且对美国具有一定潜在价值的国家，这令人失望。

11月5日，就在运送“火炬”作战部队的船队经过直布罗陀海峡之时，丘吉尔给罗斯福发来电报，其中谈到他打算在11月6日将登陆行动告诉戴高乐，并解释说，他之所以没有在早些时候这样做，原因在于

这实质上是一场美国人发起的行动。他提醒罗斯福："我与他在1940年保持着某种正式的书信往来，承认他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

罗斯福在收到这封电文几分钟后就回复说在成功登陆之前就告诉戴高乐有关这次行动的事情"是不明智的"。由于这是一次美国人的行动，罗斯福本人坚持完全保密。

仿佛是为了打动丘吉尔，罗斯福补充说，莱希海军上将也同意他的立场。几乎与约瑟夫·肯尼迪和约瑟夫·戴维斯分别担任美国驻英国和苏联代表时的情形一样，莱希对法国的判断也表明其担任驻维希代表时是不称职的。丘吉尔勉强服从了罗斯福的意愿。

为减少与法国人发生实质性战斗的可能性，美国人暗地里策动了一系列近乎荒谬的事件，经常出现于这场闹剧中的人物则是外交官罗伯特·墨菲。1940年总统选举期间，罗斯福将他召到白宫，与他亲切探讨法国沦陷后该国的政治残局。总统颇有先见之明地将他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派往北非，与刚被任命为法属北非总督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进行接触，其进一步的使命则是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境内所有潜在的友好政治势力取得联系，以有助于使整个法兰西帝国回到战争中的同盟国一方。

墨菲开始与魏刚进行讨论。罗斯福希望后者会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一支陆军，复苏已经变得支离破碎的法国海军。他希望在美方劝说之下，魏刚会置贝当衰微的权威于不顾，转而争取使法国成为战胜国中名正言顺的一分子。有关讨论产生了所谓的墨菲–魏刚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对冻结在本国的法国资产实施解冻，其程度足以使魏刚在美国购买规定的非战略物资，美国还确保这些货物通过英国海军设立的严密封锁线。另一方面，在其驻北非的诸领事馆里，美国安置了大量的情报收集设施和人员，并确立了按外交保密手段处理与美国政府的通信联系这一特权——领事馆官员一般不享有这种特权地位。

从技术和官职层面上，魏刚只是一位殖民地总督，而墨菲也只是一位外国领导人的私人代表。罗斯福一开始就指示墨菲向他本人直接汇报，而把国务院撂在一边，这是罗斯福一贯喜欢采取的行动方式。

在罗斯福与墨菲面谈之时，戴高乐还没有引起前者的重视。1940年12月，戴高乐曾试图纠合达喀尔的维希部队，但以失败告终，这使罗斯福觉得自己的见解进一步得到证实，即“自由法国”人士就是一帮言行不慎之徒，而戴高乐本人则是一个有点滑稽可笑的江湖骗子，无足轻重。至于丘吉尔对戴高乐所寄予的那些希望，罗斯福要在两年后才会产生。

戴高乐长期以来就公开主张坚决而无条件地对德抗战，他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法国人，与那些在本次战争中两边下注、与敌勾结的机会主义者形成鲜明对照。无论罗斯福或其他任何人如何看待戴高乐，随着盟国军事行动的加剧，戴高乐因其自始就一直持有正当的道义和政治立场而自动具有了合法性。说来也怪，罗斯福由于太过世故而错误地解读了戴高乐现象。在他们的交往中，他直到很久以后才认清那个真实的戴高乐：一个勇往直前的，尽管也是固执的爱国者和卓越的政治运作者，最终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

不幸的是，墨菲确信，亨利·吉罗[注]将军就是美国人正在寻求的那种法国军人，即能够在盟军登陆时将驻守北非的维希部队集合起来。吉罗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位镇压摩洛哥起义的英雄，最近刚逃脱纳粹的监禁——他是在1940年被俘后被囚禁起来的。

即使是对法国军方不怎么崇敬的希特勒也对吉罗赞誉有加。当吉罗在1942年4月逃脱德国人的囚禁后，希特勒在与自己的某些部长谈话时称：“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将这个人给抓回来。据我所知，他是一位能力巨大、精力充沛的将军，完全有可能加入戴高乐的抵抗部队，甚至成为他们的指挥官。”

在德国人的坚持下，贝当已经在1941年11月召回了担任北非总督的魏刚将军。在1942年9月中旬的华盛顿之行后，墨菲在伦敦拜访了艾森豪威尔、马克·克拉克将军、哈里曼和维纳特。墨菲本人在伦敦之行时假扮为一名将军，并大肆将吉罗吹捧为这样一位人物：如果被赋予某种适当的显要职位，他能够确保英美的登陆行动不会遇到抵抗。

罗斯福对维希政权的政策在美英两国完全不得人心。另一方面，吉罗的势力对达尔朗极为不满，表面上是因为后者曾就职于维希政权，但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这样的担心：盟军进攻北非后，达尔朗能够以让出法国海军作为诱使盟军给予他恩惠的筹码——无论他是否真的让出，这样一来，吉罗一派就会丧失影响力。

1942年10月22日，墨菲在阿尔及尔附近安排了一次有马斯特和马克·克拉克参加的会谈，此次会谈极其秘密且富有戏剧性。艾森豪威尔已经向墨菲和克拉克下达了严令：不得透露盟军登陆迫在眉睫。但美国代表还得巧妙地提及登陆后的法国管理当局这一问题，克拉克于是告诉马斯特，管理权将在登陆后“尽可能迅速地”移交给由吉罗–达尔朗“两驾马车”组成的法国行政当局。马斯特愤怒地抱怨起来，反对达尔朗以任何形式出现在领导结构中。

吉罗收到一封紧急电文，文中称，登陆比他预计的要来得更快，他在回电中恼怒地指出，这不可能，因为他正在法国建立一个亲盟国的网络，至少得到11月20日才能为指挥登陆行动做好准备。墨菲现在真的感到无能为力，他急切请求罗斯福（并将有关电文的副本发给艾森豪威尔）将登陆推迟两周进行，否认将面临某种“灾难”。

在伦敦的艾森豪威尔比身在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先收到这一请求。前者给马歇尔发去电文，反对任何这类建议，并请马歇尔将他的观点转述给总统。罗斯福在听取马歇尔的意见前就收到墨菲的电文，并当即指示莱希拒绝墨菲的请求，命令墨菲竭力与法国各政治派别协调合作。

墨菲向吉罗承诺，一旦他抵达阿尔及利亚就赋予他最高指挥权——而不是在滩头阵地被巩固以后。这样的保证仍然不明确，但至少使吉罗放弃延期登陆的请求并离开法国。吉罗原本希望直接去阿尔及利亚，但在飞行途中接受了这样的建议：首先与盟军指挥官商定确切的安排，这样比较稳妥。他于11月7日下午抵达，这时距登陆发起时间只有12个小时了。

吉罗抵达艾森豪威尔的地下指挥所时高声宣布："吉罗将军到。吉罗将军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承担指挥这次行动的重任。"幸运的是，艾森豪威尔不懂法语，但他很快领悟到吉罗言语中的核心内容。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曾提醒过他，"吉罗就自己在这次重大行动中的角色存有某些严重的错误观念。"于是，当天晚上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与吉罗进行单调、机械的争论上。后者不断重复指出，他必须拥有这次行动的指挥权——如墨菲所承诺的那样。艾森豪威尔则不断重复同样的内容，尽管力图在表达上略有不同：吉罗不能指挥这次行动，因为这可能要求他下令对自己的同胞发起攻击。7个小时后，吉罗退却了，他宣称"吉罗将军将会是一名观众"。

第二天早上，火炬登陆行动在几乎未遇抵抗后顺利展开，吉罗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他告诉艾森豪威尔，自己将听从安排。艾森豪威尔向吉罗保证，如果后者把法国人团结起来，支持登陆行动，那他将被看作法属北非的行政长官，直到达成某种长期的政治安排。

在香格里拉，罗斯福这次终于显得紧张了，他整个下午几乎与电话为伴。晚饭后不久，他接到陆军部打来的电话。罗斯福的双手平时就有点习惯性的颤抖，现在当他拿起电话时就抖得更厉害了。登陆开始了，伤亡很小。"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听上去好极了。祝贺你们。"这离斯大林的劝诫"让你们的部队在浴血奋战中经受考验"还有一定距离，但美国人毕竟最终跨越大西洋进行实战了。他们正在发起攻势，正如他们不久前开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所做的那样。

此次行动在战术上完全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因为轴心国、维希政权，甚至西班牙的情报机构都一致认为，那些在严密护送下经过直布罗陀海峡的庞大运兵船队是开往马耳他的。

11月8日星期日下午，罗斯福从休养营地返回华盛顿。但回到白宫后，等待他的是预料中的贝当愤愤不平的回信。他指责美国“启动了一个残忍的行动”，并发誓说“我们将保卫自己”。这也许是他下达的命令，但随着大量英美士兵的到达，贝当在北非的权威迅速烟消云散。

11月8日，丘吉尔与戴高乐进行了一次面谈，谈话过程并不轻松，但内容光明正大。丘吉尔重申，他始终都会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但他永远也不会抛弃“注定要决定法国命运”的戴高乐——在他们首次会晤于1940年那个令人绝望的春天时，丘吉尔就这样描述戴高乐。戴高乐敦促丘吉尔成为欧洲（利益）的代言人，并对此感到震惊——罗斯福甚至能让英国广播公司推迟播放戴高乐计划好的对北非人民的讲演。戴高乐表示自己明白这一点，他无法控制英国广播公司，但他讥讽地指出，他没有想到的是，甚至连丘吉尔也无法对英国广播公司施加影响。20年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均去世已久，而戴高乐还在继续从政，这时人们耳边又会回荡起此类谈话。

戴高乐将吉罗视为一个勇敢的爱国人士，并向丘吉尔保证，他将与吉罗充分合作。但提及达尔朗时，会谈就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戴高乐对丘吉尔说，“自由法国”人士不可能与达尔朗或其他任何维希政权的代表达成协议。丘吉尔表示，他个人同意戴高乐在与达尔朗达成安排的问题上持有的立场，并向戴高乐保证，与达尔朗的联合不会持久。

进攻部队交上了好运：摩洛哥附近的海面与往年的11月相比更加风平浪静，乔治·巴顿将军率领部队安全上岸。他们在卡萨布兰卡附近遭遇激烈而短暂的抵抗。在美军向卡萨布兰卡进发的过程中，守军进一步的抵抗被巴顿压制下去了。

巴顿有效地控制了摩洛哥。在奥兰和阿尔及尔，实际上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墨菲的努力在阿尔及尔造就了大量有益的亲盟国活动，那里的无线电台和机场迅速为亲盟国人士掌握。美国人抵达地中海，这为德国非洲军团、墨索里尼和贝当敲响了丧钟。

艾森豪威尔于11月9日在广播中宣布，吉罗不久将成为北非的领导人，而吉罗随后则在广播中要求法国人停止抵抗。令墨菲和艾森豪威尔感到不安的是，吉罗的讲演没有收到明显效果。吉罗在当天下午飞往阿尔及尔，但并未引起公众注意。

克拉克在11月10日上午与达尔朗会晤。克拉克要求达尔朗立即下达停火令，并蔑视等待贝当指示的建议，因为在贝当拒绝罗斯福的提议后，美国已断绝了与维希政权的所有关系。克拉克捶着桌子告诉达尔朗，如果在30分钟内还不服从，他——号称“美国之鹰”的克拉克就要对达尔朗实施“保护性监护”，并让吉罗发布停火令。达尔朗则告诉克拉克，无论吉罗干什么，都不会有人理会。

一直持续着这样的场面：克拉克捶打桌面，而达尔朗则狡猾地寻找借口，直到克拉克的愤怒表明其威胁绝非虚言之后，后者才屈服，写好一道停火令。

与达尔朗的协议震惊了美英舆论界，该协议没有触动人们备加指责的维希法律——涉及对犹太人和政治反对派的镇压，涉及那些参照德国模式但未见得比之更人道的囚禁营。克拉克本应干脆就对达尔朗实施“保护性监护”，然后以达尔朗甚至是贝当的名义随心所欲地发布命令。更好的选择是，罗斯福重新思量一下自己对戴高乐那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克拉克为艾森豪威尔保留了进一步改变有关政治安排的权力，维希政权在北非的丑剧已基本结束了。

11月12日，克拉克召集达尔朗和其他一些首脑开会，坚持主张由吉罗领导法国志愿部队与轴心国作战——由美国提供资金和装备，并

确认达尔朗为北非总督。艾森豪威尔从阿尔及尔向东边的突尼斯发起进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大胆的举动，具体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是英国的肯尼思·安德森将军。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与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B·坎宁安一同从直布罗陀飞往阿尔及尔。艾森豪威尔以及所有的美国参与者都在其后的岁月里忌讳谈及与达尔朗的协议。

罗斯福对法属北非政策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一开始就支持戴高乐，尽管这种支持并不意味着相关进程会一帆风顺。但必须指出，只是在罗斯福去世、大战结束很长一段时间后，罗斯福对戴高乐政策的失误才开始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罗斯福是正确的：戴高乐无法成功地收拾法国内部相互残杀的政治乱局。他在1958年后才做到这一点：上台执政制定了一部新宪法，还终结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长达130年的特殊关系。但在1942年秋天，这些都还是遥远且超乎想象的事情。

戴高乐于11月16日回访丘吉尔，毫无夸张地指出，如果法国人认为他们的解放意味着提升达尔朗之流的地位，那斯大林将会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胜利者。

1942年圣诞节前一天，在结束一次冗长的午宴后返回办公室时，达尔朗遭枪击身亡。在圣诞节那天，罗斯福任命吉罗为达尔朗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则连夜驱车从前线赶回阿尔及尔，帮助说服吉罗接受这一职位。

11月17日，罗斯福发表全国讲演，指出盟军在太平洋、苏联及非洲取得的进展，“本次战争已经达至转折点”，但“还不是欢庆的时候，因为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为赢得胜利而战斗和工作”。埃莉诺·罗斯福曾在10月写信给朋友说，由于西方没有开辟自己的战线，斯大林格勒之战使她感到“羞愧”。如果她考虑到这一事实——没有1939年的纳粹德国—苏联条约，这场战争是不会爆发的，那她可能就比较容易控制自己的自责了。11月19日和20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发起反击，他们

像尖刀一样将处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6集团军（约30万人）与德国陆军主力部队切断开来。

如果希特勒愿意接受一场战术上的退却，那他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仍然有可能被挽救，但他视不战而退为懦夫行为，要求血战到底。到1942年底，与德国非洲军团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日军一样，德国第6集团军也注定要完蛋了。距离珍珠港事件还不到一年，德国人和日本人就已被迫转入退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III

罗斯福和丘吉尔激起了及早在三大盟国间举行会晤的热情。斯大林拒绝了罗斯福的邀请，因为在冬季攻势期间，他不能与自己的部队分离。他提议，他们可以通过通讯来解决有关问题，并再次肯定地认为，西方盟国在1943年春将会兑现其进攻西欧的诺言。罗斯福向丘吉尔提议他们两人会晤，最终会议定于1943年1月中旬在卡萨布兰卡附近举行。

由于象征、节能以及安全方面的原因，白宫在1942年没有举行圣诞树点灯仪式，而总统也只是有节制地发表了一篇圣诞节战时讲演。晚餐后，他们观看了一部电影——《卡萨布兰卡》。它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不仅因为它一直是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而且与最近的事件及总统未来几周的行程有关。

1943年1月7日，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他回顾了战争取得的进展，并预先提出了某些和平目标。“轴心国明白，他们必须在1942年赢得战争，否则最终会满盘皆输。我无须告诉你们：我们的敌人没有在1942年赢得战争。”他祝贺“英勇的中国人民——那个伟大民族的和平理想与我们的如此相似”。他热情洋溢地谈到北非进攻，声称同盟国因此阻

止了德军从西非经南大西洋向拉丁美洲发动的入侵。其实罗斯福知道，这是一种荒谬透顶的战略概念（正是他本人曾在7个月前向丘吉尔保证，德国人不可能打到达喀尔，更不用说南美洲了）。

总统保证，盟军将在1943年直接打击希特勒，但拒绝说出具体地点。他祝贺战时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多数预定生产目标都超额完成，而国内批评者以及希特勒都曾声称，这些目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武装部队从200万人增加到700万人，并将在1943年以同样的速度递增，随之则是海外部署力量的大幅增强。他对盟国进行赞扬，包括“自1940年6月法国陷入黑暗以来，一直在为解放自己灾难深重的国家而英勇战斗的法国人”。但他没有提及任何法国领导人的名字。

罗斯福提醒国会及全国人民，美国的青年男女正在流血流汗、殊死战斗，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换回一个失业盛行的未来，也不是为了回到一个非正义的世界，他强调自己在1941年列举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他们不希望战后的美国是一个为营养不良或贫民窟和失业救济所困的国家。他们不希望那种由虚假‘繁荣’所造就的快速致富时代——如1929年的大萧条。”他以此结束自己的讲演：“这个国家，其精神坚定；这个国家，其信仰不朽!”

罗斯福于1月14日下午到达开会地点，丘吉尔不久就拜访了他，他俩都情绪高涨。霍普金斯陪伴着罗斯福，罗斯福还把自己的儿子埃利奥特和小富兰克林以及霍普金斯的儿子罗伯特（一名驻扎在突尼斯的随军摄影师）叫到了卡萨布兰卡。

英美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先于他们的领袖抵达卡萨布兰卡，罗斯福在1月14日邀请他们共进晚餐。丘吉尔和罗斯福主要与他们的随员进行磋商，他俩还就邀请戴高乐和吉罗与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丘吉尔希

望把两位将军的努力联合起来，丘吉尔和罗斯福事实上分别成为戴高乐和吉罗的支持者。

戴高乐两度拒绝丘吉尔向他发出的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邀请，但他最终决定，这场战争以及法国当前的形势使他有必要会见英美领导人——有必要第一次会见罗斯福，而吉罗立刻接受了罗斯福的邀请。当有关各方还在就这次访问进行准备时，英美双方的参谋长们争得不可开交：是否如英国大多数高层指挥人员所主张的那样，下一步就进攻西西里；或者如蒙巴顿所提议的，进攻撒丁岛；或者如美国人所希望的，进攻法国北部？马歇尔是美方论点的代言人，美国代表坚决反对在将轴心国势力赶出非洲后，还把更多的精力浪费在地中海地区。

美国人对于除掉墨索里尼没有兴趣，后者现在已成为一座死火山，在国内遭人鄙弃，几乎不能再兴风作浪。但大家一致同意，对意大利发动的任何进攻都将把德国人引入亚平宁半岛。英美两国人士很快就拒绝了蒙巴顿有关进攻撒丁岛的主张，他们都认为该岛在战略上无关紧要。

罗斯福和马歇尔面临的问题是，只要英国人拥有欧洲战区的大多数兵员、舰船和飞机，丘吉尔就总能在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英国的战争设想是一条不切实际的取胜之道，即封锁德国、空袭、支援当地抵抗运动，在欧洲德占区边缘实施骚扰敌军的两栖登陆。罗斯福在这一点上完全站在自己的参谋长这一边。

美方人员都认为，该设想是一种会造成某种持久僵局的处理方法，如果德国和苏联重新媾和并在欧洲大陆上划分军事分界线，将会使僵局长久固定。尽管斯大林表面上似乎对苏联遭受的伤亡漠然处之，但谁都知道，他不可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三大盟国的流血牺牲，苏联一家就承担了其中的90%。

美国实际上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实施一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能够提供这次行动所需的大部分部队。而能使美国在欧洲战区占据显著地位这一刻加速到来的唯一途径则是，将部分人力、物力从太平洋地区转移到欧洲。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有趣的见解之一就是，卡萨布兰卡会议应该就1943年在西北欧发起进攻行动确定明确的时间表。随着阿拉曼战役的结束，苏伊士运河、中东石油以及巴勒斯坦地区所面临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尽管希特勒大幅增援了驻突尼斯的德军，但他们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盟军可以运用海空力量将他们遏制和消灭于突尼斯境内。

那些通常用于推迟横渡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的借口完全没有说服力，诸如无法将人员运抵英格兰、缺乏登陆艇、没有足够的空中优势、缺乏有经验的士兵以及德军在法国北部集中了过多兵力等。最终于1944年成功实施的“霸王计划”在登陆日那天可以将8个师投放在法国海岸，并在25天内投放22个以上的师，而且此后每周的投放量达到两三个师，直到德国被最终击败。1943年3月，有近40个师驻扎在英国。与1942年年初相比，盟军在该年年底时拥有的船舶吨位减少了，尽管新建造的船舶吨位数正在超过德国潜艇所击沉的船舶吨位数。

从参战伊始到近一年后的北非登陆，美国陆军完成训练的师从37个增加到73个，而且到1943年夏及此后的一年将分别拥有120个师和220个师，英联邦国家到1943年夏将拥有75个师。霸王行动所要求的作战部队人数是可以达到的，而且也有可能将他们运送到英格兰。

如果英美促成在北非的30万法国陆军重整旗鼓，那么作战部队人数就更能达至霸王行动所要求的水平。“自由法国”部队在非洲、意大利、法国以及德国的战斗中表现卓越。美国人准备装备这些部队，前提是吉罗担任指挥官，但英国人只希望他们作为支援部队发挥非战斗作用。

他们原本应该置于戴高乐的指挥之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该举措还可能使戴高乐对其盟友产生更多的感激之情并萌生更强烈的民族自信，在未来几十年，法国由于缺乏这些而给英美造成麻烦。

登陆艇问题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美国海军尤其不喜欢这类船只，因为它们属于运载陆军的船只，而非海军战列舰。海军高层人士，尤其是海军上将金，把大多数登陆艇都分配到太平洋战场，那里的战争几乎完全由两栖登陆行动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海军进行的战争。这位海军上将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但考虑到盟国一致同意首先击败德国的政策，罗斯福应该迫使金改变其决定。

美国公众舆论要求对日本采取某种进攻性政策，而罗斯福得考虑1944年的总统选举。但在中途岛海战后，以及根据罗斯福1940年制定的造船计划而生产的大量舰船投入使用后，应该下令将更多的人员和登陆艇调往欧洲战区。到1943年夏天，就拥有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而言，美国海军分别是日本的2倍和3倍。1944年5月，美国拥有3.1万艘登陆艇，但分配给登陆日作战行动的只有2 500艘，用于那天作战行动的登陆艇有2/3是英国提供的。

马歇尔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英国打算通过火炬行动使盟军无休止地卷入地中海战事，但美国不必且最终也没有对此加以默认。为了强行确定某种更快的时间表并克服丘吉尔和布鲁克对霸王行动的抵制，罗斯福必须缩小太平洋战事的规模——那里的作战行动现在由并行不悖的两个部分组成：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分别在太平洋中部和西南部地区组织的攻势。

无论由艾森豪威尔还是由麦克阿瑟指挥，如果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在1943年8月或9月进攻法国北部，可能会将欧洲战事缩短6至9个月，还会使苏联在“二战”结束时所处的位置远远位于后来他们实际所处位置的东边。在没有做出这类决定的情况下，作为对意大利战事的替代，盟军完全可以考虑接受斯大林关于参加东部战场的要求，这也

许会使某些巴尔干国家免遭苏联控制。尽管如此，与英国人，与自己的大多数高层指挥人员，与国内政治及国会的大部分舆论就大战略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罗斯福此时缺乏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卡萨布兰卡达成一致的目标也是合理的，包括清除整个北非海岸的德军、进攻西西里，以及试图消灭墨索里尼。

1943年1月18日，布鲁克和马歇尔再次面对面地进行了非常细致而紧张的讨论，在长达几个小时的会晤中，他俩在基本战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双方的所有参谋长都出席了会议，而各自的政府最高领导人则没有与会。布鲁克反对美国暗含的威胁，即把主要战事集中于太平洋，而马歇尔则回应说，英国希望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地中海地区——那里的战事不会对德国人造成真正损害。马歇尔宣称，美国宁可将这些部队用于太平洋地区，也不愿让他们无休止地待在英国的兵营里。

双方最终在1943年1月19日上午达成妥协，其内容包括：重新夺回缅甸并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发起攻势，要在不损害优先击败德国这一目标的前提下，借助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实施这类行动；要对西西里发起进攻，因为实施这一进攻的部队就在近旁，且该行动会分散德军注意力。

盟军要尽快发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登陆行动，但出现了一种颇为流行的非正式意见，即在1944年年中以前不可能集结起为成功实施该行动所必需的部队。艾森豪威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所表达的见解进一步支持了这种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罗斯福听从了这一意见，这并非糟糕的战略——只要美国能在斯大林和希特勒单独媾和或斯大林攫取大部分欧洲之前促使英国参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行动。

英国人对布鲁克–马歇尔磋商的结果非常满意，18日晚，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出席了在罗斯福住所举行的晚宴，双方协议的大

部分内容在此得以披露。

IV

吉罗和戴高乐的到来标志着会议进入下一个阶段。

后来出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安排戴高乐拜访丘吉尔。戴高乐向丘吉尔抱怨，自己"在法国领土上还要处于美国人刺刀的包围之下"。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丘吉尔的提议，即成立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由包括戴高乐、吉罗、法属北非各总督以及其他一些人共同担任领导。戴高乐甚至指责丘吉尔单方面使法国货币贬值。

戴高乐接着会见了罗斯福。丘吉尔就这位将军与罗斯福的首次会晤写道："令我大感宽慰的是，他们出人意料地相处得很好。总统为'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所吸引。"

接着，戴高乐与吉罗就丘吉尔提出且得到罗斯福赞同的那个计划进行了大量讨论。戴高乐反对这个计划，罗斯福和丘吉尔或他们的助手进行了改动且立刻被吉罗接受，当这些改动被呈交给戴高乐时，尽管墨菲和麦克米伦进行了大量游说，后者仍然拒绝接受。

在丘吉尔和罗斯福主持下，戴高乐和吉罗进行了一次会谈。戴高乐起草了一则简短的声明，其中指出：他和吉罗举行了会晤。他们重申了自己"对法国必胜以及对人类自由必胜的信念"，宣布了在他们之间建立某种永久的联系制度。戴高乐和吉罗签署了该公报，并在没有经盟国过目的情况下就予以发布。戴高乐以这种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两位法国人完成预先设计好的握手仪式并离开之后，当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新闻发布会之时，卡萨布兰卡会议最具争议的一个内容出现了。罗斯福主动告诉大家：同盟国坚持认为，在本次大战中敌人必须无条件投降。一直以来，人们对此的通常说法是，这属于罗斯福灵光闪现的即兴之作，事先没有与任何人磋商过，而且这是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因为它激起德国人和日本人更加顽强地进行战斗。

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国务院一个研究战后政策的委员会曾在1942年年中向总统提出建议，其中将无条件投降列为针对德、日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1943年1月7日，罗斯福与其军事顾问们会晤，并就将某种无条件投降声明列入即将召开的会谈结果一事征求他们的意见。总统与其说是把斯大林的“感受”放在心上，还不如说是担心斯大林的战斗士气，因此他暗示，这类声明也许能提升西方盟国大规模参与陆上对德战争的可信度，尤其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登陆行动将进一步延至1944年的情况下。

罗斯福曾在与丘吉尔的日常交往中向后者提及此事，丘吉尔表示赞同。当卡萨布兰卡会议对有关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时，罗斯福更加正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月20日，丘吉尔通过电文就此事向战时内阁提出咨询，战时内阁没有表示异议。他后来声称，当罗斯福在1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大为惊讶。按罗斯福本人的说法，记者招待会的声明是即兴之作被人误解了，因为他所谓的“即兴”是指宣布的时机，并未否定有关该政策的事前考虑。

马歇尔认为，作为对斯大林和被占领国家的鼓舞，这样的声明是可取的，并将有助于总体上提高盟国的士气。希特勒此前一直使许多德国人相信，威尔逊和福煦用欺骗手段使德国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德国根本没有被击败。马歇尔和罗斯福为希特勒的宣传手法所触动，他们认为，盟国现在有必要宣布某种无条件投降的声明。

正如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所指出的，将意大利排除在无条件投降这一要求之外，这有助于促成其及早崩溃和墨索里尼被废黜——这些都发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6个月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随后的声明中明确表示，无条件投降只是对纳粹和当前的日本统治者的要求。

“无条件投降”可能使得纳粹和日本的极端分子更加绝望地进行战斗——尽管这也是无从证明的，但它鼓励了两国中持不同政见的势力——最终包括日本天皇。总的说来，在这个问题上对罗斯福发起的那些攻击是不公平的。

卡萨布兰卡会议于1943年1月24日结束，一般认为，此次会议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丘吉尔恳求罗斯福：“你不能大老远地来到北非而不看看马拉喀什。让我们去那里待上两天，我一定要陪你观看夕阳下的阿特拉斯山雪峰。”罗斯福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他俩第二天乘车5小时赶到马拉喀什。

罗斯福在别墅内一座塔楼的顶层观看夕阳。以缓缓下落的夕阳为背景的阿特拉斯山令人难忘，这是一个令人心灵受到触动的时刻。

两位领导人在戒备森严的别墅里愉快地共进晚餐，然后相互道别。罗斯福的飞机将在第二天早上7点30分起飞。据丘吉尔的回忆，尽管他们已经在头天晚上说过再见，“但他早上又在前往机场的路上绕道过来再次与我道别”。

总统的豪华小型座机在跑道上加速，然后毅然升入空中，此时的温斯顿·丘吉尔紧紧抓着彭德尔的胳膊，并且说道：“如果那人有什么不测，我可承受不了。他是最真诚的朋友，他是那么富有远见，他是我迄今认识的最伟大的人。”

---

1. 亨利·奥诺·吉罗（1879~1949）：法国军官和政治家，与夏尔·戴高乐同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袖。——译者注

19
罗斯福意识到了占领柏林的重大意义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在向魏德迈将军评论罗斯福的战略目标时发表的言论。1943年8月25日

I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赞同给斯大林写一封信，他们在信中兴高采烈地列举了将要进行的一切有助于苏联击败希特勒的事情，但丝毫未提全面的第二战场行动。他们不敢将预计的对西西里的进攻说成某种将会减轻苏联前线压力的行动。斯大林在1月30日的回信中问道，他们预计何时开辟第二战场。

丘吉尔代表他本人及罗斯福做出承诺：到4月，将轴心国势力完全逐出非洲；到7月，占领西西里；接着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展开行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则在8月或9月发动——如果“限制性因素”能够被克服的话。这些因素包括可资利用的运输船舶和登陆艇、德国的防御态势，但这些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在斯大林看来尤其如此。

与往常一样，斯大林2月16日的回复仍然带着怀疑的口吻，这种怀疑一度是有道理的。斯大林反对将清除北非德国人的行动从12月延至次年4月，并且称，已经有27个德国师被调往苏联前线，因此英美的所作所为不是在引开，而是在增加东线德军的兵力。

斯大林进一步用严厉的口气说：“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我必须就延迟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所带来的严重危险最郑重地提出警告。”这位苏联领导人故意不具体指明这种危险——可以是从军事失败到与希特勒单独媾和的各种情形。斯大林格勒大捷后，军事崩溃的危险大大降低了，但一贯偏执的斯大林担心，西方盟国只是利用他来消耗德国，同时让他单独承担无限制的流血牺牲的代价，这类担忧完全有可能促使他重新处理自己与希特勒的分歧，而他此时所处的地位则大大强于1939年谈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

罗斯福和丘吉尔现在必须让斯大林继续作为同盟国一方参战，并指望他在不危及这种参战地位的情况下承受伤亡代价，与此同时，英美在欧洲发起一场使斯大林信服的攻势——西方会为击败德国尽自己的一份力，并使得苏联能够突入中欧。但英国那套在地中海地区无休止地蹿来蹿去、没有实质意义的作战方案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

斯大林承担着盟国的大部分战事，显然得因此而给予他补偿，而这种补偿将会是把东欧某些在地缘政治上处于次要地位的领土交付给他。

3月4日，丘吉尔就如何措辞恰当地回复斯大林而向罗斯福征求建议。丘吉尔略带窘迫地将突尼斯战事的拖延归咎于德军力量超过预先估计。丘吉尔认为，调往苏联前线的德军只有12个师，总的说来撤离苏联前线的德军多于调入的。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这个问题上，相对于前一封电文，他这次表现得更加闪烁其词。他强调船舶运输问题，明确提出当年有可能无法实施这一行动，并在最后以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论调称：“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过早地发动进攻，只会招致伤亡惨重的溃败，使敌人赢得重大胜利。”

罗斯福已在2月22日回复了斯大林，其内容没有丘吉尔的那么多，而且也少了一些辩解的成分，这或许是由于美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物资，从而使得罗斯福在道义上相对具有优势。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给斯

大林的回复中都大肆赞扬苏联“英雄之师”的勇敢气概。罗斯福最后称：“你可以确信，北非战事胜利结束后，在以最大努力提供运输设备的情况下，我们会尽早将美国的战争努力投入欧洲大陆。”

突尼斯战场的形势稳步地发生逆转，美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得更加自信。身患重病的隆美尔于3月中旬离开指挥岗位，此后他再也没有返回非洲。突尼斯的战事一直拖延到5月13日才最终结束，但盟军战果辉煌，俘虏敌军27.5万人，其中半数是德国人，这场胜利将整个非洲大陆的轴心国势力清除殆尽。此役为初上战场的美国人提供了绝佳的实验场：在面对真正具有战斗力的德国人之前，他们先是遭遇维希部队心不在焉的抵抗，接着又与抵抗坚决但并不具备很强战斗力的意大利人交锋。

3月底，经罗斯福同意，丘吉尔再次中断了经北极地区向苏联提供物资的运输线，理由是北极地区夏季的白昼现象使运输船队太容易遭受飞机、潜艇及水上舰只的袭击。这样一来，西方盟国与斯大林的关系进一步倒退，斯大林将此决定描述为“灾难性的”，但考虑到突尼斯战事的进展，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对丘吉尔发出暗含下述后果的威胁：苏联将在军事上崩溃或与希特勒单独媾和。丘吉尔和罗斯福已经使自己的部队“浴血沙场”，消灭并俘虏了大量德军，这一事实打动了斯大林，并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再次感受到自己的盟友地位。对希特勒而言，这又是一次战略上的灭顶之灾：他在过迟的时间将过多的部队投入北非战区，接着又自以为已经先发制人地排除了盟军对欧洲的进攻和意大利的崩溃。实际上，他二者皆输。

1943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派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去见罗斯福，首次谈论有关战后安排的事宜。

罗斯福有许多关于法国的构想——从令人不安到异想天开，应有尽有。他认为，解放法国的军队应该无限期治理法国，管理法国本土各地方当局以及该国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罗斯福甚至还怀有这

类令人不安的想法：把比利时法语区、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组成一个他称之为“瓦龙尼亚”的国家。这类似黎塞留和拿破仑在莱茵区建立日耳曼诸国的创举。十分明了，这类想法的动机是削弱德国，但艾登无法理解的是，罗斯福希望通过主宰法国人的命运和分解那个国家而达到什么目的呢?

罗斯福还考虑了将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分开所具有的种种好处。艾登回答说，原则上“我不喜欢这种旨在滋生一些规模更小的国家的想法……我们应该以合并为目的。在我看来，就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未来而言，没有比与塞尔维亚人组成某种形式的联邦更好的解决方案了”。南斯拉夫的最终分裂凸显了罗斯福的远见卓识。

讨论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与苏联有关的问题。罗斯福在波兰问题上表现得很实际，他并不反对寇松线，这意味着将苏联边界大大西移，并以东普鲁士补偿波兰。对苏联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苏芬边界，罗斯福没有异议。他甚至不反对苏联重新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尽管他希望从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的舆论考虑，最好能有一场全民公决装饰门面，即使是受操纵的。

在罗斯福看来，试图迫使苏联放弃以前属于它的且在战争结束之际将处于其完全军事占领之下的部分领土，这样做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波罗的海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享有20年的独立，在此前200多年的时间里，它们一直是俄国的一部分）。罗斯福认为，如果斯大林不愿履行某种形式的公民投票——即使是闹剧般的，那么，西方就应该从他那里索取某些让步，以作为承认苏联接管波罗的海国家的条件。

存在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性，即斯大林意欲“横扫”整个欧洲大陆，罗斯福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抱幻想。艾登指出，即使这些是斯大林的目标，与他合作共事的尝试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罗斯福主张肢解德国，并主张由三大主要盟国对整个欧洲进行警备。艾登强烈要求就这两类国家做出区分：一类是其本身没有过错的被占领国，它们都决心赢得解放；另一类则是盟国的敌国。

总之，罗斯福在有关苏联的问题上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幼稚看法，对东欧也并非感情用事，苏联在赢得战争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罗斯福期望它因此而得到补偿；他还就此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即美国将一劳永逸地摆脱孤立主义，并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总统展现出的魅力和活跃的思维”使艾登大感愉悦，但艾登觉得他们的谈话“令人困惑：罗斯福熟悉欧洲的历史和地理，他的这类知识也许得益于其集邮爱好，但他以此为基础得出的具有学术性质但过于武断的见解令人不安，即便是出现在气氛活跃的随意闲谈中。他似乎以决定许多国家（包括盟国和敌国）的命运为己任。他巧妙而得体地处理这一切，令人难以提出异议”。

在最初就战后安排进行的这种讨论中，罗斯福对待战后问题的处理方式的确表现出集邮者的某些特征，但实质内容在于：美国不会受到威胁；它通过某种公正、合法的国际框架参与世界事务；它时刻准备着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来对付某种威胁。

这样的构想并非没有其合理性，但其创作者表现出极度的自信，他谈论一个又一个地方，如同一位集邮者在摆弄自己的邮票，而艾登则来自一个重要但并非实力无限的国家，对这样一位来自“旧世界”的外交大臣来说，罗斯福的见解完全有可能显得“令人困惑”。

在与安东尼·艾登的会谈结束之后，罗斯福决定着手安排与斯大林进行一次私人会晤。如同他在1942年12月向丘吉尔提出建议一样，在给斯大林的信中，罗斯福也就会晤地点提出了诸多建议，他提议在白令海峡两岸的任何一处举行一次美苏双边会议，并且保证与他同行的将只有霍普金斯、一位翻译和一位速记员。

总统希望斯大林能感受到他的魅力以及他在世界上的巨大权威，在此过程中，罗斯福有时显得过于急切，也许暴露了一点点戴高乐在他身上所感受到的东西，即赶在有生之年就世界秩序达成某种最终而持久的安排，而且只有他才拥有造就这种安排的实力、地位和天赋。

美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实力——工业实力以及日益增强的陆、海、空武装力量；拥有那种使其民主制度得以繁盛的神秘力量——罗斯福本人一直就是这种神秘性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罗斯福拥有的最大地缘政治资产就是与英国结下的紧密而实力不均的盟友关系。斯大林一定感到纳闷：即使在他与希特勒互为不稳定的盟友之时，罗斯福也保持了与英国的同盟关系，现在罗斯福却假装对这个盟友表示出厌恶之情，其意欲何为呢？罗斯福这类不自然的表现促使斯大林向葛罗米柯询问——在葛罗米柯成为驻华盛顿大使之后，罗斯福是否有“才智”。葛罗米柯那时已经感受到了罗斯福掌控美国各种复杂舆论和政治局势的技能，因此他回复说，罗斯福无疑才智过人。

就在戴维斯前往莫斯科之时，丘吉尔正搭乘豪华客轮玛丽皇后号赶往美国，他此时尚未意识到自己那位伟大的盟友正希望单独与斯大林会晤。丘吉尔此行旨在协调下一阶段的战争计划，他在船上给罗斯福和斯大林发去了内容乐观的电文。

Ⅱ

人们所熟知的三叉戟会议于1943年5月12日在白宫举行。罗斯福做了开场白，平和地追述了自一年前华盛顿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他谈到了曾经就托卜鲁克产生的担忧，谈到了有关火炬计划的诞生。盟国间惯有的那些战略分歧在此次会议的初期阶段就显现出来。丘吉尔最终宣布，一旦存在“合理的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前景”，就应该即刻发起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但是，“丘吉尔所谓的‘成功理由’取决于德

国内部发生实质上的崩溃”。他不断向大家提出意大利即将崩溃这一前景——这“将会使德国人民感受到令人胆寒的孤寂，而且可能会开启他们的厄运”。在他看来，意大利是盟国最有可能获得的战利品，也是西方盟国能够为苏联提供的最大援助。总的说来，罗斯福比丘吉尔更为关注如何使斯大林继续战斗下去。

在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强烈推动下，罗斯福表示“担心，这意味着长时期在欧洲边缘地区零敲碎打”。他要求为1944春重返西欧制定明确的、即刻付诸实施的时间表。罗斯福还得在1944年与选民打交道，他不可能像丘吉尔那样无限期地拖延选举。他没有在三叉戟会议上提及此点，但在重新选举自己的总司令之前，美国人民希望看到在欧洲取得实质性进展。

马歇尔主张在英国集结必要的部队，旨在以足够兵力实施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相对于英国人此前所熟知的美方立场，马歇尔此时提出了一个更富有进攻性的战略主张，这是布鲁克没有料到的，但他一如既往地坚信，美国人在战略上并不成熟，他强调美国部队的经验欠缺、人力不足，以及其他一些次要问题，并热衷于英国当前对地中海战事所持有的立场。马歇尔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宣称，正如英国人充分意识到的，这些行动通常比预计的更加旷日持久，进攻意大利则会造成一个“真空”，会在整个1944年不断“吸入”盟国部队。如果英国人“致力于地中海战事，除非只进行空袭，否则就意味着这是一场令美国人无法接受的持久战”。马歇尔、莱希和金全都老调重弹，即如果英国人不准备为那些倡议承担义务，美国宁愿把自己的部队部署到太平洋和缅甸战区，以使中国继续战斗下去。

在周末休会的时候，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会谈陷入僵局。丘吉尔随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去了香格里拉。总统在那里整理自己的集邮作品，垂钓休闲。在这个周末，两位领导人都得以放松休息。

会议于5月17日继续进行，双方初步达成某种妥协，可以在1944年春发起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对意大利的进攻将为此次行动提供支持，而不是造成阻碍。同盟国将着手准备此次行动，但要在地中海地区留有足够的资源，用于进攻意大利、吸引德国将部队从法国调往意大利、除掉墨索里尼在欧洲的影响，以及尽早地、实质性地为苏联减轻压力。布鲁克极力证明，在盟军准备进攻法国的同时，进攻意大利的行动将分散德国人的注意力。自5月19日，双方开始以明确的形式正式达成协议，其最终内容包括：承担于1944年春进攻法国的义务；赞同在攻占西西里之后发起一系列经过周密计划的后续行动，其目的在于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使德国陷入意大利战事；双方还同意，从1943年11月1日起，英美分别准备好四个师和三个师，一旦马歇尔提出请求，就要把他们从地中海地区调往英国。

温斯顿·丘吉尔于5月19日再次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其内容也再次通过广播传到世界各地。面对现场那些对自己深表敬意的听众，丘吉尔报告说："两位独裁者对非洲的入侵使他们的国家付出了代价——95万名士兵战死或被俘。"在提到非洲和斯大林格勒时，他感谢"希特勒下士的军事直觉"。

会议接着讨论有关太平洋、缅甸以及中国的问题。金并非与马歇尔完全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他呼吁增强太平洋战区的战争努力。美国海军取得重大进展，在中途岛及其他地方击败了日本，这些都使金在指导海军事务时具有高度的自信。会议就此达成一致：任何并非为实现"德国第一"政策所必需的资源都要用于太平洋战区，但这仍是一种模糊的表述。

卡萨布兰卡会议曾就试图收复缅甸全境做出决定，但韦维尔将军对自己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计划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丘吉尔对该目标则是全然没有信心。出席三叉戟会议的美国代表要求做出重大努

力，以解除中国面临的封锁，丘吉尔对任何仅仅旨在讨好蒋介石的“愚蠢”之举都表示强烈反对。

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是一位中国通，也是一名富有传奇色彩、性情刚烈的军人，他轻蔑地将蒋介石称为骗子和无能者。史迪威试图打通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以增援中国人在本土与日本进行的战斗，并获得中国机场的使用权，从而使盟国空军可以轰炸日本。史迪威称，为使中国继续战斗下去并开发其作为一个盟国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必须打通一条通往中国的陆上供应线，他还极力主张为空中运输承担重大义务。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史迪威提出的目标，即每月向中国空运7000吨物资，重开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会议授权相关参谋人员制定并提交一个实施计划。

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的政治游说活动使史迪威的努力面临复杂局势。前者是一个权迷心窍的自大狂，与他相比，麦克阿瑟、戴高乐、巴顿以及蒙哥马利似乎只是些默默无闻的隐修者。但作为闻名遐迩的“飞虎队”的创始人，陈纳德是一位勇敢而战功卓著的飞行员，并且深得蒋介石夫妇的信任。史迪威告诉罗斯福，陈纳德“也许是一个战术天才”，但“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领薪雇员”。罗斯福曾在2月接受霍普金斯的建议，支持蒋（介石）–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尽管马歇尔和史迪威警告说，即使取得成功，空战也会吸引日本人发动针对机场的攻势，这样一来，无论如何都将有一场地面战争，而中国尚未对此做好准备。霍普金斯很有能力，但并非是在军事事务上，就中国问题而言，他建议支持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领袖，将其视为西方在中国的最佳人选。这正是马歇尔和史迪威试图在三叉戟会议上加以矫正的，因为他们所赞同的是一项明智的军事计划，而不是一份表达政治意愿的名单。

马歇尔和金都支持史迪威的立场，尽管如此，无论是丘吉尔或是罗斯福都不信服史迪威有关中国的设想。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强国

加以对待，罗斯福在这方面是一个先行者，而丘吉尔则认为中国只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罗斯福将其家族过去在东方的经历理想化（同时忽略了其通过鸦片贸易发财致富的事实），并对美国倡导“门户开放”政策大唱赞歌。

与往常一样，就美国受欢迎的程度以及相对于其他殖民国家所拥有的道德优势而言，罗斯福的见解严重脱离实际。他不断提及，美国打算给予菲律宾独立地位且在波多黎各实施自治，并将这些与他所认为的法国人对印度支那的管理不善进行对比。罗斯福强烈主张，为印度支那另谋出路，而不是将它重新置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这是他就战后世界安排提出的众多明智建议之一。

罗斯福请求参议院批准美国与中国签订一项条约，并取得了成功。该条约废除了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以及一些严重限制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排华法律。美国参议院批准该条约后，英国人也紧接着废除了其在中国的有关特权，而蒋介石则表达了中国的感激之情以及与盟国团结的愿望。但蒋介石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到1943年中期，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控制了面积达40万平方千米的地区以及约5000万的人口（中国当时的总人口为4亿）。

蒋介石并没有真正致力于对日作战，但史迪威相信，在拥有足够资源以及由他本人行使指挥权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能够大有作为，然而史迪威本人并非广受欢迎。在三叉戟会议期间的一次非正式会晤中，罗斯福询问史迪威和陈纳德，他们如何看待蒋介石。史迪威回答说：“他一直是个摇摆不定、诡计多端、不可信任的无赖之徒，从来都言而无信。”陈纳德立刻回应说：“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仅有的那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一旦对我许下承诺或承担义务，他从不食言。”

三叉戟会议期间，蒋夫人不邀而至，而且“令罗斯福恼怒的是，她又在白宫住了下来”，罗斯福的生活因此而被搅乱了。借助身处白宫的

权威地位，她通过电话四处求助于华盛顿的官方机构，并为其丈夫的利益而对人们纠缠不休。中国驻美大使宋子文从事的干预活动则更符合惯例，他告诉与会者，如果不做出重大努力以解除中国面临的压力，中国就将与日本单独媾和。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此并未感到过分恐慌，尽管罗斯福告诉与会者，他认为“同盟国不应被置于为中国之崩溃承担责任的地位”。

总统的困境在于，他把中国设想为一个将会领导亚洲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大国，但他也意识到，蒋介石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的领袖。罗斯福也不可能与毛泽东有太多接触，因为相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他宁愿与非共产党人打交道，而且，与毛泽东的任何联系都会把蒋介石推入日本人的怀抱。但在本次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打交道的时刻就来临了。大战期间没有进行这种交往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罗斯福去世后，直到理查德·尼克松于1972年访华前，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任何实质关系。

太平洋战区一个特别令罗斯福高兴的事态发展就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于1943年4月18日在布干维尔岛上空被击落。美国的密码破译员获悉了他视察之旅的时间表，尼米兹特别授权：拦截山本。山本五十六在珍珠港事件后表现得小心谨慎，但他曾公开声称，他将会在白宫决定日美和平条款。罗斯福以嘲弄的口吻写了一篇吊唁函，与莱希共享，此函表明珍珠港给罗斯福造成了刻骨铭心之痛。

III

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通知斯大林全面进攻西欧的计划被进一步推迟——卡萨布兰卡会议将发起该计划的时间设定为1943年秋天。丘吉尔和罗斯福试图给斯大林写信，但不知该如何措辞。他们终于在26日凌晨2点放弃了，留待马歇尔从他们信稿上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中

整理出某种像样的东西。那天早上晚些时候，马歇尔在丘吉尔的飞机上完成了这项工作。

英国人感到满意的是，美方并未试图关闭地中海战区；美国人感到满意的则是，他们有了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实施进攻行动的时间和重要途径。罗斯福给抵达阿尔及尔的丘吉尔发去电报："我非常想念你。从各个方面看，这都是一次高度成功的会议。"

罗斯福等待了一周，然后将他和丘吉尔都同意其内容的信件以他本人的名义发给了斯大林。有关推迟进攻法国一事被藏在信的末尾处。出人意料的是，信中几乎没有提到即将对意大利发动的进攻——英美尚未就此达成完全一致。马歇尔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信稿进行的概括强调了英美通常列举的要点，并增加了这样一些目标——促使土耳其参战，使北非的"自由法国"部队为参加解放西欧的战斗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约瑟夫·戴维斯结束了自己那场荒唐可笑的使命，从斯大林处返回。戴维斯认为自己消除了克里姆林宫那位领导人的猜疑，并因此而感到满意。斯大林将会于7月或8月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与罗斯福会晤。但6月11日对罗斯福有关三叉戟会议的概述做出回应时，斯大林又开始玩起了他那套现在已为人所熟知的把戏：一一列举英美先前就开辟西方战场而承诺的时间，而且对非洲的军事行动以及西方盟国提议的战略轰炸行动不予看重，认为它们无法取代第二战场。斯大林在回复中丝毫没有提及有关阿拉斯加会晤的事，而且几天以后他在电文中称，自己根本不能与罗斯福会晤。

斯大林格勒大捷后，斯大林授予自己元帅头衔，尽管他并未身先士卒地亲自在前线搏杀。在苏波边界问题上，他有时近乎处于自以为是的状态：声称要享有纳粹–苏联条约的果实，同时还把该条约归咎于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怯懦。他偶尔还就自己从芬兰人那里攫取的领土得

不到承认而装出一副委屈的模样。他显然不在意战争造成的伤亡，但他也开始在这个问题上作秀了。

他真正担心的是，英美会促成一场德苏之间无休止的消耗战。为表示愤怒，斯大林将马斯基和李维诺夫分别从伦敦和华盛顿召回。

罗斯福和丘吉尔通信磋商，此后，他们分别在6月14日和6月20日回复斯大林。他俩都对苏联领导人的“失望”表示理解，但各国在共同事业中所承受的战争努力是理所当然的。他俩提议及早举行一次三方会议，而且丘吉尔还暗示，轴心国在非洲的失败使德国无力在苏联发起一场重大的夏季攻势。

斯大林与丘吉尔进一步交换意见，其结果令人不快。丘吉尔于6月28日向罗斯福指出，尽管东线的相对平静“并非必然源于我们在地中海采取的行动”，但苏联前线不会发生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变故——例如与希特勒单独媾和。

两位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样的想法，只要存在下述现实可能性，斯大林就会继续留在同盟国一方：击垮德国；在德国获取一个苏联占领区；在中、东欧地区取代德国的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英美在西线向德国发起进攻。如果他得出下述结论，那他就不会继续与同盟国站在一起：英美只是在推动苏德之间的战争，并非试图亲自击败德国。

正如罗斯福和丘吉尔所怀疑的，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就和解的可能性进行了试探。一位叫彼得·克莱斯特的德国外交官的确收到埃德加·克劳斯代表苏联外长亚历山德罗夫提出的建议，这位克劳斯是一位国际商人，其国籍不详。克劳斯称，苏联对西方盟国感到不满，对恢复1939年苏德边界感兴趣（这将使德国控制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但希特勒对此不予理睬。

7月5日，希特勒在库尔斯克以坦克战向苏联发起了强大攻势，德军遭遇灾难性失败。最初就反对入侵苏联的里宾特洛甫重新激活了克莱斯特–克劳斯对话。这两人于9月4日和8日在斯德哥尔摩会面。苏联人仍然对单独媾和感兴趣，但由于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他们现在希望得到1914年的俄德边界，并希望德方解除里宾特洛甫的职务。

西方盟国于9月8日进攻意大利，意大利随即脱离轴心国阵营。里宾特洛甫恳请希特勒允许会谈继续进行，尽管苏方的条件中有要求其离职的内容。希特勒考虑了里宾特洛甫的请求，在墨索里尼抵达后——他被德国伞兵营救出，希特勒称自己正在考虑与苏联人达成协议。但过了几天后，他再次拒绝授权进行实质性会谈，他向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即使我今天与苏联人达成了协议，明天又得对它动武。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

希特勒最终还是派克莱斯特回到斯德哥尔摩，但克劳斯于9月28日告诉后者，苏联人不再对会谈感兴趣了。斯大林告知美国人，这些接触纯属德方主动提出的倡议。有关各方长期以来试图举行有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参加的会谈，时间初步定在两个月以后，这也有助于暗示斯大林，他应该放弃与德方的会谈。

罗斯福曾将自己有关举行斯大林–罗斯福会谈的建议口头告知丘吉尔，丘吉尔则写道："如果你能使他与会，我是不会试图加以阻拦的。"

某些不善深思熟虑的西方人士坚持将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视为冷战的开始。西方为苏联的生存创造了可能性，非洲和意大利的战事严重消耗了德国的实力，而且正如斯大林最终所承认的，对德国的轰炸也具有军事意义。1943年夏季来临时，德军在苏联境内重新发起的攻势遭遇失败，他们因最近的一系列失利而被大大削弱，苏联红军现在则变得异常强大，斯大林随之在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也变得不那么斤斤计较。争夺欧洲重大地缘政治资产的斗争已经开始，这一争夺

开启了冷战。将盟国结合在一起的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要性，而不是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之间某种伟大的利益共同体，甚至也不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在认识上的某种一致性。

Ⅳ

1943年7月10日，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7集团军和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的英国第8集团军在西西里岛东部和东南部登陆。一份主要由罗斯福撰写的声明以美英两国领导人的名义向意大利人民发布。它提到墨索里尼实施的“可耻领导”，赞扬意大利人“勇气十足地”进行了战斗，但指出“他们在各个战场上……都被德国人背叛和抛弃了”。只有与“德国人以及那些虚假而腐败的领导人”决裂，并求助于你们的“自尊和利益”，才能恢复“国家的尊严、安全及和平”。“你们做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意大利人是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死，还是为意大利和文明而生？”

7月5日至7月13日，在库尔斯克附近的战斗中——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战之一，苏联人在空中以及地面上都击败了德军，希特勒将此归咎于盟军对西西里的进攻。他公开声称，将几个装甲师调离苏联。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德国再也不能在苏联系统地发起进攻了。除偶尔零星地进行一些反扑外，东线德军将在两年时间里处于退却状态，一直退到柏林。

借助于占据压倒优势的海、空力量，巴顿和蒙哥马利出色地指挥自己的部队，在8月17日就清除了西西里的德、意军队。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万人；德军战死和被俘的人数达1.2万人，当时开始彻底崩溃的意大利部队损失了14.7万人，大都成为战俘。

当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墨索里尼就被他本人创设的法西斯党最高会议除名了，甚至连他的女婿、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也投票反对他。意大利国王邀请曾担任过墨索里尼参谋长的巴多格里奥元帅出任首相。

7月28日，罗斯福对全国发表“炉边谈话”。他回顾了盟国在战争中取得的出色进展，并欢庆“墨索里尼及罪恶、腐败的法西斯政权的倒台，该政权的有关人士……将会因其犯下的反人类罪而受到审判和惩罚。我们绝不容许法西斯的残渣余孽继续存在”。

他概述了《士兵权利法案》的有关内容，并承诺说，武装部队士兵不会“在复员后面临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困境”。他回报英国首相经常对他进行的公开赞扬：“温斯顿·丘吉尔的言行体现了英国人民在此次战争中那种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全世界都知道他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很快就表明，意大利新政府打算退出战争，但英国最高指挥层慢慢才意识到，德国人将会固守意大利的每一英寸江山。“软下腹”理论在政治上言之有理，但只要瞥一下地形图就会发现，这里在军事上绝不是什么“软下腹”。

当西西里岛上的抵抗停止之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四分仪会议上再次碰头，地点是在魁北克。尽管三叉戟会议就霸王行动（计划于1944年春发起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行动）达成协议，但四分仪会议给美国人留下明确的印象：丘吉尔仍然在竭力寻求替代方案。他试图在挪威实施行动，对此，与美国人一样，布鲁克及其他英军参谋长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边缘地区发起行动不会对德国人构成威胁，只会将部队消耗在一个容易遭受失败的次要军事行动上。四分仪会议同样争论激烈：布鲁克认为，在意大利采取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它可以为实施霸王行动创造必要的条件，马歇尔则将这种说法视为英国人虚伪的进一步表现。

马歇尔表示自己愿意利用意大利境内的薄弱环节，在代价不高的情况下尽可能占领该国更多的地区，但还不至于重新考虑霸王行动。布鲁克就这一主题大肆发表自己的见解，即在意大利采取的行动规模越大，霸王行动实施起来就会越容易。

马歇尔指出，如果集结于英国的美军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就要重新进行部署，但不是到地中海地区——英国人希望美军在这里承担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山区的战斗任务，而是到太平洋战区——这意味着，美国无须与英国人讨论美军在该战区应如何部署。

刚刚拜访过丘吉尔的史汀生告诉罗斯福：“英国人只是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停留在口头上……他们仍然认为可以通过消耗战来击败德国，但那类小打小闹糊弄不了斯大林。”史汀生称，这使得由美国人指挥霸王行动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指出：“我们没有理由期待英国人会指挥我们去与德军殊死搏斗。”

那天早上，预计到罗斯福会提出此种要求的丘吉尔主动提出，这一职位由美国人担任，尽管丘吉尔向布鲁克暗示是罗斯福要求的。

四分仪会议期间，英美在8月16日的会议上努力弥合双方的分歧。布鲁克指出，美国人不相信英国人是在全身心地投入霸王行动，而英国人担心，美国人对霸王行动太过专注，以至于会不顾1944年春的战略情势强行加以实施。

8月17日，就在罗斯福抵达之前，双方打破了僵局。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能够向领导人送上一项较完整的协议。美国人接受了英国就霸王行动所重申的义务，而且承认意大利战事将有助于分散德国用于抵御该行动的兵力。

美国人此时注意到，苏联对西方盟国的态度日益恶化。马歇尔指出，他们先前一直要求提供更多的援助和早日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则

正回到对西方持怀疑态度的敌对立场。罗斯福在1943年8月23日强调，西方盟国有必要与苏联人同时进入柏林。布鲁克向他保证，已经在着手准备这样的应急计划。一旦西方盟国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相对于西线的战斗，德国人对苏联人的抵御有可能猛烈得多，这样一来，在向欧洲心脏地带推进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部队就能够比苏联人更加迅速。

英国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在战后持这样的立场：他们曾就苏联的威胁向无动于衷、天真幼稚的美国人发出警告。在四分仪会议上，有关苏联的问题完全是由美方单独提出的，罗斯福和马歇尔清楚地意识到，要使尽可能多的欧洲地区重新为西方所控制，其途径就是尽可能早、尽可能狠地实施霸王行动。

苏德战争异常惨烈，双方屠杀的战俘最后加起来近500万人，此外还有几百万军人和无数平民死亡。因此，德国人一旦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们就会正确地推断，自己的最佳机会在于：在西线投降；享受《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总体上看，在对待西方盟国的战俘时，德国遵守了这些规定；把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交到西方列强手中。占领德国是此次大战在政治上的最高战利品，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已经把注意力集中于此。英国人此刻还没有强调占领德国的重要性，但按马歇尔的说法，“罗斯福意识到了占领柏林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20
永远都占不到半点上风

1943年6月18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写给邦纳·F·福勒斯将军的信中如是说

I

1943年，军事形势的发展对同盟国明显十分有利。在这一年里，几乎所有的会议都是围绕着两个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二战”最后阶段的军事战略，以及怎样才能夺取更为优越的战后国际地位。人们期待已久的西方同盟国领导人和斯大林会晤的道路终于铺平了。这次会议将于11月末在德黑兰拉开帷幕。丘吉尔、罗斯福和蒋介石也将出席这次会议，并参加讨论。

10月，罗斯福推动了《战后退伍军人安置法案》的顺利通过。这是罗斯福推行“新政”的五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也无疑是让民众受益最多的一个阶段，这确保了人民在战争最为紧要的关头依然会对政府忠心耿耿。但是，罗斯福现在一心考虑的，差不多都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提出将跨越海峡的袭击推迟到1944年后，斯大林突然宣布从华盛顿和伦敦召回他的大使们。顿时，一种对苏联会与德国单方面媾和的不祥预感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如果德国抛弃了希特勒，而西方单独与德国媾和，这一切将会成为斯大林的梦魇。而英美联盟则担心斯大林会与希特勒合作，而这仍有可能成为现实。1943年的夏天，即使苏军将德军逼得节节后退，但还是能看出他们对开辟第二战线的热情明显下降了。

在战后重新开展革命和颠覆性活动之前，斯大林想要席卷所有的战利品。英国与美国在战争中形成了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丘吉尔想借此来稳固英国业已取得的影响力，并尽力维护大英帝国昔日的荣光。罗斯福必须尽力完成让美国走向世界的伟大进程。他认为，这最好能在明显的理想主义的框架下得以实现。罗斯福逐渐将联合国从一个口号发展到一个概念。罗斯福相信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充满智慧和人性主义精神。

罗斯福也深信帝国主义同样要奄奄一息了。罗斯福骨子里是个地地道道的亲英派，罗斯福喜欢丘吉尔并且尊重他，但是现在他们正分道扬镳，追寻各自不同的目标。

在1943年11月11日“美国退伍军人节”那一天，罗斯福总统在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陪同下参拜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不同寻常的是，这一次罗斯福并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这是他几周内最后一次在华盛顿出现。当夜，他在白宫车队的护送下，驱车前往弗吉尼亚州的匡恩提科。在这里，他登上总统游艇波托马克号，驶往切萨皮克湾。

罗斯福有一种水手一般的迷信思想，当快到周六的时候，他请求艾奥瓦号的船长不到半夜不要起航，因为水手们一贯认为周五起航是不吉利的。艾奥瓦号预期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罗斯福将从那里搭乘飞机前往开罗和德黑兰参加会议。

在他写下的航海日志的第一页，罗斯福记录道：艾奥瓦号和她的姊妹舰新泽西号是“全世界最大的战列舰”。这充分说明了美国海军情报网的信息不充足，因为当时日本战列舰大和号的排水量比它们多了整整2.5万吨，而且大和号的装甲也更厚，火力也更强。但是艾奥瓦号速度更快，而且美国海军火力攻击的精确度也更高，因此如果这两艘战列舰要和庞大的日本战列舰交火的话，对日本人来说也是一场恶战。

除了11月14日发生了一点有惊无险的小风波外，这次横渡大西洋的旅程算得上是风平浪静。一艘护卫巡洋舰上发射的一枚鱼雷差点误伤了艾奥瓦号，幸好及时避开了。如果这枚鱼雷命中的话，旗舰当然不至于沉没，但会影响它的前进速度，海水就会涌进装甲层之间，这会让大家都觉得很尴尬下不了台。

丘吉尔也于12日前往直布罗陀，这一次他搭乘的仍然是利朗恩号，这艘船担任舰队的旗舰已有好几年了。因为丘吉尔当时得了流感，整天都得待在舱房里。

11月18日，丘吉尔把布鲁克和其他的主要官员召集到了一起。丘吉尔谈到美国人“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布鲁克对此印象颇深。丘吉尔预料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并对布鲁克和别的官员大发雷霆，丘吉尔还“喋喋不休地臭骂了一顿邪恶的美国人”。丘吉尔宣称，如果美国人不对他的地中海计划表示更大的支持，他将会威胁从跨越海峡作战的行动中撤出援助。如果美国人也威胁说他们要撤离太平洋的话，丘吉尔一定会请美国人自便。

罗斯福最初反对在苏波边界上就继续向西进军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是说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纳入苏联的版图。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1942年5月，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伦敦时，罗斯福曾经避免英国在这些问题上屈从于苏联。到了1943年3月，艾登去华盛顿拜访罗斯福时，总统正准备接受寇松线（凑巧的是，这条线和纳粹与苏联签署的边界线非常吻合）。他也不可避免地会在波罗的海诸国的问题上向苏联妥协，虽然他仍然更希望看见某种形式上的公投，即使这一过程中充满了欺骗性。这一希望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性，这充分说明罗斯福对斯大林并不完全了解，因为斯大林认为苏联拥有对原沙俄时代全部领土的统治权。

1943年5月，从在莫斯科召开的会议回来没几天，约瑟夫·戴维斯前往墨西哥与苏联驻该国大使康斯坦丁·欧曼斯基进行会晤。戴维斯知

道他对斯大林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为欧曼斯基之前也曾任驻美国大使。欧曼斯基向戴维斯通报说，斯大林认为丘吉尔是个没有理性的反共分子，并且认为他可能对罗斯福产生一种负面影响。戴维斯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了罗斯福。

欧曼斯基告诉戴维斯，斯大林意识到任何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会谈，都感觉到英美两国的领导人已经绑在一块了，他面对的只会是英美已经做过事先安排并且是立场一致的情形。这是斯大林对会议安排如此固执己见的原因之一，他因此拒绝和西方领导人的会晤地址选在比德黑兰更远的地方。

在1943年10月19日莫斯科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上，罗斯福甚至让科德尔·赫尔去和斯大林确定一个对于他来说更为方便的会议地点。赫尔奉命行事，但是没有成功，可这促使斯大林做出了对德战争一结束就立刻加入对日作战的决定。赫尔曾经这样描写罗斯福，他认为罗斯福就“像个小男孩似的，对于和斯大林的会面充满了热切的期待”，这一急切的心情从来没有消减过。相反，斯大林对和同盟国的接近满怀疑虑，他从来没有对美国表示出丝毫的依附和信赖。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西方的同盟国家和苏联之间，已经开始产生了裂痕。

罗斯福再次在艾奥瓦号上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汇报了他们对于分区占领德国的观点。军事形势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对此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看法和考虑。英国已经尝试向美国提出占领法国和德国的南部地区，而英国则占领德国西北部地区。罗斯福对占领法国毫无兴趣，并且提议英国独占整个法国。

罗斯福也希望让英国负责卢森堡、比利时、巴登。他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撕下一幅地图，并在上面画了三条线，声称美国抵制英国倡议美国进入德国南部的努力。

罗斯福认为有可能“不经过太多战争，甚至不进行任何战争就可以占领德国”。此时，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但这并没有削弱罗斯福的乐观主义精神。马歇尔和其他人向总统提议，美国人应该向欧洲进军。

罗斯福怀疑英国试图阻止美国进入巴伐利亚，也没怎么注意马歇尔提出的交换战线的可能性。罗斯福大致上准备支持马歇尔在军事上的安排，但是在涉及政治、外交、国内局势的问题上，根本就懒得搭理马歇尔的想法。英国人和美国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苏联人肯定会占领德国的东北部，但是罗斯福希望美国军队应该尽快占据柏林。罗斯福说，“占领柏林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美国一定要获得胜利。罗斯福预计在两年之内，他会在欧洲保持一支100万人的军队。他并没有提及两年后的打算，也没有提及这次军队什么时候会撤离，也没有说会将驻军裁减到什么规模。

紧接着，在开罗将要召开的英国和中国的会议，以及此后在德黑兰召开的与英国和苏联会议的大致议程已经制定出来。罗斯福深信美国已经走出了孤立主义，他认为美国人更情愿在国际性力量下采取相互合作以及合法防御的行动。

因为新闻界的泄密，即将在开罗召开的会议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很大关注。罗斯福建议将这次会议移至苏丹的喀土穆去进行，而艾森豪威尔则建议在马耳他举行。当时就身在马耳他的丘吉尔说，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艾森豪威尔又转而支持在开罗召开，甚至保证在必要的情况下提供空中掩护。

Ⅱ

11月20日早晨8点零9分，艾奥瓦号在奥兰港落锚，它是曾进入过这个港口的最大的一艘船。罗斯福和他的随行人员前往飞机场，从那里分乘多架飞机，在战斗机群的护航下，飞往突尼斯。在经历三个半小时略有颠簸的飞行后，总统专机降落在突尼斯附近。罗斯福前往艾森豪威尔的驻地卡萨布兰卡。

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宋美龄在11月20日已经抵达开罗。蒋介石在驱车前往开罗一家理发店的途中，吸引了很多群众围观，这让原来用在加强安全保卫上的大量心血都付之东流。温斯顿·丘吉尔乘坐利朗恩号抵达亚历山大港，并下榻开罗附近的迈纳宫酒店，这家旅店因为这次会议的缘故而戒备森严。在11月22日下午，罗斯福和丘吉尔还驱车观赏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在开罗举行的这次会议被称为“六分仪会议”，它于11月23日早晨在迈纳宫酒店开幕。罗斯福让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将军制定下一年度的作战计划。蒙巴顿向来口才出众而且充满自信，他提出了将日本人完全从缅甸驱逐出去的设想。蒋介石要求海上援助，这样战果会从缅甸扩展到更大的范围。丘吉尔向蒋介石解释说，如果采取这种军事战略的话，海军部队将要远离基地数千千米展开作战行动，这很难实现，为此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

布鲁克欢迎蒋介石麾下的将军们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且邀请他们就蒙巴顿总结出的计划发表评论，这一计划之前就向他们提交过，以供他们参考。（英国人是埃及的“主人”，所以布鲁克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史迪威认为布鲁克在向中国军官介绍这一计划时，故作谦虚而且一脸屈尊大驾的样子，这会让中国方面感到不高兴。

罗斯福对蒋介石已经不再抱有多少信心了。他曾描述蒋介石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罗斯福厌恶蒋介石的“腐败和低效……以及明

显对广大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缺乏同情”。但是，尽管感觉到“蒋介石的军队战斗力十分低下”，罗斯福除了支持蒋介石以外别无选择。（每当蒋介石发表讲演时，能说一口优雅而流利英语的宋美龄就会从椅子上猛然起身，取代了口译的工作，来完整地表达“蒋委员长的真实含义”。布鲁克认为，听众始终不确定他们听到的到底是蒋介石的意思，还是宋美龄的意思。）

史迪威认为布鲁克是个激进主义者，因为布鲁克无关痛痒地让中国人独自作战，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布鲁克对蒋介石采取蔑视的态度，但罗斯福正确地预见了中国在战争结束后会成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罗斯福试图在开罗会议上让蒋介石大获全胜，来加强自己反对日本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罗斯福决定由美国来武装蒋介石的60~90个师。罗斯福想要鼓励中国的军队采取积极的行动，在重庆和日军展开大规模战役。不管他们多没用，他们还是牵制了相当多的日本士兵。人们也不乏对中国会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担心，但是当胜利在望时，中国背叛的可能性甚至比苏联还要小。

关于代号“海盗”的安达曼计划，使得英国与美国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正面冲突。罗斯福认为应该采取一些行动，让蒋介石不至于空着手回去，而且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1月23日，英国人表明了反对“海盗”行动计划的态度。当天下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在中国将军们遭遇惨败之前，布鲁克解释清楚了自己的立场，他表示赞成放弃“海盗”行动计划，并且表示愿意在争夺丘吉尔眼下所觊觎的罗得岛的战斗中贡献一份力量，这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在当天傍晚和11月24日，丘吉尔发表了演讲，争辩说进军罗得岛更为有利。正如丘吉尔在发动对美国人突然袭击时的一贯作风那样，

丘吉尔试图和马歇尔进行私下会晤，希望能软化马歇尔的态度。丘吉尔深知马歇尔对罗斯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两人的交谈中，马歇尔对丘吉尔的演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则发现丘吉尔是个雄辩、博学、精力充沛、记忆力超群并且酒量不小的人。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

第二天早上，丘吉尔参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且声明这个行动会把土耳其也拖入战争。当这次会议讨论到罗得岛问题的时候，会场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根据马歇尔的说法，丘吉尔目中无人地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丘吉尔当时说："伟大的英王陛下的政府不能让他的军队无所事事，现在的形势如箭在弦上了。"在丘吉尔对战争做出总结时，他对在非洲、太平洋和苏联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表示欢欣鼓舞，但是对在意大利战场无法投入足够的兵力而表示"失望"。如果在意大利战场失利，这对英国来说，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因为英国已经无力动员更多的人踏上战场了。罗斯福列数了美国业已投入战斗的海军和陆军的庞大数量，并且还估计了可能增兵的数字。

11月24日与25日两天，蒋介石都大玩政治手段，先拖拖拉拉地浪费时间，表示同意这个提案，然后又翻脸不认账，争取更多让步。这让所有人都极为恼火。

11月25日下午，会议休会半天来庆祝美国的感恩节。在开罗的圣公会教堂里，举行了宗教仪式。当天傍晚，高级官员们参加了一个气氛活跃的晚会，大家都忘记了各方存在的尖锐斗争。罗斯福邀请丘吉尔和艾登一起吃顿便饭。在丘吉尔的记忆中，这顿饭是"一场愉快而祥和的盛宴……总统熟练地把火鸡分给了所有的人……在我们的交谈中，始终洋溢着温暖和亲密的气氛。在两个小时里，我们无忧无虑。我从来没见到过总统这么高兴过"。

丘吉尔一直谋求与罗斯福进行一次坦诚的私下交谈，以协调好英美应对斯大林的立场，但是没有成功。就如艾登所写的那样，丘吉尔

被限制住了，首相只能“扮演着彬彬有礼的角色，一旦机会出现时，就紧紧把它抓住。他在这件事情上竟然这么有耐心，令我感到很吃惊”。艾登和丘吉尔都认为罗斯福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乡村绅士”，但是当他们面对罗斯福不得要领的方法失去耐心时，也会开始像布鲁克那样骂骂咧咧。

11月26日的下午，海盗行动在马歇尔的支持下获得通过。这一计划被布鲁克称为“动乱之源”，他强烈建议应该先延缓执行这一计划，而是应该先集中力量打败德国。

和丘吉尔不同，罗斯福认为这次会谈十分成功。开罗会议暂时休会，差不多所有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团都在11月27日拂晓离开，前往德黑兰与苏联最高统帅召开会议。

III

在有关罗斯福前往德黑兰的路途和住宿问题上存在极大的争论。另外，在会议召开地点选择上也发生了让人不快的争执，斯大林在这一点上不愿意向美国总统做出任何妥协。在此之后，白宫派出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和总统的安全负责人麦克·雷里前往德黑兰，会同路易斯·杜佛莱斯为这次会议期间的旅行和住宿提供建议。

罗斯福可以选择空中航线和铁路交通等很多办法抵达目的地。总统的医生麦克因泰尔博士建议总统搭乘火车前往，因为高空飞行可能会加重总统的鼻窦炎，也可能影响到他的心血管系统和肺部健康。雷里报告说，乘火车会途经一些安全无法保障的地区，可能会有叛军或是德国伞兵出没。尽管当时飞机内部稳压技术比现在要差，但是总统还是决定从开罗飞往德黑兰。

美国在德黑兰的领事馆和英苏两国的大使馆紧挨在一起。鉴于三方领导人在德黑兰都不是东道主，三方会轮流提供会议地点。在罗斯福向斯大林征求会议安排时，斯大林和丘吉尔都邀请罗斯福住在他们的大使馆中，但是罗斯福最初还是谢绝了双方的好意。

当罗斯福飞临苏伊士运河、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上空时，飞行员特地在上空盘旋一阵，以便让他可以更好地欣赏下面的景色。罗斯福写道：“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可不想要把巴勒斯坦当成我的老家。”他们向东飞越了巴格达，并于11月27日下午3点降落在德黑兰机场。

到达的第一夜，罗斯福前往美国领事馆。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儿可真够脏的，还穷得叮当响。”只有霍普金斯、莱希和他的女婿约翰·保廷格等几个人和他待在一起，其他人住在几千米远外的波斯湾指挥中心。11月28日早晨，罗斯福搬到了苏联大使馆居住。一个长得很像罗斯福的人戴着费多拉帽(注)，披着斗篷，手里挥舞着烟斗，在规模浩大的车队保护下离开了领事馆。过了不久，罗斯福和他的几个亲信从座驾的后门出来，乘坐一辆车悄悄走开。这辆车几乎没有随行车队，总统觉得这次冒险经历让他精神为之一振。

几分钟后，斯大林就和他的译员抵达了。这位苏维埃的领导人也知道自己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他穿着芥末色的军装和闪闪发亮的大靴子，胸前戴着列宁勋章。

“你好啊，斯大林元帅。”罗斯福用让人放松戒备的口气招呼道。斯大林为这么早就登门探望罗斯福而道歉，但是斯大林也表示他要略尽地主之谊。罗斯福为斯大林的友好而向他致谢，并对斯大林的安排表示非常满意。

罗斯福在斯大林期望得到的援助面前摇摆不定，因为如果美国提供了这一笔援助的话，战后苏联的船只数量将要超过美国商船。斯大

林表示会对这笔援助心存感激，并保证愿意同西方共享苏联的自然资源。罗斯福提及了他与蒋介石的谈话，以及他想帮助蒋介石装备60个师的计划。斯大林对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嗤之以鼻，并且责备了国民党军队的领导人。斯大林还谈到了黎巴嫩的局势。

罗斯福和斯大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印度支那在战后不应该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取得独立。

在这次会晤中，双方就最重要的问题交换意见时，斯大林让罗斯福深信：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倾向的不同战略决策中，斯大林仍然主张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这使得罗斯福坚信斯大林能给予自己最大援助，让丘吉尔在霸权问题上回心转意，并且让丘吉尔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痴心妄想。

全体大会召开了。和斯大林的交谈使罗斯福心情愉悦，罗斯福向他的随从和儿子埃利奥特宣布他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晤令他非常满意。罗斯福表示自己喜欢斯大林，这意味着斯大林一定比罗斯福做出了更大的努力来赢得别人的喜欢。虽然对罗斯福来说，这一行为对他来说会更为自然。丘吉尔和罗斯福自开罗会议之后就没有进行过认真的交谈，而双方迄今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缩小双方提供兵力的差距。

罗斯福热衷于在战后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斯大林对这种理想主义的倡议根本就没有兴趣，并且认为这不啻是迂回地实现资本主义阴谋的烟幕弹。斯大林还猜测，英美会把一切他们想要的土地作为战利品而攫为己有。

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这一点很快便浮出了水面，他们显然都携带了武器，而且罗斯福的随从们还怀疑他们可能会

偷听并记录下美国人的谈话内容。对此，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猜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斯大林指示他手下秘密警察局局长拉夫连季·贝利亚(注)的儿子，去偷听并记录罗斯福对他的随从和丘吉尔都说了些什么细节，斯大林当时告诉小贝利亚说，要让他接手一项“不仅棘手的、而且从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的使命”。

小贝利亚宣称，他听到丘吉尔“恳求罗斯福不要向斯大林承诺一个跨海峡登陆作战的具体时间”。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斯大林安插的窃听者耳力所及的范围内，讨论了战后与苏联的关系的细节。但是，当美国的军力达到鼎盛状态之前，罗斯福提出的诸如让苏联对日出兵和建立他所谋求的国际组织等关键目标，只会在欧洲大陆上引起敌意。

罗斯福之前并没有收到国务院关于苏联问题的任何简报。罗斯福事前准备了一些军事提案，并对可能提及的政治事件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总之，对罗斯福而言，国务院也没多大用处。在罗斯福看来，这次会议要取得成功的话，很可能得依靠他和斯大林之间互信互谅的关系。斯大林则觉得罗斯福只是个“口蜜腹剑的朋友”。1944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一位共产党政治家说道：“丘吉尔连你口袋里的一分钱都不放过。而罗斯福可不是这样，他只把大票子掏走。”

IV

11月28日，罗斯福主持了第一次会议，看上去“就像是个有钱的伯伯，去屈尊拜访他的穷亲戚一样”。用苏联人的话来说，罗斯福对“新的家庭成员”表示了欢迎。罗斯福强烈要求每个与会者都自由发言，并

且再次保证所有的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丘吉尔说他们三个人代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力量的融合”，同时也力劝他们都使用这种力量来缩短战争的进程，并稳固和平的局面。接下来，斯大林开诚布公地表示，“历史宠幸”着他们，给了他们这样一个相互和解的机会，他们必须牢牢地抓住这次机会。

罗斯福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进行了一番军事战况总结，以此作为开场白。这个涉及太平洋占区的报告，总结了“重返欧洲这一最重要的战场”之前的局势。罗斯福客观地指出了因为霸权而导致的死亡人数，然后强调说因为英伦海峡是如此“险恶而难以逾越”，为此在5月1日之前，他不会考虑越过海峡作战。

罗斯福说，因为兵力有限，美国和英国只能在跨越海峡作战行动和大规模的跨大西洋作战行动中选择一个。罗斯福表示将向斯大林征求意见，看斯大林认为哪一项行动对于苏联而言帮助更大。

斯大林一开始就重申了8月份他在莫斯科对赫尔做出的保证，即苏联一旦打败德国后，就会尽快加入对日作战。这是这些会议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一幕：罗斯福关心的是怎样吸引苏联投入太平洋战争；而斯大林则担心的是，苏联在对日作战并取消《朴次茅斯条约》[注]之前，美国就会赢得这场战争。接下来，斯大林表示完全支持美国在西欧战场上的战略。斯大林坚信，希特勒想在意大利尽可能多地牵制住同盟军的师团。而在那儿，不会有任何的决定性结果出现。土耳其的参战对于同盟国来说，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巴尔干距离德国的心脏太远了。虽然说在巴尔干的战役可能会比在意大利白白浪费力量好点，但是“我们苏联人相信，最好的结果是要靠对法国北部或西北部的敌军作战才能取得……德国的致命缺陷就在法国。德国人会像恶魔似地发起战斗来避免遭受到这样的进攻”。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丘吉尔随之发言，并表示他支持霸王计划，但是他也补充说，在战争初期英国只能投入16个师的部队，除此以外，英国再也没有力量在这个前线投入更多的兵力了，因为它所有的其他兵力都已经卷入战斗之中。美国和苏联还在源源不断地征召士兵入伍，武装他们，再把他们送上前线，两国的兵力资源仿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大英帝国已经黔驴技穷了。

美国可能会派19个师的部队投入霸王计划，加上英国的16个师，这就差不多在兵力上和德国的40个师持平了。如果一开始的登陆能够成功的话，实际上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涌入法国，不过这可不是英国的军队。随着法国傀儡政权的力量一一被肃清，法国的革命武装就会在西部边界上快速涌现。

丘吉尔对在两个月内攻陷罗马很有信心。丘吉尔为了将土耳其卷入战争，而为土耳其提供了最优厚的条件，还给土耳其人描绘了战后可能出现的最美好的蓝图，并告诉土耳其人有可能取得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希腊的控制权。

丘吉尔向斯大林征求意见，斯大林详细地向他询问了每一个步骤的细节以及暗含的用意。经过了几分钟的反复推敲后，斯大林宣称：“将力量分散到土耳其或者其他地方与分散到法国南部都是错误的……法国才是德国前线上最弱的一环。”斯大林不相信土耳其会愿意卷入战争。

丘吉尔几乎悲痛欲绝，他之前以为苏联会希望土耳其参战。这位英国领导人对攻陷罗马和霸王计划展开之前的6个月中毫无作为，表示出了极度的关切。丘吉尔不得不痛苦地决定采取守势。他解释说，罗马北部的飞机场对于发动对德国的全面空中轰炸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成功地攻占罗马，“将会被各方都认为是一场惨败，对于这种想法，英国的议会连一分钟都无法忍受”。

斯大林并没有就最后一点直接做出答复，他认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它们运作的微妙之处其实就靠这些胡说八道。丘吉尔之前努力地挽救大英帝国，并领导英国民众团结一心共同抗战，他绝不可能只是因为没有攻占罗马而被议会撵下台的。

丘吉尔请求重新考虑在地中海再开战局的选择，并考虑让土耳其参战的可能性。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斯大林承诺将派几名将军去参加马歇尔和布鲁克等人的讨论。斯大林表示，所有的中立国家都认为交战国是“傻瓜”。罗斯福也表示了土耳其如果参战，可能会要求提供给它大量的战斗机、坦克和别的军事装备，这令他感到忧虑。罗斯福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霸王计划实施的时间表。罗斯福保证会去试图说服土耳其人加入同盟国，但对此不持乐观态度。会议暂时休会。

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开端。英国与美国在战略考虑上的分歧现在已经彰明显著了，这让苏联感到称心快意。斯大林在他第二次与丘吉尔的会面中，包括在他第一次与罗斯福的会晤中，就已经充分展现出自己诡计多端、果敢有力、计划周密的特性。

罗斯福想把苏联限制在东欧，并且让美国得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应许之地。罗斯福相信必须是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下，才能挫败孤立主义的恐慌，并让上述目标得以实现。罗斯福希望在这个框架之下，美国将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事态的发展也和罗斯福的期望不谋而合，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世界影响力更是达到顶峰。罗斯福知道，这样一个组织与共产主义比起来，毋庸置疑，是一个更容易让人接受的选择。罗斯福希望能够让斯大林认识到，苏联最好还是乖乖地选择这样一条合作道路。

斯大林参加了有关对日作战的讨论，但他不会参加美英两国军事人员关于从西欧的哪一片海滩登陆的商讨，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派地位显著的将领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

根据丘吉尔的回忆，他当时尽量避免直接批评罗斯福，虽然他曾暗示其结束战争的安排并不理想。丘吉尔担心法国的北部会再一次血流成河，甚至可能会出现另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他只是不敢再直呼这个名字。

罗斯福坚持不愿意给斯大林留下美英两国勾搭成奸的印象，而丘吉尔又是如此坚持要无限期地推迟霸王计划，斯大林其实成了两者间的调停人。实际上，罗斯福因为斯大林的愤世嫉俗而获益颇丰。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动机能促使斯大林对这一提案表示赞同，并让他在欧洲尽力西进。这对于苏联自己设计的战后目标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帮助。

罗斯福的战略和政治视角极为敏感；斯大林则极其贪婪；丘吉尔很机敏，但是有一些多愁善感。

V

11月28日的晚上，罗斯福让巨头们到他的房间来共进晚餐。炉灶，甚至包括炊具和餐盘，都是罗斯福从苏联大使馆的住所里找出来的。结果，这次家宴取得了比之前举行的全体会议更大的成功与和谐。

罗斯福为了让宴会尽可能富有家庭晚宴的气氛，他亲自为客人调制鸡尾酒，就如他在白宫时每天享受的“儿童时光”一样。他习惯于将马提尼和大量苦艾酒混合在一起。当罗斯福为斯大林调制了一杯这样的酒，并且问斯大林觉得这杯酒味道如何，斯大林认真地想了想后，回答说：“嗯，还不错，就是喝了胃里有点冷。”和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斯大林更喜欢在晚餐时喝纯伏特加酒或高加索出产的烈酒。

斯大林最后详细地提出了自己对于德国和法国的观点。他希望这两个国家都自此一蹶不振，因为这些原因，他根本就懒得区分这两个国家间有什么区别。“整个法国的统治阶级都已经腐败透顶了，他们把法国白白地送给了德国……实际上，法国正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丘吉尔回答说，他无法想象“离开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法国，世界文明还能继续书写辉煌。”

斯大林要求像300年之前黎塞留曾经做过的那样，将德国肢解。丘吉尔提议将德国的军工业和航空业设备拆下并运走。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指出德国的家具厂和手表厂也可以用来生产军备物资。

丘吉尔希望看到波兰的疆域能向西拓展，苏联的领土也会因此而增加，波兰失去的领土将从德国得到补偿。斯大林对此表示赞赏。

当这些谈话结束的时候，丘吉尔胜利地宣称上帝是站在同盟国这一边的。“至少我已经竭尽所能让他成为我们忠实的同盟者了。”斯大林咧嘴大笑，说道：“那恶魔就一定站在我这一边了。每个人都知道共产主义者是恶魔，那么，上帝就一定是个好心肠的保守党人了。”（丘吉尔可能还没斯大林那么相信宗教，丘吉尔是个自然神论信仰者。虽然斯大林蔑视宗教，但是尊重他母亲的宗教信仰，并且自己也相当迷信。）在这次谈话中，丘吉尔显得十分坦率友善，而斯大林的话则充满了神秘感。更为关键的是，他们两个人相处甚欢。这真是一个气氛活跃而且悠闲惬意的夜晚。

第二天，在全体会议之前，莱希、马歇尔、布鲁克、波特尔和伏罗希洛夫开了一个碰头会，准备召开更为详细的军事参谋人员会议。布鲁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力争夺回英国前一天丢失的阵地。

在斯大林拒绝提出任何问题或发表个人意见后，罗斯福提出了计划，想要建立一个战后国际组织。斯大林怀疑战争结束后，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强大有力的国家，并且提议在欧洲和远东分别设立两个委员

会，三大巨头都在其中发挥作用。罗斯福再次提出自己准备花费巨大的努力去说服国会，让国会同意授权建立武装组织的技术细节，罗斯福再一次拿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把斯大林缠得焦头烂额。

斯大林又像前两天晚上那样杞人忧天，大谈抵御德军入侵的问题。他预期德国会在15~20年内复兴，并且认为罗斯福设想建立的机构不足以限制德国。他认为在德国境内及其周围总会有军国主义复兴的火苗窜动，必须永远将它们扑灭。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罗斯福之前就宣称，在埃塞俄比亚战争时，他曾经督促法国关闭苏伊士运河，罗斯福认为那时候“四大警察”就能把这档子事搞定了。

第二次全体代表会议仍然是由罗斯福来主持的。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坚决要求美英两国告诉他霸王行动将由谁指挥。罗斯福说这一人选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斯大林则以为这句话暗指美英两国不愿承诺进行这一行动。斯大林觉得没有一个在“精神和军事技术两方面都可以胜任霸王行动领导者”的人物在场，就相当于这次行动不过是“随口说说的事”。丘吉尔最终插话说，将会由一个得到西方同盟国家批准的美国人来领导，具体的人选将会在两周内确定。这番话总算让斯大林平静了下来。

对于丘吉尔一贯关心的问题，斯大林仍然把攻占罗马、帮助南斯拉夫游击队和寻求可能的途径让土耳其参战这些事，全都当成是无足重轻的小事。斯大林强调了霸王行动的重要性，并且不愿意因为任何原因而将计划拖延。罗斯福打断了斯大林的话，说自己完全同意斯大林的观点。

斯大林之前在战场上取得了军事优势，他可以要求同盟国履行自己的承诺，来完成一些特殊的军事计划；丘吉尔还在坚持自己的军事计划，而这一计划可能会让同盟国分崩离析；罗斯福满怀热情地推动霸王行动尽早付诸实施，并且对自己设想的国际机构满怀激情，他已

经做好准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在别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在波兰边界向西推移的问题上，罗斯福向丘吉尔做出了让步。

在11月29日举办的晚宴上，人们尽情狂欢。主持这场晚宴的斯大林老是语带讥讽地嘲笑丘吉尔。丘吉尔在通情达理的时候，脾气非常温和；但是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像个小孩似的不可理喻。斯大林知道在苏德战争刚打响的时候，苏联的军队完全没有做好对付芬兰人的准备，但是仍然宣称苏军当时已经是“一支相当了不起的部队了”。斯大林接下来又重提了自己对德国的关注，他担心德国会再次崛起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斯大林宣称战争一结束，他就要枪杀5万~10万名德国军官。丘吉尔说，英国不会容忍这样的暴行发生。斯大林逐渐将这个数字降到了5万。丘吉尔激动地回答说：“我情愿现在就被你们拖到花园里去，一枪把自己给崩了，也不愿意因为这种恶行而玷污我和英国的荣誉。”罗斯福漫不经心地插话说，建议只枪杀4.9万名德国军官就可以了。

斯大林挨个向客人们寒暄问好。当轮到罗斯福儿子埃利奥特的时候，埃利奥特已经喝了一肚子的俄国香槟酒。埃利奥特也重提了斯大林刚才的话题，并且宣称这个问题“很有学术意义……当我们的军队从西部横扫德国的时候，你们的军队也会从东部涌入德国，我们大家会一起把这档子事办妥的，不是吗？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战场上杀他5万个以上的德国军官都难解心头之恨，我倒想……再多杀上他几十万个纳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埃利奥特刚要就座，斯大林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埃利奥特的身边，用手搂住他的肩膀，以示自己对他的欣赏。丘吉尔对此极为愤慨，他向埃利奥特怒吼道：“你是想毁掉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吗？你怎么敢这样说话？”

这次宴会结束之后，英国驻苏联大使写道，他希望自己能够“记录下来（那些大人物们）都说了些什么，这样人们就会知道有时伟人也

会说蠢话”。丘吉尔写道：“如果斯大林愿意的话，他可以变得很有魅力，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的魅力有现在这么大。”

后来，大家的谈话内容开始变得比较正常了。大家开始进一步讨论应该采取何种步骤来避免德国军国主义复兴。当斯大林刺激丘吉尔的时候，罗斯福几乎一声不吭。丘吉尔对罗斯福的沉默极为恼火。丘吉尔说英国不谋求领土的扩张，但“除非发生战争的话”，它也不可能放弃任何地方，尤其是香港与新加坡。

罗斯福对此不置一词，而斯大林却恭维丘吉尔，称颂英国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并且说这为大英帝国平添了许多光彩。当丘吉尔询问斯大林，他想要得到哪块领土的时候，斯大林拒绝回答，但是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来的。”

晚宴结束时，与苏联人一街相隔的英国大使馆发生了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丘吉尔与艾登想要外出呼吸点新鲜空气，就走出了苏联大使馆，边走边唱，他俩溜达了才几百米，就返回英国大使馆。因为首相的专车已经从主门开了回来，所以岗哨们以为丘吉尔已经返回大使馆了。因此，当丘吉尔敲门的时候，应门的士兵硬要他拿出点证据来证明这不是个恶作剧。

VI

11月30日是德黑兰会议正式召开的第三天，也是丘吉尔的69岁生日，他因此被安排担任今晚晚宴的主持人。在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命令下，应斯大林的要求，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那天早上碰了头，来确定实施霸王行动的具体时间。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苏联人能在1944年的6月1日在东部发起有效的进攻，来牵制德国的力量使之不能转战法国前线的话，美英两国将在同一天开始跨越海峡的作战行动。

就在同一时刻或稍晚些时候，盟军将会进入法国南部，分遣队会搭乘足够数量的登陆艇，跨越地中海作战。

大家终于摊牌了。

罗斯福前往苏联大使馆设立的外汇交换点（虽然当时旅游者的数目并不多，但是苏联大使馆为了方便旅游者的出行而设立了外汇交换点），并且买了一只碗给丘吉尔做生日礼物。在罗斯福回到自己住所后，他还接待了来访的年轻的伊朗国王。

在那天中午时分，丘吉尔单独会见了斯大林。“事实是……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之后，（罗斯福）甚至避免与我独处，尽管我们之前的关系十分紧密，关乎我们性命的事也密切相关。”也正是这一点，才让他寻求单独与斯大林面谈。丘吉尔担心，英国对霸王行动的态度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述。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英国必须首先考虑在地中海上的军事力量。他正在尽力改善这个战区的情况，避免推迟霸王行动。他进一步说明，任何拖延都不是因为他的过错，而是美国为了实现罗斯福对蒋介石许下的诺言，要求英国去采取大胆的海盗行动，进攻安达曼群岛。

甚至是在努力让斯大林相信自己并没有拖霸王行动的后腿时，丘吉尔也只能保证说，当苏联红军发动进攻的时候，“我们将把他们（德国人）牵制在意大利，可能土耳其人也会加入战争，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能确保胜利了”。这并不是一个很能让人信服的保证，这也让斯大林逐渐认清英国和美国在态度上的区别。不管怎样，斯大林一直没有试着这么做过。他好像只是把英国与美国间的摩擦看成是用来迷惑他的假象。

第三次全体代表出席的大会于当天下午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并不像以前几次的会议一样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和粗暴无礼的言谈举止。霸王行动最终得到了通过。当天，丘吉尔说的一句话成为整个德黑兰

会议上最为经典的发言。英国和美国准备动用大量的坦克模型，并在飞机场发射大量的通讯电波，用来制造空中交通繁忙的假象欺骗德国人；而盟军打算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声东击西，在别的战场准备真正的进攻行动。斯大林对这一做法表示反对。丘吉尔说，“真理”是值得用谎言去捍卫的。”总体而言，这次会议的气氛十分友好。

丘吉尔在英国大使馆举办了盛大的生日晚宴。丘吉尔提出，他们都应该遵照苏联人的习惯，任何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向别人祝酒。可以想见，这次宴会上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小型演讲。罗斯福优雅地向布鲁克祝酒，并提到他们是世交。当斯大林评价说布鲁克不喜欢苏联时，布鲁克起身祝酒，说这正是“真理是要用谎言去捍卫的”，自己其实是十分喜欢和倾慕苏联人的。据丘吉尔回忆，斯大林对这一回答感到满心欢喜。三大巨头随后都即席做了一次震撼人心的发言。

丘吉尔结束自己的演讲时，向贵宾们祝酒，但斯大林坚持为罗斯福和美国的军事装备能力举杯。1943年12月1日凌晨2点，在一片对英国首相大寿的交口祝贺声中，这场马拉松式的晚宴结束了。

德黑兰会议关于军事方面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各位陆海空将领休息了一天，并前往参观了耶路撒冷后，也离开了开罗。罗斯福不畏险阻来到德黑兰的真正目的，是要打破与斯大林之间的坚冰。这一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他事后对霍普金斯说：“我待在他的大使馆里，参加他的晚宴，被介绍给他的部长和将军们。斯大林是个正直、固执和严肃的人，他从来不苟言笑，没人能摆布他。如果早知道来这一趟只是做些办公室的文书工作的话，我当初真没必要长途跋涉来这里了。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和斯大林交好。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和他没有建立起什么私交。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外交部长们也能完成。”

罗斯福在赢得别人的好感上颇有天分，他总是能迎合别人的心意，巧妙地说服别人改变意见，而且总是十分机智。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罗斯福发现斯大林全然不为他的心动所动，固执的心扉不肯敞开时，罗斯福会如此大动肝火了。

正如瓦尔特·李普曼所说的那样，因为罗斯福从来不轻信任何人，他也不太可能会相信斯大林。罗斯福只是认为，斯大林是苏德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罗斯福想要在斯大林面前展示个人魅力，这只能说明在罗斯福为了重建这个世界秩序而定下的任务表中，斯大林榜上有名。不管怎么样，罗斯福的努力也不算是完全失败。

12月1日，政治会议召开了。这次主要是讨论关于土耳其、芬兰、波兰和德国等国政治方面的问题。丘吉尔对于鼓励土耳其参战所能带来的利益大吹法螺，并且毛遂自荐前往安卡拉游说土耳其政府，他还指出土耳其如果不参战对它自己只能带来巨大的损失。最后只达成了一个决议：邀请土耳其的总统几天后在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和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表会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与法国的政治家曾经成功地说服了罗马尼亚和意大利，让两国也参加战争。丘吉尔对此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在土耳其参战的问题上也能轻松地共襄盛举。丘吉尔甚至还设想过说服瑞典参战。丘吉尔威逼利诱其他力量参加对德国作战，对此他抱有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热情。1940年，英军曾狼狈地从那片海滩（敦刻尔克）撤退，他看起来不太情愿让自己的军队再重回伤心故地。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明了苏联的立场，他们希望可以加强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不然，苏联则无法顺利向土耳其提供援助。

在午餐时，罗斯福提出了有关芬兰的问题，询问美国能采取什么办法让芬兰结束战争状态。斯大林说，瑞典的外交大臣已经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但是他怀疑芬兰还在期待德国会取得胜利。丘吉尔说，他对芬兰人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而且觉得他们与希特勒沆瀣一气，向苏联发动进攻的行为也是让人不齿的。瑞典的外交大臣向苏联透露，芬兰人担心苏联人可能想把芬兰变成它的一个省。

罗斯福总结道，应该让芬兰人直接与苏联人谈判。斯大林虽然觉得为之要付出很多代价，但仍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接下来，领导人们短暂休会了片刻。罗斯福要求和斯大林单独见面。下午3点20分，在莫洛托夫、哈里曼和译员的陪同下，他们见了面。罗斯福对斯大林坦述了自己所忧心的同题：美国选民对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停战问题极为关注。罗斯福说，从个人角度上，他支持将波兰的边界西进400千米；但是，在美国大选之战结束以前，他不能公开表明这一观点。斯大林表示理解罗斯福的两难处境，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实际上，罗斯福宣布退出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因为他是如此关注波兰裔美国人的投票，因为不管他和斯大林做了些什么，他都能轻易地摆布那些波兰裔美国人，他只是尽可能拖延考虑这些问题的时间。

罗斯福深信在苏联人出兵之前，霸王行动及其后续军事行动能扫平整个法国，同时席卷德国的绝大部分疆土。英国人统率的军队会荡平意大利，确保英国西部的安全。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绝大多数地区又会将像三年前一样，重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返西方阵营。几乎整个欧洲也会因此变成民主的世界。这将会是意义相当重大的一项成就。

罗斯福仍然相信，还存在让苏联成为一个负责任、重法治的大国的可能性。最后，如果最糟糕的情况发生的话，也就是说，苏联占领波兰的话，这和德国的做法就没多大区别了。那么当前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提出波兰的讨论还是越少越好。

在罗斯福的主持下，德黑兰会议的最后一场讨论在当天晚上6点开始。与会人员热烈地讨论了意大利海军船只和商船的分配方案。最后，罗斯福发表了关于波兰政府问题的讲演。当时，波兰政府流亡到

了伦敦，罗斯福希望斯大林能够与之重建关系。这显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斯大林宣称逃往伦敦的波兰政府残杀在波兰的游击队员，其中也包括共产党人。丘吉尔也表明了英国的立场，他说正是为了保卫波兰，英国才加入战争的。

斯大林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反对波兰流亡政府的长篇大论，并且抱怨说，丘吉尔前天还说波兰木已成舟，现在又想要谈判了。（斯大林本人也知道，丘吉尔说的是波兰的边界已是既成事实，而不是说波兰的地位。）

会议开始远远地偏离原先的主旨，与会人员开始讨论波兰与苏联和德国的原定边界问题。人们把地图拿了出来，与会人员三五成群，一个个忙得团团乱转。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最后向波兰人解释说，他们要将一块沼泽地交割给苏联，但是他们会得到德国的一块矿产丰富的土地作为补偿，直到这会儿，才唤起了与会者的一点热情。斯大林说，他一点也不想照顾成批的波兰人。在这天下午早些时候，罗斯福就曾向斯大林暗示过会出现这种情况，此刻罗斯福几乎一言不发。

当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将波兰领土边界往西迁移之后，罗斯福提出了有关德国的问题。罗斯福再次提到，在历史上黎塞留和梅特涅统治的时期，德国被划分为107个行政区划，而这是德国最安全的时期。罗斯福计划，在将德国的大片领土划给波兰之后，由苏联吞并东普鲁士，剩下的领土划分成五个独立的州和两个由联合国托管的国际区域。丘吉尔想分割普鲁士，对其采取严厉的政策，并将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德国南部其他部分合并，建立“多瑙河联邦”。斯大林的想法与罗斯福更为相近，他觉得丘吉尔的办法可能会给德国军国主义的复兴提供温床。斯大林提醒道，所有的德国人都像“魔鬼那样好战，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的”。丘吉尔坚持将奥地利当作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来看待，这是他在这场会议里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正如罗斯福和马歇尔所担心的那样，霸王行动被拖延到了1944年。西方同盟国和欧洲中部的人民最终为之付出了代价。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斯大林也因此在英国与美国面前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在德黑兰，当三大巨头会晤时，斯大林处于最为有利的形势，除非罗斯福愿意摆出自己军事物资供应者的身份来。显而易见，斯大林想要影响波兰政府，而这种影响力肯定会在波兰的政府里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任何防范措施都证明是徒劳无功的。

当14个月后召开雅尔塔会议时，英国与美国在西线上也已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苏联人的战略领先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动摇。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德黑兰会议上，关于霸王行动问题，如果斯大林不是一味固执地对他的同盟者抱有怀疑的话，他就会和丘吉尔相处得更好。而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苏联就可能占有德国的绝大多数领土，同时他还会完全控制奥地利、希腊、丹麦和南斯拉夫，而在法国和意大利也更有可能出现中立的或是偏向共产主义的政权，甚至有可能是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权。从德黑兰会议的各个层面上来进行分析，斯大林的表现不错；对罗斯福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而丘吉尔把自己坚持的原则都给弄丢了，他认为自己的表现糟糕透顶，但是丘吉尔却在自己反对的决定中获益匪浅，还在奥地利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成功。这三个人都显示了他们的个性魅力和能言善辩，这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霸王行动一经提出，布鲁克就坚决表示反对。所以，他认为德黑兰会议失败的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可以理解的。而让蒙哥马利作为霸王行动的指挥官这一观点就让人觉得无法理解。

Ⅶ

12月1日，德黑兰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斯大林主持的晚宴。在这场晚宴中，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关于通过一个各方共识，特别声明和公报的总结。除了在霸王行动上达成的一致外，会议还决定苏联同时在东部战线上向德国展开反攻，确定了波兰边界，以及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等问题。

晚宴后，罗斯福立即离开了苏联大使馆，驱车前往几千米外的阿米里巴德军营。第二天早晨，罗斯福对医院的病人、员工和军营里的士兵们发表了演说，随后乘车来到机场，飞往开罗。飞机于l2月2日下午4点着陆，他和丘吉尔共进晚餐。美国人计划12月5日或6日离开开罗，英国人对此大吃一惊。布鲁克在日记中愤然写道，“美国人曾在蒋介石和斯大林的身上浪费了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都还没跟他们谈成点什么呢……我都有段日子没看见过这么糟糕和困难的局面了。”这是布鲁克惯用的夸张语气。罗斯福已经离开美国三周了，要回家他还得长途跋涉。同时，罗斯福和斯大林在讨论上花了很多时间，虽然没取得多大成果，但毕竟没有浪费一分钟。

因为英国的坚决反对，罗斯福认为海盗行动不切实际。12月5日，他告诉手下的参谋人员停止为之争辩。英国人的看法毫无疑问是对的，蒋介石根本不配得到这么好的援助。

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同日抵达开罗。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谈判家，并且声称除非得到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外，否则他不会考虑让自己的国家卷入战争。而正如伊诺努所确信的那样，同盟国会发现自己很难挤出这么多军事物资来。

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对土耳其总统施压，罗斯福决定推迟回国的日期。丘吉尔极尽其能言善辩之才能，把土耳其的领导人说得频频点头称是。但是，丘吉尔不允许任何人记录他所说过的话。罗斯福从来就没相信过这种计划能成功，因而态度相对冷淡，伊诺努对军事援助

的要求只收到了一个推搪的答复。实际上，对于伊诺努来说，比起德国来，苏联的力量更有充分的理由让他忧心。

丘吉尔和艾登到飞机场去为伊诺努送行。在这名土耳其领导人登机之前，他拥抱并亲吻了丘吉尔。丘吉尔对艾登说，“你看见了吗？伊诺努亲了我一下。”艾登则回答说，这是他们从伊诺努身上捞到的唯一东西。

12月7日黎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开罗机场互相道别。罗斯福乘飞机前往突尼斯，在那里，他将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罗斯福询问马歇尔下一步想接手什么工作，马歇尔说自己指挥霸王行动或继任陆军总参谋长都无所谓，他没有在这两个职位中表明自己的偏好。对于马歇尔来说，这应该是个无私的行动。其实他更愿意担任霸王行动的总指挥官，但是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私欲影响总统的公正判断。

罗斯福接着说道：“如果你不在华盛顿的话，我都不能睡上一晚安生觉。”罗斯福到达华盛顿没多久就通知艾森豪威尔，他被任命为霸王行动的总指挥。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打招呼时说：“好啦，艾克，你最好开始整理行李吧。”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霸王行动来说，总指挥官的最佳人选非麦克阿瑟莫属。布鲁克和戴高乐都承认，麦克阿瑟是西方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但罗斯福和他的继任者不同，罗斯福有足够的权威和自信来控制住局面。

麦克阿瑟可能会更受苏联人的喜爱。作为一个战区司令，即使是在撤离菲律宾的时候，麦克阿瑟永远会按照自己制定的外交政策出牌，并且想诱使苏联对日本出兵。虽然他支持军事反共，在战争结束时，麦克阿瑟可能会在占领欧洲领土的问题上，比艾森豪威尔走得更远。（他还曾威胁说，要把一切胆敢踏上日本领土的苏联人都关押起来。）

如果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霸王行动在1943年9月展开，同时由麦克阿瑟获得领导权的话，历史可能会改写，而且这次行动不会有那么大的危险性。同时，人们认为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同盟国可能会提前一年打到莱茵河畔，而那时德黑兰会议都还没有召开呢，甚至可能那时苏联红军还没有打到维斯图拉河呢。那时候，还有可能改变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场，让这几个国家像芬兰和奥地利那样保持中立，甚至可能会降低冷战爆发的可能性。

麦克阿瑟是个很情绪化的人，而艾森豪威尔则与之不同，他是性情温和的人。但是麦克阿瑟天资聪颖，而艾森豪威尔只能算得上是普通人中的佼佼者。

罗斯福的这一人事任命也存在一些政治上的考量，因为麦克阿瑟非常以自我为中心，不排除他日后步上政界、参选总统的可能性。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罗斯福早就已经注意到了麦克阿瑟的政治野心。但是，正如我们在本书后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麦克阿瑟在政治上差不多就是一个低分的无能儿。

历史证明，罗斯福不仅任命了霸王行动这一历史上最伟大军事行动的总指挥，还为美国选定了一位未来的总统。虽然麦克阿瑟比艾森豪威尔大十几岁，而且更加雄心勃勃，也是公认的一流的演讲家，但是罗斯福一直认为，要是由麦克阿瑟来担任美国的最高领导人，美国的前景实在堪忧。

如果事态的发展正如英国希望的那样，由马歇尔负责指挥霸王行动，而艾森豪威尔担任陆军总参谋长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两个人都会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双方都不一定能发挥出他们的最佳水平。

这些都是充满了变数的猜想。因为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设想并没有在1943年真的推动跨海战役的启动，罗斯福在人事上的选择是否是最

好的决定，也不得而知。但是，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决定，而且是最为保险的决定。艾森豪威尔令人无可指责地完成了打败德国的命令，而麦克阿瑟也在太平洋战场上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马歇尔也表现得不错。他们之后在仕途上的发展都很顺利。

在突尼斯逗留期间以及后来的一段交往岁月里，罗斯福那丰富的地理知识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罗斯福对自己和苏联人打交道的能力极为自信，而且有关占领德国的最初设想开始慢慢在他的脑海中成型。重新考虑将更多的导弹部队安排到五个州和两个国际共管地区后，罗斯福想把德国划分为三个自治区，由三大国分区占领。

罗斯福希望西方同盟国在德国开展的军事行动一帆风顺，可以轻松攻下柏林，这样他就可以凭借他们在德国取得的影响力来和斯大林讨价还价，并可以使用数额巨大的经济援助来重建饱受蹂躏的苏联，用这些手段来确保苏联人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不会采取野蛮手段。

12月7日，罗斯福在突尼斯与艾森豪威尔、卡尔·斯帕茨将军（北非空军司令）和自己的儿子埃利奥特共进了晚餐。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艾森豪威尔、莱希等人劝说罗斯福放弃前往那不勒斯巡视海军和陆军并以此来鼓舞士气的计划。罗斯福12月8日前往马耳他。

12月8日晚些时候，罗斯福重返突尼斯。他检阅了士兵阵容，把他们看作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勇士，这极大地鼓舞了士兵们的斗志。尽管希特勒和斯大林可以身体力行，他们甚至比罗斯福离战线更近，但是他们几乎没有出现在士兵的面前。丘吉尔即使在战斗时也很少像罗斯福这样近距离地接近士兵。根据宪法，罗斯福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两项重任。很多年轻的应征的新兵，自打记事起，就一直是罗斯福担任着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出现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并给所有的美国国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12月9日，总统一行人离开了突尼斯前往达喀尔。后来，总统一班人马起航回国。

整个横穿大洋的过程，悠闲而宁静。12月16日，艾奥瓦号停泊靠岸。在罗斯福离船前，他在后甲板上向艾奥瓦号的船员们发表了一个演说。公众和记者们对德黑兰会议和公告的态度几乎一致是拥护的。苏联的媒体在提到西方同盟国时，也比之前的语气要友善得多。这是自凡尔赛会议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多国峰会，而这次会议也让整个世界为之激动不已。但是，斯大林对于他的盟友的可靠性依然抱怀疑态度。在很多场合下，斯大林都表现出对自己的西方盟友是否发动对德国的正面进攻感到怀疑。

1943年12月21日，哈里·霍普金斯搬出了白宫，和他的新妻子一起住到了乔治城的家里。他的离开让罗斯福觉得白宫分外阴沉。他没花费多大气力就说服了女儿从西雅图的一家报社辞职，并让她从1944年1月开始总管白宫事务。罗斯福还答应在参加下一次峰会的时候，携女儿一同前往。

---

1. 一种帽顶相当低，并有纵长折痕且侧面帽沿可卷起或不卷起的软毡帽。——译者注
2.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899~1953），在斯大林时期任苏联秘密警察局局长（1938~1953）。——译者注
3. 1905年9月，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权益让与日本。——译者注

第五部分 美国治下的和平
1944~



21
没事，我们放手干吧！

1944年6月4日，艾森豪威尔下令克服恶劣的天气状况。27个小时的部署之后，200万士兵、4500艘战列舰和12000架飞机投入了反攻西欧的战斗

I

1944年1月，安娜·罗斯福作为她父亲的助手和伙伴来到了白宫，她还代为行使白宫女主人的职责。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直想找回他刚当上总统时的那种活泼亲密的气氛，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努力尝试。在以前的那些日子里，路易斯·豪总是随处乱弹香烟灰，动不动就发牢骚，再不然就像具死尸似的躲在卧室里。

罗斯福想方设法来改善自己和妻子的关系。毫无疑问，埃莉诺富有才智，而且极其能干，如果她愿意的话，绝对可以做到善始善终。她对罗斯福的帮助很大，在战争时期，随时跟随在丈夫身边，给予他无尽的鼓励和支持。她虽然温顺，但是性格不屈不挠，或许她远算不上是一个好配偶。埃莉诺喜欢虚张声势，对许多事情态度冷漠，而且经常满怀仇恨，不仅如此，她还缺乏幽默感。罗斯福想给他们之间的婚姻带来一点新鲜空气，而她对之不以为然，无视罗斯福做出的努力。在1936年年底的时候，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写道："我越来越觉得罗斯福是个伟大的人，他对我也特别好，但是我们只能做到相敬如宾。其实对于婚姻，我已别无他求。"他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能和睦相

处，但是有时也会因为彼此间的怨气积压太久而爆发争执，在争吵的时候双方都会表现得歇斯底里。

埃莉诺的观点比罗斯福更激进。在大多数时候，她觉得罗斯福的朋友们都很轻浮，而罗斯福觉得埃莉诺和她的随从们都没有什么情趣。两个人说得都没错。

霍普金斯是总统最亲密的同伴，但是霍普金斯可一点都不轻浮。埃莉诺则觉得霍普金斯是个享乐主义者，经常纵酒过度，迷恋赛马，还常和自己的丈夫混在一起。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霍普金斯毕竟是个社会公众人物，所以言谈举止应该更加本分一些。

整个罗斯福家族一直被严格地划分为海德公园和牡蛎湾两个分支。出于对西奥多·罗斯福的尊重以及维持家族血缘纽带的考虑，即使是在某些艰难的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夫妇一直和牡蛎湾的罗斯福家族的成员保持着联系。牡蛎湾的罗斯福家族成员因为自己无法取得可以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相匹敌的成就，因而对他非常嫉妒。他们原来都以为他们的这个表兄弟没什么能耐，而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他们对富兰克林怀恨在心。艾丽丝为了和埃莉诺竞争，就在报纸上专门开了一个专栏指责对方。虽然艾丽丝聪明过人，但是她的专栏无法和埃莉诺的专栏“我的一天”相比，“我的一天”广受人们欢迎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小西奥多·罗斯福曾担任过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两地的行政官员，政绩彰显。他对自己无往不胜的表亲因妒生恨，激烈地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当1939年战争爆发时，他在美国第一委员会中担任重要的角色，而且一大批比小西奥多·罗斯福更没脑子的家伙们积极支持这个组织。罗斯福总统指责这个组织是纳粹和苏联人攻击美国的又一道战线，他略施小计就让这个组织变得声名狼藉。

罗斯福的智取和成功不胜枚举，从上面的例子能略窥一斑。对于他的亲属来说，罗斯福是真正继承了这个家族的传统，而且为家族门楣增光，而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涌现出的最伟大的行政官员。这让牡蛎湾的亲戚们对他十分眼红。他们一开始根本就没有看好罗斯福的政治才能，而罗斯福现在正以自身娴熟的领导技巧和勇气统治着这个国家，引导他的国民从历史上最艰苦卓绝的战争中走向和平的曙光。而牡蛎湾一派在这些国家大事上却根本插不上手，他们因此变得更加垂头丧气。

艾丽丝的哥哥科米特是个夹在老婆和情妇中间的酒鬼。他退出了共和党，应征入伍，加入了英国陆军。丘吉尔最后任命他成为一支堂吉诃德式的远征军的指挥官，率领这支军队前往芬兰，和苏联人作战。1940年3月5日，他在海事法庭与温斯顿·丘吉尔共进午餐。他还告诉丘吉尔，1900年他的父亲担任纽约州州长时，丘吉尔前来访问他的父亲。当一群女士走进房间的时候，丘吉尔并没有起身表示欢迎，他的父亲因此而不喜欢丘吉尔。科米特翻出的这点陈年旧账，让丘吉尔听了觉得十分有趣。

对全世界来说幸运的是，这支军队到达芬兰已经太晚了，所以英国、法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得以幸免。科米特历经千辛万苦，将残余的英国部队带到了挪威，最终登上船驶往北非。1941年年初，他满载着荣誉离开了英国军队（因为长期酗酒导致肝脾肿大，医生建议休养）重返美国。结果，他被自己的兄弟阿奇送进了疗养院。

在同一时刻，住在海德公园的这一支罗斯福家族，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安娜·罗斯福是总统唯一的女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她都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她富有吸引力，活力充沛，聪明，而且不喜欢矫揉造作。虽然她人见人爱，但是在生活中她也有自己的麻烦。她和自己

的第二任丈夫约翰·保廷格之间暂时出现了一点不稳定的情况，他们很快便离了婚。

罗斯福的四个儿子都在军队里任过职，这是对这个家族军事传统的尊重（虽然这只是西奥多·罗斯福时的家族传统，至于罗斯福和詹姆斯先生，他们这辈子连一枪都没放过呢）。吉米在潜艇部队任职，埃利奥特在空军中负责极其危险的空中侦察工作，富兰克林和约翰都是海军官员。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军官。在战争之前，他们四个人都多少有点任性放纵。毕竟他们都是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家族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在他们成年或是将要成年的那段时期，他们的父亲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力量和权威。

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罗斯福和埃莉诺之间的婚姻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使得夫妻两人在履行父母责任时常常会互相牵肘掣袖。埃莉诺的大部分时间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尽管她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但她并不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罗斯福很早就开始履行身为人父的职责。他会在感恩节给孩子们分火鸡，会带他的孩子出海航行，会在演讲中含蓄地提到他们，在圣诞前夜将一家人聚集起来，一起读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但是罗斯福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敞开心扉，当然也不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些什么。他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生涯，另一方面又要努力挣扎，希望尽快能从疾病中恢复过来，以继续扩展自己的事业。虽然在公众面前，他一直扮演着一个对孩子十分宠溺的父亲的角色，其实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花在孩子身上。

罗斯福家的男孩们逐渐长大了。正如一个作家提到的那样，他们正符合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著名的一段话："他们是些冒冒失失的家伙……他们把事情搞砸，将别人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就转身不管了……他们总是让别人替他们收拾残局。"这些名声可不怎么光彩，而这场战争则送给了他们洗刷这些恶名的机会。但是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去世了，这个世界也对他们的任性

不再那么宽容。他们的父亲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和最引人注目的人。当他们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父亲离去时，世界对他们来说也变得无趣多了。

埃利奥特永远是麻烦最多的家伙。他一开始拒绝去上大学。他在格罗顿公学时，参加体育比赛时会表现得十分粗鲁。他有时会用同样粗鲁的口气，表示对皮博迪博士的不满。皮博迪博士事后对罗斯福这样描述埃利奥特，说他是个“凶狠的斗士，他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让别人受到了伤害”。

埃利奥特成年之后，搬到得克萨斯州居住，和与他父亲政见不同的右翼石油商人和牧场主做生意。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埃利奥特毫无羞愧之心地利用他的身份，来帮助有钱的得克萨斯人和他父亲建立关系。而他个人，尤其是在异性交往方面更是声名狼藉，而且还是个典型的朝三暮四的花花公子。

1928年，埃利奥特从格罗顿公学毕业之后，就和一些朋友乘坐一艘蒸汽船，沿着海岸航行到了墨西哥湾。他对一天到晚待在户内的生活非常不满，就在贝敦码头上了岸，后来跑到了在休斯敦召开的民主党大会。在那里，他帮助父亲罗斯福为艾尔·史密斯争取总统提名权。后来，埃利奥特去了位于费城的一所大学预科学校学习，之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埃利奥特加入了一家广告公司，通过这一途径，他成为了杰出的汽车设计师E·L·科德的司机。

1932年，埃利奥特的第一次婚姻破裂，而这对新婚夫妇才刚度完蜜月而已。埃利奥特把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丢在白宫，自己驱车去了美国西部待了10个月。但他妻子的表现则十分大度，令人钦佩，她归还了埃莉诺送给她的一条珍珠项链，明智地推测说她将再也见不到她的丈夫了。

埃利奥特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受到了石油大亨的热情宴请，他参观了墨西哥的大规模蒸馏酒工厂，只等禁酒令一被取消，就会投入大规模生产。他接下来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邀请他做《洛杉矶观察者报》的航空版编辑，赫斯特随后又邀请约翰·保廷格和安娜·罗斯福担任出版商的职位。从这一点看来，这倒像是赫斯特用来打通白宫关节的一种有效手段。

1937年，由于赫斯特公司的创办人极近奢靡之能事，在这沉重的财务负担下，赫斯特的公司摇摇欲坠。埃利奥特想乘机购买赫斯特公司麾下的广播公司集团，将它们并入得克萨斯州立新闻网。（正如埃利奥特所说的那样，这是他成为一个“大人物”的一步。当然，这个目标，他一辈子都没有达到。）罗斯福的儿子们的大多数商业灵感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埃利奥特的计划也撞了南墙。罗斯福通过美国商务部部长杰西·琼斯对这件事加以干预。杰西·琼斯劝说债权人仅仅收回了2%的债务，这件事就此草草收场。1940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埃利奥特也参与了反对华莱士获得副总统提名的活动，并且莫名其妙地决定帮助杰西·琼斯获得副总统提名。埃莉诺出其不意地对这场小小的“叛乱”采取了措施，她用对一个6岁小孩训话的口气把埃利奥特训了一顿。她告诫埃利奥特说，不要再公然反抗你的父亲，埃利奥特没有再坚持下去。

在这次会议后，埃利奥特相信杰出的美国人都会投身战争。于是，他也参加了空军部队，并成为了上校。埃利奥特被提升为上校的速度也太快了一点，以至于引起人们激烈的争论。

相比而言，约翰则规矩得多，他一直安守本分地在波士顿生活，年纪轻轻就私订终身，还隐姓埋名地在法林公司找到了销售员这第一份工作。在他的几个弟兄当中，他是最能自食其力的一个。他秘密地加入了其他党派，但是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从来没有和家里人说到过这一点。

居住在牡蛎湾的罗斯福家族也不是完全没有烦恼。科米特没有撑过这场战争。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还颇有点名声，但是他终日酗酒，精神颓废。1943年6月3日，他用一把军用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富兰克林和埃莉诺竭尽所能地来照顾他的遗孀，并让她经常到白宫小住。

小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英勇奋战过，终于得到应有的回报。他（和他的姐姐不同）终于认识到，“美国第一”这个组织的成员，不外乎是一群同情纳粹的低俗、幼稚的孤立主义者。1941年春天，他宣布退出这个组织。他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参战的请求，并得到了应得的职务，他被任命为一个名声不错的步兵团的团长。他在西西里的表现十分出色，同时因为他与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了一次面谈，而且因为他显赫的家族出身，他成为了参加跨海作战行动中年龄最大的军人。

小西奥多·罗斯福在诺曼底与他在西西里时一样，因为一条腿得了关节炎，他拄着拐杖踏上了诺曼底海岸。他丝毫不在意身处熊熊烈火和浓浓炮烟之中，这给他的士兵以很大的精神鼓舞。在登陆的那一天，他连续数小时在对方机关枪扫射下英勇作战，而将其他士兵分散成小组，尽可能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刚在诺曼底站稳脚跟，小西奥多·罗斯福就被任命为瑟堡的临时地方长官。他被艾森豪威尔提升到少将，并任命他为师长。但在他得知自己获得提升之前，因为心脏病病发而在睡梦中逝世，享年57岁。他被埋在了一个小镇上，6位将军为他扶灵，士兵们奏起振奋人心的军歌为他送行。他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一样，是“二战”时美国军队中获得授勋最多的军官，并最终获得了所有的陆军战斗勋章。

在总统的强烈鼓励之下，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都建议向小西奥多·罗斯福颁发国会荣誉奖章。1944年9月22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将这枚奖章授予了他的遗孀。

正如《纽约客》的杰出作家A·J·利波林所写的那样：“西奥多·罗斯福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但他是个半瓶子醋的士兵；小西奥多·罗斯福是个第一流的士兵，但他是个半瓶子醋的政治家。”

1917年，当时的总统威尔逊曾经拒绝西奥多·罗斯福主动参战的打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从这件事中汲取了不少教训。他意识到，他的政府应该是家长制式的。罗斯福总统在私下里告诉他的亲属们，要尽可能抑制为国捐躯的豪情壮志，不要参加这场残酷的战争。

Ⅱ

1月11日，罗斯福总统向国会递交了1944年的国情咨文。他并没有依照上一年的惯例，而是不容争辩地直接提出了征兵的要求。国内普遍认为，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同盟国现有的陆军力量和海空军的舰艇飞机，已经足以保证战争的胜利了。但是，罗斯福更关心的是重组战后的世界。罗斯福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或者假装考虑过放弃第四个总统任期的可能性。他1940年接任总统职务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

自从1864年林肯统治时期开始，政界就一直存在着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断，“不要临阵换将。”罗斯福作为战争期间的领导人，他的权威可不是那么容易挑战的。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对同盟国的支持做得无懈可击。在1940年和1941年，他的大规模防御性生产计划也没有可以让人指摘的地方。在遭到日本袭击的最初5个月的时间内，美国战争取得结果几乎一直是成功的。罗斯福任命的军事领导人和民政高级官员都是称职的，其中有些人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在美国史上留下了英名。

罗斯福继任的唯一威胁就是他的健康因素。有种观点认为，他已经精力不济了，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罗斯福在自己身体残疾程度的问题上，多年以来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欺骗了他的国民。现在，他提议举办一场规模巨大的活动，他将充分展示自己健康的体魄以及旺盛的精力，来彻底消除人们对于他身体能否负担总统工作的忧虑。这样，他也会让自己得到所有军人的拥护。他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竞选，他还抱有一个坚定而热切的信念——罗斯福认为美国的年轻人们应该重建一个公正而繁荣的美国。

罗斯福总统在1月11日强有力的演说中，宣告自己将争取连选连任，并为战后的美国做出了规划。正如他的习惯，他巧妙地大谈国家的利益，其实只是玩弄了些简单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他的竞争对手还没完成布兵遣将时，他就已经抢占了有利的地位了。

要想实现最终的胜利，美国必须承担起至高无上的、与它的地位相称的责任。为了唤起整个国家对这一责任的注意，罗斯福提出通过“一项现实可行的税法，对所有不正当营利者实行课税……最终减少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后代要付出的代价”。他提议继续制定法律，来与在战争中渔利的那些人作斗争，和他们重新讨论军售合同。他还号召通过《食品价格法》来保证制定合理的价格，使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都不会受到损害。他要求美国重新恢复1942年10月份的物价稳定的状态，他认为如果不整顿物价，“这个国家到了夏季，价格可能会陷入混乱。”他再次要求通过国家服务法案，以便国家能够满足国内民众的基本需求，而且能够减少罢工现象的出现。

这个项目得到了民众的普遍理解，它也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它也同时说明罗斯福忘记了自由市场作为供给与需求决定者的重要作用。在战争的状态下，将所有产品的价格固定，强行征召所有的劳动力，并且制定法规赋予政府制定价格的权力，这些在概念上都是正当的。

而且总统的确有正当的理由，希望以此制止一些私人部门的恶劣行径。

总统在他的演说中也提到了投票的问题。他是参战军人利益的保护者。他不仅在战斗中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在他们从前线退役下来以后也要保护他们的利益，特别保护他们的投票权。“不管进行多少次法律辩论，美国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美国军人的投票权不可能受到影响。即使在战争时期，宪法的制定者们绝不愿意制定一项法律，来剥夺那些为了捍卫宪法而战的勇士们的自由投票权。”他的讲演掷地有声。

罗斯福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振聋发聩，而国会却对之充耳不闻，但这却在国民之中引起了有力的回响。国会最后终于通过了一项软弱无力的联邦法令，给予海外的美军官兵以投票的权力。尽管这项法令最后成为了一项法律，罗斯福当时对之不置可否。由于这项法令的保证，共有85000名士兵参加了投票。

如果罗斯福住在华盛顿，而当时国会又处于会期的时候，罗斯福每周一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卧室接见民主党的国会领导人。副总统华莱士、众议院议长雷伯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伯克利和众议院多数派领袖麦克科马克会聚集在罗斯福的床前，讨论关于立法问题。1944年的2月，罗斯福对其中三个来访者的意见置之不理，并且反对一项他认为效果并不明显的税制改革法案。只有华莱士支持总统的这一意见。罗斯福在他的反对声明中表示，他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税制改革法案，要求每年增加105亿美元的国家财政税收。但是在国会批准通过的法案中，国家财政税收的净增加额只有总统提出数额的10%。罗斯福认为这个法案充其量只能暂时缓和一下矛盾，是远远不够的。国会最终还是选择了提高贷款利息的方式来给战争提供资金保障，而不是按照罗斯福的建议，扩大财政赤字，直到战争取得胜利为止。

罗斯福本应该和自己的新闻负责人斯蒂芬·厄尔利谈一下的。斯蒂芬·厄尔利是位美国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总统看到了症结所在，并且明确无误地知道自己的同情心应当偏向何方。但是，他觉得当前在这个问题（或别的什么问题）上纠缠，会有引起党派内部分裂的危险。他更情愿采取一些有效的秘密行动：他的救济金项目对黑人和白人一视同仁，非裔美国人在军队中的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他承诺当黑人陆海空军士兵重返故土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也不会像他们从前所知道的那样，受到矫揉造作的虚假感谢或是遭到粗鲁的对待。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

罗斯福唯一可以走的捷径是，清除改革派共和党人头脑中的孤立主义思想，然后让他们和民主党人融合。他尽力想把这一精神传授给温戴尔·L·威尔基，希望能和他一起完成这项盛举。

罗斯福拒绝直接卷入改组战后的波兰，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就曾解释过原因（但是尽管这些情况都属实，斯大林却不知为什么罗斯福会优柔寡断，也不相信罗斯福的解释）。丘吉尔接手了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事，试图在斯大林和波兰人之间充当政治掮客，牵线搭桥让他们之间达成协定。

III

1944年2月6日，丘吉尔和艾登邀请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领导人，齐聚英国首相的乡间别墅，并在那里召开了一场气氛热烈的会议。波兰人由他们的首相斯坦因斯洛·米科拉伊奇克率领。1月28日，流亡在英国的波兰人要求丘吉尔向斯大林发电报。四天前，斯大林就和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面谈过。这位大使汇报说，斯大林保证要建立一个“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自由而独立的波兰，而他将不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政体选择的问题上，对这两国施加任何影响”。斯大林

还代表苏联保证说，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全力支持将德国人从波兰领土上赶走的作战计划。在波兰和苏联依据德黑兰会议上的决议重新划分边界后，位于苏联新领土上的波兰人有重返波兰的自由，而流亡政府也有完全的权力在波兰重组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斯大林在前一天给丘吉尔发了封电报，抱怨波兰流亡官员的反苏言论。但是丘吉尔却把斯大林电报上的内容告诉了罗斯福，把它说成是“绝不能说这是毫无希望的”，认为英国驻苏大使的面访成果“鼓舞人心”。

斯大林宣称，波兰人许多英勇的地下力量都得到了流亡政府的命令，被告诫不得与苏联合作。米科拉伊奇克否认这一点，并且说他已经向英国政府说明了自己的每一项命令。米科拉伊奇克说他的指示从来没有过反对苏联的内容，而是希望一旦苏联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关系正常化以后，就可以全心全意地和苏联进行合作。米科拉伊奇克指出波兰的地下抵抗力量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转入地上和苏联人合作，一起全力攻击德国人。

丘吉尔强硬地宣称，波兰150年前就已经失去了独立，只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短暂间隔中才重获新生。虽然波兰的士兵和空军飞行员在伦敦“为他们自己赢得了爱戴与尊敬”，可是波兰依然难逃自己的命运。现在只有三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波兰、苏联和英国三方分别订立双边协议；第二条路，只由英国和苏联双方达成一致，在西方国家同盟的批准下，由苏联负责执行；最后一条途径，干脆就什么协议都不签订。

随后，在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展开了进一步谈判，但是米科拉伊奇克提出波兰的独立其实已经危如累卵。正如丘吉尔在谈判中多次发现的那样，米科拉伊奇克的担忧显然是合理的，但是波兰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丘吉尔强调说他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希望就是先达成协议，接下来英国和美国会设法让斯大林配合的。不幸的是，由于波兰人民一贯的固执作风，米科拉伊奇克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做出任

何让步。丘吉尔指出，这种固执就是几个世纪以来造成波兰亡国的巨大悲剧的原因。丘吉尔警告说：“在历史上，波兰在重要问题上已经做出许多次错误的抉择，而现在的拒绝合作可能是最为致命并会带来最大灾难的一个。”

在1944年年初，霸王行动还未启动，原子弹的时代也还未到来，可以用来帮助波兰拖延时间或说服斯大林改变心意的只有波兰地下抵抗力量和苏联“解放者”们的合作，以及西方国家同盟的良好意愿。斯大林并不介意在波兰的死伤人数，所以也并非十分关心同波兰地下抵抗力量的合作。他深知反纳粹抵抗力量摇身一变就可能是反苏抵抗力量，所以德国人把他们赶尽杀绝的话，他的愿望还能更容易实现。

斯大林相当轻松地就答应了波兰独立的保证，但是不管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他们都认为苏联人难以信任，波兰人自己对此更是怀疑。但是这些声明在世界的观点舆论中，尤其是对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国内观点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1944年2月21日，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说，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同僚们已经竭尽所能了，大多数党派者的反应都出乎他们的预料，实际上并不赞同他们。这些党派表示，他们更支持丘吉尔2月6日的提议。2月20日，丘吉尔发电报通知斯大林，波兰人决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罗斯福向丘吉尔表示祝贺，并告诉斯大林，他也支持丘吉尔的提案。罗斯福还说他认为波兰人接受了这一提案，将会加速打败德国人的进程，同时还会有效地帮助波兰的抵抗力量。

1944年3月4日，斯大林向丘吉尔做出正式答复。斯大林表示：“苏波关系的解决方案还不成熟。”尽管斯大林说他已经和罗斯福谈过此事了，丘吉尔还是立刻把这一“最为让人心灰意冷”的答复告知了罗斯福。“还不成熟”是斯大林的一种委婉说法，实际上，他一开始占领波兰，就立刻着手准备建立一个傀儡政权。3月21日丘吉尔告诉罗斯福，他会向英国议会通报，苏波谈判已经“破裂”。

正如3月16日，丘吉尔在首相官邸告诉米科拉伊奇克的那样，而当西方同盟国在欧洲战区取得了更为有利的地位时，波兰的命运已经操纵在他人手中了。4月1日，他通过英国驻苏联大使告诉斯大林：

“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不再担任调停人这一不被人领情的职务，同时宣告调停失败。”

在1944年的前几个月里，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有关意大利问题的讨论上，也费尽心血。当时，他们的军队正以蜗牛般的速度，在意大利半岛上缓缓推进。丘吉尔之前并没有认识到，在意大利进军如此不易，其实看一眼作战地图就应该能得出这个结论，而现在丘吉尔也开始这么预测了。艾森豪威尔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增加在意大利的部分能源供应，但这些还远远不够。丘吉尔建议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是罗斯福发了封电报拒绝了这一提议。罗斯福设想增加5~7个师的力量来增援霸王行动。

在2月13日丘吉尔传达给罗斯福的信息中，丘吉尔解释了自己在意大利政策上的看法：“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政府必须要对我们俯首称臣，并且是牢牢地被我们握在掌心。与我们不辞劳苦建立起来的其他政权相比，新的意大利政府要更加听话……这个政府不会因为政党之间的钩心斗角而筋疲力尽，我们不会让意大利人民进行立法和选举，因而不管哪个政党都不会具有实际的权力。新的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人民之中的政治权威，只有通过和我们站在一边才能得到。”

这就意味着同盟国要和没有悔改的法西斯政府打交道。罗斯福担心同盟国会因此而丧失信用，他反对斯大林想要在意大利控制委员会里分一杯羹的要求，并且对尽快重建意大利的民主政治党派很感兴趣。

丘吉尔几乎是抱着故意要和罗斯福作对的心情，坚持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不肯动摇。意大利的战争已经英寸步难行，根本就没有取得

任何军事进展。

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还存在其他方面的摩擦，比如在英国的美元储备问题上，以及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石油开采权的问题上。在美国政府中，摩根索和其他财政官员也产生了分裂。那些财政官员担心如果英国的美元储备升到10亿美元之上时，而美国还在根据《租借法案》将大量消费品运到英国去的话，国会将对政府进行猛烈攻击。1944年的春天，英国的美元储备就远大于这个数字了，国会中也有人开始表示担心英国正在巧妙地把美国的口袋掏空。如果减少《租借法案》对英国的援助，会有助于强迫英国动用这些外汇储备。在美国国会里，人们就租借的额度展开了争论。罗斯福设法平息了这一场风波，但是任何一点关于这些问题的风声都令丘吉尔坐立不安。

在2月22日、2月24日和3月3日的电报中，罗斯福试图安抚英国的不安情绪。他写道，美国正在争取英国保证不会试图“抢占”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开采权。很快，双方就签订了互惠条款，保障双方的石油开采权力。但是两个国家下辖的石油公司和政府的低级商务官员实际上早就开始战略竞争了。

尽管霸王行动的日程日益逼近，但一切似乎都笼罩在阴影之下。随着盟国在西欧登陆日（D–Day）的临近，温斯顿·丘吉尔可能是出于防御的考虑，顽固而不明智地抵抗跨越英吉利海峡的军事行动，并满怀热情地主动向罗斯福提出要加强在意大利战区的攻势。虽然丘吉尔一直都更偏向于意大利战区，但是那个战区的形势实在让人失望。1944年3月18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写道：“随着时间的临近，我越来越能顶得住‘霸王行动’的压力了，艾森豪威尔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些进展明显超过了德国军队的预期，德国人完全低估了美国军队的实力。

Ⅳ

英美双方的摩擦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罗斯福想要通过一个后帝国主义的、自由的、至少表面看上去比较和缓的方式来迎接战后苏联的挑战，然而丘吉尔想要重建帝国的权威，来与苏联正面对抗。但是这两个政策都建立在快速地复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基础上。而这两位领导人也不断做出努力，促进彼此间的友谊。他们经常交换照片和绘画增进感情。

参谋长联席会议催促罗斯福修正他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政策会激起纳粹分子更为顽强的抵抗，而这正是帮了德国的大忙。情报部门汇报说，德国的新闻机构正把这一要求扭曲成是要摧毁德国人的决心。罗斯福拒绝对此做出修改，至少是在公众面前对这加以修改，因为他担心这将引起苏联人的疑心。苏联人会误以为这样的修改举措是美国想要寻求谈判媾和的第一步。斯大林一旦有了这样的印象，也会跟着想要寻求同样的结果，并且抢先一步和德国搭上关系。

在1944年伊始，有关德国人的残暴统治，尤其是针对犹太人的暴行的报道和有关日本的野蛮行径的报道不断曝光。摩根索直接指斥布莱克金里奇·朗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是布莱克金里奇矢口否认。摩根索还委托能力出众的美国财政部总顾问拉道夫·保罗来做一个报告反映这一现实问题。保罗在报告中指责国会不仅没有尽其所能来帮助犹太人，还为私人援助犹太人设立了种种障碍。

大批犹太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巴勒斯坦，这让罗斯福清楚地意识到了阿拉伯人中存在强烈的反抗情绪。而丘吉尔方面出于对与阿拉伯人之间关系的考虑，在这件事情上采取保留态度。但是，罗斯福决定采取行动，初步打算在美国建立难民中心。美国接纳了来自意大利的1

000名犹太难民，并且将他们安置在难民营中。木已成舟之后，他向议会宣布了自己的计划。

3月21日，罗斯福就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行发表了公开声明。这些罪行包括在欧洲和中国的某些城市里发生的屠杀事件和虐囚事件，罗斯福对之表示了严厉的谴责。这可能来得晚了点，但是依然很有效果。从这篇宣言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罗斯福对犹太人的安置方案。在战争结束后，一旦自由的政体建立之后，他想让犹太幸存者们重新回到他们曾经受过压迫的国家，因为罗斯福请求欧洲和亚洲还未被纳粹占领的国家“暂时向这些遭受迫害的人们打开边界线”，并保证美国会为这些犹太人提供必需的生活物资。罗斯福清楚地认识到身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处境，虽然这件事也和别的很多问题一样，如果在初现端倪之时就去解决的话会容易得多。罗斯福一开始倾向于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而不是一个只有犹太人的国家。就算真的要建立这个国家的话，至少不会选择建在中东地区。他1938年曾经写信给墨索里尼，希望可以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但是没有成功。当1945年时，他遇到海尔·塞拉西的时候，这个提议已毫无任何现实意义。

1943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外交部长会议之后，欧洲咨询委员会应运而生。罗斯福想通过建立这一组织，来让苏联人习惯于同英国和美国一起共同执掌世界的权柄。除此之外，罗斯福还想在西方军队成功地在欧洲西北部登陆并挺进到德国中部前，用这件事来拖延时日。美方代表维纳特写信向罗斯福报告说：“有史以来，没有一个政府正式建立起来的委员会，比欧洲咨询委员会从创立国得到的支持更小的了。”

维纳特经常能收到国务院的有关德国重建问题的建议。国务院发来的文件强调要求保持德国的战前边界，但是要限制它发动战争的能力。赫尔对德黑兰会议上的有关边界变动的讨论一无所知。各种有关战后德国的急切提议都涌向了维纳特，而维纳特知道总统尚未批准这

些提议，而制定这些提议的人也完全不知道在德黑兰会议上，包括对苏联和波兰的边界将会大幅西移等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在欧洲咨询委员会里，有些动议从来就没被拿到桌面上讨论过。

丘吉尔也忽略了这一委员会的作用。威廉·斯特朗爵士既是英国政府的代表，同时也身兼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一职，但是他接到了不同的指示，并且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1944年1月14日，在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英国提出一项全面提案，这项提案与罗斯福在前往德黑兰的途中制定的西方同盟的势力范围相比，野心可要小得多。

维纳特代表美国政府提出了提案，这一提案是建立在罗斯福参加德黑兰会议途中的规划之上的。根据这一提案，美国将得到德国领土的46%，苏联会得到20%，而英国会得到34%。罗斯福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只可能有一个国家在欧洲部署的军队，都只驻扎在意大利一个国家，并没有立即派出大量兵力来参加这场战斗，而且军事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但还能渔利颇丰）。直到1944年8月12日，也就是同盟国登陆法国10周后，维纳特告诉出访英国的摩根索，他其实对罗斯福对战后德国的规划一无所知。

后来，尽管维纳特极力反对，英国和苏联都支持在斯特朗提议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议案，并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中得到了通过。罗斯福对此“大为光火”。这将德国差不多均分成了三块，而柏林位于苏联的控制区域之中，当然这座城市是由三方同盟控制委员会来管理的。斯特朗的计划一开始甚至没有留给西方进入柏林的权力。

奇怪的是，为什么欧洲咨询委员会使用战前德国边界来划分占领区。在德黑兰会议上，各方已经确定了奥德–尼斯线作为德国的边界，将苏联的大部分德占区都划入了波兰。这可能暗示相较于德国，苏联更担心怎样将波兰紧紧地控制在脚下，但是那种鼠目英寸光的考虑无疑没有什么战略意义。而且，这还完全是多余的，因为苏联将要得到的那块土地上的德国人会纷纷西迁，这将使德国的居民全部迁入西方

世界的范围之内。考虑到这些移民，同时让德国重返西方世界的积极意义，尽管是无心插柳，斯特朗的提议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斯特朗也在外交战线上为英国取得了胜利。因为在霸王行动开始之前，而非洲战场的战争即将结束，英国的军队在德国的数量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苏联的十分之一。有人因此猜测，这就是丘吉尔、艾登和卡多根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为斯特朗的失误遮羞的原因。在这次事件之中，他们并没有提到斯特朗仅仅只是按丘吉尔的委托行事。很难解释，为什么在美国人的回忆录中对这件事也只字不提。除了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看上去对相互诽谤很感兴趣之外，没人愿意冒犯威望甚高的丘吉尔。

但是毋庸置疑，罗斯福等到同盟国军队实际瓜分德国后，再进行占领区域谈判的策略无疑是最好的一步棋。罗斯福对西方同盟国军队将在战场上取得巨大突破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而苏联人原来对自己的力量极为乐观，但是在战场上却行动迟缓。而在登陆战和在法国北部的阵地战中，英国人所惧怕的血流成河的场面也没有出现。

在斯特朗的回忆录中，他说如果没有欧洲咨询委员会上的划分，柏林将整个属于苏联。而实际上，正如蒙哥马利和其他美国将军曾一度同意的那样，要不是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上已经做出了决议，西方的军队可能早就占领了柏林了，最后只不过分给苏联一块统治区域而已。

在太平洋上，美国人正稳步向西推进。麦克阿瑟已经占据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尼米兹穿过了马绍尔群岛和凯瑟琳群岛到达了太平洋中部。两支军队的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他们卓有成效地指挥着自己的军队登陆作战，两个战区司令都迂回绕过了日本防御最为严密的地区。

此时，日本人根本没有办法对装备精良的美国海军发起攻击。美国的航空军备技术一流，飞行员受过良好的训练，因此美国甚至能够

把一些很小的岛屿变成强有力的空军基地。在面对不可战胜的美国人的反击时，除了大规模的自杀性空袭和负隅顽抗以外，日本军队根本无计可施，无能为力。

从1944年2月的最后一周开始，只要天气晴好而且能见度高，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就对德国的战略要地进行空袭，总共投下了大约4000枚炸弹，这彻底摧毁了德国的防御工事。在夜间，他们会不加选择地轰炸德国的城市，这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1945年2月，德累斯顿已是囊中之物，唾手可得。而两个月后，日本包括东京在内的很多大城市也几乎被美国夷为了平地。

而这段时间对罗斯福来说，自从入主白宫的11年以来，他的身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从德黑兰返回之后，他就不断受到感冒的困扰，由此时常引发头痛并伴有高烧。他的睡眠状况很不好，而且很容易感到疲乏。埃莉诺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她还总是忙着四处旅行。

V

1944年3月27日，一位海军部队的心脏病专家和其他医生一起对罗斯福进行了会诊。罗斯福顺从而愉快地接受了这次检查。但这只不过是他的一贯作风，他很少表现出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担心。专家诊断发现，罗斯福患有高血压，而且左心室扩大，这是极为危险的征兆。专家为罗斯福制定了一个减轻体重的计划，建议他少吸烟，每天只能喝一杯鸡尾酒。每天包括餐后小憩在内，罗斯福必须保持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且要延长其他的休息时间。他的心脏收缩时会伴有心杂音，这说明他是个老支气管炎了。他的血压也很高，有时都高到让人担心的地步。

新的生活规律坚持了三天之后，罗斯福的气色就好多了，胸腔里也没有那么多浓痰了，并且情况还在持续改善。但是心杂音依然没有消失，而他的血压也没有很快稳定下来。在两个星期之后，他的心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大小。记者们提到罗斯福的气色更好了，反应更为机敏了，精神也好多了。因为罗斯福从来不向医生们询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这些医生们几乎都不认识他，所以都没有告诉过他身体的状况。

罗斯福的身体健康，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阻止他实现自己崇高梦想的极大障碍。经济大萧条现在仅仅是一个昏暗模糊和苦涩不堪的记忆，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罗斯福是把他们从那场苦难中解救出来的大救星，所以对他们长年任职的总统充满信任。持续已久的战事开始明显好转，预计会在1945年或1946年取得最终的胜利。而在有关和平的问题上，人们也逐渐达成共识。罗斯福希望建立起一个国际组织，还想看到孤立主义者名声扫地，彻底出局。如果对法国的进攻取得胜利的话，西欧将会掌握在美国和英国的手中。罗斯福并没有低估将欧洲人同他们的殖民地分开时将面临的巨大挑战，但他知道这一切终将发生。

罗斯福深信民主的西方会拥有广泛的地缘政治力量。罗斯福最初的计划是要显示给斯大林看，美国领导的西方在经济、军事、文化和公众关系等方面都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然后再诚心诚意地对斯大林提出合理的合作计划。回顾世界三四年前的局势，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革命。

根据有关罗斯福的资料记载，及时采取的治疗和休养安排稳定了他的身体状况，但是不久之后，他的脸上出现了老年斑。很多年以来，在他疲乏的时候下眼皮便会浮现黑眼圈，而现在，黑眼圈几乎无法消失了。

埃利奥特在看见分别仅仅数月的父亲之后，看到父亲外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脸上禁不住露出惊讶之情。罗斯福注意到了埃利奥特异样的感觉，说道：“好啦，你还指望我怎么样？”在罗斯福点香烟的时候，他的手颤抖得更加厉害了。罗斯福看上去更为虚弱，但这有一部分是他减肥的原因，他的体重从85千克降到了75千克。75千克的体重对他来说很合适，但是他的腿上现在都已经皮包骨头了。

3月4日，罗斯福政府迈进了执政的第12个年头，有将近200名老职员依然在供职，也有些新的陆军和海军部队的官员加入新政府。

安娜作为白宫女主人的工作让人称羡。世界上所有的爸爸都觉得自己的女儿开朗，富有吸引力，关心体贴。罗斯福也一样，他觉得自己的女儿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快乐。安娜在空闲时间学会了速记，并且兴高采烈地说：“我才无所谓自己要做些什么呢。帮助筹划1944年的大选，为戴高乐将军倒茶，还是往爸爸空了的烟盒里放香烟，什么都行。”露西·默瑟·拉瑟弗德也常常来访，这也帮助罗斯福振奋了精神。埃莉诺不知疲倦地在战区间来回旅行，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不可估价的努力，但是她并没有给罗斯福以任何直接的帮助。

5月8日，罗斯福总统从南卡罗来纳州返回华盛顿。那里的高级政府官员正在心中倒计时，焦躁不安地等待盟国西欧登陆日的到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欢迎罗斯福归来，庆祝他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日，写道：“他在办公室里背负着几乎不可战胜的负担。这次假期的每个小时都是罗斯福应得的。”罗斯福本来打算这次旅途结束之后，前往英国会见丘吉尔，但是医生建议他不要安排这么紧张的一次旅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罗斯福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经常出现问题。哈罗德·麦克米伦[注]以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会如此粗鲁，而同时又如此敏感……别人对他一点点谦逊有礼的行为或是一点特殊的表

示就能触动他，唤起他内心最深的情感……我经常觉得这些问题不是政治家们所能解决的。它们其实是要靠专门的心理医生才能治愈。”

1943年年末，罗斯福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明显有了改善。在丘吉尔从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返回英国的途中，戴高乐和丘吉尔在马拉喀什召开了一场令人愉快的会议。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态度相较于罗斯福来说，要微妙得多。就像在一边观察的哈罗德·麦克米伦所说的那样：“他就像一个和儿子发生争吵的父亲那样，细致地观察着戴高乐。为了一个先令，丘吉尔都会不惜杀掉戴高乐。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只要以后戴高乐这个浪子能乖乖地承认错误，并且顺从地接受领导的话，丘吉尔会大张旗鼓地为戴高乐接风。”艾森豪威尔也很欣赏戴高乐，他觉得和戴高乐在一起工作，比和吉罗要容易得多。

随着西欧登陆日的日渐临近，和戴高乐交流上的困难引发了许多可笑的尴尬局面。戴高乐曾表示，除非美国邀请他以法国临时总统的身份访问华盛顿，否则他不会前往。罗斯福拒绝以这种规格邀请他，并表示，如果戴高乐自己选择前往华盛顿的话，罗斯福本人并不确定是不是会接待他。

戴高乐被美英联盟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发表演讲，批评罗斯福和丘吉尔忽略法国政府，并且设想法国和“亲爱的苏联”之间构成某种联盟。罗斯福询问丘吉尔是否可能邀请戴高乐前往伦敦，然后把他一直留在伦敦，直到登陆计划开始为止。

美英关系变得越发亲近，这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丘吉尔在议会时，因为这一原因而受到质问。1944年5月26日，在丘吉尔写给罗斯福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如果人们觉得，因为我们没有和法国的国家精神支柱一起合作，而让更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血白白流淌的话，我们就有大麻烦了……毕竟，我们很难不借助法国人的力量就解放法国。”

虽然军队的指挥官曾要求英国轰炸法国的铁路和别的目标，丘吉尔担心轰炸会导致平民伤亡，故而非常担心，因为这可能会影响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罗斯福就没有这种疑虑。他和丘吉尔不同，他还没完全原谅法国在1940年的所作所为，在罗斯福看来，那纯粹是一种懦夫的行为。罗斯福9个月之前就想进攻法国了，罗斯福除了取得最大的军事效果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会考虑的。现在，他也不会为了法国公众敏感的神经，而浪费一条美国、英国或加拿大士兵的生命。

第二天，罗斯福试探性地回复了丘吉尔5月26日发过来的电报："我对你和戴高乐将军的交谈满怀希望。我希望你可以说服他，让他同意能在法国的解放中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6月2日，丘吉尔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邀请他来英国，这封信被送到了阿尔及尔。第二天，丘吉尔的私人飞机就将戴高乐接到了英国。6月4日，戴高乐抵达英国，并立刻前往丘吉尔的军事指挥总部，其实这个总部就是停靠在朴次茅斯的一列私人火车。

丘吉尔特别喜欢这列火车，可他的随员们可没有这番热情。车厢里只有一间浴室，据艾登所说，几乎永远被首相霸占着。那儿也只有一部电话，而丘吉尔的总参谋部长一直在占用。6月4日，戴高乐一到达那里，丘吉尔就热情地伸出双臂欢迎他。而根据别人的记忆，当时戴高乐的反应却相对比较冷淡。

不幸的是，情况急速恶化。在戴高乐同意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向法国人发表讲演之后，丘吉尔急切地希望他们可以在政治上达成谅解，为此戴高乐可以获得罗斯福的邀请前往华盛顿。考虑到丘吉尔在法国问题的敏感认识，他在提出这一建议的时候，没有使用动人的言词，这令人感到非常惊讶。

6月3日，艾森豪威尔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指出，现在亟须解决的问题是，他马上就要发动对法国的进攻来解放当地的法国人民，但是他

并没有得到法国军方的许可。丘吉尔收到艾森豪威尔的简报说，进攻计划因为恶劣的天气而被迫推迟，因为对于登陆作战来说，这样的天气状况太恶劣了。当问及戴高乐的时候，他表示将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一切决定，但催促他不要拖延。但是，戴高乐不同意艾森豪威尔对西欧人民发表的宣言，他觉得那个在华盛顿起草的宣言把法国当作战败国看待。

6月3日，艾森豪威尔宣布进攻计划被延期到6月6日。这个决定也是不确定的。成百万的士兵在等着接到投入作战的通知。丘吉尔“因为计划不确定而焦急万分”，他决定返回伦敦。他向戴高乐提议顺便带他一起回伦敦去，但是戴高乐拒绝了他的好意，说自己更情愿和法国军官一起重返伦敦，丘吉尔对于戴高乐的决定感到一阵“心寒”。6月2日（星期五），罗斯福前往弗吉尼亚州，和他的军事顾问共度周末。陪伴他们的还有安娜夫妇，他们一起讨论登陆日的演讲安排，而且一致同意采用祷告的形式。

所有人都在等待同盟国军队最高总指挥的命令，是发动进攻还是再度延期。在1944年6月5日凌晨4点左右，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对集合起来的军官说：“没事，我们放手干吧。”2个小时后，同盟国军队攻击了诺曼底海岸。

VI

6月5日，戴高乐为了抗议盟军在法国空投的宣传小册子，而拒绝对法国人发表演说，这增加了紧张的气氛。在那些宣传材料里，他们号召法国人接受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位领袖权威人物，而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只字未提。

法国驻英国大使在外交部和戴高乐的临时住所之间不断地往返穿梭，因为戴高乐与他的英国主人一样怒火中烧。华盛顿的邀请是个圈套："他们想逮到我，但是不可能!"诸如此类的牢骚。戴高乐驻英国大使找到艾登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他当时正在丘吉尔的床侧。首相在这个一生中最为紧张的夜晚，喝了不少酒，比平时更早就上床休息了。

当驻伦敦大使向戴高乐报告这一切的时候，这位将军细想了一下丘吉尔的愤怒和痛苦，心满意足地平静了下来，并且保证会发表讲演，还允许政治联络的军官去参加战斗。这些人已经登上船了，而伞兵已经开始在德国后方降陆了。

罗马刚刚落入同盟军之手，罗斯福在华盛顿也刚刚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了演讲。他欢迎意大利重新回到了文明社会。

1944年6月6日，美国东部时间凌晨3点32分，美国正式宣布进入西欧。艾森豪威尔当天的命令在空中回荡："同盟远征军的士兵们，水手们和飞行员们，你们就要踏上这场伟大的远征……"

戴高乐发表了演讲，宣告他现在身处于"古老和亲爱的英国"。但是他再一次拒绝去见英国大使，并且拒绝宣读英国人为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丘吉尔知道，除了让戴高乐讲演外，别无他法。如果戴高乐的讲演充满对立情绪的话，就在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切断他的麦克风。尽管戴高乐是运用法国语言、文化和调动民众心理的大师，而他的这次演讲充分展示了他的过人口才，这种场景在他的一生中都不常见。他将所有国民权力都归于法国政府，他还毫不含糊地表示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就是由他本人领导的。

丘吉尔和法国的其他民众一样，从自己的收音机里倾听他那位让人生厌的客人滔滔不绝地演说。他一开始还做好了对这位将军的演讲随时喊停的准备，但是，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被

戴高乐感动到几乎落泪的地步。当伊斯梅难以置信地看着首相的时候，丘吉尔对他咆哮道：“你这个饭桶，你有没有感情啊？”

罗斯福知道登陆行动正在进行之后，午夜时分就休息了，而埃莉诺因为太紧张而无法入睡。当凌晨3点白宫的接线员为她接通马歇尔从英国打来的电话时，她唤醒了总统。罗斯福穿上他那件旧的灰毛衣，从床上一跃而起。马歇尔汇报说，在奥马哈海岸，登岸部队遭到了比预期更为猛烈的抵抗，但是在五个海滩分别登陆的多数士兵正在稳步登岸并向内陆挺进。罗斯福命令接线员在凌晨4点的时候，让白宫的全体职员立即回到工作岗位上来。

在登陆日的那天早上，罗斯福于早晨9点50分和国会领导人会面，在11点30分他又接见了一些军方领导人。午后没过多久，温斯顿·丘吉尔兴高采烈地打来电话传达前线的捷讯。当罗斯福和他的女儿一起共进午餐的时候，先遣部队传来的音讯只是星星点点的消息。在下午4点，当总统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他的办公室里塞满了记者。有迹象说明伤亡人数超过6 000人，被杀的士兵使水面上泛起了“许多血色的小泡沫”，但这远比预计付出的代价要少。总统欢欣鼓舞地告诉记者，他们知道和自己知道的一样多，并且透露这次作战的日期是在德黑兰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当被问及这次独立登陆行动的意义时，总统反问提问的记者是否横渡过英吉利海峡，并且说：“英吉利海峡的狂风暴雨，总是被旅游者当成是人生的一次最大的考验。”

在那一天里，罗斯福告诉戴高乐说，如果戴高乐将军乐意在7月到华盛顿来的话，他将很高兴去接待他。他也送给丘吉尔两台电子打字机，作为盟国在西欧登陆日的特别礼物。

当天傍晚，罗斯福向美国和全世界发表了演讲。对于沉迷于罗斯福的演讲艺术的人而言，他的这次讲演被认为是他所有演讲中最伟大的一次，也是取得效果最大的一次，也只有他第一次就职时的演说堪与之匹敌。

《纽约时报》第二天的社论中写道："我们终于等到了我们为之而生的那一刻……我们奋勇向前，来迎接对我们力量和灵魂的考验，迎接对我们信念的考验，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信念，而且是对全人类的信念。"

希特勒又向他的指战员们下达了老一套的命令。希特勒命令他们拼死抵抗，将盟军消灭在海滩上。希特勒还在暗自思忖道，罗斯福可能会因此失去连选连任的机会，"要是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会在什么地方的监狱里终此一生。"丘吉尔也会因此被清洗下台。

6月17日，隆美尔和战区总指挥、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告诉希特勒不可能将盟军控制在滩头阵地上。同盟国的空军力量使得德国聚集装甲部队进行反击的努力搁浅。到了6月末的时候，同盟国的军队已经渗透到离岸30多千米的区域，铺开了一条近100千米长的战线。

力量的天平再一次发生了变化。法国人被重新组织了起来，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力量得到了加强。西方同盟军开始和苏联军队展开了争夺柏林的竞赛。丘吉尔和戴高乐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重返了法国。

---

1. 哈罗德·莫里斯·麦克米伦（1894~1986）：英国政治家，在20世纪30年代支持丘吉尔反对英国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他于1957~1963年间担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22
想拒绝这个阴谋家实在太难了

夏尔·戴高乐对1944年7月6日到8日间他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交谈的描述

I

在盟军诺曼底登陆日的前一天，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抵达华盛顿。罗斯福应丘吉尔的要求前去会见他，这使得斯大林相信美国人也对波兰问题极为关注。罗斯福在国宴上发表祝酒词时，对来访的波兰人极为体贴。罗斯福提到自己曾经仔细观察过16幅不同的波兰地图。他还说，当他的客人和他都是年轻人的时候，当时还没有一个独立的波兰呢。罗斯福可能是想要暗示波兰人应该意识到他们立足未稳的处境，并且在精神上依赖欧洲。这可不是米科拉伊奇克想要听到的，对于罗斯福引述的斯大林承诺解放波兰并使之独立的说法他也不以为然。会谈结束后，米科拉伊奇克几乎没有与公众和美国媒体有任何接触。

罗斯福让斯大林能会见米科拉伊奇克。在7月23日，为了配合霸王行动，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同期展开了对德军的大规模军事反击。他调动了100万士兵向前推进，形成了一条720多千米长的阵线。苏联红军俘获了大量的德军士兵，清除了明斯克附近的敌人，并且涌入波兰，占领了卢布林等地。此时，斯大林将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波兰委员会迁到了卢布林，并向丘吉尔和罗斯福宣布，只有在他已经建立的波兰委员会的安排下，他才能同意会见米科拉伊奇克。

罗斯福的最终目标是在实力强大的美国领导下重建新世界。他知道，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得到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支持。丘吉尔和戴高乐也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有些时候都会遭到国内选民的反对。罗斯福则并非如此，他非常狡诈，富有灵感和理想主义，他的这些特质总能帮助他找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正如1940年当罗斯福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冒着可能引发战争或是无法再次当选的风险，坚决帮助丘吉尔的主战派来战胜纳粹和英国国内的绥靖主义力量。事实证明罗斯福的选择是正确的。

罗斯福深知，对于饱受磨难的波兰来说，翻身的机会还没到呢。罗斯福尽力寻求解救所有的人，但是他也知道不可能立刻将所有的人救出苦海。罗斯福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也有着慈悲之心，但是现实主义永远在他的政策制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斯大林在7月末发表了公开讲演，称赞艾森豪威尔将军率领的军队“战果辉煌”。如果布鲁克判断正确的话，斯大林之所以会支持霸王行动，是因为他不相信这次行动会成功，只不过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来削弱德国的力量，同时促进苏联对欧洲的渗透。那么现在，斯大林对于战果一定感到极为震惊。而如果西方同盟国还如丘吉尔和布鲁克所愿的那样，在地中海战区踌躇不前的话，他们一定会完全失信于斯大林。

随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罗斯福第四次竞选的对手即将产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放出风声说，他愿意参加这次竞选。在一封写给密歇根州极富影响力的参议员的信里，他说，自己现在身处的地理位置和在军队中的职务让他无法参加竞选，但是如果受到共和党代表会议的提名的话，他将顺从民众的普遍意愿。但是罗斯福却能够泰然处之。他多年前就知道该怎么对付麦克阿瑟。

1944年7月26日，罗斯福在火奴鲁鲁同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召开会议。此时，罗斯福回顾了一下麦克阿瑟的不光彩的历史。在珍珠港事

件发生的一周前，麦克阿瑟曾说过，就算遭遇日本攻击的话，他不需要什么援助就能保住菲律宾。“我们最重要的安全保障是，我们的敌人没有能力对我们所驻扎的岛屿发动空中袭击。”

在火奴鲁鲁的会议上，罗斯福向麦克阿瑟提出，可能将授予他最高军事统帅权，并提出让他怦然心动的提议，让他完全控制海军力量和主持进攻菲律宾的战斗。这对麦克阿瑟来说是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

尼米兹想要先避开菲律宾岛，先攻占一些较小的岛屿，逐步逼近日本本土，然后以岛屿和航母为基地轰炸日本。他认为攻占菲律宾是时间和人力上的浪费，最多是能给麦克阿瑟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罗斯福本来早就有过好几次机会可以毁掉麦克阿瑟的职业生涯。1942年1月，麦克阿瑟曾接受了菲律宾总统奎松送给他的一份价值不菲的礼物，这份礼物的价格超过50万美元（当时，这位将军的年薪也仅有3.3万美元）。购买礼物的钱取自菲律宾国库，而这份礼物是对麦克阿瑟对菲律宾杰出贡献的认可。但是对于一个现役美国军官来说，接受这样一份礼物，无论如何都是十分不合适的。如果把此事公之于众，一定会对麦克阿瑟的竞选造成沉重打击，何况罗斯福本来就在毁坏对手政治声誉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天赋。正如罗斯福所深知的那样，麦克阿瑟是个自恋狂，也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反对者，还是个很容易对付的竞选对手。

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罗斯福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政治斗争策略上的每一步几乎都处于上风。正如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麦克阿瑟老是想要反抗，想要冒犯罗斯福的权威，可是罗斯福一点都不因此而觉得受到困扰。这位将军的个性完全符合总统的需要。总统希望能树立一个偶像，敌人们尊重他，可是无法打败他。”

罗斯福并没有试图阻止麦克阿瑟参加总统竞选，但是共和党人却让麦克阿瑟空忙一场。共和党党魁们忽略了这位将军，把总统提名给了纽约州州长托马斯·E·杜威。

杜威是罗斯福发自内心痛恨的那种共和党人，他为人冷漠、做事古板、毫无幽默感，尽管口才很好。杜威很聪明，而且办事富有效率。在共和党内，他的立场介于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

1944年6月中旬，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就旨在进攻法国南部的铁砧行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可能是因为地中海战区而引起的无休止争执的最后一幕。原计划打算从意大利抽出5~7个师的力量用于法国登陆。而丘吉尔希望暂缓这一计划，想要在意大利进行突击，攻入奥地利。艾森豪威尔相信在铁砧行动中，部队将会迅速地攻到罗纳河(注)，这将强迫德国人很快把战线收缩到莱茵河畔，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也会于当年年底进军德国。美国高级参谋人员和总统都认为，在意大利的作战不会取得什么效果。而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军事企图在战略上来说，成功的可能性更小。

1944年6月28日，丘吉尔终于忍不住大发脾气，并且送给罗斯福一份很长的备忘录。他在军事行动的目标上依然倾向于自己从前就偏爱的意大利，并且相信很快就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然而，丘吉尔坚持认为铁砧行动会“前景凄凉，无疾而终”。他对此做了全面的分析，并为此感到担心。但是这一分析的基础是丘吉尔自身的战略失误。首先，丘吉尔将太多的兵力投入到了地中海地区，他还过于固执地抵制霸王行动，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在斯大林的支持下，罗斯福必然会强制性推动这一计划的实现。

丘吉尔首相是一位历史伟人，但是他在战略上的判断并非总是绝对正确的。由于他对霸王行动的厌恶，英国的角色相对而言被边缘化了。不久之后，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里，丘吉尔这样写道：“毫无疑

问，我们的军队和他们（美国人）相比，只有少得可怜的兵员。每当我看到这种局面的时候，都会感到痛心。我一直都希望能保持均势，但是你要怎样才能和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相比呢？他们国家的人口几乎是我们的3倍。”

1944年8月15日，“铁砧行动”易名为“龙骑兵行动”于当日发起进攻。

盟军在法国南部迅速取得了进展。他们成功地切断了10万名德国士兵的退路，并最终将他们全部俘获。

II

经过漫长的等待和磨难重重的前期准备工作，1944年7月6日，夏尔·戴高乐终于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这是他第一次对美国访问。“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白宫大门口向我问候，他一直带着微笑，极为热忱。”戴高乐还和罗斯福政府的高层民政和军事官员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刚进行了心脏手术的赫尔，还有马歇尔和莱希。

“在身处美国首都的这五天里”，大部分的欧洲政治分析家都会掩藏自己对美国的嫉妒，而戴高乐丝毫没有这种情况，他写道：“我观察到美国的上层人士身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这令我感到十分羡慕……当然，罗斯福总统一点都不对自己可以（保持乐观）表示怀疑。”罗斯福认识到孤立主义是“极大的错误”，他现在正在设想建立一种新的制度，用他的访客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永久性的干预机制，他企图用国际法来使之制度化”。戴高乐总结道，罗斯福提议的国际组织“会使得美国在全球都建立起军事基地”，这也自然包括法国的领土。

戴高乐清楚地看到，因为罗斯福显然将要支持世界上每一个殖民地的独立，而这些新成立的、羽翼未丰的国家，一定会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正如戴高乐所观察到的，通过小小的逢迎、慷慨的施予和压倒性的力量优势，美国将力争把苏联也纳入这个系统中，从而“抑制他们的野心”。

“和大多数人一样，罗斯福只不过是给自己的愿望披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可能罗斯福的动机中真的有理想主义的因素，但是那个和罗斯福同一时代的高卢人（戴高乐），就是孤傲地不肯相信这一点。

戴高乐宣布了法国外交政策的准则，以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欧洲、非洲和中东的追随者。戴高乐意识到，尽管法国是美国不可动摇的战略伙伴，它同时也是阻止美国霸权的关键力量。不然的话，美国将会完全同化这个世界，让各个国家都仿效美国的模式，而其实美国模式或许和有些国家的文化无法很好地融合。

戴高乐对美国军队帮助解放法国，和美国政府准备给法国的物质援助心怀感激：“但是在政治领域，法国必须恢复活力，必须能自力更生，接下来法国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这位将军试图消除1940年遗留下来的后果，并且反对将法国从四巨头中排除出去。

罗斯福个人对戴高乐的勇气和坚定怀有敬意，但是他也无法相信法国能很快重新焕发大国的风貌，再次成为世界上一支伟大的力量。罗斯福甚至有些感伤地想起“二战”之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领导人如走马灯般地轮换，他有时甚至想不起法国当权者的名字。戴高乐可能会使这个国家成功地开辟政治新纪元，但是鉴于这个国家“一战”后的政治状况，以及之前130年间法国政局的动荡状况，罗斯福对戴高乐可能取得的成功仍然心存疑虑。

戴高乐羡慕大不列颠，尤其羡慕丘吉尔。虽然丘吉尔将戴高乐当作法国爱国主义情绪的代表，但是他也因戴高乐的不合作态度而心存芥蒂。戴高乐努力想让别人把他当成一个羽翼已丰的同盟者，但丘吉尔却执意将自己摆在法国的保护者和解放者的地位上。同时，丘吉尔还和美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这引起了戴高乐的嫉妒。戴高乐尊重并羡慕美国的力量，但是他觉得自己必须彰显法国的重要性，才能获得美国的真正尊重。

因为显而易见的理由，丘吉尔深信，在外交政策方面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是英国国家利益的基石。在世界大战和冷战之中，对于英国来说，美国都是一支不可取代的力量。

总的来说，戴高乐想要和英美建立一个平等的同盟，但是他没办法得到美国人的首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却被当成是美国的竞争者而非盟友。

7月19日，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只有一个议题，就是确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虽然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有时实在让人不能放心。民主党人并没有看中亨利·华莱士，他们认为华莱士总是发出不和谐的声音，相对于主流派的民主党人而言来说，他是个左倾分子。他的很多观点都很奇怪，他也无法和国会领导层合作，在所有有关赞助和党务的问题上，他都经常大发厥词，唱些关于道德之类早就过时的老调。然而，罗斯福却很偏爱他，但是也发现他引起了党内持续不断的争议。比起加纳，华莱士对总统个人要忠诚得多。

埃德加·胡佛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华莱士是个危险人物。1944年2月4日，华莱士在洛杉矶的一个工会会议上发表了讲演。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这是个共产主义的会议。罗斯福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华莱士并没有发表什么煽动性的言辞。但是在罗斯福派他去南美洲转了一圈之后（他自己除了怀着良好的意愿出访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做），胡佛写信给司法部长，信中说副总统“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已经受到玻

利维亚共产党的影响了”。这明显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扭曲。罗斯福老谋深算，不可能看不出这只是政治诽谤，他也清楚这位美国联邦调查局领导人有偏执的倾向。然而，罗斯福的人生已经走到了这么高的位置之上，而国际形势也发展到了当前的地步，他不愿意为杜威指斥他的副总统是斯大林的傀儡而费心。

罗斯福曾向几个密友暗示，不是他需要这个总统职位，而是总统这个职位更需要他。现在罗斯福间或会展现出蛮横无理的一面了，这也是他内心感到疲倦厌烦的标志。

从来没有一次，人们对副总统的提名人选如此关注过，也从来没有哪名在任的总统在挑选和自己共同执政的伙伴时如此满不在乎。

7月10日，华莱士从他的中国与苏联之旅返回，他这次行程长达43 470千米。他回来时，罗斯福已离开华盛顿。而民主党大会将在19日召开。当被告知他不再被作为副总统提名人选时，他和总统通了电话。关于这次访问，罗斯福和华莱士谈论了两个小时，期间，罗斯福提到了副总统的职位，并且说他自己的选择是华莱士，但是他得到的意见是，如果他选择华莱士的话，他将失去300万张选票。华莱士说，如果罗斯福能找到一个人，可以比他对民主党做出更大贡献的话，“那就选择他吧”。但是，他相信罗斯福将力保他。

7月11日，罗斯福给民主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写了一封信，宣布自己将参加总统竞选，想要赢得第四届任期。7月11日傍晚，罗斯福、罗伯特·汉尼根和别的党魁一起讨论了副总统的人选。大家对每一个考虑之中的副总统人选都仔细加以评判，而华莱士的名字却几乎无人提及。在这个小圈子里，他几乎连一个支持者都没有。“罗斯福根本就没有保护他。”

汉尼根提名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哈里·S·杜鲁门。杜鲁门任参议员期间，成绩斐然。他从来没有过贪污的记录，而且很受大众欢迎，在意

识形态问题上也无可指摘，同时他还是个温和的改良派。每个人都觉得杜鲁门是最合适的人选。罗斯福最后对党魁们说，他们看上去好像偏爱杜鲁门，他本人对此也没有异议。哈里·杜鲁门和几个历史学家曾经断言，在这场讨论结束的时候，罗斯福在一个信封上写下了几行字递给汉尼根，上面写着："鲍勃，就是杜鲁门了。"

汉尼根很想说服华莱士放弃竞选，但是华莱士说，除非是罗斯福总统亲口说出要求他退出，否则他一定会坚持到底。于是所有的党魁都在非正式的新闻简报中大骂这位副总统不识时务。

罗斯福本来应该更加关注个人的健康状况，如果他想要实现在美国和世界上的宏远目标的话，就应该保证有人能为这一目标而奋斗不息。他不应该这样轻率地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沉浸在一片沸腾的气氛之中，很多政治家看上去暂时忘了他们只有一位能打败杜威的候选人——罗斯福。95%的代表拥戴罗斯福，他是继林肯以来最为伟大的美国领导人。1940年，罗斯福挑选了华莱士作为他的副总统，因此而招致了党内的批评。1944年，罗斯福干脆把选择副总统的权力交给了国会。总统离开了芝加哥，党内各派豪杰就开始跃跃欲试了。

罗斯福夫妇共度了一段轻松愉快的假期。他们之间的关系稳定下来，并且还出现了转机。7月20日，总统抵达了圣迭戈。

就在同一天，在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的支持下，一群不满的德军军官试图刺杀希特勒。希特勒拥有一种常人不可思议的自我防卫本能，他预感到了不安，就在炸弹爆炸之前离开了标有军事部署图的桌子，而炸弹原来就放在桌子旁边的一只公文箱里。有人当场被炸死了，但是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希特勒还活着。

7月20日下午，民主党的党魁们还聚在芝加哥，他们打电话给罗斯福，让总统说服杜鲁门接受副总统的提名。罗斯福如果加以个人干涉，即使是在处理一般事务的时候，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杜鲁门就站在汉尼根的身边，能够清楚地听见总统说的每一个字。罗斯福让汉尼根去告诉杜鲁门，说如果杜鲁门“想看到民主党在战争的中间崩溃，或许还会输掉这场战争的话，那就听之任之吧”。杜鲁门尽管曾经坦白地表示他对这个职务不感兴趣，终于还是做出了让步。

在第一轮投票中，华莱士以429.5票对319.5票领先于杜鲁门，而剩下的427张选票则分散在其他候选人中间。在第二轮投票时，汉尼根等各大党魁玩弄手段操纵了选票，最终杜鲁门以1031票对105票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埃莉诺宣布她自己“对这整场交易感到恶心”。她认为这是“恶政”，是“弄虚作假”，虽然她知道杜鲁门是个“好人”。

III

7月21日，星期五，罗斯福本来预计搭乘一艘全新的美国海军重量级巡洋舰巴尔的摩号离开圣迭戈，但是他不愿意在周五开始一段航程，所以这艘巡洋舰在午夜之后动身。在民主党大会结束之前，他就已经到达公海上了。在经过一段愉快的旅程之后，他于7月26日抵达珍珠港。太平洋舰队的许多船只都停泊在珍珠港。当罗斯福的旗舰和护卫舰驶进港口时，所有的海军水兵都在甲板上列队接受总统的检阅。

自从发生标志战争转折点的中途岛海战之后，太平洋战争差不多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美军在太平洋西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所罗门群岛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分别由西和由北跨越太平洋包抄日本的过程中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战争指挥才能。

经过太平洋海战，在9个月内美国向日本本土方向推进了2 400多千米，日本海军被完全打退了。在中途岛海战之后，日本人重建运输线的目标也落空了。

美国领导人在火奴鲁鲁召开了会议，讨论下一步的军事计划。有种意见认为应该先攻打台湾岛。因为它比菲律宾更接近日本，这将使空中干涉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变成可能，还能巩固蒋介石的力量，同时潜在地增加美国对日本的攻击能力。反对攻打台湾岛的人除了鼓吹抢占菲律宾的好处之外，还认为占领台湾岛反而可能使美国卷入一场规模巨大的陆地战争，而美国在从欧洲战争之中抽身之前，无力应付一场这样的战争。麦克阿瑟也发表了一篇雄辩的演说表示支持攻打菲律宾。于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开始两周前，美军发动了对菲律宾的进攻。

7月27日，在结束了军事战略的谈论之后，罗斯福、麦克阿瑟、尼米兹和莱希乘坐一辆敞篷轿车，在瓦胡岛上兜风。总统和陪在他身边的将领们受到成千上万名夏威夷人的欢呼，很多现役军人也对他们行礼致敬。为了迎接总统，海军、陆军和潜艇部队还组织了军事表演。罗斯福总统追忆起了10年前他上一次来访时的不同景象，那时也举行了一次军事表演，但是大多数坦克和卡车的性能都有问题。

7月28日，罗斯福总统参观了一家军医院。罗斯福让一名安全人员推着他，经过每一位因为战争而截肢的士兵的病床，他和许多受伤的老兵交谈。他身边的人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总统这么动情——总统都几乎忍不住要潸然泪下了。

几个小时后，罗斯福和他的随行人员登上巴尔的摩号，从珍珠港驶往阿拉斯加。这趟旅程具有重要的意义。罗斯福总统对战区的情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找到了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最好方式，并且做出了科学而理性的决定。而如果将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从他们的指挥岗位召回国内的话，是一种极为不负责任的做法。

1944年8月3日，巴尔的摩号及其护航舰到达了阿留申群岛。罗斯福在和机场上的军官和工作人员谈话时提到："我喜欢吃你们这儿的食物。我喜欢你们这儿的气候。"这句话也不纯粹是场面之言。他把阿拉斯加当成是美国最后的一座堡垒。在这里，他改乘一艘驱逐舰，在雾色中沿着太平洋岸航行至华盛顿州的布雷默顿(注)。

就在那里，8月12日，罗斯福站在驱逐舰前甲板上搭起的讲台上，对1万名船坞工人发表了演讲。这个演讲安排很有问题，因为自从罗斯福遵照医嘱减轻了体重之后，他有一年多时间没有依靠支架站着了。这时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罗斯福发现自己很难控制住讲台上的演讲稿。他站在微微倾斜的甲板上。用两只手扶住讲台。风可能会吹走他的演讲稿，同时也让船只摇摆不停。除了这些因素让罗斯福分神之外，他的胸和肩膀还承受着剧痛。

罗斯福坚持继续演讲，尽管他感到极度不适，呼吸也变得不畅，最终结束了演讲，他步履蹒跚地回到驱逐舰的舰长舱里，跌坐在一把椅子上。医生告诫罗斯福，在回去的路上每天都要好好休息。罗斯福自己对此也表示了同意。他于8月15日到达了华盛顿。

有趣的是，只有戴高乐对罗斯福的布雷默顿讲演发表了积极的评论。8月l4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发过来一封信，在信里他宣称自己"满怀最大的兴趣，聆听了您最新发表的精彩演讲"。

尽管总统不仅在劳动阶层中，而且在整个美国，甚至在全世界都受到广泛的爱戴，但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很痛恨新闻界对他虚弱的身体和治疗状况的好奇心。这20年以来，面对有些记者在这方面的提问，他要么避而不答，要么就含糊其辞。在看到那些小报上爆出的秘闻逸事的时候，他曾说："这帮新闻记者全都是些盗尸魔。"

战后如何安排德国占领的欧洲的问题，日渐迫切地摆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面前。盟军已经从东、西、南三面几乎形成了对第三帝国

的合围。8月17日，丘吉尔发给罗斯福一封电报。在电文中，丘吉尔表示自己想尽快部署兵力，德国一撤军，英国就立即占领雅典，避免希腊被共产党人所控制。在这个时候，国务院向罗斯福建议，如果如丘吉尔希望的那样，重建君主制政体的话，共产主义将会在希腊蔓延。丘吉尔在8月17日的电文里主动提出，当这个国家里的侵略者被肃清之后，希腊人将决定自己是想要选择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但他也提出暂时建立君主立宪制政府的设想。罗斯福忽略了国务院的意见（他经常如此），并且于8月26日回信给丘吉尔，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随着苏联进军波兰，波兰国内形势的发展到了紧要的关头。8月10日，米科拉伊奇克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面。在这次会面中，斯大林反复保证，他不会做任何努力来推动波兰的共产主义发展进程，还宣布会帮助波兰人民。斯大林还对民主德国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做法持不同意见，他说“要在德国推行共产主义，还不如给母牛上鞍呢”。斯大林的表态让米科拉伊奇克感到欢欣鼓舞。

事实证明，米科拉伊奇克对于斯大林的讲演是高兴得太早了。8月18日，斯大林发电报给丘吉尔，宣布苏联与在华沙发生的“无序的、可怕的”暴动之间没有任何纠葛。波兰地下力量在华沙开始逐渐转到地上行动，并勇敢地和德国人为了城市的控制权而斗争。斯大林向罗斯福宣称自己本来都准备“在波兰大规模布置军事力量”了，但是出于长远考虑，认为这一计划有欠周详，而且会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同一天，罗斯福收到了丘吉尔发来的电报。丘吉尔称赞盟军在“法国取得的辉煌而巨大的胜利”，并认为这一胜利“比苏联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所取得的战绩都要大得多”。丘吉尔认为，“显而易见”斯大林也会相应地“更加尊重我们”。当时，西方国家在欧洲的兵力差不多只是苏联红军兵力的40%。而且，西方国家的军队还承受着因为战争中严重伤亡而兵力不断减少的压力。英美联盟明显增加了人手来对付苏

联，但是能在波兰发挥多大作用就不好说了。不管怎么样，丘吉尔长期以来对霸王行动的疑虑已经一扫而光了。

第二天，罗斯福提议与丘吉尔联名发一封电报给斯大林，请求斯大林给予华沙的波兰人所有可能的援助，“如果对于华沙的民众不闻不问的话，那么考虑一下世界舆论将会做何表态吧”。罗斯福认为波兰的暴动可能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但不想因为这件事而和苏联交恶。

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这一提议立刻表示同意，并在罗斯福的电文后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将这封电报转发给了斯大林。8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助理电告丘吉尔，向他保证苏维埃政府不会反对英美飞机向波兰空投物资，但不希望这些飞机进入苏联境内，“因为苏联政府不愿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华沙危机中”。

8月15日，丘吉尔前往地中海地区，亲自为铁砧行动督战。8月20日那天，他写信给罗斯福，为美军的出色表现向罗斯福道贺，但是后面又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我们对于您的帮助深表谢意。”四天后，丘吉尔又发电报解释说，上次的那份电报是要发给巴西总统的：“密码译电员明显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位总统。”

罗斯福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比起丘吉尔来说，也积极不到哪儿去。与丘吉尔相比，罗斯福更笃信宗教，他对宗教的膜拜远甚于对资本主义的信仰，这可能是美国政治生活对他的影响。

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丘吉尔写道，自己和内阁“对华沙的处境深表忧虑。而斯大林拒绝提供机场设施的做法，更使我们未来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再次要求罗斯福）命令去华沙空投援助物资的飞机在苏联的机场上迫降。我不认为苏联人会对这一既成事实做出什么干预。”丘吉尔还在信里夹了一封一位波兰妇女写给教皇的信。

9月5日，罗斯福回答说，根据他的“军事情报部门的汇报……作战的波兰人已经离开了华沙……德国人已经完全掌握了局势……华沙的波兰人心中反抗的火种，已经因为拖延和德国的行动被不幸地扑灭了。现在看起来，也没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了。长期以来，我一直因为无法向英勇的华沙捍卫者们提供相应的援助而感到非常愧疚。我仍然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为争取波兰战胜德国而共同努力。”罗斯福的这番表态其实是毫无诚意的。“反抗的火种”直到苏联人最终进占华沙时才被“扑灭”。前后差不多总共有20万具英勇的华沙人尸体被埋葬，这占到华沙城总人口的1/5。

华沙早已被残酷野蛮的血染过了，而苏联“仍然站在波兰门外，犹豫不前。”

10月2日，米科拉伊奇克向丘吉尔报告说，华沙的波兰人眼看就要向德国人投降了。发生在波兰首都的这场抵抗运动，是整场战争中最富有英雄主义精神的斗争。1944年，波兰的这次抵抗比法国1940年反对德国入侵的抵抗长了三周，比1939年波兰政府的抵抗长了四周。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信念，波兰人总是非常坚韧而又非常英勇。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回忆录中写下的那样，在德国人一度重夺华沙的控制权之前，华沙的最后一次广播里说道：“这里曾出现过短暂而璀璨的真理。我们在希特勒的魔掌下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愿公正的上帝早日做出他的裁决，波兰正承受着严重的不公正待遇。愿主惩罚所有的罪人。英雄属于那些只有左轮枪和汽油瓶，却能够无惧地面对坦克、飞机和机枪威胁的勇士……英雄属于那些在战火中照料伤员、传递情报、宽慰垂危者的妇女……英雄属于那些依然无声地在焦土废墟中玩耍的孩子。这就是波兰人民。”

“能唤起人民如此的英雄气概的国家必然千秋不朽。死者长已矣，生者仍笙歌。波兰人只要不亡，就一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波兰必将重生。”

丘吉尔评论道，“这些话的光辉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作战了60天，波兰地下运动的4万名战士中有1.5万名为国捐躯，德国人也因此而付出了2.6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10年后，丘吉尔写他的回忆录时，依然对此满腔愤怒，他写道：“当三个月后，苏联人进入这所城市的时候，他们发现整座城市几乎都沦为瓦砾了，满目都是还未掩埋的尸体。这就是他们对波兰的‘解放’。”

丘吉尔向卡多根承认，他当时已经做好准备为了波兰与苏联走到“战争的边缘”。丘吉尔实际上想说的是，他准备推动美国采取这样的政策。

Ⅳ

波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野，但是西方领导人已经初尝了苏联占领东欧后会带来的苦果的滋味。丘吉尔当时的盛怒应该得到嘉许，即使是从今天的视角看来，都比罗斯福当时的优雅镇定要合适得多。不管怎么样，在波兰的问题上，西方国家已经无计可施。

斯大林和丘吉尔同样关注德国，而德国的大部分都被英国与美国控制了，也就是说罗斯福和丘吉尔（实际上是他们的继任）会决定德国的命运。罗斯福希望可以利用斯大林对德国的关切作交换，来保证苏联在东欧的问题上会规规矩矩的。如果原子弹试验成功的话，美国对苏联谈判的筹码就又多了一个。这只是一种说得通的猜测，但这种对罗斯福想法的理解，是唯一能符合他之前观点和行事准则的解释。

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军队都逼近了莱茵河畔，他们离意大利半岛还有1/3的路程。他们想在斯大林的眼皮底下夺取希腊和南斯拉夫。8月25日，戴高乐返回巴黎。第二天，在他前往爱丽舍宫的时候，受到了

上百万巴黎人的热情欢迎。罗斯福之前同他确立了彼此间的关系可谓正是时候。如果戴高乐将军的合法性得到了这么多民众的认可，而美国却还没有表示对戴高乐将军的赞同态度的话，接下来对美国来说，事态就会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而在历史上，戴高乐最终宣誓就职，并很快用美国的军火武装起了法国的军队。

在罗斯福的远期计划中，他打算和苏联大打德国牌。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总统提出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和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总统对此大加肯定。他相信斯大林会为此买单的。美国的军队在仔细考虑过占领德国的情况后，制订了彻底清除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计划。国务院制订了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一个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但是赫尔和史汀生都不知道，在德黑兰会议上，几大巨头已经就有关问题达成过初步共识。

罗斯福鼓励摩根索的计划，但是他从来也不相信一个如此有违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计划能够成功。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 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摩根索的计划还要求所有的德国人中犯了“重罪”的，一个个都要受到指控，将他们聚在一起，然后“执行集体处决”，甚至没有必要走一遍军事法庭审判的过场。摩根索在制订这一计划时，看上去更像他之前担任法官时的表现，而不是现在的这个温文尔雅的财政部长。丘吉尔和罗斯福彼此间根本就没有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提出这个计划，只是为了吊足斯大林的胃口。

罗斯福的亲信们为了战后对德条约签订的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另一场巨大的闹剧在罗斯福身边的宠臣和高级军官之间展开了。霍普金斯十分希望自己有机会能统治战后的德国。摩根索深信德国人民就是邪恶的温床，他们心里不可避免地滋长着对世界的敌意，霍普金斯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就连罗斯福的发妻埃莉诺也在某种程度上怀有相似的想法。史汀生等人激烈地反对摩根索的计划，并且热切地感觉到

重建一个融入文明社会的德国的必要性。德国从1918年开始，就作为战败国受到严酷的对待，这也是他再一次挑起世界大战的原因。赫尔一开始对摩根索抱有某种同情，但是当他完全理解摩根索的计划后就开始坚决地反对。安娜·罗斯福明显对摩根索很冷淡。于是财政部长拿出最后一招，在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办公室门外耗上了。当罗斯福说不愿意再见到摩根索的时候，安娜遵照指示，抓住摩根索的前臂，把他带到了电梯口。

1944年8月，摩根索访问英国，重新考虑战后《租借法案》的要求和与英国宏观经济关系。摩根索向罗斯福报告英国的国库已经快要掏空了，而丘吉尔也可能因此在大选中落败。罗斯福说如果事情以至这种田地，他会为英国“买单”的。克莱门蒂娜·丘吉尔夫人领着摩根索参观了英国的防空洞（英国当时正在躲避德国的V–1火箭的袭击）。摩根索从伦敦同时向两个国家发表了演讲。演讲稿中提到了几处关于战后德国处置的问题。

摩根索从艾登嘴里哄骗出了德黑兰会议的一些情况。艾登当时正在为了《租借法案》一事而有求于摩根索，而且艾登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忤逆摩根索的意思。这使得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大为光火。艾登没有在罗斯福身边工作过，对罗斯福的独特思维方式不太了解。他明显没有料到，罗斯福不会像丘吉尔那样把德黑兰会议的进程告诉自己身边的高级政府官员。

当摩根索回到华盛顿的时候，他还煽动了赫尔和霍普金斯的情绪。罗斯福催促霍普金斯去找到史汀生，让史汀生去安抚摩根索，让他冷静下来。所有的人都是总统内阁的德国问题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要是罗斯福后院起火的话，一定会弄得鱼死网破的。摩根索的小集团开始将他们听到的事件的版本泄露给新闻界。摩根索在埃莉诺·罗斯福面前攻击史汀生，说他私下和丘吉尔电报往来，并在罗斯福面前攻击史汀生说，他曾与胡佛过从甚密。

罗斯福一直略带困惑地看着双方互相攻讦撕咬，直到他的新一届总统任期选举开始，他才觉得这些事情做得太过火了。他要求这些领导人们保持克制。不管是在和哪一边交谈的时候，罗斯福都表示自己从头到尾都会置身事外。当时最聪明的小集团领导人是弗兰克福特，他向史汀生保证摩根索所说的德国决议里面一定有问题，史汀生没必要对这个太过在意。因为他觉得罗斯福不可能认真做出那样的决定。弗兰克福特的判断是正确的。

罗斯福不愿意让摩根索来为美国的占领军制定美元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总统考虑到现实情况后说："什么都不用做。"他说，士兵们行军到一个地方后，在和当地人自由交易的时候会自然地形成兑换汇率。

摩根索认为取得和平的关键在于德国自己身上，因而他建议避免德国拥有任何飞机，"就连滑翔机都不行"。罗斯福面无表情地听他说了一大通。摩根索又重提要避免让德国人重披军装或行军服之类的话题。他好像相信德国是一个会自我武装的战争机器人，只要让德国人穿上军装，他们就会无止境地向前行军，直到走到他们邻国的土地上为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丘吉尔对这个也有点神经过敏。正如丘吉尔公开坦白的那样，他相信是普鲁士容克贵族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尚武的国家。实际上，丘吉尔有时候说的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观点也差不多："杀了布尔什维克，亲吻德国人。"丘吉尔依然坚持大不列颠几个世纪以来一贯的均势政策，去压制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

罗斯福稍后将决定是否要重建德国，从而让德国来制衡苏联；还是决定在人权许可的范围内，压制德国的复兴，以此来作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收敛自己的行为。1944年9月29日，罗斯福告诉赫尔："在他们占领的领土上，（苏联）多多少少都会为所欲为的。"9月13日那天，罗斯福在魁北克给摩根索转发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哈里曼刚刚从莫斯科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称："苏联人正想靠苏联红军的力量

和威望撑腰，逼迫我们和英国政府，接受苏联所有的政策。”而且一旦有可能的话，苏联人还想成为“世界霸主”。

罗斯福在第一次亲自参加有关德国问题的委员会讨论时，就推荐用赈济来喂饱德国，并提议不给他们发展现代化的机会，而让他们从事简单的初级劳动生产。罗斯福认为这样管理德国人会比较容易。罗斯福还打趣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进行的就都是简单初级劳动。摩根索的一位助手事后询问道，这是不是总统重建德国和平的方案，即避免鲁尔发展军事工业，但是仍不限制其重工业的发展。当时罗斯福与其他会谈者的笑谈至今仍是一个谜。

---

1. 罗纳河：源于瑞士中南部阿尔卑斯山的河流，流向西南偏西和西北，流程约813千米，流向日内瓦湖，然后流入法国东部，最后流入地中海。——译者注
2. 布雷默顿：华盛顿州中西部的城市，位于西雅图西部的普吉湾。——译者注

23
世界又一大奇迹吗?

1944年10月25日，莱特湾战役中，这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指挥、海军上将切斯特·W·尼米兹向美国第三舰队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发出的信号

I

总统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他的思路依旧清晰，但精力却在不断下降，以至于他现在很难清醒地工作超过四个小时。他差不多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了战后世界的安排之上。罗斯福毫不怀疑自己能赢得1944年的总统选举，尽管他嘴上说可能会出现问题。他认为杜威是个刚愎自用、死板僵硬的家伙。杜威在1940年至1941年间，曾在是否要帮助同盟国的问题上含含糊糊，态度摇摆不定。而罗斯福认为，那是有关这一代人命运的最重要的历史决定了，而杜威竟然在那时还是个骑墙派，因此非常讨厌杜威。而杜威的整个竞选策略就是在罗斯福身体健康问题上大做文章。

不幸的是，罗斯福的政治竞选班子里，不仅是霍普金斯，其他人也都处于过度劳累的状态。赫尔比霍普金斯还要累，而且觉得非常无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创见。史汀生依然十分敏锐，但是他也已经是一位78岁的老人了，他的身体也已经日渐衰弱。伊克斯和珀金斯是内阁几位老将中身体最健康的两位了，但是他们所主管的部门（内政部和劳工部）在战争时期并不是最重要的部门。

在内阁成员中，表现最优秀而且身体最强壮的当属新近延揽入阁的哈里·杜鲁门。尽管哈里·杜鲁门是得到副总统提名的人选，但是没人关注这一点，而且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也没有人找他协商。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和他在白宫南草坪上共进午餐。罗斯福告诉杜鲁门，他在白宫已经整整12年了，他现在想要的只是一段时间来消化。罗斯福还说自己想要一个“基本上是中间派，但是稍稍右倾的继任人”。罗斯福知道《权利法案》会带来多么大的冲击，并且知道接下来将要进行一场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权利的国内斗争。

正如罗斯福预料到的那样，杜威的咄咄逼人其实已经弄得共和党自己的缺陷大白于天下。罗斯福知道，在反驳共和党的指责的时候，他必须表现得精神抖擞，身体充满活力，这样才能消除共和党的一项极其恶毒的指责：罗斯福的身体已经不足以再撑完一届总统任期了。罗斯福在9月10日前往魁北克参加八方会谈的时候，遇见了丘吉尔。对于竞选的结果，丘吉尔认为，如果罗斯福无法当选的话，“那美国人民也太忘恩负义了”。10个月后，丘吉尔就会知道，人是一种多么不知道感恩的动物了(注)。

9月23日傍晚，罗斯福将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发表一场酝酿已久的讲演，正式宣布再次参加竞选，他的参选活动也会随之拉开帷幕。因为罗斯福没有充分锻炼肌肉，所以他还能不能拄双拐行走还是个问题。总统的私人医生建议他尽量多用轮椅代步，但是在他外出演讲的时候，他决定还是拄拐行走；当他和同僚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尽量坐在轮椅上说话。这样他就能把精力完全贯注在精心构思的演讲稿上。美国人都习惯于见到他们的总统经常进行巡回演说。但是这一次，过多的巡回演说可能反而会毁掉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的目标。

由于罗斯福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流言四起，人们都对罗斯福的身体状况特别关注，这次来听演讲的观众人数多得异乎寻常。罗斯福的声音抑扬顿挫，引人入胜，而且充满了力量。人们从12年前罗斯福的

演讲之后，就对之十分熟悉。他的演说是美国民众欣赏了最长时间的“娱乐节目”，总是能引起广泛的兴趣。在这天晚上，罗斯福并没有让他的国民们失望。这是他最伟大和最著名的政治讲演之一。罗斯福微笑着扬起头的时候，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响彻整个大厅。他的这个动作长期以来一直让他的追随者们为之振奋，而让他的对手们为之震怒。

“大家好啊!”他终于开了口，语气就像是在亲属聚会上一样，“我们总算又在一起了。中间隔了四年吧，这是怎样的四年啊！你们都知道，我实际上又老了四岁啦，这一点看上去让有些人相当不满。实际上，如果单从数字的角度来考虑，自从1933年，我们开始尽力清除堆在我们面前的烂摊子开始，有成百万的美国人都老了11岁。”

“说几句话容易，但是想通过几句话改变历史，那就难了。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1932年，知道那时候美国处于怎样的境地。”

“你们都还记得那些倒闭的银行吗？还记得排成长龙等待领面包的队伍吗？还记得不足以让你们填饱肚子的微薄工资吗？房屋和农场被低价抵押而又无钱赎回；破产倒闭随处可见；流离失所的人们被迫住进‘胡佛村’；年轻的男女们面对着绝望的将来、看不到工作的希望；工厂和矿井纷纷倒闭；铁路线上情景萧条；而船坞早就成为了空渡；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片绝望的乌云之下……”

“你们都还记得那一段坎坷而漫长的来路，我们有所得也有所失，可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风雨中一直携手共进。”

“这些共和党的领袖们早就不满足于只是攻击我了，连我的妻子和儿子也没有放过。不，他们才不只满足于这些呢，他们现在把我的小狗法拉都算上了。我并不痛恨受到攻击，我的家庭也不害怕受到攻击。但是，你们知道，法拉血管里流淌的可是苏格兰的血液，它是条苏格兰犬。它一旦得知国会内外有几个共和党的科幻小说作家编造了

一个故事，说我把它拉在了阿留申的一个小岛上，事后又派了一艘驱逐舰，花了纳税人两三百万才把它接回来的话，它那苏格兰式的烈性子早就爆发了。甚至还有的版本说为了它花了800万美元，更有人说花了2 000万美元。我已经习惯于听到别人对我进行诽谤，但我有权利抗议他们诽谤我的狗。”

莱希将军代表海军并以官方身份证明，对小狗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虽然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与这件事没多大关系，但是共和党的竞选手段中，使用了对政敌过分尖锐的指责，使很多美国人都对他们抱有厌恶感。因此，在听到罗斯福总统相当幽默的反击时，人们都很高兴。人们到现在都不明白，杜威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和这些谩骂的人划清界限。

《时代》周刊评论说："整个大厅里都回荡着经久不息的掌声。这对于新闻记者来说，看见了杜威的挑战者有力地对他进行还击，就好像看到拳击选手脱下自己的拳击手套，目光炯炯有神一样。"

历史证明大多数美国人的选择是对的，因为罗斯福成功地击溃了共和党遗留给美国的大萧条；他对孤立主义者的攻击是正确的；他支持了民主的发展；他成功地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两年内，完成了对美国的再武装过程；他以极大的技巧将美国和盟军带到了莱茵河畔；他指导军队从夏威夷推进了好几千千米，打到了日本本土。而现在杜威却因为总统的狗而在那里喋喋不休。

10月5日，罗斯福在白宫发表了一次"炉边谈话"。这次谈话的目的旨在敦促人民参加竞选投票，否认自己的政府里有共产党人，并且描绘了一幅战后他将致力去实现的美好图景。除了暗示自己的身体足够健康，能够担负起总统的行政职责之外，罗斯福在这次竞选中最大的担心就是，上百万的军队官兵害怕自己的选举权可能会遭到剥夺。

10月5日，罗斯福发表的广播讲演就是为了避免官兵的这一忧虑。表面看来，他几乎不是出于政党斗争的考虑，才催促他的听众一定要投票，因为这是他们“神圣的权利与自由”。他还更进一步表示：“美国的公民不论种族、肤色、宗教信仰，都享有投票的权利。这一权利的行使，不应该受到纳税多少或其他任何人为限制的影响。”这是对南方各州选举制度的直接攻击。在这些地区，黑人的选举权被一大群种族主义者限制了。鉴于罗斯福已经击溃了孤立主义者，让他们名声扫地再无翻身之日，所以他也不再像三年前（珍珠港事件之前）那么需要南方诸州的支持了。

在10月5日的演讲中，罗斯福还提到：“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率领下，盟军在过去的四个月中取得了世界战争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这句话可不是没有根据的恭维。作为一手推动霸王行动计划的人，他理应为此而获得声望。

他再一次声明，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必须，而且我希望，我们将能和以前同盟中的老朋友，在一个有力的国际组织之下联合起来。通过这一国际组织，我们能保卫和平，哪怕要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

就一场在正式大选前一个月发表的全国广播讲演来说，罗斯福的态度过于温和了点，但是，罗斯福的目的是要试图避免争执，并成为全国民众的精神领袖，就像当年领导他的人民走出经济上的梦魇那样，他想再次领导他的人民远离战火和纷争，走向和平与繁荣。

Ⅱ

丘吉尔在观察苏联红军推进中欧的时候，心中的焦虑也在不断增加，他决定通过私人关系来说服斯大林，减少可能的摩擦。10月9日，

他和安东尼·艾登一同飞抵莫斯科。罗斯福、霍普金斯等都对丘吉尔与斯大林能达成什么样的决议而深为不安。10月5日，罗斯福给双方领导人都发了电报，请求他们同意哈里曼列席会议。罗斯福表示，美国把这次会议看成是几个月后将在克里米亚举行的三方会议的预备会议。罗斯福表示希望双方能将这次会议上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所达成的一切决议告知美国。丘吉尔没有专门就此问题回复，而斯大林回电报说，自己也“困惑不解”。斯大林原来以为丘吉尔这次前来是为了带来魁北克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而丘吉尔是同时代表英美双方来和斯大林谈条件的。斯大林意味深长地总结道:“这一逻辑……看上去和事实并非完全一致。”

丘吉尔和艾登抵达的当天夜里10点，他们就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举行了会谈。大家一致同意，立刻邀请波兰领导人米科拉伊奇克参加会谈。丘吉尔之前就给米科拉伊奇克写了信，试图劝他前往卡萨布兰卡。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拒绝的话，这将是对英国的冒犯，将“使我们决定不再对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负更多的责任”。

丘吉尔一点都没有受到罗斯福的提请他注意的电报的影响，他对斯大林说：“让我们来解决我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问题吧。您的军队目前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与这两国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们对他们负有责任，我们还有代理人在那儿……”丘吉尔建议，在罗马尼亚，苏联占有90%的势力范围，而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分享剩下10%的势力范围；然后，在希腊，英国将拥有90%的影响力；在南斯拉夫，双方五五分成划分势力范围。当翻译正向斯大林解释这些的时候，丘吉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刚才的条件，并规定匈牙利两家各占50%；保加利亚，苏联占75%的大头，英国满足于25%的控制权。丘吉尔将这张纸递给斯大林。“出现了一段沉默。然后，斯大林拿起他的蓝色铅笔，然后在上面画了个钩，然后把它递回给我们。这事双方一拍即合，立刻就达成了一致。”

丘吉尔也意识到这样做可能有些不妥，因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当然都花了不少时间急切地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这也只是战时的暂时安排而已。我们双方都决定，所有的重大问题应该留到战争结束以后，彼此心平气和地坐在谈判桌前再说。"这其实根本就说不通。丘吉尔根本就不该拿这些幻想来逗自己开心的，斯大林也根本就没可能放松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控制。因而，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此后，双方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我用铅笔涂鸦的那张纸就静静地躺在桌子中间。过了一段时间，我问道：'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么草率地决定数百万人的命运？还是把这张纸烧了吧。''不，你留着它吧。'斯大林回答说。"

这纸草约只发挥了短短几个月效用，它并不会决定数百万人的命运，所以，丘吉尔根本没必要建议烧了那张纸。实际上，他做的那笔交易可能还不算太坏。如果西方国家成功地和苏联分享了对匈牙利的统治权的话，1956年的惨剧也就肯定不会发生。但是斯大林很快就占领了整个匈牙利，完全无视自己之前做出的承诺。

在丘吉尔制定被他自己谑称为"淘气的文件"时，哈里曼已经对事态的走向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他立刻和罗斯福进行了联系。尽管罗斯福公开表示反对大国间划定势力范围，但他也深知这样做的必要性，同时也在极力为美国谋求这方面的优势。他为丘吉尔的让步深感悔恨，并拒绝通过立法程序承认它们，但是表示，它们在当前的军事现实中的确可以发挥作用。

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确信，有关巴尔干的这些安排，是在现实可能情况下的最好安排。通过我们现在的军事行动，我们现在能够拯救希腊了。而且，我毫不怀疑，我们达成的有关在南斯拉夫各占有50%影响力的约定，能保证我们在南斯拉夫实行联合统治，这是对当前困境的最优解决方案了……"

丘吉尔在莫斯科期间，只字未提美国在原子弹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如果斯大林知道原子弹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将要出现的话，他和丘吉尔的谈判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如果丘吉尔也没有坚持对地中海的远征，霸王行动也能因此早日实现的话，捷克与匈牙利可能不会陷入斯大林的手中，只能看他的脸色度日。不仅如此，整个德国也都会在西方国家的掌握下。如果在欧洲咨询委员会上，在苏联提出分区占领德国的时候，英国没有投票支持他的话，西方国家可能也会找到一条战线，在苏联之前攻占柏林，使德国的首都完全处于英美的治下——这一点是丘吉尔与罗斯福都希望看见的。

在1944年10月19日，当丘吉尔离开柏林的时候，他已经和斯大林在东欧和德国的问题上谈好了条件，并为财政援助铺好了道路。唯一悬而未决的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了。

丘吉尔当然不是轻易上当的主，当与波兰流亡政府竞争的卢布林波兰委员会抵达的时候，丘吉尔写道："它们只不过是苏联人的爪牙，他们把该说的话背得滚瓜烂熟，还反复进行排练，连他们的主子都觉得他们做得过了头了。"

波兰的两个政治派别间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会后，双方发表了一个态度温和的公报，称双方缩小了分歧。

剩下的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苏联对日参战问题。苏联人曾经答应，一旦击溃德国，就尽快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再次表示承认自己的这一义务。但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这并不是外交上的一次胜利。因为苏联本身就对远东的领土十分觊觎。斯大林除了想扩大自己在欧洲的领土之外，就是想在远东开疆拓土了。对于苏联来说，这一次的外交策略是十分成功的。"这次对苏联的访问，丘吉尔可没捞到多少便

宜。”难怪斯大林会如此急切地向他提出让步，最后还亲自去机场为丘吉尔送行呢。

III

中美关系这幕长剧也逐渐发展到了高潮。蒋介石是个脾气乖戾的人，而被派到中国执行任务的四星上将史迪威为人也十分刻薄。史迪威来华是担任中国战区的总参谋长，并指导盟国军队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这两个人的关系最终宣告破裂。而有过外交生涯经历的马歇尔将军则令两人的争端更加激烈。史迪威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

蒋介石什么忙都不愿帮。他只想在美国和日本拼出个你死我活之前，先坐山观虎斗，以保存自己本来就不强大的力量。罗斯福当时就正确地认识到了中国在战后一定会成为一支伟大的力量，所以不愿意放弃中国。而且，罗斯福还想帮助中国提升国际地位，最终使之成为同盟国中的重要一员。

6月底，在为宋美龄所举办的一场宴会上，蒋介石公开否认他或他的妻子曾经有过不忠的行为。这让西方小报的记者们觉得极为有趣，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之间只是因为政治利益才走到了一起。宋美龄和蒋介石分居了一年多时间，蒋介石因此无法得知西方对他的评价，更不可能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魁北克的八方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决定，除了保持中国名义上的战争状态以外，什么都不必再多做了。美国人也知道，毛泽东与周恩来比蒋介石具有更强的能力，但是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都不愿意看到中国被共产党接管，虽然罗斯福曾经希望有机会能与毛泽东面谈。而蒋介石，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仍然握有很大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方国家也只能挑选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

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威胁说自己不会为了打破日本对中国的封锁而出力。马歇尔在八分仪会议上概述了蒋介石电文的内容，并依照自己一贯小心谨慎的作风，事先就准备了一份600多字的回复信。罗斯福说，给蒋介石的这封回信就用“学校校长对一个阴郁沉闷、屡教不改的小男生训话的口气来写就行了”。

罗斯福在信中告诉蒋介石，他的行为浪费了所有曾经为保卫中国而奋战过的人民的勇气，使亲者痛仇者快，他的行为正中日本人的下怀，这样空运给中国的援助就危殆了。“你必须准备好承担所有的后果及负完全责任。”信中，罗斯福提出由史迪威“不加限制统率所有……部队”。

史迪威对能收到这样一篇回信欣喜若狂，他将所有的谨慎都抛诸脑后，并决定不经过正常途径而直接去把这封信亲自交给蒋介石。史迪威还为此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小畜生吓得浑身发抖，连句话都讲不顺溜。脸色发青唇角抽，强忍着才没尖声吼。我也曾碧血黄沙骤骅骝，我也曾厌弃芳尊独倚楼。今朝也轮到我出头，看‘花生米’注他又出丑。”

史迪威的兴高采烈可能是有点幼稚。但是蒋介石认为，不管怎么样，如果他现在不把史迪威撵走，美国的下一步可能就是用毛泽东来取代他，所以至少要在表面上维持同盟的统一性。而史迪威却在试图通过秘密谈判与毛泽东建立合作关系。

帕特里克·赫尔利（罗斯福派往蒋介石处的一名无能的总统特使）于1994年9月23日会见了蒋介石。使这位特使大吃一惊的是，蒋介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

蒋介石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正在受到威胁，同时也认为美国不会对共产主义放松警惕性，而且现在美国正在总统大选的关键阶段，面对

日本人的威胁，美国不敢轻举妄动，以免整个战区发生惨败。蒋介石决定拿这个赌上一把。

不幸的是，罗斯福把这个战区当成了人员调配的中转池。罗斯福让唐纳德·纳尔逊在中国毫无目的地闲逛，提点经济建议。蒋介石利用了这种局面，他邀请唐纳德在战后接管中国经济重建的任务："我将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您，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就由您说了算。"罗斯福自己就是玩这种心计的高手，对这一提议完全不感兴趣。

霍普金斯私下里向孔祥熙透露：罗斯福将不情愿但不得不召回史迪威。此时，霍普金斯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已经失去了他敏锐的判断力，因此，对于罗斯福来说，他已是无用之身。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老软蛋'（指霍普金斯）吃他这一套的话……那从今以后，就没人控制得住'花生米'了。"

站在史迪威一边的马歇尔起草了一份电报，想给予蒋介石"严厉的反驳"，但是罗斯福拒绝签发。马歇尔只好在10月5日重新按罗斯福的意思起草了一份。史迪威被调离了中国的租借物资管理机关，也不再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但是仍然负责指挥在缅甸和云南的中国军队。蒋介石并未就此满意，固执地要求史迪威再辞去这一职务。罗斯福认为不可能任命一个不被盟友接受的将领，因为这样不利于发展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因此，史迪威被迫再度辞职。

马歇尔对史迪威桀骜不驯的个性颇为担心，催促他尽快从重庆返回华盛顿。史迪威刚一到，马歇尔就不给他和新闻媒体见面的机会。马歇尔想尽快找个合适的职务，把史迪威给差遣出去就完事，但是当时美国的军队哪里都不缺一名四星上将。虽然史迪威自己要求说给个师长他也干，但是马歇尔觉得这个职位对于一名四星上将来说太大材小用了。1945年3月8日，史迪威又一次见到罗斯福。罗斯福正对丘吉尔要送给他的一件英国装饰品赞不绝口。更重要的是，这是对罗斯福统治能力的一种肯定。史迪威在罗斯福总统面前永远提不起精神头

来，但总统从来没有因此而受到过影响。罗斯福是如此的机敏多识，他根本就不打算看出个中的端倪。史迪威认为总统在3月份的时候，看起来身体好像不太舒服，但是这一次史迪威终于被罗斯福给触动了，“就像一匹老马终于走完了一路坎坷艰辛，也就在那一瞬间，他体会到了罗斯福魅力的一线光芒”。

1944年10月20日，美国发动了旨在解放菲律宾的战争。人们对此次军事行动早就期待已久。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着4个师的力量，在强大的海空力量配合护卫下，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湾登陆。6个加强师紧跟着投入战斗。在第二天，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战之一——莱特湾战役爆发了。日本的帝国联合舰队孤注一掷，将自己的精锐力量全部投入了战斗。这场战斗的地点是莱特湾的几个相距不远的登陆口处。10月17日和18日两天，美国的突击队员占领了莱特湾东边的小岛。20日，当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着美军主力驶近海岸的时候，日本人大吃一惊。

在战斗正式打响之前，麦克阿瑟将军在一位身材矮小的总统（他几个月前刚刚继承了菲律宾总统一职，他的前任是因病在任期内过世的）的陪同下，登上了海岸。这次登陆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麦克阿瑟将军在滩头上向菲律宾民众发表了一番情感真挚的讲演：“菲律宾的父老乡亲们，我又回来了！请给予我信心！让巴丹半岛和柯雷吉多尔岛[注]的精神领导我们吧！投身战斗，随着战线一起往前移动吧！让我们一起向敌人发动袭击吧！为了你们的家人和幸福的家庭生活……大家冲锋吧！”他在结束这番振奋人心的演讲时说道：“谁都不要害怕、退缩，让每一双手臂都像钢铁般坚强！神圣的主会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紧随着他的名字前进，在他的圣杯中畅饮胜利的甘露吧！”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可能根本都没有想到，但其实这次登陆对于罗斯福总统再度当选，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莱特湾的军事行动在圣诞节之前就差不多全部结束了。在这场战斗中，日军的伤亡人数达到7万人，而美军的伤亡人数仅为15584人。

莱特湾之役逼迫日本海军决定和美国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对莱特湾的进占，使得美国军队直插日军的心脏。1945年1月9日，美军展开了对吕宋岛的攻击。

1944年10月23日，决定性的大海战开始了。

在10月25日这惊心动魄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日本的海军已经被美国海军第3舰队和第7舰队打败并歼灭。第二天，罗斯福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同样的消息。

到这个时候，罗斯福让他的竞选小组开足马力，竭尽全力进行宣传造势。杜威错误地发动了对罗斯福的攻击，说他没有给麦克阿瑟将军提供足够的士兵和飞机。但是，麦克阿瑟将军现在远在菲律宾，在他返回之前，根本就没有办法证实这一消息是否准确。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变成了共和党人唯一可以用来攻击的目标了。

Ⅳ

1944年10月21日，星期六，罗斯福总统乘敞篷车去纽约市的四个大区兜了一圈。这场旅程引起了民众广泛的关注，民众纷纷向他问好。那一天，气温只有摄氏5度左右，天上还下着雨。但这既没有妨碍到总统的行程，也没有浇熄民众的热情。行程从布鲁克林区开始，穿越90千米，经过皇后大道、布朗克斯、曼哈顿，时间长达4个小时。罗斯福丢掉了他的海军斗篷，并且逢人就挥手微笑。大约有300万纽约市民出来一睹总统的风采。300万人差不多是当时纽约市人口总数的一半了，而且还有些朝九晚五要上班的职员没法来参加。很多人为了和总统打招呼，在路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这次出行除了证明总统的身体充满活力以外，也向人们证明了罗斯福的巨大威望和富有吸引力的个性。这一年，纽约选民数占到了全国选民总数的7%，纽约的选民数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罗斯福是把美国人民从绝望的泥沼里带入到胜利王国的救星，人民想要向总统表明自己对他的敬意。

罗斯福结束了这次兜风，最后来到华盛顿广场埃莉诺的公寓。他在那里小酌了三杯，吃了午餐，洗了个热水澡，从里到外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当天傍晚，他在一家宾馆的大厅里，向2 000位外交政策协会的成员发表了演讲。他谴责共和党是孤立主义者，说他们甚至妨碍了世界法庭的进展。

罗斯福重提起1939年，他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度过夏天，有朋友曾经说不可能会发生战争，他就算反对《中立法》通过都没问题。然而，几周后，希特勒就攻击了波兰。

与往常演讲时一样，罗斯福又提了一些明智的共和党人的名字，比如“我们伟大的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而此时史汀生就坐在罗斯福的身边。

他又断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必须拥有快速反应的能力和制定决策的权力，这样在需要的时候才能够用武力去保卫和平。”他把德国说成是一个“悲剧化的国家，你在他的土壤上播撒下微风，当你想要收获的时候，得到的却只是狂风暴雨的侵袭……我将会无颜面对我的宗教信仰，我将羞于再提我的政治良心，如果我真的想要抹杀这些希望，甚至是信念的话。我依然相信所有的民族，无一例外，都有追求真理的本能，都能听见正义对他们的感召，都怀有对和平的深情。可能在德国，这些美好的情愫被野蛮的政治制度所掩埋，但是我不相信它们会窒息。我们不要再对任何德国人施加伤害了！因为，我们不相信上

帝会永远无法对一个种族的错误释怀”。他赞扬了德国裔的美国人，并保证对纳粹分子加以严厉的处罚。

这是一场有力而成功的讲演。共和党人一直就像被指斥犯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很多人可能会在大萧条的问题上原谅他们不再追究，可是战前他们对希特勒的友好态度，以及和日本的暧昧联系，都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对于民众来说，在总统竞选这么敏感和重要的场合下，就是无法忽略的了。

罗斯福乘火车回到海德公园，在那儿休整了几天后，10月27日，又踏上了远行去费城的海轮。在他开始巡回讲演之前，他乘坐一辆敞篷车，花了两个小时，绕费城兜了一圈。沿路上，就像他在纽约市那样，频频向车窗外的行人挥手和微笑。天气同样又冷又湿，但是当他向一大群人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几乎都没注意到这些。

罗斯福拿出一份1943年麦克阿瑟递交陆军部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麦克阿瑟肯定了政府在军备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第二天，罗斯福前往芝加哥。他来到“士兵广场”这一全国最大的露天大型运动场，站在自己的车上，向10万多名民主党的支持者发表了演说。

随后，他直接来到芝加哥当地的橄榄球队芝加哥熊队的主场发表演讲。罗斯福在芝加哥的讲演，侧重提到自己在帮助美国振兴经济方面做出的贡献。他对共和党关于“新政”的批评做出了积极有力的回应。罗斯福说，如果共和党认为新政不成功的话，其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共和党人的政绩比起“新政”来要差多了。

11月2日，总统在白宫做了广播讲演，对自己不能去包括克利夫兰和底特律在内的城市表示遗憾，他把原因推到战争的压力之上。他认为国民负有为国战斗的责任。同时还确定冷战后美国的任务是“建立一

个比我们所知的美国更好的美国，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能够立刻开始这项工作的话，那么你和我会知道，我们为自己的孩子带来了信念，我们帮助他们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11月4日，他在另一座公园里向4万多名听众做了讲演，西纳特拉是娱乐界里众多倾慕罗斯福的人士之一，他在开场时高唱了一曲《美国》。西纳特拉的教名是弗朗西斯，但是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富兰克林，就是因为敬仰总统。

对于很多名流而言，罗斯福身上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特别是那些艺术家对罗斯福更是钦佩之极。对少数人来说，比如海明威，认为罗斯福看上去有点呆板，一看就是那种常春藤名校出来的富家子弟，但是海明威并不怀疑罗斯福作为总统的魄力和过人之处，而且第一夫人埃莉诺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竞选前夜，11月6日，就像4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样，罗斯福在家里对全国发表了广播讲演。“今夜，我们全家静静地坐在位于海德公园的家里，我们和成百上千万的美国家庭一样，深切地关注着我们的美军战士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我们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想起了我们邻居家的孩子，想起我们朋友的孩子……他们全都上战场去了。”

“我今晚不想和你们谈政党政治，政治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面对未来，我们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军人，要把自己当成一名真正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民……在短短的25年里，我们的人民已经有两次满怀着对战争的恐惧、焦躁和疑虑，强迫自己满脸笑容地踏上战场，直面死亡。没有人愿意再次忍受这种痛苦。”最后，他在祈祷声中结束了这次讲演。

投票的当晚，11月7日，摩根索和其他一些罗斯福的亲信聚在罗斯福的家中，等待投票结果。罗斯福的自信再一次得以证实。刚过10点，罗斯福的支持者们就在各大城市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罗斯福的

票数超过了杜威，尽管这是他最近的4次竞选中票数相差最少的一次。因为有将近1 000万军人远在海外服役，他们中有90%以上的人没有参加投票，这导致总投票人数也大大降低。最后，罗斯福得到了2 560万张直接选票，领先于杜威的2 200万张直接选票——这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表现了。如果用百分比来衡量，罗斯福以53.8%的支持率高于杜威46%的支持率。罗斯福拿到了36个州共432张选举人票，而杜威拿到了12个州的99张选举人票。调查结果显示，罗斯福获得了几乎所有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的支持。

V

罗斯福现在越来越容易伤感，越来越喜欢怀旧。他从年富力强、充满干劲想要推动“新政”的那个总统，变成“二战”初期那个安详、镇定的总统，直到成为现在这个虽然疾病缠身，却想极力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总统。尽管罗斯福这时只不过62岁，但是疾病和他长期的执政生涯，导致他身上弥漫着一种超然睿智的感觉。

1944年11月27日，总统离开华盛顿，前往温泉。自从1944年11月27日以后，他就没有再拜访过这里了。他想在这里吃上一顿地道的大餐，并且放松休息一下。他在那里遇见许多旧交，和他们在一起让罗斯福觉得轻松、自在，而且感受到了支持。但是对于生性严谨而且喜欢争辩的埃莉诺来说，她从没有过这种感觉。

赫尔的身体很不好，他从干了将近12年的国务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罗斯福任命了他以前的副手斯特蒂纽斯接替了他的职务。罗斯福的这一任命使得他的有些同事对此大为错愕。他们都认为斯特蒂纽斯不足以承担这份重任，摩根索更是把继任的国务卿称为“坐办公室的小职员”。但是，事后证明，这个年轻人讨人喜欢，处处受到欢迎，而且外在气质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罗斯福需要的也只是一个能帮助他在

两党制的斗争中，以及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能给他提高支持率的助手。

12月16日，罗斯福总统从温泉重返华盛顿。而此时希特勒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垂死挣扎。希特勒攻击了比利时的海岸，这场战役最后被称为阿登反击战或突出部战役。德国人事前秘密地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德国最精锐的两支装甲部队横穿阿登高地，来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这就像是1940年德军横扫比利时将英法联军逼至敦刻尔克的重演，只是这一次的规模比1941年要小得多。德国人等待恶劣的天气出现再发动进攻，以避免因为盟国的空中优势而吃太多亏。

德军首先向美军防守最薄弱的地段发起了进攻，在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指挥下的美军，因为实战经验不足，部队在10天内向西北方向后撤了80千米。美国的一个师因为无法通行，而被挤进了巴斯托涅镇。希特勒的计划是要夺取美国源源不断的石油供给车辆，来保证德国飞机和装甲武装等的正常作战。但是，德国人的阴谋并没有得逞。谨慎的艾森豪威尔将美军的石油储藏都放在阵线的后面，因为这一战略眼光而使自身免受很大的损失。

艾森豪威尔在遭遇德军反击时，显得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将自己的战略预备部队调给了布莱德雷，特别是两个赫赫有名的空降师（第82师和第101师），并把美国最靠近战场北方的那几个师的指挥权交给了蒙哥马利。在比利时东南部，9 000名美军官兵被迫投降。战场的形势并不乐观，但罗斯福总是十分镇定自若。他在白宫里运筹帷幄，密切关注着军事情况的变化。

最后，在阿登高地战役中德军的伤亡总人数达到12万，而盟军伤亡人数仅为9万。在盟军的伤亡人数中，有2/3以上是美军士兵。希特勒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差不多1 500架飞机，这占到了他空中力量的

1/3。希特勒最多也只能再坚持战斗几个月了。在阿登高地的西部损兵折将以后，希特勒也对在东部防住苏联的进攻不再抱乐观态度。

1944年，罗斯福一家在海德公园共度圣诞节。罗斯福的孙子和孙女大多数都在那里。一切和往年都没有什么不同，大家一起听罗斯福背诵了一段《圣诞颂歌》，他们一家人分不同的角色，用不同的声音来朗读。圣诞前夜，总统在家中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演。

1945年的第1周，总统的身体健康成了家人和他身边最亲密的伙伴们最为担心的事。有些时候，他看上去极为健康，反应敏捷，而且气色也不错。他会经常活动筋骨，而且依旧很健谈睿智。但是，几个小时以后，他又会面色发灰，嘴唇几乎没有血色。他的手会剧烈摇晃，两眼茫然，嘴唇微张。弗朗西斯·珀金斯说，罗斯福就好像“一个没机会见到访客的危重病人，忽然被允许见客了，可是客人待的时间又太长了。”

麦克因泰尔一贯的观点是，如果罗斯福多休息一点的话，他的身体就会改善，也能和同龄的正常人一样生活。另一位医生的观点则不这么乐观。他在私下里对有权知道总统身体情况的人说，总统的心脑血管情况已经恶化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他的生命都有很大的风险。罗斯福可能活上许多年，也可能随时会断气，而后一种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一点。

1月9日，美国开始对菲律宾主岛吕宋岛发起进攻，并向马尼拉进军。马尼拉的敌人差不多要等到2月下旬才能解决。而在菲律宾，美国会被迫在某些不利的地形下作战，而且这场战争，估计要到整场世界大战结束才能停止。

美国在解放菲律宾的过程中，已经损失了1.4万年轻的生命，并有4.8万军人受伤。但是他们差不多消灭了大概有4.5万日本军队的有生力量，赢得了莱特湾以来的最大的胜利，并且摧毁了至少1 000架日本飞

机。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菲律宾几乎变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它也是进攻日本的落脚点。总而言之，麦克阿瑟的这场战争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罗斯福把自己第四届就职典礼的预算砍掉了90%，到了1月20日就职典礼那一天，他还决定在白宫的门廊，而不是国会山的楼梯上，进行就职演讲。

就职典礼后，在白宫举行了一个有2 000多名宾客参加的午餐接待会。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的那样，当天早上，罗斯福和他的厨娘还发生了争执。那个厨娘既没想象力又笨手笨脚，要不是埃莉诺一直袒护的话，恐怕早就被辞退了。

---

1. 此句话指10个月后，丘吉尔本人在英国选举中落败一事。——译者注
2. “花生米”：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蔑称。——编者注
3. 柯雷吉多尔岛：马尼拉湾入口处菲律宾群岛北部的一个岛。1942年5月，尽管经过英勇的保卫战，菲律宾和美国军队还是被迫将放弃了这个小岛留给了日本。1945年3月美国伞兵部队收回了此岛。——译者注

24
战争的命运似乎在他那超凡之手的掌控之中

英国外长安东尼·艾登这样描述罗斯福总统1945年2月2日赴雅尔塔会议途中抵达马耳他大港湾的情景

I

1945年1月30日，罗斯福在船上庆祝了他的63岁生日。那天晚上，埃莉诺在来宾中间往来穿梭，尽职尽责地为小儿麻痹症的治疗和研究募集资金。这类小型聚会也是罗斯福吸引美国娱乐界明星的一种手法。来宾中几乎所有人都承认，罗斯福才是美国最伟大的明星和演员，在全球杰出人物中，唯有丘吉尔能与之媲美。

1月30日这天，乔·布朗、金·凯利和简·怀曼（未来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妻子）等娱乐界名流都莅临白宫。埃莉诺优雅地引领客人参观他们的寓所，其中包括总统的私人办公室，她甚至还打开办公桌的抽屉，给大家看总统的备忘录。总统夫妇的魅力令几乎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

在昆西号船上，安娜为总统准备了五种生日蛋糕，每种蛋糕代表一届总统大选。第五种是一块小蛋糕，上面用冰激凌写着“1948？”。生日那天，总统收到了一封电报，是有关亨利·华莱士的。罗斯福兑现了他对华莱士的承诺，在后者的副总统提名在民主党大会上未获通过之后，总统直接问他喜欢什么职位。当华莱士表示他想当商业部长

时，罗斯福撤下了爱唱反调的杰西·琼斯，让他为华莱士腾地方。罗斯福给了琼斯一个大使的职位，但这并不合他的心意。

2月1日清晨，风和日丽，飘扬着总统旗帜的昆西号平静地驶入位于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海港。艾登被他船上起劲排练《星条旗永不落》的管乐队吵醒。“9时30分，罗斯福总统的巡洋舰出现了。”艾登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这艘大型军舰驶进这座破损的港口时，所有的船上都站满了人，所有的屋顶和有利的眺望位置上都挤满了围观者。乐队还在演奏，四周弥漫着浓重的战争气氛。远远就可以看到昆西号的舰桥上坐着一个穿便装的人。战争的命运似乎在他那超凡之手的掌控之中。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一瞬间鸦雀无声。那是这样的一刻，似乎一切都静止不动，唯能感到历史留下的一个印记。”

温斯顿·丘吉尔上了昆西号。两位领袖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丘吉尔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朋友已经到了，他非常健康，精神饱满。一切都很顺利。”当天及次日，他们都在一起共进晚餐，尽管令艾登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讨论什么实质问题。2月2日深夜，他们转乘飞机。英美两国一行700人搭乘20架飞机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它们相互间隔10分钟起飞，趁着夜色飞向雅尔塔。

总统的机群小心地绕过德国占领之下的克里特岛，岛上还有一个德国空军基地。罗斯福的医生本来不希望他乘飞机，但是达达尼尔海峡更不安全，因为在狭窄的水域航行，总统的船就会完全暴露在德国人空袭的射程之内。2月3日正午刚过，罗斯福的专机神牛号抵达克里米亚的萨基。丘吉尔在记录中写道，当“罗斯福被人从神牛号悬梯搀扶下来的时候，他看起来很虚弱，病恹恹的”。斯大林还没到克里米亚，莫洛托夫迎接了这些大名鼎鼎的来访者。

罗斯福和他的主要随行人员下榻在里沃蒂亚宫——这里是俄国末代沙皇冬天的度假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住处安排在附近的尤萨波夫

宫，丘吉尔和他的随员则安顿在9千米外的沃伦托夫别墅。德国人大约在8个月前才被赶出这个地区，留给此地的是满目疮痍。

2月4日，斯大林来到了雅尔塔，他一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这位苏联领袖先去看望了丘吉尔，随后又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探访罗斯福。罗斯福说，德国人对克里米亚的破坏促使他希望斯大林再消灭5万名德国军官。他们谈到了戴高乐。斯大林说他没发现戴高乐是一个“高深莫测”的人。罗斯福又讲起了戴高乐曾对他自诩为是圣女贞德的精神继承人、克里孟梭的世俗接替者。这个逸事罗斯福都用滥了。

罗斯福说，他赞成分出一个法占区只是“出于好意”。实际上，罗斯福现在被丘吉尔的观点说服了，后者认为，一个复兴的法国将是对付苏联的有效堡垒。

对于东线的战况，斯大林对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解释完全不同。他对丘吉尔说红军很快就会攻克柏林，对罗斯福却说奥得河一线很难突破。这或许是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看待柏林的视角不同。实际上，当“三巨头”还在雅尔塔的时候，苏军就已经过了奥得河，而且，最初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斯大林从雅尔塔给朱可夫打电话，命令他停止推进，而先清理他右侧的“波罗的海阳台”。这是错失良机，但可能是考虑到他对罗斯福说了那些有关夺取柏林有困难的话吧。

像在德黑兰一样，罗斯福的翻译还是由美国国务院特别助理查尔斯·波伦担任，他现在是国务院苏联司司长。由于是美国代表团中唯一的国家元首，罗斯福再次成为所有全体会议的主持人。为了他的方便，这些会议都在他的住处里沃蒂亚宫举行。罗斯福也是三位领袖中唯一穿便装的，而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喜欢穿军装。为了尽可能减少别人对他身体情况的注意，大多数会议罗斯福会早到，在其他代表团进入会场时，他已经在桌子旁坐好了。

1945年2月4日下午5时刚过，雅尔塔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新任国务卿斯特蒂纽斯、哈里曼和罗斯福一致认为有八项大的议题要处理：战后国际组织；临时管理被解放地区的欧洲紧急委员会；波兰问题；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设置“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伊朗问题；中国问题，尤其是结束中国内战的好处；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及其追求的目标。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罗斯福一本正经地致了开幕词，苏联将军安东诺夫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东线的战况。正如在德黑兰重新估计的那样，在东线，苏联红军已经挺进德国，深入战后德国25千米。随后，马歇尔全面介绍了西线的战况。目前，盟国在这一线大约部署了8个师，并将继续以每周两个师的规模增加。在意大利有32个师，另有10个师在地中海。在法国和意大利，德国和盟国的兵力大体相当，但是，在东线，苏联近100个师的兵力形成对德军的优势，仅在波兰和战前德国两地，苏军就比德军多20多个师。

1945年2月5日，美军夺取了马尼拉。在当天的雅尔塔外长午餐会上，莫洛托夫提议为盟国最近取得的这次胜利干杯。

雅尔塔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就在同一天的下午4时召开，这次会议开了4个小时。会议预先商定的议程是德国问题。罗斯福在介绍时中说，占领区已经由1944年9月12日魁北克八分仪会议批准成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划定了。现在还有法国问题，也即它作为一个占领国和将建立的管制德国机构中的成员问题。

斯大林想知道，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否还遵守他们两人在德黑兰会议上提议的肢解德国原则。罗斯福暗示，这种肢解可能源于有不同占领区的存在，例如每一个占领国在其占领区内可以实际上将它作为其在德国的一个殖民总督管辖区行事。在德黑兰，罗斯福曾建议将德国一分为五，而如果像丘吉尔建议并得到罗斯福同意的那样，法国也拥有一个占领区，那么继德国的东部地区被割给了波兰和苏联之后，德

国就将变成这样的四块，另外，奥地利也被同盟国分成了四个占领区。

丘吉尔坚持分割普鲁士，仿佛它真是德国军国主义的唯一来源，同时以维也纳为基础将西南部德语区复原为一个国家。基于不同的原因，罗斯福和斯大林都不赞同这种观点。罗斯福认为这个想法不切实际，斯大林认为它可行但不可取，他宁愿将德国分割成许多脆弱的小国。丘吉尔说，肢解德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研究。在这次会议上，各方在原则上同意肢解德国，具体事宜还有待进一步商讨。

接着，与会者就法占区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丘吉尔解释说，他认为法国对于确保德国不再崛起并攻击现在围堵它的那些国家至关重要。如果美国不打算在欧洲长久保留大规模驻军，那么，英国就需要法国帮助它提供在德国占领、强制执行和威慑的军队。丘吉尔说，法占区将单独从英占区或美占区中划分出，但不会对苏占区产生任何影响。

斯大林拒绝在苏、美、英、法四国之间分享对德国控制职责的任何建议。他认为法国没有对赢得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他担心那样做将会为刺激德国边界诸小国的野心开一个先例。他对此解释说，几个月前，戴高乐访问莫斯科时曾告诉他说，他打算让法国占领德国至莱茵河一带。显然，在反对法国取得任何政治进步方面，斯大林甚至比罗斯福要无情得多，更不用说比丘吉尔了。

丘吉尔是法国的支持者，罗斯福至少倾向于保持善意。

罗斯福说，他没有设想美国在长达二三年以上的时间内在欧洲保留大规模的驻军，尽管在1944年7月他就已经对戴高乐承认，美国很可能得在欧洲和远东驻军，这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抗衡苏联在中欧和跨西伯利亚地区的驻军。在美国军队驻扎欧洲期间，罗斯福预计美国会在那里保留100万名士兵。罗斯福刺激了斯大林的欲望，他的有关美

国将尽早从欧洲撤军的暗示与丘吉尔在德黑兰坦言不能向盟军最高统帅提供6个以上的师一样，都是预先表露他们对于一个危险对话者的相对弱势。罗斯福本来应该做得更好，他可以对斯大林说他打算在欧洲保留驻军，在戴高乐面前则不强调这一点，而不是相反。

丘吉尔说，法国在对付德国方面有很多经验，况且，英国“将来不想承受德国进攻的全部重压”。当然，事实上，就像他经常在私下里所说的那样，他不想单独在欧洲与“熊”共舞。罗斯福支持为法国划分出一个占领区，但是除了三大国之外，不能再为其他任何国家这样做了。

在罗斯福明显赞同的情况下，丘吉尔含蓄地反对斯大林的迦太基式对德和约计划，而德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的存在本来对斯大林就并无损失。西方国家一边的摩根索计划以及促成这个计划的一些想法并非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对待德国问题已经呈现为英美与斯大林在欧洲最大的讨价还价筹码。丘吉尔希望将法国和非纳粹化的德国重建为对抗苏联的堡垒，他相信斯大林会拿走他在欧洲能够拿到的一切。如果斯大林像丘吉尔预料的那样行事，罗斯福会采纳丘吉尔的观点，但要以对德问题上某种程度的绥靖和对苏联的经济援助来换取它在东欧的良好表现。

在这次会议期间，霍普金斯提醒罗斯福说法国已经是“欧洲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了，敦促他同意划分出一个法国占领区，而推迟对“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问题表态。应罗斯福的要求，霍普金斯在去雅尔塔的途中分别在伦敦和巴黎做了停留。从霍普金斯那里听说法国将在德国得到一个占领区时，戴高乐并未表示特别感激，他拒绝在事先没有看到的情况下而对在雅尔塔会议上可能达成的任何东西表示赞同。不过，他倒是原则上同意在罗斯福总统从雅尔塔回国的途中来看望他。

起初，罗斯福同意丘吉尔的观点，法国应该拥有它自己的占领区，但他也同意斯大林的观点，法国不应该参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

会”。艾登指出，任何其他国家获得占领区是不可能的，而让法国拥有一个占领区却又不让法国人参与“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也是不可能的。他补充说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戴高乐不会在得不到另一个的情况下而接受这一个，他也不应该这样。斯大林建议将这个问题提交外长会议处理，这个提议得到了通过。毫无疑问，斯大林发现罗斯福对这些法国问题感到沮丧。他迎合着罗斯福对戴高乐公认的反感，恢复了德黑兰会议上关于像对德国人一样彻底地肃清法国人的公共生活的讨论。

会议转到战争赔款问题。斯大林认为应该对德国人进行极端严厉的惩罚。丘吉尔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执行赔款条款的失败。他说，1919年“异想天开的”赔款梦想被证明是一个“神话”。他担心德国负担过重以至于垮掉，促使同盟国在听凭无数德国人饿死或者为挽救他们而支取自己所强加的赔款金之间做出选择。丘吉尔的结论是，如果你“想让马拉车，你就得间或给它饲料”。斯大林回击说，你也得小心“那匹马不踢你”。

罗斯福说，至少在初期他不希望德国人的生活水平超过苏联人。他认为某种程度的资源转移是适当的，但不能以使德国变成“世界的负担”这样一种规模来进行。他指出，赔款不可能当真减轻战争的破坏。美国的经济援助是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处理与斯大林关系中第二笔讨价还价的本钱。罗斯福希望苏联接受美国的援助，同时将德国重建成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他不希望斯大林通过榨取德国人的血汗而恢复经济独立。

现在，重要的战略问题出现了。一方面，实际上由苏联处理各被占国；另一方面，英美处理并经济援助德国的大部分。

为了尽可能使波兰向西推移，斯大林将其德占区的大部分都划给了波兰，相应程度上扩大了他对波兰的影响。波兰的大部分领土成为苏联的正式占领区，这使得许多德国人继续西逃，西方三国的占领区

由此就聚集了前所未有的众多德国人口。波兰人承担了过重的义务，但是，这对于西方盟友是一笔划算的战略交易，因为德国最终会到他们手上。波兰是苏联人的一个不合作的受保护国，而联邦德国则成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个坚定盟友。

Ⅱ

2月6日下午4时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罗斯福在开场白中支持作为未来联合国组织基础的敦巴顿橡树园协定，他赞同丘吉尔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时对斯大林宣布的目标，即使和平至少维持50年。出人意料的是，这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此前在西方无能和独裁者奉行军国主义的情况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还是维持了21年。斯大林也接受这个目标，50年和平就成为一条会议口号。

斯特蒂纽斯概述了《敦巴顿橡树园协定》的内容。他强调，在新国际组织中，在总体上和在关键领域，包括成员国的接收和开除、秘书长的选举以及和平协议的执行，绝对需要坚持大国一致的原则。斯大林担心其他国家有能力抱怨大国的所为并强行对它们被排除在外的问题上投否决票。丘吉尔让他放心，还举例说如果中国抱怨香港问题，埃及抱怨苏伊士运河问题，这都不会被接受。

最后，斯大林主动提到，英国人和法国人促使苏联1939年12月被赶出国际联盟的方式还让他感到恼火，他希望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丘吉尔回答说，当时苏联正与芬兰交战，“英法两国政府对苏联感到非常、非常生气”，根据建议的各种办法，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会议的主题转到争论不休的波兰问题。罗斯福在介绍这个议题时有限度地赞同波兰向西移至“寇松线”和奥得—尼斯河一线之间。罗斯

福请求苏联对波兰做些让步，特别是以苏联西部城市利沃夫和它周围的油田。

罗斯福建议成立一个代表五个被确认的非法西斯和反纳粹政党的“总统委员会”，在自由选举举行之前，由它管理波兰。这会将“卢布林波兰人”和“伦敦波兰人”都包括在内。罗斯福强调必须鼓励波兰与苏联建立最合作的关系。罗斯福的同僚曾指责他对苏联人过于迁就，现在苏联已经占领了几乎整个波兰，至少可以说，很难不迁就它了。

丘吉尔也以同样的态度发言。他表示他也准备支持“寇松线”这一主张，甚或苏联不对波兰人做出任何让步。

斯大林发表了他精心准备的关于波兰问题的讲演。他承认丘吉尔的荣誉观，也渴望波兰强大、自由。但他希望纠正关于俄国人历史上“对波兰人犯下许多罪孽”的看法。对他的国家而言，波兰是一条入侵通道，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这样使用着。这是“攸关生死的事情”。他没有丘吉尔的宽宏大量理论。他指出，列宁不曾接受寇松和克里孟梭划的所谓“寇松线”，因为它对苏联不够宽宏大量。

斯大林声称，他的军队正准备浴血将波兰边界向德国纵深推进，这要付出很大牺牲，仿佛他是在为波兰人而不是尽可能为自己获取更多德国土地而战。尽管与会者都十分清楚，但没有人提到，自从“欧洲咨询委员会”划定的在德国的占领区于1944年春得到一致同意，并在同年9月经英美两国批准之后，复原的波兰领土有1/3以上，即战前波兰的西部边界至奥得–尼斯河线之间的地带，公然成为苏联在德国的占领区。似乎苏美英三国领导人都在煞费苦心地做戏，特别是斯大林，他好像只做其他人接受的事情。

斯大林在讲演结束时亮出了他的王牌，他说“华沙波兰人”与戴高乐有同样多的合法性，后者他已经承认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将这种对比视为荒唐而加以忽视。

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向斯大林表明，他认为“卢布林波兰人”（西方领导人针锋相对地拒绝将他们称为华沙波兰人）在波兰人口中占不到1/3以上，骚扰红军也非听命于“伦敦波兰人”的那些人的政策，他这样说显然更接近问题的症结了。丘吉尔还坚定地指出，作恶者应受到惩罚，但是波兰的命运不能以这些没有代表性的事件为基础决定。

第四次全体会议在2月7日午后4时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试图在已经讨论的各种问题上取得进展。丘吉尔强调，法国应该拥有一个占领区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的一个位置。这个问题被再次搁置。会上没有人告诉斯大林霍普金斯已经向戴高乐承诺了一个占领区。斯大林只要通过解散“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就可以阻止西方盟国这样做。因为正如艾登曾经指出的那样，戴高乐不会在不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情况下接受在德国拥有一个占领区的责任。

会议回到波兰问题。罗斯福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建议应该立即邀请两名“卢布林波兰人委员会”的代表和波兰其他派别的另外两名代表来参加会议，并请求制定建立波兰临时政府的条款。

会议主题转到国际组织上。前一天提出的罗斯福–丘吉尔建议得到了与会者的接受。斯大林再一次提出希望各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全体代表大会上都拥有投票权。他也认识到所有16个所谓的共和国都有代表权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将要求的数量降至总共3个投票权。

罗斯福对于大会接受他的总体建议表示感激，但对苏联提出的多个投票权建议不予表态。他将会议转向探讨某些国家的相对幅员和人口问题，其中包括巴西、加拿大和古巴等。与会者对所有的事实都了如指掌，但质疑它们与本次会议议题的相关性。这是雅尔塔会议上可观察到的罗斯福的智力已经出现波动的一点迹象。罗斯福拒绝考虑显而易见但未被言明的事实，即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会按美国的意愿投票，至少像英联邦国家追随英国一样忠诚。

丘吉尔对于苏联对其建议的反应表示“由衷的感谢”，他对于苏联享有多个投票权的提议比罗斯福表现得更积极，因为他实际上接受苏联共和国和英联邦自治领之间的某种类似。他持有被证实是相当陈腐的有关英联邦自治领效忠英国的观点。凭借他在加拿大度过的35个夏天的经历，罗斯福对加拿大的情况可以说相当熟悉，但他对此保持沉默。丘吉尔趁机谈到曾与英国并肩作战的英联邦自治领在战争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尽管它们十分清楚英国的“衰弱”，也“知道在重大问题上它们不能经常参与协商”。丘吉尔不同意降低英联邦国家的地位，他也理解苏联想要获得更强声音的愿望。他甚至请求罗斯福不要拒绝苏联的要求。

这时，莫洛托夫关于波兰的提案已经准备好了。他建议，为了波兰的利益，东部的“寇松线”可做5至8千米的变化，在西部，以最西划定的奥得–尼斯河线为准；某些“民主流亡者”参加波兰临时政府；所有同盟国承认该政府，以及尽早举行选举。罗斯福对这个提案反应积极，但他反对使用“流亡者”一词，认为它有贬义。丘吉尔对该提案持乐观态度，但他也不喜欢“流亡者”这个词，认为它不合适。他还对波兰如此向西纵深推进，以至于“波兰鹅吃了太多德国粮食而患消化不良”持谨慎态度。看来，在这一地区的800万德国人也被裁定给了波兰人，但是，斯大林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为了逃避红军已经向西逃跑了。与会者同意讨论取得了进展。

III

就在第五次全体会议之前，罗斯福在与斯大林会面时说，随着马尼拉被攻克，美国将要封锁日本，因此想利用西伯利亚的空军基地和苏联的最东部地区为发起最后的进攻做准备。斯大林对此没有表示反对。他还表示希望战后美国能给苏联提供一些商船。罗斯福表示很乐

意这样做，并认为英国也会这样做，他还补充说希望苏联能更大程度上对航运业感兴趣。

罗斯福对于会减少苏联孤立主义和偏执狂的任何事情都加以鼓励，而现在商业船队就成为他手中鼓励苏联合理行为的又一张牌。斯大林趁机向罗斯福谈起他对美国《租借法案》的感受，认为它作为一种不使接受者感到尴尬的灵活的援助形式，是一个英明的方案，这一方案大大缩短了战争的时间。斯大林很可能是真诚的，但是他费力地刺激罗斯福的虚荣心，而总统本人对这种策略总是十分警觉。斯特蒂纽斯回忆说，斯大林主动同意罗斯福的意见。与通常的神话相反，斯大林承认各种力量之间的相关性，显然他对罗斯福的迁就比后者对他的迁就多得多。

由上述谈话做引子，斯大林谈到他参与对日作战的条件。他想要回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输给日本的一切，特别是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控制中国东北的旅顺港以及铁路。罗斯福在最后这些点上犹豫不决，他说，这些地方苏联得与中国协商处理，否则中国人马上就会将这种安排视为殖民主义的回归。

罗斯福决心做到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蒋介石最终不能抽中当中国领导人的签，他也不能将大片中国转送他人作为殖民地。旅顺港要国际化，阿瑟港（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南部港市）作为苏联的一个海军基地，苏联可以长期租用。莫洛托夫和哈里曼对此做了些更改，在基本要点问题上，罗斯福丝毫不让步，最终两位领袖达成了一致。

据斯特蒂纽斯回忆，雅尔塔会议期间的一个问题是，罗斯福的军事长官对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以使苏联参加远东战争。“当时，原子弹还是一个未知数，而大家对我方在突出部战役中的失败记忆犹新。我们还没有跨过莱茵河。没有人知道欧洲战争还要持续多久，也没有人知道还要造成多大伤亡。”

罗斯福会通过适当的渠道告知蒋介石他与斯大林做出的这些安排，但是，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言行失检，他还不想这么做。当罗斯福说他一直试图使中国存在时，斯大林回应说，中国会生存，但它需要一个新领导人。他们两人对蒋介石都不看好。罗斯福说，美国正试图推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斯大林和罗斯福都知道，毛泽东是远比蒋介石坚定得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轻易战胜了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和罗斯福的理想主义。

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曾说："斯大林显然担心，一场（重开的）中国内战同样很可能毁灭共产党人，同时将国民党置于抵制苏联在中国东北和外蒙古诸种要求的地位；即使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也会对苏联的边界要求及其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构成挑战。因此，斯大林完全愿意支持中国建立国共联合政权。罗斯福的兴趣在于，增强中国国力并将其作为在亚洲抗衡苏联的力量，而在西欧，一个重组并得到彻底抑制的德国将扮演这一角色。"

罗斯福也宣传对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的计划。他认为这是对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罗斯福2月8日与斯大林私下会谈时建议，朝鲜的托管国应该是苏联、美国和中国三个国家。他承认不让英国人参加托管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英国人在该地区起不到什么作用。斯大林也承认这会很尴尬，他还开玩笑说，丘吉尔可能"杀了我们"。他也认为在这一地区英国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保证者。

罗斯福也考虑在印度支那实行托管。戴高乐曾请求美国提供船只运送一支法国军队，以重新占领那里。迄今为止，罗斯福假装美国抽不出船来。

下午，罗斯福和斯大林结束了会谈，随后召集第五次全体会议。外长会议已经同意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举行关于拟议的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大会。斯大林反对承认那些没有对纳粹宣战或者仅仅是出于投机才这样做，以及对这次战争没有做出真正贡献的国家为联合国创建

国。罗斯福说，他们确实得接受那些曾经宣战的国家，无论它们是否做出过重大贡献。他建议以1945年3月1日作为对德宣战的截止日期，这一建议得到了通过。

议题转到波兰问题上。英美苏三国向会议提交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各不相同。丘吉尔认为，就波兰问题达成并签署一个协议“极其重要”，斯大林则不那么担心。

在当天的晚宴上，斯大林“心境极佳”，他首先提议为丘吉尔干杯。接着提议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他说，他和丘吉尔做出了相对简单的决定，因为希特勒的入侵迫使他们为生存而战。然而，美国领导人“没有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但是他有更宽泛的国家利益观。即使他的国家没有直接陷入危险，他一直是世界反希特勒总动员的各种手段的主要创造者。”他还特别提到了《租借法案》。罗斯福答谢说，今晚的气氛像置身于一次“家庭聚会……尽管在座的各国领导人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其人民的利益，但是我们都致力于为全人类提供一线机遇和希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世界上那些除短暂的生存之外看不到任何机遇和希望的人的比例在稳步下降，他们的目标是而且必须总是“使全世界每个人享有安全和安康成为可能”。

2月9日第六次全体会议开始不久，一个荒唐的主题就被引入会议议项，这就是斯特蒂纽斯主持讨论的托管问题。丘吉尔“一下子被激怒了”，说他对这个报告一个字都不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同意让四五十个国家染指英帝国的生存。只要他是首相，他就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一点儿遗产。他有好一段时间都气冲冲地，尽管罗斯福请他让斯特蒂纽斯解释完。斯大林对他的来宾中的这种混乱感到很好笑，他“从座椅上站起来，一会儿走，一会儿停，不时突然鼓掌叫好”。丘吉尔问斯大林，如果宣布克里米亚被作为一个避暑胜地而国际化，他有什么感觉。这是一个荒谬的类比，但斯大林极其乐意将克里米亚作为他们三大国永久的会议场所。

最后，丘吉尔被罗斯福劝止后，斯特蒂纽斯才得以解释“这里提到的创建（托管）机构不是意指英帝国”。它与“从敌人手中独立的地区”有关，尤其是日本和维希法国。丘吉尔强烈的敏感的确发人深省。

会议转到南斯拉夫问题的讨论，与会者接受了英国提议的修改意见。任何没有与德国人合作的前政府官员都是反法西斯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地方政府委员会”的成员。随后，与会者转向波兰问题。罗斯福建议，凡提到华沙政权应该由“临时政府”改称“波兰现政府”。他强调美国人民，特别是600万波兰裔美国人，都很重视确保以民主程序决定波兰政府。

丘吉尔同意罗斯福的意见，但他进一步请求斯大林帮助减少波兰人自相残杀的暴行，据他所知，目前事态已经扩大到“卢布林波兰人”承诺惩罚那些在1944年秋起来反抗纳粹分子的人。

丘吉尔请求大家接受统一的自由选举的界定标准。他还请求向波兰派遣国际观察员，并保证这在希腊也会受到欢迎，他还相信美国人也会同意在意大利这样做。斯大林试图通过与埃及的情况对比来搅浑水，在那里，选举由国王操纵。斯大林还试图在文化水准与选举的可靠性之间确立某种关联，他还带有欺骗性地暗示，由于丘吉尔和艾登都不能准确地回答他有关埃及人的文化水准问题，那么，他的观点已经证明了。

斯大林声称支持美国起草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但是，就各地被解放的国家而言，他认为那些“积极参与反抗德国侵略者”的国家应该被给予更高的地位。这话具有他所希望的再次将丘吉尔惹火的效力。丘吉尔对于美国的普适自决原则是否适用于英帝国感到担忧，大部分英联邦国家还没有完全独立，但他们对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

丘吉尔说，他曾经以英帝国遵守《大西洋宪章》所规定的民主原则为主题发表了声明，并将该声明的副本给了温戴尔·威尔基。此时，罗斯福突然插话问，这是否造成了威尔基的早逝，让人忍俊不禁。

斯大林主动表示他对“英国在希腊的政策完全信任”，但他显然不能接受丘吉尔的向希腊和波兰派遣选举观察员的建议。这对于新生的“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丘吉尔一度坚持会议一直要开到在一切要点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才结束，因此，当罗斯福宣布他得在2月9日离开雅尔塔赴与埃及国王、沙特阿拉伯国王和埃塞俄比亚皇帝的预定约会时，他吓了一跳。罗斯福的宣布引起了英国阵营的警觉，好像没有英国人陪伴，美国总统就没有权力与这些人会面一样。显然，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相比，这三位君主是小人物，但是，罗斯福认为实际上重大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

Ⅳ

2月10日下午4时雅尔塔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召开。罗斯福宣布，他改变了对法国的看法。既然法国已经在德国拥有了一个占领区（正如丘吉尔和艾登所指出的，也像10天前霍普金斯实际上已经对戴高乐所承诺的），所以不能拒绝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给它留一个位置。但是，不再有其他国家作为占领区的持有者或者“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成员的候补者。罗斯福改变想法的唯一解释是，在内部而不是在外部与法国打交道更容易些。会议就此达成了协议。

罗斯福实际上许多天前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他选择推迟宣布他的决定，直到斯大林的态度明朗化。听了罗斯福的意见，斯大林和蔼地宣布：“我投降。”法国由此成为了对德占领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

会”的四个国家之一，拟议中的世界组织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召集国之一。这对于戴高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寻常的胜利。

战争赔款问题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最终表示同意只是由于这种枯燥乏味的公式化描述，即“（与会者）一致同意德国必须为战争给同盟国造成的损失支付赔偿，莫斯科委员会受命估计损失的数量。”在此之前，霍普金斯交给了罗斯福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人已经做出了这么多让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失望……简单地说，一切都提交‘赔款委员会’处理。”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未来的解释，斯大林确实几乎在每一个核心问题上都做了让步。苏联人总是认为霍普金斯对他们的事业友好，就像丘吉尔认为他对英国的利益友好一样。

关于波兰边界问题所能达成的最佳方案是，东部以寇松线为界，并略做对波兰有利的变动，在北部和西部大量地增加领土。当莫洛托夫试图插入对波兰有利的“在东普鲁士和在奥得河上的古老边界”时，罗斯福反问这些要求有多古老。莫洛托夫含糊其辞，显然没什么主意了。罗斯福警告说，支持这样的古老标准可能导致英国要求将美国归还给大不列颠王国政府。斯大林只好竭尽全力为他的外长解围。

2月10日大会结束后的晚宴只有政府首脑、外长和译员出席。美英苏三国领导人从哲理角度谈论了政府的本质。罗斯福说，在他第一次竞选总统之前，美国处在“革命的边缘，因为人民缺少食物、衣服和避难所”，但是，他满足了“他们的主要需求……目前，在美国，就社会动乱而言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接着，罗斯福动情地建议为丘吉尔干杯。他说：“当我28岁开始从政时，丘吉尔先生已经有了为其国家服务的长久经历。他在政府内外工作了许多年，以两种身份做出了重大贡献。”提到丘吉尔对绥靖行为的抵制，罗斯福确信，丘吉尔在野时甚至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因为他迫使人们思考”。

斯大林声称他将左派和右派看作议会术语，并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保守党党员丘吉尔对工会不加干扰时，一个名义上的“激进社会主义者”达拉第却解散了它们。罗斯福又开始抱怨法国政治的混乱，他说，那个国家在第三帝国末期有18个政党，而他曾经在一周内不得不与三位不同的总理通信联系。戴高乐曾向他保证改变这一切。丘吉尔说，斯大林有一个更好的体制，它只有一个政党。斯大林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方便”。其后，斯大林还谈到犹太人问题。他说，他对犹太人没有仇恨，他们是天生的商人。罗斯福宣称他自己是毫不含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问斯大林是否也持这样的立场，因为他知道丘吉尔是这样。斯大林回答说，他原则上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承认这个问题的困难。因此，由于这三位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政治家至少在原则上的认可，一个犹太国家的前景日益光明。

随后，斯大林还主动谈到，如果不是由于《慕尼黑协定》和1934年《波德条约》，他本来永远不会签署《苏德协定》。

2月12日，雅尔塔会议公报以苏美英三国领袖的名义代表他们的国家向全球媒体公布。公报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德国的失败。第二部分概述了占领德国并确认邀请法国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第三部分承诺通过“尽可能实物补偿”的方式赔偿。第四部分规定1945年4月25日五国代表去旧金山召集世界组织大会。第五部分是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所有人都有权选择他们政府的形式”为基础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第六部分是关于波兰问题，它承诺建立“一个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和由现存以及附加的民主团体组成的一个新‘波兰国民联合临时政府”’。第七部分论述南斯拉夫。第八部分承诺苏美英三国外长每隔3至4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会时不限。第九部分宣布“像团结作战一样，团结谋和平”。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战犯处理等问题的协议。

另有一份两年后才公布的秘密协定，它是关于苏联保证在德国投降和欧战结束后两三个月时间内参加对日作战。这份协定保存在罗斯福在白宫的保险箱里，只有三大国最高层的几位政府官员知道它。英国人，特别是艾登，为没能参与谈判而生气。但是，美国人承担了90%的对日战争，使得英国收回了对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占领权。因而，丘吉尔明智地拒绝就此问题挑起争论。此时，英国人对于同日本人在靠近他们的本土岛屿作战是种什么情况一点儿也没谱——在那里，没有日本士兵或飞行员会接受被活捉。

在新世界组织中，苏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共拥有三个投票权，英联邦自治领也有一些投票权，美国只有一个投票权，而出现政治麻烦时，英苏两国领导人将支持给美国三个投票权。

三大国领导人在《雅尔塔协定》和一些协议上签了字。雅尔塔会议于1945年2月11日（星期天）下午3时45分午宴后结束。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我们很快会在柏林见面。"领袖们相互真诚地道别，乘汽车离去。2月12日早晨，罗斯福和他的女儿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到达萨基，在那里登上神牛号飞往埃及。

在全部历史中，只有结束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会议和"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会议是比雅尔塔会议更著名的结束战争的峰会。维也纳会议一般被认为是一次理性的胜利，因为在其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凡尔赛会议的最终失败通常被归咎于美国变节成孤立主义，将新生的苏联政府排除在外，以及强加于德国的不公平条约。然而，雅尔塔会议的名声也不好，它被许多人视为是向一个邪恶独裁者骇人听闻的欲望可耻投降的实例。

2001年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对华沙成千上万欢呼的人说："不再有慕尼黑，不再有雅尔塔!"仿佛它们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布什总统某种程度上是罗斯福的崇拜者，但他暗示，通过雅尔塔会

议，波兰被无偿地、令人蒙羞地转让给了苏联。许多波兰人同意这种提法。

最初，《雅尔塔协定》被看作是公平的协议，是西方的胜利，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显然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后来，流行的看法却变成了认为它是斯大林对西方领袖的胜利。丘吉尔的崇拜者曾暗示丘吉尔曾为抵制罗斯福向斯大林出卖东欧的倾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丘吉尔没有全部加以劝阻。

丘吉尔1944年10月在莫斯科默认苏联接管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某种程度上）将波兰交给斯大林，并将这种默认在其自传中描写成一种“暂时的措施”。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不是决定势力范围的基础，尤其是同斯大林。丘吉尔自称自己是夹在美利坚牛和俄罗斯熊之间的一头“英国驴”，正如他在描写德黑兰会议时所说的那样。三巨头都知道他们想去哪里以及如何到达。

英国杰出的战将蒙哥马利是一位老派的憎恶美国的人，在多年后任何其他人都认识到1944年8月（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是重大成功之后，他还激烈地对此抱反感态度。蒙哥马利还鼓吹斯大林神话，认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具有“一种令人惊奇的战略意识”。而对于罗斯福，他放肆地写道：“我似乎从来不曾清楚他（罗斯福）为什么而战……（斯大林）愚弄起他来毫不费力。”

与罗斯福在雅尔塔完全被骗的推测紧接着的是这样一个推测，即罗斯福在脑力和体力上都不胜任进行这样的谈判。丘吉尔在马耳他和雅尔塔时带着他的女儿萨拉，后者对罗斯福的外貌感到震惊，但由于他“光彩照人的魅力……和勇敢、宽广的心灵”，她逐渐就不注意这些了。艾登认为罗斯福“看起来比在魁北克时更显老了。他给人一种衰弱的大人物的印象”。

丘吉尔的忧郁而草率的医生洛德·莫兰曾大胆地宣称，罗斯福将是“三巨头”中第一个去世的人：“他病得很重。他有早期脑血管硬化的所有症状，因此，我估计他只能再活几个月。”这里的问题在于，莫兰对于霍普金斯的评论也是不太令人鼓舞的，他说，霍普金斯似乎“只有一半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皮肤是紧绷在骨头上的一层黄白色的薄膜”。

外交史学家沃伦·金博尔曾经令人信服地直言，罗斯福的心脏问题、肺功能衰弱、高血压、贫血、出血的痔疮、鼻窦炎以及其他更小的麻烦都没有影响他履行政治家的职责。但罗斯福由于上面列出的几种问题，有时脑供血不足会引起“间或失忆，亦称继发性代谢脑病”，由此导致了呈现在一些雅尔塔会议照片上的那个“张着嘴发呆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毋庸置疑，在雅尔塔期间罗斯福正在病中。”金博尔写道，“战时领导人身体上、思想上的重压以及长期瘫痪导致的日益衰弱的折磨使他精疲力竭……疾病和疲惫没有决定他的政策。”罗斯福是否知道他的病情同样是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在雅尔塔或者紧随其后，没有什么改变他曾在整个战争中所采取的方式——一种对于战后安排的方式，到雅尔塔会谈时，这种方式已经较详细地概括出来了。有几天，罗斯福确实患间歇性心律不齐，但没有影响他的工作。这种观点与来自就此主题长篇大论发表意见的其他原始资料的任何可靠证据不矛盾。

在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关系方面有大量记录。他们之间所有的通信都保存着，他们仅有的两次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会晤的全部讨论都已经被翻译并整理成文字。没有什么材料支持这一结论，即在十分清楚（与斯大林的）关系很可能会破裂，同时也在为那种最终结局做准备时，在不会给西方带来地缘政治损失的情况下，罗斯福过多地尝试向斯大林摇橄榄枝。

V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女儿重新登上了停泊在苏伊士运河上的昆西号巡洋舰。总统在船上接见了来访的三位君主。第一位是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罗斯福建议他多种棉花，给了他一架双引擎运输机。第二位是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罗斯福送给了他四辆装甲侦察汽车。第三位是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沙特，他由于患白内障视力较差，腿上还有残疾。他恭维轮椅上的罗斯福，认为这是美国人有效免去多余运动的一个实例。罗斯福送给了他几个轮椅，还给了他一架飞机。

在同这位沙特国王就石油和重新植林问题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之后，罗斯福回到了核心问题上，他请求伊本·沙特允许更多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但沙特国王对此一口回绝。

罗斯福坚信犹太人需要也理应拥有一个祖国，而巴勒斯坦是它的必然所在地。他清楚地认识到安抚阿拉伯人是一个复杂的、强求的过程。像中国内战、东欧的治理以及非殖民化一样，犹太与阿拉伯问题也要等到目前的战争结束后再处理。所有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但罗斯福认为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昆西号驶入亚历山大港时，丘吉尔上了船，两位领导人一起愉快地共进午餐。他们两人都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感到高兴，但也一致认为需要保持警惕，和平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罗斯福像以往一样喜欢并钦佩丘吉尔，但是对于他的喋喋不休感到厌倦，越来越将其视为英帝国贫弱状况的一种掩饰。

正如斯特蒂纽斯在日记上所透露的那样，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问题在于，罗斯福“早期对他（丘吉尔）的那种迷恋减少了，他们对于战后世界愿望的分歧日益扩大。不过，罗斯福和丘吉尔彼此非常了解，相互的钦佩将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使他们一同攀上了历史的最高

峰。他们的联盟有点弱化，而他们的友谊，像一桩美好而持久的婚姻一样，尽管不如以往那么激情四溢，但深刻而且至关重要。

“总统似乎很平静、虚弱。我感到了他生命力的微弱。我不会再见到他了。我们深情地道别了。”送别了丘吉尔一行后不久，昆西号起锚驶向阿尔及尔。

这艘船原计划在阿尔及尔停留，以便使罗斯福能够与戴高乐会面。这位将军已经感觉到了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不和，他接受了自己作为德国的一个占领国以及世界组织的联合发起人的身份，但拒绝再一次在法国的土地上听从一个来访要人的召唤。这可能使他想起了被召唤去卡萨布兰卡的丢脸经历。但是，考虑到目前美国有70个师在法国执行清除入侵者的任务，这次拒绝是相当具有挑衅性的。

戴高乐曾忍受罗斯福无缘无故的恼怒，但是，他以这次当众怠慢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统统报复了。罗斯福现在决意采取将法国完全整合到西方阵营的行动方针，但本不该在没有戴高乐亲自参加的情况下这样做。罗斯福承认戴高乐对于法国的迅速复兴必不可少。罗斯福兼具理想主义目标和坚定的现实主义政治手腕。他曾告诉自己的孙子，在一场小规模的冲突中他输给了戴高乐，但他等闲视之。他甚至一次都没有在私下提起戴高乐的侮辱，并对所有询问他们之间关系的人粉饰太平。

罗斯福曾承诺从雅尔塔一回来就对国会发表演讲，但罗森曼花了一星期时间才使他集中于准备他的演讲上面。通常，罗斯福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看书或阅读官方报告，与安娜、戴西和罗森曼共进午餐，之后，和女儿一起坐在顶层的甲板晒太阳，此时，他或者静静地阅读，或者只是吸烟，凝视着远处的地平线。依据莱希所讲的雅尔塔会议情况和波伦给他看的相关文件，罗森曼为总统准备了一份演讲稿，它成为罗斯福一行海上航程最后一天认真讨论的主题。

3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特别联合会议上发表演说，这是两年内他在国会大厦第一次露面。罗斯福的讲演通过广播传遍了全世界。这也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场面——这是他第一次坐着轮椅出现在国会，依旧是那个没有扶手也没有靠垫安着小轮子的海德公园厨房用椅。他的支持者和他的敌人都能够看到他的脆弱，并感受到他的勇气。美国政治的最高捍卫者不仅是一个人，当他领导这个国家从贫苦和与世隔绝的深渊中走向繁荣和胜利时，他还是一个患有严重残疾的人。

罗斯福为“被迫坐着发表演说”表示歉意，接着，他详细叙述了雅尔塔会议的各项议题。最后，他将矛头指向他的孤立主义敌人。他说，雅尔塔会议是否成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你们手中。因为除非在美国国会大厅就座的你们……（对这个协定）给予积极的支持，否则，这次会议就不会产生持久的效果”。

罗斯福声称，“三巨头”形成了“更便利的彼此协商的方式，那是世界和平的良好预兆”。他对自己所坚持的德国无条件投降主张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它意味着纳粹主义的终结。它意味着纳粹党及其所有残暴法律和制度的终结……它意味着对纳粹战犯的惩罚迅速、公正而严厉。”他采取了隐瞒苏联多个投票权这一非同寻常的举措，强调他与伍德罗·威尔逊的方法不同。“这次我们没有犯坐等到战争结束再去建立和平机构的错误……参众两院议员都将派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共和、民主两党代表人数相等。”

罗斯福着重谈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波兰问题和对民主的承诺等问题。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与戴高乐的和解：“任何人都不应该诋毁在雅尔塔授予法国的对其在未来欧洲和未来世界中作用的承认。”他还声称，从与伊本·沙特的五分钟谈话中所了解的犹太与阿拉伯问题，比他从交换二三十打信件中所获得的还多。

罗斯福的演讲不讲究内容均衡，总是东拉西扯，大部分靠现场发挥。他在结束语中说：“这里没有中间派。我们得承担起世界合作的责

任，否则，我们就得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承担责任……克里米亚会议是三个最重要的国家为和平寻找共同基础的一次成功努力。它应该意味着单边行动制度、排他性同盟、势力范围、均势以及其他几百年来一直尝试而又总是失败的权宜之计的终结。”

他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六个星期前，他对一个有影响的两党参议员团说，不幸的是，势力范围完全是存在的，而美国的势力范围（尽管他拒绝这样看待）是幅员广大的。他结束均势的手段是：以美国主导的一种力量不平衡格局取代它，而美国将在世界上拥有这样的实力，没有其他的国家的联合能与之抗衡。罗斯福知道他赢得了最大的全面胜利。美国将经由他倡导建立的普适和平组织而步入世界。

当罗斯福结束他的演讲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通过借此最后机会首次向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展示，迄今在领导这个国家和世界的过程中，他本人不得不克服多么大的障碍。这使他的胜利变得更加圆满。所有人可能都惊讶于他身体的虚弱，追随者们因此增加了对他的敬意，而诋毁者们则更加沮丧。作为一位领袖，作为一个男人，没有人能怀疑他所取得的成就。

25
他的声音沉寂了，但勇气犹存

哈里·杜鲁门宣布1945年4月13日为哀悼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国丧日

I

不久，斯大林就显示出将苏联的原则无情地强加于被占领土的兴趣比与同盟国合作的兴趣更大。他们推延签署军事协定，推迟“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组建，起初在罗马尼亚、接着在其他地方嘲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以及在波兰问题上极度地不合作。在美国陆军航空队对靠近布达佩斯的未来基地进行初步检验的过程中，苏联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授权他们使用，以致这个项目最终变成多余的。他们甚至在与西方盟国之间的互惠对待和遣返战俘问题上制造麻烦。

丘吉尔在罗斯福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前两天就同一个主题对英国议会发表了讲演。他在2月27日说：“斯大林元帅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友好相处、平等相待。我也感到他们的话是对他们的约束。我知道没有哪国政府比苏联政府更团结一致地信守义务，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在这里，我完全拒绝讨论苏联人的真诚。很显然，这些事情涉及整个世界的未来。”

丘吉尔不愿在罗马尼亚问题上变得更好战，因为他担心这会导致斯大林拒绝履行1944年11月他们在莫斯科签署的那份“耸人听闻”的文件规定的几项义务。不过，他准备在波兰问题上立场坚定，并警告罗

斯福说，他们可能看起来就这个主题签署了“一个欺骗性的计划”。“我相信您同意我的看法，这里涉及的远不止波兰。我感到这个问题是对我们与苏联人之间赋予像民主、主权、独立、代议制政体以及自由而不受约束的选举等以何种含义的考验。”这是1945年3月8日，也即这位首相向议会发表讲演9天之后。

罗斯福在3月11日的回信中写道：“我下定决心，正如我知道您也一样，不让在克里米亚达成的正确决定从我们的手上溜掉，并尽一切努力约束斯大林，使其履行协定。”他说，哈里曼向莫洛托夫提及了罗马尼亚。据推测，他提到1944年11月丘吉尔将罗马尼亚作为礼物送给斯大林。罗斯福还提到苏联需要一个不受威胁的后院的合理性，尽管他承认这个借口被苏联人滥用。

关于波兰，罗斯福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坚持正确解释在克里米亚达成的决定。您的推断非常正确，即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它的人民都不会支持参与卢布林政府的诡计或者对它的纯粹粉饰，而解决方案必须像我们在雅尔塔所设想的那样。”

次日，罗斯福又回复了丘吉尔3月10日有关苏联压制波兰的长电报，他写道：“我们迫切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手段，以实现在雅尔塔商定的各项纠正措施。”3月13日丘吉尔又发来了一封长电报，他说：“如果我们不保持一致，波兰的灭亡将是注定的。”危险在于他将不得不承认“在雅尔塔达成的东西变成了一个重大失败，它被彻底撕毁，但是我们英国人没有进一步实现它的必要实力，我们的行动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罗斯福在3月15日的回信中说，他什么分歧都没发现，美英之间只是存在一点儿战术上的差异。这封回信像从3月中旬至4月中旬关于这一主题的所有雪片似的往来信件一样，就罗斯福而言，他不乏现实主义和决心。

在离开华盛顿去国外的五个星期之后，罗斯福的时间表排得非常满。他整天工作，接待许许多多的来访者，而在早期监督雅尔塔协定

的履行情况也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3月9日例行记者招待会结束后，罗斯福用他那过得去的法语与一群来访的法国记者打趣。这是他为与法国和解而战的又一组成部分。他否认自己与戴高乐之间有点儿小问题。

那天晚上，没有时间观念的麦肯齐国王来同罗斯福一起吃晚餐，埃莉诺和安娜显然都对罗斯福的身体感到担忧。“他看起来更老了，脸更加消瘦……”但是，几小时之后，国王觉得对他不那么担心了。他还觉得罗斯福的右眼比左眼更亮，总统有“将许多事情都归功于自己的倾向”。

罗斯福告诉麦肯齐国王，他计划6月去欧洲，去白金汉宫拜访大不列颠的国王和王后；向英国议会发表讲演；到契克斯别墅访问丘吉尔；拜访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并且有可能去巴黎访问戴高乐，以及检阅获胜部队和新近的战场。丘吉尔向罗森曼预言，英国人民会给予他自拿破仑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最盛大欢迎”，“它将出于英国人民真诚、由衷的情感。英国人都爱戴他，因为他为把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所做的一切”，以及赋予他们对自己未来的安全感。

3月12日开始的这一周，露西·默瑟·拉瑟弗德在华盛顿。那天是总统用车去接的她，然后带她一起去弗吉尼亚乡间兜风。使人惊讶的是，这些短途旅行并没有吸引公众的注意，也从未被报告给埃莉诺。当天晚上，露西、安娜夫妇和总统愉快地共进晚餐。第二天晚上，还是这几个人在一起，外加避不开的麦肯齐国王。罗斯福说露西是“一个亲戚”，这位国王发现她“是一个很可爱、很有魅力的女人”。显然他对他的东道主与这个女人的关系秘史毫不知情。

第二天，总统的午餐由露西和安娜作陪，晚餐是罗斯福和露西单独在一起吃的。3月15日，埃莉诺回来了，两天后，她和总统一起庆祝了他们的金婚。3月19日埃莉诺离开了华盛顿，同一天，露西回来了，

与总统一起去乡村兜风，并跟他及安娜夫妇一起进餐。次日，他们在总统的书房喝茶。

3月24日，总统和他的夫人动身去海德公园。罗斯福第一次愉快地让他的妻子开他的车带着他在庄园的四周兜圈子，而他就坐在她的身边。通常，他坚持开飞车以显示他超乎寻常的车技，就像当他切火鸡甚或署上他自负而浮夸的亲笔签名一样，是对其病症的一种反抗。

雅尔塔会议闭幕6个星期之后，无疑，斯大林在严重地违背他的许多义务。3月23日，罗斯福对女儿说："我们不能与斯大林交往，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做出的所有承诺。"罗伯特·康奎斯特适时地说，这不十分准确，因为斯大林正在违背更多的东西。3月29日，罗斯福对《纽约时报》的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说，如果不是斯大林不诚实，那么就是他已经无法控制苏联政府。丘吉尔和霍普金斯两人都曾提及斯大林需要应对的压力和竞争，但是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平稳地度过了30年代的骚乱和血腥事件，目前，苏联取得自击退拿破仑以来最重大的胜利之后，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当然不可能被动摇。

3月27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信，复述莫洛托夫已经断然拒绝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大使提出的每一个要点问题。苏联人坚持"卢布林委员会"的完全合法性。莫洛托夫不会听从在波兰的观察员的意见，尽管他最终给予他们准人权，但组织选举的事情什么都没有做。显而易见，他的手段是在"卢布林委员会"巩固权力时把事情往后拖……

罗斯福将3月24日和27日他与斯大林之间的一份笔谈寄给了丘吉尔，其间他请求斯大林派莫洛托夫来旧金山，斯大林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因为"应副主席的要求，最高苏维埃已经开会了"。

3月29日，罗斯福又给丘吉尔发了一封内容广泛的电报，对他的担忧表示同意。罗斯福说，他"正焦虑地注视着"苏联人的行动，"深刻地了解对世界合作的种种威胁……就我们而言，我们不打算逃避《雅尔

塔协定》所规定的责任。”罗斯福认为现在是坦率地劝告斯大林的时候了。他随电报附了一封拟定的给斯大林的信，信写得直截了当但不失礼貌。丘吉尔对这封信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罗斯福接受了，随后寄给了斯大林。丘吉尔也将自己准备寄给斯大林的信首先寄给罗斯福过目，罗斯福对这封信表示同意。

罗斯福在争取时间。他不希望这种创建世界组织的高涨情绪消退。这是使美国最迅速地参与世界事务的方法，以至于苏联的背叛将激起美国公众的愤怒决心，去保卫那些易为暴饮暴食的“熊”所伤的国家。当然，罗斯福也寄希望于原子武器的开发，它无疑会增强美国与斯大林摊牌的实力。至此，斯大林本应该觉察到，美国永远不会退回到孤立状态，德国不会被肢解，也不会被强加沉重的赔款。德国因此仍是一个西方盟国手中的强大国家。

为了更密切地协调东西两线最高司令部行动，艾森豪威尔在雅尔塔被授权直接与苏联最高司令部联系。3月28日，艾森豪威尔这样做了。让英国人生气的是，这导致将柏林留给了苏联，尽管长期以来罗斯福认为这个城市应该由西方盟国夺取，后来，它被1944年9月12日划分在德国的占领区计划所取代。

艾森豪威尔认为，由于占领区已经确定了，因此，为了换取依据“欧洲咨询委员会”的占领区协定将交还给苏联的领土而牺牲美、英、加（拿大）以及法国士兵的生命，这是无意义的。斯大林经由美国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向艾森豪威尔暗示，事实上，在发动夺取该城市的强有力进攻时，他对柏林也不太感兴趣。

丘吉尔反对错过尽可能向东纵深推进的机会，尽管他没有特别敦促罗斯福拒绝交还这些由此将脱离苏占领区而成为西方国家占领的领土，但在几个星期后他确实敦促杜鲁门采取这样的行动方针。

在艾森豪威尔的自传中，他相当公正地写道：“当然，首相知道，不论盟军可能向东推进多远，他和总统已经一致同意，英国和美国占领区的东部边界应以柏林以西320千米为限。结果，怀着确保西方盟军在苏联红军之前到达柏林的希望，他极力坚持动用我方的一切资源，这一定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西方盟国的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将会因这次成就而大大提高。”

用艾森豪威尔自己的话说，“当然知道”丘吉尔考虑的不是夺取柏林或者任何其他地区再把它还给苏联人，而是使它脱离苏联。艾森豪威尔为避免政治麻烦而将自己局限于军事问题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在他的自传里假意声称这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是不对的。

在收到艾森豪威尔致斯大林信的副本之后，丘吉尔连珠炮似的向马歇尔和罗斯福提出（盟军）尽快向东推进的各种要求。艾森豪威尔在3月30日回应说，他“对于英国人抗议什么完全蒙在鼓里”，他“只是遵守菲尔德·马歇尔·布鲁克总是对他喊的那条原则……集中于一次重大突击……”正是在收到艾森豪威尔的信之后，斯大林对柏林发起了他的决定性进攻。

丘吉尔在1945年4月18日的电报中告诉杜鲁门，这是“大战略的一部分，战争计划不能将它漏掉……”至于占领区，丘吉尔表示愿意坚持，但指出这个问题只能在“欧洲胜利日”之后讨论，还会有一些问题要跟苏联人讨论。据杜鲁门说，丘吉尔还补充道：“占领区决定得有些草率……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我们在德国超乎寻常的推进。”

罗斯福有些这样的预见，然而，他承受着对于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向东推进可能达到的界限不够乐观的责备。因为他去世得突然，所以他不具备丘吉尔、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所充分享有的撰写自我开脱的自传的机会。

杜鲁门在10年后写道："对于一个我们如此明确地对其承担义务的协定，我不知道有何对其提出质疑的理由，我也不知道对成功的军事行动加以干涉有何益处。"他还引用时为他的国内政敌艾森豪威尔的话说："万一苏联人正式宣布他们打算直接向他们的占领区边界推进，美军将陷入严重的困境。"

艾森豪威尔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担心被夸大了。他没能根据巴顿的尽早打进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采取适当行动。至少，他本应该夺取这个国家的捷克部分，将斯洛伐克留给苏联人。捷克斯洛伐克不受"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任何协定的约束，也不受1944年10月丘吉尔–斯大林协议的约束。不过，艾森豪威尔对于苏联人可能在美国人之前并先于西方盟国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到达丹麦半岛的担心是合理的。

在对待雅尔塔神话上，杜鲁门远不像丘吉尔那样恶意中伤，他大约和艾森豪威尔处在同一水准上。杜鲁门从没承认他本应该夺取更多领土，对其持守不放，直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到那时，再以更强的实力对付斯大林。

将这些问题提交给马歇尔处理是一种不适当的反应，因为马歇尔服从艾森豪威尔，而后者以不违反已达成的占领区协议为自己的任务。这是一个政治而非军事决定，杜鲁门和马歇尔原本不应该将它交给艾森豪威尔处理。丘吉尔除了请求美国人采取他们所能采取的行动并对苏联人摆出好战姿态之外，提不出任何计划，因为他承认，英国自己没有实力这样做，这一事实使美国新总统的立场变得复杂。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战略问题含糊不清，这一点在1945年4月12日宴会上他与巴顿的一次谈话中得到了阐明。艾森豪威尔说："从战术观点来看，夺取柏林是不明智的，我希望政治影响不会促使我夺取这个城市。它没有战术或战略价值，并会让美军背上照顾成千上万德国人、流离失所的人以及同盟国的战俘的负担。"巴顿强有力地反对他的观点。几分钟后，他们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假使艾森豪威尔知道苏

联人不履行雅尔塔承诺，西方可能会废除占领区协定，甚或原子武器可能即将面世，那么，他会有不同的想法。杜鲁门和马歇尔将决定权转给艾森豪威尔，却没有为他提供背景资料，以便他能做出一个有资料依据的决定。

在没有听从丘吉尔向柏林挺进的要求情况下，西方盟军夺取了大量曾被指明为苏联占领区的领土，并直到1945年6月11日德国投降一个多月后才将它交出。当时，英国人和美国人仍在试图促使苏联参加对日战争，而原子弹试验还要再等5个星期。由于这些原因，杜鲁门拒绝了丘吉尔的敦促：留住这些土地，将它们作为6月11日后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杜鲁门本应该保留它们，他没有这样做不是罗斯福的责任。可是，杜鲁门不该受太多的责备，他新上任，对这些事情的背景不了解，而且，从不同且重要的消息来源获取相互冲突的建议。他学得很快。

对于英国偏激的保守党党员、美国共和党右翼以及戴高乐主义的支持者来说，将苏联在中欧的存在归咎于罗斯福是很顺理成章的。雅尔塔神话由于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显而易见地恶化。

Ⅱ

罗斯福从海德公园返回华盛顿，短暂逗留后便动身去“温泉”做一次康复性旅游，于3月30日到达那里。平时，警卫长迈克·赖利将总统转移到另一把椅子上很容易，例如从他的专列上转到汽车上。这一次，在到达“温泉”时他“死沉”，赖利得移动他整个72千克重的身躯。他的头垂着，周围的人时时刻刻感到担心。以往只有一次，当他从德黑兰回来时这样的无精打采。不过，一上了他的车，他就高兴地自己

开车，从一个小火车站一直开到“冬天的白宫”。他告诉戴西·萨克利他的强烈欲望是“睡觉，睡觉，再睡觉”。3月30日，他的助手威廉·哈西特告诉布鲁恩医生：“他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没有什么世俗的力量能让他待在这儿。”

1945年4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次大规模的水陆两栖军事行动开始了，美军进攻位于琉球群岛的冲绳岛，这里距日本本土只有560千米。这是一次残酷的军事行动，它持续了近3个月，造成美军4.9万人的伤亡（其中死亡人数为1.25万人），日本的伤亡人数大约为11.7万人，其中死亡人数为11万人。日本还损失了近8 000架飞机，其中许多是由敢死队队员驾驶的二流飞机。

到这时，尼米兹率领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其中包括由麦克阿瑟指挥的军舰，已经具有了庞大规模，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阶段，这支舰队在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中能运载4 000多架飞机，有时能向海上运送40万名士兵。

4月3日和4日，罗斯福与斯大林就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分别由卡尔·沃尔夫和艾伦·杜勒斯率领的谈判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于斯大林提出的为什么没有邀请苏联代表加入盟国的问题，罗斯福未做回答，而是暗示，假使谈判得以继续进行，苏联人会被引入谈判。沃尔夫将军不能交出更多的德军，双方的谈判没有深入下去。

斯大林的好奇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丘吉尔原想通过这些渠道冲进奥地利和匈牙利以便填补真空，这恰恰是斯大林所指控的盟国的计划。但是，斯大林指控西方串通一气加强德国对苏联的抵抗是没有根据的。

罗斯福在其4月4日致斯大林的信的结尾处写道：“就在胜利触手可及的时刻，在丧失了大量的生命、物力和财力之后，如果这种怀疑、这种缺乏信任损害了整个事业，那将是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坦率

地说，因为这种对我的行动或者我所信任的下属的行动的恶意歪曲，我不能不对你的告密者充满怨恨，不论他是谁。”罗斯福有力地指责斯大林上了德国宣传工具的当，指出它们现在正不顾一切地制造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的矛盾。

4月5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写了回信，口头上敦促采取更强硬的路线。他担心斯大林会拒绝西方盟国进入他们在奥地利的占领区，这被证明是不必要的担心。

丘吉尔将他自己写的信寄给了斯大林，他在信上指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已经适当、适时地将伯尔尼会谈的进展情况透露给了莫洛托夫，并和罗斯福一道反驳“您在4月3日致总统信中所提出的各种指控”。

这件事过去了，但4月6日罗斯福又将他更多的最新看法写信告诉了丘吉尔：“我为您写给斯大林的那封非常清楚而坚定的信感到高兴。我们不能给任何人留下我们害怕了的错误印象。我们的部队很快就会处于这样的地位：使我们的态度变得强硬。”

罗斯福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无法肯定，但是，他当然非常清楚斯大林在违背自己的承诺，但罗斯福的本性不是被动地听任别人把更好的东西从他那里拿走，并将勇敢而不幸的受害者踩在脚下，正如他所做的这样，尤其是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

他曾坚定地支持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但是，这是他准备在直接与斯大林打交道时，使战后地缘政治优先于纯军事考虑的第一个迹象。他是一个有点儿喜欢炫耀的扑克牌玩家，他原本可能转而完全支持丘吉尔的观点：西方盟国应该尽可能地夺取领土，并拖延向苏联移交其在德国的占领区的领土的时间，直到苏联人在《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和波兰问题上做出了具体成绩。

这原本与罗斯福的政策——在谋求最终解决与斯大林之间的突出问题之前，形成一个在西中欧问题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会试图避免与斯大林的关系公开破裂，直到世界组织及其支持良好目标的保护伞已经建立起来。他会试图将最棘手的问题推迟到1945年7月举行的下一次高峰会议，到那时，原子弹该研制出来了。在雅尔塔他对斯大林最后说的话是："我们不久会在柏林重逢。"

紧接着，4月8日，罗斯福以同样的腔调写给丘吉尔的信上说，鉴于事态的发展，他不会选择向苏联派一个经济代表团以便讨论经济援助问题。他认为一个双边委员会也不合适，因为他不希望美国是正在退出雅尔塔协定的一方，他说："我们必须小心不削弱我们为了使苏联人履行他们一方的那些承诺而做出的努力。"

4月10日，罗斯福在致丘吉尔的信中写道："我们将不得不最谨慎地考虑斯大林的态度的含义，以及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在没有与您协商的情况下，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也不会发表任何声明，我知道，您也会这样。"

英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关于与斯大林的关系的交流在4月11日这天达到了最高潮，当天丘吉尔给罗斯福发了6封电报，罗斯福回复了3封。丘吉尔在致罗斯福的电报中附了一封斯大林的信，这封信部分是为了撤回他对伯尔尼会谈的指控。斯大林在信上说："我和莫洛托夫都没有任何意图给任何人'抹黑'……不过，如果您继续将我的任何坦率声明都看作是进攻性的，那会使这种交流变得十分困难。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意图冒犯任何人。"丘吉尔对罗斯福评论说："我感觉，这是我们将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最好的回应，当然，它接近于一个道歉。"罗斯福回答说："我将使总的苏联问题尽可能地最小化，因为这些问题似乎每天都以某种形式出现，而它们大多数都得到了解决，就像伯尔尼会议的情况那样。不过，我们必须坚定，而且，我们迄今的行动路线是正确的。"

这是所知的罗斯福关于这个问题的定论，它反映了罗斯福深信以强硬路线反对斯大林蔑视雅尔塔承诺会防止与苏联关系的较早公开破裂。试验原子武器和创建联合国还需要3个多月。如果核武器不奏效，甚至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征服日本也还需要3~6个月的时间。

丘吉尔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雅尔塔神话，他在其自传和其他场合声称，罗斯福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对于后来被他称之为横跨中欧的铁幕的降落负有责任。正如丘吉尔十分清楚地知道的那样，罗斯福希望世界组织的建立、原子弹由美国研制成功，以及苏联击败日本都将在他与苏联保持总体一致的公开借口终止之前完成。杜鲁门上任后，接受并在几个月内听从其前任的文职和军方顾问的意见。

但是，正如丘吉尔所清楚知道的，在任何这些情况发生之前，罗斯福赞同要求斯大林能合理地遵守其承诺。在经过短暂停顿之后，这成为杜鲁门采取行动的方针。

4月13日，斯特蒂纽斯将一份美国与所有主要国家关系的概要给了杜鲁门。这些如实地呈现了罗斯福政府最后的政策立场。在丘吉尔“完全同意”美国对雅尔塔会议的解释的同时，“他倾向于对苏联施压这一立场”。对于法国，“美国的最佳利益是要求它尽一切努力在道义上和精神上协助法国恢复其实力和影响”。

至于对苏联，“自从雅尔塔会议以来，苏联政府几乎在每一个主要问题上都采取坚定而不妥协的立场，”丘吉尔列举说，尤其是在波兰和被解放地区的问题上，“他们一直要求在战后得到更大的荣誉。”而罗斯福拒绝给予。

在意大利问题上，美国与苏联和英国两者之间都存在麻烦，后者希望使这个国家维持其“反常状态……既作为一个积极的联合国成员又作为一个被击败的敌人的一个双重身份”。美国理所当然地希望它立即加入联合国。

1945年4月，“温泉”的魔力对罗斯福起了作用，正如往常那样。几天后，他不再面色苍白、有气无力了。他的肤色和食欲恢复了，体重和活力也有所增加，尽管他的血压还不稳定。他在上午和晚上身体状态较好，而在下午经常显得萎靡不振。

4月9日，罗斯福与戴西乘他的车在一辆保安车的护卫下去接露西的车。“他不断地躲避着阳光，目光掠过每一辆向我们开来的车，想象着它在慢慢地减速。”戴西写道。对于一个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家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吃惊的突袭。他们在离“温泉”72千米的地方相遇了，露西是带着肖像画家伊丽沙白·舒玛多夫一起来的，她们上了总统的车。

4月11日，在与丘吉尔进行了频繁的电报交流之后，罗斯福向罗伯特·舍伍德口授修改他起草的“杰斐逊日”讲演稿。它是一种情绪激昂的对和平的恳求，它在结尾处这样写道：“对于我们实现明天的唯一限制是我们对今天的怀疑。让我们怀着坚定、积极的信心阔步前行。”

接着，罗斯福在三位女士的陪伴下驱车前往这一地区他最喜爱的野餐场所和景点。戴西写道，这曾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他们坐在阳光下聊了一个多小时，他的皮肤恢复了健康的棕褐色”。

那天晚上，亨利·摩根索过来用餐，他仍竭力推行其使德国田园化的幻想。摩根索声称罗斯福说他“100%同意您的设想”。这位财政部长回忆说，罗斯福的手抖得这么厉害，以至于在他倒饮料的时候差点儿将鸡尾酒杯碰翻。总统一再“将人名弄混”，摩根索“痛苦地注视着他”从轮椅上移到他餐桌旁的椅子上。

宴会结束后，摩根索离开了，罗斯福和女士们“围坐在一起边笑边聊，我必须说，总统看来好像很幸福，过得很愉快”。

考虑到摩根索夫妇与埃莉诺那么友好，让他来与露西一起用餐是不合适的。在对妻子绝对禁止他们交往怨恨了27年之后，罗斯福一定是几乎准备好向她透露这件意想不到的事。

布鲁恩在3月末的记录上写道，在与埃莉诺谈了45分钟话之后，总统的血压上升了50。他仍保持礼貌，不时重复着：“对不起，埃莉诺，但是，我做不到。”（她在请求他增加对“南斯拉夫敌后游击队”的援助。）“总统的前额青筋暴出。”但是，不管埃莉诺可能继续对他造成怎样的麻烦，事情还是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如果他选择与露西交往，埃莉诺几乎无计可施。罗斯福的母亲去世了，他也不用考虑再一次面对选民，这使他最终在其罗曼蒂克关系上拥有了相对的行动自由。戴西当然将露西光临“温泉”记录在案，就好像这不会引起争议一样。

次日上午晚些时候，总统在写文件，而露西的朋友伊丽莎白·舒玛多夫在为他画肖像。露西、劳拉和戴西都和总统待在他那个小房子的客厅里。总统穿了一套优雅的双排扣灰色西装。戴西在钩编工艺品，劳拉在插花，随后她离开了房间一小会儿。露西在欣赏这位艺术家笔下的肖像。比尔·哈西特拿着文件进来请总统签阅，当他发现舒玛多夫在场时感到生气。“这是我制定法律的地方。”总统说，他挥笔签署了一项国会的法案。

男仆在为午餐摆放桌子。总统看了一下他的表，下午1点整，他说，绘画得在15分钟之内结束。几乎就在那个时间一到，“富兰克林似乎在找什么东西，他探着头，手摸索着”。戴西靠近前来，问他是否香烟掉了。他将左手举到脑后说：“我的后脑勺很疼。”戴西建议他把头向后靠。

“露西，出事了!”舒玛多夫说。露西和劳拉将总统的椅子向后倾斜，这时戴西在打电话找布鲁恩医生。男管家和总统的贴身男仆在她们的协助下将总统抱到隔壁他的床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劳拉·德

拉诺听到处在半清醒半昏迷状态中的罗斯福说：“小心。”这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

戴西攥着他的左手。劳拉拍打他并监测他的心跳。露西把樟脑放到他的鼻孔下。“有两三次他的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睁开眼睛，”戴西写道，但是“在那些眼睛中，我看不到任何可以识别的迹象”。他陷入完全的昏迷状态。格雷斯·塔利到了，他默默地祈祷。

布鲁恩到了，他把女人们赶了出去，帮助男管家和男仆给总统换上了他的睡衣。他给总统打了针，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的患者发生了脑出血。总统的呼吸声音很响，像刚刚劳作完一样。比尔·哈西特进了卧室，他后来记得总统的双目紧闭，嘴张着，“那可怕的呼吸……但是，那希腊式鼻子和高贵的前额还像以往一样尊贵。我知道我不会再看见他了。”

1945年4月12日下午3时35分，罗斯福停止了呼吸，甚至直接向心脏注射了肾上腺素也是徒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自己的床上和他最珍爱的朋友的陪伴下去世了。幸运的是，对于一个在这么长时间里快乐地承受了这么多痛苦的人，在其生命终结时，他去得比较平静，没有明显的恐惧或者使人不安的临死的预兆。对于美国和世界而言，他似乎像他的1 300万陆军士兵、水兵和空军士兵中的一员一样倒下了。25年多来，他一直为没能在战时穿上一套真正的军服而窘迫，此刻，他应该无比自豪，作为强大、胜利的美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他的名字在明天美国官方公布的阵亡名单上高居榜首。

III

在总统刚发病不久，麦金太尔就给埃莉诺打了电话，说他“晕倒了”。这位医生还说，总统的情况“不是很严重”，但是，她应该准备当

天晚上到“温泉”来。埃莉诺问，她是否应该取消她下午4时在“苏格雷夫俱乐部”预约的演讲，麦金太尔建议她按计划进行，否则惊慌会被扩大。

哈西特给斯蒂芬·厄尔利打电话，总统去世的消息第一次传到白宫。埃莉诺在“苏格雷夫俱乐部”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她返回比德罗·威尔逊夫人旁边的座位上，聆听著名钢琴家伊夫林·泰纳的演奏。其间，她被叫出去接听来自白宫的一个紧急电话。电话是厄尔利打来的，他强调有要事，让她立刻返回白宫。

“无论如何，礼节还是要遵守的。”埃莉诺后来这样写道，她返回去欣赏了泰纳演奏的其余部分，接着，向大家致歉，解释说她要立即返回白宫。埃莉诺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了那里，乘车急匆匆地往家赶。厄尔利和麦金太尔在她的会客室，他们说出了那些可怕的话。

安娜正在毕士大医院探望她生病的儿子，她被接回了白宫，但没人告诉她为什么。早些时候麦金太尔曾告知她，她的父亲“摔着了”，据他描述没什么大碍。埃莉诺已经换上了一身黑衣服，她叫人找副总统杜鲁门来，还给她的儿子们发了电报，告知他们的父亲已经“长眠了”，“他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如他期望你们去做的那样”。埃莉诺甚至还给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接受康复治疗的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妻子去了电话，请她拔掉收音机的电源，以免她受到严重的打击。

下午5时30分，哈里·杜鲁门被召回了白宫。

斯特蒂纽斯到了，他泪流满面。他建议晚7时召集内阁会议举行新总统宣誓就职仪式。当首席法官哈伦·斯通让哈里·杜鲁门宣誓成为美国的第32任总统时，大多数内阁成员都在场。

埃莉诺·罗斯福在她丈夫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后不久就离开了白宫。总统去世的消息最终被公布了，埃莉诺在上车之前亲切地向一群白宫

雇员和记者发表了讲演。

将近午夜，埃莉诺到达了“温泉”。她来到了“小白宫”，拥抱了一直在那里等她的戴西、劳拉和格雷斯，并请她们每个人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轮到劳拉，她随口透露罗斯福当时坐着让人画像，一边还在阅读来信和文件，画像的这位艺术家是露西的一个朋友，露西当时也在场，她作为总统的客人一直待在“温泉”。显然，这三个女人事先没有沟通，戴西和格雷斯没有提到那幅肖像，或者其他两位女士在场。

在这个紧张的下午和夜晚，埃莉诺·罗斯福表现得极其镇静，现在她的尊严也没有弃她而去。她的侄女和女儿参与了一个阴谋，向她隐瞒她丈夫40年来事实上的双重浪漫生活，这令她感到沮丧和丢脸，但她仍保持镇定。她走进了他的卧室，随手关上了门，与她丈夫的遗体独处了5分钟。

埃莉诺为她的丈夫挑选最后一次穿的衣服：一套双排扣的蓝色西装、白衬衫和一条蓝自相间的领带。阿瑟·普雷蒂曼为罗斯福穿衣服，为他的主人梳理头发。当他被抬回起居室并被放进棺材里时，他看起来仍是一个相貌英俊的男人。在几小时内遭受两次巨大打击之后，埃莉诺·罗斯福表现出了超人的自控力。

1945年4月13日上午，成千上万佐治亚州人聚集在小“温泉”火车站的四周。罗斯福夫人请马歇尔将军负责安排各项事宜，后者以其不变的高效率执行了这一任务。来自佐治亚州本宁要塞的仪仗队行了军人的告别礼，军乐队演奏了哀乐。许许多多市民和游客流下了眼泪。

总统的火车经过了改装，将一个凸起的灵柩台放在一辆特等客车上，这使得当火车向北行进时，裹着国旗的总统灵柩能够被沿途的旁观者看到。它在夜晚被照亮，从很远处都能看到。火车徐徐开出，匀

速驶向1 300千米外的华盛顿。200多万人来到铁道边见证美国任期最长的领导人的最后一次旅行。

火车在4月14日早晨到达华盛顿的联合站，杜鲁门总统、内阁成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会和司法部的代表在那里迎候。当送葬的行列向白宫行进时，密密麻麻而肃静的人群分列在大街的两侧。灵柩通过正门进入白宫，被抬到东室。埃莉诺请求将灵柩再打开，“和我的丈夫”再待几分钟。她轻轻地将她手上的一枚金戒指戴到了她丈夫的手上，然后，非常平静地离开了房间。灵柩被封上了，没有再打开。

白宫的葬礼在4月14日下午4时举行，所有的华盛顿官员，包括军方的和文职的都参加了。来自美国盟国的高级代表有麦肯齐国王、英国外长安东尼·艾登和苏联大使安德列·葛罗米柯。

丘吉尔声称他想去参加罗斯福的葬礼，但从没解释他为什么没去。或许这个消息使他沮丧，丘吉尔有时就是这样，或者他大概感到太疲惫了。或许他为近18个月他和罗斯福之间的战略分歧、美国实力令人眩晕的攀升以及战后与斯大林达成战后安排过程中他自己的第三号地位而生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很快就克服了。回想起他和罗斯福真诚的友谊，他总是流露出怀念之情。丘吉尔本应该来，不仅是出于他和罗斯福的友谊，而且是为了与杜鲁门协调政策。

白宫的仪式短暂而简单，它以赞美诗《我们祖先的信仰》开头，包括朗读死者第一次就职演讲的片段。当包括瘦骨嶙峋的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许多人都控制不住地哭泣时，埃莉诺·罗斯福仍保持极其平静。在这些沉重的日子里，唯一泄露她悲痛的是在从“温泉”至华盛顿的火车上，当她问格雷斯·塔利她的丈夫对于他的葬礼安排曾有什么要求时，她的声音略有些嘶哑。

那天晚上，罗斯福总统最后一次离开白宫，他的灵柩被重新放上他的火车，在夜色中运往海德公园。安娜被安排住在她父亲火车上原

来的卧室里，但是，她不能入睡。“整个晚上我都坐在床铺边，注视着那些赶来看火车经过的人。他们中有小孩、父亲、祖父。他们在那儿……在整个漫漫长夜。”

灵柩又被放到一辆马车上，被拉到山上的斯普林伍德。在那里参加默哀的官员比在白宫时的稍少些，大多数是来自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总统的邻居。圣詹姆斯的78岁美国新教圣公会教牧师主持了默哀仪式。来自附近西点军校的仪仗队鸣了三响礼炮。

那是一个美好的春日，丁香花盛开，鸟儿在歌唱。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被安葬在一个小花园里的那幢大房子旁边，这儿是他孩提时代玩耍的地方。人们离开了。埃莉诺·罗斯福戴着45年前她丈夫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她的一枚胸针。她是最后一个离开坟墓边的人。

罗斯福曾讲过，他的墓碑上只刻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17年后，埃莉诺也加入了他的行列。

世界被其最著名、最重要的人的突然死亡惊得目瞪口呆，甚至像克洛内尔·麦考密克这样的国内死敌们都对罗斯福的去世给予了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所应有的那种尊重。

他的追随者几乎伤心欲绝。与他有分歧的阿尔本·巴克利说：“这是曾经发生的最不幸的悲剧之一。罗斯福在政府内的同仁，甚至那些发现他的方法惹人恼火的人，都为他的去世所震动。”摩根索、伊基斯、珀金斯，甚至华莱士和引人注目的霍普金斯都记录下了他们的悲伤。史汀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领袖是一位非常和蔼、友好的人，他的幽默、诙谐曾一直是内阁会议的生命。我认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敏锐地感到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我知道我就是这样。我从未隐瞒这一事实，即我认为他的行政持续混乱，但是，他的外交政策总是建立在深谋远虑和目光敏锐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国家的思想处于

严重混乱的阶段，失去领导者将是最令人担心的。杜鲁门总统在宣布国丧日时写道：“尽管他的声音沉寂了，但他的勇气尚存。”

曾被罗斯福打算任命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的原财政部长助理、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与罗斯福有过争论，并于1934年被解职。艾奇逊对罗斯福的态度是“钦佩而不喜爱……总统能够因玩扑克牌而放松，以及欣赏汤姆·科科伦的手风琴，他确实能对从他的仆人到国务卿的每一个人以其第一个名字呼之”。艾奇逊感到，罗斯福对待他像对“一个有出息的持重男孩”。

罗斯福的“本质……是力量。他流露出少许权力和命令的迹象。他的反应似乎太快。他的理由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后非常易于理解。他仍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一位值得钦佩和尊重的领袖。换句话说，他激起了极其多的喜爱和忠诚。”这一分析大半是可靠的。罗斯福是敏捷、神秘而冷酷的，并且是独立于他人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喜欢偶尔蓄意地以他的官职恐吓人，尤其是以司法手段骚扰对手。

艾奇逊的观点与波伦的有点类似。在得出罗斯福是一个伟人的结论之后，波伦继续写道：“我不能说罗斯福是一个可爱的人……在那些长期与他一起在白宫共事的人中，存在对他的真正喜爱，但不是那种发自个人喜爱的个人情感。”

很可能只有露西·拉瑟弗德和安娜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之间有一种完全的爱的关系。

这些特征可能增添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天资。正如他的没有人情味是一种限制一样，他的超然很可能是一种优点。他了解人民，而且，他受大众的喜爱远比受个人的喜爱多，而这是他作为政治家和领袖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之一。

他说：“我像一只猫。我迅速地一搏，接着，就松弛下来。”这尤其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声明，因为罗斯福不是一只猫而是一只狗的主人，他甚至于将自己描述成一个传统的利他主义的乡村绅士，绝对具有男子气概并且相当直截了当。在这一外表下面暗藏着一个有着狡猾个性的十足的孤独者，除了一个由几位女性听众（米西、露西、戴西、劳拉和安娜）构成的小圈子。据说，他很少对她们透露他自己，但他是充满深情的。科科伦说他有“女性化的”个性。亨利·华莱士最终明白，“他不了解任何人，也没有人了解他。就连他的家人都对他一无所知。”安娜证实这是真的。

他知道自己像一只猫，不是因为他研究过猫，或者拥有它们，而是他知道他的狡猾、执着和自我承受有猫的特性。这是一个十分犹豫的推测。但是，他喜欢狗的部分原因可能恰恰在于它们的纯粹忠诚，这与他的本性是一个对比。这些因素也唤起了他对于像伊基斯和摩根索这样的无条件忠诚者的欣赏。

埃夫里尔·哈里曼清晨3时在国外听说了他的领袖去世的消息。他了解斯大林夜间活动的习惯，因此，他穿戴好，去克里姆林宫通知苏联统治者这个消息。只有这一次，斯大林看起来真正被震动了，“极度悲伤。”哈里曼这样写道，他握着大使伸出的手足有半分钟。哈里曼建议，出于对已故总统的尊重，由莫洛托夫代表苏联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斯大林克服了他先前的不情愿，立刻就同意了。

戴高乐随后宣布，“我真心地对他的去世感到痛惜，他令我钦佩。”尽管他当时的反应不那么由衷。他也没有建议为罗斯福举行像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那样的盛大纪念活动，当时英国王室、政府及其他领导层都出席了那一纪念活动。

令人奇怪的是，东京广播电台严肃地宣布了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并播放了哀乐“以纪念这位伟人的逝世”，日本人将“美国现今所处的有利地位”归功于罗斯福。然而，在柏林，官方电台为此欢欣鼓舞。戈培

尔高兴地大叫香槟酒。这位帝国的宣传部长向希特勒表示祝贺。在4月14日当天向德国军队发布命令时，希特勒宣布德国的时运会复苏，因为“命运之神已经除掉了历史上最大的战犯”。

按照英国的惯例，为悼念一位显赫人物的去世，各党派的领导人都要在议会发表讲演。既然是这样，有鉴于当时在英国执政的是一个将国内各政治派别都统一在一起的联合政府，以及已故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的密切关系，丘吉尔被请求代表议会两院、各党派、全国和整个英帝国发表讲演。出于对已故总统的尊重，4月13日英国议会刚开会8分钟就宣布休会。4月17日下午，议会重新集会聆听丘吉尔的悼词，会场内座无虚席，甚至连台阶和所有的走廊都挤满了人。

在简略描述他与罗斯福的关系的历史与亲密程度之后，丘吉尔说：“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实务家和战争领袖令我钦佩。我对他的正直、激励人心的品格和观点充满信任。今天，我要对他表达我个人的敬意和敬爱，我必须说。他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对宪法的尊重，他判定多变的公众舆论的潮流和趋势的能力一直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他那颗宽厚的心总是被强者对弱者的侵略和压迫的场景所激怒并起而行动。他的心脏永远地停止跳动对人类来说确实是一个损失，一个惨痛的损失。

“苦恼沉重地压在罗斯福总统的身上。经历这么多年的所有混乱与风暴，他能承受住这种折磨，真是一个奇迹。像他那样的残疾之人，1 000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尝试投身于竭尽体力、智力和充满激烈、无休止的政治争议的生活之中。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人取得如此的成功。他不仅进入了这个领域，不仅在其中激情洋溢地展开活动，而且通过超乎寻常的使精神超越肉体，使意志力战胜疾病的努力，成为了这个舞台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毫无疑问，总统以超人的预见力预见到了巨大的危险正逼近战前的世界……对于他支持哪一方的问题，他从未有过片刻的迟疑……他

发明了被称为‘租借’的不寻常的援助措施，这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中最无私、最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的‘背信和贪婪行为之后’，”首相说，“我们两国共同武装起来。”

在描述战争取得的进展之后，丘吉尔接着说：“在雅尔塔，我注意到总统的身体欠佳。但他仍保持着迷人的微笑和愉快的态度，他的脸上有种清澈、净化的神态，眼中则有恍惚的神色。当我在亚历山大港向他道别时，我对他的健康和力量的衰退有种不可名状的担忧。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他坚定不移的责任感。他无所畏惧地面对他的无数任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走得多么令人羡慕！他已经引导美国走出了最严峻的险境和最沉重的辛劳。胜利之光已经确定不移地照耀着他。

在和平岁月，他扩大和稳定了美国人的生活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基础。在战争时期，他将这个伟大合众国的力量、威力和荣誉提升至历史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达到的高度……

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只能说已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我们所认识的最伟大的美国朋友，是自由的最伟大捍卫者，他曾将他的帮助和安慰从新世界带到旧世界。”

首相的讲演得到了深刻而冷静的赞同，他的提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温斯顿·丘吉尔以他惯有的慷慨大方和生动流畅的文笔给罗斯福夫人、杜鲁门总统和哈里·霍普金斯都写了信。他是在美国大使馆前面的格罗夫纳广场树起一座罗斯福塑像的发起者之一。他在议会发表的支持这一项目的讲演中说，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如果他失败了，西方文明就会遭受奴役，但是，华盛顿或林肯的失败后果仅局限于美国。

格罗夫纳广场上的罗斯福塑像的底座雕刻着这样的细节：给它的捐款“不允许超过5英镑，以便使英国各阶层的人们都有机会纪念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朋友”。在罗斯福逝世3周年之际，罗斯福夫人为罗斯福的塑像揭幕，英国国王、王后以及英国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导人都出席了揭幕仪式。

在罗斯福逝世50周年时，在这座塑像旁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但由杰出人士参加的纪念仪式，仪式上一位善于辞令的牧师吟诵道，在场的人聚集在一起是“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逝世周年纪念日致哀，也是为他作为美国的总统、‘二战’中同盟国的领导者以及人类权利和尊严的捍卫者的一生做感恩祈祷”。

在英国历史上，对于任何已故外国领袖从未有过一篇如此忧伤的颂词。英国人，尤其是丘吉尔，比任何人都更早地认识到，罗斯福是20世纪多么卓越的一位巨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忍受着强求美国援助的痛苦，他们知道，美国参与世界，支持民主、法治和西方的价值观，情况会有多么大的不同。

英国人已经认识到，没有美国持续地参与维持和平和巩固民主国家，一切都会处于险境；反之，就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没有其他地方的那种有竞争力的有效的体制，世界就会有逐渐归依西方政治、经济价值观的可能性。

Ⅳ

本书的论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因其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和自林肯以来最有作为的领袖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他的伟大依赖于七个方面的成就。

第一，他和丘吉尔并称为西方文明的救星。1940年，为了使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他劝说他的同胞援助他们的天然盟友。为了坚持到战争紧急状态结束，他自称被迫延长前所未有的他的总统任期。没有他的支持，英国就不能坚持作战。他将美国的领海向大西洋延伸288千米，德国的船只一旦被美国发现就会遭到袭击。他还对日本的军需品——石油和废金属实行禁运。这使得美国将会受到袭击成为必然。他知道这是为西方赢得战争胜利的唯一办法，而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的放肆蠢行让他从中得利。

借助于丘吉尔和英国人的雄辩和勇气以及对希特勒的野蛮的强烈反感，罗斯福引导美国的舆论走出1937年极度的孤立主义。

使美国扎根于世界是罗斯福的第二大成就。他永久地击败了孤立主义者，这是自滑铁卢战役以来为世界稳定所做出的最大贡献。20世纪后半期远比其前半期成功得多，其原因在于美国充当了一个维持稳定的强国，它在欧洲和远东提供了威慑和遏制的力量。在罗斯福以美国完全参与为前提的战后世界里，苏联在没有经历一次大战的情况下逐渐瓦解了。

罗斯福的第三大成就是他对美国政府的彻底改造。在使美国摆脱孤立并参与世界事务之前，罗斯福得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使政府参与以往受到限制或者根本不参与的领域，例如工业复兴、治理通货膨胀、大规模的工业福利制计划以及社会安全等等。

“新政”没有取得绝对的成功。这一计划最初的核心——《国家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案》，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上述列举的各领域的大多数计划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根据后来的标准，“新政”取得的成效是及格的，但从经济意义上说并非显著。作为危机管理和维护市民社会的措施，它是一次巧妙的成功。其中有许多

有益的创新，这些措施的总体效果逐渐使美国摆脱了“大萧条”，防止了类似灾难的重演。

罗斯福将政府重新界定为不仅是公共秩序而且是国民信心以及至少最低限度的社会公正所最后求助的保护者。他恢复了美国人对其国家和政府作为一个公平社会的至关重要、积极的推动者和经济与自然灾难的矫正者的信心。任何其他美国总统都不曾取得如此重要的改革成绩。罗斯福既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救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改革者。

通过战胜“大萧条”并部分地改革经济和社会体制，罗斯福维持或者恢复了民主政府的好名声。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政府是唯一一个重要国家的民主政府，也是唯一一个真正提高了人民社会地位的政府。罗斯福本人还是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唯一一个最终既没有受到独裁者也没有受到独裁者的绥靖者羞辱的领袖。丘吉尔和许多其他人帮助赋予民主以压倒性的合法性。但是，在1933~1940年这段令人气馁的岁月里，这个沉重的责任几乎就落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个人结实的肩膀上。

罗斯福的第四大成就是，他几乎是一位保持成功的战争领袖，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超越了华盛顿、麦迪逊、林肯或威尔逊。他的战略洞察力几乎总是准确的，即便他没有以一个军事战略家自居。他也比丘吉尔更少地烦扰他的指挥官，更不用说斯大林和希特勒。他在指挥官的任命上也做得很出色。

罗斯福从未动摇德国第一的战略，甚至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也是如此。他坚持尽早发动跨海峡的进攻，将其视为及时击败纳粹德国，以及赋予西方以防止苏联夺取德国甚至法国的最佳机会的唯一办法，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命令进攻菲律宾几乎无疑也是正确的。

从1940~1945年间，美国超额完成了罗斯福的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的告诫。在最危急的时刻，例如珍珠港事件、盟军在法国北部发起进攻日以及阿登战役，罗斯福都能保持冷静。他受到了他所有下属的钦佩，甚至包括麦克阿瑟以及巴顿。只有专爱唱反调的史迪威是个例外。

在政治与军事战略的界限上，他的敏锐直觉是他的可靠向导。这种直觉使他能够判断，在他被诱使与希特勒发生争执之前，斯大林还有多久能够独自承受90%的战争伤亡，以及采取行动以确保大部分地缘政治上有益的欧洲掌握在他们而非苏联人手里之前，英国人和美国人还能在主战区的边缘作战多久。在这些问题上处理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关系，除了纯军事的要素外，还要求几乎是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和手腕。

这导致了罗斯福的第五大成就：他为使其战后继任者能够完善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解放东欧和最终使世界安享民主创造了条件。他曾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拉斯大林加入负责任的世界领袖之列。他意识到让苏联进入西欧的危险，他在这方面的担心不比丘吉尔少。

在表现出战后美军可能从欧洲迅速撤离的同时，他在为无限期地占领大部分德国做准备。他决意着手研制核武器。他是联合国的主要创造者，该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框架和一个非常有限程度的世界政府能够根据盟国的意愿行事，如果它们能保持团结的话。

罗斯福意识到帝国会土崩瓦解，尽管丘吉尔和戴高乐持异议。在结束美国的孤立，使得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加入或重新加入西方，以及通过《雅尔塔协定》达成的关于波兰和被解放的欧洲的协议，使西方相对于苏联在更高的道德基础上树立了界桩的过程中，罗斯福为赢得冷战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要素。

罗斯福的第五大成就被雅尔塔神话所遮蔽。引发冷战是一个灾难性错误，但是“大联盟”解体以及斯大林被揭露为一个口是心非的敌人所带来的震动为有计划、有步骤地中伤罗斯福创造了机会。

美国在冷战中的大多数关键性人物都是罗斯福的门生，或者至少是他的仿效者，他们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直接的例子包括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艾奇逊、林登·约翰逊；而间接的例子包括肯尼迪以及其他更年轻的人，他们不认识罗斯福，“二战”期间在军中任职级别较低，但他们也向他学习，例如尼克松、基辛格、福特、里根和老布什。

丘吉尔在1945年英国大选中的失败更突出了罗斯福的第六大成就：他对美国政治体系无与伦比的控制。此前，丘吉尔在大选中从未领导一个政党，况且，英国自1935年以来就一直不曾举行过一次大选。罗斯福在“二战”期间两次面对选民，从未失去与美国舆论的联系。

罗斯福在美国政治的各方面都是专家。他知道如何操纵国会领导人，如何引导舆论，如何拟定和适时立法，以及如何照顾政党的领导核心和外围人员。他有非同寻常的直觉，能够感知舆论在何处和向何处以及以何种速度对其加以引导。

他有时行动谨慎，偶尔还优柔寡断。他有时也犯错误，但他无数次推动了舆论、劝诱了国会并实现了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常常是至关重要的目标，这些成绩大大超过了他的缺点。

他连续4次取得总统大选的胜利，连续7次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他所到之处总是能得到人们的广泛拥戴，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他在操纵美国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机器方面是一个天才。他对平民百姓的洞察力更引人注目，因为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他从未片刻假装他是。

他气度不凡。他认为怎样做总统就是如何做回他自己。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不喜欢成为一名总统。他成为了世界上最知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并且长期以来保持着这一形象，尽管在这一点上有时受到来自希特勒和丘吉尔的竞争。

他总是充满自信但从不自负或者显得盛气凌人，他也很少发脾气。他是一位天生的领袖，在他担任总统期间的所有可怖的岁月里，他从未有一次表现出片刻的恐惧。他是一个奇才，很难确定他何时停止使用可靠的直觉而开始了狡猾的分析。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他常常能找到使这个国家振奋的词句。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一直是他自己的顾问。在这个领域，正如他首先智胜保守主义者，接着是孤立主义者一样，他不需要顾问，而只需要执行者。他稳健地带领美国从“大萧条”的深渊走向战后的乐观与繁荣，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谨慎的，几乎没有给国内政治带来混乱。罗斯福就像一位杰出的杂技演员那样，只有当他的节目结束了，而且已经退出了舞台，他的精湛技巧和最终的成功才变得显而易见。从他就任总统到他离开，美国和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大部分可以归因于他担任美国总统，而这种变化从黑夜到白昼。

鉴于他的多才多艺，可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是人类非凡本领的宝库。他在掩饰小儿麻痹症影响的同时战胜了它，这被认为是他的第七大成就：不仅是他掩饰自己伤残程度的同时战胜它的勇气和决心，而且是他的胜利对于所有与重大困难（无论是否是疾病的折磨）抗争的人的意义。他的范例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几乎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罗斯福本该会感到特别快意，在他逝世10周年纪念会上，他在司法界的老搭档巴兹尔·奥康纳在“温泉”宣布索尔克疫苗研制成功，这种疫苗能预防小儿麻痹症，它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罗斯福战胜其疾病所取得的最终胜利，因为如果没有他为募捐所做出的如此成功

的努力，至少在10年后，在医学研究上不会取得这样的突破。罗斯福去世多年之后，“温泉基金会”集会时为罗斯福留了一个坐位，无声地纪念它的创建者。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有教养的人，他温文尔雅，记忆力非凡。他对于知识过于浅尝辄止，因而对许多科目不能完整地掌握。但是，他有充沛的洞察力和强烈的求知欲。他的直觉、精力和信心使他广泛地涉猎与他的公职相关的几乎所有问题。他阅读面很广，阅读速度很快，而且，能记住所读的内容。令埃莉诺惊讶的是，他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至少40万字的小说《飘》的主要内容阅读完了，且足以能回答他妻子关于这部小说的一些细节问题。

正如埃莉诺·罗斯福所说，当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和心理抑郁的深渊，但它是生机勃勃、压抑不住的。逐渐地，罗斯福的决心和乐观主义弥漫了他的政府和整个国家。他将全部的力量都奉献给了他所服务的国家，然后在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精疲力竭，溘然长逝，这时，美国在世界上有了重要而确定的目的，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它在世界上所发挥的军事、经济、大众文化以及道德影响力在民族国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还战胜了国内外的所有敌人。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齐名。因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将美国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使美国能够领导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罗斯福创造了这样的环境，使美国及其盟国能够在其中赢得和平，并引导世界进入比以往更美好的未来。